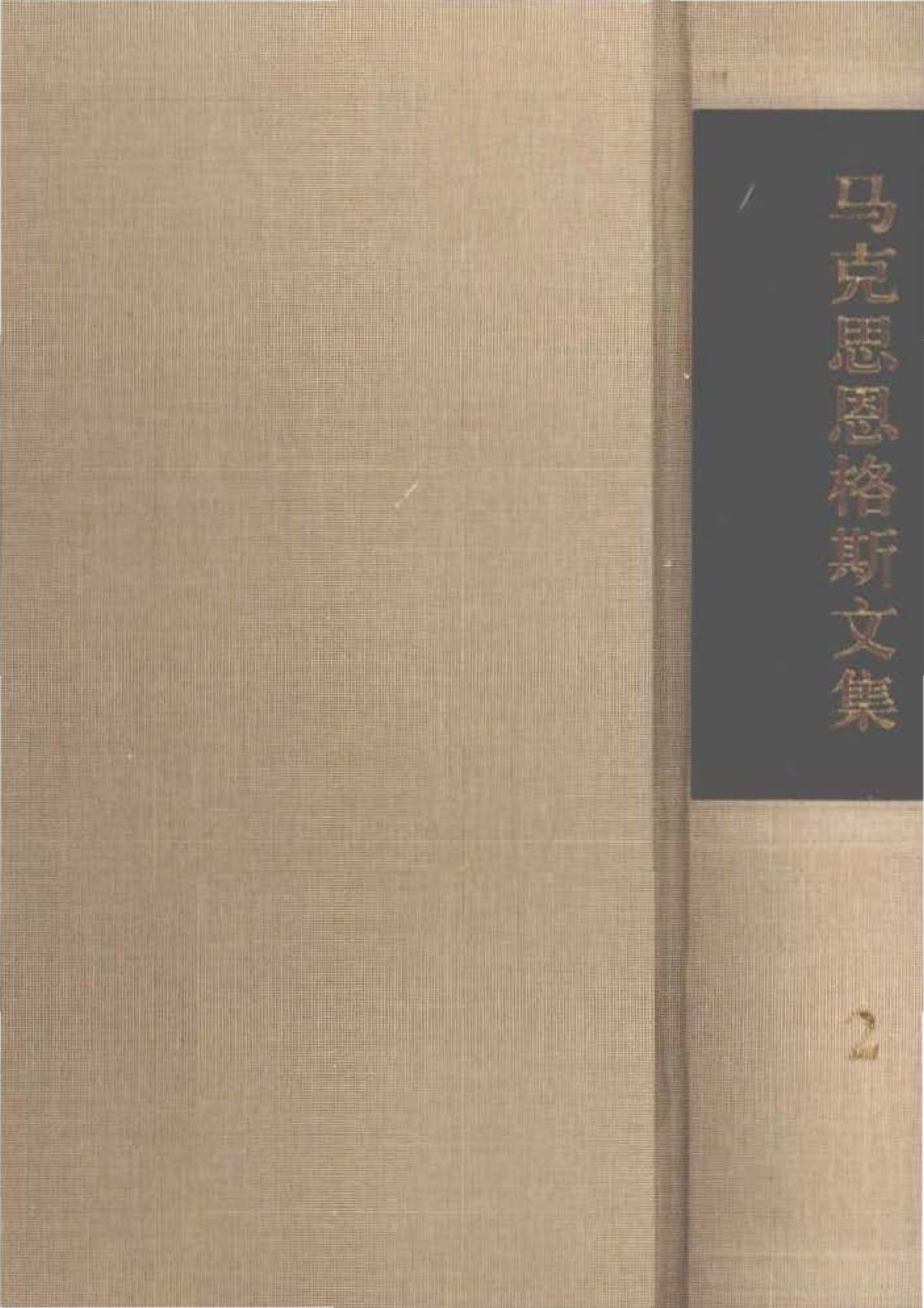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2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项目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2

1848—1859年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编译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邓仁娥
装帧统筹：曹　春
编辑助理：崔继新
技术设计：程凤琴
责任校对：吴海平　赵立新　徐林香　张　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01-008456-5

Ⅰ.马…　Ⅱ.中…　Ⅲ.马恩著作-文集　Ⅳ.A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04142号

书　　名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MAKESI ENGESI WENJI 第二卷
编 译 者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出版发行	人民出版社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邮编 100706)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邮购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59.25
字　　数	799千字
书　　号	ISBN 978-7-01-008456-5
定　　价	120.00元



编 辑 说 明

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点项目，旨在为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译文更准确、资料更翔实的基础文本。为了编辑这部文集，经中共中央批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成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点著作译文审核和修订课题组，由中央编译局组织实施。

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编为十卷，精选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各个时期写的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文集的内容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政治、法学、史学、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军事、民族、宗教等方面的重要论述，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

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所收的著作按编年和重要专著单独设卷相结合的方式编排：第一卷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3年至1848年期间的著作；第二卷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至1859年期间的著作；第三卷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64年至1883年期间的著作；第四卷收入恩格斯在1884年至1895年期间的著作；第五、六、七卷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二、三卷；第八卷为《资本论》手稿选编；第九卷收入恩格斯的两部专著《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第十卷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选编。

四、《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所收著作的译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和第二版以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为了保证译文的准确性，课题组根据最权威、最可靠的外文版本对全部译文重新作了审核和修订。校订所依据的外文版本主要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柏林）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莫斯科、伦敦、纽约）。部分文献还参照了国外有关机构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稿编辑出版的专题文集和单行本。

五、《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各卷均附有注释、人名索引、文献索引和名目索引，第十卷还附有《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大事年表》。课题组对原有的各类资料作了审核和修订，力求资料更翔实、考证更严谨。在注释部分，重新编写了全部著作的题注，增加了对各篇著作主要理论观点的介绍，以便读者把握这些著作的要义。在对各篇著作的写作和出版流传情况的介绍中，增加了对重要著作中译本出版情况的介绍，以便读者了解和研究这些著作在中国的传播情况。

六、《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技术规格沿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的相关规定：在目录和正文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引文中尖括号〈 〉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马克思、恩格斯加的，引文中加圈点处是马克思、恩格斯加着重号的地方；目录和正文中方括号[ ]内的文字是编者加的；未注明“编者注”的脚注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注。

七、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对文集的整体方案、各卷文献篇目、译文修订标准以及各篇著作的题注进行了认真审议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这对提高文集编译工作的质量起了重要作用。

目　　录

第二卷说明 .... *1—5*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 3—67

1872年德文版序言 5

1882年俄文版序言 7

1883年德文版序言 9

1888年英文版序言 11

1890年德文版序言 17

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 23

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 25

共产党宣言 30

一　资产者和无产者 31

二　无产者和共产党人 44

三　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 54

1. 反动的社会主义 54

(甲)封建的社会主义 54

(乙)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56

(丙)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 57

2. 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60

3.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62

四　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 65

卡·马克思　危机和反革命 .... 68—71

卡·马克思　资产阶级和反革命 .... 72—76
卡·马克思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 77—187
一　1848年的六月失败 80
二　1849年6月13日 106
三　1849年六月十三日事件的后果 138
四　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 173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
告同盟书　1850年3月 .... 188—199
弗·恩格斯　德国农民战争 .... 201—319
1870年第二版序言 203
1870年第二版序言的补充 213
德国农民战争 220
一 221
二 234
三 255
四 271
五 276
六 303
七 314
弗·恩格斯　*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条件与前景 .... 320—347
弗·恩格斯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 349—459
[一　革命前夕的德国] 351
[二　普鲁士邦] 360
[三　德国其他各邦] 370
[四　奥地利] 375

[五　维也纳起义] 382
[六　柏林起义] 386
[七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391
[八　波兰人、捷克人和德意志人] 396
[九　泛斯拉夫主义。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战争] 401
[十　巴黎起义。法兰克福议会] 406
[十一　维也纳起义] 410
[十二　对维也纳的攻击。对维也纳的背叛] 416
[十三　普鲁士制宪议会。国民议会] 424
[十四　秩序的恢复。议会和议院] 429
[十五　普鲁士的胜利] 435
[十六　国民议会和各邦政府] 440
[十七　起义] 444
[十八　小资产阶级] 449
[十九　起义的终结] 454
卡·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 461—578
1869年第二版序言 465
恩格斯写的1885年第三版序言 468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470
一 470
二 481
三 494
四 510
五 521
六 540

七 560
卡·马克思　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 .... 579—581
卡·马克思　法国的动产信用公司 .... 582—587
卡·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 588—594
弗·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 .... 595—606
一 595
二 600
卡·马克思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 607—614
卡·马克思　*俄国的对华贸易 .... 615—617
卡·马克思　*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 .... 618—621
弗·恩格斯　波斯和中国 .... 622—628
卡·马克思　鸦片贸易史 .... 629—636
一 629
二 633
卡·马克思　*英中条约 .... 637—642
卡·马克思　中国和英国的条约 .... 643—648
弗·恩格斯　*俄国在远东的成功 .... 649—653
卡·马克思　新的对华战争 .... 654—671
一 654
二 658
三 663
四 668
卡·马克思　对华贸易 .... 672—676
卡·马克思　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 .... 677—684

卡·马克思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 .... 685—691

注释 .... 695—784
人名索引 .... 785—837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 838—843
文献索引 .... 844—872
报刊索引 .... 873—880
名目索引 .... 881—927

插 图

《共产党宣言》1848年版(30页本)的封面 .... 4—5
马克思、恩格斯(19世纪40年代) .... 4—5
1872—1893年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德文、俄文、英文、
波兰文和意大利文版的扉页 27
1920年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
中文全译本 .... 66—67
载有《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部分内容的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 78—79
1942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
阶级斗争》中译本 .... 186—187
德国农民战争示意图 .... 270—271
载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的《纽约每日论坛报》 .... 408—409
最先刊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革命。不定期
刊物》第一期的扉页 463

1930年上海江南书店和1940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译本 .... 578—579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一版的扉页 589
1926—1934年间载有《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译文的
部分书刊 .... 614—615

第二卷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选收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1859年的著作，以及他们后来为一些著作写的序言。

这一时期，欧洲大陆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虽然遭到了失败，但动摇了封建制度的基础，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在革命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开始为争取自身解放而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身参加了1848—1849年革命，共同创办《新莱茵报》指导工人阶级的斗争实践。革命失败后，他们全面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科学理论。

本卷的开篇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的纲领《共产党宣言》。在这个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地评价了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论述了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伟大历史使命，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指出：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共产主义不仅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且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工人革命首先要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并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共产主义新社会将是这

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宣言》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础，论述了共产党的性质、特点、基本纲领和策略原则，指出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宣言》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流派，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这些流派的界限，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战斗口号。

本卷同时收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时期为《宣言》写的七篇序言。序言阐明了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是唯物史观，并结合各个国家的不同条件和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实践，阐述了《宣言》的指导意义，强调指出：不管后来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宣言》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是完全正确的；而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危机和反革命》、《资产阶级和反革命》是马克思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写的两篇评论。这两篇评论深刻地揭露了德国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行径及其原因，为无产阶级确立革命目标、制定斗争策略指明了方向。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是马克思科学总结法国1848—1849年革命经验的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通过对法国1848—1849年革命的分析和总结，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理论和策略，并第一次使用了“无产阶级专政”概念。他评价六月起义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伟大战斗，是保存还是消灭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马克思划清了革命的社会主义与各种空论的社

会主义的界限，指出革命的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克思阐明了"劳动权"的科学内涵，强调劳动权就是支配资本的权力，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配，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此外马克思还提出了"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个著名论点，并阐述了工农联盟的思想。

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了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经验，着重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策略，强调必须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并坚持无产阶级独立的革命策略，必须保持自己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独立性。他们第一次比较完整地阐述了"不断革命"理论，指出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不断革命，直到彻底消灭有产阶级的统治，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将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无产者手中。

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是在总结德国革命经验过程中撰写的一部重要史学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分析了16世纪上半叶德国农民战争的性质、根源和重要历史作用，强调工人阶级在现实斗争中必须高度重视和发挥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恩格斯还把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同德国1848—1849年革命进行比较，总结了这两次革命失败的原因及其主要经验教训。

《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条件与前景》是恩格斯论述军队及其作战方法同社会生产、政治制度的关系的军事著作。恩格斯通过总结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几次战争，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证明

新的军事科学只能是新的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而新的生产力则是作战方法上的每一步新的完善的前提。

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恩格斯全面总结了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起因、性质、过程及失败原因，并通过对德国社会结构、各阶级的地位及其在革命中的态度和作用的分析，论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略原则。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总结法国1848年革命经验和评述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政变的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通过对法国社会结构和阶级斗争状况的科学分析，揭示了历史运动的规律，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指出历次资产阶级革命都没有动摇在君主专制时代形成的军事官僚机器，反而把它当做主要的战利品，而无产阶级革命则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阐述了工农联盟的思想，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只有获得农民的支持，才能形成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都会成为孤鸿哀鸣。

马克思的《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扼要地阐述了唯物史观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指出：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中蕴含着巨大的革命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对抗必然引起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肩负着彻底改造旧世界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的《法国的动产信用公司》第一次评述了股份公司的作用和影响，指出：一方面，股份公司显示出前所未有的联合的生产能力，使工业企业具有单个资本家力所不能及的规模；另一方面，股份公司加速了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导致小资产阶级加速破产并使工业寡头集团的统治日益加强；与此同时，雇佣工人的人数迅速增长，成

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日益强大的革命力量。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作了经典表述，阐明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论证了旧的社会形态为新的更高的社会形态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条件。

恩格斯的书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局限性，阐述了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伟大贡献；阐明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的辩证统一，概要介绍了马克思的商品、价值和货币学说，强调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时期十分关注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斗争，本卷选收了他们论中国的10篇文章和论印度的两篇文章。

在论中国的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揭露了资本主义列强对华战争的侵略本质和血腥暴行，热情支持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并对中国的农民起义作了科学的评价。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封建专制的压迫和欧洲列强的侵略是引起中国革命的原因，中国革命必将对欧洲产生重要影响。

在论印度的文章中，马克思揭露了英国殖民统治的本质和罪恶行径，同时指出，它破坏了印度的宗法制，造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革命，因而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强调，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的时候，人类才能实现真正的历史进步。

卡·马克思

弗·恩格斯

1848—1859年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1]



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Veröffentlicht im Februar 1848.

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 vereinigt euch.

London.

Gedruckt in der Office der „Bildungs-Gesellschaft für Arbeiter"

von J. E. Burghard.

46, Liverpool Street, Bishopsgate.

《共产党宣言》1848年版(30页本)的封面



马克思、恩格斯(19世纪40年代)

1872年德文版序言[2]

共产主义者同盟[3]这个在当时条件下自然只能是秘密团体的国际工人组织，1847年11月在伦敦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委托我们两人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详细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结果就产生了这个《宣言》，《宣言》原稿在二月革命[4]前几星期送到伦敦付印。《宣言》最初用德文出版，它用这种文字在德国、英国和美国至少印过12种不同的版本。第一个英译本是由海伦·麦克法林女士翻译的，于1850年在伦敦《红色共和党人》杂志上发表，1871年至少又有三种不同的英译本在美国出版。法译本于1848年六月起义[5]前不久第一次在巴黎印行，最近又有法译本在纽约《社会主义者报》上发表；现在有人在准备新译本。波兰文译本在德文本初版问世后不久就在伦敦出现。俄译本是60年代在日内瓦出版的。丹麦文译本也是在原书问世后不久就出版了。

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

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6]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见《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德文版第19页，那里对这个思想作了更详细的阐述。）其次，很明显，对于社会主义文献所作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一批判只包括到1847年为止；同样也很明显，关于共产党人对待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的论述（第四章）虽然在原则上今天还是正确的，但是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因为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彻底扫除了。

但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下次再版时也许能加上一篇论述1847年到现在这段时期的导言。这次再版太仓促了，我们来不及做这件工作。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72年6月24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1872年6月24日

载于1872年在莱比锡出版的德文版《共产主义宣言》一书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8卷翻译

1882年俄文版序言[7]

巴枯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一版，60年代初①由《钟声》印刷所出版。当时西方认为这件事(《宣言》译成**俄文**出版)不过是著作界的一件奇闻。这种看法今天是不可能有了。

当时(1847年12月)卷入无产阶级运动的地区是多么狭小，这从《宣言》最后一章《共产党人对各国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一章里，正好没有说到俄国和美国。那时，俄国是欧洲全部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支庞大后备军；美国正通过移民吸收欧洲无产阶级的过剩力量。这两个国家，都向欧洲提供原料，同时又都是欧洲工业品的销售市场。所以，这两个国家不管怎样当时都是欧洲现存秩序的支柱。

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正是欧洲移民，使北美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这种农业生产的竞争震撼着欧洲大小土地所有制的根基。此外，这种移民还使美国能够以巨大的力量和规模开发其丰富的工业资源，以至于很快就会摧毁西欧特别是英国迄今为止的工业垄断地位。这两种情况反过来对美国本身也起着革命作用。作为整个政治制度基础的农场主的中小土地所有制，正逐渐被大农场的竞争所

---

①应是1869年。——编者注

②《宣言》最后一章的标题应是《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编者注

征服，同时，在各工业区，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和神话般的资本积聚第一次发展起来了。

现在来看看俄国吧！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不仅欧洲的君主，而且连欧洲的资产者，都把俄国的干涉看做是帮助他们对付刚刚开始觉醒的无产阶级的唯一救星。沙皇被宣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现在，沙皇在加特契纳成了革命的俘虏[8]，而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

《共产主义宣言》①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2年1月21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1882年1月21日

载于1882年2月5日《民意》杂志第8—9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5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翻译

①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1883年德文版序言[9]

本版序言不幸只能由我一个人署名了。马克思这位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应受到欧美整个工人阶级感谢的人物，已经长眠于海格特公墓，他的墓上已经初次长出了青草。在他逝世以后，就更谈不上对《宣言》作什么修改或补充了。因此，我认为更有必要在这里再一次明确地申述下面这一点。

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①

①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转载该序言时在此处加了一个注："我在英译本序言中说过：'在我看来这一思想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我们两人早在1845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当时我个人独自在这方面达到什么程度，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就是最好的说明。但是到1845年春我在布鲁塞尔再次见到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考虑成熟，并且用几乎像我在上面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编者注

这一点我已经屡次说过，但正是现在必须在《宣言》正文的前面也写明这一点。

弗·恩格斯

1883年6月28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83年6月28日

载于1883年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的德文版《共产主义宣言》一书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1卷翻译

1888年英文版序言[10]

《宣言》是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3]的纲领发表的，这个同盟起初纯粹是德国工人团体，后来成为国际工人团体，而在1848年以前欧洲大陆的政治条件下必然是一个秘密的团体。1847年11月在伦敦举行的同盟代表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完备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手稿于1848年1月用德文写成，并在2月24日的法国革命[4]前几星期送到伦敦付印。法译本于1848年六月起义前不久在巴黎出版。第一个英译本是由海伦·麦克法林女士翻译的，于1850年刊载在乔治·朱利安·哈尼的伦敦《红色共和党人》杂志上。还出版了丹麦文译本和波兰文译本。

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这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第一次大搏斗的失败，又把欧洲工人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要求暂时推到后面去了。从那时起，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又像二月革命以前那样只是在有产阶级的各个集团之间进行了；工人阶级被迫局限于争取一些政治上的活动自由，并采取资产阶级激进派极左翼的立场。凡是继续显露出生机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都遭到无情的镇压。例如，普鲁士警察发觉了当时设在科隆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一些成员被逮捕，并且在经过18个月监禁之后于1852年10月被交付法庭审判。这次有名的"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1]从10月4日一直继续到11月12日；被捕者中有七人被判处三至六年的要塞监禁。宣判之后，同盟即

由剩下的成员正式解散。至于《宣言》，似乎注定从此要被人遗忘了。

当欧洲工人阶级重新聚集了足以对统治阶级发动另一次进攻的力量的时候，产生了国际工人协会[12]。但是，这个协会成立的明确目的是要把欧美正在进行战斗的整个无产阶级团结为一个整体，因此，它不能立刻宣布《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原则。国际必须有一个充分广泛的纲领，使英国工联[13]，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14]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①[15]都能接受。马克思起草了这个能使一切党派都满意的纲领，他对共同行动和共同讨论必然会产生的工人阶级的精神发展充满信心。反资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失败更甚于胜利——不能不使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各种心爱的万应灵丹都不灵，并为他们更透彻地了解工人阶级解放的真正的条件开辟道路。马克思是正确的。当1874年国际解散时，工人已经全然不是1864年国际成立时的那个样子了。法国的蒲鲁东主义和德国的拉萨尔主义已经奄奄一息，甚至那些很久以前大多数已同国际决裂的保守的英国工联也渐有进步，以致去年在斯旺西，工联的主席能够用工联的名义声明说："大陆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再不可怕了。"[16]的确，《宣言》的原则在世界各国工人中间都已传播得很广了。

这样，《宣言》本身又重新走上了前台。从1850年起，德文本在瑞士、英国和美国重版过数次。1872年，有人在纽约把它译成英文，并在那里的《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上发表。接着又有人根据这个英文本把它译成法文，刊载在纽约的《社会主义者报》上。以后在美国又至少出现过两种多少有些损害原意的英文译本，其中一种还在

①拉萨尔本人在我们面前总是自认为是马克思的学生，他作为马克思的学生是站在《宣言》的立场上的。但是他在1862—1864年期间进行的公开鼓动中，却始终没有超出靠国家贷款建立生产合作社的要求。

英国重版过。由巴枯宁翻译的第一个俄文本约于1863年①在日内瓦由赫尔岑办的《钟声》印刷所出版；由英勇无畏的维拉·查苏利奇翻译的第二个俄文本[17]于1882年也在日内瓦出版。新的丹麦文译本[18]于1885年在哥本哈根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的一种出版。新的法文译本于1886年刊载在巴黎的《社会主义者报》上。[19]有人根据这个译本译成西班牙文，并于1886年在马德里发表。[20]至于德文的翻印版本，则为数极多，总共至少有12个。亚美尼亚文译本原应于几个月前在君士坦丁堡印出，但是没有问世，有人告诉我，这是因为出版人害怕在书上标明马克思的姓名，而译者又拒绝把《宣言》当做自己的作品。关于用其他文字出版的其他译本，我虽然听说过，但是没有亲眼看到。因此，《宣言》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现代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

可是，当我们写这个《宣言》时，我们不能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宣言。在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一方面是指各种空想主义体系的信徒，即英国的欧文派[21]和法国的傅立叶派[22]，这两个流派都已经降到纯粹宗派的地位，并在逐渐走向灭亡；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他们凭着各种各样的补缀办法，自称要消除一切社会弊病而毫不危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阶级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只有工人阶级中确信单纯政治变革还不够而公开表明必须根本改造全部社会的那一部分人，只有他们当时把自己叫做共产主义者。这是一种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纯粹出于本能的共产主义；但它却接触到了最主要之点，并且在工人阶级当中已

①应是1869年。——编者注

经强大到足以形成空想共产主义,在法国有卡贝的共产主义[23],在德国有魏特林的共产主义[24]。可见,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自始就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25],那么,在这两个名称中间我们应当选择哪一个,就是毫无疑义的了。而且后来我们也从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

虽然《宣言》是我们两人共同的作品,但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指出,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是属于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

在我看来这一思想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我们两人早在1845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当时我个人独自在这方面达到什么程度,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①一书就是最好的说明。但是到1845年春我在布鲁

---

①《1844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译,1888年纽约—伦敦拉弗尔出版社版,威·里夫斯发行。

塞尔再次见到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考虑成熟，并且用几乎像我在上面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

现在我从我们共同为1872年德文版写的序言中引录如下一段话：

"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由于1848年以来大工业已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组织也跟着有了改进和增长，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6]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见《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伦敦1871年特鲁拉夫版第15页，那里对这个思想作了更详细的阐述。）其次，很明显，对于社会主义文献所作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一批判只包括到1847年为止；同样也很明显，关于共产党人对待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的论述（第四章）虽然在原则上今天还是正确的，但是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因为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当时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彻底扫除了。

但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

本版译文是由译过马克思《资本论》一书大部分的赛米尔·穆尔先生翻译的。我们共同把译文校阅过一遍，并且我还加了一些有关历

史情况的注释。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8年1月30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88年1月30日

载于1888年在伦敦出版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一书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1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1卷翻译

1890年德文版序言[26]

自从我写了上面那篇序言①以来，又需要刊印《宣言》的新的德文版本了，同时《宣言》本身也有种种遭遇，应该在这里提一提。

1882年在日内瓦出版了由维拉·查苏利奇翻译的第二个俄文本[17]，马克思和我曾为这个译本写过一篇序言。可惜我把这篇序言的德文原稿遗失了[27]，所以现在我只好再从俄文译过来，这样做当然不会使原稿增色。下面就是这篇序言：

“巴枯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一版，60年代初②由《钟声》印刷所出版。当时西方认为《宣言》译成俄文出版不过是著作界的一件奇闻。这种看法今天是不可能有了。在《宣言》最初发表时期（1848年1月）卷入无产阶级运动的地区是多么狭小，这从《宣言》最后一章《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一章里，首先没有说到俄国和美国。那时，俄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支庞大后备军；向美国境内移民吸收着欧洲无产阶级的过剩力量。这两个国家，都向欧洲提供原料，同时又都是欧洲工业品的销售市场。所以，这两个国家不管怎样当时都是欧洲社会秩序的支柱。

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正是欧洲移民，使北美的农业生产能够

---

①指1883年德文版序言，见本卷第9—10页。——编者注

②应是1869年。——编者注

大大发展，这种发展通过竞争震撼着欧洲大小土地所有制的根基。此外，这种移民还使美国能够以巨大的力量和规模开发其丰富的工业资源，以至于很快就会摧毁西欧的工业垄断地位。这两种情况反过来对美国本身也起着革命作用。作为美国整个政治制度基础的自耕农场主的中小土地所有制，正逐渐被大农场的竞争所征服；同时，在各工业区，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和神话般的资本积聚第一次发展起来了。

现在来看看俄国吧！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不仅欧洲的君主，而且连欧洲的资产者，都把俄国的干涉看做是帮助他们对付当时刚刚开始意识到自己力量的无产阶级的唯一救星。他们把沙皇宣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现在，沙皇在加特契纳已成了革命的俘虏[8]，而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

《共产主义宣言》①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狂热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刚开始形成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

那么试问：俄国农民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有制形式，是能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呢？或者，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工人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卡·马克思　弗·恩格斯

1882年1月21日于伦敦”

---

①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大约在同一时候，在日内瓦出版了新的波兰文译本：《共产主义宣言》①。

随后又于1885年在哥本哈根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的一种出版了新的丹麦文译本。可惜这一译本不够完备；有几个重要的地方大概是因为译者感到难译而被删掉了，并且有些地方可以看到草率从事的痕迹，尤其令人遗憾的是，从译文中可以看出，要是译者细心一点，他是能够译得很好的。

1886年在巴黎《社会主义者报》上刊载了新的法译文；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译文。[19]

同年又有人根据这个法文本译成西班牙文，起初刊登在马德里的《社会主义者报》上，[20]接着又印成单行本：《共产党宣言》，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著，马德里，社会主义者报社，埃尔南·科尔特斯街8号。

这里我还要提到一件奇怪的事。1887年，君士坦丁堡的一位出版商收到了亚美尼亚文的《宣言》译稿；但是这位好心人却没有勇气把这本署有马克思的名字的作品刊印出来，竟认为最好是由译者本人冒充作者，可是译者拒绝这样做。

在英国多次刊印过好几种美国译本，但都不大确切。到1888年终于出版了一种可靠的译本。这个译本是由我的友人赛米尔·穆尔翻译的，并且在付印以前还由我们两人一起重新校阅过一遍。标题是：《共产党宣言》，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经作者认可的英译本，由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校订并加注，1888年伦敦，威廉·里夫斯，东中央区弗利特街185号。这个版本中的某些注释，我已收入本版。

①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宣言》有它本身的经历。它出现的时候曾受到当时人数尚少的科学社会主义先锋队的热烈欢迎(第一篇序言里提到的那些译本便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不久它就被随着1848年6月巴黎工人失败[5]而抬起头来的反动势力排挤到后台去了,最后,由于1852年11月科隆共产党人被判刑[11],它被"依法"宣布为非法。随着由二月革命[4]开始的工人运动退出公开舞台,《宣言》也退到后台去了。

当欧洲工人阶级又强大到足以对统治阶级政权发动另一次进攻的时候,产生了国际工人协会[12]。它的目的是要把欧美整个战斗的工人阶级联合成**一支**大军。因此,它不能**从**《宣言》中提出的那些原则**出发**。它必须有一个不致把英国工联[13],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14]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①[15]拒之于门外的纲领。这样一个纲领即国际章程绪论部分,是马克思起草的,其行文之巧妙连巴枯宁和无政府主义者也不能不承认。至于说到《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原则的最终胜利,马克思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共同行动和讨论必然会产生的工人阶级的精神的发展。反资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失败更甚于胜利——不能不使进行斗争的人们明白自己一向所崇奉的那些万应灵丹都不灵,并使他们的头脑更容易透彻地了解工人解放的真正的条件。马克思是正确的。1874年,当国际解散的时候,工人阶级已经全然不是1864年国际成立时的那个样子了。罗曼语各国的蒲鲁东主义和德国特有的拉萨尔主义已经奄奄一息,甚至当时极端保守的英国工联也渐有进步,以致1887年在斯旺西,工

---

①拉萨尔本人在我们面前总是自认为是马克思的"学生",他作为马克思的"学生"当然是站在《宣言》的立场上的。但是他的那些信徒却不是如此,他们始终没有超出他所主张的靠国家贷款建立生产合作社的要求,并且把整个工人阶级划分为国家帮助派和自助派。

联代表大会的主席能够用工联的名义声明说:“大陆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再不可怕了。”[16]而在1887年,大陆社会主义已经差不多完全是《宣言》中所宣布的那个理论了。因此,《宣言》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1848年以来现代工人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所有国家的千百万工人的共同纲领。

可是,当《宣言》出版的时候,我们不能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宣言。在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是指两种人。一方面是指各种空想主义体系的信徒,特别是英国的欧文派[21]和法国的傅立叶派[22],这两个流派当时都已经缩小成逐渐走向灭亡的纯粹的宗派。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他们想用各种万应灵丹和各种补缀办法来消除社会弊病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相反,当时确信单纯政治变革还不够而要求根本改造社会的那一部分工人,则把自己叫做**共产主义者**。这是一种还没有很好加工的、只是出于本能的、往往有些粗陋的共产主义;但它已经强大到足以形成两种空想的共产主义体系:在法国有卡贝的“伊加利亚”共产主义[23],在德国有魏特林的共产主义[24]。在1847年,社会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则意味着工人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当时已经十分坚决地认定“工人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25],所以我们一刻也不怀疑究竟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定哪一个名称。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42年前我们在巴黎革命即无产阶级带着自己的要求参加的第一次革命的前夜向世界上发出这个号

召时，响应者还是寥寥无几。可是，1864年9月28日，大多数西欧国家中的无产者已经联合成为流芳百世的国际工人协会了。固然，国际本身只存在了九年，但它所创立的全世界无产者永久的联合依然存在，并且比任何时候更加强固，而今天这个日子就是最好的证明。因为今天我写这个序言的时候，欧美无产阶级正在检阅自己第一次动员起来的战斗力量，他们动员起来，组成**一支**大军，在**一个**旗帜下，为了**一个**最近的目的，即早已由国际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宣布、后来又由1889年巴黎工人代表大会再度宣布的在法律上确立八小时正常工作日。[28]今天的情景将会使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地主看到：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真正联合起来了。

如果马克思今天还能同我站在一起亲眼看见这种情景，那该多好啊！

弗·恩格斯

1890年5月1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90年5月1日

载于1890年在伦敦出版的德文版《共产主义宣言》一书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2卷翻译

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29]

目前已有必要出版《共产主义宣言》①波兰文新版本这一事实，可以引起许多联想。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宣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测量欧洲大陆大工业发展的一种尺度。某一国家的大工业越发展，该国工人想要弄清他们作为工人阶级在有产阶级面前所处地位的愿望也就越强烈，工人中间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就越扩大，对《宣言》的需求也就越增长。因此，根据《宣言》用某国文字发行的份数，不仅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工人运动的状况，而且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大工业发展的程度。

因此，《宣言》波兰文新版本，标志着波兰工业的重大发展。而且从10年前上一版问世以来确实已有这种发展，这是丝毫不容置疑的。俄罗斯的波兰，会议桌上的波兰[30]，已成为俄罗斯帝国的巨大的工业区。俄国的大工业分散于各处，一部分在芬兰湾沿岸，一部分在中央区（莫斯科和弗拉基米尔），一部分在黑海和亚速海沿岸，还有一些分散在其他地方；波兰的大工业则集中于一个比较狭小的地区，这种集中所产生的益处和害处，它都感受到了。这种益处是竞争对手俄国工厂主所承认的，他们虽然拼命想把波兰人变成俄罗斯人，同时却

①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要求实行对付波兰的保护关税。至于这种害处，即对波兰工厂主和俄国政府的害处，则表现为社会主义思想在波兰工人中间迅速传播和对《宣言》的需求日益增长。

但是，波兰工业的迅速发展（它已经超过了俄国工业），又是波兰人民拥有强大生命力的新的证明，是波兰人民即将达到民族复兴的新的保证。而一个独立强盛的波兰的复兴是一件不仅关系到波兰人而且关系到我们大家的事情。欧洲各民族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只有当每个民族自己完全当家作主的时候才能实现。1848年革命在无产阶级的旗帜下使无产阶级战士归根到底只做了资产阶级的工作，这次革命也通过自己的遗嘱执行人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实现了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的独立。至于波兰，虽然它从1792年以来对革命所作的贡献比这三个国家所作的全部贡献还要大，可是它于1863年在十倍于自己的俄国优势下失败的时候，却被抛弃不管了。波兰贵族既没有能够保持住波兰独立，也没有能够重新争得波兰独立；在资产阶级看来，波兰独立在今天至少是一件无关痛痒的事情。然而这种独立却是实现欧洲各民族和谐的合作所必需的。这种独立只有年轻的波兰无产阶级才能争得，而且在波兰无产阶级手里会很好地保持住。因为欧洲所有其余各国工人都像波兰工人本身一样需要波兰的独立。

弗·恩格斯

1892年2月10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92年2月10日

载于1892年2月27日《黎明》杂志第35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2卷翻译

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31]

致意大利读者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可以说正好碰上1848年3月18日这个日子，碰上米兰和柏林发生革命，这是两个民族的武装起义[32]，其中一个处于欧洲大陆中心，另一个处于地中海各国中心；这两个民族在此以前都由于分裂和内部纷争而被削弱并因而遭到外族的统治。意大利受奥皇支配，而德国则受到俄国沙皇那种虽然不那么直接，但是同样可以感觉得到的压迫。1848年3月18日的结果使意大利和德国免除了这种耻辱；如果说，这两个伟大民族在1848—1871年期间得到复兴并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重新获得独立，那么，这是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那些镇压1848年革命的人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这次革命的遗嘱执行人[33]。

这次革命到处都是由工人阶级干的；构筑街垒和流血牺牲的都是工人阶级。只有巴黎工人在推翻政府的同时也抱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明确意图。但是，虽然他们已经认识到他们这个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对抗，然而无论法国经济的进展或法国工人群众的精神的发展，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因此，革命的果实最终必然被资本家阶级拿去。在其他

国家，在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工人从一开始就只限于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但是在任何国家，资产阶级的统治离开民族独立都是不行的。因此，1848年革命必然给那些直到那时还没有统一和独立的民族——意大利、德国、匈牙利——带来统一和独立。现在轮到波兰了。

由此可见，1848年革命虽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它毕竟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了道路，为这个革命准备了基础。最近45年来，资产阶级制度在各国引起了大工业的飞速发展，同时造成了人数众多的、紧密团结的、强大的无产阶级；这样它就产生了——正如《宣言》所说——它自身的掘墓人。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试想想看，在1848年以前的政治条件下，哪能有意大利工人、匈牙利工人、德意志工人、波兰工人、俄罗斯工人的共同国际行动！

可见，1848年的战斗并不是白白进行的。从这个革命时期起直到今日的这45年，也不是白白过去的。这个革命时期的果实已开始成熟，而我的唯一愿望是这个意大利文译本的出版能成为良好的预兆，成为意大利无产阶级胜利的预兆，如同《宣言》原文的出版成了国际革命的预兆一样。

《宣言》十分公正地评价了资本主义在先前所起过的革命作用。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现在也如1300年那样，新的历史纪元正在到来。意大利是否会给我们一个新的但丁来宣告这个无产


Das
Kommunistische Manife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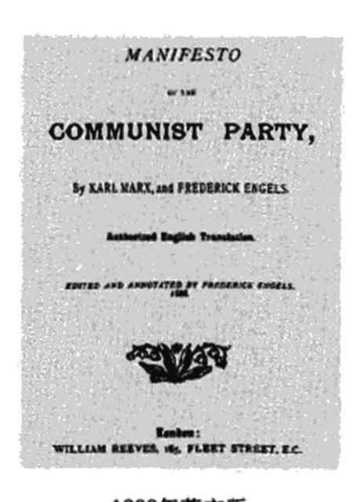
1872年德文版

MANIFESTE DU PARTI COMMUNISTE
par Karl MARX et Fr. ENGELS
МАНИФЕСТЪ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ЖЕНЕВА
1882

1882年俄文版


Das
Kommunistische Manifest.


1883年德文版


MANIFESTO
COMMUNIST PARTY,
By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Authorized English Translation.
EDITED AND ANNOTATED BY FREDERICK ENGELS.
London:
WILLIAM REEVES, 185, FLEET STREET, E.C.

1888年英文版


XXXIII.
Das
Kommunistische Manifest.
London.
German Cooperative Publishing Co.

1890年德文版


K. Marks i Fr. Engels
Manifest
komunistyczny
Wydanie drugie
w drukarni „Przedświtu"
1892.

1892年波兰文版


CARLO MARX e FEDERICO ENGELS
IL MANIFESTO
PARTITO COMUNISTA
FEDERICO ENGELS
MILANO
CRITICA SOCIALE

1893年意大利文版

1872—1893年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德文、俄文、英文、波兰文和意大利文版的扉页



阶级新纪元的诞生呢？

弗·恩格斯

1893年2月1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93年2月1日

载于1893年在米兰出版的意大利文版《共产党宣言》一书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2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0年法文版第1卷翻译

共产党宣言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它的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党呢？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

从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

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

为了这个目的，各国共产党人集会于伦敦，拟定了如下的宣言，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佛拉芒文和丹麦文公布于世。

一 资产者和无产者[①]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②]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③]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

①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编者注

②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公有制是一切条顿族的历史起源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逐渐发现，农村公社是或者曾经是从印度到爱尔兰的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关于这个解体过程，我曾经试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6年斯图加特第2版)中加以探讨。"——编者注

③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行会师傅就是在行会中享有全权的会员，是行会内部的师傅，而不是行会的首领。"——编者注

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

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行会师傅被工业的中间等级排挤掉了；各种行业组织之间的分工随着各个作坊内部的分工的出现而消失了。

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支一支产业大军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

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发展起来，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

由此可见，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

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①。它在封建主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级，在公社②里是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在一些地方组成独立的城市共和国③，在另一些地方组成君主国中的纳税的第三等级④；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君主国⑤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而且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

---

①“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这个阶级的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编者注

②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法国的新兴城市，甚至在它们从封建主手里争得地方自治和‘第三等级’的政治权利以前，就已经称为‘公社’了。一般说来，这里是把英国当做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典型国家，而把法国当做资产阶级政治发展的典型国家。”

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意大利和法国的市民，从他们的封建主手中买得或争得最初的自治权以后，就把自己的城市共同体称为‘公社’。”——编者注

③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例如在意大利和德国）”。——编者注

④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例如在法国）”。——编者注

⑤“等级君主国”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半封建君主国”。——编者注

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资产阶级揭示了，在中世纪深受反动派称许的那种人力的野蛮使用，是以极端怠惰作为相应补充的。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34]和十字军征讨[35]的远征。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

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①。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

①“文学”一词德文是“Literatur”，这里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等方面的著作。——编者注

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它已经被炸毁了。

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

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

现在，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

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

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像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他们同样地受到竞争的一切变化、市场的一切波动的影响。

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因此，花在工人身上的费用，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活和延续工人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商品的价格，从而劳动的价格[36]，是同它的生产费用相等的。因此，劳动越使人感到厌恶，工资也就越减少。不仅如此，机器越推广，分工越细致，劳动量[①]也就越增加，这或者是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或者是由于在一定时间内所要求的劳动的增加，机器运转的加速，等等。

现代工业已经把家长式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了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他们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他们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这种专制制度越是公开地把营利宣布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它就越是可鄙、可恨和可恶。

手的操作所要求的技巧和气力越少，换句话说，现代工业越发

①“劳动量”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劳动负担”。——编者注

达，男工也就越受到女工和童工的排挤。对工人阶级来说，性别和年龄的差别再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了。他们都只是劳动工具，不过因为年龄和性别的不同而需要不同的费用罢了。

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

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的资本家的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不值钱了。无产阶级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

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

最初是单个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单个资产者作斗争。他们不仅仅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且攻击生产工具本身①；他们毁坏那些来竞争的外国商品，捣毁机器，烧毁工厂，力图恢复已经失去的中世纪工人的地位。

在这个阶段上，工人是分散在全国各地并为竞争所分裂的群众。工人的大规模集结，还不是他们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联合的结果，当时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必须而且暂时还能够把整个无产阶级发动起来。因此，在这个阶段上，无产者不是

①这句话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他们不是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是攻击生产工具本身”。——编者注

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而是同自己的敌人的敌人作斗争，即同专制君主制的残余、地主、非工业资产者和小资产者作斗争。因此，整个历史运动都集中在资产阶级手里；在这种条件下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

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而且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机器使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内部的利益、生活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致。资产者彼此间日益加剧的竞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商业危机，使工人的工资越来越不稳定；机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单个工人和单个资产者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①；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以便为可能发生的反抗准备食品。有些地方，斗争爆发为起义。

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这种联合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联合，现代的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

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重新产生，并且一

①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工联)”。——编者注

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它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迫使他们用法律形式承认工人的个别利益。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37]就是一个例子。

旧社会内部的所有冲突在许多方面都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发展。资产阶级处于不断的斗争中:最初反对贵族;后来反对同工业进步有利害冲突的那部分资产阶级;经常反对一切外国的资产阶级。在这一切斗争中,资产阶级都不得不向无产阶级呼吁,要求无产阶级援助,这样就把无产阶级卷进了政治运动。于是,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自己的教育因素①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无产阶级。

其次,我们已经看到,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的整批成员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②。

最后,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所以,正像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能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

---

①“教育因素”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政治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因素”。——编者注

②“大量的教育因素”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启蒙和进步的新因素”。——编者注

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

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旧社会的生活条件已经被消灭了。无产者是没有财产的；他们和妻子儿女的关系同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再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了；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

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

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爆发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

我们已经看到，至今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的。但是，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勉强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农奴曾经在农奴制度下挣扎到公社成员的地位，小资产者曾经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做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下生存下去了，就是说，它的生存不再同社会相容了。

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二　无产者和共产党人

共产党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①]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②]；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

---

①"特殊的"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宗派的"。——编者注

②"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最先进的和最坚决的部分，推动所有其他部分前进的部分"。——编者注

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废除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并不是共产主义所独具的特征。

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更。

例如，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的所有制，代之以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①]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有人责备我们共产党人，说我们要消灭个人挣得的、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要消灭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

好一个劳动得来的、自己挣得的、自己赚来的财产！你们说的是资产阶级财产出现以前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小农的财产吗？那种财产用不着我们去消灭，工业的发展已经把它消灭了，而且每天都在消灭它。

或者，你们说的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吧？

但是，难道雇佣劳动、无产者的劳动，会给无产者创造出财产来吗？没有的事。这种劳动所创造的是资本，即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只

---

①“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编者注

有在不断产生出新的雇佣劳动来重新加以剥削的条件下才能增殖的财产。现今的这种财产是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中运动的。让我们来看看这种对立的两个方面吧。

做一个资本家,这就是说,他在生产中不仅占有一种纯粹个人的地位,而且占有一种社会的地位。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

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

因此,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

现在,我们来看看雇佣劳动。

雇佣劳动的平均价格是最低限度的工资,即工人为维持其工人的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额。因此,雇佣工人靠自己的劳动所占有的东西,只够勉强维持他的生命的再生产。我们决不打算消灭这种供直接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这种占有并不会留下任何剩余的东西使人们有可能支配别人的劳动。我们要消灭的只是这种占有的可怜的性质,在这种占有下,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

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

而资产阶级却把消灭这种关系说成是消灭个性和自由！说对了。的确，正是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

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自由贸易、自由买卖。

但是，买卖一消失，自由买卖也就会消失。关于自由买卖的言论，也像我们的资产者的其他一切关于自由的大话一样，仅仅对于不自由的买卖来说，对于中世纪被奴役的市民来说，才是有意义的，而对于共产主义要消灭买卖、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本身这一点来说，却是毫无意义的。

我们要消灭私有制，你们就惊慌起来。但是，在你们的现存社会里，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这种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不存在。可见，你们责备我们，是说我们要消灭那种以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所有制。

总而言之，你们责备我们，是说我们要消灭你们的那种所有制。的确，我们是要这样做的。

从劳动不再能变为资本、货币、地租，一句话，不再能变为可以垄断的社会力量的时候起，就是说，从个人财产不再能变为资产阶级财产①的时候起，你们说，个性被消灭了。

由此可见，你们是承认，你们所理解的个性，不外是资产者、资产阶级私有者。这样的个性确实应当被消灭。

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

---

①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变为资本”。——编者注

有人反驳说，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兴起。

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早就应该因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劳者不获，获者不劳。所有这些顾虑，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同义反复：一旦没有资本，也就不再有雇佣劳动了。

所有这些对共产主义的物质产品的占有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责备，也被扩展到精神产品的占有和生产方面。正如阶级的所有制的终止在资产者看来是生产本身的终止一样，阶级的教育的终止在他们看来就等于一切教育的终止。

资产者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

但是，你们既然用你们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教育、法等等的观念来衡量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主张，那就请你们不要同我们争论了。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

你们的利己观念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这种利己观念是你们和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谈到古代所有制的时候你们所能理解的，谈到封建所有制的时候你们所能理解的，一谈到资产阶级所有制你们就再也不能理解了。

消灭家庭！连极端的激进派也对共产党人的这种可耻的意图表示愤慨。

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是建立在资本上面，建立在私人发财上面的。这种家庭只是在资产阶级那里才

以充分发展的形式存在着，而无产者的被迫独居和公开的卖淫则是它的补充。

资产者的家庭自然会随着它的这种补充的消失而消失，两者都要随着资本的消失而消失。

你们是责备我们要消灭父母对子女的剥削吗？我们承认这种罪状。

但是，你们说，我们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要消灭人们最亲密的关系。

而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也是由你们进行教育时所处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也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作用；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作用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

无产者的一切家庭联系越是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破坏，他们的子女越是由于这种发展而被变成单纯的商品和劳动工具，资产阶级关于家庭和教育、关于父母和子女的亲密关系的空话就越是令人作呕。

但是，你们共产党人是要实行公妻制的啊。整个资产阶级异口同声地向我们这样叫喊。

资产者是把自己的妻子看做单纯的生产工具的。他们听说生产工具将要公共使用，自然就不能不想到妇女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他们想也没有想到，问题正在于使妇女不再处于单纯生产工具的地位。

其实，我们的资产者装得道貌岸然，对所谓的共产党人的正式公妻制表示惊讶，那是再可笑不过了。公妻制无需共产党人来实行，

它差不多是一向就有的。

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受他们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卖淫更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

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人们至多只能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蔽着的公妻制。其实，不言而喻，随着现在的生产关系的消灭，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卖淫，也就消失了。

有人还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要取消祖国，取消民族。

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①]，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

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

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从宗教的、哲学的和一切意识形态的观点对共产主义提出的种种责难，都不值得详细讨论了。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

---

①“民族的阶级”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民族的领导阶级”。——编者注

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

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

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各种宗教就被基督教战胜了。当基督教思想在18世纪被启蒙思想击败的时候，封建社会正在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殊死的斗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领域①里占统治地位罢了。

“但是”，有人会说，“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政治的、法的观念等等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固然是不断改变的，而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和法在这种变化中却始终保存着。

此外，还存在着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永恒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但是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至今的全部历史发展相矛盾的。”

这种责难归结为什么呢？至今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

但是，不管阶级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

①“信仰领域”在1872、1883和1890年德文版中是“知识领域”。——编者注

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不过，我们还是把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种种责难撇开吧。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也就是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无法持续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①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

但是，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

1. 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

2. 征收高额累进税。

3. 废除继承权。

4. 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5. 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

①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使进一步向旧的社会制度进攻成为必要”。——编者注

6. 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7. 按照共同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8. 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9. 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①逐步消灭。②

10. 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③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④，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

①"对立"在1872、1883和1890年德文版中是"差别"。——编者注

②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一条是："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通过把人口更平均地分布于全国的办法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编者注

③"联合起来的个人"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巨大的全国联合体"。——编者注

④"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在1872、1883和1890年德文版中是"消灭了阶级本身"。——编者注

三　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

1. 反动的社会主义

（甲）封建的社会主义

法国和英国的贵族，按照他们的历史地位所负的使命，就是写一些抨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作品。在法国的1830年七月革命[38]和英国的改革运动[39]中，他们再一次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从此就再谈不上严重的政治斗争了。他们还能进行的只是文字斗争。但是，即使在文字方面也不可能重弹复辟时期①的老调了。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作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去写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书。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

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

①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这里所指的不是1660—1689年英国的复辟时期，而是1814—1830年法国的复辟时期。"——编者注

令人感到可笑。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一部分法国正统派[40]和“青年英国”[41]，都演过这出戏。

封建主说，他们的剥削方式和资产阶级的剥削不同，那他们只是忘记了，他们是在完全不同的、目前已经过时的情况和条件下进行剥削的。他们说，在他们的统治下并没有出现过现代的无产阶级，那他们只是忘记了，现代的资产阶级正是他们的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

不过，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批评的反动性质，他们控告资产阶级的主要罪状正是在于：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有一个将把整个旧社会制度炸毁的阶级发展起来。

他们责备资产阶级，与其说是因为它产生了无产阶级，不如说是因为它产生了革命的无产阶级。

因此，在政治实践中，他们参与对工人阶级采取的一切暴力措施，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违背自己的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言辞，屈尊拾取金苹果①，不顾信义、仁爱和名誉去做羊毛、甜菜和烧酒的买卖。②

正如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一样，僧侣的社会主义也总是

①“金苹果”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工业树上掉下来的金苹果”。——编者注

②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这里主要是指德国，那里的土地贵族和容克通过管事自行经营自己的很大一部分土地，他们还开设大规模的甜菜糖厂和土豆酒厂。较富有的英国贵族还没有落到这种地步；但是，他们也知道怎样让人家用他们的名义创办颇为可疑的股份公司，以补偿地租的下降。”——编者注

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

要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是再容易不过了。基督教不是也激烈反对私有财产，反对婚姻，反对国家吗？它不是提倡用行善和求乞、独身和禁欲、修道和礼拜来代替这一切吗？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了。

（乙）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封建贵族并不是被资产阶级所推翻的、其生活条件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里日益恶化和消失的唯一阶级。中世纪的城关市民和小农等级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前身。在工商业不很发达的国家里，这个阶级还在新兴的资产阶级身旁勉强生存着。

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但是，这一阶级的成员经常被竞争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而且，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他们甚至觉察到，他们很快就会完全失去他们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在商业、工场手工业和农业中很快就会被监工和雇员所代替。

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例如在法国，那些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的。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西斯蒙第不仅对法国而且对英国来说都是这类著作家的首领。

这种社会主义非常透彻地分析了现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它揭穿了经济学家的虚伪的粉饰。它确凿地证明了机器和分工的破坏作

用、资本和地产的积聚、生产过剩、危机、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必然没落、无产阶级的贫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财富分配的极不平均、各民族之间的毁灭性的工业战争，以及旧风尚、旧家庭关系和旧民族性的解体。

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按其实际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

工场手工业中的行会制度，农业中的宗法经济。这就是它的结论。

这一思潮在它以后的发展中变成了一种怯懦的悲叹。①

（丙）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

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是在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压迫下产生的，并且是同这种统治作斗争的文字表现，这种文献被搬到德国的时候，那里的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进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

德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美文学家，贪婪地抓住了这种文献，不过他们忘记了：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

---

①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一句是：“最后，当顽强的历史事实把自我欺骗的一切醉梦驱散的时候，这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就化为一种可怜的哀愁。”——编者注

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它必然表现为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这样，第一次法国革命的要求，在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看来，不过是一般“实践理性”的要求，而革命的法国资产阶级的意志的表现，在他们心目中就是纯粹的意志、本来的意志、真正人的意志的规律。

德国著作家的唯一工作，就是把新的法国的思想同他们的旧的哲学信仰调和起来，或者毋宁说，就是从他们的哲学观点出发去掌握法国的思想。

这种掌握，就像掌握外国语一样，是通过翻译的。

大家知道，僧侣们曾经在古代异教经典的手抄本上面写上荒诞的天主教圣徒传。德国著作家对世俗的法国文献采取相反的做法。他们在法国的原著下面写上自己的哲学胡说。例如，他们在法国人对货币关系的批判下面写上“人的本质的外化”，在法国人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批判下面写上所谓“抽象普遍物的统治的扬弃”，等等。

这种在法国人的论述下面塞进自己哲学词句的做法，他们称之为“行动的哲学”、“真正的社会主义”、“德国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论证”，等等。

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就这样被完全阉割了。既然这种文献在德国人手里已不再表现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于是德国人就认为：他们克服了“法国人的片面性”，他们不代表真实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

这种曾经郑重其事地看待自己那一套拙劣的小学生作业并且大言不惭地加以吹嘘的德国社会主义，现在渐渐失去了它的自炫博

学的天真。

德国的特别是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和专制王朝的斗争，一句话，自由主义运动，越来越严重了。

于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就得到了一个好机会，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德国的社会主义恰好忘记了，法国的批判（德国的社会主义是这种批判的可怜的回声）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而这一切前提当时在德国正是尚待争取的。

这种社会主义成了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及其随从——僧侣、教员、容克和官僚求之不得的、吓唬来势汹汹的资产阶级的稻草人。

这种社会主义是这些政府用来镇压德国工人起义的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

既然“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这样成了这些政府对付德国资产阶级的武器，那么它也就直接代表了一种反动的利益，即德国小市民的利益。在德国，16世纪遗留下来的、从那时起经常以不同形式重新出现的小资产阶级，是现存制度的真实的社会基础。

保存这个小资产阶级，就是保存德国的现存制度。这个阶级胆战心惊地从资产阶级的工业统治和政治统治那里等候着无可幸免的灭亡，这一方面是由于资本的积聚，另一方面是由于革命无产阶级的兴起。在它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能起一箭双雕的作用。“真正的”社会主义像瘟疫一样流行起来了。

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给自己的那几条干瘪的“永恒真理”披上一件用思辨的蛛丝织成的、绣满华丽辞藻的花朵和浸透甜情蜜意的甘露的外衣，这件光彩夺目的外衣只是使他们的货物在这些顾客中间增加销路罢了。

同时，德国的社会主义也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就是充当这种小市民的夸夸其谈的代言人。

它宣布德意志民族是模范的民族，德国小市民是模范的人。它给这些小市民的每一种丑行都加上奥秘的、高尚的、社会主义的意义，使之变成完全相反的东西。它发展到最后，就直接反对共产主义的“野蛮破坏的”倾向，并且宣布自己是不偏不倚地超乎任何阶级斗争之上的。现今在德国流行的一切所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属于这一类卑鄙龌龊的、令人委靡的文献。①

2. 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

这一部分人包括：经济学家、博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劳动阶级状况改善派、慈善事业组织者、动物保护协会会员、戒酒协会发起人以及形形色色的小改良家。这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甚至被制成一些完整的体系。

---

①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1848年的革命风暴已经把这个可恶的流派一扫而光，并且使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再也没有兴趣搞社会主义了。这一流派的主要代表和典型人物是卡尔·格律恩先生。”——编者注

我们可以举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作为例子。

社会主义的资产者愿意要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是不要由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愿意要现存的社会,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瓦解的因素。他们愿意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看来,它所统治的世界自然是最美好的世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把这种安慰人心的观念制成半套或整套的体系。它要求无产阶级实现它的体系,走进新的耶路撒冷,其实它不过是要求无产阶级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但是要抛弃他们关于这个社会的可恶的观念。

这种社会主义的另一种不够系统、但是比较实际的形式,力图使工人阶级厌弃一切革命运动,硬说能给工人阶级带来好处的并不是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改革,而仅仅是物质生活条件即经济关系的改变。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所理解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绝对不是只有通过革命的途径才能实现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废除,而是一些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的行政上的改良,因而丝毫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至多只能减少资产阶级的统治费用和简化它的财政管理。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只有在它变成纯粹的演说辞令的时候,才获得自己的适当的表现。

自由贸易!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保护关税!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单人牢房!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才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唯一真实的结论。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个论断:资产者之为资产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3.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在这里，我们不谈在现代一切大革命中表达过无产阶级要求的文献（巴贝夫等人的著作）。

无产阶级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在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最初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够发展，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随着这些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

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体系，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体系，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关于这个时期，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了（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①）。

诚然，这些体系的发明家看到了阶级的对立，以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本身中的瓦解因素的作用。但是，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

由于阶级对立的发展是同工业的发展步调一致的，所以这些发明家也不可能看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于是他们就去探求某种社会科学、社会规律，以便创造这些条件。

社会的活动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解放的历史条件要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逐步组织成为阶级要由一种特

---

①指《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编者注

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

诚然，他们也意识到，他们的计划主要是代表工人阶级这一受苦最深的阶级的利益。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

但是，由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由于他们本身的生活状况，他们就以为自己是高高超乎这种阶级对立之上的。他们要改善社会一切成员的生活状况，甚至生活最优裕的成员也包括在内。因此，他们总是不加区别地向整个社会呼吁，而且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他们以为，人们只要理解他们的体系，就会承认这种体系是最美好的社会的最美好的计划。

因此，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一切革命行动；他们想通过和平的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企图通过一些小型的、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

这种对未来社会的幻想的描绘，在无产阶级还很不发展，因而对本身的地位的认识还基于幻想的时候，是同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相适应的。①

但是，这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也含有批判的成分。这些著作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因此，它们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例如消灭城乡对立②、消灭家庭、消灭私人营利、消灭雇佣劳动、提倡社会和谐、把国

①这段话在1872、1883和1890年德文版中是："这种对未来社会的幻想的描绘，是在无产阶级还很不发展，因而对本身的地位的认识还基于幻想的时候，从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中产生的。"——编者注

②"城乡对立"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城乡差别"。——编者注

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所有这些主张都只是表明要消灭阶级对立，而这种阶级对立在当时刚刚开始发展，它们所知道的只是这种对立的早期的、不明显的、不确定的形式。因此，这些主张本身还带有纯粹空想的性质。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阶级斗争越发展和越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所以，虽然这些体系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这些信徒无视无产阶级的历史进展，还是死守着老师们的旧观点。因此，他们一贯企图削弱阶级斗争，调和对立。他们还总是梦想用试验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空想，创办单个的法伦斯泰尔，建立国内移民区，创立小伊加利亚，①即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而为了建造这一切空中楼阁，他们就不得不呼吁资产阶级发善心和慷慨解囊。他们逐渐地堕落到上述反动的或保守的社会主义者的一伙中去了，所不同的只是他们更加系统地卖弄学问，狂热地迷信自己那一套社会科学的奇功异效。

因此，他们激烈地反对工人的一切政治运动，认为这种运动只是由于盲目地不相信新福音才发生的。

在英国，有欧文派[21]反对宪章派[42]，在法国，有傅立叶派[22]反对改革派[43]。

---

①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法伦斯泰尔是沙尔·傅立叶所设计的社会主义移民区；伊加利亚是卡贝给自己的理想国和后来他在美洲创立的共产主义移民区所起的名称。"

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国内移民区是欧文给他的共产主义的模范社会所起的名称。法伦斯泰尔是傅立叶所设计的社会宫的名称。伊加利亚是卡贝所描绘的那种共产主义制度的乌托邦幻想国。"——编者注

四　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

看过第二章之后，就可以了解共产党人同已经形成的工人政党的关系，因而也就可以了解他们同英国宪章派和北美土地改革派[44]的关系。

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在法国，共产党人同社会主义民主党①联合起来反对保守的和激进的资产阶级，但是并不因此放弃对那些从革命的传统中承袭下来的空谈和幻想采取批判态度的权利。

在瑞士，共产党人支持激进派，但是并不忽略这个政党是由互相矛盾的分子组成的，其中一部分是法国式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一部分是激进的资产者。

在波兰人中间，共产党人支持那个把土地革命当做民族解放的条件的政党，即发动过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45]的政党。

---

①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当时这个党在议会中的代表是赖德律-洛兰，在著作界的代表是路易·勃朗，在报纸方面的代表是《改革报》。'社会主义民主党'这个名称在它的发明者那里是指民主党或共和党中或多或少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一部分人。"

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当时在法国以社会主义民主党自称的政党，在政治方面的代表是赖德律-洛兰，在著作界的代表是路易·勃朗；因此，它同现今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有天壤之别的。"——编者注

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资产阶级。

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

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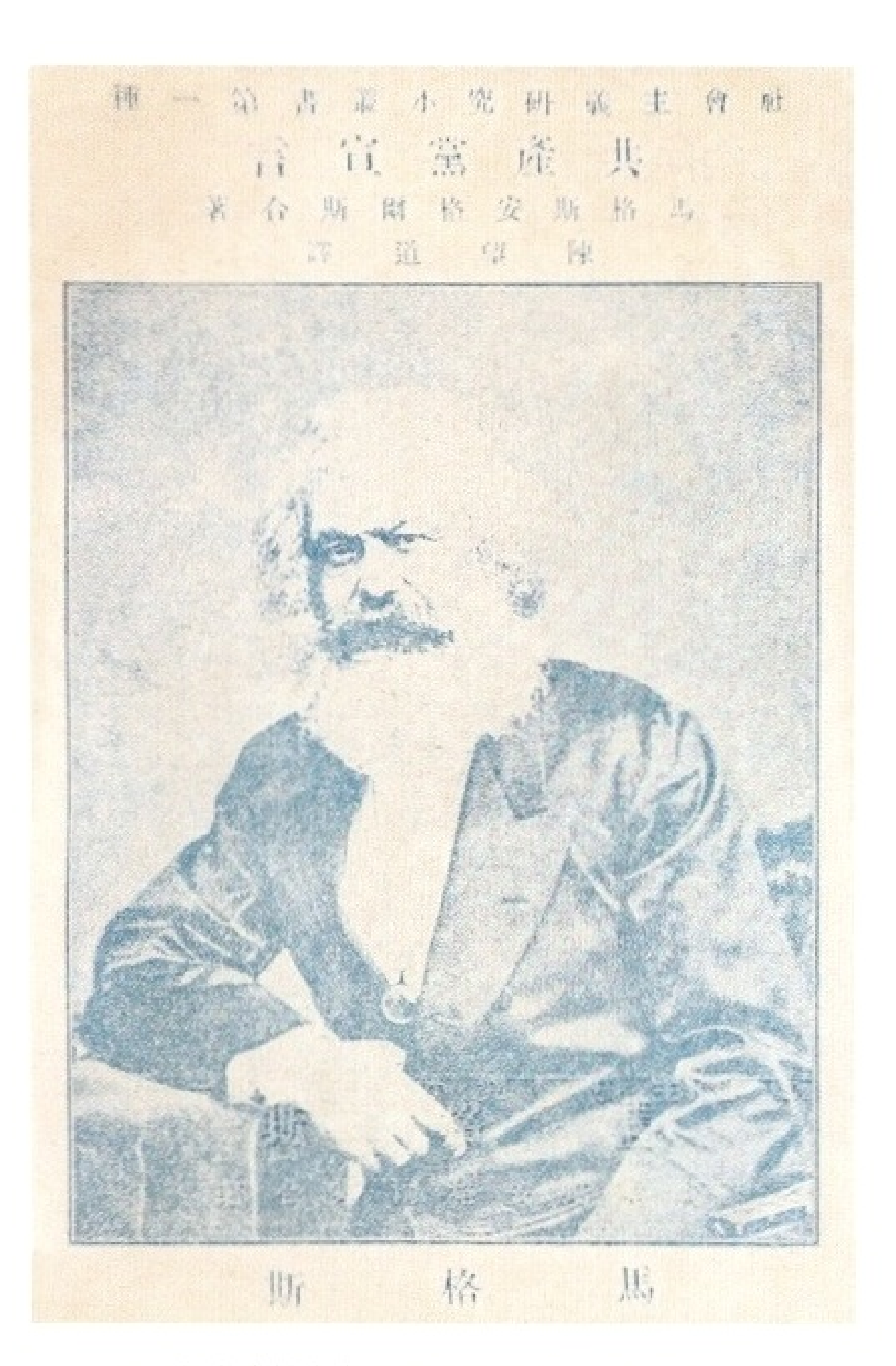
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

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

最后，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920年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的《共产党宣言》

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四 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

1848年2月以小册子形式在伦敦出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4卷翻译

卡·马克思

危机和反革命[46]

科隆,9月13日。柏林的危机又进了一步:**同国王**①**的冲突**,昨天还仅仅估计是难免的,现在**实际上已经发生了**。

本报读者在下面就可看到国王对内阁呈请辞职的答复[47]。由于这封信,国王自己登上了前台,同内阁站在一边,把自己和议会对立起来。

不仅如此,国王还背着议会让**贝克拉特**组阁,贝克拉特在法兰克福站在极右派一边,所有人早就知道,他决不可能指望在柏林获得多数。

国王的信是由**奥尔斯瓦尔德**先生副署的。奥尔斯瓦尔德先生以这种方式把国王推到前面去以掩饰他自己的可耻的退缩,同时,他在议会面前却企图躲在立宪原则后面践踏这一原则,**破坏国王的声誉,并激起建立共和国的要求**。对这一切奥尔斯瓦尔德先生是要承担责任的!

大臣们高喊:立宪原则!右派高喊:立宪原则!《科隆日报》也以哀叹的声音随声附和:立宪原则!

"立宪原则!"难道这些先生们真的这样愚蠢,以为依靠腐朽透顶的孟德斯鸠—德洛姆的分权学说,依靠陈词滥调和早就被揭穿的假象就能使德国人民摆脱1848年的风暴,摆脱日益临近的、使历史上

---

①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遗留下来的全部机构覆灭的危险吗?!

"立宪原则!"但是,正是这些想不惜任何代价拯救立宪原则的先生们首先应当看到:在这种临时局面下,只有毅力才能拯救这一原则!

"立宪原则!"难道柏林议会的表决,波茨坦和法兰克福之间的冲突,骚乱、反动阴谋以及军阀的挑衅不是早就表明,我们总是不顾一切空话而始终**立足于革命的基础上**吗?难道不是早就表明,说我们已经立足于**业已确立的**完备的立宪君主制基础上的这种捏造,只会导致现在已经使"立宪原则"濒于毁灭的冲突吗?

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政局下都需要专政,并且是强有力的专政。我们一开始就指责康普豪森没有实行专政,指责他没有马上粉碎和清除旧制度的残余。正当康普豪森先生陶醉于立宪的幻想时,被打垮的党派已在官僚机构和军队中巩固他们的阵地,甚至敢于在各处展开公开的斗争。为了协商宪法而召集了国民议会。国民议会和国王是平权的。在一种临时局面下有两个平等的权力!正是康普豪森先生想借以"拯救自由"的这种分权,正是临时局面下的这种分权状态,必然会导致冲突。贵族、军阀和官僚的反革命奸党藏身于国王背后。资产阶级站在议会的多数派背后。内阁想充当调停人。但是它太软弱,不能坚决维护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一举推翻贵族、官僚和军阀的权力;它也太不灵活,它的财政措施总是触犯资产阶级的利益。它所做的都是各个党派所不能接受的,因而引起了它恰恰希望避免的冲突。

在任何一种尚未组织就绪的局面下,有决定意义的不是这种或那种原则,而是salut public,即公共安全。内阁要想防止议会和国王之间的冲突,只有遵循公共安全的原则,并且即使**自己**和国王有发生冲突的危险也不畏缩。但是,内阁宁愿成为波茨坦"能够"接受的内

阁。它一直坚决采取各种保障公共安全的措施(mesures du salut public)、专制的措施来对付民主派。在梅尔克尔先生已经承认邦法①的某些条文应当废除之后又用这些旧法律来对付政治上的犯罪行为,难道不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吗?在王国各地进行大规模的逮捕,不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吗?

可是内阁以保障公共安全为由,在对付反革命时却缩手缩脚!

正因为内阁对待日益猖獗的反革命采取这种温和态度,议会才不得不**亲自提出保障**公共安全的措施。既然大臣们所代表的那位国王过于软弱,议会就不得不亲自过问。它通过了8月9日的决议,这就是它在这方面采取的行动。不过它的行动方式还是非常温和的,只是向大臣们提出了警告。可是大臣们却置之不理。

的确,他们怎么能同意这一点呢?!8月9日的决议践踏了立宪原则,它是立法权对行政权的干预,它要消灭为了自由的利益所十分必需的分权和权力互相监督,它要把协商议会[48]变成**国民公会**[49]!

于是燃起了威胁的烈火,传来了使小资产者心惊胆战的雷鸣般的呼号,说什么将来会出现一个恐怖政府,它将设置断头台,征收累进税,没收财产,悬挂红旗。

柏林议会变成了公会!真是极大的讽刺啊!

然而这些先生们并不是完全不对。如果政府今后仍然我行我素,我们很快就会有公会。并且不只是普鲁士的公会,而且是全德国的公会。这个公会应当用一切办法来制止我们的20个旺代[50]的内战和不可避免的同俄国的战争。而现在,我们的确只有一幅制宪议会[51]的讽刺画!

① 指1794年颁布的《普鲁士国家通用邦法》。——编者注

但是,呼吁立宪原则的各位大臣先生自己是怎样遵守这个原则的呢?

8月9日,他们让议会平静地散会了,议会当时还满以为大臣们会执行决议。其实这些大臣根本不想把自己拒绝执行决议的打算告诉议会,更不准备提出辞职。

大臣们考虑了整整一个月,最后,在许多质问的追逼下,他们才直截了当地向议会宣布:他们不打算执行决议,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在这以后,议会仍然命令大臣们执行决议,于是,大臣们就躲在国王后面,在国王和议会之间制造裂痕,从而激起建立共和国的要求。

然而这些先生们却还在谈论什么立宪原则!

总而言之:

在一种临时局面下的两个平等的权力之间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内阁不敢坚决果断地处理政务;它没有采取必要的保障公共安全的措施。议会要求内阁尽职只是执行了自己的职责。内阁宣布这样做是破坏国王的权利,而在它辞职的时候,它却损害了国王的声誉。国王和议会互相对立。"协商"造成了分裂,造成了冲突。这也许要用武力来解决。

谁最勇敢、最坚定,谁就能取得胜利。

卡·马克思写于1848年9月13日

载于1848年9月14日《新莱茵报》第102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5卷翻译

卡·马克思

资产阶级和反革命[52]

科隆,12月11日。当三月的洪水[53]——一场势头很小的洪水——消退以后,在柏林地面上留下的不是什么庞然大物,不是什么革命巨人,而是一些陈旧货色,一些低矮的资产阶级人物——联合议会[54]的自由派,觉悟的普鲁士资产阶级的代表。那些拥有最发达的资产阶级的省份,即**莱茵省**和**西里西亚**,曾提出新内阁的基本人选。尾随其后的有莱茵省的一大群律师。随着资产阶级被封建主排挤到次要地位,莱茵省和西里西亚在内阁里也向旧普鲁士各省让位了。勃兰登堡内阁只是通过一个埃尔伯费尔德的托利党人[55],才与莱茵省保持一点联系。**汉泽曼**和**海特男爵**!在普鲁士资产阶级看来,这两个名字体现着1848年三月和十二月之间的全部差别!

普鲁士资产阶级被抛上了国家政权的高峰,不过与它的初衷不符的是,这一结果并不是通过一次**同王权的和平交易**取得的,而是通过一场**革命**取得的。它本来不应当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应当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去反对王权,即反对**自己**,因为**人民运动**替它扫清了道路。但是在它看来,王权只是上帝赐予的一道屏障,可以用来掩盖它自身的尘世利益。**它**自身的利益以及与这些利益相适应的政治形式的不可侵犯性,译成宪法的语言应该是**王权的不可侵犯性**。因此,德国资产阶级特别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狂热地向往**立宪君主制**。所以,虽然二月革命[4]及其在德国的可悲结果使普鲁士资产阶级感到高兴,

因为这场革命使国家的权柄落到了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手中，但是这场革命同时也打碎了它的如意算盘，因为此时它的统治已受到它所不愿实现而且也不可能实现的那些条件的束缚了。

资产阶级只是袖手旁观，让人民为它作战。因此，转交给它的统治权，也就不是一个统帅在战胜自己的敌人后所掌握的那种统治权，而是一个受取得了胜利的人民的委托来保护人民自身利益的安全委员会所掌握的那种统治权。

康普豪森倒也深深地感觉到了这种处境的难堪之处，并且他的内阁的全部软弱性都是从这种感觉和引起这种感觉的那些情况中产生的。因此，他的政府的那些最无耻的行径便带有几分羞愧的色彩。而**汉泽曼**的特权却是肆无忌惮的**无耻**和**卑鄙**。**是否脸红**，就是这两个油漆匠之间的唯一差别。

普鲁士的三月革命[53]既不应该和1648年的**英国**革命混为一谈，也不应该和1789年的**法国**革命混为一谈。

1648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结成同盟反对君主制，反对封建贵族，反对居于统治地位的教会。

1789年，资产阶级和人民结成同盟反对君主制、贵族和居于统治地位的教会。

1789年革命仅仅以1648年革命作为自己的榜样（至少就欧洲来说是如此），而1648年革命则仅仅以尼德兰人反对西班牙的起义作为自己的榜样。这两次革命都比自己的榜样前进了一个世纪；不仅在时间上是如此，而且在内容上也是如此。

在这两次革命中，资产阶级都是**实际上**领导运动的阶级。**无产阶级和那些不属于资产阶级的市民等级集团**，不是还没有与资产阶级截然不同的利益，就是还没有组成独立发展的阶级或阶层。因此，

在它们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地方，例如1793年和1794年在法国，它们只不过是为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虽然它们采用的并不是资产阶级的**方式。全部法兰西的恐怖主义**，无非是用来对付**资产阶级的敌人**，即对付专制制度、封建制度以及市侩主义的一种**平民方式**而已。

1648年革命和1789年革命，并不是**英国的**革命和**法国的**革命，而是**欧洲**的革命。它们不是社会中**某一**阶级对**旧政治制度**的胜利；它们**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资产阶级在这两次革命中获得了胜利；然而，当时**资产阶级的胜利**意味着**新社会制度的胜利**，资产阶级所有制对封建所有制的胜利，民族对地方主义的胜利，竞争对行会制度的胜利，遗产分割制对长子继承制的胜利，土地所有者支配土地对土地所有者隶属于土地的胜利，启蒙运动对迷信的胜利，家庭对宗族的胜利，勤劳对游手好闲的胜利，资产阶级权利对中世纪特权的胜利。1648年革命是17世纪对16世纪的胜利，1789年革命是18世纪对17世纪的胜利。这两次革命不仅反映了发生革命的地区即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

普鲁士的三月革命却完全不是这样。

二月革命在事实上**消灭了**立宪君主制，在思想上**消灭了**资产阶级统治。普鲁士的三月革命却要在思想上**确立**立宪君主制，在事实上**确立**资产阶级统治。三月革命决不是**欧洲的革命**，它不过是欧洲革命在一个落后国家里的微弱的回声。它不仅没有超过自己的世纪，反而比自己的世纪落后了半个世纪以上。它一开始就是一种**继发性的现象**，大家都知道，继发性病症比原发性疾病更难医治，并且对机体更加有害。它不是要建立一个新社会，而是要在柏林复活那种早已在巴黎死亡了的社会。普鲁士的三月革命甚至不是**民族的、德意志的**革

命，它一开始就是**普鲁士地方性的**革命。维也纳起义、卡塞尔起义、慕尼黑起义以及各式各样的地方性的起义，都是同它并驾齐驱的，都同它争夺首位。

1648年革命和1789年革命，因其站立于创造性的事业的顶峰而充满无限的自信；而1848年柏林革命的抱负，则在于造成时代错乱。这次革命的光芒就像某些星球的光芒一样，在发出这种光芒的那些星体消逝了10万年以后，才到达我们地球居民的眼中。普鲁士的三月革命对于欧洲来说就是这样一个星球，只是缩小了规模，就像它在一切方面都缩小了规模一样。它的光芒是一具早已腐烂的社会尸体发出的光芒。

德国资产阶级发展得如此迟钝、畏缩、缓慢，以致当它以威逼的气势同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对抗的那一刻，它发现无产阶级以及市民等级中所有那些在利益和思想上跟无产阶级相近的集团也以威逼的气势同它自己形成了对抗。它看到，不仅有一个阶级在它**后面**对它采取敌视态度，而且整个欧洲都在它**前面**对它采取敌视态度。与1789年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同，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并不是一个代表**整个**现代社会反对旧社会的代表者——君主制和贵族的阶级。它降到了一种**等级**的水平，既明确地反对国王又明确地反对人民，对国王和人民双方都采取敌对态度，而在单独面对自己的每一个对手时态度都犹豫不决，因为它总是在自己前面或后面看见这两个敌人；它一开始就蓄意背叛人民，而与旧社会的戴皇冠的代表人物妥协，因为它本身已经从属于旧社会了；它不是代表新社会的利益去反对旧社会，而是代表已经陈腐的社会内部重新出现的那些利益；它操纵革命的舵轮，并不是因为它有人民作为后盾，而是因为人民在后面迫使它前进；它居于领导地位，并不是因为它代表新社会时代的首创精神，而

只是因为它反映旧社会时代的怨恨情绪；它是旧国家的一个从未显露的岩层，由于一次地震而被抛到了新国家的表层上；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在上层面前嘟囔，在下层面前战栗，对两者都持利己主义态度，并且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利己主义；对于保守派来说是革命的，对于革命派来说却是保守的；不相信自己的口号，用空谈代替思想，害怕世界风暴，同时又利用这个风暴来谋私利；毫无毅力，到处剽窃；因缺乏任何独特性而显得平庸，同时又因本身平庸而显得独特；自己跟自己讲价钱；没有首创精神，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没有负起世界历史使命；活像一个受诅咒的老头，注定要糟踏健壮人民的初次勃发的青春激情而使其服从于自己风烛残年的需求；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牙齿，没有一切[①]——这就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在三月革命后执掌普鲁士国家权柄时的形象。

卡·马克思写于1848年12月11日

载于1848年12月15日《新莱茵报》第169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6卷翻译

① 莎士比亚《皆大欢喜》第2幕第7场。——编者注

卡·马克思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56]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redigirt v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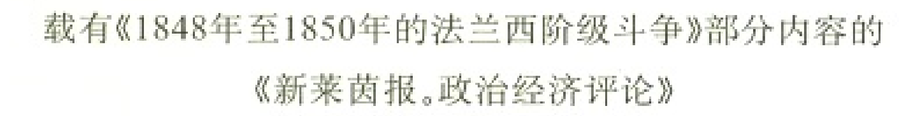
Karl Marx.

Drittes Heft. — März 1850.

Inhalt:

1848–1849. III. Die Folgen des 13. Juni. Von Karl Marx.
Für Republik zu sterben. I. Von Friedrich Engels

London,
C. Schramm, Gerant.
Hamburg und New-York.
In Commission bei Schuberth & Co.
1850.



载有《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部分内容的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除了很少几章之外，1848—1849年的革命编年史中每一个较为重要的章节，都冠有一个标题：**革命的失败！**

在这些失败中灭亡的并不是革命，而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是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即革命党在二月革命以前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观念和方案，这些都不是**二月胜利**所能使它摆脱的，只有一连串的**失败**才能使它摆脱。

总之，革命的进展不是在它获得的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中，相反，是在产生一个联合起来的、强大的反革命势力的过程中，即在产生一个敌对势力的过程中为自己开拓道路的，只是通过和这个敌对势力的斗争，主张变革的党才走向成熟，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党。

证明这一点就是下面几篇论文的任务。

一　1848年的六月失败[5]

七月革命[38]之后，自由派的银行家拉菲特陪同他的教父①奥尔良公爵向市政厅②胜利行进时，脱口说出了一句话：**“从今以后，银行家要掌握统治权了。”**拉菲特道出了这次革命的秘密。

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掌握统治权的不是法国资产阶级，而只是这个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银行家、交易所大王、铁路大王、煤铁矿和森林的所有者以及一部分与他们有联系的土地所有者，即所谓**金融贵族**。他们坐上王位，他们在议会中任意制定法律，他们分配从内阁到烟草专卖局的各种公职。

真正**工业资产阶级**是官方反对派中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它的代表在议会中只占少数。金融贵族的专制发展得越纯粹，工业资产阶级本身越以为在1832年、1834年和1839年各次起义[57]被血腥镇压以后，它对工人阶级的控制已经巩固，则它的反对派态度也就越坚决。鲁昂的工厂主**格朗丹**在制宪国民议会和立法国民议会中是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最狂热的喉舌，在众议院中却是基佐的最激烈的反对者。后来曾以妄图充当法国反革命派的基佐角色而出名的**莱昂·福适**，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末年，为了工业的利益进行过反对投机事业及其走

①“教父”的原文是“compère”，也有“同谋者”的意思。——编者注

②1789—1794年法国革命以来的政府所在地，1848年二月革命后是临时政府所在地。——编者注

狗——政府的笔战。**巴师夏**曾以波尔多和所有法国酿酒厂主的名义煽动反对现存的统治制度。

小资产阶级的所有阶层，以及**农民阶级**，都完全被排斥于政权之外。最后，置身于官方反对派的行列或者完全处于选举权享有者的范围之外的有上述阶级的**意识形态**代表和代言人，即它们的学者、律师、医生等等，简言之，就是它们的那些所谓"**专门人才**"。

财政困难使七月王朝[58]一开始就依赖资产阶级上层，而它对资产阶级上层的依赖又不断造成日益加剧的财政困难。没有达到预算平衡，没有达到国家收支平衡，是不能使国家行政服从于国民生产利益的。然而，如果不缩减国家开支，即不损害那些恰好构成现存统治制度的全部支柱的利益，如果不重新调整捐税的分担，即不把很大一部分税负加到资产阶级上层分子肩上，又怎能达到这种平衡呢？

国家负债倒是符合资产阶级中通过议会来统治和立法的那个集团的**直接利益**的。**国家赤字**，这正是他们投机的真正对象和他们致富的主要源泉。每一年度结束都有新的赤字。每过四至五年就有新的公债。而每一次新的公债都使金融贵族获得新的机会去盘剥被人为地保持在濒于破产状态的国家，因为国家不得不按最不利的条件向银行家借款。此外，每一次新的公债都使他们获得新的机会通过交易所活动来掠夺投资于国债券的大众，而政府和议会多数派议员是了解交易所活动的秘密的。一般说来，银行家和他们在议会中和王位上的同谋者由于利用国家信用的不稳定状态和掌握国家的机密，有可能制造国债券行价的突然急剧的波动，这种波动每次都会使许多较小的资本家破产，使大投机者难以置信地暴富起来。正因为国家赤字符合掌握统治权的那个资产阶级集团的直接利益，所以路易-菲力浦统治最后几年的国家**非常**开支超过了拿破仑统治时的国家非常开支

一倍以上；这笔开支每年几乎达到4亿法郎，而法国年输出总额平均很少达到7.5亿法郎。此外，这样由国家经手花出的巨款，又使各式各样骗人的供货合同、贿赂、贪污以及舞弊勾当有机可乘。在发行国债时大批地骗取国家财物，而在承包国家工程时则零星地骗取。议会与政府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在各个官厅与各个企业家之间反复重演着。

正如统治阶级在整个国家支出和国债方面进行掠夺一样，它在**铁路建筑**方面也进行掠夺。议会把主要开支转嫁于国家而保证投机的金融贵族得到黄金果。大家都记得众议院中的那些丑闻，当时偶然暴露出：多数派的全体议员，包括一部分内阁大臣在内，都曾以股东身份参与他们后来以立法者身份迫令国家出资兴办的那些铁路建筑工程。

相反，任何细小的财政改革，都因银行家施加影响而遭到失败。**邮政改革**就是一例。路特希尔德起来抗议了。难道国家能缩减它赖以支付日益增加的国债利息的财源吗？

七月王朝不过是剥削法国国民财富的股份公司，这个公司的红利是在内阁大臣、银行家、24万选民和他们的走卒之间分配的。路易-菲力浦是这个公司的经理——坐在王位上的罗伯尔·马凯尔。这个制度经常不断地威胁和损害商业、工业、农业、航运业，即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这个资产阶级在七月事变时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下的是gouvernement à bon marché——廉价政府。

金融贵族颁布法律，指挥国家行政，支配全部有组织的社会权力机关，而且借助于这些现实状况和报刊来操纵舆论，与此同时，在一切地方，上至宫廷，下至低级的咖啡馆，到处都是一样卖身投靠，一样无耻欺诈，一样贪图不靠生产而靠巧骗他人现有的财产来发财致富；尤其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上层，不健康的和不道德的欲望以毫无节制的、时时都和资产阶级法律本身相抵触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种

形式下，投机得来的财富自然要寻求满足，于是享乐变成放荡，金钱、污秽和鲜血汇为一流。金融贵族，不论就其发财致富的方式还是就其享乐的性质来说，都不过是**流氓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上层的再生**罢了。

当1847年，在资产阶级社会最高贵的舞台上公开演出那些通常使流氓无产阶级进入妓院、贫民院和疯人院，走向被告席、苦役所和断头台的同样场景时，法国资产阶级中没有掌握统治权的集团高叫“**腐败！**”人民大声疾呼：“**打倒大盗！打倒杀人凶手！**”工业资产阶级看到了对自己利益的威胁，小资产阶级充满了道义的愤慨，人民的想象力被激发起来了。诸如《路特希尔德王朝》、《犹太人是现代的国王》等等的讽刺作品，充斥巴黎全城，这些作品都或多或少巧妙地揭露和诅咒了金融贵族的统治。

不为荣誉做任何事情！荣誉不能带来任何好处！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和平！战争将使三分息和四分息国债券跌价！这就是交易所犹太人的法国写在自己旗帜上的字样。因此，它的对外政策就是让法国人的民族感情遭到一系列的凌辱。当奥地利吞并克拉科夫[45]而完成了对波兰的掠夺的时候，当基佐在瑞士宗得崩德[59]战争中积极地站到了神圣同盟[60]方面的时候，法国人的民族感情更加激昂起来了。瑞士自由党人在这次虚张声势的战争中的胜利增强了法国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自尊心，而巴勒莫人民的流血起义[61]则像电击一样激活了麻痹的人民群众，唤起了他们的伟大革命回忆和热情①。

①恩格斯在1895年版上加了一个注：“奥地利在俄国和普鲁士同意下吞并克拉科夫，是在1846年11月11日；瑞士宗得崩德战争，是在1847年11月4日至28日；巴勒莫的起义，是在1848年1月12日；1月底，那不勒斯军队对该城进行了一连九天的炮击。”——编者注

最后，**两起世界性的经济事件**的发生，加速了普遍不满的爆发，使愤怒发展成了起义。

1845年和1846年的马铃薯病害和歉收，使得到处民怨沸腾。1847年的物价腾贵，在法国也像在欧洲大陆其他各国一样，引起了流血冲突。金融贵族过着糜烂生活，人民却在为起码的生计而挣扎！在比藏赛，饥荒暴动的参加者被处死刑[62]，在巴黎，大腹便便的骗子却被王室从法庭中抢救出来！

加速革命爆发的第二个重大经济事件，就是**英国的普遍的工商业危机**。1845年秋季铁路股票投机者整批失败的事实已经预示了这次危机的来临，在1846年有一系列偶然情况如谷物关税即将废除等等使它延缓了一下，到1847年秋天危机终于爆发了。最初是伦敦经营殖民地货物贸易的大商人破产，接着便是土地银行破产和英国工业区工厂倒闭。还没有等到这次危机的全部后果在大陆上彻底表现出来，二月革命就爆发了。

这场由经济瘟疫造成的工商业的毁灭，使金融贵族的专制统治变得更加不堪忍受了。反对派的资产阶级，在法国各处发起了支持**选举改革的宴会运动**[63]，这种改革的目的是要使他们能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并推翻交易所内阁。在巴黎，工业危机还引起一个特别的后果：一批在当时的条件下已无法再在国外市场做生意的工厂主和大商人只得涌向国内市场。他们开设大公司，使大批小杂货商和小店主被大公司的竞争弄得倾家荡产。因此巴黎资产阶级中间这一部分人破产的很多，他们也因此而在二月事变中采取了革命行动。大家都知道，基佐和议会以露骨的挑战回答了选举改革的提议，路易-菲力浦决定要任命巴罗组阁的时候已经太迟了，事情竟闹到人民与军队发生冲突，军队因国民自卫军采取消极态度而被解除了武装，七月王朝[58]不

得不让位给临时政府。

在二月街垒战中产生出来的**临时政府**，按其构成成分必然反映出分享胜利果实的各个不同的党派。它只能是**各个不同阶级间妥协的产物**，这些阶级曾共同努力推翻了七月王朝，但他们的利益是互相敌对的。临时政府中**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赖德律-洛兰和弗洛孔代表共和派小资产阶级，代表共和派资产阶级的是《国民报》方面的人物[64]，代表王朝反对派[65]的是克雷米约、杜邦·德勒尔等。工人阶级只有两个代表：路易·勃朗和阿尔伯。至于临时政府中的拉马丁，他当时并不代表任何现实利益，不代表任何特定阶级；他体现了二月革命本身，体现了这次带有自己的幻想、诗意、虚构的内容和辞藻的总起义。不过，这个二月革命的代言人，按其地位和观点看来是属于**资产阶级**的。

如果说巴黎由于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而统治着法国，那么工人在革命的动荡时期却统治着巴黎。临时政府诞生后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企图从陶醉的巴黎向清醒的法国呼吁，从而摆脱这种压倒一切的影响。拉马丁不承认街垒战士有权宣告成立共和国。他认为，只有法国人的大多数才有权这样做，必须等待他们投票表决，巴黎的无产阶级不应该因篡夺权力而玷污自己的胜利。资产阶级只允许无产阶级进行**一种**篡夺，即对于斗争权的篡夺。

直到2月25日中午时分，共和国还没有宣告成立，然而内阁的一切职位都已被临时政府中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国民报》派的将军、银行家和律师们瓜分了。但是工人这一次已决心不再像1830年7月那样任人欺骗。他们准备重新开始斗争，以武力强迫成立共和国。**拉斯拜尔**前往市政厅去声明这一点。他以巴黎无产阶级的名义，**命令**临时政府宣布成立共和国；如果人民的这个命令在两小时之内不付诸

执行，他就要带领20万人回来。阵亡战士尸骨未寒，街垒尚未拆除，工人也还没有解除武装，而唯一可以用来与工人相对抗的力量不过是国民自卫军。在这种情况下，临时政府的政略上的考虑和按法律行事的拘谨精神立即消失不见了。两小时的期限未满，巴黎的各处墙壁上就已出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夺目的大字：

法兰西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以普选权为基础的共和国一宣告成立，那些驱使资产阶级投入二月革命的有限目的和动机就无人记起了。不是资产阶级中的少数几个集团，而是法国社会中所有阶级，都突然被抛到政权的圈子里来，被迫离开包厢、正厅和楼座而登上革命舞台亲身去跟着一道表演！随着立宪君主制被推翻，国家政权不受资产阶级社会支配的这种假象就消失了，因而由这种虚假的政权挑起的一切派生的冲突也一并消失了！

无产阶级既然把共和国强加给临时政府，并通过临时政府强加给全法国，它就立刻作为一个独立的党登上了前台，但是同时它招致了整个资产阶级的法国来和它作斗争。它所获得的只是为自身革命解放进行斗争的基地，而决不是这种解放本身。

其实，二月共和国首先应该**完善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这个共和国使**一切有产阶级**同金融贵族一起进入了政权的圈子。大多数的大土地所有者即正统派[40]从七月王朝迫使他们所处的那种政治地位低微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无怪乎《法兰西报》同反对派的报纸一起进行过鼓动，无怪乎拉罗什雅克兰在2月24日的众议院会议上表示过赞同革命。普选权已把那些在法国人中占绝大多数的名义上的所有者即**农民**指定为法国命运的裁定人。最后，二月共和国打落了后面隐藏着资本的王冠，因而资产阶级的统治现在已经赤裸裸地显露

出来。

正如在七月事变中工人争得了**资产阶级君主国**一样，在二月事变中他们争得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正如七月君主国不得不宣布自己为**设有共和机构的君主国**一样，二月共和国也不得不宣布自己为**设有社会机构的共和国**。巴黎的无产阶级把这个让步也**争到手了**。

工人马尔什迫使刚成立的临时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其中规定临时政府保证工人能以劳动维持生存，使全体公民都有工可做等等。当临时政府几天以后忘却了自己的诺言，并且好像心目中已经没有了无产阶级的时候，有两万工人群众向市政厅进发，大声高呼：**组织劳动！成立专门的劳动部！**临时政府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之后，勉强设立了一个专门常设委员会，负责**探求**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办法！这个委员会由巴黎各手工业行会的代表组成，由路易·勃朗和阿尔伯两人任主席。把卢森堡宫拨给它做会址。这样，工人阶级的代表就被逐出了临时政府的所在地，临时政府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就把实际的国家政权和行政管理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了。在财政部、商业部和公共工程部**旁边**，在银行和交易所**旁边**，修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礼拜堂**，这个礼拜堂的两个最高祭司路易·勃朗和阿尔伯所承担的任务就是要发现乐土，宣告新福音，并让巴黎无产阶级有工作可做。与任何世俗的国家政权机关不同，他们既没有任何经费预算，也没有任何行政权。他们得用自己的头去撞碎资产阶级社会的柱石。卢森堡宫在寻找点金石，市政厅里却在铸造着通用的钱币。

可是，巴黎无产阶级的要求既然越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范围，那也只能在卢森堡宫的朦胧状态中得到表现。

工人与资产阶级共同进行了二月革命；现在工人企图在资产阶

级**旁边**实现自己的利益，就像他们在临时政府本身安插了一位工人坐到资产阶级多数派旁边一样。**组织劳动**！但是雇佣劳动就是现存的资产阶级的组织劳动。没有雇佣劳动，就没有资本，就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资产阶级社会。**专门的劳动部**！但是，难道财政部、商业部和公共工程部不是**资产阶级的**劳动部吗？设在这些部**旁边的无产阶级的**劳动部，只能是一个软弱无力的部，只能是一个徒有善良愿望的部，只能是一个卢森堡宫委员会。工人们相信能在资产阶级旁边谋求自身解放，同样，他们也认为能够在其他资产阶级国家旁边实现法国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但是，法国的生产关系是受法国的对外贸易制约的，是受法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以及这个市场的规律制约的。如果没有一场击退英国这个世界市场暴君的欧洲革命战争，法国又怎么能打破这种生产关系呢？

一个一旦奋起反抗便集中体现社会的革命利益的阶级，会直接在自己的处境中找到自己革命活动的内容和材料：打倒敌人，采取适合斗争需要的办法，它自身行动的结果就推动它继续前进。它并不从理论上研究本身的任务。法国工人阶级不是站在这样的立足点上，它还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革命。

一般说来，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是受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制约的。在工业资产阶级统治下，它才能获得广大的全国规模的存在，从而能够把它的革命提高为全国规模的革命；在这种统治下，它才能创造出现代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同时也正是它用以达到自身革命解放的手段。只有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铲除封建社会的物质根底，并且铺平无产阶级革命唯一能借以实现的地基。法国的工业比大陆上其他地区的工业更发达，而法国的资产阶级比大陆上其他地区的资产阶级更革命。但是二月革命难道不是直接反对金融贵族的

吗?这--事实证明,工业资产阶级并没有统治法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只有在现代工业已按本身需要改造了一切所有制关系的地方才有可能实现;而工业又只有在它已夺得世界市场的时候才能达到这样强大的地步,因为在本国的疆界内是不能满足其发展需要的。但是,法国的工业,甚至对于国内市场,也大都是依靠变相的禁止性关税制度才掌握得住。所以当革命发生时,法国无产阶级在巴黎拥有实际的力量和影响,足以推动它超出自己所拥有的手段去行事,而在法国其他地方,无产阶级只是集聚在一个个零散的工业中心,几乎完全消失在占压倒多数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间。具有发展了的现代形式、处于关键地位的反资本斗争,即工业雇佣工人反对工业资产者的斗争,在法国只是局部现象。在二月事变之后,这种斗争更不能成为革命的全国性内容,因为在当时,反对次一等的资本剥削方式的斗争,即农民反对高利贷和反对抵押制的斗争,小资产者反对大商人、银行家和工厂主的斗争,也就是反对破产的斗争,还隐蔽在反对金融贵族的普遍起义之中。所以,无怪乎巴黎无产阶级力图在资产阶级利益**旁边**实现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提出来当做社会本身的革命利益;无怪乎它在**三色**旗面前降下了**红**旗。[66]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工人们只能用惨重的六月失败做代价来换得这个胜利。

由巴黎工人创造出来的卢森堡宫委员会总算还有一个功劳,这就是它从欧洲的一个讲坛上泄露了19世纪革命的秘密:**无产阶级的解放**。《通报》在不得不正式宣传一些"荒诞呓语"时脸红了,这些"荒

诞呓语"原先埋藏在社会主义者的伪经里,只是间或作为一种又可怕又可笑的遥远的奇谈传进资产阶级的耳鼓。欧洲忽然从它那资产阶级的假寐中惊醒了。于是,在把金融贵族和一般资产阶级混为一谈的那些无产者的观念里,在甚至否认有阶级存在或至多也只认为阶级不过是立宪君主制产物的那些共和主义庸人的想象里,在先前被拒于政权之外的那些资产阶级集团伪善的词句里,**资产阶级的统治**已随着共和国的成立而被排除了。这时,一切保皇党人都变成了共和党人,巴黎所有百万富翁都变成了工人。与这种在想象中消灭阶级关系相适应的词句,就是**博爱**——人人都骨肉相连、情同手足。这样和气地抛开阶级矛盾,这样温柔地调和对立的阶级利益,这样想入非非地超越阶级斗争,一句话,博爱——这就是二月革命的真正口号。只是纯粹出于**误会**才造成各阶级的分裂,于是2月24日拉马丁就把临时政府叫做"消除**各阶级间所存在的可怕误会**的政府"。巴黎无产阶级就沉醉在这种宽大仁慈的博爱气氛中了。

从临时政府这方面来说,它既然被迫宣告共和国成立,那就要尽力使这个共和国能为资产阶级和外省所接受。它以废除政治犯死刑来否定法兰西第一共和国那种血腥恐怖;在报刊上可以自由发表任何观点;军队、法庭、行政,除了少数例外,仍然掌握在昔日的达官贵人手中;七月王朝的重大罪犯没有一个受到追究。《国民报》方面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把君主国的名称和衣裳改换成旧共和国的名称和衣裳,借以取乐。对他们来说,共和国只不过是旧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件新舞衣罢了。年轻的共和国认为自己建立丰功伟绩的途径不在于去恐吓别人,而在于自己总是诚惶诚恐,依靠自己的柔顺和不对抗的生存方式来谋求生存并消除对抗。它向国内特权阶级和国外专制政权大声宣告,共和国是爱好和平的。自己

活，也让别人活——这就是它的座右铭。恰好在这个时候，紧跟着二月革命，德国人、波兰人、奥地利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各个民族的人都按照自己直接所处的情势起来反抗了。俄国和英国都感到措手不及，后者本身被运动波及，而前者则被运动吓住了。于是，共和国面前一个**民族**敌人也没有了，于是也就没有什么重大的外部纠纷可以激发起活力，加速革命过程，推动临时政府前进或将它抛弃。巴黎无产阶级把共和国看做是自己创造的，自然赞同临时政府所采取的每一个有助于巩固其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地位的措施。它心甘情愿地接受科西迪耶尔的委派，去执行警察职务，来保护巴黎的财产，就像它让路易·勃朗去调停工人与雇主关于工资的争议一样。它认为在欧洲面前保全共和国的资产阶级荣誉是它自己的荣誉问题。

共和国不论在国外或国内都没有碰到什么抵抗。这种情况就使它解除了武装。它的任务已不是要用革命手段改造世界，而只是要它自己去适应资产阶级社会的环境。临时政府的**财政措施**最能清楚地表明它是如何狂热地解决这一任务的。

公共信用和**私人信用**自然被动摇了。**公共信用**是以确信国家听凭犹太人金融家剥削为基础的。但是旧的国家已经消失了，而革命反对的首先是金融贵族。最近这次欧洲商业危机的震荡还没有终止。破产还在相继发生。

可见，在二月革命爆发以前，**私人信用**已经瘫痪，流通已经不畅，生产已经停滞。革命危机加剧了商业危机。既然私人信用是以确信在整个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范围内的资产阶级生产、资产阶级制度没有受到侵犯并且不可侵犯为基础的，那么这种已经使资产阶级生产的基础，即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受奴役的状态受到威胁的革命，以卢森堡

宫的斯芬克斯[1]去向交易所对抗的革命，又该产生什么影响呢？无产阶级的起义，就是消灭资产阶级的信用，因为它意味着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及其制度。公共信用和私人信用是表明革命强度的经济温度计。**这种信用降低到什么程度，革命的热度和革命的创造力就增长到什么程度。**

临时政府想要抛掉共和国的反资产阶级外貌。为此首先必须设法保证这个新国家形式的**交换价值**，保证它在交易所中的**行价**。私人信用必然要跟着共和国在交易所中的行价再度上升。

为了使人不致**怀疑**共和国不愿意或不能够履行它从君主国继承下来的义务，为了使人相信共和国具有资产阶级的道德和偿付能力，临时政府采取了既不体面而又幼稚的虚张声势的手段。法定偿付期限**未到**，临时政府就向国债债权人付清了五厘、四厘五和四厘息国债券的息金。资本家一看见临时政府这样提心吊胆地急于收买他们的信任，他们那种资产阶级的骄矜自负的态度就立刻恢复了。

自然，临时政府的财政拮据，并没有因它采取这种耗费本身现金储备的矫揉造作办法而有所减轻。财政拮据已不能再掩饰下去了，于是**小资产者、仆役和工人**就不得不掏出钱来，为政府赠给国债债权人的这份令人喜出望外的礼物付款。

政府宣布，凡存款在100法郎以上的**储蓄银行存折**今后不得提取现款。储蓄银行中的存款被没收了，由政府下令变为不予兑现的国债。这就激起了原已处境困窘的**小资产者**对于共和国的愤恨。小资产者这时所持有的已经不是储蓄银行的存折而是国债券，于是他们就不得不把这种债券拿到交易所去出卖，从而直接听任交易所犹太人

---

①指卢森堡宫委员会。——编者注

的宰割，而他们正是为了反对这些人才进行二月革命的。

银行是七月王朝时期掌握统治权的金融贵族的高教会[67]。正像交易所操纵着国家信用一样，银行操纵着**商业信用**。

二月革命不仅直接威胁银行的统治，而且威胁银行的生存；银行一开始就把不守信用弄成普遍现象，以图使共和国丧失信用。银行突然停止对银行家、工厂主和商人发放信贷。这种手腕既然没有立刻引起反革命，就必然反而使银行本身受到打击。资本家们把他们贮藏在银行地下室里的钱提出来。银行券持有者们都赶到银行出纳处去挤兑金银。

临时政府本来可以不用强力干涉而完全合法地迫使银行**破产**，它只要冷眼旁观，让银行听天由命就行了。**银行破产**就会像洪水泛滥一样，转瞬间把金融贵族，这个共和国的最强大最危险的敌人，七月王朝的黄金台柱，从法国土地上扫除干净。银行一旦破产，如果政府建立一个国家银行并把全国信用事业置于国家监督之下，资产阶级自身就只得把这看做是自己在绝境中的一线生机。

但是，临时政府并没有这样去做，反而规定银行券**强制流通**。不仅如此，它还把一切外省银行变成了法兰西银行的分行，使法兰西银行网络遍布法国全境。后来，临时政府又向法兰西银行签约借款，把**国有森林**抵押给它作为担保。于是二月革命就直接地巩固和扩大了它本来应该推翻的银行统治。

同时，临时政府又日益被有增无已的财政赤字压得直不起腰来。它恳求大家为爱国主义作出牺牲，但是毫无用处。只有工人才给它一点施舍。于是它只得采取英勇手段——开征**新税**。然而向谁征税呢？向交易所的豺狼、银行大王、国债债权人、食利者和工业家征税吗？这不是取得资产阶级对于共和国同情的办法。一方面，这样做意

味着危害国家信用和商业信用，而另一方面，人们又力图用很大的牺牲和屈辱去换取这种信用。但是，总得有人从自己腰包里掏出钱来才行。谁来为资产阶级的信用事业作出牺牲呢？是笨伯雅克①，**农民**。

临时政府对所有四种直接税每法郎加征四十五生丁附加税[68]。官方的报刊欺骗巴黎无产阶级，说这项税负主要是落在大地产上，即落在复辟王朝非法攫取的10亿巨款[69]占有者的身上。而实际上这项税负首先落在**农民阶级**身上，即落在法国绝大多数人民身上。**农民不得不负担二月革命的费用**，反革命由此就得到了他们的主要物质力量。四十五生丁税，对于法国农民是个生死问题，而法国农民又把它变成了共和国的生死问题。从这时起，法国农民心目中的**共和国**就是**四十五生丁税**，而在他们看来，巴黎无产阶级就是靠他们出钱来享乐的浪费者。

1789年的革命是从免除农民的封建负担开始的，而1848年的革命为了使资本不受到损害并使其国家机器继续运转，首先就给农民加上了一项新税。

临时政府只有用一个方法才能排除这一切困难，并使国家脱离其旧日的轨道，这就是**宣告国家破产**。大家都记得，赖德律-洛兰后来曾向国民议会描述，他如何义愤填膺地驳斥了交易所犹太人、法国现任财政部长富尔德所提出的这种无理要求。其实，富尔德当时劝他接受的是知善恶树上的苹果[70]。

临时政府既然承认旧资产阶级社会发行的要国家负责付款的期票，也就归附了旧资产阶级社会。它不是以一个威风凛凛的债权人

①笨伯雅克原文是Jacques le bonhomme，是法国贵族对农民的蔑称。——编者注

身份去向资产阶级社会索取多年的革命旧账，反而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受催逼的债务人。它只得去加固摇摇欲坠的资产阶级社会关系，来履行那些只有在这种社会关系范围内才必须履行的义务。信用已成了它维持生存的必要条件，而它对无产阶级的让步和对无产阶级的许诺，已成了它无论如何都**必须**打破的**桎梏**。工人的解放——即令只是**空话**——也已成了新共和国不堪忍受的危险，因为要求工人解放，就意味着不断反对恢复信用，而这种信用是以坚定不移地、毫不含糊地承认现存的经济的阶级关系为基础的。所以，一定要**把工人清除出去**。

二月革命已把军队逐出巴黎了。国民自卫军，即资产阶级各个阶层的势力，成了唯一的军事力量，但是它觉得自己还不能对付无产阶级。而且，国民自卫军尽管进行了极顽强的抵抗和千方百计的阻挠，也不得不逐渐地、部分地开放自己的队伍，让武装的无产者加入进来。这样一来，就只剩下了一条出路：**使一部分无产者与另一部分无产者相对立。**

为了这个目的，临时政府组织了24营**别动队**[71]，每营1 000人，由15岁到20岁的青年组成。这些青年大部分属于**流氓无产阶级**，而流氓无产阶级在所有大城市里都是由与工业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的一群人构成的。这是盗贼和各式各样罪犯滋生的土壤，是专靠社会餐桌上的残羹剩饭生活的分子、无固定职业的人、游民——gens sans feu et sans aveu；他们依各人所属民族的文化水平不一而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具有拉察罗尼[72]的特点。他们的性格在受临时政府征募的青年时期是极易受人影响的，能够做出轰轰烈烈的英雄业绩和狂热的自我牺牲，也能干出最卑鄙的强盗行径和最龌龊的卖身勾当。临时政府每天给他们1法郎50生丁，就是说，收买了他们。临时政府给他们

穿上特别制服，就是说，使他们在外表上不同于穿工作服的工人。担任他们指挥官的，一部分是政府指派的常备军军官，一部分是他们自己选出的资产阶级年轻子弟，这些人满口要为祖国牺牲和为共和国效忠的高调迷住了他们。

这样，当时与巴黎无产阶级相对立的，就有一支从他们自己当中召募的年轻力壮、好勇斗狠的24 000人的军队。无产阶级向列队通过巴黎街头的别动队欢呼“**万岁！**”他们把别动队看成是自己在街垒战中的前卫战士。他们认为别动队是同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相对立的**无产阶级**自卫军。他们的错误是情有可原的。

除了别动队之外，政府还决定在自己周围募集一支产业工人大军。马利部长把10万个因危机和革命而失业的工人编进了所谓国家工场[73]。在这个响亮的名称之下不过是以23苏的工资雇用工人去从事枯燥、单调和非生产性的**掘土工作**罢了。国家工场只不过是**露天的英国习艺所**[74]。临时政府以为这样就组建了**第二支反对工人本身的无产者大军**。这一次资产阶级把国家工场看错了，正如工人把别动队看错了一样。它原来是创立了一支**暴动军**。

不过有**一个**目的是达到了。

国家工场——路易·勃朗在卢森堡宫所宣传的那种人民工场就叫这个名字。马利的工场同卢森堡宫的设想完全**相反**，但因为名称相同，就往往给人提供机会，去别有用心地制造误会，就像描写仆人的西班牙喜剧所制造的那种误会一样[75]。临时政府自己暗地里散布谣言，说这些国家工场是路易·勃朗的发明，因为国家工场的预言者路易·勃朗是临时政府中的一员，谣言就更加显得真实了。在巴黎资产阶级半天真半故意地混淆这两种东西的过程中，在法国和欧洲当时受到操纵的舆论中，这些习艺所竟成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步，于

是，社会主义就一起被钉在耻辱柱上了。

如果不是就内容来说，而是就名称来说，**国家工场**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工业，反对资产阶级信用和反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具体表现。因此，资产阶级把自己的全部仇恨都倾注在这些国家工场上。同时它认定这些国家工场是它一旦强大到能够跟二月革命的幻想公然决裂时就可以加以打击的对象。**小资产者**也把这些已成为共同攻击对象的国家工场当做发泄自己一切不满和烦恼的目标。他们咬牙切齿地计算着这班无产阶级懒汉耗费的钱财，而他们自己的境况却变得一天比一天艰难。装装样子的工作竟可以获得国家年金，这就叫社会主义！他们这样嘟囔着。他们认为自己境况穷困的原因就在于国家工场，就在于卢森堡宫的浮夸之词，就在于巴黎工人的示威游行。最狂热地反对共产主义者的所谓阴谋诡计的，莫过于这些濒临破产而又毫无得救希望的小资产者了。

这样，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行将来临的搏斗中，一切优势，一切最重要的阵地，社会的一切中间阶层，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而正是在这个时候，二月革命的浪潮又在整个大陆高涨起来了；每一次来的邮件，时而从意大利，时而从德国，时而从最遥远的欧洲东南部地区都传来新的革命消息，不断地给人民带来胜利的证据，使人民普遍地沉浸在欣喜的情绪之中，而实际上他们已经丧失了这种胜利。

三月十七日事件和**四月十六日事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内部蕴蓄的伟大阶级斗争的初次交锋。

三月十七日事件暴露了无产阶级不能采取任何坚决行动的模棱两可态度。无产阶级举行示威游行的最初目的，是要让临时政府回到革命轨道上来，在必要时把资产阶级的阁员清除出去，并且迫使国

民议会和国民自卫军的选举延期[76]。但是在3月16日，由国民自卫军代表的资产阶级举行了反对临时政府的示威游行。他们在“打倒赖德律-洛兰!”的呐喊声中涌向市政厅。这就使人民不得不在3月17日高呼：“赖德律-洛兰万岁!临时政府万岁!”不得不**抗击**资产阶级，以维护他们觉得陷于危急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他们没有使临时政府屈服于自己，反而加固了临时政府的地位。三月十七日事件以一种戏剧性的场面结束了。诚然，巴黎无产阶级在这一天再度显示了自己强大的力量，但这只是加强了临时政府内外的资产阶级击破无产阶级的决心。

四月十六日事件是临时政府串通资产阶级制造的一个**误会**。当时许多工人聚集在马尔斯广场和跑马场上，以便筹备国民自卫军总部的选举事宜。突然有一个谣言迅速传遍巴黎全城各处，说在马尔斯广场上工人们在路易·勃朗、布朗基、卡贝和拉斯拜尔领导下武装集合，打算从那里向市政厅进发，推翻临时政府，宣布成立共产主义政府。立刻就有人发出全体紧急集合警报——后来赖德律-洛兰、马拉斯特和拉马丁三人竞相表白，说首先发出警报的殊荣归于自己——，于是一小时以后就有10万人荷枪待发，市政厅的所有入口都被国民自卫军占据了，“打倒共产主义者!打倒路易·勃朗、布朗基、拉斯拜尔和卡贝!”的口号响彻巴黎全城，无数的代表团跑来向临时政府表示效忠，所有的人都准备拯救祖国和社会。最后，当工人们来到市政厅前面，正要把他们在马尔斯广场上募集的爱国捐款献给临时政府的时候，他们才惊悉，原来资产阶级的巴黎刚才在周密筹划的虚假战斗中战胜了他们的影子。4月16日的这场可怕的乱子，便成了**把军队召回巴黎**(这出拙劣喜剧的真正目的原在于此)，并在外省各处举行反动的联邦主义示威游行的借口。

5月4日，由**直接普选**产生的**国民议会**①开会了。普选权并不具备旧派共和党人所寄托于它的那种魔力。旧派共和党人把全体法国人，或至少是把大多数法国人看做具有同一利益和同一观点等等的**公民**。这就是他们的那种**人民崇拜**。但是，选举所表明的并不是他们**意想中的**人民，而是**真实的**人民，即分裂成各个不同阶级的代表。我们已经看到，农民和小资产者在选举中为什么必定由好斗的资产阶级和渴望复辟的大土地所有者来统辖。然而，普选权虽不是共和主义庸人所想象的那种法力无边的魔杖，却具有另一种高超无比的功绩；它发动阶级斗争，使资产阶级社会各中间阶层迅速地产生幻想又迅速地陷入失望；它一下子就把剥削阶级所有集团提到国家高层，从而揭去他们骗人的假面具，而有选举资格限制的君主制度则只是让资产阶级中的某些集团丧失声誉，使其余的集团得以隐藏在幕后并且罩上共同反对派的神圣光环。

在5月4 日开幕的制宪国民议会中，占压倒优势的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国民报》的共和派[64]。正统派[40]和奥尔良派[77]本身起初也只有戴着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假面具才敢出头露面。只有借共和国的名义，才能发动斗争反对无产阶级。

共和国，即法国人民所承认的共和国开始存在的时期，**应该是从5月4日算起，而不是从2月25日算起**；这不是巴黎无产阶级强令临时政府接受的那个共和国，不是设有社会机构的那个共和国，不是在街垒战士眼前浮现过的那个幻象。国民议会所宣告成立的、唯一合法的共和国，不是一种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革命武器，而是在政治上对

①从本页到第132页，国民议会是指1848年5月4日—1849年5月的制宪国民议会（制宪议会）。——编者注

它实行的改造，是在政治上对资产阶级社会的重新加固，简言之，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这种论断是从国民议会的讲坛上发出的，并且在一切共和派的和反共和派的资产阶级报刊中得到了响应。

我们已经看到：二月共和国事实上不过是，而且也只能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临时政府在无产阶级的直接压力下，不得不宣布它是一个**设有社会机构的共和国**；巴黎无产阶级还只能在**观念**中、在**想象**中越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范围，而当需要行动的时候，他们的活动却处处都为资产阶级共和国效劳；许给无产阶级的那些诺言已成了新共和国所不堪忍受的威胁，临时政府的整个存在过程可以归结为一场反对无产阶级要求的、持续不断的斗争。

整个法国在国民议会里对巴黎无产阶级进行审判。国民议会立即与二月革命的一切社会幻想实行了决裂，公然宣布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纯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它立即从自己所任命的执行委员会[78]中排除了无产阶级的代表——路易·勃朗和阿尔伯；它否决了设立专门劳动部的提案，并且以暴风雨般的欢呼声同意了特雷拉部长所作的声明："现在的问题只是**要劳动恢复原状**。"

然而还不止这些。二月共和国是工人在资产阶级消极支持下争得的。无产者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二月斗争中的胜利者，并提出胜利者的高傲要求。必须在巷战中战胜这些无产者，一定要让他们明白，一旦他们在斗争中不是**联合**资产阶级而是**反对**资产阶级，他们就注定要失败。先前，为了建立一个对社会主义作出让步的二月共和国，曾经需要无产阶级联合资产阶级同王权进行战斗；现在，为了使共和国摆脱它向社会主义作出的让步，为了正式确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统治，已需要再来一场战斗了。资产阶级一定要用手中的武器来反对无产阶级的要求。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真正出生地并不是**二月胜**

利，而是**六月失败**。

无产阶级加速了决战的到来：它在5月15日涌入了国民议会，徒然地试图恢复自己的革命威望，结果只是使自己有能力的领袖落到了资产阶级狱吏手中。[79]*Il faut en finir*！这种局面必须结束！这个呼声表明了国民议会决心迫使无产阶级进行决战。执行委员会颁布了许多挑衅性的法令，如禁止民众集会等等。从制宪国民议会的讲坛上直接向工人发出挑衅，辱骂和嘲弄工人。但是，我们已经看到，真正的攻击对象，还是**国家工场**。制宪议会命令执行委员会对付这些国家工场，而执行委员会本来就只等国民议会用命令方式批准它自己既定的计划。

执行委员会开始阻挠工人进入国家工场，把计日工资改成了计件工资，并把一切不是在巴黎出生的工人赶到索洛涅，说是让他们去做掘土工作。而所谓掘土工作，正如从那里失望归来的工人向同行工友们所说的那样，不过是用来掩饰驱逐工人这一行动的花言巧语罢了。最后，6月21日，《通报》上登载了一项法令，命令把一切未婚工人强制逐出国家工场，或者编入军队。

工人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不是饿死，就是斗争。他们在6月22日以大规模的起义作了回答——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保存还是消灭**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蒙在共和国头上的面纱被撕破了。

大家知道，那些没有领袖、没有统一计划、没有经费和多半没有武器的工人，是如何以无比的勇敢和机智扼制了军队、别动队、巴黎的国民自卫军以及从外省开来的国民自卫军，一直坚持了五天。大家知道，资产阶级为自己所经受的死亡恐怖进行了闻所未闻的残酷报复，残杀了3 000多名俘虏。

法国民主派的正式代表人物受共和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太深，以致在六月战斗已经过去了几星期，才开始觉察到这次战斗的意义。他们简直被冲散他们共和国幻觉的硝烟熏得头昏眼花。

请读者允许我们用《新莱茵报》[80]中的一段话来表达六月失败的消息给我们的直接印象：

"二月革命的最后正式残余物——执行委员会——已像幻影一样在严重事变的面前消散了；拉马丁的照明弹变成了卡芬雅克的燃烧弹。博爱，一方剥削另一方的那些互相对立的阶级之间的那种博爱；博爱，在2月间宣告的、用大号字母写在巴黎的正面墙上、写在每所监狱上面、写在每所营房上面的那种博爱，用真实的、不加粉饰的、平铺直叙的话来表达，就是**内战**，就是最可怕的国内战争——劳动与资本间的战争。在6月25日晚间，当资产阶级的巴黎张灯结彩，而无产阶级的巴黎在燃烧、在流血、在呻吟的时候，这个博爱便在巴黎所有窗户前面烧毁了。博爱存在的那段时间正好是资产阶级利益和无产阶级利益友爱共处的时候。

拘守1793年旧的革命传统的人，社会主义的空论家，他们曾为人民向资产阶级乞怜，并且被允许长时间地说教和同样长时间地丢丑，直到把无产阶级的狮子催眠入睡为止；共和党人，他们要求实行整套旧的、不过没有君主的资产阶级制度；王朝反对派[65]，他们从事变中得到的不是内阁的更换，而是王朝的崩溃；正统派，他们不是想脱去奴仆的服装，而是仅仅想改变一下这种服装的式样。所有这些人物就是人民在实现自己的二月革命时的同盟者……

二月革命是一场**漂亮的**革命，得到普遍同情的革命，因为在这场反对王权的革命中显现出来的各种矛盾还在**尚未充分发展的状态**中和睦地安睡在一起，因为构成这些矛盾背景的社会斗争还只是一

种隐约的存在，还只是口头上和字面上的存在。相反，**六月革命**则是一场**丑恶的**革命，令人讨厌的革命，因为这时行动已经代替了言词，因为这时共和国已经摘掉了保护和掩饰过凶恶怪物的王冠，暴露出这个凶恶怪物的脑袋。**秩序**！——这是基佐的战斗呐喊。**秩序**！——基佐的信徒塞巴斯蒂亚尼曾在俄军攻下华沙时这样高喊。**秩序**！——法国国民议会和共和派资产阶级的粗野的应声虫卡芬雅克这样高喊。**秩序**！——他所发射的霰弹在炸开无产阶级的躯体时这样轰鸣。1789年以来的许多次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一次曾侵犯过**秩序**，因为所有这些革命都保持了阶级统治和对工人的奴役，保持了**资产阶级**秩序，尽管这种统治和这种奴役的政治形式时常有所改变。六月革命侵犯了这个秩序。六月革命罪该万死！”①（1848年6月29日《新莱茵报》）

六月革命罪该万死！——欧洲各处响应道。

巴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逼迫**下发动了六月起义。单是这一点已注定无产阶级要失败。既不是直接的、公开承认的要求驱使无产阶级想用武力推翻资产阶级，也不是无产阶级已经到了有能力解决这个任务的地步。《通报》只得正式向无产阶级挑明，共和国认为有必要对它的幻想表示尊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并且只有它的失败才使它确信这样一条真理：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只要企图加以实现，就会成为罪行。于是，原先无产阶级想要强迫二月共和国予以满足的那些要求，那些形式上浮夸而实质上琐碎的、甚至还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要求，

①参看马克思《六月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153—155页）。——编者注

就由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取而代之，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既然将自己的葬身地变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地，也就迫使资产阶级共和国现了原形：原来这个国家公开承认的目的就是使资本的统治和对劳动的奴役永世长存。已经摆脱了一切桎梏的资产阶级统治，由于眼前总是站立着一个遍体鳞伤、决不妥协与不可战胜的敌人——其所以不可战胜，是因为它的存在就是资产阶级自身生存的条件——就必定要立刻变成**资产阶级恐怖**。在无产阶级暂时被挤出舞台而资产阶级专政已被正式承认之后，资产阶级社会的中间阶层，即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就必定要随着他们境况的恶化以及他们与资产阶级对抗的尖锐化而越来越紧密地靠拢无产阶级。正如他们从前曾认为他们的灾难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崛起一样，现在则认为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失败。

如果说六月起义在大陆各处都加强了资产阶级的自信心，并且促使它公开与封建王权结成联盟来反对人民，那么究竟谁是这个联盟的第一个牺牲品呢？是大陆的资产阶级自身。六月失败阻碍了它巩固自己的统治，阻碍了它使人民在半满意和半失望中停留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最低阶段上。

最后，六月失败使欧洲各个专制国家识破了一个秘密，即法国为了能在国内进行内战，无论如何都必须对外保持和平。这就把已经开始争取民族独立的各国人民置于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强权之下，而同时这些国家的民族革命的成败也就要依无产阶级革命的成败而定，它们那种表面上不依社会大变革为转移的独立自主性就消失了。只要工人还是奴隶，匈牙利人、波兰人或意大利人都不会获得自由！

最后，神圣同盟[60]的胜利使欧洲的局面发生了变化，只要法国发生任何一次新的无产阶级起义，都必然会引起**世界战争**。新的法国革命将被迫立刻越出本国范围去**夺取欧洲的地区**，因为只有在这里才能够实现19世纪的社会革命。

总之，只有六月失败才造成了所有那些使法国能够发挥欧洲革命**首倡作用**的条件。只有浸过了六月起义者的**鲜血**之后，三色旗才变成了欧洲革命的旗帜——**红旗！**[66]

因此我们高呼：**革命死了！——革命万岁！**

二　1849年6月13日

1848年2月25日法国被迫实行**共和制**，6月25日**革命**被强加给法国。在6月以后，革命意味着**推翻资产阶级社会**，而在2月以前，它却意味着**推翻一种国家形式**。

六月斗争[5]是资产阶级**共和**派领导的，斗争胜利了，政权当然归他们。戒严使手足被缚的巴黎毫无抵抗地倒在他们脚下，而在外省，则到处笼罩着精神上的戒严气氛，获胜的资产者盛气凌人、飞扬跋扈，农民则肆无忌惮地表现出对财产的狂热情绪。因此，**在下层**已经没有任何威胁了！

在工人的革命力量被消灭的同时，**民主主义共和派**即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共和派的政治影响也被消灭了，他们的代表者在执行委员会[78]中是赖德律-洛兰，在制宪国民议会中是山岳党[81]，在新闻出版界是《改革报》。他们同资产阶级共和派一起在4月16日搞过反对无产阶级的阴谋，同这些人一起在六月事变时攻打过无产阶级。这样，他们就自己破坏了他们那一派赖以成为一股力量的背景，因为小资产阶级只有以无产阶级为后盾，才能保持住自己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阵地。他们被踢开了。资产阶级共和派公然破坏了自己在临时政府和执行委员会时期勉强地而且是满腹鬼胎地跟他们结成的虚假同盟。民主主义共和派作为同盟者已被轻蔑地抛弃，堕落成了三色旗派[64]的仆从，他们不可能迫使三色旗派作出任何让步，但是每当三色

旗派的统治以及整个共和国看来受到反对共和的资产阶级集团的威胁时，他们就必定要维护这个统治。最后，这些集团，即奥尔良派和正统派，一开始就在制宪国民议会中占少数。在六月事变以前，他们自己只有戴上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假面具才敢出头露面；六月胜利使整个资产阶级法国一度把卡芬雅克当成自己的救星来欢迎，而当反共和派在六月事变后不久重新取得独立地位时，军事专政和巴黎戒严只容许这一派非常畏缩谨慎地伸出自己的触角。

自1830年起，**资产阶级共和派**以他们的著作家、他们的代言人、他们的专门人才、他们的野心家、他们的议员、将军、银行家和律师为代表，聚集在巴黎的一家报纸即《**国民报**》的周围。在外省，《国民报》设有自己的分社。《国民报》派是**三色旗共和国的王朝**。他们立刻就占据了一切官职——内阁各部、警察总局和邮政总局的职位，以及地方行政长官的职位和军队高级军官的空缺。他们的将军**卡芬雅克**执掌着行政权，他们的总编辑马拉斯特成了制宪国民议会常任议长。同时，他又以司礼官的身份在自己的沙龙中接待正直的共和国的宾客。

甚至那些革命的法国著作家，也由于对共和主义传统怀着某种敬畏而抱着错误见解，以为在制宪国民议会中是保皇党人占统治地位。恰恰相反，在六月事变之后，制宪议会仍然**完全是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代表者**，而且，三色旗共和派在议会外的影响越是丧失殆尽，制宪议会就越是坚决地摆出这副面孔。在需要捍卫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形式**时，制宪议会就拥有民主主义共和派的支持票；在需要捍卫这个共和国的**内容**时，制宪议会甚至连讲话的方式也与资产阶级保皇派如出一辙了，因为构成资产阶级共和国内容的正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正是它的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物质条件。

由此可见，这个制宪议会的生命和活动不是体现了保皇主义，

而是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它归根到底不是死去了，也不是被杀害了，而是腐烂了。

在制宪议会统治的全部期间，当它在前台表演大型政治历史剧的时候，在后台却进行着一刻不停的牺牲祭——军事法庭不断地对被捕的六月起义者判罪，或是不经审判就放逐。制宪议会老练地承认，它不是把六月起义者当做罪犯来审判，而是当做敌人来消灭。

制宪国民议会的第一步行动就是成立了**调查委员会**，来调查六月事件[5]和五月十五日事件[79]，并调查社会主义各派和民主主义各派的领袖们参加这些事件的情况。调查的直接对象就是路易·勃朗、赖德律-洛兰和科西迪耶尔。资产阶级共和派急于要除掉这些敌手。他们再也找不到比**奥迪隆·巴罗**先生更为适当的人选来替他们复仇了。这个人是王朝反对派过去的首领，自由主义的化身，妄自尊大的小人，浅薄无能的庸才，他不仅要为王朝复仇，而且要同那些使他丢掉内阁首相职位的革命家算账。这保证他决不会手软。于是这个巴罗被任命为调查委员会主席，而他也就制造出了一桩控诉二月革命的完整的案件，这个案件可以概括如下：3月17日——**游行示威**，4月16日——**阴谋**，5月15日——**谋杀**，6月23日——**内战**！他为什么没有把他的深奥的刑事调查工作延伸到二月二十四日事件呢？《辩论日报》对此作了回答①：二月二十四日事件就是**创建罗马**。国家的起源湮没在神话之中，而对神话是只许相信，不许讨论的。路易·勃朗和科西迪耶尔被交付法庭审判了，国民议会已经完成了它在5月15日开始进行的清洗自身的工作。

由临时政府拟定而由古德肖重新提出的对资本课税的方案(通

①指1848年8月28日《辩论日报》社论。——编者注

过抵押税的形式)被制宪议会否决;限制工作日为十小时的法律[37]被废除;负债者监禁制度重新施行;占法国人口大部分的没有读写能力的人被取消了参加陪审的资格。为什么不干脆连他们的选举权也剥夺掉呢?报刊交纳保证金的制度重新施行,结社权受到了限制。

但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在急忙给旧日的资产阶级关系恢复旧日的保障,并消除革命浪潮所遗留下来的一切痕迹时,却遇到了一种使他们遭受意外危险的反抗。

在六月事变中,最狂热地为拯救财产和恢复信用而奋斗的,莫过于巴黎的小资产者——开咖啡店的、开餐馆的、开酒店的、小商人、小店主、小手工作坊主等等。小店主们奋起向街垒进攻,以求恢复从街头到小店去的通路。但是,街垒后面站着小店主们的顾客和债务人,街垒前面站着他们的债权人。而当街垒被摧毁,工人被击溃,小店主们在胜利的陶醉中奔回自己店里的时候,发觉店门已被财产的救主即信用的正式代理人堵住了,这位代理人拿着威胁性的通知单迎接他们:票据过期了!房租过期了!债票过期了!小店铺垮了!小店主垮了!

拯救财产!但是,他们所居住的房屋不是他们的财产;他们做生意的店铺不是他们的财产;他们所出卖的商品不是他们的财产。无论是他们的店铺,或是他们吃饭用的盘子,或是他们睡觉用的床铺,都已不再归他们所有了。正是为了对付他们,人们才需要**去拯救这种财产**,这样做为的是那些将房屋租给他们住的房东,为的是那些为他们贴现票据的银行家,为的是那些贷给他们现金的资本家,为的是那些把商品信托给小店主们出卖的工厂主,为的是那些把原料赊卖给小手工作坊主的批发商。**恢复信用**!但是,重新变得稳定的信用已表明自己是一个充满活力而又十分干练的神,它把无力支付的债务人连

同其妻子儿女一起逐出了住所，把他的虚幻的财产交给了资本，而把他本人抛进了在六月起义者尸体上重又威风凛凛地耸立起来的债务监狱。

小资产者惊愕地认识到，他们击溃了工人，就使自己毫无抵抗地陷入了债权人的掌握之中。他们从2月起就像慢性病一样拖延下来的、似乎没有人去注意的破产，在6月以后被正式宣告了。

小资产者的**名义上的财产**，只有在需要驱使他们去**以财产的名义**进行斗争的时候，才不受侵犯。现在，既然已经和无产阶级算清大账，也就可以和小店主来算小账了。在巴黎，过期的票据总值在2 100万法郎以上，外省则在1 100万法郎以上。巴黎有7 000多家商店老板，自2月以来就没有交过房租。

如果说国民议会决定要调查自2月以来的**政治罪责**，那么小资产者则要求调查2月24日以前的**公民债务**。大群的小资产者聚集在交易所的大厅里，威胁地提出要求：任何商人，凡是能证明自己只是由于革命引起的不景气才遭到破产，而到2月24日以前生意仍然不错，就应该由商业法庭准许延长偿付债务的期限，并强制债权人在取得适当利息的条件下撤诉。这个问题曾以"**友好协议**"法案形式在国民议会中讨论。国民议会正在踌躇不决的时候，突然听说有起义者的妻子儿女数千人在圣但尼门前准备请愿要求大赦。

小资产者面对着复活的六月幽灵战栗了起来，而国民议会又板起了面孔。债权人和债务人的concordats à l'amiable——友好协议——中最重要的条款遭到了否决。

可见，在国民议会中，资产阶级的共和派代表早已把小资产者的民主派代表压了下去，这种议会范围内的分裂使资产阶级获得了现实的经济利益，因为小资产者作为债务人被交给资产者这个债权

人去摆布了。这些债务人当中有一大部分已经完全破产，其余的人则只许在完全成为资本奴隶的条件下继续经营自己的业务。1848年8月22日，国民议会否决了友好协议，而1848年9月19日，即在戒严期间，路易·波拿巴亲王和囚禁在万塞讷监狱的共产主义者拉斯拜尔当选为巴黎的代表。资产阶级则选举了犹太汇兑业者和奥尔良党人富尔德。这样，各方面都同时向制宪国民议会，向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和卡芬雅克公开宣战了。

不言而喻，巴黎小资产者大批破产造成的后果势必远远超出直接受害者的范围而持续发生作用，因而势必再次破坏资产阶级的交易，同时因六月起义造成的耗费加大了国家的赤字，而国家财政收入则因生产停滞、消费紧缩和输入减少而持续下降。卡芬雅克和国民议会别无他法，只好靠发行新公债寻找出路，而新公债又使他们更加受到金融贵族的束缚。

小资产者得到的六月胜利果实是破产和依法清账，而卡芬雅克的鹰犬即**别动队**[71]得到的酬劳则是娼妇们温情的拥抱，社会的这些"年轻的救主们"在马拉斯特——同时扮演正直的共和国东道主和行吟诗人角色的三色旗骑士——的沙龙里备受欢迎。但是，别动队这样受到社会优待，领取过高的薪俸，却使**军队**感到恼怒；同时，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通过自己的报纸《国民报》用以争取一部分军队和农民阶级的一切民族幻想，却已经消失了。卡芬雅克和国民议会在**北意大利**充当调停者，以便伙同英国把它出卖给奥地利，仅仅这么一天的政绩就把《国民报》派18年来扮演反对派所得的成果化为乌有。再也没有哪一个政府比《国民报》派政府更缺乏民族气质了；再也没有哪一个政府像它这样依赖英国，而《国民报》派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原是每天都靠搬用卡托的"迦太基必须被消

灭”①这句话过日子的；再也没有哪一个政府像它这样屈从于神圣同盟[60]，而《国民报》派原是要求基佐那样一个人撕毁维也纳条约[82]的。历史的讽刺竟使《国民报》的前外事编辑巴斯蒂德当上了法国外交部长，让他以自己的每一件公文来驳斥自己的每一篇论文。

军队和农民阶级曾一度相信，有了军事专政，同时就会把对外战争和“荣誉”提到法国的日程上来。可是，卡芬雅克不是对资产阶级社会实行军刀专政，而是靠军刀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现在需要的士兵只是宪兵。卡芬雅克在恪守古希腊罗马共和主义的忍让精神的严肃面具下隐藏着这样一个真相：他鄙俗地服从于为了资产阶级的官位而必须接受的屈辱条件。L'argent n'a pas de maître！金钱无主人！卡芬雅克也像制宪议会那样把第三等级的这句老格言理想化了，把它译成了如下的政治语言：资产阶级无国王，资产阶级统治的真正形式是共和国。

制宪国民议会的“伟大的根本性工作”就是造出这个**形式**，拟定共和**宪法**。正如把基督教历改名为共和历[83]，把圣巴托洛缪节改名为圣罗伯斯比尔节不会使天气有什么改变一样，这部宪法没有并且也不能使资产阶级社会有什么改变。凡是宪法超出了**改换服装**的范围的地方，它就把**已经存在的**事实记录下来。于是，它隆重地登记了共和国的事实，普选权的事实，由单一全权国民议会代替两个权力有限的立宪议院的事实。于是，它把固定不变的、无责任的、世袭的王权改成了可变更的、有责任的、由选举产生的王权，即改成了任期四年的总统制，从而登记了并且法定了卡芬雅克专政的事实。同样，它把国民议会在受过5月15日[79]和6月25日[5]的惊吓后为保证自身安全而预

①卡托通常在元老院中结束演讲时所惯用的一句话。——编者注

先赋予议长的非常权力，提高成了根本法。宪法里其余的东西都是在术语上做文章。从旧君主国的机器上撕掉保皇主义的标签而贴上了共和主义的标签。原任《国民报》总编辑、现任宪法总编辑的马拉斯特，不无才华地完成了这项学院式的任务。

制宪议会好像那个智利官吏，当地下的轰鸣已经预告火山即将喷发而必定会把他脚下的土地冲走的时候，他还准备通过土地丈量来更精确地划定地产的边界。当制宪议会在理论上雕琢资产阶级统治的共和主义形式的时候，它在实际上却是专靠否定一切常规、使用赤裸裸的暴力、宣布**戒严**来维持的。它在开始制定宪法的前两天，宣布延长戒严期。从前，通常是在社会变革的过程达到一个停顿点，新形成的阶级关系已经固定，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各派彼此已经求得一种妥协，使它们相互间可以继续进行斗争而同时把疲惫的人民群众排除于斗争之外的时候，才制定和通过宪法。与此相反，这次的宪法却不是批准了什么社会革命，而是批准了旧社会对于革命的暂时胜利。

在六月事变以前制定的最初宪法草案中，还提到了“*droit au travail*”，即劳动权这个初次概括无产阶级各种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现在劳动权换成了*droit à l'assistance*，即享受社会救济权，而哪一个现代国家不是这样或那样地养活着自己的穷人呢?劳动权在资产阶级的意义上是一种胡说，是一种可怜的善良愿望，其实劳动权就是支配资本的权力，支配资本的权力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配，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劳动权**”是以六月起义为后盾的。制宪议会既然已在事实上把革命无产阶级置于hors la loi——法律之外，也就势必要在原则上把**它的**公式从宪法——法律的准绳——中删去，把“劳动权”斥为异

端。但制宪议会并不到此为止。正如柏拉图把诗人逐出了自己的共和国一样，制宪议会把**累进税**永远逐出了自己的共和国。其实累进税不仅是在现存生产关系范围内或多或少可行的一种资产阶级的措施，并且是唯一能使资产阶级社会各中间阶层依附"正直的"共和国，减少国家债务并抵制资产阶级中反共和主义多数派的手段。

在友好协议问题上，三色旗共和派[64]实际上是为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而牺牲了小资产阶级。他们用立法方式禁止征收累进税，就把这件个别事实提高成为一个原则。他们把资产阶级改良跟无产阶级革命同等看待。那么，还有哪个阶级留下来做他们共和国的支柱呢?大资产阶级。而大资产阶级中的多数是反对共和的。如果说他们利用了《国民报》的共和派来重新巩固经济生活中的旧关系，那么，在另一方面，他们则打算利用重新巩固起来的旧社会关系来恢复那些与它相适应的政治形式。早在10月初，卡芬雅克就已经不得不任命路易-菲力浦时期的大臣杜弗尔和维维安做共和国的部长，而不顾他自己党内愚蠢的清教徒们拼命叫喊表示反对。

三色旗宪法拒绝对小资产阶级作任何妥协，也没有能吸引任何新的社会成分来归附新的国家形式，却又匆忙恢复了最顽强、最狂热地拥护旧国家的那个集团历来享受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它把临时政府企图否定的**法官终身制**提高成为根本法。于是，它所罢黜的**一个**国王，就在这种裁定合法性的终身任职的宗教裁判官身上大量地复活了。

法国报刊多方面揭示了马拉斯特先生的宪法中所包含的矛盾，如一国二主——国民议会和总统——同时并存等等，等等。

但是，这部宪法的主要矛盾在于：它通过普选权赋予政治权力的那些阶级，即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者，正是它要永远保持

其社会奴役地位的阶级。而它认可其旧有社会权力的那个阶级，即资产阶级，却被它剥夺了这种权力的政治保证。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被宪法硬塞进民主主义的框子里，而这个框子时时刻刻都在帮助敌对阶级取得胜利，并危及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本身。宪法要求一方不要从政治的解放前进到社会的解放，要求另一方不要从社会的复辟后退到政治的复辟。

资产阶级共和派不大理会这些矛盾。既然他们已经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人物——他们只有在充当旧社会反对革命无产阶级的急先锋时才是必不可少的人物，他们在胜利后几个星期就从一个**政党**降为一个**派别**了。宪法在他们眼中是一个大**阴谋**。他们认为宪法首先应该确定他们那个派别的统治，总统应该由卡芬雅克继续充任，立法议会应该是制宪议会的延续。他们希望能把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力降低为一种有名无实的权力，同时又能充分玩弄这种权力，借以威胁资产阶级中的多数，让他们时时面对六月事变时期的那种两难选择：或者是**《国民报》派的天下**，或者是**无政府状态的天下**。

9月4日开始的制宪工作在10月23日结束了。9月2日制宪议会就已经决定，在颁布补充宪法的基本法律以前不宣布解散。然而它却决定在12月10日，即在它自己的活动终结以前很久，就要使它特有的产儿即总统出世。它确信宪法造就的人物一定不愧为其母亲的儿子。为了慎重起见，当时决定如果候选人中没有一人获得200万选票，则总统就不再由国民选举，而由制宪议会选举。

真是枉费心机！宪法实施的第一天就是制宪议会统治的最后一天。在投票箱的底层放着的原来是制宪议会的死刑判决书。它寻找"母亲的儿子"，但找到的是"伯父的侄子"。扫罗-卡芬雅克获得100万选票，而大卫-拿破仑却获得了600万选票，是扫罗-卡芬雅克的

六倍。[84]

1848年12月10日是**农民起义**的日子。只是从这一天起，才开始了法国农民的二月。这种表示他们投入革命运动的象征既笨拙又狡猾、既奸诈又天真、既愚蠢又精明，是经过权衡的迷信，是打动人心的滑稽剧，是荒诞绝顶的时代错乱，是世界历史的嘲弄，是文明人的头脑难以理解的象形文字——这一象征显然带有代表着文明内部的野蛮的那个阶级的印记。共和国通过**收税人**向这个阶级表明自己的存在，而这个阶级则通过**皇帝**向共和国表明自己的存在。拿破仑是最充分地代表了1789年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农民阶级把他的名字写在共和国的门面上，就是对外宣布战争，对内宣布谋取自己的阶级利益。拿破仑在农民眼中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纲领。他们举着旗帜，奏着乐曲走向投票站，高呼："Plus d'impôts, à bas les riches, à bas la république, vive l'Empereur!"——"取消捐税，打倒富人，打倒共和国，皇帝万岁！"隐藏在皇帝背后的是农民战争。由他们投票推翻的共和国是**富人共和国**。

12月10日的事变是农民推翻现政府的政变。自从他们取消法国的一个政府而给了它另一个政府的那一天起，他们就目不转睛地盯着巴黎。他们在一瞬间扮演了革命剧中的活跃的主角，别人就再也无法强迫他们重新回到合唱队的无所作为的、唯命是从的角色中去了。

其余各阶级帮助完成了农民的选举胜利。对**无产阶级**来说，选举拿破仑就意味着撤换卡芬雅克和推翻制宪议会，意味着取消资产阶级共和主义，意味着宣布六月胜利无效。对**小资产阶级**来说，拿破仑意味着债务人对债权人的统治。对于**大资产阶级**中的多数来说，选举拿破仑意味着跟他们曾不得不暂时利用来对付革命的那个集团公开决裂，一旦这个集团想把暂时性的地位作为宪法认可的地位固定

下来，他们就感到不能容忍了。拿破仑代替卡芬雅克，这对大资产阶级中的多数来说是君主国代替共和国，是王朝复辟的开端，是向奥尔良派羞答答地示意，是隐藏在紫罗兰当中的百合花[85]。最后，**军队**投票选举拿破仑，就是投票反对别动队，反对和平牧歌而拥护战争。

这样，正如《新莱茵报》所说的，法国一个最平庸的人获得了最多方面的意义[86]。正因为他无足轻重，所以他能表明一切，只是不表明他自己。虽然拿破仑的名字在各个不同阶级的口中可以有不同的意义，但是各个阶级都在自己的选票上把以下口号同这个名字写在一起："打倒《国民报》派，打倒卡芬雅克，打倒制宪议会，打倒资产阶级共和国！"杜弗尔部长曾在制宪议会中公开声明了这一点："12月10日乃是第二个2月24日。"

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致投票**拥护**拿破仑，是为了**反对**卡芬雅克，并且用集中选票的办法剥夺制宪议会的最后决定权。可是，这两个阶级的最先进部分却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拿破仑是联合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一切派别的**集合名词**，**赖德律-洛兰**和**拉斯拜尔**则是**专有名词**，前者是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的专有名词，后者是革命无产阶级的专有名词。无产者及其社会主义代言人大声宣称投拉斯拜尔的票，完全是一种示威；这既是表示反对任何总统制，即反对宪法本身的一种抗议，同时又是对赖德律-洛兰投的反对票；这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政党脱离了民主派的第一次行动。相反，后一派，即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表——山岳党在提名赖德律-洛兰为候选人时倒是一本正经的，这是它在愚弄自己时的一种庄严的习惯。而且，这也是它想作为与无产阶级对峙的独立派别出现的最后一次尝试。不仅共和派资产阶级的派别，而且还有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及其山岳党，都在12月10日被击败了。

法国现在除了有一个**山岳党**[81]之外，还有一个**拿破仑**——这就证明两者都不过是他们名义上所代表的那些伟大现实的毫无生气的讽刺画罢了。正如使用1793年词句摆出蛊惑家姿态的山岳党，是对于旧山岳党的一种拙劣的模仿一样，戴着皇冠打着鹰旗的路易-拿破仑，也是对于老拿破仑的一种拙劣的模仿。于是，历来对1793年的迷信和历来对拿破仑的迷信同时都告结束。革命只有在它取得了自己**专有的**、**独特的**名称时，才显出了自己本来的面目，而这一点只有在现代的革命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作为主角出现在革命前台时，才成为可能。可以说，12月10日之所以使山岳党觉得出乎意料和感到惊惶失措，至少是因为在这一天，农民以不体面的逗趣兴高采烈地打破了对旧革命的经典式模拟。

12月20日，卡芬雅克卸职，制宪议会宣布路易-拿破仑为共和国总统。12月19日，即在自己专制统治的最后一日，制宪议会否决了关于大赦六月起义者的提案。它如果撤销自己不经法庭审讯而判处15 000个起义者流放的6月27日的法令，岂不就是否定六月屠杀本身吗？

路易-菲力浦的最后一个大臣奥迪隆·巴罗，成了路易-拿破仑的第一任总理。正如路易-拿破仑认为自己的统治不是始于12月10日，而是始于1804年的元老院法令一样，他给自己找到的内阁总理，也认为自己的内阁不是始于12月20日，而是始于2月24日的敕令。作为路易-菲力浦的合法继承人，路易-拿破仑保留旧内阁以缓和政府的更迭，况且这个旧内阁因为还来不及出世，所以也就没来得及被用坏。

他的这个选择是资产阶级保皇集团的领袖们提示给他的。这位昔日王朝反对派[65]的首领曾无意识地充当过转向《国民报》派共和党

人[64]的过渡阶梯，现在他完全有意识地来充当从资产阶级共和国转向君主国的过渡阶梯，当然是再合适不过了。

奥迪隆·巴罗是那个总是徒然争夺内阁位置而还没有精疲力尽的唯一的旧反对党的领袖。革命迅速地把所有的旧反对党相继推上国家高峰，使它们不只在行动上，而且在言论上都不得不放弃、否认自己旧日的言论，并且最终成为一堆令人作呕的大杂烩，被人民全部丢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巴罗，这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化身，18年来一贯以外表的持重来掩盖自己内心的卑劣和空虚，简直是极尽变节之能事。虽然他自己有时也因现今的荆棘与过去的月桂之间过分尖锐的对照而感到惊恐，但他只要往镜中一瞥，就又重新恢复了他那种阁员的镇定和人的自负。在他面前的镜子里照出的是基佐，就是那个一向令他羡慕并经常把他当做小学生看待的基佐；镜子里的形象简直就是基佐本人，然而这个基佐长着奥迪隆的前额，即奥林波斯山上的神的前额。他只是没有发觉迈达斯的耳朵。

2月24日的巴罗，只是通过12月20日的巴罗才显露出来。正统主义者兼耶稣会会士的法卢又作为文化部部长跟他这个奥尔良党人兼伏尔泰主义者[87]沆瀣一气了。

几天之后，内务部就交给了马尔萨斯主义者莱昂·福适。法、宗教、政治经济学！在巴罗的内阁里，这一切都齐全了，此外它还把正统主义者与奥尔良党人结合在一起。所缺少的只是一个波拿巴主义者。波拿巴还隐藏着自己想要充当拿破仑的意图，因为**苏路克**还没有扮演杜山-路维杜尔。

《国民报》派立刻被革除了它所占据的一切高级官职。警察总局、邮政总局、总检察署、巴黎市政厅——这一切都落到了旧日君主制走卒的手中。正统派尚加尔涅一人兼掌了塞纳省国民自卫军、别动队以

及正规军第一师的指挥大权；奥尔良党人毕若被任命为阿尔卑斯军团司令。这种官员的任免，在巴罗内阁时期总是连续不断地发生。巴罗内阁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恢复旧日保皇派的行政机构。顷刻间，官方的舞台——布景、服装、台词、演员、配角、哑角、提词员、各种角色的位置、戏剧题材、冲突内容和整个格局——全都变样了。只有老掉牙的制宪议会，仍然留在原地没有动。但是自从国民议会任命波拿巴，波拿巴任命巴罗，巴罗任命尚加尔涅之后，法国就从共和国建立时期进入共和国建成时期了。而在一个已经建成的共和国里，制宪议会又有什么用呢？大地已经创造出来，它的造物主除了逃到天上去，就没有其他事情可做了。制宪议会决心不去效法造物主，国民议会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最后一个避难所。它即使已经被夺去了行政权的一切杠杆，它手中不是还握有立宪大权吗？它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无论如何都要保住自己的主权岗位，并从这里出发去夺回失去的阵地。只要《国民报》派内阁取代了巴罗内阁，保皇派的人物就得立即退出一切官厅，而三色旗的人物就可以得胜回朝了。国民议会决定推翻内阁，而内阁自己就给制宪议会提供了一个它怎么也想不出来的再合适不过的攻击机会。

我们记得，在农民的眼中，路易·波拿巴意味着取消捐税！可是，他在总统宝座上刚坐了六天，到第七天，即12月27日，他的内阁就提议**继续保留**临时政府已下令取消的**盐税**。盐税和葡萄酒税一起享有充当法国旧财政制度替罪羊的特权，在农民的眼中更是如此。对于农民所选中的这个人，巴罗内阁再不能教他一句比"**恢复盐税！**"更为尖刻辛辣的话来嘲弄他的选民了。随着盐税的恢复，波拿巴就失去了自己身上的那点革命的盐，变得淡而无味了——农民起义所拥戴的拿破仑就像一个模糊的幻影一样消散，剩下的只是一个体现着保皇派

资产阶级阴谋的非常陌生的人物。而巴罗内阁把这种不明智的令人失望的蛮横步骤作为总统施政的第一步，却是不无用意的。

制宪议会方面迫不及待地抓住了这个一箭双雕的机会——既能够推翻内阁，又能够扮成农民利益的保护者去攻击农民所选中的那个人。它否决了财政部长的提案，把盐税减少为原来数额的三分之一，从而使56 000万的国家赤字又增加了6 000万。它在通过了这个**不信任案**之后，就静待内阁辞职。它对自己周围的新世界以及它自己已经改变的地位，实在是太不理解了。内阁背后有总统，而总统背后又有600万选民，每一个选民都往票箱中投进了对制宪议会的不信任票。制宪议会把国民的不信任票又退还给国民。真是一种可笑的交换！制宪议会竟忘记了它的不信任票已经失去强制性的行价。它否决盐税只是加强了波拿巴及其内阁要把它“**干掉**”的决心。那个贯串着制宪议会整个后半期的长期决斗从此开始了。**一月二十九日事件**、三月二十一日事件、五月八日事件是这个危机时期中的重大事件，同时也正是**六月十三日事件**的先兆。

法国人——例如路易·勃朗——把一月二十九日事件看成是宪法中所包含的矛盾的表现：矛盾一方是享有主权、不许解散、通过实行普选权而产生的国民议会；另一方是总统。按照条文，总统应当对国民议会负责，而实际上，总统不仅同样是通过实行普选权而获得批准，并把分配在国民议会各个议员身上从而百倍分散的全部选票集中于一身，而且，总统还掌握着全部行政权，而国民议会则只是作为一种道义力量悬浮在行政权之上。对于一月二十九日事件的这种解释，是把议会讲坛上、报刊上、俱乐部里的斗争的语言同斗争的真实内容混同了。路易·波拿巴和制宪国民议会的对立并不是宪制权力中一方同另一方的对立，不是行政权同立法权的对立，而是已经建立起

来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本身同建立共和国的那些工具的对立,同资产阶级中革命集团的野心勃勃的阴谋和意识形态上的要求的对立,这个集团建立了共和国,而现在却惊奇地发现自己所建立的共和国像一个复辟的君主国,于是就想把立宪时期及其条件、幻想、语言和人物强行保持下去,不让已经成熟了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以其完备的和典型的形态出现。正如制宪国民议会代表着回归到它中间的卡芬雅克一样,波拿巴代表着尚未脱离他的立法国民议会,即代表着已经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民议会。

波拿巴的当选,只有当选举给**一个**名字加上它的各种不同的意义的时候,只有当这种选举在新国民议会选举中重演的时候,才能得到解释。12月10日废除了旧国民议会的代表权。这样,在1月29日,发生冲突的就不是**同一个**共和国里的总统和国民议会,而是尚在建立中的共和国的国民议会和已经建成的共和国的总统,即体现着共和国生命过程中两个全然不同时期的两个权力。一方是不大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集团,唯有它才能宣布成立共和国,才能用巷战和恐怖统治从革命无产阶级手里夺去共和国,并在宪法中定出这个共和国的各种理想特征;另一方则是资产阶级中的全部保皇派大众,唯有他们才能在这个已经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实行统治,才能剥去宪法的那套意识形态的服饰,并利用自己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来实现为奴役无产阶级所必需的各种条件。

1月29日发生的风暴,是在整个1月份当中蓄积起来的。制宪议会想通过对巴罗内阁投不信任票来迫使它辞职。但巴罗内阁作为回敬,却建议制宪议会对自己投下最终的不信任票,判处自己自杀,宣布自己**自动解散**。一个极无声望的议员拉托,在内阁指使下于1月6日把这个提案交给制宪议会,交给这个早在8月间就已经决定在它

颁布一系列补充宪法的基本法律以前决不自行解散的制宪议会。内阁中的富尔德率直地向制宪议会说，**“为恢复遭到破坏的信用”**，制宪议会必须解散。的确，制宪议会延长临时状态，而且使波拿巴跟着巴罗、已经建成的共和国跟着波拿巴都重新受到威胁，岂不就是破坏信用吗？巴罗这位奥林波斯山上的神变成了疯狂的罗兰，因为共和派让他等了整整一个“Dezennium”即十个月之久才终于弄到手的内阁总理位置眼看又要被夺去，而他连两个星期的福也没有享到。于是巴罗就比暴君还要残暴地对待这个可怜的议会。他所说的最温和的话是：“它是根本没有前途的。”而议会这时确实也只代表着过去。巴罗又以讽刺的口吻补充说：“它没有能力在共和国周围确立那些为巩固共和国所必需的机构。”确实如此！议会对无产阶级的极度敌视同它的资产阶级毅力同时受挫，它对保皇派的敌视态度同它的共和主义狂热一起复活。所以，它就加倍地不能以适当的机构来巩固它再也无法理解的那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了。

在指使拉托提出建议的同时，内阁在全国各地掀起了**请愿的风暴**；每天从法国各地往制宪议会头上飞来一束一束情书，其中都或多或少坚决地请求它**解散**自己和立下遗嘱。制宪议会则掀起了反请愿运动，让人们要求它继续存在下去。波拿巴与卡芬雅克之间的竞选斗争，就以主张或反对国民议会解散的请愿斗争形式复活了。请愿是对十二月十日事件的事后注释。这种鼓动在整个1月份一直持续不断。

制宪议会在同总统的冲突中，不能再说自己是普遍选举的产物，因为别人正是用普选权来反对它。它不能依靠任何合法权力，因为问题就在于反对法定权力。它不能如它早在1月6日和26日尝试过的那样用不信任票来推翻内阁，因为内阁并不需要它来表示信任。它所剩下的**唯一**出路就是**起义**。构成起义战斗力量的是**国民自卫军共**

和派部分、**别动队**[71]以及革命无产阶级的各个中心——**俱乐部**。别动队，这些六月事变的英雄们，在12月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有组织的战斗力量，正如六月事件以前**国家工场**[73]是革命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战斗力量一样。正如制宪议会执行委员会在必须彻底取消无产阶级那些已使它不堪忍受的权利时，就残暴地攻击国家工场一样，波拿巴的内阁在必须彻底取消资产阶级共和派那些已使它不堪忍受的权利时，就向别动队猛攻。它下令**解散别动队**。其中有一半被遣散并被抛到街头，另一半则从民主制的组织被改成君主制的组织，而薪饷则减低到正规军的普通薪饷水平。别动队陷入了六月起义者的境地，于是报纸上每天都刊载别动队的**公开悔过声明**，承认自己在6月间犯的罪过，并恳求无产阶级宽恕。

而**俱乐部**又怎样呢？自从制宪议会通过对巴罗的不信任而表示对总统的不信任，通过对总统的不信任而表示对已经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不信任，通过对这个共和国的不信任而表示对一般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不信任时起，在议会的周围就必然地聚集起二月共和国中的所有制宪分子，所有想要推翻现存共和国并用强制性手段使它回复到原来状态、想要把它改造为维护自己阶级利益和原则的共和国的各派。已经发生的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革命运动的结晶又重新融解了；这些派别为之斗争的共和国又成了性质模糊的二月共和国，而对于二月共和国的性质，他们本来就各持己见。转瞬之间，各派又采取了它们在二月时期的旧立场，不过没有抱着二月时期的幻想。《国民报》的三色旗共和派又来依靠《改革报》的民主主义共和派，推出他们来做议会斗争前台上的急先锋。民主主义共和派又来依靠社会主义共和派（1月27日发表的公开宣言已宣告了他们的和解和联合），并在俱乐部里奠定发动起义的基础。内阁的报刊有理由把《国民

报》的三色旗共和派看做复活的六月起义者。他们为要保持自己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中的领导地位，就设法使资产阶级共和国本身成为问题。在1月26日，福适部长提出了关于结社权的法案，其中第一条就是“**取缔俱乐部**”。他提议把这个法案当做紧急事项立即进行讨论。制宪议会否决了这项紧急提案，而1月27日赖德律-洛兰就提出了一项由230个议员署名的关于内阁违反宪法应交付审判的提案。把内阁交付审判这样的行动，不是冒失地暴露出审判官即议会多数的软弱无能，就是意味着控告人对这个多数本身的软弱无力的抗议；在这种时候竟要求把内阁交付审判——这就是后辈山岳党此后在危机的每个紧要关头打出的那张大点数革命王牌。可怜的山岳党已被自己名称的重负压碎了！

布朗基、巴尔贝斯、拉斯拜尔等人曾于5月15日率领巴黎无产阶级冲入制宪议会的会场，企图把它解散。巴罗也针对这个议会，准备在道义上把五月十五日事件[79]重演一遍，想强迫它自行解散，并封闭它的会场。就是这个议会曾经委托巴罗对五月事件的被告进行审讯；而现在，当巴罗已开始扮演保皇派的布朗基角色反对制宪议会，而制宪议会已开始在俱乐部里，从革命无产者方面，从布朗基派方面寻找同盟者来反对巴罗的时候，残酷无情的巴罗就提议把五月囚犯从陪审法庭提出来交给《国民报》派所发明的特别最高法庭，以此来刁难制宪议会。令人惊奇的是，怕失去内阁总理位置的焦虑竟从巴罗的脑袋中挤出了堪与博马舍的机智媲美的机智！国民议会经过长期的踌躇后接受了他的提议。国民议会在对待五月杀人犯的问题上，又回复到它的正常性质了。

如果说制宪议会在对付总统和部长们时不得不诉诸**起义**，那么总统和内阁在对付制宪议会时就不得不诉诸政变，因为他们没有任

何法律手段去解散制宪议会。但是，制宪议会是宪法之母，而宪法又是总统之母。总统举行政变就会取消宪法，因而也就会取消自己的共和制的合法名义。于是他只好拿出帝制的合法名义，而帝制的合法名义又要唤起奥尔良王室的合法名义，但这两种名义同正统的合法名义比起来是相形见绌的。合法共和国的颠覆，只能使与它势不两立的一方即正统君主国重新抬头，因为这时奥尔良派只是2月的失败者，而波拿巴只是12月10日的胜利者，双方所能用以对抗共和派的篡夺行为的，只是自己同样用篡夺手段得来的君主国的名义。正统派知道时机对他们有利，就公然进行阴谋活动。他们有可能指望尚加尔涅将军来做他们的**蒙克**。正如在无产者俱乐部里曾公开宣告**红色共和国**的到来一样，在他们的俱乐部里也公开宣告了**白色君主国**的到来。

只要把一次起义顺利镇压下去，内阁就可以摆脱一切困难。"合法性害死我们！"——奥迪隆·巴罗这样叫喊道。如果发生一次起义，人们就可以借口维护公共安全来解散制宪议会，就可以为了宪法本身来破坏宪法。奥迪隆·巴罗在国民议会的粗暴态度，建议解散俱乐部，大张旗鼓地撤销50个三色旗地方行政长官职务而代之以保皇派，解散别动队，尚加尔涅虐待别动队长官，恢复在基佐政府时代就已混不下去的勒米尼耶教授的讲席，容忍正统派的狂妄行为——这一切都是为了要挑动起义。但是起义毫无动静。起义等候的是来自制宪议会的信号，而不是来自内阁的信号。

终于到了1月29日，这一天要对马蒂厄（德拉德罗姆）关于无条件否决拉托提案的提案进行表决。正统派[40]、奥尔良派[77]、波拿巴派、别动队、山岳党[81]、各个俱乐部——大家都在这一天进行密谋活动，既起劲地反对自己假想的敌人，又起劲地反对自己假想的同盟者。波

拿巴骑着马在协和广场检阅部分军队，尚加尔涅装模作样地举行排场很大的战略演习，制宪议会发现自己的会场已被军队包围了。这个交织着各种希望、疑惧、期待、愤慨、紧张和阴谋的中心——猛如雄狮的制宪议会，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时代精神的关头一刻也没有犹豫。它好像是一个不仅害怕动用自己的武器，而且觉得应该保全敌人的武器的战士。它以视死如归的气概签署了宣告自己死刑的判决书，否决了关于无条件否决拉托提案的提案。既然它自己已处于戒严之下，它就以巴黎戒严作为必要界限来限制自己的立宪活动。次日它就决定对内阁在1月29日加于它的恐怖进行调查，它也只配采取这种报复办法。山岳党暴露出自己缺乏革命毅力和政治理解力，居然让《国民报》派利用它来充当这出阴谋大喜剧中参与争吵的叫喊者。《国民报》派最后一次尝试在已经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保持它曾在共和国产生时期拥有的那种垄断政权的地位。它遭到了失败。

一月危机关系到制宪议会的存亡，而三月二十一日危机则关系到宪法的存亡；前一件事涉及《国民报》派的人员，后一件事涉及这一派的理想。不言而喻，正直的共和党人宁愿放弃他们超凡脱俗的意识形态，也不肯放弃在尘世间执掌政府权力的乐趣。

3月21日，在国民议会的日程上所列的是福适提出的反对结社权的法案：**查封俱乐部**。宪法第八条保障一切法国人有结社权。因此，取缔俱乐部就是公然破坏宪法，而且制宪议会还得亲手批准对自己的这个圣物的亵渎。然而，俱乐部是革命无产阶级的集合地点，是它的密谋活动场所。国民议会自己就曾禁止工人们联合起来反对他们的资产者。而俱乐部不就是要让整个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去反对整个资产阶级，不就是要建立一个工人的国家去对抗资产者的国家吗？俱乐部不就是十足的无产阶级制宪议会和十足的起义军备战部队吗？

宪法首先要确立的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因此,宪法所说的结社权显然只是指容许那些能与资产阶级统治,即与资产阶级制度相协调的社团存在。如果说宪法为了理论上的冠冕堂皇而表述得有点笼统,那么政府和国民议会的存在难道不正是为了在各个具体场合对宪法进行解释和运用吗?既然在共和国初创时期,俱乐部实际上已经因为戒严而被取缔,那么在已经整顿好的、已经建成的共和国里,难道就不能用法律来取缔吗?三色旗共和派只能用宪法中的堂皇辞令来反对这样生硬地解释宪法。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如帕涅尔、杜克莱尔等等,投票拥护内阁,从而使它获得了多数。另一部分人,则以天使长卡芬雅克和教会之父马拉斯特为首,在关于取缔俱乐部的条文通过之后,就与赖德律-洛兰和山岳党一同退到一个专用的办公大厅里去"开会"。国民议会瘫痪了,它已经不再具有为通过决议所必需的票数。这时克雷米约先生在办公大厅里及时提醒,说这里有一条路直通街头,并且现在已不是1848年2月,而是1849年3月了。《国民报》派恍然大悟,回到了国民议会的会场,再度受骗的山岳党也尾随其后。山岳党一直苦于革命的渴望得不到满足,同样,它也一直在寻求合乎宪法的途径;所以它总是觉得站在资产阶级共和派后面比站在革命无产阶级前面更为自在。这出喜剧就这样收场了。制宪议会自己通过决定,认为违背宪法条文就是唯一恰当地实现宪法条文的精神。

只有一点还需要调整一下,这就是已经建成的共和国对欧洲革命的态度,即它的**对外政策**。1849年5月8日,在行将寿终正寝的制宪议会里气氛异常激奋。日程上所列的问题是法军进攻罗马,法军被罗马人击退,法军在政治上受辱和在军事上丢丑,法兰西共和国暗杀罗马共和国[88],第二个波拿巴首次出征意大利。山岳党再一次打出了自己的大点数王牌,赖德律-洛兰免不了在议长桌上放上一份

控告内阁——而且这一次还控告波拿巴——违反宪法的控诉书。

5月8日动议的理由，后来又在6月13日动议中重述了一遍。我们来看看这次出征罗马是怎么一回事吧。

卡芬雅克早在1848年11月中就派遣舰队到奇维塔韦基亚去保护教皇，把他接到船上并送到法国。教皇的任务是为正直的共和国祝福，并保证卡芬雅克当选为总统。卡芬雅克想利用教皇来拉拢神父，利用神父来拉拢农民，再利用农民来谋取总统职位。卡芬雅克的远征按其直接目的来说是为选举做广告，同时也是对罗马革命进行抗议和威胁。这次远征包含着法国为保护教皇而进行干涉的苗头。

这次为保护教皇和反对罗马共和国而联合奥地利和那不勒斯进行的干涉，是12月23日在波拿巴内阁第一次会议上决定的。法卢在内阁，这就意味着教皇在罗马，并且是在教皇的罗马。波拿巴不再需要教皇来帮助他成为农民的总统，但他需要稳住教皇，以便稳住总统的农民。农民的轻信使他当上了总统。如果他们不再有信仰，就会不再轻信，而他们一旦失去教皇，也就不再有信仰。那些借波拿巴的名字来实现统治的联合起来的奥尔良派和正统派会怎么样呢！要恢复国王，必须先恢复使国王神圣化的权力。问题不仅在于他们的保皇思想，如果没有受教皇世俗权力支配的旧罗马，就没有教皇；没有教皇，就没有天主教；没有天主教，就没有法国宗教；而没有宗教，旧的法国社会又会成为什么样子呢？农民享有的对天国财富的抵押权，保证了资产者享有的对农民土地的抵押权。因此，罗马革命，也如六月革命一样，是对于所有权，对于资产阶级制度的可怕的侵犯。在法国重新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统治，要求在罗马恢复教皇统治。最后，打击罗马革命者，就是打击法国革命者的同盟军；已建成的法兰西共和国内各反革命阶级间的联盟，自然要以法兰西共和国与神圣同盟结

成的联盟，即与那不勒斯和奥地利结成的联盟来作补充。内阁会议12月23日的决定，对制宪议会来说并不是什么秘密。1月8日赖德律-洛兰已经就此事向内阁提出了质询，内阁予以否认，国民议会就转而进行下一项议程。国民议会是否相信了内阁的话呢？我们知道，在整个1月里，它始终忙于对内阁投不信任票。不过，如果说扯谎已是内阁的本分，那么假装相信这种谎言，并以此挽回共和国的体面，就是国民议会的本分。

这时，皮埃蒙特被攻破，查理-阿尔伯特退位，奥地利军队直叩法国的大门，赖德律-洛兰以激烈的语气提出质询。但是内阁证明，它在北意大利只是继续了卡芬雅克的政策，而卡芬雅克只是继续了临时政府即赖德律-洛兰的政策。这一次，它甚至获得国民议会的信任票，并且被授权在北意大利暂时占领一个适当的地点，以作为与奥地利进行关于撒丁领土不可分割问题和罗马问题的和平谈判的后盾。大家知道，意大利的命运是由北意大利战场上的会战来决定的。所以，不是罗马随着伦巴第和皮埃蒙特一并陷落，就是法国必须向奥地利，从而也向欧洲反革命势力宣战。难道国民议会忽然把巴罗内阁当做旧日的救国委员会[89]了吗？或是把自己当做国民公会[49]了吗？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法国军队为什么要在北意大利占领一个地点呢？原来在这层透明的面纱下藏着的是对罗马的远征。

4月14日，14 000名士兵由乌迪诺率领乘船前往奇维塔韦基亚；4月16日，国民议会同意给内阁拨款120万法郎，作为进行干涉的舰队驻留地中海三个月的经费。这样，国民议会就给了内阁干涉罗马的一切手段，同时却装做是让内阁去干涉奥地利。它对内阁不是观其行，而只是听其言。这么深的信仰，就是在以色列也没有遇见过。制宪议会已经落到了无权过问已经建成的共和国所作所为的境地了。

终于，在5月8日，喜剧的最后一幕上演了。制宪议会要求内阁立即采取措施，使意大利远征回到它原定的目标。波拿巴当晚就在《通报》上刊载了一封信，对乌迪诺大加赞扬。5月11日，国民议会否决了弹劾这个波拿巴及其内阁的控诉书。而山岳党没有去揭穿这个骗局，却把议会的喜剧弄成了一个悲剧，以便自己在这里扮演富基埃-坦维尔的角色，但这岂不是在借来的国民公会的狮子皮底下露出了天生的小资产阶级的牛犊皮吗！

制宪议会的后半期可以概括如下：1月29日，它承认资产阶级各保皇集团是它所建成的共和国中的当然首脑；3月21日，它承认违背宪法就是实现宪法；5月11日，它又承认堂皇宣布的法兰西共和国与正在奋斗的欧洲各族人民结成的消极联盟意味着法兰西共和国与欧洲反革命势力结成的积极联盟。

这个可怜的议会在自己诞生一周年纪念日即5月4日的前两天否决了大赦六月起义者的提议而给自己一点补偿，此后它便退出了舞台。制宪议会既已丧失了自己的权力，既已为人民所切齿痛恨，既已引起曾利用它做工具的资产阶级的反感而被粗暴地、轻蔑地扔在一边，既已被迫在自己的后半生否定自己的前半生，既已失去了自己共和主义的幻想，过去没有建树而将来又毫无希望，只是在活活地一点一点地死去，那么，它就只能通过经常重提六月的胜利、重温六月的胜利，通过再三判处已被判处的人们以证实自己的存在，来镀饰自己的尸体。这些专靠六月起义者的鲜血为生的吸血鬼！

它遗下了以前的国家赤字，并且因镇压六月起义的费用、盐税的取消、为废除黑奴制而给予种植场主的补偿金、远征罗马的费用以及葡萄酒税的取消而使赤字增大了；制宪议会在临终时才决定取消葡萄酒税，它活像一个幸灾乐祸的老人，庆幸给自己欣喜的继承者加

上一笔令人身败名裂的信誉债。

3月初开始了**立法国民议会**的选举鼓动。有两大集团相对垒：一是**秩序党**[90]，一是**民主社会主义党或红党**；站立在这两大集团中间的是**宪法之友**——《国民报》派的三色旗共和派[64]企图在这个名称下弄成一个党。**秩序党**是在六月事变后立即成立的，但是直到12月10日以后，当它可以摆脱《国民报》派即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时候，它存在的秘密才暴露了：它是**奥尔良派与正统派联合组成的一个党**。资产阶级分裂成为两大集团，一是**大地产**，一是**金融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这两大集团曾先后独占政权，前者在**复辟王朝**时期独占过政权，后者在**七月王朝**[58]时期独占过政权。**波旁**是一个集团的利益占优势的王室姓氏；**奥尔良**则是另一个集团的利益占优势的王室姓氏；只有在**没有姓氏的共和制王国**中，这两大集团才能在同等掌握政权的条件下维护共同的阶级利益，而又不停止相互间的竞争。既然资产阶级共和国不外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完备的纯粹的统治形式，那么，它除了是以正统派为补充的奥尔良派的统治和以奥尔良派为补充的正统派的统治，即**复辟时期与七月王朝的综合**，还能是什么呢？《国民报》派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并不代表本阶级中拥有经济基础的庞大集团。他们的作用与历史任务只在于：在君主制时期，他们与两个只知道各自的**特殊**政治制度的资产阶级集团相反，提出了资产阶级的共同政治制度，即**没有姓氏的共和制王国**，把它理想化，并饰以古代的阿拉伯式花纹，但首先是把它当做自己小集团的统治来欢迎。《国民报》派看见在自己所创立的共和国的顶峰站着联合的保皇派时感到莫名其妙，而联合的保皇派对于自己共同统治的事实也同样感到迷惑不解。他们不了解，如果他们的每一个集团分开来看是保皇主义的，那么他们的化合物就必然是**共和主义的**；他们不了解，白色王朝与蓝色王朝在三

色旗的共和国里必然互相中和。秩序党的两个集团既与革命无产阶级以及那些日益向作为中心的革命无产阶级靠拢的过渡阶级相对抗，就不得不发动自己的联合力量并保全这个联合力量的组织；每个集团都只得为反对另一集团的复辟独霸意图而提出共同的统治，即提出资产阶级统治的**共和形式**。于是我们就看到，这些保皇派起初还相信能立刻实行复辟，尔后又在怒气冲冲、切齿咒骂中保存了共和形式，最后则承认他们只有在共和国中才能和睦相处，并把复辟无限期地延搁了。共同享有统治本身使这两个集团的每个集团都加强起来，使每个集团都越发不能和不愿服从另一集团，即越发不能和不愿复辟君主制。

秩序党在自己的选举纲领中直截了当地宣布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即保全这个阶级统治的存在条件：**财产**、**家庭**、**宗教**、**秩序**！当然它是把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以及这个阶级统治的条件描绘为文明的统治，描绘为物质生产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交往关系的必要条件。秩序党拥有巨额资金，它在法国各地都成立支部，以薪金豢养旧社会的一切意识形态家，控制着现政权的势力，在众多的小资产者和农民中拥有不领薪的奴仆大军，这些小资产者和农民对革命运动还很疏远，把地位显赫的大财主看做是他们的小财产和小偏见的天然代表。秩序党在全国有不可胜数的小国王为其代表，能够把拒绝选举其候选人当做造反来惩罚，能够解雇造反的工人、不顺从的雇农、仆役、听差、铁路职员、文书、一切日常生活中从属于它的工作人员。最后，秩序党在某些地方竟能维持这样一种错觉，即共和主义的制宪议会阻碍了12月10日的当选者波拿巴施展他那神奇的力量。我们在谈秩序党时没有提到波拿巴分子。他们并不是资产阶级中的一个真正的集团，而只是迷信的老年伤残者和无信仰的青年冒险家的混合体。秩序党在

选举中获得了胜利，向立法议会输送了绝大多数的议员。

在联合的反革命资产阶级面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中一切已经革命化的成分，自然必定要与享有盛誉的革命利益代表者，即与革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我们看到，议会里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代言人，即山岳党，如何由于议会中的失败而去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代言人接近，而议会外的真正的小资产阶级又如何由于友好协议被否决，由于资产阶级利益被蛮横坚持以及由于破产而去与真正的无产者接近。1月27日，山岳党与社会主义者庆祝了他们的和解；而在1849年的二月大宴会上他们又再次采取了这种联合行动。社会党与民主党，工人的党与小资产者的党，就结合成**社会民主党**，即结合成**红党**。

法兰西共和国由于紧跟着六月事变而来的痛苦挣扎一度陷于瘫痪，从戒严状态解除时起，即从10月14日起，又接连不断地经历了一连串寒热症似的动荡。最初是争夺总统位置的斗争；接着是总统与制宪议会的斗争；因俱乐部而引起的斗争；布尔日的案件[91]，这一案件使无产阶级的真正革命家与总统、联合的保皇派、正直的共和派、民主主义的山岳党人以及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空论家等渺小人物比起来，就像是一些只是被大洪水遗留在社会表层的，或者只能引领社会大洪水的史前世界的巨人；选举鼓动；处决那些打死布雷亚的人[5]；接连不断地对报刊提出控告；政府派警察对宴会运动[63]进行暴力干涉；保皇派的放肆挑衅；路易·勃朗与科西迪耶尔的肖像被挂在耻辱柱上；已经建成的共和国与制宪议会之间的不断斗争，这种斗争随时都迫使革命回到自己最初的出发点，随时都使战胜者变为被战胜者，被战胜者变为战胜者，并且顷刻间就改变各党派和各阶级的地位、它们的决裂和结合；欧洲反革命的迅速前进；匈牙利人的光荣斗争；德

国各地的起义；远征罗马；法军在罗马城下的可耻失败[88]——在这运动的旋涡中，在这历史动荡的痛苦中，在这革命的热情、希望和失望的戏剧性的起落中，法国社会各阶级从前以半世纪为单位来计算自己的发展时期，现在却不能不以星期为单位来计算了。很大一部分农民和外省已经革命化了。他们已经对拿破仑感到失望，况且，红党答应向他们提供的已经不再是名称，而是内容；不再是免除租税的幻想，而是收回已付给正统派的10亿法郎、调整抵押贷款和消灭高利贷的行动。

军队本身也感染了革命的寒热症。军队投波拿巴的票，原是为了取得胜利，而波拿巴却给军队带来了失败。军队投他的票，原是投票拥护可望成为伟大革命统帅的小军士，而他给军队带来的却仍然是那些只具有普通军士水平的大将军。毫无疑问，红党，即联合的民主派，即使得不到胜利，也一定会获得巨大的成就，因为巴黎、军队和大多数的外省都会投票拥护它。**赖德律-洛兰**这个山岳党的领袖在五个省当选了；秩序党的领袖没有一个得到这样的胜利，真正无产者的党派中的候选人也没有谁得到这样的胜利。这次选举结果给我们揭示了民主社会主义党的秘密。如果说，一方面，山岳党这个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在议会中的先锋，不得不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空论家联合——无产阶级在6月遭受了沉重的物质失败，不得不通过精神上的胜利重新振作起来，又由于其余各阶级的发展使它无力实行革命专政，它就势必投入幻想无产阶级解放的空论家的怀抱，即投入那些社会主义流派的创始人的怀抱——那么，另一方面，革命的农民、军队和外省都站到了山岳党方面。于是，山岳党就成了革命营垒的指挥官，而它与社会主义者的谅解就消除了革命派内部的任何对立。在制宪议会存在的后半期，山岳党体现了制宪议会的共和主义的激情，而

使人忘记了它在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会和六月事变时期的罪孽。随着《国民报》派由于自己的不彻底的本性而听任保皇派内阁的压制，在《国民报》派全权在握的时期被摒于一边的山岳党也就抬起头来，并且起到了议会中的革命代表者的作用。的确，《国民报》派能拿出来与其他保皇派相对立的，除了沽名钓誉的人物和唯心主义的空谈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相反，山岳党则代表着摇摆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群众，这些群众的物质利益要求民主制度。于是与卡芬雅克之流和马拉斯特之流相比，赖德律-洛兰和山岳党站在革命真理的一边，由于意识到自己所处的这种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革命热情的表现越是局限于在议会中进行攻击——提交控诉书、进行威吓、高声喊叫、发表雷鸣似的演说和提出不外是些空话的极端措施，他们也就越是勇敢。农民所处的地位与小资产者大致相同，他们的社会要求也大致一样。所以，社会的一切中间阶层既然被卷入革命运动，就必定要把赖德律-洛兰视为他们的英雄。赖德律-洛兰是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的主要人物。在与秩序党相抗衡的情况下，这种秩序的半保守、半革命和全然空想的改良家必然首先被推上领导地位。

《国民报》派、“坚决的宪法之友”、纯粹的共和派在选举中一败涂地。他们只有极少数被选进立法议会；他们的最著名的领袖，连马拉斯特这位总编辑，这位正直的共和国的奥菲士也包括在内，都退出了舞台。

5月28日立法议会开幕，6月11日重演了5月8日的冲突。赖德律-洛兰代表山岳党提出了弹劾总统和内阁违反宪法、炮轰罗马的控诉书。6月12日，立法议会否决了这个控诉书，正如制宪议会在5月11日否决了它一样，但是这次无产阶级迫使山岳党走上了街头——然而不是去进行巷战，而只是上街游行。只要指出这次运动是以山岳党为

首的，就足以知道这次运动要被镇压下去，而1849年6月只不过是1848年6月的一幅可笑而又可鄙的漫画。6月13日的伟大退却，只是因为被秩序党急忙封为大人物的尚加尔涅提出了更伟大的战斗报告，才显得逊色了。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

12月20日，存在的只是已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一半，即**总统**。5月28 日，补上了另一半，即**立法议会**。建立中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在1848年6月通过对无产阶级的空前搏斗载入历史的出生登记簿的；而已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则是在1849年6月通过它与小资产阶级合演的难以名状的滑稽剧载入这个出生登记簿的。1849年6月是对1848年6月实行报复的涅墨西斯。1849年6月，并不是工人被打败，而是站在工人与革命之间的小资产者遭到了失败。1849年6月，并不是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流血悲剧，而是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包藏大量牢狱之灾的可悲的正剧。秩序党获胜了，它已经全权在握，现在一定要露出真相了。

三　1849年六月十三日事件的后果

12月20日，**立宪共和国**的雅努斯脑袋只显示出它的**一副**面孔，即带有路易·波拿巴的模糊的浅淡线条的行政权面孔。1849年5月28日，它显示出另一副面孔，即布满了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时期的闹宴所留下的累累伤痕的**立法权**面孔。有了立法国民议会，**立宪共和国**的外表即共和制的国家形式也就完成了，在这个国家形式中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即确立了构成法国资产阶级的两大保皇派集团——联合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共同统治，**秩序党**的统治。于是，法兰西共和国就成了保皇派同盟的财产，同时欧洲反革命的大国同盟又向三月革命[53]的最后避难所举行了全面的十字军征讨[35]。俄国人侵匈牙利[92]，普鲁士军队进攻维护帝国宪法[93]的军队，乌迪诺炮轰罗马[88]。欧洲危机显然已经接近决定性的转折点，全欧洲的目光都集中在巴黎，而全巴黎的目光则都集中在**立法议会**。

6月11日，赖德律-洛兰登上立法议会的讲坛。他没有发表演说，他只提出了弹劾内阁部长们的控诉书，赤裸裸的、毫无掩饰的、切实的、扼要的、无情的控诉书。

侵犯罗马就是侵犯宪法，侵犯罗马共和国就是侵犯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第V条说："法兰西共和国永远不使用自己的武装力量侵犯任何民族的自由"，而总统却使用法国军队去侵犯罗马的自由。宪法

第54条禁止行政权未经国民议会①同意而宣布任何战争。制宪议会5月8日通过决议，坚决命令内阁尽速使罗马远征军回到原定目标上来，可见它也同样坚决地禁止他们对罗马作战，而乌迪诺却在炮轰罗马。这样，赖德律-洛兰就请出宪法本身来做他控诉波拿巴及其部长们的证人。他这位宪法保护人向国民议会的保皇派多数发出了威胁性声明："共和派会采取一切手段迫使人们尊重宪法，甚至会诉诸武力！"山岳党[87]以强烈百倍的回声重复说："**诉诸武力！**"多数派则报以可怕的喧嚷；国民议会议长要赖德律-洛兰遵守秩序；赖德律-洛兰重复自己挑战性的声明，最后在议长桌上放了一份要求将波拿巴及其部长们交付审判的提案。国民议会则以361票对203票的多数决议从炮轰罗马问题转入一般议程。

难道赖德律-洛兰以为能够利用宪法来击败国民议会，利用国民议会来击败总统吗？

诚然，宪法是根本禁止侵犯其他民族自由的，但是，据内阁说，法军在罗马侵犯的不是"自由"，而是"无政府势力的专横"。难道山岳党虽然在制宪议会中有那么多经验，却依然不懂得宪法的解释权不属于宪法制定人，而只属于宪法接受者吗？依然不懂得宪法条文应该就其切实可行的意义去解释，而资产阶级的意义就是宪法的唯一切实可行的意义吗？依然不懂得波拿巴和国民议会保皇派多数是宪法的真正解释者，正如神父是圣经的真正解释者，而法官是法律的真正解释者一样吗？当制宪议会在世时，奥迪隆·巴罗一个人就曾违背过它的意志，难道刚由普选产生的国民议会还会认为自己受已故的制宪

①从本页到本文结束，国民议会是指1849年5月28日—1851年12月的立法国民议会（立法议会）。——编者注

议会的遗言约束吗?赖德律-洛兰在援引制宪议会5月8日决议时,难道忘记了正是这个制宪议会在5月11日否决了他第一次要把波拿巴及其部长们交付审判的提案,忘记了这个制宪议会业已宣告总统及其部长们无罪,从而承认侵犯罗马是"合乎宪法的",忘记了他只是对一个业已宣布的判决提出上诉,并且最终是由共和主义的制宪议会去向保皇主义的立法议会上诉吗?宪法专门列了一个条文,号召每一个公民来保护它,因而它本身就是求助于起义的。赖德律-洛兰依据的正是这一条文。但同时,难道国家的各个权力机构不是为保护宪法而建立的吗?难道违背宪法的行为不是只有当国家的一个宪制权力机构起来反对另一个宪制权力机构的时候才出现的吗?而当时共和国的总统、共和国的部长们和共和国的国民议会却是协调一致的。

山岳党在6月11日企图发动的是"**纯理性范围内的起义**",即纯**议会内的起义**。山岳党想让被人民群众武装起义的前景吓坏了的国民议会多数派借毁灭波拿巴及其部长们来毁灭他们自己的权力和他们自己当选的意义。制宪议会曾经那么顽强地要求罢免巴罗—法卢内阁,不也是企图用类似手段宣告波拿巴的当选无效吗?

难道在国民公会[49]时代没有出现过议会内的起义突然使多数派与少数派的对比关系发生根本转变的实例吗?为什么老辈山岳党能够做成的事情,青年山岳党就不能做成呢?况且当前的局势看来也不是不利于采取这种行动。民情的激愤,在巴黎已经达到使人惶惶不安的程度;按选举时的投票来看,军队并不拥护政府;立法议会的多数派本身刚刚形成不久,来不及牢固地组织起来,而且都是些老年人。如果山岳党把议会内的起义搞成功了,国家的大权就会直接落入它的手中。至于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它一向热衷的莫过于看到议会的亡灵们在它头上的云端里发生争斗。最后,民主派小资产阶级以及它的

代表者山岳党，都想借议会内的起义达到自己的伟大目的：粉碎资产阶级的势力，而又不让无产阶级有行动自由，或只是让它在远景中出现；利用无产阶级，但是不让它构成危险。

在6月11日国民议会投票之后，山岳党的若干成员和秘密工人团体的代表们举行了一次会谈。后者极力主张当天晚上就起事。山岳党坚决拒绝了这个计划。它无论如何不肯丢掉领导权；它对盟友也像对敌人一样疑虑重重，而这是有道理的。1848年6月的记忆，从未这样强烈地使巴黎无产阶级的队伍激动过。然而无产阶级还是被它自己同山岳党的联盟束缚住了。山岳党代表着大部分的省，它夸大了自己在军队中的影响，它掌握了国民自卫军内的民主主义部分，并得到小商店的道义上的支持。在这个时候，违反山岳党意志发动起义，对于无产阶级说来——况且无产阶级又因霍乱而人员锐减，因失业而不得不大批地离开巴黎——就是在没有1848年6月的那种逼迫无产阶级进行拼死斗争的情势下徒然重演1848年的六月事件。无产阶级的代表们采取了唯一合理的办法。他们迫使山岳党**丢丑**，即迫使它在它的控诉书被否决时越出议会斗争的范围。在6月13日这一整天内，无产阶级一直保持着这种怀疑、观望的态度，等待民主主义的国民自卫军与军队之间展开一场真刀真枪的、你死我活的搏斗，以便在那时投入斗争，推动革命超出强加于它的那些小资产阶级的目的。如果获得胜利，无产阶级的公社已经成立好了，要让它与正式的政府并行地活动。巴黎的工人已经接受了1848年6月的血的教训。

6月12日，部长拉克罗斯自己向立法议会提出了立即讨论控诉书的动议。政府在当晚采取了准备防御和进攻的一切措施；国民议会的多数派决心要把反叛的少数派逼上街头，少数派本身也已经无法退却，非应战不可了；控诉书以377票对8票被否决了；拒绝投票的山

岳党，气愤地跑到“爱好和平的民主派”的宣传厅，跑到《和平民主日报》的编辑部里去了。[94]

山岳党一退出议会会场，就失去了力量，正如大地的儿子安泰一离开大地，就失去了力量一样。山岳党人在立法议会会场内是参孙，而在“爱好和平的民主派”的厅堂里却成了非利士人①。一场冗长、嘈杂而空洞的争论就这样开始了。山岳党决心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迫使人们尊重宪法，“**只是不诉诸武力**”。山岳党的这个决心，得到了“宪法之友”的一个宣言[95]和一个代表团的赞助。“宪法之友”是《国民报》派即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残余的自称。它在议会中保留下来的代表有六人投票**反对**否决控诉书，但其余的人全都投票**赞成**否决控诉书；**卡芬雅克**已经把他的军刀交给秩序党随意使用，但是另一方面，这一派在议会外的更大部分，却如饥似渴地抓住这个机会以摆脱其政治贱民的地位，并挤入民主政党的行列。他们不正是这个藏在他们的盾牌、藏在他们的**原则**、藏在**宪法**后面的民主政党的当然持盾者吗？

直到天明，山岳党一直在忍受分娩的痛苦。它生下了一个《**告人民书**》，于6月13日早晨在两家社会主义报纸的不显眼的地方刊登出来。[96]这个宣言宣布总统、部长们、立法议会多数派“**不受宪法保护**”(hors la constitution)，并号召国民自卫军和军队，最后还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宪法万岁！**”就是它的口号——无异于“**打倒革命！**”的口号。

与山岳党的宪制宣言相呼应的，是6月13日小资产者举行的一次所谓**和平示威游行**。这是从水塔街出发沿着林荫大道行进的列队游行；3万人中大部分是不带武器的国民自卫军，其中夹杂着秘密工

①参看《旧约全书·士师记》第15章。——编者注

人团体的成员，他们沿途高呼：“**宪法万岁！**”游行者在喊这个口号时是机械的、冷漠的、违心的，这些呼喊声没有汇成雷鸣般的巨响，反而受到群集于人行道上的民众的嘲讽。在这个多声部的合唱中缺少的是发自内心的声音。当游行队伍走到“宪法之友”开会的楼房前面时，在那楼房的山墙上出现了一个雇用的宪法使者，他拼命挥动他那顶受雇捧场者的帽子，使足了劲叫喊“**宪法万岁！**”，喊声像冰雹似地撒落在朝拜者的头上。这时，游行者自己似乎刹那间也感觉到了这个场面滑稽可笑。众所周知，游行队伍在和平路口转入林荫大道时遇到了尚加尔涅的龙骑兵和猎步兵的完全不是议会式的接待；游行者顷刻间就四散奔逃，只是在奔跑中喊了几声“拿起武器！”，以执行6月11日议会中发出的拿起武器的号召。

和平游行队伍被强力驱散，隐约传闻赤手空拳的公民在林荫大道上被杀害，街道上越来越乱，当这一切似乎预告起义即将来临的时候，集合在阿扎尔街上的山岳党人大部分就逃散了。**赖德律-洛兰**带领着一小群议员挽回了山岳党的名誉。他们在集结于国民宫的巴黎炮兵队的保护下，跑到工艺博物馆去，等候国民自卫军第五军团和第六军团来援救。但是山岳党人没有等到第五军团和第六军团；这些谨慎的国民自卫军把自己的代表丢开不管，巴黎炮兵队本身还阻挠人民构筑街垒，极端的混乱使得任何决定都不可能作出，正规部队端着上好刺刀的枪向前逼进，一部分议员被逮捕了，另一部分逃跑了。六月十三日事件就此结束。

如果说1848年的6月23日是革命无产阶级起义的日子，那么1849年的6月13日就是民主派小资产者起义的日子；这两次起义中的每一次都是发动起义的那个阶级的**典型纯粹的**表现。

只有在里昂，事变才发展成顽强的流血冲突。在这里，工业资产

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不可调和地对立着，工人运动不像在巴黎那样被约束在一般运动范围内并受一般运动的支配，因此，六月十三日事件在这里的反映就丧失了它原来的性质。在对六月十三日事件有过反响的其他外省地方，这个事件并没有燃成烈火，只不过划过**一道冷清清的闪电**。

6月13日结束了**立宪共和国生命的第一个时期**，立宪共和国是在1849年5月28日随着立法议会的开幕而开始其正常存在的。这整个序幕充满着秩序党与山岳党之间、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喧嚣的斗争；小资产阶级徒然反抗确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为了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它自己曾在临时政府和执行委员会中不断进行阴谋活动，在六月事变中拼命攻击无产阶级。6月13日这一天摧毁了它的反抗，而把联合保皇派的**立法独裁**弄成了既成事实。从这时起，国民议会就只是**秩序党的救国委员会**[89]了。

巴黎把总统、部长们和国民议会多数派放在“**被告地位**”，而他们则宣布巴黎“**戒严**”。山岳党宣布立法议会多数派“**不受宪法保护**”；而多数派则以违背宪法的罪名把山岳党交付特别最高法庭审判，并使这个党内仍有生命力的一切都不受法律保护。山岳党被砍杀得只剩下了一个无头无心的躯干。少数派只是企图举行**议会内的起义**，多数派则把自己的**议会专制**提升为法律。多数派发布了新的议会**规章**，借以取消讲坛上的言论自由，并授权国民议会议长用谴责、罚款、停发薪金、暂停与会资格和监禁等手段，来惩罚议员违反规章的行为。这个多数派在山岳党的躯干上方悬挂的不是利剑，而是鞭子。留下来的山岳党议员，为了保全名誉，本应集体退出议会。这样的行动会加速秩序党的解体。当不再有对抗的迹象促使秩序党团结一致的时候，秩序党就必定会分裂成它原来的构成部分了。

在民主派小资产者被夺去**议会**力量的时候，它的**武装**力量也被夺去了；巴黎炮兵队以及国民自卫军第八、第九和第十二军团都被解散了。相反，金融贵族的军团在6月13日袭击了布莱和鲁镇的印刷厂，毁坏了印刷机，捣毁了共和派报刊编辑部，擅自逮捕了它们的编辑、排字工人、印刷工人、收发员和投递员，却得到了来自国民议会讲坛的嘉奖。在整个法国，凡是有共和主义嫌疑的国民自卫军，都相继被解散了。

颁布新的**新闻出版法**[97]、新的**结社法**、新的**戒严法**；巴黎各监狱关满囚犯，政治流亡者被驱逐出境，一切超出《国民报》限度的报刊都被查封；里昂及其邻近五个省被迫服从军人的粗暴专横的统治；检察机关无处不在；已经受过多次清洗的大批公职人员再次受到清洗——这都是获得胜利的反动派必不可少和经常重复的**惯用手法**，其所以在六月大屠杀和六月放逐后还值得一提，只是因为这次它们不单是用来对付巴黎，而且也用来对付外省，不单是用来对付无产阶级，而且首先是用来对付中等阶级。

国民议会在6月、7月和8月间的全部立法活动，都是在忙于制定各种镇压的法律，这些法律把宣布戒严的权力交给了政府，对报刊的控制更严，取消了结社权。

可是，这一时期的特点不是在**事实上**利用胜利，而是在**原则上**利用胜利；不是国民议会通过各种决议，而是为这些决议寻找理由；不是行动，而是词句；甚至不是词句，而是使词句显得生动的腔调和手势。放肆无耻地表露**保皇主义信念**，以盛气凌人的狂妄态度对共和国进行侮辱，卖弄而轻浮地道出复辟的目的，一句话，大言不惭地破坏**共和主义的体面**，这就使这一时期具有特殊的音调和色彩。“宪法万岁！”是6月13日的**失败者**的战斗口号。因此，**胜利者**也就不必虚情

假意地去讲什么宪制的即共和主义的言辞了。反革命战胜了匈牙利、意大利和德国，所以他们认为复辟的日子在法国很快就要到来。秩序党各派头头们之间发生了真正的竞争，竞相在《通报》上表白自己的保皇立场，坦白、忏悔他们在君主制时期无意间犯下的自由主义罪行，恳求上帝与人们宽恕。每天都有人在国民议会讲坛上宣布二月革命是社会的灾难，每天都有外省的正统派地主庄严地宣称自己从未承认过共和国，每天都有一个背弃和出卖了七月王朝的懦夫追述自己的英雄勋业，说只是因为路易-菲力浦的仁慈或其他的误会才妨碍了这种英雄勋业的实现。似乎在二月事变中令人惊叹的，竟不是获得胜利的人民的宽宏大量，反而是保皇派表现出的自我牺牲与温和态度，让人民取得了胜利。有一位人民代表提议把二月事变负伤人员抚恤金发一部分给**市近卫军**，因为他们是二月事变时唯一有功于祖国的。另一位代表提议在卡鲁塞尔广场建立奥尔良公爵骑像。梯也尔称宪法是一片脏纸。在讲坛上有奥尔良党人相继发言，痛悔自己曾阴谋反对正统王朝；同时又有正统主义者相继发言，责备自己，说他们对非正统王朝的反抗加速了整个王朝的倾覆；梯也尔痛悔他曾阴谋反对摩莱，摩莱痛悔他曾阴谋反对基佐，巴罗则痛悔他曾阴谋反对他们三个人。"社会民主共和国万岁！"这一口号被宣布为违反宪法的口号；"共和国万岁！"这一口号则被视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口号而受到追究。在滑铁卢会战的周年纪念日，有一个议员宣称："我对于普鲁士人侵入法国，不像对于革命流亡者进入法国那样害怕。"为了回答人们对里昂及其邻近各省实行的恐怖政治的怨言，巴拉盖·狄利埃说道："我宁愿要白色恐怖而不愿要红色恐怖。"(J'aime mieux la terreur blanche que la terreur rouge.)每当国民议会的发言者说出反对共和国、反对革命、反对宪法、拥护君主国、拥护神圣同盟的警句时，全场

都报以狂热的掌声。每当共和派的惯常做法——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做法，例如用“公民”称呼议员——被违反时，那些维护秩序的骑士们都会欢欣鼓舞。

7月8日在戒严影响下以及在无产阶级大部分人拒绝投票的情况下举行的巴黎补充选举，法国军队占领罗马，红衣主教们进入罗马[98]，以及随之而来的宗教裁判所和僧侣恐怖——这一切都给6月的胜利添上新的胜利，使秩序党更加陶醉了。

最后，8月中旬，保皇派宣布国民议会休会两个月，一方面是为了要出席那些刚刚召集的各省议会，另一方面是由于一连数月的帮派闹宴弄得他们精疲力竭。他们以明显的嘲弄态度，留下了一个由25个议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国民议会的代理人，作为**共和国的守卫者**，其中包括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精英，如摩莱与尚加尔涅。这种嘲弄比他们所料想的还要意味深长。他们先是历史注定要去帮助推翻他们心爱的君主国，后来又历史注定要去维护他们所憎恶的共和国。

随着立法议会的**休会**，**立宪共和国生命的第二个时期**，即其**保皇主义猖狂时期也就结束了**。

巴黎的戒严解除了，报刊恢复了。在社会民主主义报纸停刊期间，在实行镇压措施与保皇主义嚣张期间，**立宪君主派小资产者**的老的代言者《世纪报》**共和主义化了**；**资产阶级改革派**的老的喉舌《新闻报》**民主主义化了**，而**共和派资产者**的老的典型机关报《国民报》则**社会主义化了**。

公开的俱乐部变得难以存在，**秘密团体**也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强了。被视为纯商业团体而容许存在并且在经济上无所作为的产业**工人协会**，在政治上对无产阶级起了纽带的作用。6月13日把各种半革命党派的正式首脑除掉了，而留下的群众却有了他们自己的头脑。

那些维护秩序的骑士们以预言红色共和国的恐怖来吓唬人，但是获得胜利的反革命在匈牙利、巴登和罗马的卑鄙的兽行和无以复加的残暴手段，已经把“**红色共和国**”洗成了白色。法国社会的心怀不满的中间阶级，开始觉得与其接受实际上完全无望的红色君主国的恐怖，还不如接受未必会带来恐怖的红色共和国的诺言。在法国，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比**海瑙**进行了更多的革命宣传。按工效定能力！

这时，路易·波拿巴利用国民议会休会到外省去作隆重的巡游，最热忱的正统派跑到埃姆斯去参拜圣路易的孙子[99]，而大批亲近秩序党的议员则在刚召开的各省议会中进行阴谋活动。必须使各省议会说出国民议会多数派还不敢说的话，即提出**立刻修改宪法的紧急动议**。依据宪法，只有在1852年专门为修改宪法而召集的国民议会上才能修改宪法。但是，如果大多数省议会主张修改宪法的话，难道国民议会还不应当听听法国的呼声而牺牲宪法的贞操吗？国民议会对这些省议会的期望，同伏尔泰的《亨利亚德》中的修女们对潘都尔兵[100]的期望一样。但是，除了少数例外，国民议会的波提乏们在外省碰到了为数不少的约瑟①。绝大多数人都不愿理会这种令人厌烦的诱导。阻碍修改宪法的，正是本该用来实现修改宪法的工具本身：各省议会的表决。法国，并且是资产阶级的法国，已经发表了意见，发表了反对修改宪法的意见。

10月初，立法国民议会复会——但它是多么不同了啊！[tantum mutatus ab illo!]②它的面貌已经完全改变。各省议会出人意料地不同意修改宪法，这就使国民议会回到了宪法的界限内，并且向它提示

①参看《旧约全书·创世记》第39章。——编者注

②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编者注

了它生存的界限。奥尔良派因正统派前往埃姆斯参拜而发生猜疑，正统派则因奥尔良派跟伦敦来往[101]而疑虑重重，两派的报纸都已经把火煽旺了，衡量了各自的王位追求者的相互要求。奥尔良派和正统派一致怨恨波拿巴派的阴谋，这些阴谋表现于总统的隆重巡游，表现于他那或多或少露骨的、想要摆脱宪法束缚的企图，以及波拿巴派报纸的傲慢论调；路易·波拿巴则怨恨国民议会只承认正统派和奥尔良派有理由进行秘密活动，并怨恨内阁经常把他出卖给这个国民议会。最后，内阁本身在对罗马的政策问题上，以及在由**帕西**部长提议的而被保守派骂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所得税**问题上发生了分裂。

巴罗内阁向重新召开的立宪议会提出的第一批议案之一，就是要求拨款30万法郎给**奥尔良公爵夫人**作为寡妇抚恤金。国民议会同意了这个要求，又在法兰西民族负债簿上增添了700万法郎的数目。这样，路易-菲力浦就继续成功地扮演着“pauvre honteux”——羞羞答答的乞丐，而内阁却不敢向议会提议增加波拿巴的薪俸，议会看来也不愿批准，于是路易·波拿巴又像以往那样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要么做凯撒，要么进债狱！**[102]

内阁的第二个拨款要求是提供900万法郎来弥补**罗马远征费用**，这更加剧了波拿巴这一方同内阁和国民议会那一方之间的紧张关系。路易·波拿巴在《通报》上公布了他写给侍卫官埃德加·奈伊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以一些宪法上的保证约束教皇政府。教皇则发表了一个训谕，即“出乎真意”[103]，拒绝对自己的已经恢复的权力加任何限制。波拿巴的信有意透露内情，掀开了他的内阁的帷幕，使他自己能在戏院顶层楼座观众面前显现为一个心地善良的，但是在自己家里不被了解和受着束缚的天才。他以“自由心灵渴望振翼飞

腾”①的神情来讨好卖俏，已不是第一次了。委员会的报告人**梯也尔**完全忽略了波拿巴的振翼飞腾，而只限于把教皇的训谕译成法文。企图为总统挽回面子而提议国民议会对拿破仑的信表示赞同的并不是内阁，而是**维克多·雨果**。“**够了！够了！**”——多数派以这种无礼而轻率的喊声埋葬了雨果的提案。总统的政策？总统的信？总统自己？“**够了！够了！**”谁会对波拿巴先生的话信以为真呢？维克多·雨果先生，难道您以为我们相信您，认为您真正相信总统吗？“**够了！够了！**”

最后，波拿巴与国民议会之间的决裂，又因对**召回奥尔良王室和波旁王室**议案的讨论而加速了。总统的堂弟②，前威斯特伐利亚国王的儿子，乘内阁没有出席时，向议院提出了这个提案，目的不外是要把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王位追求者摆到与波拿巴派的王位追求者不相上下的地位，或者更确切地说，摆到**低于**波拿巴派王位追求者的地位，因为后者至少在事实上是站在国家政权的顶峰。

拿破仑·波拿巴居然无礼到如此地步，竟把**召回被放逐国外的王室与大赦六月起义者**合成了一个提案。多数派的愤怒迫使他立即为自己将神圣的东西与可恶的东西、王室血统与无产者败类、社会的恒星与社会的沼泽游火亵渎地混为一谈而表示歉意，并使这两个提案各自得到应有的地位。多数派断然否决了召回王室的提案，而**贝里耶**这位正统派的狄摩西尼，更是透彻地阐述了这次投票的意义。把各个王位追求者贬为普通公民——这就是所要追求的目的！有人居然想要夺去他们身上的圣光，夺去他们剩下的最后一点尊严，**流亡国外的尊严**！贝里耶喊叫道：如果有哪个王位追求者忘记了他的尊贵的出

①见格·海尔维格《一个活人的诗》。——编者注

②拿破仑·波拿巴亲王。——编者注

身，回到法国来只是为了以普通的私人身份生活的话，那人家会怎样看待他！这就再明显不过地告诉了路易·波拿巴，他靠目前的状况什么也没有赢得，而联合的保皇派需要他在法国这里作为一个**中立人物**坐在总统位子上，则是因为俗人的目光无法透过流亡的云雾认清真正的王位追求者。

11月1日，路易·波拿巴以一件咨文回敬了立法议会，咨文用颇为粗暴的言词通知说，他已撤销巴罗内阁并成立新内阁。巴罗—法卢内阁是保皇派联盟的内阁，而奥普尔内阁则是波拿巴的内阁，是总统反对立法议会的工具，是**听差内阁**。

波拿巴已经不只是1848年12月10日的**中立人物**了。他掌握行政权，从而成为一定利益的中心。反无政府状态的斗争使得秩序党本身不得不加强波拿巴的势力，而且如果说他已经不再得人心了，那么秩序党本来就不得人心。难道他不能指望，由于奥尔良派与正统派的竞争，以及某一君主复辟的必要性，将会迫使这两派承认**中立的王位追求者**吗？

从1849年11月1日开始了立宪共和国生命的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于1850年3月10日结束。宪法机构间那种受到基佐如此赞美的习见的把戏，即行政权与立法权间的争端已经开始了。但是并不止于这一点。波拿巴反对联合起来的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复辟欲望而维护自己实际政权的名义——共和国；秩序党反对波拿巴的复辟欲望而维护自己共同统治的名义——共和国；正统派反对奥尔良派，奥尔良派反对正统派而维护现状——共和国。秩序党中所有这些集团各自心里都有自己的国王，自己的复辟意图，同时又都为了反对自己对手的篡夺和谋叛的欲望而坚持资产阶级的共同统治，坚持使各种特殊的要求得以互相抵消而又互相保留的形式——**共和国**。

康德认为，共和国作为唯一合理的国家形式，是实践理性的要求，是一种永远不能实现但又是我们应该永远力求实现和牢记在心的目标。同样，这些保皇派也正是这样对待**君主国**的。

这样，立宪共和国从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手中产生出来时本来是一个空洞的意识形态的公式，而落到联合保皇派手中时就成了一个内容充实的生动的形式了。当梯也尔说“我们保皇派是立宪共和国的真正支柱”时，他没有料想到他的话里包含有这么多的真理。

联合内阁的倒台和听差内阁的登台还有另外一个意义。新内阁的财政部长是**富尔德**。让富尔德当财政部长，就等于把法国的国民财富正式交付给交易所，通过交易所并且为了交易所的利益来管理国家财产。金融贵族在《通报》上宣布了对富尔德的任命，同时也就宣布了自己的复辟。这个复辟必然成为其余各种复辟的补充，而且与它们一起构成立宪共和国链条中的各个环节。

路易-菲力浦从来不敢任命真正的交易所豺狼为财政大臣。正如他的君主国是资产阶级上层的统治的理想名称一样，在他的各届内阁中，特权的利益必定要带着表明没有利害关系的意识形态的名称。在所有的领域，资产阶级共和国都把各种君主国——正统王朝的和奥尔良的君主国——隐藏在后台的东西推到了前台。它把君主国捧到天上去的东西都降到地上来了。它用表明统治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专有名称代替了圣徒的名称。

我们的全部叙述都已经表明，共和国从它存在的头一天起就不仅没有推翻金融贵族，反而巩固了它的地位。但是，它对金融贵族的让步，是违反本意而屈从命运的。富尔德一上任，政府的主动权又回到了金融贵族手中。

有人会问，联合的资产阶级怎么能忍受和容许在路易-菲力浦

时期以排斥或支配资产阶级其余各个集团为基础的金融贵族的统治呢?

答案很简单。

首先,金融贵族本身在保皇派联合势力内部形成了一个举足轻重的集团,这个联合势力的共同的统治权力称为共和国。难道奥尔良派中的演说家和专门人才不是金融贵族昔日的同盟者和同谋者吗?难道金融贵族本身不是奥尔良派的黄金法郎吉吗?至于正统派,他们早在路易-菲力浦时期就已经实际参加了交易所、矿山和铁路投机生意的全部闹宴。一般来说,大地产与金融贵族结成联盟,是一种**正常现象**。**英国**就是一个证明,甚至**奥地利**也是证明。

在法国,国民生产水平与国家债务相比是低得不相称的,国债是投机生意的最重要的对象,而交易所是希图以非生产方法增殖的资本的主要投资市场。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整个资产阶级和半资产阶级中的数不尽的人,不能不参与国家的借贷活动、交易所投机生意和金融活动。所有参与这些活动的二流人物,不正是把那个在很大的范围内整个地代表着同一利益的集团,视为他们的天然靠山和首脑吗?

国家财产落到金融贵族手中的原因何在呢?就在于有增无已的国家负债状态。而这种国家负债状态的原因何在呢?就在于国家支出始终超过收入,在于失衡,而这种失衡既是国债制度的原因又是它的结果。

为了摆脱这种负债状态,国家必须限制自己的开支,即精简政府机构,管理尽可能少些,官吏尽可能少用,尽可能少介入市民社会方面的事务。秩序党是不可能走这条道路的,因为秩序党的统治和它那个阶级的生存条件越是受到各方面的威胁,它就越是必须加强它的镇压措施,加强它的由国家出面的官方干涉,加紧通过国家机关来

显示自己的无所不在。对人身和财产的侵犯越是日益频繁，宪兵人数就越是不能减少。

或者，国家必须设法避免借款，把**特别税**加在最富裕的阶级身上而使预算立即得到哪怕是暂时的平衡。但是秩序党[90]难道会为了使国民财富摆脱交易所剥削，而把他们自己的财富献上祖国的祭坛吗？它没有这么傻！

总之，如果没有法兰西国家的根本变革，就决不会有法兰西国家财政上的变革。而与国家财政必然联系着的是国家债务，与国家债务必然联系着的是国债投机买卖的统治，是国债债权人、银行家、货币经营者和交易所豺狼的统治。秩序党中只有一个集团同金融贵族的垮台有直接利害关系，这就是**工厂主**。我们所指的既不是中等的也不是小的工业家，而是在路易-菲力浦统治下构成王朝反对派广大基础的工业巨头。他们的利益无疑是要求减少生产费用，从而也就是要求减少列入生产费用项下的捐税，也就是减少国债，因为国债的息金已列入捐税项下，所以，他们的利益是要求金融贵族垮台。

在英国——法国最大的工厂主与他们的英国对手比起来都是小资产者——我们确实看到工厂主，例如某个科布顿或布莱特，带头对银行和交易所贵族举行十字军征讨。为什么在法国没有这种情形呢？在英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工业，而在法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农业。在英国，工业需要自由贸易，而在法国，工业则需要保护关税，除需要其他各种垄断外还需要国家垄断。法国工业并不支配法国生产，所以法国工业家并不支配法国资产阶级。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受资产阶级其他集团的侵犯，就不能像英国人那样站在运动的前头，并把自己的阶级利益提到第一位；他们必须跟随在革命后头，并为那些同他们阶级的整体利益相反的利益服务。在2月间，他们没有了解自己的地位，

但2月已使他们学乖了。还有谁比雇主，即工业资本家更直接受到工人的威胁呢？所以在法国，工厂主必然成为秩序党中最狂热的分子。诚然，**金融巨头是在削减他们的利润，但是这和无产阶级消灭利润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

在法国，小资产者做着通常应该由工业资产者去做的事情；工人完成着通常应该由小资产者完成的任务；那么工人的任务又由谁去解决呢？没有人。它在法国解决不了，它在法国只是被宣布出来。它在本国范围内的无论什么地方都不能解决；法国社会内部阶级间的战争将要变成各国间的世界战争。只有当世界战争把无产阶级推到支配世界市场的国家的领导地位上，即推到英国的领导地位上的时候，工人的任务才开始解决。革命在这里并没有终结，而是获得有组织的开端，它不是一个短暂的革命。现在这一代人，很像那些由摩西带领着通过沙漠的犹太人。他们不仅仅要夺取一个新世界，而且要退出舞台，以便让位给那些能适应新世界的人们。

我们回过来说富尔德吧。

1849年11月14日，富尔德登上国民议会的讲坛，说明他的财政制度：赞扬旧税制！保留葡萄酒税[104]！撤回帕西关于征收所得税的提案！

帕西也不是革命家，他是路易-菲力浦的一个老大臣。他是杜弗尔一类的清教徒，是七月王朝的替罪羊戴斯特①的密友。帕西也曾称

---

①恩格斯在1895年版上加了一个注："1847年7月8日，在巴黎贵族院里开始了对于帕芒蒂耶和居比耶尔将军（被控贿赂官吏以图取得盐场特权）以及当时的公共工程大臣戴斯特（被控收受前两人的贿赂）的审判案。后者在受审时企图自杀。三个人都被判处很重的罚金。戴斯特除罚金外还被判处了三年徒刑。"——编者注

赞旧税制，也曾提议保留葡萄酒税，但同时他又揭开了蒙在国家赤字上的面纱。他宣称，如果不想让国家破产，就必须征收一种新税——所得税。曾经劝告赖德律-洛兰宣布国家破产的富尔德，现在又劝告立法议会保留国家赤字。他答应节约，而这种节约的秘密后来暴露出来了：例如，开支减少了6 000万法郎，而短期债款却增加了2亿法郎，这只是数字分类和决算上的一些戏法，结果都归结于举借新债。

在富尔德任期内，由于金融贵族身旁有其他一些心怀忌妒的资产阶级集团，所以它当然就不像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那样无耻腐败。但是制度还是照旧：国家债务不断增加，财政赤字被掩饰起来。渐渐地，旧日的交易所欺诈行为就更加露骨地表现出来了。证据是：关于阿维尼翁铁路的法律；一时成为巴黎全市议论话题的国债券行市令人莫测的涨跌；最后，还有富尔德和波拿巴在3月10日选举中没有成功的投机。

在金融贵族正式复辟以后，法国人民势必很快就重新回到2月24日前的境况了。

制宪议会为了发泄对自己的继承人的仇恨，废除了1850年度的葡萄酒税。旧税既已废除，新债就无法偿付了。秩序党中的一位白痴**克雷通**还在立法议会休会以前，就提议要保留葡萄酒税。富尔德以波拿巴派内阁的名义采纳了这个提议，而在1849年12月20日，即波拿巴宣布总统就职一周年纪念日，国民议会颁令**恢复葡萄酒税**。

竭力为这次恢复葡萄酒税作辩护的不是一位金融家，而是耶稣会首领**蒙塔朗贝尔**。他的论据简单明了：赋税，这是喂养政府的母乳；政府，这是镇压的工具，是权威的机关，是军队，是警察，是官吏、法官和部长，是**教士**。攻击赋税，就是无政府主义者攻击秩序卫士，而秩序卫士是保卫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不受无产阶级野蛮

人侵犯的。赋税，这是与财产、家庭、秩序和宗教相并列的第五位天神。而葡萄酒税无疑是一种赋税，并且不是一种寻常的赋税，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浸透君主主义精神的、可敬的赋税。葡萄酒税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法国农民想象魔鬼的时候，就把他想象成税吏。自从蒙塔朗贝尔把赋税尊崇为天神的时候起，农民就变成不信神的人，变成无神论者，并投到魔鬼即**社会主义**怀抱里去了。秩序的宗教轻率地失去了农民，耶稣会会士轻率地失去了农民，波拿巴轻率地失去了农民。1849年12月20日不可挽回地断送了1848年12月20日的名声。“伯父的侄子”并不是他的家族中受葡萄酒税，即受蒙塔朗贝尔所说的预示着革命风暴的赋税之害的第一个人。真正的伟大的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曾经说过，恢复葡萄酒税是使他垮台的最大原因，因为这使法国南部的农民脱离了他。这项赋税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就已经是人民憎恨的主要对象了（见布阿吉尔贝尔和沃邦两人的著作）。第一次革命废除了它，而拿破仑在1808年又把它改头换面重新施行起来。当复辟王朝进入法国时，为它开路的不仅有哥萨克骑兵，而且有废除葡萄酒税的诺言。当然，贵族阶级是不必履行他们对必须无条件纳税的人民许下的诺言的。1830年答应了废除葡萄酒税，可是根本没有行其所言和言其所行。1848年答应废除葡萄酒税，也如它答应了其他一切一样。最后，什么都没有答应过的制宪议会，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在自己的遗嘱中规定从1850年1月1日起废除葡萄酒税。但是恰巧在1850年1月1日前10天，立法议会又重新实行了葡萄酒税。这样，法国人民一个劲地驱逐这项赋税，但是刚把它从门口赶了出去，又看见它从窗口飞了进来。

人民普遍憎恨葡萄酒税，不是没有原因的：这项赋税集中了法

国赋税制度的一切可憎之处。它的征收方式是可憎的，分摊方法是贵族式的，因为最普通的酒和最名贵的酒的税率全都一样。因此，消费者的财富越少，税额越是按几何级数增加；这是倒过来的累进税。它是对于伪造和仿造酒品的奖励，因而使劳动阶级直接受到毒害。这项赋税使人口在4 000人以上的城镇都在城门口设立税卡，使每一个城镇都变成以保护关税抵制法国酒的异邦，这样就减少了酒的消费量。大酒商，尤其是那些全靠卖酒为生的小酒商，所谓marchands de vins，即酒店老板，都是葡萄酒税的死敌。最后，葡萄酒税使消费量减少，从而使产品的销售市场缩小。它既然使城市工人无力买酒喝，也就使酿造葡萄酒的农民无力把酒卖出去。而法国酿造葡萄酒的人数大约有1 200万。因此，一般百姓对于葡萄酒税的憎恨是可以理解的，而农民对于葡萄酒税的切齿痛恨也就尤其可以理解了。况且，他们不是把恢复葡萄酒税看做一个多少带有偶然性的孤立事件。农民具有一种父子相传的特有的历史传统，他们已从这一历史经验中形成了一种信念：任何一个政府要想欺骗农民时，就答应他们废除葡萄酒税，而当它一旦骗取了农民的信任时，就把葡萄酒税保留或恢复起来。农民根据葡萄酒税来鉴别政府的气味，判断政府的倾向。12月20日恢复葡萄酒税的事实表明，**路易·波拿巴和别人是一样的**。但他过去和别人不一样，他本是**农民塑造出来的一个人物**，所以农民在有数百万人签名的反对葡萄酒税的请愿书中，把他们一年前投给“伯父的侄子”的选票收回去了。

占法国人口总数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村人口，主要是所谓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他们的第一代人，由于1789年革命而无偿地免除了封建赋役，不付任何代价地取得了土地。但是，以后各代人却以**地价**形式偿付了他们那些半农奴式的祖先当时曾以地租、什一税、徭役等等形

式偿付过的赋役。人口越增加，土地越分散，小块土地的价格也就变得越昂贵，因为这些小块土地分割得越零碎，对于它们的需求也就越大。但是农民购买小块土地的价钱越提高，**农民的负债程度**即**抵押程度**也就必然随着增大，不管这小块土地是由他直接买下的，还是作为资本由共同继承人分给他的，都是一样。加在土地上的债务，称为**土地抵押**，即土地典当。正如在中世纪大地产上积聚着**特权**一样，在现代的小块土地上积聚着**抵押权**。另一方面，在小块土地制度下，土地对于它的所有者来说纯粹是**生产工具**。但是土地的肥力随着土地被分割的程度而递减。使用机器耕作土地，分工制度，大规模的土壤改良措施，如开凿排水渠和灌溉渠等，都越来越不可能实行，而耕作土地的**非生产费用**却按照这一生产工具本身被分割的比例而递增。这一切情况，都与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是否拥有资本无关。但是土地被分割的过程越发展，小块土地连同它那极可怜的农具就越成为小农的唯一资本，向土地投资的可能就越少，小农就越感到缺乏利用农艺学成就所必需的土地、金钱和学识，土地的耕作就越退步。最后，**纯收入**按照**总消费**增长的比例而相应减少，按照农民财产阻碍农民全家从事其他生计的程度而相应减少，然而这份财产已不能保障农民的生活。

这样一来，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土地的不断被分割，**生产工具**即土地则相应地**昂贵**，**土地肥力**则相应地下降，**农业**则相应地**衰落**，**农民的债务**则相应地**增加**。而且，本来是结果的东西，反而成了原因。每一代人都给下一代人留下更多的债务，每一代新人都在更不利更困难的条件下开始生活，抵押贷款又产生新的抵押贷款，所以当农民已经不能再以他那一小块土地作抵押而借**新债**时，即不能再让土地担负新的抵押权时，他就直接落入**高利贷者**的手中，而**高利贷的利息**也就越来越大了。

这样,法国农民就以对**押地借款**支付**利息**的形式,以向**高利贷者的非抵押借款**支付利息的形式,不仅把地租,不仅把营业利润,总之,不仅把**全部纯收入**交给资本家,甚至把**自己工资的一部分**也交给资本家;这样他就下降到**爱尔兰佃农**的地步,而这全是在**私有者**的名义下发生的。

在法国,这个过程由于日益增长的**赋税负担和诉讼费用**而加速了。这种诉讼费用,一部分是法国法律对土地所有权所规定的许多手续本身直接引起的;一部分是地界相连和互相交错的小块土地的所有者之间的无数纠纷引起的;一部分是农民爱打官司引起的,这些农民对于财产的乐趣都归结于狂热地保卫想象的财产,保卫**所有权**。

根据1840年的统计资料,法国农业的总产值为5 237 178 000法郎。从这个总数中除去355 200万法郎的耕作费用,其中包括从事劳动的人的消费。余下来的净产值为1 685 178 000法郎,其中扣去55 000万法郎支付押地借款利息,1亿法郎付给法官,35 000万法郎用于赋税,10 700万法郎用以支付公证费、印花税、典当税等等。原产值剩下的只有三分之一,合计为578 178 000法郎;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还分不到25法郎的净产值。这项统计资料自然并没有把土地抵押以外的高利贷利息或律师费等估计在内。

现在当共和国在法国农民旧有的重担上又添加了新的负担时,农民的情况更是可想而知了。很明显,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不同罢了。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单个的资本家通过**抵押**和**高利贷**来剥削单个的农民;资本家阶级通过**国家赋税**来剥削农民阶级。农民的所有权是资本迄今为止用来支配农民的一种符咒;是资本用来唆使农民反对工业无产阶级的一个借口。只有资本的瓦解,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

的政府，才能结束农民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地位的低落。**立宪共和国**是农民的剥削者联合实行的专政；**社会民主主义的红色**共和国是农民的同盟者的专政。而天平的升降要取决于农民投进票箱的选票。农民自己应该决定自己的命运。——社会主义者在各种各样的小册子、论丛、历书以及传单中，都是这样说的。这些语言已经由于秩序党[90]的论战文章而使农民更容易理解；秩序党也向农民呼吁，它随意地夸大、粗暴地歪曲和篡改社会主义者的意向和思想，因而恰好打中了农民的心坎，激起了农民尝食禁果[70]的渴望。但是最容易理解的语言是农民阶级在行使选举权时所获得的经验本身，是农民阶级在革命的急剧发展进程中接连遭到的失望。**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农民逐渐发生的转变，已经表现出种种征兆了。它已表现于立法议会的选举，表现于里昂周围五个省的戒严，表现于六月十三日事变后几个月由吉伦特省选出一个山岳党人来代替无双议院①的前任议长；表现于1849年12月20日由**加尔省**选出一个红色议员来代替一个去世的正统派的议员，[105]而加尔省原是正统派的乐园，是1794年和1795年对共和党人施行最恐怖的暴行的地方，是1815年白色恐怖的中心，在这里公开杀害过自由主义者和新教徒。这个最守旧的阶级的革命化，在葡萄酒税恢复后表现得最明显了。1850年1月和2月间政府所颁布的规定和法律，差不多完全是用来对付**外省**和**农民**的，这就是农民进步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明。

奥普尔的通令，使宪兵被加封为省长、专区区长尤其是镇长的宗教裁判官，使密探活动向各地蔓延，直到穷乡僻壤；**教师法**，使身为

①恩格斯在1895年版上加了一个注："历史上一般这样称呼在1815年间紧接着拿破仑第二次退位后选出的那个极端保皇主义的和反动的众议院。"——编者注

农民阶级的专门人才、代言人、教育者和顾问的学校教师受省长任意摆布，使身为学者阶级中的无产者的学校教师从一个乡镇被赶到另一个乡镇，就像被追猎的野兽一样；**镇长法案**，在镇长们头顶上悬着一把免职的达摩克利斯剑，时时刻刻把他们这些乡村总统跟共和国总统和秩序党对立起来；**军令**，把法国17个军区改为四个帕沙辖区[106]，并把兵营和野营作为民族沙龙强加给法国人；**教育法**，秩序党靠它来宣布法国的愚昧状态和强制愚化是该党在普选权制度下生存的条件——所有这一切法律和规定究竟是什么呢？就是拼命企图为秩序党重新赢得各省和各省农民。

作为**镇压措施**来看，这是一些使秩序党自己的目标落空的拙劣办法。重大的规定，如保留葡萄酒税[104]和保留四十五生丁税[68]，轻蔑地拒绝农民关于归还10亿法郎的请愿等等——这一切立法上的雷电一下子从中心大批袭来，使农民阶级感到震惊。上述各项法律和规定使攻击手段和反抗行动具有了**普遍的**性质，使它们成为每所茅舍中议论的中心话题，使革命感染每个农村，**把革命带到全国各地并使它农民化**。

另一方面，波拿巴提出这些法案和国民议会通过这些法案，岂不是证明了立宪共和国的两个权力在镇压无政府势力方面，即在镇压奋起反对资产阶级专政的一切阶级方面，是协调一致的吗？难道**苏路克**不是在发出了自己那个粗暴咨文[107]后，立刻又通过**卡尔利埃**——这个人是对富歇的一种卑劣庸俗的模仿，正如路易·波拿巴自己是对拿破仑的一种平庸的模仿一样——随后发出的公告[108]向立法议会保证他忠实于秩序吗？

教育法给我们指明了年轻的天主教徒和年老的伏尔泰主义者[87]之间的同盟。联合起来的资产者的统治，不是亲耶稣会的复辟王朝与

卖弄自由思想的七月王朝的联合专制，又是什么呢？资产阶级各个集团为争夺最高权力而彼此攻击时散发给人民的那些武器，在人民一旦跟他们的联合专政对立的时候，他们不是必定要再从人民手里夺过去吗？任何事情，甚至连友好协议法案的被否决，也都没有比这种对**耶稣会教义**的谄媚更使巴黎小店主感到愤慨。

然而，秩序党各个集团之间的冲突，国民议会与波拿巴之间的冲突，还是照样继续着。使国民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在发动政变之后，即在组成了自己的波拿巴派内阁之后，立即就把那些刚被任命为省长的王朝老朽无能之辈召来，要他们以鼓动连选他当总统的违宪活动作为他们任职的条件；使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卡尔利埃封闭了一个正统派的俱乐部来庆祝他的就职；使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创办了他自己的报纸《拿破仑》，这家报纸向公众透露了总统的秘密欲望，而部长们却不得不在立法议会的讲坛上对此否认一番；使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不顾议会历次的不信任投票，执意保留自己的内阁；使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每天多发给军士四苏薪饷，企图以此讨好他们，同时又抄袭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中的办法，即设立“信誉贷款银行”，借以讨好无产阶级；最后，使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无耻地通过部长们提议将剩下的六月起义者放逐到阿尔及尔，以使立法议会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人心，而总统自己却以实行个别赦免的办法来逐个笼络人心。**梯也尔**说了些关于“政变”和“冒险行动”①的威胁性的话，立法议会就对波拿巴进行报复，否决他为自身利益而提出的一切法案，对于他为公共利益而提出的

①“政变”原文为“coups d'état”，“冒险行动”原文为“coups de tête”。两词发音相近。——编者注

一切法案则都以吵吵闹闹的怀疑态度予以审查，看波拿巴是不是企图通过加强行政权来扩大他个人的权力。一句话，立法议会**以轻蔑相待的阴谋进行了报复**。

使正统派方面感到烦恼的，是那班更能干的奥尔良派又夺走了几乎一切要职，是**中央集权制**的扩大，而他们是希望主要靠实行**地方分权**来获得成功的。的确，反革命在**用强力实行中央集权**，即为革命准备了一套机构。反革命甚至规定银行券强制流通，把法国的金银都**集中**于巴黎银行，因而就为革命建造了一个**现成的军用钱库**。

最后，使奥尔良派感到烦恼的，是他们那个旁系王朝的原则受到重新抬头的正统王朝原则的对抗，是他们自己经常受到他人的冷淡和鄙视，正像一个市民出身、地位低微的妻子受到自己贵族丈夫的冷淡和鄙视一样。

我们已经逐一考察过农民、小资产者、整个中间等级如何逐渐向无产阶级靠拢，如何迫于形势而同正式共和国公开敌对，如何被共和国当做敌人来对待。**反对资产阶级专政，要求改造社会，要把民主共和机构保存起来作为他们运动的工具，团结在作为决定性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周围**——这就是**所谓社会民主派即红色共和国派**的一般特征。这个**无政府派**——如它的敌人所称呼的——正和**秩序党**一样，是各种不同利益的联合。从对旧社会的无秩序加以稍微改良到把旧社会的秩序推翻，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到革命恐怖主义——这就是构成无政府派的起点和终点的两个极端间的距离。

废除保护关税！这就是社会主义，因为这样做就是要打破秩序党**工业**集团的垄断。整顿国家财政！这就是社会主义，因为这样做就是要打破秩序党**金融**集团的垄断。自由输入外国肉类与粮食！这就是社会主义，因为这样做就是要打破秩序党第三个集团即**大地产**集团

的垄断。英国资产阶级最先进的派别即自由贸易派[109]的要求在法国也成了社会主义的要求。伏尔泰主义[87]！这就是社会主义，因为它攻击秩序党第四个集团即**天主教**集团。新闻出版自由、结社权利和普及国民教育就是社会主义，全都是社会主义！因为这一切都是要打破秩序党的整个垄断！

在革命进程中，形势成熟得这样快，连各种色彩的改良之友，要求极其温和的中等阶级，都被迫团结在最极端的主张变革的党的旗帜周围，团结在**红旗**周围。

可是，虽然无政府派的各个主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因本阶级或阶级集团的经济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整个革命要求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宣布自己是**解放无产阶级的手段**，而无产阶级的解放就是自己的**目的**。某些人是在故意骗人，而另一些人则是在自我欺骗，因为这些人以为，按照他们的需要加以改造的世界对于一切人来说都是最好的世界，是一切革命要求的实现和一切革命冲突的扬弃。

在**无政府派**的声调大致相同的**一般**社会主义词句下面，隐藏着《国民报》、《新闻报》和《世纪报》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大体上一贯要求推翻金融贵族的统治而使工业和交易摆脱历来的束缚。这是工业、商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这三者的利益由于同秩序党中工业、商业和农业巨头的私人垄断不再相符而被这些巨头摒弃了。这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任何一种社会主义的变种一样，自然也吸引了一部分工人和小资产者。跟这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不同的是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即**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地道的社会主义。资本主要以**债权人**的身份来迫害这个阶级，所以这个阶级要求设立**信贷机关**；资本以**竞争**来扼杀它，所以它要求设立由国家支持的**协作社**；资本以积

聚来战胜它，所以它要求征收**累进税**、限制继承权并由国家兴办大型工程以及采取其他各种**强力抑止资本增长**的措施。既然它梦想和平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至多允许再来一次短促的二月革命，那么它自然就把未来的历史进程想象为正在或已经由社会思想家协力或单独设计的种种**体系的实现**。于是这些思想家就成为各种现有社会主义**体系**，即**空论的社会主义**的折中主义者或行家，这种社会主义只有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为自由的历史的自主运动的时候，才是无产阶级的理论表现。

这种**乌托邦**，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想使全部运动都服从于运动的一个阶段，用个别学究的头脑活动来代替共同的社会生产，而主要是幻想借助小小的花招和巨大的感伤情怀来消除阶级的革命斗争及其必要性；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实质上只是把现代社会理想化，描绘出一幅没有阴暗面的现代社会的图画，并且不顾这个社会的现实而力求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当无产阶级把这种社会主义让给小资产阶级，而各种社会主义首领之间的斗争又表明每个所谓体系都是特意强调社会变革中的某一个过渡阶段而与其他各个阶段相对抗时，**无产阶级**就日益团结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被资产阶级用**布朗基**来命名的**共产主义**周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由于本文叙述范围所限，我们不能更详细地来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正如在**秩序**党中必然是**金融贵族**占据领导地位一样，在**无政府**派中也必然是**无产阶级**占据领导地位。当结成革命联

盟的各个不同阶级在无产阶级周围聚集起来的时候，当各省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而立法议会本身越来越埋怨法国的苏路克所提的要求时，延搁已久的为填补6月13日被逐的山岳党人空缺而安排的补缺选举临近了。

备受敌人轻视而又时刻遭到假朋友欺凌的政府，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摆脱这种令人讨厌和摇摇欲坠的境况，这个办法就是**暴动**。只要巴黎发生暴动，政府就可以在巴黎和各省宣布戒严，从而操纵选举。另一方面，当政府战胜无政府势力之后，秩序之友如果不愿意让自己扮演无政府主义者的话，就不得不对政府让步。

于是政府就着手工作。1850年2月初，政府砍倒了自由之树[110]，以此向人民挑衅。结果是徒劳。如果说自由之树丧失了安身之所，那么政府自己也已弄得张皇失措，并被它自己的挑衅吓倒了。国民议会则以冷冰冰的不信任态度对待波拿巴这种妄求解脱的拙劣企图。从七月纪念柱[111]上取走不谢花花环，也没有收到更大的成效。这在一部分军队中引起了革命示威游行，并使国民议会找到借口，用或多或少隐蔽的方式对内阁投不信任票。政府报刊以废除普选权和哥萨克骑兵入侵来进行恫吓，也是徒劳。奥普尔在立法议会中向左翼分子直接挑战，要他们上街，并说政府已准备好对付他们，也没有奏效。奥普尔接到的只是议长要他遵守秩序的命令，而秩序党则在暗中幸灾乐祸，听凭一位左翼议员对波拿巴的篡夺欲望进行嘲弄。最后，政府预言**2月24日**将发生革命，也是枉然。政府的所作所为使得人民在2月24日采取冷漠的态度。

无产阶级没有受人挑动去进行**暴动**，因为他们正准备**革命**。

政府的种种挑衅行为只是加强了对现状的普遍不满，并没有能阻止完全处于工人影响下的选举委员会为巴黎提出下列三位候选

人：**德弗洛特**、**维达尔**和**卡诺**。**德弗洛特**是六月被放逐者，只因波拿巴有一次企图笼络人心才获得赦免；他是布朗基的朋友，曾经参加过5月15日的谋杀行动。**维达尔**是共产主义作家，以《论财富的分配》一书闻名；他曾在卢森堡宫委员会当过路易·勃朗的秘书。**卡诺**是一位从事过组织工作并赢得胜利的国民公会议员的儿子，《国民报》派中威信丧失得最少的成员，临时政府和执行委员会的教育部长，因为提出民主主义的人民教育法案而成了对抗耶稣会会士的教育法的活生生的象征。这三个候选人代表着三个互相结成同盟的阶级：为首的是一个六月起义者，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其次是一个空论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最后，第三个候选人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代表，这一派的民主主义公式在与秩序党的冲突中获得了社会主义的意义而早已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这就**像在2月那样，是为反对资产阶级和政府而结成的普遍联合**。但这一次**无产阶级是革命联盟的首脑**。

一切反对都是枉然，社会主义的候选人都取得了胜利。甚至军队也投票表示拥护六月起义者而反对自己的那个陆军部长**拉伊特**。秩序党吓得如同遭到五雷轰顶。各省的选举没有给它带来安慰：选举结果是山岳党获得多数票。

1850年3月10日的选举！这是1848年六月事件的翻案：那些屠杀和放逐过六月起义者的人回到了国民议会，但他们是低声下气地跟随着被放逐者并且嘴里喊着后者的原则回来的。**这是1849年六月十三日事件的翻案**：曾被国民议会赶走的山岳党回到了国民议会，但它回来时已不再是革命的指挥官，而是革命的先头司号兵了。**这是十二月十日事件的翻案**：拿破仑以他的部长拉伊特为代表落选了。法国议会史中只有过一次类似的情形：查理十世的大臣奥赛在1830年落

选。最后，1850年3月10日的选举，是使秩序党获得多数票的5月13日选举的翻案；3月10日的选举，是对5月13日的多数票的抗议。3月10日是一次革命。隐藏在选票后面的是铺路石①。

“3月10日的投票是一场战争。”秩序党的最极端分子之一赛居尔·达居索这样高声叫道。

立宪共和国随着1850年3月10日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解体的阶段**。多数派方面的各个集团又互相联合起来，并与波拿巴联合起来了；他们来拯救秩序，而波拿巴又成了他们的**中立人物**。如果他们想起自己是保皇派，那只是因为他们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可能性已感到绝望了；如果波拿巴想起他是王位追求者，那只是因为他对自己继续做总统的可能性感到绝望了。

为了回答六月起义者**德弗洛特**的当选，波拿巴在秩序党的指挥下任命曾对布朗基和巴尔贝斯、赖德律-洛兰和吉纳尔提起诉讼的**巴罗什**当内务部长。为了回答**卡诺**的当选，立法议会通过了教育法；为了回答**维达尔**的当选，当局扼杀了社会主义的报刊。秩序党企图以自己报刊的喇叭声来驱走自己的恐惧。“剑是神圣的。”它的一个刊物这样叫道。“秩序的保卫者应该对红党发起进攻。”另一个刊物这样声明。“在社会主义与社会之间进行着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斗，一场不停息的无情的战争；在这场殊死战中，双方必有一方灭亡；如果社会不消灭社会主义，那么社会主义就要消灭社会。”秩序的第三只雄鸡这样叫道。筑起秩序的街垒、宗教的街垒、家庭的街垒来吧！一定要把巴黎的127 000个选民收拾掉！给社会主义者带来一个巴托洛缪之

①暗指武装起义，因当时巴黎起义者经常利用铺路石来构筑街垒。——编者注

夜[112]!而秩序党在刹那间确实相信它准能获得胜利。

它的各个报刊攻击得最猛烈的是**“巴黎的小店主”**。巴黎的小店主居然把巴黎的六月起义者选举为自己的代表!这就是说,1848年6月不会重演了;这就是说,1849年6月13日不会重演了;这就是说,资本的道义影响已经被摧毁了;这就是说,资产阶级议会只代表资产阶级了;这就是说,大所有制陷入绝境了,因为它的陪臣,即小所有制已经到一无所有者的阵营中去寻求解救了。

秩序党自然要重弹它那非弹不可的**老调**。**“加强镇压!”**它高声叫道,**“把镇压加强十倍!”**但是它的镇压力量已减少了十倍,而它受到的反抗却增强了百倍。难道最主要的镇压工具——军队本身不需要镇压吗?于是秩序党就说出了它的最后结论:“必须粉碎窒息着我们的合法性的铁环。**立宪共和国太不成体统了**。我们一定要运用自己的真正武器来作战。自1848年2月以来,我们总是用**革命的**武器并在**革命的**基地上同革命作战,我们接受了**革命的**机构;宪法是保护围攻者而不是保护被围攻者的堡垒!我们藏在特洛伊木马[113]的肚子里潜入了神圣的伊利昂城,但我们并不是像我们的祖先**希腊人**①那样潜入的,我们没有占领敌人的城池,反而使自己成了俘虏。”

可是宪法的基础是**普选权**。**废除普选权**——这就是秩序党的最后结论,资产阶级专政的最后结论。

在1848年5月4日、1848年12月20日、1849年5月13日、1849年7月8日,普选权承认秩序党和资产阶级专政是对的。而在1850年3月10日,普选权则承认自己是错的。把资产阶级统治看做普选权的产物和

①恩格斯在1895年版上加了一个注:“这是双关语,原文grecs意为‘希腊人’,但同时也有‘职业骗子’的意思。”——编者注

结果,看做人民主权意志的绝对表现——这就是资产阶级宪法的意义。但是,当这种选举权,这种主权意志的内容已不再归结为资产阶级统治的时候,宪法还有什么意义呢?难道资产阶级的责任不正是要调整选举权,使它合乎理性,即合乎资产阶级的统治吗?普选权一再消灭现存国家权力而又从自身再造出新的国家权力,不就是消灭整个稳定状态,不就是时刻危及一切现存权力,不就是破坏权威,不就是威胁着要把无政府状态本身提升为权威吗?在1850年3月10日之后,谁还会怀疑这一点呢?

资产阶级既然将它一向用来掩饰自己并从中汲取无限权力的普选权抛弃,也就是公开承认:“**我们的专政以前是依靠人民意志而存在的,现在它却必须违背人民意志而使自己巩固起来。**”照这个逻辑,资产阶级现今已不在**法国**境内寻求支持,而在法国境外,在国外,在外敌**入侵**中寻求支持。

资产阶级,这个在法国本土上的第二个科布伦茨[114],既然求助于外敌入侵,它就会激起一切民族情感来反对自己。既然攻击普选权,它就为新的革命提供了**普遍的口实**,而革命正需要有这样一个口实。任何**特殊的**口实,都会使革命联盟的各个集团分离,使他们彼此间的差异显露出来。但是**普遍的**口实却把一些半革命的阶级弄得眼花缭乱,使它们对于即将来临的革命的**明确性质**,对于它们本身行动的后果怀有一种自欺的幻想。任何革命都需要有一个宴会问题。普选权就是新革命的宴会问题。[115]

可是,联合的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抛弃了它们**联合**权力的唯一可能形式,抛弃了它们**阶级统治**的最强大最完备的形式,即抛弃了**立宪共和国**,后退到低级的、不完备的、较软弱的形式即**君主国**去,这样它们就给自己作出了判决。它们正像是一个老人,为了要恢复自己的

青春活力，居然拿出自己童年的盛装，硬要把他的干瘪的四肢塞进去。它们的共和国只有一个功绩，就是**充当了革命的温室**。

1850年三月十日事件带有这样一句题词：

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①]

①据说这是路易十五讲的话。——编者注

四 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

（这是前三章的续文，是从《新莱茵报》杂志[116]最后两期即第5—6期合刊所载《时评》中摘出来的。该文首先叙述了1847年在英国爆发的大规模商业危机，说明欧洲大陆政治纠纷因受这次危机影响而尖锐化并转变为1848年2月和3月的革命，随后又指出，在1848年即已再度来临而在1849年势头更猛的工商业的繁荣，如何遏止了革命高潮，并使反动派有可能在此期间取得胜利。接着，文章在专门讲到法国时作了如下论述：）①

从1849年，特别是1850年初起，**法国**也出现了这样的征兆。巴黎的工业开足马力，鲁昂和米尔豪森的棉纺织厂情况也相当好，虽然在这些地区也像在英国一样，原料价格昂贵起了阻碍作用。同时，西班牙广泛进行关税改革和墨西哥降低各种奢侈品的关税，也大大促进了法国繁荣的发展。法国商品对这两个市场的输出量大大增加。资本的增加导致法国出现了一连串的投机活动，而大规模开采加利福尼亚金矿是这些投机活动的借口。大批的公司纷纷设立，它们以小额股票和涂上社会主义色彩的说明书直指小资产者和工人的腰包，但是这完全是法国人和中国人所独有的纯粹的欺骗。其中有一家公司甚至直接受到政府的庇护。法国进口税，1848年的前9个月为6 300万法

①这段引言是恩格斯为1895年版所写。——编者注

郎，1849年的前9个月为9 500万法郎，1850年的前9个月为9 300万法郎。而1850年9月份，进口税比1849年同月又增加了100余万法郎。出口在1849年也有所增加，而1850年增加得更多。

法兰西银行根据1850年8月6日的法令恢复兑现，就是繁荣再度来临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明。1848年3月15日，该行曾受权停止兑现。当时，银行券流通额，其中包括外省银行发行的，共达37 300万法郎（1 492万英镑）。1849年11月2日，银行券流通额是48 200万法郎，或1 928万英镑，这就是说，增加了436万英镑；而1850年9月2日是49 600万法郎，或1 984万英镑，即增加了将近500万英镑。同时，没有发生过银行券贬值的现象；相反，银行券流通额增加的同时，该行地下室里存的黄金和白银日益增多，以致到1850年夏季金银储备达到了将近1 400万英镑，这在法国是空前的数额。该行能够这样增加自己的银行券流通额并把自己的流动资本增加12 300万法郎，或500万英镑，这一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我们在本刊前一期中的论断①是正确的，即金融贵族不仅没有被革命推翻，反而更加巩固了。从下面对法国近几年的银行法的概述中可以更为明显地看出这种结果。1847年6月10日法兰西银行受权发行面额200法郎的银行券。在这以前，银行券的最低面额是500法郎。1848年3月15日的法令宣布，法兰西银行发行的银行券为法定支付手段，于是就免除了该行为银行券兑换现金的义务。它发行银行券的数额限定为35 000万法郎。同时它还受权发行面额为100法郎的银行券。4月27日的法令规定各个外省银行合并于法兰西银行；另一个在1848年5月2日颁布的法令允许该行把银行券的发行额增加到45 200万法郎。1849年12月22日的法令

①见本卷第151—156页。——编者注

规定银行券的最高发行额为52 500万法郎。最后，1850年8月6日的法令又重新规定银行券可以兑现。银行券流通额不断增加，法国的全部信贷都集中在法兰西银行的手中，法国的全部黄金和白银都贮存在该行的地下室里。这些事实使蒲鲁东先生得出结论说，法兰西银行现在必须蜕掉旧的蛇皮，变成蒲鲁东式的人民银行。[117]其实，蒲鲁东甚至用不着了解1797年到1819年英国的银行限制[118]的历史，只要看一看拉芒什海峡的对岸，就可以知道，这个据他看来在资产阶级社会历史中前所未闻的事实正是资产阶级社会中极其正常的现象，只不过现在在法国是第一次出现而已。我们可以看到，那些跟着巴黎的临时政府说大话的冒牌革命理论家也像临时政府中的先生们自己一样，对所采取的措施的性质和结果一无所知。

尽管法国目前出现了工商业的繁荣，但大部分人口，即2 500万农民却由于严重的不景气而受苦。近几年的丰收使法国谷物价格跌得比英国低得多，负债累累、受高利贷盘剥并受捐税压榨的农民的处境远远不能认为是美妙的。但是，近三年来的历史充分证明，居民中的这个阶级根本没有能力首倡革命。

在大陆上，不论危机时期还是繁荣时期都比英国来得晚。最初的过程总是发生在英国；英国是资产阶级世界的缔造者。资产阶级社会经常反复经历的周期的各个阶段，在大陆上是以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形式出现的。首先，大陆对英国的输出要比对任何国家的输出多得多。但是，这种对英国的输出却又取决于英国的情况，特别是英国海外市场的情况。其次，英国对海外国家的输出要比整个大陆多得多，所以大陆对这些国家的输出量始终要取决于英国对海外的输出量。因此，如果危机首先在大陆上造成革命，那么革命的原因仍然始终出在英国。在资产阶级机体中，四肢自然要比心脏更早地发生震荡，因

为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要大些。另一方面，大陆革命对英国的影响程度同时又是一个温度计，它可以显示出，这种革命在多大的程度上真正危及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在多大的程度上仅仅触及资产阶级的政治形式。

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大陆秩序党内各个集团的代表目前争吵不休，并使对方丢丑，这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社会关系的基础在目前是那么巩固，并且——这一点反动派并不清楚——是那么明显地**具有资产阶级特征**。一切想阻止资产阶级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像民主派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新的革命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

我们现在来谈一谈**法国**。

人民既已促成了4月28日的新的选举，也就把自己联合小资产阶级在3月10日的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化为乌有。维达尔不仅在巴黎当选，而且在下莱茵省也当选。山岳党[81]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力量很强的巴黎委员会，怂恿他接受下莱茵省的委任状。3月10日的胜利已丧失了它的决定性意义；最后的决定性时刻又拖延了下来，人民松了劲，他们已经习惯于合法的胜利而不再去争取革命的胜利。最后，感伤的小市民的社会幻想家欧仁·苏被提名为候选人这件事，完全勾销了3月10日选举的革命意义，否定了为六月起义恢复名誉的做法；无产阶级至多不过把这次提名看成是讨好轻佻女郎的玩笑而接受下

来。由于对手的政策不坚决而壮起胆来的秩序党，为了同这种善意的提名相对抗，提出了一个应该体现六月**胜利**的候选人。这个可笑的候选人是斯巴达式的家长勒克莱尔[119]，不过他身上的英雄甲胄被报刊一片一片地扯了下来，在选举中遭到了惨败。4月28日选举的新胜利使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得意忘形。山岳党心花怒放，认为它可以用纯粹合法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愿望，而不用掀起一场再度把无产阶级推上前台的新的革命；它确信，在1852年新的选举中一定能靠普选权把赖德律-洛兰先生安置在总统宝座上，并保证山岳党在国民议会里占多数。新的选举，提名苏为候选人以及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的情绪，使秩序党十分有把握地相信，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决心保持平静，所以秩序党以废除普选权的**选举法**回答了这两次选举的胜利。

政府极为谨慎，自己不对这个法案负责。它向多数派作了假的让步，把这个法案的起草工作交给了多数派的首脑即交给17个卫戍官[120]。这样一来，就不是政府向国民议会提议，而是国民议会的多数派向自己提议废除普选权。

5月8日，这个法案提交议会审核。所有社会民主主义报刊都异口同声地劝人民要保持尊严，要保持庄重冷静，要安心等待，要信赖自己的代表。这些报刊的每一篇论文都承认，革命首先必定会消灭所谓的革命报刊，因而现在的问题是报刊如何保全自己。所谓的革命报刊泄露了自己的全部秘密。它签署了自己的死刑判决书。

5月21日，山岳党将这个临时性问题提交讨论，要求否决整个提案，理由是它违反宪法。秩序党回答说，宪法在必要时是要违反的，但现在还用不着，因为宪法可以作各种解释，只有多数才有权决定哪种解释是正确的。山岳党对梯也尔和蒙塔朗贝尔的肆无忌惮的野蛮进

攻，报以彬彬有礼和温文尔雅的人道态度。山岳党引证了法的基础；秩序党给它指出了法借以发展的基础——资产阶级所有制。山岳党呜咽着说：难道他们真的要不顾一切地挑起革命吗？秩序党回答说：我们将静候革命来临。

5月22日，人们以462票对227票的表决结果解决了这个临时性问题。有些人曾经十分郑重而认真地证明说，国民议会和每个议员一旦使人民，即他们的授权人丧失了权利，自己也就会丧失代表权；正是这些人仍然稳坐在自己的席位上，他们突发奇想，要全国行动起来，并且是以请愿的方式行动起来，而他们自己却不采取行动；甚至当5月31日法案已经顺利通过的时候，他们还是安然不动。他们企图用抗议书来为自己报复，在抗议书中写明他们没有参与强奸宪法，但是，就连这份抗议书，他们也没有公开提出，而是偷偷地塞进议长的衣袋里。

巴黎的15万大军，最后决定的无限期推迟，报刊的平静态度，山岳党和新当选的议员的胆小怕事，小资产者的庄重冷静，而主要是商业和工业的繁荣，阻碍了无产阶级进行任何革命的尝试。

普选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大多数人民都上了有教育意义的一课，普选权在革命时期所能起的作用不过如此而已。它必然会被革命或者反动所废除。

在随后不久发生的事件中，山岳党消耗了更多的能量。陆军部长奥普尔在国民议会的讲坛上把二月革命称为危害深重的灾难。山岳党的演说家照例大吵大嚷地表示义愤，但是议长杜班不让他们发言。日拉丹提议山岳党立刻全体退出会场。结果，山岳党依然留在那里，而日拉丹却作为一个不够资格的人被驱逐出山岳党。

选举法还需要一个东西作补充，即新的**新闻出版法**[97]。后者不久

就问世了。经过秩序党的修正而变得严厉得多的政府提案，规定要增加保证金，规定对报刊副刊上登载的小说征收特别印花税（这是对欧仁·苏当选的报复），规定对周刊和月刊上发表的所有达到一定页数的作品都要征税，最后，规定报刊上的每一篇文章都要有作者署名。保证金的规定扼杀了所谓的革命报刊；人民把这些报刊的死亡看成是对废除普选权的报应。但是，新法律的意图和作用不仅仅局限于这一部分报刊。当报刊匿名发表文章的时候，它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的工具；它是国家中的第三种权力。每篇文章都署名，就使报纸仅仅成了或多或少知名的人士的作品集。每一篇文章都降到了报纸广告的水平。以前，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现在报纸却变成了多少有点不可靠的本票，它的价值和流通情况不仅取决于出票人的信用，而且还取决于背书人的信用。秩序党的报刊不仅煽动废除普选权，而且还煽动对坏的报刊采取极端措施。然而，就连好的报刊，也由于用了可恶的匿名方式而不合秩序党的口味，尤其不合它的个别外省议员的口味。秩序党希望只跟领取稿酬的著作家打交道，想知道他们的姓名、住址和特征。好的报刊埋怨人家以忘恩负义的态度来酬谢它的功劳，也是白费力气。法案通过了，而署名的要求首先打击的正是它。共和主义时事评论家是相当著名的，但是，当这批神秘人物突然表现为像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那样为了金钱可以替任何事情辩护的、卖身求荣的、老奸巨猾的廉价文人，或者表现为像卡普菲格那样以国家要人自居的老废物，或者表现为像《辩论日报》的勒穆瓦讷先生那样的卖弄风骚的下流作家的时候，自诩代表国家智慧的《辩论日报》、《国民议会报》、《立宪主义者报》等等可尊敬的报馆便露出一副可怜相。

在讨论新闻出版法的时候，山岳党已经堕落到如此道德败坏的

地步，竟然只是给路易-菲力浦时期的老名人维克多·雨果先生的高谈阔论拍手喝彩。

从选举法和新闻出版法通过时起，革命的和民主的党派就退出了官方舞台。议会闭会不久，在议员动身回家之前，山岳党的两派——社会主义民主派和民主社会主义派——发表了两篇宣言[121]，即两份赤贫证明书，用以证明，虽然权力和成功从来都不在他们那一边，但是他们却一向都站在永恒的正义和其余一切永恒的真理一边。

现在来谈一谈秩序党。《新莱茵报》杂志在第3期第16页上写道："波拿巴反对联合起来的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复辟欲望而维护自己实际政权的名义——共和国；秩序党反对波拿巴的复辟欲望而维护自己共同统治的名义——共和国；正统派反对奥尔良派，奥尔良派反对正统派而维护现状——共和国。秩序党中所有这些集团各自心里都有自己的国王，自己的复辟意图，同时又都为了反对自己对手的篡夺和谋叛的欲望而坚持资产阶级的共同统治，坚持使各种特殊的要求得以互相抵消而又互相保留的形式——共和国。……当梯也尔说'我们保皇派是立宪共和国的真正支柱'时，他没有料想到他的话里包含有这么多的真理。"①

不得已的共和派②这出喜剧，即憎恶现状而又不断地巩固现状；波拿巴与国民议会之间无休止的摩擦；秩序党经常面临分裂为它的几个组成部分的危险以及它的各个集团经常重新结合；每一个集团都企图把对共同敌人的每一次胜利变成自己的暂时同盟者的失败；相互的忌妒、仇恨、倾轧，常常剑拔弩张，而结果总是拉摩勒特式的亲

①见本卷第151—152页。——编者注

②套用莫里哀的喜剧《不得已的医生》。——编者注

吻[122]——整个这一出没趣的谬误喜剧从来没有发展得像最近六个月那样典型。

秩序党同时把选举法也看做是对波拿巴的胜利。政府把自己提案的草拟工作和对这项提案的责任交给了十七人委员会，这难道还不是政府放弃了政权吗?波拿巴能同国民议会抗衡，不正是倚仗他是由600万人选出来的吗?在波拿巴看来，选举法是对议会的让步，他用这种让步换得了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协调。这个下流的冒险家要求把他的年俸增加300万法郎作为酬劳。国民议会在剥夺绝大多数法国人选举权的情况下，能跟行政权发生冲突吗?国民议会十分气愤，看来它决心要采取极端措施了，它的委员会否决了提案，波拿巴的报刊也摆出威胁的姿态，抬出遭受抢劫的、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人民；在进行了许多吵吵闹闹的试图达成协议的活动之后，议会终于在事实上作了让步，但同时在原则上却进行了报复。国民议会不同意在原则上把年俸增加300万法郎，而只同意拨给波拿巴216万法郎的临时补助金。国民议会对此并不满意，只是在秩序党的将军和波拿巴的自告奋勇的庇护者尚加尔涅对国民议会表示支持以后，它才作出这种让步。可见，这200多万实际上不是拨给波拿巴的，而是拨给尚加尔涅的。

波拿巴全然以施主的心情接受了这个勉强掷给的施舍。波拿巴的报刊重新对国民议会进行攻击，而在讨论新闻出版法过程中，有人首先针对代表波拿巴私人利益的二流报纸提出了关于文章署名的修正案，这时波拿巴派的主要机关报《权力报》对国民议会进行了公开的猛烈攻击。内阁阁员不得不在国民议会面前斥责这家报纸；《权力报》的发行人被传到国民议会问罪，并被课以最高罚金5 000法郎。次日，《权力报》刊载了一篇更加粗暴无礼的文章攻击议会，政府的报复

行动是，立即由法庭以破坏宪法的罪名追究几家正统派报纸的责任。

最后，提出了议会会议延期的问题。波拿巴为了使自己的行动不受国民议会阻碍，希望会议延期。秩序党一方面为了使自己的各个集团能够进行阴谋活动，另一方面为了使各个议员能够谋求个人利益，也希望会议延期。双方为了巩固和扩大各省反动派的胜利，都需要会议延期。因此议会把它的会议从8月11日延期到11月11日。但是，因为波拿巴毫不隐讳地一心想要摆脱国民议会的讨厌的监督，所以议会给信任投票本身打上了不信任总统的印记。在议会休会期间由28名共和国道德卫士组成常设委员会[123]，所有波拿巴分子都被排除在外。为了向总统证明多数人对立宪共和国的忠诚，没有选波拿巴分子，反倒选了《世纪报》和《国民报》的几个共和主义者。

在议会会议延期前不久，尤其在刚刚延期的时候，秩序党的两大集团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看来准备和解，和解的基础就是两个王室的融合，而它们在斗争时打的旗号就是王室。报纸上登满了在圣伦纳兹的路易-菲力浦病床前讨论的和解计划；路易-菲力浦的死突然使情况简单化了。路易-菲力浦是个篡位者，亨利五世曾被他夺去了王位，而巴黎伯爵由于亨利五世无嗣便成了他的合法继承人。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借口来反对两个王朝利益的融合。但是资产阶级的两个集团现在才终于明白，使它们分裂的并不是对这个或那个王室的温情的眷恋，相反，是它们的不同的阶级利益使两个王朝分了家。正统派像他们的竞争者到圣伦纳兹去谒见路易-菲力浦一样，也前往威斯巴登行宫谒见亨利五世，在那里获悉路易-菲力浦死去的消息。他们立刻组织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内阁，其成员主要是上述共和国道德卫士委员会的委员，这个内阁趁党内发生冲突的时机立刻直言不讳地宣布它的权利是上帝恩赐的。奥尔良派看到这个宣言[124]在报刊上使对

方丢了丑而兴高采烈，毫不掩饰他们对正统派的公开敌视。

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各省议会都开了会。它们大多数都赞成多少有保留地修改宪法，就是说，它们赞成没有明确规定的君主制复辟；赞成"**解决问题**"，但同时又承认自己没有足够的权力和胆量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波拿巴派急忙从延长波拿巴总统任期的角度来解释这种修改宪法的愿望。

统治阶级决不能容许用合乎宪法的办法解决问题，这个办法就是：波拿巴在1852年5月辞职，同时由全国选民选举新总统，在新总统上任后几个月内由为修改宪法而选出的特别议院来修改宪法。新总统选举之日，必定是正统派、奥尔良派、资产阶级共和派、革命派等一切敌对派别相逢之时。结果必然要在各个集团之间以暴力一决胜负。即使秩序党能够一致推出一个王室之外的中立候选人，波拿巴也会反对这个候选人。秩序党[90]在其反对人民的斗争中不得不经常加强行政权。行政权一加强，执掌行政权的波拿巴的地位也就加强了。因此，秩序党加强其共同的权力时，也就加强了想登王位的波拿巴的战斗手段，增加了他在决胜关头以暴力阻挠用宪制的办法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那时，波拿巴在反对秩序党时将不会与宪法的一个重要支柱发生冲突，正像秩序党在选举法问题上反对人民时不会与宪法的另一个重要支柱发生冲突一样。他甚至有可能诉诸普选权来反对议会。总之，用宪制的办法解决问题会危及整个政治现状，而资产者觉得在现状动荡不定的后面是混乱、无政府状态、内战。他们好像觉得，在1852年5月头一个星期日，他们的买卖、票据、婚约、公证书、押据、地租、房租、利润，一切契约和收入来源都将成为问题，他们不能让自己冒这样的风险。在政治现状的动荡不定后面潜伏着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崩溃的危险。对资产阶级来说，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就是延期解

决。它只能用破坏宪法和延长总统任期的办法来挽救立宪共和国。这也是秩序党报刊在省议会会议结束后对所热衷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经过长期深入的辩论后得出的结论。这样，强大的秩序党只好忍受羞辱，不得不认真看待这个可笑的、平庸的、它所憎恶的人物——假波拿巴。

这个肮脏人物对越来越使他具有必要人物性质的原因，也理解错了。他那一派十分明了，波拿巴的作用日益增长是当时的环境造成的，而他本人却相信，这仅仅是由于他的名字有魔力和他一贯模仿拿破仑的缘故。他的雄心一天比一天大。他以周游法国来对抗前往圣伦纳兹和威斯巴登的拜谒。波拿巴分子不相信他这个人有什么魔力，所以他们用火车和驿递马车大批装载十二月十日会[125]这个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组织的成员，把他们送到各处去为他捧场喝彩。他们根据不同城市对总统接待的情况，教自己的傀儡发表演说，或者宣称总统施政的座右铭是坚持共和主义的随和温顺的态度，或者宣称这一座右铭是坚持刚毅倔强的精神。尽管施用了一切花招，这次巡游还是一点也不像凯旋的游行。

波拿巴确信已经用这种办法把人民鼓动了起来，于是他着手争取军队。他在凡尔赛附近的萨托里平原上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在阅兵时，他力图用蒜腊肠、香槟酒和雪茄烟来收买士兵。如果说真拿破仑在其侵略性远征的艰苦时刻善于靠突然表现家长式的关怀来鼓励疲劳的士兵，那么假拿破仑则以为，士兵高喊“拿破仑万岁，腊肠万岁！”即“腊肠万岁，小丑万岁！”①就是向他表示感谢。

①文字游戏：“腊肠”的原文是“Wurst”，“小丑”的原文是“Hanswurst”。——编者注

这次阅兵暴露出波拿巴和陆军部长奥普尔与尚加尔涅之间长期隐伏的纠纷。秩序党认为尚加尔涅是它的真正中立的人物，因为这个人谈不上有什么建立自己王朝的野心。秩序党指定他作为波拿巴的继承人。况且，尚加尔涅由于在1849年1月29日和6月13日的行为，已经成了秩序党的伟大统帅，成了当代的亚历山大，在胆怯的资产者看来，这个亚历山大以蛮横的干涉斩断了革命的戈尔迪之结。其实他跟波拿巴一样可笑，他以这种极便宜的手段变成一个有势力的人物，被国民议会捧出来监视总统。他以波拿巴的庇护者身份炫耀自己——如在讨论总统的薪俸时就是如此——并且以越来越高傲的态度对待波拿巴和部长们。当人们预料新选举法的颁布会引发暴动的时候，他不许他的军官接受陆军部长或总统的任何命令。报刊方面也帮助吹捧尚加尔涅这个人。秩序党由于根本没有什么杰出人物，而不得不把整个阶级所缺乏的力量凭空移到一个人身上，以这种办法使他膨胀为一个巨人。关于尚加尔涅这个**“社会中坚”**的神话就是这样产生的。尚加尔涅借以把整个世界担在自己肩上的那种无耻的招摇撞骗和不可思议的妄自尊大，跟萨托里阅兵时和阅兵后所发生的事件形成了十分可笑的对比。这些事件无可争辩地证明，只要波拿巴这个极端渺小的人物大笔一挥，就足以使惊恐不安的资产阶级通过幻想产生的怪物——巨人尚加尔涅降为一个平庸的人，就足以把这个拯救社会的英雄变成退休的将军。

波拿巴很早就对尚加尔涅进行过报复，唆使陆军部长在纪律问题上同这个讨厌的庇护者发生冲突。最近在萨托里举行的阅兵式，终于使旧怨公开爆发了。当骑兵团列队通过波拿巴面前并高呼反宪法口号“皇帝万岁！”时，尚加尔涅为维护宪法而产生的愤怒简直达

到了极限。波拿巴为了在议会即将开会对这个口号进行不愉快的辩论之前抢先采取行动，便把陆军部长奥普尔调走，任命他为阿尔及尔总督。他任命一个十分可靠的帝国时代的老将军担任陆军部长的职务，这位老将军的粗暴丝毫不亚于尚加尔涅。但是，为了不让人觉得奥普尔的免职是对尚加尔涅的让步，波拿巴同时又把伟大的社会救主的得力助手诺马耶将军从巴黎调到南特。正是诺马耶在上次阅兵式上使全体步兵在拿破仑继承人面前十分冷淡地默默走过。由于诺马耶的被调而感到自己被触犯的尚加尔涅提出了抗议并进行恫吓。结果白费力气。经过两天的谈判，调动诺马耶的命令在《通报》上发表了，秩序的英雄除了服从纪律或提请辞职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办法。

波拿巴跟尚加尔涅的斗争是他跟秩序党的斗争的继续。因此，11月11日国民议会将在不祥的征兆之下复会。但是，这将是杯水风波。从根本上说，旧戏必定还会继续演下去。尽管秩序党各集团维护原则的勇士们大喊大叫，秩序党的多数人仍将不得不延长总统任期。同样，尽管波拿巴提出了种种临时性的抗议，他也仍然会把这种延长任期当做国民议会的简单授权从它手里接受下来，因为仅仅由于缺钱，他就已经感到沮丧。这样，问题的解决就延搁下来，现状就保持下去；秩序党的各个集团互相破坏威信，互相削弱，使对方丢丑；对共同的敌人即全国群众的镇压手段不断加强，并且无所不用其极，直到经济关系本身重新达到这样的发展水平，使得所有这些互相抱怨的派别连同它们的立宪共和国由于新的爆炸而粉身碎骨。

不过，为了安慰资产者，还需要补充一点，由于波拿巴与秩序党之间的争吵，交易所里许多小资本家陷于破产，他们的钱财都落到交



1942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译本

易所大豺狼的腰包里去了。

卡·马克思写于1849年底—1850年3月底和1850年10月—11月1日

载于1850年1、2、3和5—10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1、2、3和5—6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0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7卷翻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共产主义者同盟
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26]

1850年3月

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

兄弟们!

在1848年和1849年这两个革命的年头中,同盟[3]经受了双重的考验。第一重考验是,它的成员在各地积极参加了运动,不论在报刊上、街垒中还是在战场上,都站在唯一坚决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最前列。同盟经受的另一重考验是,1847年各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通告以及《共产主义宣言》①中阐述的同盟关于运动的观点,都已被证明是唯一正确的观点,这些文件中的各种预见都已完全被证实,而以前同盟仅仅秘密宣传的关于当前社会状况的见解,现在人人都在谈论,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中公开宣扬。可是在同一个时候,同盟以前的坚强的组织却大大地涣散了。大部分直接参加过革命运动的成员,都认为秘密结社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单靠公开活动就够了。个别的区部和支部开始放松了,甚至渐渐地中止了自己同中央委员会的联系。结果,当德国民主派即小资产阶级的党派日益组织起来

①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的时候，工人的政党却丧失了自己唯一巩固的支柱，至多也只是在某些地方为了当地的目的还保存着组织的形式，因此在一般的运动中就落到了完全受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控制和领导的地位。这种状况必须结束，工人的独立应该恢复。中央委员会认识到这种必要性，因此早在1848—1849年冬天就已委派特使约瑟夫·莫尔到德国去改组同盟。可是莫尔所负的使命没有产生持久的影响，这一方面是由于德国工人当时还没有足够的经验，另一方面是由于去年5月发生的起义[93]使这次使命不能继续执行。莫尔本人拿起武器加入了巴登-普法尔茨军队，于6月29日在穆尔格河战斗中阵亡。他的牺牲使同盟失去了一位资历最深、最积极和最可靠的成员，他参加过历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曾多次非常成功地完成使命。在1849年6月德法两国革命政党遭到失败之后，差不多全体中央委员会委员都重聚在伦敦，他们用新的革命力量补充了自己的队伍，再次精神焕发地进行改组同盟的工作。

同盟的改组只有通过一个特使才可能实现，因此中央委员会认为指派一个特使立即动身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新的革命即将爆发，工人政党必须尽量有组织地、尽量一致地和尽量独立地行动起来，才不会再像1848年那样被资产阶级利用和支配。

兄弟们，我们早在1848年就对你们说过，德国的自由资产者很快就会掌握统治权，并且立刻就会利用他们刚刚获得的权力转过来对付工人。你们已经看到，这个预言已成为事实。1848年三月运动[53]之后，资产者果然立即就夺得了国家政权，并且随即利用这个权力迫使工人即自己在战斗中的同盟者回到从前那种受压迫的地位。资产阶级如果不同那个在3月间被打败了的封建党派结成联盟，最后甚至把统治权重又让给这个封建专制主义党派，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的。不过它终究为自己保住了一些条件，假如革命运动现在就有可能走上所谓和平发展的道路，那么，在政府陷入财政困难的情况下，这些条件就可能使统治权逐渐落到资产阶级的手中，使它的全部利益都得到保障。为了保障自己的统治权，资产阶级甚至不必采用惹人憎恨的反人民的暴力措施，因为所有这一切暴力手段封建反革命派都用过了。但是，发展不会采取这种和平进程。相反，革命已经迫近，而这次革命不管是由法国无产阶级的独立起义引起的，还是由神圣同盟[60]对革命的巴比伦的侵犯引起的，都会加速这种发展。

德国自由资产者1848年在对人民的关系上扮演过的叛徒角色，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将由民主派小资产者来担任，而民主派小资产者现今在反对派中所持的态度，正和自由资产者在1848年以前所持的态度相同。这个党派，这个对工人来说比从前的自由派危险得多的民主派，是由下面三种人组成的：

一、大资产阶级中最进步的那部分人，他们所追求的目的是立即彻底推翻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这一派的代表是从前的柏林的协商派[48]，即那些曾经主张拒绝纳税的人。

二、立宪民主派小资产者，他们在迄今为止的运动中所追求的主要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多少有点民主的联邦国家，也就是要建立他们的代表即法兰克福议会左派以及后来的斯图加特议会和他们自己在维护帝国宪法运动[93]中所争取的那种国家。

三、共和派小资产者，他们的理想是建立一个瑞士式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他们现在自称为**红色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因为他们幻想消除大资本对小资本的压迫、大资产者对小资产者的压迫。这一派的代表是历次民主大会和民主委员会的成员、民主协会的领导者和民主报纸的编辑。

所有这三派在遭到失败之后，现在都自称为共和党人或红色党人，正像法国的共和派小资产者现在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一样。凡是在他们还能找到机会用立宪的办法追求自己目标的地方，如在符腾堡、巴伐利亚等地方，他们总是利用机会来坚持他们那套陈词滥调，用行动来证明他们丝毫没有改变。此外，很明显，改变这个党派的名称，丝毫也改变不了它对工人的态度；改变名称只不过是证明这个党派现在不得不反对同专制制度相勾结的资产阶级，而且不得不依靠无产阶级。

德国的这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力量很大。它不但包括居住在城市里的绝大多数市民、小工业品商贩和手工业师傅；跟着它走的还有农民以及尚未得到独立的城市无产阶级支持的农村无产阶级。

革命的工人政党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关系是：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去反对工人政党所要推翻的派别；而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企图为自己而巩固本身地位的一切场合，工人政党都对他们采取反对的态度。

民主派小资产者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他们要求改变社会状况，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日子好过而舒服。因此，他们首先要求限制官僚制度以缩减国家开支，让大土地占有者和大资产者承担主要税负。其次，他们要求消除大资本对小资本的压迫，设立公共信用机构，颁布反高利贷的法令，这样他们和农民就可以不从资本家那里，而从国家那里以优惠条件得到贷款；然后，再彻底铲除封建制度，在农村中建立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为了实现这一切，他们需要一种能使他们及其同盟者农民占多数的民主的——不论是立宪的或共和的——政体，并且需要一种能把乡镇财产的直接监督权以及目前由官僚行使的许多职能转归他们掌握

的民主的乡镇制度。

此外，他们还认为，必须一方面用限制继承权的办法，另一方面用尽量把各种事业转由国家经营的办法，阻挡资本的统治及其迅速的增长。至于工人，首先毫无疑问的是，他们还应当照旧做雇佣工人，不过这些民主派小资产者想让工人的工资多一点，生活有保障一点；他们希望通过国家部分地解决就业问题，并通过各种慈善救济的措施来达到这一点。总之，他们希望用或多或少经过掩饰的施舍来笼络工人，用暂时使工人生活大体过得去的方法来摧毁工人的革命力量。这里所概述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各种要求，并不是他们当中的一切派别都在坚持，而只有其中的极少数人才把所有这些要求当做既定的目标。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个别人物和派别走得越远，这些要求中被他们当做自身要求去争取的就越多，而那些把上述种种要求视为自己纲领的少数人，也许会以为这就是对革命所能寄予的最大希望。但是这些要求无论如何也不能使无产阶级的党感到满足。民主派小资产者只不过希望实现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断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只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将保持一段时期的优势，这是毫无疑义的。因此应当考虑，无产阶级特别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应对他们采取什么态度：

1. 当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处于被压迫地位的现有关系还继续存在的时候对他们应取什么态度?

2. 在最近的将来会使他们获得优势的革命斗争中对他们应取什么态度?

3. 这场斗争结束后,在他们的势力超过被推翻各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时候对他们应取什么态度?

第一,目前,在民主派小资产者到处都受压迫的时候,他们一般都向无产阶级宣传团结与和解,表示愿意与无产阶级携手合作,力求建立一个包括民主派内各种人物的大反对党,就是说,他们极力想把工人拉入这样一个党组织,在这里尽是一些掩盖他们特殊利益的笼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空话,为了所向往的和平而不许提出无产阶级的明确要求。这种联合只会对小资产者有利,而对无产阶级则十分有害。无产阶级会完全丧失它辛辛苦苦争得的独立地位,而重新沦为正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庸。因此,对于这种联合应该坚决拒绝。工人,首先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不应再度降低自己的地位,去充当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随声附和的合唱队,而应该谋求在正式的民主派旁边建立一个秘密的和公开的独立工人政党组织,并且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都成为工人协会的中心和核心,在这种工人协会中,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利益问题应该能够进行独立讨论而不受资产阶级影响。资产阶级民主派对于他们同无产者缔结这种应该保证无产者与他们具有同等力量和同等权利的联盟,采取多么不严肃的态度,这可从布雷斯劳的民主派的例子上看出来:他们在自己的机关报《新奥得报》上,非常猖狂地攻击他们称为社会主义者的那些独立组织起来的工人。在反对共同的敌人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联合。一旦必须进行反对共同敌人的直接斗争,两个党派的利益也就会暂时趋于一致,正如

历来的情况一样，将来也自然会产生出这种只适合一时需要的联合。不言而喻，在即将发生的流血冲突中，也如在先前各次流血冲突中一样，主要是工人必须勇敢而坚定地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来争取胜利。在这个斗争中，小资产者群众也必定会和从前一样，尽可能拖延行动，采取犹豫不决和消极的态度，而在将来取得胜利的时候，则把胜利果实据为己有，要求工人镇静下来，回去劳动，防止所谓过火行为，并且不让无产阶级享有胜利果实。工人没有能力阻止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这样做，可是工人有能力阻挠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凌驾于武装的无产阶级之上，并逼迫他们接受一些条件，使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统治一开始就种下覆灭的根苗，使他们的统治在以后很容易就被无产阶级的统治排挤掉。工人在发生冲突期间和斗争刚结束时，首先必须尽一切可能反对资产阶级制造安静局面的企图，迫使民主派实现他们现在的恐怖言论。工人应该设法使直接革命的热潮不致在刚刚胜利后又被压制下去。相反，他们应该使这种热潮尽可能持久地存在下去。工人不应反对所谓过火行为，不应反对人民对与可恨的往事有关的可恨的人物或官方机构进行报复的举动，他们不仅应该容忍这种举动，而且应该负责加以引导。在斗争中和斗争后，工人一有机会就应当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要求之外提出他们自己的要求。民主派资产者一准备夺取政权，工人就应当要求他们给工人以各种保证。在必要时，工人应当以强制性手段争得这些保证，并且应当设法使新执政者作出一切可能的让步和承诺——这是使他们丧失威信的最可靠的手段。总之，工人应该用一切方法，尽可能抑制那种随着每次巷战胜利而出现的新形势所引起的陶醉于胜利的情绪，应该镇定清醒地认清形势，对新政府公开表示不信任。同时，工人应该立刻在正式的新政府旁边成立自己的革命工人政府，可以采用市镇领导机关即市镇委

员会的形式，也可以采用工人俱乐部或工人委员会的形式，使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府不仅立刻失去工人的支持，而且一开始就看到自己处于受全体工人群众拥护的行政机关的监督和威胁之下。总之，从胜利的最初一瞬间起，工人的不信任态度就不必再针对已被打倒的反动党派，而是必须针对自己从前的同盟者，即针对那个想要独吞共同胜利的果实的党。

第二，为了坚决而严厉地反对这个从胜利的头一小时起就开始背叛工人的党，工人应该武装起来和组织起来。必须立刻把整个无产阶级用步枪、马枪、大炮和弹药武装起来；必须反对复活过去那种用来对付工人的市民自卫团。在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工人就应该设法组成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指挥官和自己选出的总参谋部来指挥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近卫军，不听从国家权力机关的调遣，而听从由工人建立的革命的市镇委员会调动。凡是国家出钱雇用工人做工的地方，工人们都应该武装起来，组成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指挥官指挥的独立军团，或者组成无产阶级近卫军的支队。武器和弹药不得以任何借口交出去；对任何解除工人武装的企图在必要时都应予以武装回击。消除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工人的影响，立刻建立起独立和武装的工人组织，造成各种条件，尽量使暂时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统治感到困难和丧失威信。这就是无产阶级，因而也就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即将爆发的起义中和起义后应当牢记不忘的主要问题。

第三，新政府只要巩固到一定程度，就会立刻开始反对工人的斗争。为了能够有力地反对民主派小资产者，首先必须使工人以俱乐部的形式独立地组织起来并集中起来。在推翻现存政府以后，中央委员会一有可能就迁往德国，立刻召开代表大会，并向大会提出旨在把各个工人俱乐部集中起来由一个设在运动中心的机关来领导的

各种必要的提案。至少要在各省范围内迅速建立各个工人俱乐部之间的联系，这是加强和发展工人政党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推翻现存政府以后，立刻就要选举国民代表会议。这里无产阶级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一、无论如何都不要让地方当局或政府委员用某种诡谲借口把一部分工人摒除于选举之外。

二、各地都要尽可能从同盟盟员中提出工人候选人来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候选人相抗衡，并且要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使工人候选人当选。甚至在工人毫无当选希望的地方，工人也一定要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计算自己的力量，并公开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和本党的观点。同时，工人不应听信民主派的空话，例如说这种做法将使民主派陷于分裂而使反动派有可能获得胜利。所有这些空话，归根到底是为了蒙骗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政党通过这种独立行动所必然取得的进展，同几个反动分子参加国民代表会议所能造成的害处相比，其重要性不知要大多少。如果民主派一开始就坚决用恐怖手段对付反动派，那么，反动派在选举中的影响预先就会被消除掉。

引起资产阶级民主派同工人发生冲突的第一个问题，将是废除封建制度的问题。正如在第一次法国革命中一样，小资产者将把封建地产交给农民作为他们自由支配的财产，也就是说，他们要继续保存农村无产阶级并造就一个农民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会像法国农民现在的处境一样，经受日益贫困和债台高筑的痛苦。

工人为了农村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自身的利益，一定要反对这种意图。他们必须要求把没收过来的封建地产变为国有财产，变成工人移民区，由联合起来的农村无产阶级利用大规模农业的一切优点来进行耕种。这样一来，在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发生动摇的情况下，公

有制的原则立刻就会获得巩固的基础。正如民主派同农民联合起来那样，工人应当同农村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其次，民主派或者将直接力争建立联邦共和国，或者，如果他们无法回避建立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至少也将设法赋予各乡镇和各省区以尽量大的独立自主权，从而使中央政府陷于瘫痪状态。工人应该反对这种意图，不仅要力求建立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而且还要极其坚决地把这个共和国的权力集中在国家政权手中。他们不应当被民主派空谈乡镇自由、自治等等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在任何一个像德国这样还需要铲除那么多中世纪残余，还必须打破那么多地方性和省区性痼习的国家里，无论如何也不能容许每个村庄、每个城市和每个省设置新的障碍去阻挠革命活动，因为革命活动只有在集中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全部力量。——决不能容许现今这种状况重现，因为在这种状况下，德国人在每个城市和每个省都不得不为同一个前进步骤而独自去搏斗。决不能容许利用所谓自由的乡镇制度来永远保存乡镇所有制，因为这种所有制形式比现代私有制还要落后，并且到处都必然陷于解体而转变为现代私有制；决不能容许利用所谓自由的乡镇制度来使各个贫穷乡镇与富裕乡镇在这种所有制基础上发生的争执，以及与国家民法并存的乡镇民法及其各种刁难工人的规定永远存在下去。正如1793年在法国那样，目前在德国实行最严格的中央集权制是真正革命党的任务①。

---

①恩格斯在1885年版上加了一个脚注："现在必须指出，这个地方是出于误会。当时因受到波拿巴派和自由派的历史伪造家的欺骗，大家都以为法国中央集权的管理机器是由大革命建立起来的，特别是以为国民公会[49]曾利用这个机器作为战胜保皇主义反动派和联邦主义反动派以及外敌的必不可少的和决定性的武器。可是，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事实是：在整个革命时期，直到雾

我们已经说过，在下次运动中，民主派将取得统治，他们将不得不提出一些多少带点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试问：工人对此应该提出一些什么措施呢？当然，在运动初期，工人还不可能提出直接的共产主义的措施。但是他们可以采取如下两个措施：

1. 迫使民主派尽可能多方面地触动现存的社会制度，干扰现存社会制度的正常运行，使它自己丧失威信，并把尽可能多的生产力、运输工具、工厂、铁路等等集中在国家手里。

2. 工人应当极力将那些肯定不会采取革命手段而只会采取改良手段的民主派所提出的主张加以提升，把这些主张变成对私有制的直接攻击。例如，假若小资产者主张赎买铁路和工厂，工人就应该要求把这些铁路和工厂作为反动派财产干脆由国家没收，不给任何补偿；假若民主派主张施行比例税，工人就应该要求施行累进税；假若民主派自己提议施行适度的累进税，工人就应该坚持征收税率逐级大幅度提高的捐税，从而使大资本走向覆灭；假若民主派要求调整国债，工人就应该要求宣布国家破产。这就是说，工人的要求到处都必须针对民主派的让步和措施来决定。

如果说德国工人不经过较长时间的革命发展过程，就不能掌握

月十八日为止，各省、各区和各乡镇的全部管理机构都是由被管理者自己选出的机关组成的，这些机关可以在共同的国家法律范围内完全自由行动；这种和美国类似的省区的和地方的自治，正是革命的最强有力的杠杆；拿破仑在雾月十八日政变刚刚结束以后，就急忙取消这种自治而代之以沿用至今的地方行政长官管理制，可见，地方行政长官管理制自始就纯粹是反动势力的工具。但是，正如地方的和省区的自治不同政治的和全国的中央集权相抵触一样，它也并不一定同自治州或乡镇的狭隘的利己主义联系在一起，这种利己主义现今在瑞士已经显得非常丑恶可憎，而南德意志的所有联邦共和主义者在1849年却企图在德国把它奉为准则。"——编者注

统治权和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那么这一次他们至少可以确信，这一出即将开始的革命剧的第一幕，将与他们本阶级在法国取得直接胜利同步上演，因而第一幕的进展一定会大大加速。

但是，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终胜利，他们首先必须自己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能因为听信民主派小资产者的花言巧语而动摇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组织的信念。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

1850年3月于伦敦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1850年3月24日以前

1850年印成传单，1885年由恩格斯收在马克思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书中作为附录发表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0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7卷翻译



弗·恩格斯

德国农民战争[127]



1870年第二版序言[128]

这部著作是1850年夏天对刚刚得逞的反革命还留着直接印象的时候在伦敦写成的；它发表于1850年由卡·马克思主编在汉堡出版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16]杂志第5—6两期合刊上。我在德国的一些政治友人希望重印这部著作，于是我就满足他们的愿望，因为使我感到遗憾的是，这部著作至今还没有失去它的现实意义。

这部著作并不奢望提供独立研讨过的材料。相反，关于农民起义和托马斯·闵采尔的全部材料，都是从威美尔曼那里借用的。①他那部书虽然有些缺点，但仍然不失为一部最好的真实的史料汇编。并且，威美尔曼老人热爱自己所研究的对象。在他的书里到处表现出来的那种为被压迫阶级辩护的革命本能，后来使他成为法兰克福的极左派[129]的最优秀代表之一。②

如果说，尽管如此，威美尔曼所作的论述还是缺乏内在联系，如果说他没有能指明那个时代的宗教上政治上的kontroversen（争论问题）是当时阶级斗争的反映，如果说他在这个阶级斗争中只看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善良者和凶恶者以及凶恶者的最后胜利，如果说他对

---

①指威·威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1—1843年斯图加特版。——编者注

②在《德国农民战争》1875年第三版中，下面还有这样一句话："诚然，从那时起，他仿佛是有点衰老了。"——编者注

于决定斗争的开端与结局的那些社会关系所持的见解带有很大的缺点，那么，这一切正是这部书问世的那个时代的缺陷。相反，就当时来说，这部书是德国唯心主义历史著作中值得嘉许的一个例外，它还是写得很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

我的论述打算通过对这场斗争的历史进程的简要叙述，来说明农民战争的起源，参加这一战争的各种党派的立场，这些党派企图借以弄清自己立场的那些政治的和宗教的理论，以及从当时这些阶级的历史地存在的社会生活条件中必然产生的斗争结局本身；这就是说，我是打算指明：当时德国的政治制度，反对这一制度的起义，以及当时那个时代的政治的和宗教的理论，并不是当时德国农业、工业、水陆交通、商品交易和货币交易所达到的发展程度的原因，而是这种发展程度的结果。这个唯一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不是由我，而是由马克思发现的，这个历史观还见于他在同一个《政治经济评论》杂志上发表的论述1848—1849年法国革命的著作[130]，以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

德国1525年革命①和1848—1849年革命间的类似之处异常明显，以致当时不能完全将其忽略。但是，除了各种地方起义都是被同一种诸侯军相继镇压下去这一事变进程中的相同点之外，除了城市市民在这两种场合的行动相似得往往令人好笑之外，其间的差别也还是十分明显的：

“从1525年的革命中得到好处的是谁呢？**诸侯**。从1848年的革命中得到好处的是谁呢？**大**诸侯，即奥地利和普鲁士。站在1525年的小诸侯背后的，是用赋税锁链把这些小诸侯束缚起来的小市民，站在

①指1524—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编者注

1850年的大诸侯背后，即站在奥地利和普鲁士背后的，是很快就通过国债制服这些大诸侯的现代大资产者。而站在大资产者背后的则是无产者。”①

很可惜，应当说这个论点未免把德国资产阶级看得太高了。在奥地利和普鲁士，它都曾经有机会“很快就通过国债制服”君主制，可是，无论何时何地这种机会都没有被利用。

由于1866年的战争，资产阶级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奥地利这一礼物。但是，资产阶级还不善于统治，它在一切方面都显得软弱无力，庸碌无能。它只会做一件事，即一旦工人行动起来，就狂暴地对付他们。它所以还在掌握政权，仅仅是由于**匈牙利人**需要它。

而在普鲁士呢？固然，国债迅猛增长，财政赤字不断公布，国家支出逐年增多，资产者已在议院里占据多数，非经他们同意就既不能增税，也不能借债——但是，他们驾驭国家的权力何在呢？还在几个月以前，当财政赤字再次出现的时候，他们的地位是极为有利的。他们只要**稍许**坚持一下，就能取得很大的让步。可是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认为，政府**准许他们**给政府献款约900万，并且不只是**一**年，而是今后**每年**如此，这就是一个足够大的让步了。[131]

我并不想苛责议院中的那些可怜的“民族自由党人”[132]。我知道，他们已被那些站在他们背后的人即资产阶级群众抛弃了。这些群众不愿进行统治。他们始终刻骨铭心地牢记着1848年。

德国资产阶级为什么表现得这样畏首畏尾，这一点我们留待下面来讲。

上面引用的论断在其他各方面完全得到了证实。从1850年起，

① 见本卷第318—319页。——编者注

各个小邦日益明确地退到后面去了，只是充当着普鲁士或奥地利的各种阴谋的工具；奥地利和普鲁士彼此间发生越来越激烈的争夺霸权的斗争，以致终于在1866年采取了暴力解决的手段，在这之后，奥地利保留了自己原有的省区，普鲁士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整个北部地区，而西南部三个邦[133]暂时还被排斥在门外。

在这全部重大政治历史事件中，对德国工人阶级有意义的只有如下几点：

第一，工人因普选权的施行而得到了直接选派自己的代表参加立法议会的权力。

第二，普鲁士以吞并另外三个天赐王权[134]而树立了良好的榜样。现在，甚至民族自由党人也不相信普鲁士**在**这个行动**之后**仍旧握有它先前自命自封的那样一个完美无缺的天赐王权了。

第三，在德国现在只剩下**一个**反对革命的强硬敌手——普鲁士政府了。

第四，现在德意志的奥地利人终于必须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了：他们究竟愿意做什么人——德国人，还是奥地利人？究竟什么对他们更珍贵些——是德国，还是莱塔河彼岸的那些非德意志的属地？他们必须放弃其中的一个，这一点早就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始终被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所掩盖。

至于“民族自由党”和“人民党”[135]双方从那时起已经讨论得令人生厌的其他有关1866年的重要争论问题，随后数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两种观点所以如此激烈地互相敌对，也无非是因为它们是同一种狭隘性的两个相反的极端而已。

1866年几乎没有改变德国的社会关系中的任何东西。几项资产阶级改革，如统一度量衡、迁徙自由、经营自由等等，全都局限于官僚

制度所能接受的范围，这些改革甚至没有获得西欧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早已得到的东西，并且丝毫也没有触动主要的祸害——官僚主义的经营权制度[136]。而对于无产阶级说来，通常的警察行动本来就已经把迁徙自由、公民权、废止身份证等各种法律完全变成一纸空文了。

比1866年的重大历史事件意义重大得多的，是从1848年起在德国开始的工商业、铁路、电报和海洋航运业的兴旺。尽管这些进步还赶不上英国以至法国在同一时期所取得的进步，但它们对于德国说来却是空前未有的，它们在20年中带来的成果比以前整整一个世纪还要多。只有到这时，德国才真正地、不可逆转地被卷入了**世界贸易**。工业家的资本迅速增加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也相应地提高了。最能表明工业繁荣的**投机事业**广泛发展，它已把伯爵和公爵们紧系在它的凯旋车上了。在15年以前，德国铁路还曾向英国企业主乞求援助，而如今德国资本——保佑它在天之灵！——却已经在俄国和罗马尼亚修筑铁路了。可是为什么资产阶级没有在政治上也夺得统治，为什么它在政府面前表现得如此懦弱呢？

德国资产阶级的不幸就在于：它按照惯常的德国方式，出世得太迟了。它兴盛的时期，正是西欧其他各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开始衰败的时期。在英国，资产阶级能把自己真正的代表布莱特送到政府里去，只是由于扩大了选举权，而这种办法的后果是必定会终结整个资产阶级统治的。在法国，资产阶级作为整个阶级来进行统治，只有两年之久，即只是在1849年和1850年，在共和国时期；它只是由于把自己的政治统治让给了路易·波拿巴和军队，才得以延长了自己的社会存在。而在欧洲三个最先进国家相互作用已经无限增长的条件下，当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英国和法国已经衰败的时

候，资产阶级今天要在德国舒舒服服地确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已经不可能了。

与先前所有的统治阶级相比，资产阶级的特点恰恰在于：在它的发展进程中有一个转折点，经过这个转折点之后，它的统治手段每进一步的增加，首先是它的资本每进一步的增加，都只会使它越来越没有能力进行政治统治。**“站在大资产者背后的则是无产者。”**[①]资产阶级把自己的工业、商业和交通发展到什么程度，它也就使无产阶级成长到什么程度。而到了一定时刻——这种时刻不一定在各地同时到来，也不一定在同一发展阶段上到来——它就开始觉察到：它的这个形影不离的同伴无产阶级已开始胜过它了。从这时起，它就丧失进行独占政治统治的能力；它为自己寻找同盟者，并且斟酌情况，或是把自己的统治权分给他们，或是把统治权完全让给他们。

在德国，资产阶级的这个转折点在1848年就已来到了。诚然，那时德国资产阶级与其说是害怕德国无产阶级，倒不如说是害怕法国无产阶级。1848年巴黎的六月战斗[5]已经向德国资产阶级表明什么前途在等着它；当时德国无产阶级所表现的激愤足以向它证明：在德国也已撒下将得到同样收获的种子；从这时起，资产阶级政治行动的锋芒就被摧折了。它开始找寻同盟者，不计代价地把自己出卖给他们——而直到今天它一步也没有前进。

所有这些同盟者都具有反动的本性。这就是拥有自己的军队和官僚机构的王权；这就是大的封建贵族；这就是小的土容克；最后，这就是神父。资产阶级跟所有这些人都串通一气并达成协议，只求保全自己宝贵的性命，直到最后它无可典卖时为止。而无产阶级越发

---

①见本卷第319页。——编者注

展，越是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阶级，并作为一个阶级行动起来，资产者就越是变得畏首畏尾。当普鲁士人的拙劣得惊人的战略在萨多瓦会战[137]中战胜了奥地利人的更加拙劣得惊人的战略时，很难说是谁更轻松地舒了一口气——是在萨多瓦同样被击败了的普鲁士资产者，还是奥地利资产者。

我们的大资产者在1870年的行动，与1525年中等市民的行动一模一样。至于小资产者、手工业师傅和小店主，他们是永远不变的。他们千方百计地希望跻身于大资产阶级的行列，他们害怕被抛到无产阶级的行列中去。他们彷徨于恐惧和希望之间，在斗争期间会力求保全自己宝贵的性命，而在斗争之后则去投靠胜利者。这就是他们的本性。

伴随着1848年以后的工业高涨，无产阶级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也开展起来了。单是目前德国工人在其工会、合作社、政治组织和政治集会中，在选举以及所谓国会中所起的作用，就足以表明，最近20年来在德国已不知不觉地发生了什么样的变革。德国工人获得了很大的荣誉：**唯有他们**做到了把工人和工人代表派到国会中去，而无论是法国人或英国人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但是，就连无产阶级的发展也还没有超出1525年的水平。完全地和终生地依靠工资过活的阶级，还远没有构成德国人民的多数。因此，它也得依靠同盟者。而同盟者只能在小资产者、城市流氓无产阶级、小农和农业短工中间去寻找。

关于**小资产者**，我们已经说过了。他们是极不可靠的，只有当已经取得胜利时他们才在啤酒馆中高呼狂叫。然而，在他们中间，也有一些自动加入到工人方面来的优秀分子。

流氓无产阶级是以大城市为其大本营的、由各个阶级的堕落分

子构成的糟粕，他们是所有能够找到的同盟者中最坏的同盟者。这些社会渣滓极易被人收买，非常厚颜无耻。如果说法国工人们在每次革命中都在墙壁上写上Mort aux voleurs!——消灭盗贼!——并且把他们枪毙了不少，那么这并不是由于法国工人热衷于保护财产，而是由于他们正确地认识到首先必须摆脱这帮家伙。任何一个工人领袖只要利用这些流氓作为自己的近卫军或依靠他们，就已经足以表明他是运动的叛徒。

小农——大农属于资产阶级——有不同类型：

有的是**封建的农民**，他们还必须为自己的主人服徭役。既然资产阶级未能履行自己的职责，没有把这些人从农奴依附地位解放出来，所以也就不难令他们相信：他们只有依靠工人阶级才能求得解放。

有的是**佃农**。这些人的情况多半与爱尔兰的情况相同。地租已增加得如此之高，以致在得到中等收成时，农民也只能勉强维持本人和自己家庭的生活，而在收成不好时，他们就几乎要饿死，无力交纳地租，因而完全听任土地所有者摆布。资产阶级只有迫不得已时才会为这些人做一点事。除了工人，他们还能指望谁来拯救自己呢?

还有的农民是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进行经营。他们大都承受着抵押借款造成的沉重压力，因而就像佃农依附地主那样依附高利贷者。他们只能获取很少一点劳动报酬，而且这种劳动报酬由于年成的好坏不同而极不稳定。他们绝对不能对资产阶级寄托什么希望，因为正是资产者、高利贷资本家在榨取他们的脂膏。但是，他们大部分都牢牢抱住自己的财产不放，虽然这个财产实际上不是属于他们，而是属于高利贷者的。尽管如此，还是应当让他们明白，只有在服从人民意志的政府把一切抵押债务变成对国家的债务，并从而减低利息之

后，他们才能摆脱高利贷者。而这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做到。

凡是中等地产和大地产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农业短工**是农村中人数最多的阶级。德国整个北部和东部地区的情况就是如此，而城市工业工人就**在这里**找到自己**人数最多的天然同盟者**。正像资本家与工业工人相对立一样，土地所有者或大租佃者是与农业短工相对立的。那些有益于工业工人的措施，也必定有益于农业短工。工业工人只有当他们把资产者的资本，即生产所必需的原料、机器和工具以及生活资料转变为社会财产，即转变为自己的、由他们共同享用的财产时，他们才能解放自己。同样，农业工人，也只有首先把他们的主要劳动对象即土地本身从大农和更大的封建主的私人占有中夺取过来，转变为社会财产并由农业工人的合作社共同耕种，才能摆脱可怕的贫困。这里，我们就谈到了巴塞尔国际工人代表大会[138]的著名决议：为了社会的利益，必须把地产转变为共同的、国家的财产。这个决议所指的，主要是这样的国家，那里存在着大地产以及与它相联系的、在大片土地上进行的经营，而且在这大片的土地上存在着一个主人和许多短工。而这种情况一般说来在德国还占优势，因此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对于德国**也和对于英国一样，**正好是极为适时的**。农业无产阶级，即农业短工，是为各邦君主军队提供新兵最多的阶级。这是目前由于实行普选权而把许多封建主和容克选入国会的阶级。但同时这又是最靠近城市工业工人，与他们生活条件相同，甚至比他们更加贫困的阶级。这个阶级因零星分散而软弱无力；政府和贵族十分清楚地知道它的潜在力量，因而故意使教育事业凋敝，好让这个阶级继续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唤起这个阶级并吸引它参加运动，是德国工人运动首要的最迫切的任务。一旦农业短工群众学会理解自己的切身利益，在

德国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封建的、官僚的或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府存在了。

弗·恩格斯写于1870年2月11日前后

载于1870年4月2日和6日《人民国家报》第27号和28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6卷翻译

1870年第二版序言的补充[139]

上面那一部分是四年多以前写成的。它直到今天还具有意义。在萨多瓦会战[137]及德国分裂后是正确的东西，在色当会战[140]及普鲁士民族的神圣德意志帝国[141]建立以后又得到了证实。可见，所谓伟大政策造成的"震撼世界的"重大政治历史事件，并不能使历史运动的方向发生什么变化。

但是这些重大政治历史事件可以加快这个运动的速度。在这方面，上述那些"震撼世界的事件"的肇事者无意中得到了大概是极不合他们自己心愿的结果，但不管愿意与否，他们都不得不容忍这些结果。

1866年的战争已经震撼了旧普鲁士的根基。在1848年以后，为了使西部各省骚动的工业成分——无论是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重新遵守旧纪律，已经费了不少力气；这件事总算是成功了，而且东部各省容克的利益和军队的利益一起，重新在国家中占了统治地位。在1866年，整个德国西北部地区几乎都归普鲁士管辖。姑且不谈普鲁士的天赐王权因吞并其他三个天赐王权[134]而在道义上遭受的不可挽回的损失，现在君主政体的重心确实已经显著地向西移动了。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原有的500万人口已经增加：首先有400万德意志人被直接兼并进来，后来又有600万德意志人通过北德意志联邦[142]被间接兼并进来。[143]而在1870年，又增添了800万西南部德

意志人，[144]结果在“新帝国”中，同1 450万旧普鲁士人（这是易北河东部六个省的人，那里还有200万波兰人）对立的，是早已越出旧普鲁士容克封建制度界限的2 500万左右的人。因此，正是普鲁士军队的胜利动摇了普鲁士国家大厦的整个基础；容克的统治甚至使政府也越来越感到不堪忍受。但同时工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已经把容克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排挤到后面去，而把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的斗争提到显要地位上来，所以在旧国家的社会基础中，从内部也发生了彻底的变革。从1840年起日渐腐朽的君主政体存在的基本条件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正是君主政体维持着这场斗争中的均势。但是，从问题已经不在于保护贵族免受资产阶级攻击，而在于保护一切有产阶级免受工人阶级攻击时起，旧的专制君主政体就势必会彻底转变成专为此目的而发明的国家形式，**即波拿巴主义的君主政体**。关于普鲁士向波拿巴主义的这一转变，我在另一篇著作中（《论住宅问题》第二篇第26页及以下几页①）已经进行了分析。在那篇著作中，有一点我没有必要加以强调，而在这里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就是：这个转变是普鲁士在1848年以后**向前迈进的最大一步**，可见普鲁士当时多么落后于现代的发展。它当时仍然是个半封建的国家，而波拿巴主义则无论如何都是以消除封建制度为前提的现代国家形式。所以，普鲁士不得不下决心清除自己的无数封建残余，并牺牲容克本身。所有这一切，当然都是以最温和的形式并在可爱的“永远缓步前进！”②的旋律中进行的。大名鼎鼎的专区法就是一个例子。[145]

①恩格斯《论住宅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299—302页。——编者注

②1813年流行于普鲁士的民歌《来自偏僻村庄的后备军》的副歌。——编者注

它废除单个容克在其领地范围内的封建特权，但这不过是为了用全体大土地所有者在全专区的特权的形式来恢复这种特权。事情的实质依然如故，只是把封建的行话翻译成资产阶级的行话而已。旧普鲁士容克在被迫变为类似英国乡绅的人物，但是他完全用不着特别反对这件事，因为这两种人是同样的愚蠢。

可见，普鲁士遇到了一个特殊的命运，即在本世纪末以惬意的波拿巴主义形式完成它的资产阶级革命，这场革命开始于1808—1813年，并在1848年向前迈进了一步。如果一切顺利，如果世界保持宁静，而我们大家又能长寿的话，那么我们也许将在1900年亲眼看到，普鲁士政府确实废除了一切封建机构，而普鲁士也终于达到了法国在1792年时所处的状况。[146]

废除封建制度，从肯定方面来说，就是确立资产阶级制度。贵族特权废除到什么程度，立法也就资产阶级化到什么程度。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德国资产阶级对待政府的态度的基本点。我们已经知道，政府是**被迫**实行这些缓慢而微小的改良的。但是，政府在资产阶级面前把每一个这样的微小让步都描绘成为资产者所作的**牺牲**，描绘成费很大力气才从国王那里争得的让步，为此资产者自己也应当向政府作某些让步。而资产者虽然十分清楚事情的真相，却甘心去受这种欺骗。由此就产生了在柏林暗中成为国会和普鲁士议院全部讨论基础的默契：一方面政府像蜗牛爬行一样慢慢地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修改法律，消除各种封建的和由于小邦分立而造成的阻挠工业发展的障碍，确立统一的币制和度量衡，确定经营自由等等，准许迁徙自由而使资本可以无限制地支配德国的劳动力，对贸易和投机实行保护；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则听任政府保留全部实际政权，投票赞成赋税、公债和征兵，并协助政府制定一切新改良法，以便使旧的警察权

力仍然十分有效地对付那些不受欢迎的人物。资产阶级用立刻放弃自己政权的代价，换取自己渐进的社会解放。当然，资产阶级接受这种协议的主要动机，并不是害怕政府，而是害怕无产阶级。

尽管我们的资产阶级在政治领域表现得极其可怜，但是不可否认，它在工业和商业方面终于去履行自己的义务了。我在第二版序言中所指出的工业和商业的高涨，从那时起显示出了更加强劲的发展势头。从1869年以来，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工业区在这方面所发生的一切，对德国说来简直是闻所未闻的，就像是本世纪初英国工业区的繁荣景象。在萨克森和上西里西亚，在柏林、汉诺威和沿海城市，也将会出现同样的景象。我们终于有了世界贸易，有了真正的大工业和真正的现代资产阶级；但同时我们这里也有了真正的危机，而且也形成了真正的、强大的无产阶级。

在未来的历史编纂学家看来，在1869年至1874年的德国史上，施皮歇恩、马斯拉图尔和色当等地会战[147]的隆隆炮声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其重要性远远不及德国无产阶级那种质朴、平稳但不断向前的发展。早在1870年德国工人就曾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即波拿巴主义的战争挑衅[148]及其自然的结果——德国普遍的民族激情。德国社会主义的工人一刻也没有被人引入迷途。他们没有被卷入民族沙文主义的狂澜。当举国欢欣若狂地沉醉于胜利时，他们保持了冷静，要求“同法兰西共和国缔结公正的和约并且不要任何割地”[149]，就连戒严状态也不能迫使他们沉默。不论是战争的荣耀，还是关于德意志“帝国壮丽辉煌”的废话，在他们中间都得不到响应；他们唯一的目标始终是整个欧洲无产阶级的解放。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另一个国家的工人如此出色地经受过这样严峻的考验。

继战时戒严状态之后，便是以叛国、侮辱帝王和官员等罪名提

出的审判案，便是和平时期日益加紧的警察迫害。《人民国家报》[150]通常总是有三四个编辑同时被关在监狱里；其他报纸境况也是一样。党内每个稍微著名的演说家每年至少总有一次要到法庭受审，而且几乎总是被判有罪。流放、查抄、解散集会等接二连三地发生。但这一切手段都是徒劳的。一个人被捕或被流放了，立刻就有另一个人来代替；一个集会被解散了，人们随后就会举行两个新的集会；横暴的警察常因人们坚韧顽强和恪守法律而弄得疲于奔命。一切迫害都引起与本意相反的结果；不仅不能摧毁或至少制服工人政党，反而源源不断地给它招来了新的战斗力量并巩固了它的组织。工人不论在对政权或对个别资产者的斗争中，处处都表现了自己智力上和道义上的优势，特别是在与所谓"雇主"发生冲突时，工人证明了他们现在是有教养的人，而资本家则是粗野蛮横之徒。同时工人们大都是抱着幽默态度进行斗争的，这种幽默态度是他们对自己的事业满怀信心并深知自身优势的最好的证明。这样一种在历史奠定的基础上展开的斗争，必定会取得伟大的成果。一月选举的成功[151]是现代工人运动史上迄今独一无二的现象，所以这次选举引起了整个欧洲的惊奇，那是很自然的。

德国工人同欧洲其他各国工人比较起来，有两大优越之处。第一，他们属于欧洲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他们保持了德国那些所谓"有教养的人"几乎完全丧失了的理论感。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么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那么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深入他们的血肉。这个优越之处无比重要，表现在以下的事实中：一方面，英国工人运动虽然在各个行业中有很好的组织，但是发展得非常缓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

对于一切理论的漠视；另一方面，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由于受初始形态的蒲鲁东主义的影响而产生谬误和迷惘，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则由于受经巴枯宁进一步漫画化的蒲鲁东主义的影响而产生谬误和迷惘。

第二个优越之处，就是德国人参加工人运动，从时间上来说，差不多是最迟的。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站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个人的肩上的。虽然这三个人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同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一样，德国的实践的工人运动也永远不应当忘记，它是站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的肩上发展起来的，它能够直接利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而在现在避免它们当时往往无法避免的那些错误。如果没有英国工联运动和法国工人政治斗争的榜样，如果没有特别是巴黎公社所给予的那种巨大的推动，我们现在会处在什么境地呢？

必须承认，德国工人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自己地位的有利之处。自从有工人运动以来，斗争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个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计划地推进。德国工人运动所以强大有力和不可战胜，也正是由于这种可以说是集中的攻击。

一方面由于德国工人具有这种有利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英国工人运动具有岛国的特点，而法国工人运动又受到暴力的镇压，所以现在德国工人是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形势究竟容许他们把这种光荣地位占据多久，现在还无法预先断言。但是，只要他们还占据着这个地位，我们就希望他们能履行在这个地位所应尽的职责。要做

到这一点，就必须在斗争和鼓动的各个方面都加倍努力。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来越彻底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言辞的影响，并且时刻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来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不断增强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团结。虽然在1月份投票赞成社会党人的选民已经是一支相当庞大的队伍，但是他们还远远没有构成德国工人阶级的多数；而且，在农村居民中宣传的成就虽然很令人振奋，但正是在这方面仍有无数的事情要做。因此，不能在斗争中懈怠下来，而必须从敌人手中把城市和选区一个接一个地夺取过来。但是，首先必须维护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容许产生任何爱国沙文主义，这种精神欢迎无产阶级运动中任何民族的新进展。如果德国工人将来继续这样发展下去，那么虽然不能说他们一定会走在运动的最前列（只是某一个国家的工人走在运动的最前列，这并不符合运动的利益），但是毕竟会在战斗行列中占据一个光荣的地位；而将来如果有出乎意料的严峻考验或者重大事变要求他们表现出更大的勇气、更大的决心和毅力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有充分的准备。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74年7月1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74年7月1日

载于1875年在莱比锡出版的《德国农民战争》第3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8卷翻译

德国农民战争

德国人民也有自己的革命传统。在历史上德国也产生过能和其他国家最优秀的革命人物媲美的人才；在历史上德国人民也曾表现出韧性和毅力，如果是在一个中央集权程度较高的国家，这种韧性和毅力会创造出极其辉煌的成果；在历史上德国农民和平民所怀抱的理想和计划，常常使他们的后代为之惊惧。

历时两年的斗争过去以后，目前几乎到处都是一片消沉。在这种情况下，把伟大的农民战争中那些笨拙的，但却顽强而坚韧的形象重新展现在德国人民面前，是很合时宜的。自从农民战争以来，300年过去了，有些事物已经改变；然而农民战争同我们今天的斗争相去并不甚远，要反对的敌人大部分还是相同的。我们将会看到，1848年和1849年到处叛变的那些阶级和那些阶级中的某些集团，其实早在1525年就已经是叛徒了，不过当时是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而已。如果农民战争中的暴烈行动在近几年的运动中仅仅在局部地区，即在奥登林山、黑林山和西里西亚才得到应有的重视，那么这无论如何不能说是现代暴动的优点。

一

我们现在先简单地回顾一下16世纪初期德国的状况。

德国工业在14和15世纪已经相当繁荣。城市行会手工业已经取代封建的地方性的农村工业，并且已经为较广大的地区，甚至为较远的市场从事生产。粗毛呢和亚麻布的织造这时已经成为固定而又分布很广的工业部门；就连比较精细的毛织品和亚麻织品以及丝织品也已经在奥格斯堡织造出来。除了纺织业以外，那些靠中世纪末期僧侣的和世俗的奢侈生活来维持的工艺品生产部门，例如金银加工业、雕塑和雕花业、铜版雕刻和木板雕刻业、武器锻造业、奖章制作业、旋工行业等等，也都蒸蒸日上。一系列或多或少具有重要意义的发明大大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其中具有光辉历史意义的是火药①和印刷术的发明。商业也同工业齐头并进。汉撒同盟[152]垄断海上航路达百年之久，从而确保整个德国北部脱离了中世纪的野蛮状态；虽然从15世纪末起，汉撒同盟由于英国人和荷兰人的竞争已经开始急剧衰落，而且当时已经有华斯哥·达·伽马的发现，但是，从印度到北方诸国的通商大道还是要经过德国，奥格斯堡依然是意大利丝织品、印度香料以及黎凡特的一切产品的庞大的集散地。德国南部的城市，尤其

①恩格斯在1875年版上加了一个注："现在已经毫无疑义地证实，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从阿拉伯人那里同火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的。"——编者注

是奥格斯堡和纽伦堡，是当时著名的富饶繁华的中心。原料开采业也有了显著的发展。德国矿工在15世纪已经是世界上最熟练的矿工；城市的繁荣也使农业摆脱了中世纪的最初的粗陋状态。人们不仅开垦了大片的荒地，而且种植了染料植物以及其他引进的作物，对这些作物的精心栽培，使农业普遍得到了有益的促进。

然而，德国国民生产的高涨仍然赶不上其他国家生产高涨的步伐。农业远远落后于英国和尼德兰，工业远远落后于意大利、佛兰德和英国，而在海外贸易中，英国人，尤其是荷兰人已经开始排挤德国人。人口依然很稀少。在德国境内，文明的景象仅仅散见于几个工商业中心及其周围地区；就是这几个中心，利益也极不一致，几乎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共同点。南部的贸易联系和销售市场同北部毫不相同；东部和西部几乎没有任何往来。没有一个城市像英国的伦敦那样发展成为全国工商业的中心。国内的全部交通几乎只限于沿海和内河航路，以及由奥格斯堡和纽伦堡经过科隆到尼德兰、经过爱尔福特到北方的几条通商大道。一些较小的城市远离内河和通商大道，被排斥在频繁的贸易往来之外，没有受到任何外来影响，继续在中世纪末期的生活条件下艰难度日，很少需要外来商品，也很少输出产品。在农村居民中，只有贵族才同外界保持较为广泛的接触，才会产生新的需求；农民群众从来不曾逾越最邻近的地方关系，他们的视野也从来没有超出与此相应的地方范围。

在英国和法国，工商业的高涨促使各种利益在全国范围内联结在一起，因而促成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而在德国，却只是环绕着一些地方中心按照省区结合成利益集团，因而造成政治上的四分五裂。紧跟着又因德国被排挤出世界贸易之外，于是这种四分五裂的局面很快就固定了下来。随着**纯粹封建**帝国的解体，维系整个帝国的纽带松

散了，直属帝国的大采邑领主们几乎变成了独立的诸侯，一方面是许多帝国直辖市结成联盟，另一方面是帝国骑士们结成联盟，他们时而相互对抗，时而同诸侯或皇帝对抗。帝国当局对自己的地位已经失去信心，它惶惑不定地摇摆于帝国的各种势力之间，因而日益丧失威信；它企图像路易十一那样实行中央集权，但是，尽管采用了各种阴谋诡计和残暴手段，结果也只是维系住奥地利的世袭领地[153]，除此之外一无所成。在这种混乱局面中，在相互交错的无数冲突中，最后赢得胜利而且稳操胜券的人，就是在四分五裂局面下实行集权的代表人物，也就是在地方和省区实行集权的代表人物，即**诸侯**。同这些诸侯相比，皇帝本人日益变得像一个普通的诸侯。

在这种情况下，从中世纪保留下来的各个阶级的地位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除了原有的阶级之外，又形成了一些新的阶级。

从上层贵族中出现了**诸侯**。他们几乎完全脱离皇帝而独立，并且已经掌握大部分主权。他们自行宣战与媾和，拥有常备军，召开邦议会，征收赋税。他们已经把很大一部分下层贵族和城市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他们还不断使用一切手段吞并其余的帝国直辖市和男爵领地。他们对这些城市和男爵领地实行集权，而对帝国当局却主张分权。他们对内部的统治已经十分专横，多半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召集等级会议。他们任意地征收赋税和搜刮钱财；等级会议对征税的批准权很少得到承认，更少见诸执行。即使在等级会议执行这种征税批准权的时候，诸侯通常也总是依靠骑士和高级教士这两个等级而拥有多数，而这两个等级都是既免税而又分享税收的。诸侯由于生活奢侈和宫廷耗费日增，由于要供养常备军，还由于政府的开支不断增加，因而对钱财的需要日益迫切。赋税重担有增无已。城市多半因享有特权而免去了这个负担；于是整个赋税的重担都落到了农民身上，

既落到诸侯的农庄雇农身上，也落到农奴、依附农以及对诸侯履行采邑义务的骑士的佃农身上。[154]在直接税不够用的地方，就实施间接税；财政上用尽心机巧立名目，以期填补国库亏空。如果一切都无济于事，再没有什么可资弥补，也再没有任何一个独立的帝国直辖自由市愿意借贷，那么他们就在币制上使出最肮脏的手法，铸造劣币，强制抬高或降低币值，一切都以国库的方便为转移。拿城市特权和其他特权来做交易，然后又强行收回，以便再以更高的价钱卖出；把反对派的任何一种图谋都用来作为口实，进行各种各样的勒索和掠夺；所有这一切，都是当时的诸侯通常谋取收入的财源。甚至连司法也是诸侯经常出卖的一种不可小看的货色。当时的臣民除了承受上述负担之外，还得满足诸侯属下的官吏的私欲，总之，他们实在尝够了这种"慈父般的"政府所赐予的恩泽。

中世纪封建等级制度中的中层贵族几乎已经完全绝迹；中层贵族不是上升为独立的小诸侯，就是降入下层贵族的行列。**下层贵族**，即**骑士等级**，迅速走向没落。很大一部分骑士已经完全陷于贫困，只靠从军或担任文职为诸侯效力来维持生活；另一部分骑士还对诸侯履行采邑义务而听其调遣；还有较少一部分骑士是直属皇帝的帝国骑士。军事技术在发展，步兵作用日益增大，火器已经得到改进，这一切使骑士这种笨重的骑兵在军事上失去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他们的城堡也不再是不可攻克的了。正如纽伦堡的手工业者一样，骑士也由于工业的进步而成了多余的人物。骑士等级对金钱的渴求，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他们走向毁灭。随着社会向前发展，城堡里的生活变得日益奢侈，比武会和庆宴场上竞相炫耀豪华的风气越来越盛，武器和马匹的价格越来越高，而骑士和男爵们的收入来源却很少增加或根本没有增加。专为掠夺和勒索而出击，或拦路行劫，以及诸如此类的高尚

勾当，都日渐变得十分危险了。他们自己属下的臣民提供的杂捐和贡赋很难比往日增多。为了应付不断增长的需要，这些尊贵的老爷们不得不采取同诸侯一样的手段。贵族榨取农民的手段一年比一年更加刁钻。农奴们被榨尽最后一滴血，依附农则在各种各样的借口和名目下被加上新的杂捐和贡赋。徭役、地租、土地税、接租费、死亡税[155]、保护金[156]等等，都不顾一切原有契约的规定而任意增加。法庭拒绝受理案件，而且专干受贿敲诈的勾当。骑士再也想不出法子榨取到农民的钱财时，就不问青红皂白地把农民投入牢狱，然后再强迫农民把自己赎出来。

下层贵族和其余各个等级也同样不能和睦相处。对诸侯履行采邑义务的贵族企图使自己直接从属于帝国，直属帝国的贵族则企图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因此他们都同诸侯不断发生冲突。僧侣当时表现得高傲狂妄，他们在骑士的心目中已经完全成为多余的等级；骑士羡慕僧侣拥有大片庄园，羡慕他们由于坚持独身和遵守教规而积累起来的财富。[157]骑士同城市不断发生纠纷；他们向城市借债，他们靠洗劫城市所辖地区，靠抢劫城市商旅，靠在冲突中从城市抓获人质、收取赎金来维持生活。金钱问题越是成为骑士等级生死攸关的问题，骑士等级反对其余等级的斗争也就越激烈。

僧侣是中世纪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代表，他们也同样感受到了这种历史转折的影响。书刊印刷业的兴起和商业发展的需要，不仅打破了僧侣对读书写字的垄断，而且也打破了他们对较高层次的文化教育的垄断。在知识领域也出现了分工。新兴的法学家等级把僧侣从一系列最有影响的职位中排挤出去了。这部分僧侣从此也就成了多余的人；他们自己也承认这一事实，因为他们日益变得无所事事、愚昧无知。但是，这些人越是显得多余，其人数也就越是增多，这是由于

他们拥有巨大的财富，而且还在用一切手段不断增殖财富。

僧侣中有两个极其不同的阶级。僧侣中的封建教权等级构成了**贵族**阶级，包括主教和大主教，修道院院长、副院长以及其他高级教士。这些教会显贵或者本身就是帝国诸侯，或者在其他诸侯手下以封建主身份控制着大片土地，拥有许多农奴和依附农。他们不仅像贵族和诸侯一样肆无忌惮地榨取自己属下的人民，而且采取了更加无耻的手段。他们除了使用残酷的暴力，还玩弄一切宗教上的刁钻伎俩，除了用严刑拷打来威胁，还用革除教籍和拒绝赦罪来威胁，此外还利用忏悔室来玩弄形形色色诡谲的花招，总之是要从他们的臣民身上榨取最后一文钱，以增添教会的产业。伪造文书是这些道貌岸然的人经常乐于使用的欺骗手段。虽然他们除了通常的封建贡赋和地租以外还要征收什一税[158]，但是，所有这些收入还是不够挥霍。于是他们便求助于其他各种手段，通过制造灵验的圣像和圣徒遗物、组织超度礼拜场、贩卖赦罪符，从人民身上榨取更多的财物，而且在长时期内收到了极好的效果。

这些高级教士及其人数众多的、随着政治煽动和宗教煽动的扩大而日益强横的修道士打手队伍，不仅引起了人民，而且也引起了贵族的切齿痛恨。只要他们还直属于帝国，他们就总是诸侯前进的障碍。脑满肠肥的主教、修道院院长以及他们的修道士走卒的奢侈生活引起了贵族的忌妒，激起了人民的愤怒。人民不得不承担他们这种生活的耗费；他们的奢侈生活越是同他们的说教形成鲜明的对照，人民就越是怒不可遏。

僧侣中的**平民**集团是由农村传教士和城市传教士组成的。他们不属于教会的封建教权等级，不能分享教会的财富。他们的工作不大有人过问；虽然他们的工作对教会十分重要，可是在当时却远不像兵

营内的修道士警察活动那样不可缺少。因此，他们的报酬就少得多，其薪俸多半都很菲薄。他们出身于市民或平民，生活状况同群众十分接近，因此他们尽管身为僧侣，还是保持着市民和平民的思想感情。参加当时的运动，在修道士中间只是例外，而在传教士中间却很普遍。他们为运动贡献出理论家和思想家，其中许多人都成了平民和农民的代表，并为此而牺牲在断头台上。人民对僧侣的憎恨只是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才指向他们。

正如在诸侯和贵族之上有皇帝一样，在高级僧侣和低级僧侣之上也有**教皇**。正如对皇帝要纳“公捐”[159]，即帝国税一样，对教皇也要纳一般教会税，而教皇就是用教会税去支付罗马教廷的豪华生活费用的。德国由于僧侣人多势众，因此这种教会税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征收得更加认真和严格。特别是在主教出缺后新任者要向教皇交纳上任年贡[160]时，就更是如此。随着需要的日益增长，搜括钱财的新花样也相继发明出来了，诸如贩卖圣徒遗物、收取赎罪金和庆祝费等等。大宗钱财就这样年复一年地从德国流入罗马；由此而增加的沉重负担不仅加深了人们对僧侣的憎恨，而且激发了民族感情，特别是激起了贵族们的民族感情，贵族们在当时是最有民族意识的等级。

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兴盛，中世纪**城市**最初的城关市民[161]中发展出三个截然不同的集团。

高踞在城市社会上层的是**城市贵族**，即所谓“**名门望族**”。他们都是最富有的人家。他们独自操纵市政当局，并占据一切城市官职。因此他们不仅管理，而且也侵吞城市的收入。他们倚仗其财富，倚仗其世代沿袭的、得到皇帝和帝国承认的贵族地位，不仅用各种方式剥削城市公社，而且也剥削隶属于城市的农民。他们用谷物和钱币放高利贷，把各种垄断权强行据为己有，把公社中共同享用城市森林和牧场

的一切权利逐步取消，并把这些森林和牧场直接用来谋取私利；他们擅自在大路、桥头和城门口设置税卡，还征收其他捐税；他们利用行会特权、师傅权、市民权和司法权做交易。他们对待城郊农民并不比贵族和僧侣宽厚；恰恰相反，城市派往乡村的官吏，全都出身城市贵族，他们在征税工作中除了表现出贵族的残酷和贪婪，还带有官僚制度下的精细苛刻作风。通过这类手法聚敛的城市收入，竟听凭这些人极其随意地掌管。市政财务账目纯粹是官样文章，草率紊乱到了极点；侵吞和亏空成了家常便饭。要想了解这个在一切方面都拥有特权、人数较少、靠亲戚关系和利害关系紧密结合起来的特权阶层，在当时是如何轻而易举地从城市收入中大量中饱私囊，我们只要回想一下1848年在许多城市管理机构中揭露出的数不胜数的侵吞诈骗行径，就一目了然了。

城市贵族处心积虑地取消城市公社在各个领域的权利，特别是在财政方面的权利。直到后来，当这些老爷的欺诈行径变得穷凶极恶时，各公社才又行动起来，以期至少要掌握监督市政管理的权利。在大多数城市中，公社也确实恢复了自己的权利。但是，由于各个行会之间争斗不已，由于城市贵族不肯甘休，并受到帝国以及同他们结盟的各个城市政府的保护，这些出身于城市贵族的市政会成员便通过巧取豪夺，很快又在实际上恢复了他们原有的独占统治地位。16世纪初期，在所有的城市中，公社都重新回到反对派的地位。

在城市中，反对城市贵族的反对派分为两个集团，这两个集团在农民战争中态度都十分鲜明。

市民反对派，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自由派的前身，它包括比较富裕的市民和中等市民，以及一部分小市民。这部分小市民的人数随各地情况不同而多少不等。市民反对派完全是在合法基础上提出要求。

他们要求通过公社大会本身或是通过公社代表机构(扩大的市政会、公社委员会),去监督市政管理并分享立法权;其次,他们要求对城市贵族任人唯亲和少数家族独揽大权的状况加以限制,这种状况甚至在城市贵族内部也日益明显了。此外,市民反对派至多还要求由他们中间的市民在市政会里担任几个职位。这个反对派有时也有城市贵族中的心怀不满和潦倒没落的团体参加进来。在所有正规的公社大会中,在各个行会中,这个反对派都占大多数。而市政会的支持者和较激进的反对派合计起来在真正的**市民**中只占绝对少数。

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这个"温和的"、"合法的"、"富裕的"、"有教养的"反对派如何在16世纪的运动中扮演了同他们的后代门徒——立宪派——在1848和1849年的运动中一模一样的角色,并且取得了完全相同的成就。[162]

此外,市民反对派还很激烈地反对僧侣,僧侣的奢靡生活和放荡行为使他们深恶痛绝。他们要求采取措施对这些尊贵人士的卑劣行径加以惩处。他们要求废止僧侣的独立审判权和免税权,并且限制全体修道士的人数。

平民反对派是由没落的市民和没有市民权的城市居民群众构成的。这些没有市民权的群众包括:手工业帮工、短工以及在城市发展较低阶段出现的人数众多的早期流氓无产阶级。一般说来,流氓无产阶级是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社会发展阶段都出现过的现象,只是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罢了。而正是在当时,由于社会中封建制度的崩溃,那些没有固定职业或者没有固定住所的人就大量增加,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每一种行业、每一个生活领域都是无数特权把持的禁地。在所有发达的国家中,流浪者的人数从来都没有像16世纪上半叶那么多。这些流浪者,一部分在战争期间参加了军队,另一部分到处行乞,

还有一部分在各城市靠做短工以及其他不属于行会的工作以糊口。所有这三部分流浪者都在农民战争中扮演了某种角色：第一部分参加了镇压农民的诸侯军队；第二部分参加了农民秘密结社和农军，在这里，他们随时都在产生涣散斗志的影响；第三部分参加了城市派别斗争。然而不可忘记，这个阶级中的大部分人，尤其是住在城市的那一部分人，当时基本上还保持着纯朴的农民本性，还远没有发展到今天开化了的流氓无产阶级这种卑贱和堕落的地步。

可见，当时城市中的平民反对派是由很复杂的成分组成的。它把旧封建行会社会的没落成分，同处于萌芽状态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刚刚崛起但尚未发展的无产阶级成分结合起来了。一方面是陷入贫困境地的行会师傅，这些人由于享有特权还同当时的市民社会秩序血肉相连；另一方面是被驱逐的农民和被辞退的侍从人员，这些人还不可能变成无产者。介于二者之间的是帮工，这些人暂时还没有取得正式的社会地位，在当时那样的工业发展阶段，在行会特权还存在的情况下，他们的生活状况最接近无产阶级；但同时也正由于这种行会特权的关系，这些人差不多都是未来的市民师傅。因此，这个由各种成分混合而成的人群，其党派倾向当然是非常不稳定的，而且是因地而异的。在农民战争以前，平民反对派在政治斗争中不是作为一个派别出现，而只是作为市民反对派的尾巴出现，他们吵吵嚷嚷，一心只想攫取财物，为了几桶葡萄酒就可以供人驱使。农民的起义才使他们成为一个派别，而即使在这个时候，他们的要求和行动仍然几乎处处都以农民为转移——这正是当时城市还紧紧依赖农村的一个明显证据。一旦他们以独立姿态出现，他们就要求确立城市手工业在农村的垄断地位，就不愿意免除郊区的封建负担而使城市收入减少，以及其他等等。总而言之，就这一点来说，他们是反动的，他们为自身的

小资产阶级本性所支配，从而为最近三年来现代小资产阶级在民主招牌下演出的悲喜剧揭开了典型的序幕。

只是在受闵采尔直接影响的图林根和其他某些受他的弟子直接影响的地方，城市平民集团才被卷入整个风暴，以致其中处于萌芽状态的无产阶级成分比运动中的其他一切集团都暂居上风。这段插曲构成了整个农民战争的最高潮，它的中心是农民战争中最伟大的人物**托马斯·闵采尔**，可是这段插曲为时极其短暂。城市平民集团势必垮得最快，同时，他们势必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幻想的色彩，他们的要求也必然表达得极其含糊，所有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正是他们这一集团最缺乏牢固的基础。

处于所有这些阶级（平民反对派除外）之下的，就是这个民族中遭受剥削的广大群众——**农民**。压在农民头上的是社会的各个阶层：诸侯、官吏、贵族、僧侣、城市贵族和市民。无论农民是属于一个诸侯、一个帝国直属贵族、一个主教、一个寺院，还是属于一个城市，他们都毫无例外地被当做一件东西看待，被当做牛马，甚至连牛马都不如。如果他们是农奴，那就得无条件地听从主人支配。如果他们是依附农，契约规定的法定负担已经压得他们透不过气了，可是这些负担还在一天天加重。他们必须以绝大部分时间在主人的田庄上劳动；而他们在少量的自由时间里的劳动所得，还要用来缴纳什一税、地租、土地税、财产税、远征税（战争税）、邦税和帝国税[159]。农民若不向主人送钱，非但不能结婚，连死也不行。除了常规徭役以外，农民还要为老爷采集干草、草莓、越桔、蜗牛壳，驱赶野兽以供打猎，为主人砍柴等等。捕鱼和打猎都是主人才可以干的事；如果野兽践踏了农民的庄稼，农民只许眼睁睁地看着。农民的公社牧场和林地几乎到处都被主人强占。主人像支配财产一样任意支配农民及其妻女的人身。主人享

有初夜权。主人可以任意把农民投入监牢；在监牢中，正如今天一定有预审法官等着一样，当时一定有刑具等着农民。主人可以任意把农民打死，或者把农民斩首。加洛林纳法典[163]中的那些含有惩戒意义的条款提到了"割耳"、"割鼻"、"剜眼"、"断指断手"、"斩首"、"车裂"、"火焚"、"夹火钳"、"四马分尸"等等，其中没有一项不被这些尊贵的老爷或保护人随心所欲地用来对付农民。谁来保护农民呢?法庭上坐着的都是权贵、僧侣、城市贵族或律师，他们深知拿了钱就该办什么事。帝国官场中各等级本来就是靠从农民身上吮血吸髓过活的。

农民对这种可怕的压迫恨得咬牙切齿，可是要让他们举行起义却很困难。他们散居各地，要取得任何共同协议都无比困难。农民世世代代习惯于逆来顺受；在许多地区，已经禁绝使用武器；剥削的严酷程度随着主人的不同而有轻有重；所有这些情况，都促使农民默然忍受。因此，我们在中世纪可以找到很多局部性的农民暴动，但是——至少在德国——在农民战争以前，遍及各地的、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却一次也找不到。与农民对峙的是诸侯、贵族和城市的有组织的力量，他们相互结盟，严阵以待，这种情况一日不变，农民就不可能独立进行革命。农民只有同其他等级结成联盟才有胜利的机会；但是，既然所有其他等级一齐剥削农民，农民如何去同他们联合呢?

可见16世纪初期帝国的各个不同等级——诸侯、贵族、高级教士、城市贵族、市民、平民和农民，形成了一种极其杂乱的人群，他们的要求极其悬殊而又错综复杂。每一等级都妨碍着另一等级，都同所有其他等级进行不断的、有时公开有时隐蔽的斗争。整个民族分裂为两大营垒的情形，在法国第一次革命爆发时曾经出现过，目前在最进步的国家中正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出现，但是在当时德国的条件下是完全不可能的。只有当这个民族中遭受所有其他等级剥削的最下

层人民，即农民和平民起来暴动的时候，那种分裂为两大营垒的情形才稍有可能出现。今天的德意志民族是由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构成的，这种状况远不像当时那样复杂。我们如果回想一下过去两年中这种阶级结构竟造成了怎样的混乱，那么，对于那个时代各种利害关系、各种见解和各种意图纷纭错杂的情况，就不难理解了。

二

由于存在着地方分权以及地方和各省的独立地位，由于各省工商业彼此隔绝，由于交通条件恶劣，当时那么多的等级几乎不可能归并成较大的集团。这种归并是在宗教改革时期随着革命的宗教政治思想的普遍传播才开始出现的。赞成或者反对这些思想的各个等级（当然只是很费劲地而且勉强地）把全民族集结成三大营垒，即天主教或反动营垒、路德的市民改良营垒、革命营垒。这次全民族大分化并不彻底，而且在第一第二两大营垒中还有一部分成分是相同的，这是因为从中世纪沿袭下来的大多数正式的等级此时已经处于解体状态；又因为地方分权状态使同样的等级在不同的地方暂时向完全相反的方向前进。我们在过去几年常常有机会在德国见到这类十分相似的事实，因此，在16世纪更为复杂的情况下，各个等级和阶级之间看来混淆不清的现象就不会使我们感到惊奇了。

虽然有了最近的经验，但是照德意志意识形态看来，把中世纪送入坟墓的那些斗争仍然只不过是激烈的神学上的争论。在我们的爱国的历史学家和聪明的政治家们看来，只要那个时代的人能够对天国事物取得一致的认识，他们就毫无理由去为人间的事物争吵了。这些意识形态家实在轻信，总是把某一个时代关于本时代的一切幻想当做确凿的事实，或者把某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家们关于那个时代的一切幻想当做确凿的事实。例如，正是这帮人把1789年革命看

成只不过是对于立宪君主制优于专制君主制问题的激烈辩论，把七月革命[38]看成只是关于“神授”君权无法继续这一问题的实际争执，把二月革命[4]看成只是解决“要共和制还是要君主制?”这一问题的尝试，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其实在这些大震荡中，始终贯穿着**阶级斗争**，而且每次写在旗帜上的政治口号都是阶级斗争的赤裸裸的表现，可是对于这些阶级斗争，我们的意识形态家们甚至直到今天还几乎一无所知，虽然关于阶级斗争的信息不仅从国外频频传来，而且从成千上万的国内无产者发自底层的抱怨和愤怒声中也清晰可闻。

16世纪的所谓宗教战争首先也是为着十分实际的物质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这些战争同后来英国和法国的国内冲突完全一样，都是阶级斗争。如果说这些阶级斗争当时是在宗教的标志下进行的，如果说各阶级的利益、需要和要求都还隐蔽在宗教外衣之下，那么，这并没有改变事情的实质，而且也不难用时代条件来加以解释。

中世纪完全是从野蛮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学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从没落的古代世界接受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丧失文明的城市。其结果正如一切原始发展阶段的情形一样，僧侣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在僧侣手中，政治和法学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不过是神学的分支，一切都按照神学中适用的原则来处理。教会的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个法庭都具有法律效力。甚至在法学家已经形成一个等级的时候，法学还久久处于神学控制之下。神学在知识活动的整个领域的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威，同时也是教会在当时封建统治下万流归宗的地位的必然结果。

显然，这种情况下，一切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全面攻击必然首

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而一切革命的、社会和政治的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了有可能触犯当时的社会关系，就必须抹掉笼罩在这些关系上的灵光圈。

反封建的革命反对派活跃于整个中世纪。随着时代条件的不同，他们或者是以神秘主义[164]的形式出现，或者是以公开的异教的形式出现，或者是以武装起义的形式出现。说到神秘主义，大家知道，16世纪的宗教改革派同它有着很深的依赖关系；就连闵采尔也从神秘主义中吸取了许多东西。至于各种异教，其中一部分是实行宗法制的阿尔卑斯山牧民反对封建势力侵入他们生活的表现（韦尔登派[165]）；一部分是越出封建制度的城市同封建制度对抗的表现（阿尔比派[166]、布雷西亚的阿尔诺德[167]等等）；一部分是农民直接暴动的表现（约翰·保尔[168]、皮卡第地方的匈牙利牧师[169]等等）。韦尔登派的宗法制异教，同瑞士人的暴动完全一样，无论就形式还是就内容来看，都是阻碍历史运动的一种反动企图，而且只有地方性的意义，所以在这里不必多谈。在其余的两种中世纪异教形态中，我们看到，早在12世纪就已经出现了市民反对派和农民平民反对派大规模对立的先兆，农民战争后来就是由于这种对立而归于失败的。这一对立贯穿于整个中世纪末期。

城市的异教——这是中世纪真正公开的异教——主要是反对僧侣，对他们的豪富殷实和政治地位进行抨击。正如现在资产阶级要求一个廉价政府一样，中世纪市民首先要求一个廉价教会。市民异教同所有把教会和教条的发展仅仅看成是一种蜕变的异教一样，从形式上来看是反动的，它要求恢复原始基督教的简单教规，要求取消自成一统的僧侣等级。实行这种廉价措施，就会取消修道士，取消高级教士，取消罗马教廷，一言以蔽之，就会取消教会中一切耗费钱财的东

西。这些城市虽然还处于君主保护之下，但它们本身已经是共和国，它们在对教皇权力进行攻击时，就第一次以一般形式提出：资产阶级统治的正常形式是共和国。这些城市之所以对一系列教条和戒律如此敌视，一部分可以由上述情况来说明，一部分也可以由当时城市的其他生活条件来说明，例如，为什么这些城市要如此激烈地反对独身制度呢?其中的道理没有人比薄伽丘说得更清楚了。这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意大利和德国有布雷西亚的阿尔诺德，在法国南部有阿尔比派，在英国有约翰·威克利夫[170]，在波希米亚有胡斯和加里克斯廷派[171]。至于反对封建制度的反对派在这里只是以反对**教会**封建势力的反对派姿态出现，其理由十分简单，因为各城市都已经被承认为等级，它们已经能够运用武力或在等级会议中以足够的力量去反对世俗的封建势力及其特权了。

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无论在法国南部，还是在英国和波希米亚，绝大部分下层贵族在反对僧侣的斗争中和从事异教活动时都加入城市一方。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下层贵族依赖城市，也是由于在面对诸侯和高级教士时，下层贵族和城市有着共同的利益。这种现象我们在农民战争中还会见到。

另一种异教则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这种异教是农民和平民的要求的直接表现，并且几乎总是同起义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异教虽然也同意市民异教关于僧侣、教皇权力以及恢复原始基督教教规的一切要求，但是它却走得更远。它要求在教区成员间恢复原始基督教的平等关系，要求承认这种关系也是市民间的准则。它从“上帝儿女的平等”得出有关市民平等的结论，甚至已经部分地得出有关财产平等的结论。它要求贵族同农民平等，要求城市贵族和享有特权的市民同平民平等，它要求取消徭役、地租、捐税、特权，要求至少消除那些极其

悬殊的贫富差别——这些要求，都是带着或多或少的明确性提出来的，而且被说成是原始基督教教义的必然结论。这种农民平民异教，在封建制度全盛时期，例如在阿尔比派中，还不易同市民异教相区别，但是到了14和15世纪，它就发展成一种与市民异教截然不同的派别见解了，这时，农民平民异教通常总是完全独立地出现，同市民异教并立。例如在英国，在威克利夫运动之外有瓦特·泰勒起义[172]的传教者约翰·保尔。又如在波希米亚，在加里克斯廷派之外有塔博尔派[173]。在塔博尔派里，甚至已经在神权政治的掩饰下出现了共和制倾向，而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德国的平民代表人物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倾向。

有些神秘主义宗派的狂想就同上述这种异教形式结合在一起，例如鞭笞派[174]、罗拉德派[175]等等的狂想就是如此。这些宗派在被迫害时期还继续保持着革命传统。

平民在当时是完全被排斥于正式存在的社会之外的唯一阶级。他们处于封建组织之外，也处于市民组织之外。他们既没有特权，又没有财产；他们甚至不如农民和小市民，连一点带着沉重税负的产业也没有。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既没有产业又没有权利的。他们的生活条件甚至同当时的公共机构毫无直接关系，这种公共机构完全不理会他们。他们是封建社会和行会市民社会解体的生动的象征，同时又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最初的先驱者。

从平民的这种地位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平民集团早在当时就不可能仅限于反对封建制度和享有特权的城关市民[161]，为什么这个集团——至少在幻想里——甚至已经超出当时刚刚萌生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为什么这个完全无产的集团早在当时就必然对一切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社会形式所共有的公共机构、观点和看法提出疑问。原始基督教中的锡利亚式狂想[176]同这类想法就很容易联系起来。但

是，这种超越不仅超出了现在，甚至超出了未来，因此，它只能是武断的、空想的超越，而在第一次付诸实践的尝试之后，就不得不退到当时条件所容许的有限范围中去。对私有制的攻击，对财产公有制的要求，都必然烟消云散，结果出现的只是原始的慈善团体；意义模糊的基督教平等，至多只能归结为资产阶级的"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要废除一切官厅，最后变成了要建立民选的共和政府。这种靠幻想来对共产主义所作的预见，在实际上成了对现代资产阶级关系的预见。

这种武断的、但是很容易从平民集团的生活状况中得到解释的对于未来历史的预见，最初出现在**德国**，出现在**托马斯·闵采尔**和他那一派中。诚然，在塔博尔派那里已经存在过一种锡利亚式的财产公有制，但只是作为纯粹军事措施而存在的。直到闵采尔才用这种刚刚萌生的共产主义思想来表达一个现实的社会集团的要求，直到闵采尔才以一定的明确性把它表达出来；自闵采尔以来，民众在每一次动荡中都出现这种思想，直到它渐渐同现代无产阶级运动合流为止。这种情况，正如中世纪自由农民反对封建统治日益加紧束缚的斗争同农奴和依附农为完全打破封建统治而进行的斗争合流一样。

在三大营垒中的第一营垒即**保守的天主教营垒**中，集结了所有希望维持现状的势力，即帝国政府、僧侣诸侯以及一部分世俗诸侯、富裕贵族、高级教士、城市贵族；而聚集在**市民阶级温和派路德**改革旗帜下的是反对派中的有产者势力，即大量的下层贵族、市民阶级，甚至还包括一部分希望通过没收教会财产中饱私囊并想乘机脱离帝国羁绊而扩大独立地位的世俗诸侯。至于农民和平民则组成了**革命派**，其要求和理论都由闵采尔作了极其鲜明的表述。

路德和闵采尔，无论就其理论来说，还是就其性格和行动来说，都不折不扣地代表着他们各自的派别。

路德在1517年到1525年这几年间所经历的转变，恰恰就是现代德国立宪派从1846年到1849年所经历的转变，也恰恰就是一切资产阶级党派目前正在经历的转变，这些资产阶级党派一度被推到运动的领导地位，但在这种运动中一转眼就被站在它背后的平民党派或无产阶级党派抛到后面去了。

当路德在1517年开始反对天主教会的教条和制度的时候，他的反对立场还根本没有明确的性质。这种反对立场没有超出以往的市民异教所提出的要求的范围，可是，它没有也不可能排斥任何一种更为激进的思潮。因为在最初它不能不把一切反对派势力团结起来，不能不表现出最坚决的革命魄力，不能不代表迄今所有的异教去同天主教正宗信仰对抗。我们的自由派资产者恰恰就是这样，他们在1847年还是革命的，还自命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还热衷于工人阶级解放事业。路德在他活动的最初阶段，以无比激烈的方式表现出他那强健有力的农民本性。

> “如果他们〈罗马僧侣〉还要继续逞凶肆虐，我以为只有请国王和诸侯采用暴力，武装自己，讨伐这些毒害整个世界的恶人，**不用语言而用武器**去制止他们的罪行，除此而外，简直没有更好的办法和药方来遏制这种暴虐行径。我们既然用刀剑惩治盗贼，用绞索惩治杀人犯，用烈火惩治异教徒，为什么不**运用一切武器**来讨伐这些身为教皇、红衣主教、大主教而又伤风败俗、教人作恶的丑类，以及罗马罪恶城中的所有奸邪之徒，并**用他们的血来洗净我们的双手呢？**”①

但是早期的这种火一般的革命热情并没有维持多久。路德放出的闪电引起了燎原烈火。全体德国人民都投入了运动。一方面，农民与平民把路德反对僧侣的号召和关于基督教自由的说教看成是起

①威·威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1年斯图加特版第1卷第364—365页。——编者注

义的信号；另一方面，较温和的市民和一大部分下层贵族也站到了路德一边，甚至诸侯也被卷进了这个潮流。农民与平民认为向一切压迫他们的人进行清算的日子来到了；而市民、贵族和诸侯只想剥夺僧侣的权力，摆脱对罗马的依附，废除天主教教阶制度，并且没收教会财产而大发横财。两派势力壁垒分明，并且各自找到了自己的代表人物。路德不得不在两派中进行抉择。这个受到萨克森选帝侯①保护的人，这个维滕贝格的名教授，这个一鸣惊人、声势煊赫而被一群趋炎附势之徒簇拥着的大人物，毫不踌躇地抛弃了运动中的下层人民，倒向了市民、贵族和诸侯一边。剿灭罗马的号召销声匿迹了；现在路德吹起了**和平发展**和**消极抵抗**的调子（见1520年《给德意志基督教贵族的公开信》等文件）。当胡登邀请路德前往贵族密谋反对僧侣和诸侯的中心埃伯恩堡去同他本人和济金根见面时，路德回答道：

> “我不希望人们**靠暴力和流血来维护**福音。世界是靠圣经来征服的，教会是靠圣经来维持的，也还是要靠圣经来复兴。反基督的人们不用暴力而取得一切，同样，他们也将在不施暴力的情况下自取灭亡。”②

从路德发生了这样的转变时起，或者更确切些说，从路德比较清楚地确定了方向时起，就开始了那一场讨价还价的争论，以决定教会机构和教条哪些需要保留，哪些需要改革；就开始了那一场施展权术、妥协变通、玩弄阴谋和握手成交的丑恶把戏，其结果就是奥格斯堡告白[177]，也就是经过讨价还价而最终议定的改革后的市民教会的

①弗里德里希三世。——编者注

②威·威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1年斯图加特版第1卷第366页。——编者注

章程。正是这种肮脏的交易，近来又令人作呕地以政治形式在德国国民议会、协商议会、宪法审查会议以及爱尔福特议会中重演。官方宗教改革的市侩性质在这类交易中表现得最为露骨。

路德如今公然成了市民阶级改革的代表人物，他鼓吹合法的进步是有他的理由的。当时多数城市已经倾向于温和的改革；下层贵族参加温和改革的越来越多，一部分诸侯也随声附和，另一部分诸侯则举棋不定。至少在德国的大部分地区，温和的改革可以说已经稳操胜券。如果形势继续和平地发展下去，其余地区也不能长久抵挡温和反对派的进逼。但是，任何激烈的动荡都必然促使温和派同激进的平民农民派发生冲突，必然导致诸侯、贵族和一些城市退出运动，其结果不是市民派被农民与平民所压倒，就是参加运动的所有派别一齐被天主教复辟势力所镇压，二者必居其一。资产阶级政党只要稍微取得一点点胜利，就立即企图利用合法进步的手段周旋于革命的岩礁和复辟的漩涡之间[178]。这种情况，我们在最近时期也屡见不鲜。

在当时的一般社会政治条件下，任何一种变动的结果都必然有利于诸侯，必然加强诸侯势力；市民阶级的改革也同样如此，它越是明显地脱离平民和农民群众，便越要落在改革派诸侯的控制之下。路德本人已经日益变成了诸侯的奴仆，而民众也很清楚应该怎么办，他们说，路德也同其他一些人一样，变成了诸侯的仆人；民众还在奥拉明德追击路德，向他投掷石块。

当农民战争在诸侯和贵族绝大部分都信天主教的地区爆发时，路德企图采取调解的态度。他极力攻击这些地区的政府，认为起义是由于他们施行苛政而引起的；并不是农民要反对他们，而是上帝本身要反对他们。另一方面，在他看来起义当然也是亵渎上帝、违反福音

二

的。最后他劝告双方让步，实行和解。①

但是，这种好意的调解建议无济于事，起义还是迅速蔓延开来，甚至席卷了路德派诸侯、贵族和城市所统治的新教地区，很快就冲出了市民阶级"慎重考虑"的改革的范围。闵采尔所领导的最坚决的一支起义队伍就把大本营设在最靠近路德的图林根。如果再取得一些进展，整个德国就会烽火漫天，路德就会陷入重围，人们也许就会手持长矛驱逐他这个叛徒，市民阶级的改革就会被农民平民革命的洪流冲垮。在这种时候，就再也没有什么慎重考虑的余地了。在革命面前，一切旧仇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同农民暴徒相比，罗马罪恶城的奴仆们都成了无罪的羔羊，成了上帝的温顺的孩子；市民和诸侯、贵族和僧侣、路德和教皇都联合起来"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179]。路德大声疾呼：

> "凡是力所能及的人，都应当**用秘密的或者公开的方式**，去**戳碎**他们，**扼死**他们，**刺死**他们，就像必须打死**疯狗**一样！""所以，亲爱的先生们，想想办法吧，救救局势吧，凡是力所能及的人，都来刺死他们，击毙他们，扼死他们吧。如果你因此而死，那么你将无比荣幸，死得其所。"②

路德认为，决不可对农民乱发慈悲。谁怜悯上帝所不怜悯的人，谁怜悯上帝所要惩罚和毁灭的人，谁就是置身于叛乱者的行列。如果农民只须交出一头牛，就可以安然享用另一头牛，他们就会感谢上帝；诸侯们要从这次叛乱事件中认识到，贱民头脑里想的是什么，对于他们，只能用暴力来进行统治。③

---

①马丁·路德《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1525年维滕贝格版。——编者注

②马丁·路德《1525年5月30日给约翰·吕埃尔的信》，见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3年斯图加特版第3卷第713页。——编者注

③马丁·路德《就反对农民的小册子发的通函》1525年版。——编者注

“圣人说：驴子需要的是吃草、负重和挨鞭。而农民需要的是吃糠咽菜，他们不听圣经，十分愚蠢，所以必须让他们听听鞭声和枪声，他们活该如此。我们应当为他们祈祷，使他们俯首听命；如果他们竟敢违抗，那就不必再讲什么慈悲。**让他们尝尝枪林弹雨的滋味吧**，否则他们还会干出千百倍的坏事来呢。”①

当无产阶级在三月革命[53]以后要求分享胜利果实的时候，先前曾标榜社会主义和博爱的那些资产者恰恰就是用这样的腔调来讲话的。

路德通过翻译圣经给平民运动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武器。他在圣经译本中使公元最初几个世纪的纯朴基督教同当时已经封建化了的基督教形成鲜明的对照，提供了一幅没有层层叠叠的、人为的封建等级制度的社会图景，同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形成鲜明的对照。农民利用这种武器从各方面反对诸侯、贵族、僧侣。而现在路德竟把这一武器掉转过来反对农民，他从圣经中拼凑了真正的赞美诗去歌颂那些由上帝委派的当权者，这是任何一个舔食专制君主残羹的臣仆从来没有能够做到的。神授君权、唯命是从，甚至农奴制度都由圣经认可了。在这方面，不仅农民起义，就连路德本人对教会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反抗活动也被全盘否定；这样，路德不仅把下层人民的运动，而且连市民阶级的运动也出卖给诸侯了。

资产者最近又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否定自己过去所作所为的实例，这些难道还要一一列举吗？

现在让我们把平民革命家**闵采尔**和市民宗教改革家路德作一番对比。

托马斯·闵采尔大约在1498年[180]生于哈茨山麓的**施托尔贝格**。相传他的父亲死在绞刑架下，成了施托尔贝格伯爵淫威的牺牲品。

---

①马丁·路德《1525年5月30日给约翰·吕埃尔的信》，见威·威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3年斯图加特版第3卷第714页。——编者注

闵采尔早在15岁时就在哈雷中学组织秘密团体反对马格德堡大主教①,并反对整个罗马教会。他在当时神学领域的渊博知识使他早就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取得了哈雷的一个女修道院神父助手的职位。在这里,他已经以极端蔑视的态度对待教会教条和仪式;在举行弥撒的时候,他根本不朗诵把圣餐酒饼化为基督血肉的祷词,照路德描写他的话来说,他是以不信教的态度把圣体吃掉了②。他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中世纪神秘主义者,特别是卡拉布里亚人约雅敬撰写的论述锡利亚教义[176]的著作。在闵采尔看来,约雅敬所宣告和描绘的千年王国[181]以及对堕落教会和腐败世界的末日审判,随着宗教改革以及当时遍及各地的风潮而即将来临。他的布道在周围地区受到了热烈欢迎。1520年,他作为第一个宣讲新教教义的布道者前往茨维考。在那里,他遇到了狂热的锡利亚教派中的一支,这个教派在许多地区秘密地坚持活动,过去,他们一度做出卑微恭顺、与世无争的姿态,以掩盖最下层社会对现状的日益强烈的反抗;而现在,随着鼓动工作不断加强,他们已经越来越公开而顽强地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了。这个教派就是再洗礼派[182],其领导者是尼克拉斯·**施托尔希**[183]。他们宣称末日审判和千年王国的实现已为期不远,他们能够"见神、通神并且传达神谕"。不久他们就同茨维考市政会发生冲突;虽然闵采尔从未无条件地参加这一派,相反,倒是这一派受了他的影响,但闵采尔仍然出来保护他们。市政会采取坚决行动反对他们;他们不得不离开这座城市。闵采尔也同他们一道离去。这些事发生在1521年底。

闵采尔来到布拉格,同胡斯运动的余部取得联系,力图在这里

①恩斯特第二。——编者注

②《马丁·路德论温克尔麦斯的信》,见威·威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2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第55页。——编者注

立足。他发表了宣言①，但结果只是使他不得不又逃出波希米亚。1522年他在图林根的阿尔施泰特城担任布道者。他在这里开始对礼拜仪式进行改革。路德还不敢做的事他已经付诸实施。他完全不用拉丁文，而且在规定宣读礼拜日福音书和使徒书信的时候，他也不只宣读这两部分而是宣读全部圣经。同时他又组织了附近地区的宣传工作。人民从四面八方来归附他，不久阿尔施泰特就成为整个图林根下层民众反对僧侣的运动的中心。

当时闵采尔主要还是神学家；他所攻击的对象几乎还只是僧侣。但是，他却不像路德当时所做的那样，提倡平心静气的辩论与和平的进步，而是把路德早期那种激烈的布道继续下去，并号召萨克森诸侯和人民起来用武力对付罗马僧侣。

> "基督说过：我不是带着和平，而是带着刀剑来的。但是你们〈萨克森诸侯〉要刀剑干什么呢？你们如果要做主的仆役，那就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去驱除妨害福音的恶魔。基督十分严肃地下了命令（见《路加福音》第19章27节）：把我那些仇敌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 不要有这种浅陋的看法，认为此事应靠主的力量去完成，而不需要你们手持刀剑予以协助，果真如此，你们的刀剑就要在鞘中生锈了。凡是违背主的启示的人，都必须消灭掉，而不予任何宽赦，就像希西家、居鲁士、约西亚、但以理和以利亚消灭侍奉巴尔的僧侣们一样，否则基督教会就不会恢复本来面目。我们必须在收获的时节在主的葡萄园里拔除莠草。主在摩西《申命记》第7章说过：你们不可怜恤不跟从主，而去侍奉其他神的人，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偶像，这样我才不会怒斥你们。"②

---

①托·闵采尔《布拉格宣言》，见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2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第64—67页。——编者注

②托·闵采尔《对诸侯讲道。解释〈但以理书〉第二章，由上帝的代言者托马斯·闵采尔在阿尔施泰特宫对积极的、可敬的诸侯们和萨克森的执政者们进行讲解》。——编者注

二

但是，对诸侯提出的这些要求并无结果，而与此同时，人民中的革命激情却一天比一天高涨。闵采尔的思想越来越犀利，也越来越果敢，于是他坚决地同市民阶级宗教改革分道扬镳，从此之后他就同时直接以政治鼓动家的姿态出现了。

他的神学—哲学理论不仅攻击天主教的一切主要论点，而且也攻击整个基督教的一切主要论点。他利用基督教形式宣讲一种泛神论，这种泛神论同近代的思辨观点[184]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有些地方甚至已经接近无神论。他既否认圣经是唯一的启示，也否认圣经是无误的启示。照他看来，真正的、生动活泼的启示是理性，这种启示曾经存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之中，而且现在依然存在。他认为，如果把圣经同理性对立起来，那就意味着以经文扼杀圣灵。因为圣经所宣讲的圣灵并不是我们身外的存在物；圣灵本来就是理性。信仰无非是理性在人身上的复苏，因此非基督徒同样可以有信仰。通过这种信仰，通过这种复苏的理性，人人可以有神性，人人可以升入天堂。因此天堂并不是什么彼岸世界的事物，天堂必须在此生中寻找，信徒的使命就是要把天堂即天国在人世间建立起来。既然无所谓彼岸的天堂，当然也就无所谓彼岸的阴间或地狱。同样，也就没有什么魔鬼，有的只是人的邪念和贪欲。基督同我们一样也曾是人，不过他是先知和师长，他的圣餐其实只是简单的纪念宴会，在宴会上大家享用的饼和酒并没有加入任何神秘的佐料。

近代哲学曾经在一段时期里不得不以基督教辞令作掩饰，闵采尔宣讲上述这些教义也大半是以同样的基督教辞令为掩饰。但他的著作到处都流露出他那极端异教的基本思想，可以看出，闵采尔对这件圣经外衣的态度远不像近代某些黑格尔门徒那样郑重。然而在闵采尔与近代哲学之间却相隔300年之久。

闵采尔的政治理论是同他的革命的宗教观紧密相连的；正如他的神学远远超出了当时流行的看法一样，他的政治理论也远远超出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正如他的宗教哲学接近无神论一样，他的政治纲领也接近共产主义。甚至在二月革命前夕，许多近代共产主义派别拥有的理论武库还不如16世纪“闵采尔派”的理论武库那么丰富。闵采尔的纲领，与其说是当时平民要求的总汇，不如说是对当时平民中刚刚开始发展的无产阶级因素的解放条件的天才预见。这个纲领要求立即在人间建立天国，建立早已预言的千年王国，其途径是恢复教会的本来面目，并废除同这种似乎是原始基督教会而实际上是崭新的教会相冲突的一切机构。闵采尔所理解的天国不是别的，只不过是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那里不再有阶级差别，不再有私有财产，不再有对社会成员而言是独立的和异己的国家政权。闵采尔认为，当时所有的政权，只要是不依附、不参与革命的，都应当推翻，一切劳动和一切财产都应当具有公共的性质，必须实行最完全的平等。为了不仅在整个德国，而且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实现这一切，必须建立一个同盟；必须邀请诸侯和封建主都来参加；如果他们拒绝，同盟就应当不失时机地用武器去推翻或消灭他们。

闵采尔随即着手组织这个同盟。他的说教具有更加激烈、更加革命的性质；除了攻击僧侣以外，他还以同样慷慨激昂的情绪来猛轰诸侯、贵族、城市贵族。他以火辣的笔调刻画出当时的压迫，并把他想象中的实行社会共和平等的千年王国同当时的压迫加以对比。与此同时，他写的革命小册子一个接一个地发表；他向四面八方派出密使，而他本人则留在阿尔施泰特及其周围地区进行组织同盟的工作。

这种宣传的第一个成果，是捣毁了阿尔施泰特附近梅勒巴赫的圣母教堂，这是按照圣诫行事的：“你们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

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偶像，因为你们是圣洁的人民。”（《申命记》第7章第5节）萨克森诸侯亲自到阿尔施泰特去平息这次骚乱，并且把闵采尔传唤到城堡里去。闵采尔在那里宣读了一篇布道词，这样的布道词是诸侯们从路德这个“维滕贝格的行尸走肉”（闵采尔对路德的称呼）那里从来没有听见过的。闵采尔主张杀掉那些不敬上帝的统治者，特别是要杀掉那些把福音书当做异端邪说的僧侣和修道士，为此，他援引新约作为根据。他说，不敬上帝的人都不该有生存的权利，除非得到上帝选民的恩赦。如果诸侯不消灭这些不敬上帝的人，那么上帝将从他们手里夺去宝剑，**因为用剑之权属于全体教徒**。诸侯和封建主就是盘剥、偷盗和掠夺的祸首；他们把一切造物——水中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植物，统统攫归己有。然后他们却向穷人们宣讲清规戒律：你不应该偷窃。而他们自己却是见东西就拿，对农民和手工业者敲骨吸髓；农民和手工业者只要误取一丝一毫，就得上绞架，这时那位撒谎的博士[①]就对这一切祈祷一声：阿门。

“穷人仇恨封建主，这是封建主自己造成的。他们不愿意消除骚乱的根源，年深月久，局势怎么会安定呢？啊！亲爱的封建主，要是我主拿着铁杖把这些旧壶破罐横扫一通，那该多好啊！我说了这些话，会有人说我是大逆不道。是就是吧！”（见威美尔曼《农民战争》第2卷第75页）

闵采尔把这篇布道词付印了；他在阿尔施泰特的承印者受到萨克森约翰公爵的惩罚而被驱逐出境，闵采尔本人的一切著作都必须交付魏玛公爵政府检查。但是他不理会这个命令。他随即把一篇万分激昂的著作[②]拿到帝国直辖市米尔豪森付印，在这篇著作里，他要求

①“撒谎的博士”是闵采尔对马丁·路德的蔑称。——编者注

②托·闵采尔《根据路加对福音的证明来公开驳斥不忠实世界的错误信仰，使可怜的和不幸的基督教界知道它的迷途》。——编者注

人民

“把口子打大些，让全世界的人都清清楚楚地看到，究竟是哪些权贵亵渎神明，把上帝变成画像上的小人物。”

他用下面的话来结束这篇著作：

“整个世界必须经受一次巨大的冲击；这将是一场较量，它将使不敬上帝的人垮台而使卑贱的人翻身。”

在封面上，“带着铁锤的托马斯·闵采尔”写了一段警语：

“请你注意，我已经把话向你讲清楚了，我今天已经把你置于人们和帝国之上，为的是你能去根除、破坏、击溃、颠覆，同时还能去建设、种植。一道抵御君主、诸侯、僧侣而又护卫人民的铁壁已经形成了。他们要战就战吧，胜利是惊人的，不敬上帝的强悍暴君一定灭亡。”①

闵采尔同路德及其党羽之间的裂痕早就存在了。路德曾迫不得已接受某些教会改革，这些改革都是闵采尔撇开路德而自行实施的。路德怀着温和改革派对较坚决的急进派恼怒和猜疑的心情去观察闵采尔的行动。早在1524年春季，闵采尔就已经写信给梅兰希顿这个心胸狭窄、思想顽固、蛰居书斋的典型人物，指出他和路德根本不理解这场运动。他们企图以死背圣经字句的方式窒息运动，他们的全部教义都已经陈腐不堪。

“亲爱的兄弟们，不要再等待和踌躇了，时机已经到了，夏天已经来临。请不要同不敬上帝的人为友，他们在阻挠圣经发挥全部力量。请不要对你们的诸侯

①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2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第77—78页。——编者注

阿谀逢迎，否则你们自身将与他们同归于尽。你们这些温文尔雅的人士，幸勿见责，我实在不能不如此。”①

路德不止一次地要求同闵采尔公开辩论；但是，闵采尔虽然时刻准备在人民面前应战，却毫无兴趣在维滕贝格大学有偏见的听众面前参与一场神学的争吵。他不愿意“只向高等学校证实圣灵的力量”②。他表示，如果路德真有诚意，就应当运用他的影响去制止对闵采尔著作承印者的迫害，取消书刊检查令，以便论战可以毫无阻碍地通过出版物充分展开。

在上述闵采尔的革命小册子印行以后，路德就以告发者的姿态公开出来反对闵采尔了。他印发了《为反对叛逆的妖精致萨克森诸侯书》，称闵采尔为撒旦的工具，要求诸侯采取措施，将这些煽动叛乱者驱逐出境，其理由是他们不以宣讲邪恶教义为满足，还号召人们起来暴动，以暴力反抗官厅。

8月1日，闵采尔不得不在魏玛宫廷的诸侯面前就指控他密谋作乱一事进行答辩。人们揭发了一些事实，使他陷入极为窘迫的境地；原来他的秘密同盟已经被发觉，他同矿工和农民的组织联系也被发觉。当场就有人用驱逐出境来威胁他。他刚刚回到阿尔施泰特，就听说萨克森的格奥尔格公爵要求引渡他；原来他亲笔写的同盟书信被截走了，他在书信里要求格奥尔格的臣民起来武

---

①托·闵采尔《1522年3月27日给菲力浦·梅兰希顿的信》，见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2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第76页。戚美尔曼错把日期写成1524年3月29日。——编者注

②托·闵采尔《根据路加对福音的证明来公开驳斥不忠实世界的错误信仰，使可怜的和不幸的基督教界知道它的迷途》，见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2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第77页。——编者注

装反抗福音的敌人。要不是他已经离开了该城，市政会就会把他引渡过去。

在这期间，农民和平民中的鼓动热潮日益高涨，使得闵采尔的宣传工作进行得极为顺利。闵采尔把再洗礼派争取过来，作为宣传工作的极宝贵的代言人。这个教派本来没有确定成文的教义，他们只是通过反对一切统治阶级的共同立场，通过再洗礼的共同象征而结合起来的；他们在生活上力修苦行，在鼓动方面狂热不倦，勇敢无畏；这一派人日益紧密地团结在闵采尔周围。由于遭受种种迫害，他们居无定所，在整个德国到处漂泊，到处宣讲新的教义，因为闵采尔在这种教义中明确地表达了他们自身的需要和愿望。他们当中有无数的人遭受刑讯，被火焚，或死于其他酷刑之下，但是这些密使坚贞不屈；在人民的激情迅速高涨的过程中，他们的活动取得了无法估量的成就。因此闵采尔从图林根逃跑出来的时候，到处都找得到现成的立足之地，他随便走到哪里，都可以得到帮助。

闵采尔首先来到纽伦堡[185]。约在一个月以前，该城附近刚刚有一次农民起义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闵采尔就在此地暗中进行鼓动；马上就有一些人出来拥护他那十分大胆的神学主张，都认为圣经没有绝对约束力，圣礼[186]毫无价值可言，并且宣称基督也不过是一个人，而世俗官厅的作威作福乃是对上帝的亵渎。路德大叫："看吧，撒旦又在这里出没了，那个来自阿尔施泰特的妖精！"①闵采尔把他的答路德书②在纽伦堡付印。他直截了当地指责路德向诸侯献媚，指

①马丁·路德《1525年2月4日给约·布里斯曼的信》，见威·威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2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第81页。——编者注

②托·闵采尔《为反驳维滕贝格的不信神、生活安逸、以歪曲方式剽窃圣经从而使可怜的基督教惨遭玷污的人而作的立论充分的抗辩和答复》。——编者注

责他虎头蛇尾，支持反动派。尽管如此，人民仍将获得解放，那时路德博士的处境将如被擒之狐。——这篇文章被市政会下令没收了，闵采尔又被迫离开纽伦堡。

闵采尔于是穿过士瓦本到阿尔萨斯和瑞士，然后再回到黑林山南部。这个地区早在数月以前就已经爆发了起义，他的再洗礼派密使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这次起义的进程。闵采尔的宣传旅行，对于人民派的组成，对于这个派的要求获得明确提法，对于起义最后在1525年4月全面爆发，显然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闵采尔在这次旅行中在两方面起了特别显著的作用，一方面是对人民，当时人民唯一能领会的语言是宗教预言，闵采尔就用这种语言对他们进行诱导；另一方面是对志同道合的人们，闵采尔能坦率地同他们畅谈自己的最终目的。闵采尔当初在图林根的时候就已经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批最坚决的人，这些人不仅来自民间，而且也有些是低级僧侣，他就用这一批人去领导秘密组织；现在，闵采尔已经成为德国西南部整个革命运动的核心人物，从萨克森和图林根，到法兰克尼亚和士瓦本，直到阿尔萨斯和瑞士边境，他都建立了组织联系，德国南部的鼓动家，如瓦尔茨胡特的胡布迈尔、苏黎世的康拉德·格雷贝尔、格里森的汉斯·雷布曼、梅明根的沙佩勒尔、莱普海姆的雅科布·韦厄和斯图加特的曼特尔博士，都成了他的弟子和同盟的首领，这些人大多是革命的教士。他本人多半逗留在沙夫豪森边境的格里森，由此出发巡游黑高和克莱特高等地区。惶惶不安的诸侯和封建主到处对这个新的平民异教进行血腥的迫害，反而使平民派的反抗精神更加昂扬，使他们的团结更加巩固。闵采尔在德国南部进行鼓动近五个月之久，并在密谋接近实现的时刻又回到图林根。他要在这里亲自领导起义，详情后面再谈。

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这两派首脑人物的品性和行为是如何忠实地反映出本派的立场；路德的动摇不定的态度，他在运动发展的严峻时刻所怀的恐惧心理，以及他投效诸侯的卑劣行径，如何同市民阶级优柔寡断、模棱两可的政治态度完全合拍；闵采尔的革命气魄和果断精神如何在最先进的平民和农民集团中得到发扬。他们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路德只满足于表达本阶级大多数人的想法和愿望，借以在本阶级内部沽钓极其廉价的声誉；而闵采尔则相反，他远远超出平民和农民的直接想法和要求，并且只从当时的革命队伍中挑选优秀分子组成一派，这一派既要站在他那样的思想高度，又要具有他那样的魄力，这样一来，这一派就始终只占起义群众的极少数。

三

胡斯运动被镇压下去以后约50年，处于萌芽状态的革命精神就在德国农民中间显出了最初的征兆[①]。

1476年，在维尔茨堡主教管区出现了最初的农民密谋活动，这是一个早已被胡斯战争，“被暴政、苛捐、杂税、争斗、敌视、战争、烧杀和监禁等等”[②]弄得一贫如洗，而又不断遭到主教、僧侣、贵族无耻搜刮的地区。一个年轻的牧人兼乐师，**尼克拉斯豪森的汉斯·伯海姆**，人称**吹鼓手小汉斯**，忽然以预言者的身份出现于陶伯河谷。他说圣母马利亚曾在他面前显灵；圣母叫他把鼓烧掉，不要再为跳舞和邪恶的狂欢伴奏，而要劝告人民忏悔。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洗刷自己的罪过，戒除尘世虚浮的欲念，抛弃一切浮华的饰物，到尼克拉斯豪森去朝拜圣母，以求赦罪。

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在运动的第一个先驱者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中世纪一切带着宗教色彩的起义以及近代任何无产阶级运动的初期都具有的那种禁欲主义。这种严格的禁欲主义的道德规范，这种摒弃一切人生享受和娱乐的要求，一方面是要针对统治阶级而确立斯

①我们在纪年上沿用了威·威美尔曼的材料，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在国外缺少足够的资料，而威美尔曼的材料也已经能完全满足本书的要求。

②见威·威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1年斯图加特版第1卷第118页。——编者注

巴达式的平等原则，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必经的阶段，不经过这个阶段，社会的最底层是决不能发动起来的。社会的最底层要展示自己的革命毅力，要明确自己同其他一切社会成员处于敌对的地位，要使自己集结成一个阶级，就必须一开始就彻底抛弃自己身上还能同现存社会制度和平相处的一切；就必须放弃那些使深受压抑的生活有时尚堪忍受的一点点乐趣，放弃连最残酷的压迫也不能剥夺的一点点乐趣。这种**平民的和无产阶级的禁欲主义**，无论就它的粗犷狂热形式来看，还是就它的内容来看，都和市民阶级的、路德派的道德以及英国的清教徒[187]（不同于独立派[188]和更激进的各教派）所鼓吹的市民阶级禁欲主义大不相同；市民阶级禁欲主义的全部奥秘不过是**市民阶级的节俭**而已。此外，显而易见，这种平民无产阶级的禁欲主义将随着下述两种情况的出现而失掉其革命性质：一方面，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消费资料无止境地增加，因而使斯巴达式的平等成为多余；另一方面，随着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日益革命化，无产阶级本身也就日益革命化。这样一来，这种禁欲主义就将逐渐从群众中销声匿迹；就是在那些坚持这种禁欲主义的教派分子那里，它也直接演变为市民阶级的吝啬之风，或者演变为一种矫揉造作的骑士式的道德规范，而实际上也不过是一种小市民的、行会手工业者式的鄙吝习气而已。无产阶级群众既然几乎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割舍，那就无须再对他们进行什么禁欲的说教了。

吹鼓手小汉斯的忏悔说教深得人心；所有的起义预言者都是从这种说教开始活动的。事实上，只有猛烈地振臂高呼，只有突然抛弃习以为常的整个生活方式，才能把没有联系、散居四方、并且从小习惯于盲目服从的农民发动起来。到尼克拉斯豪森去朝圣的活动开始了，而且规模迅速扩大；人民越是大批地涌来，这位年轻的造反者就

越是公开地宣布他的计划。他在布道时说，尼克拉斯豪森的圣母向他宣告，从今以后不应该再有皇帝，也不应该再有诸侯、教皇以及其他教会或世俗的权贵；人人都应该是兄弟，人人都应该靠自己双手劳动为生，任何人都不应该比别人占有更多的东西。一切地租、土地税、徭役、关税、赋税以及其他杂捐和贡赋都应该永远废止；各处的森林、河流、牧场都应该自由使用。

人民以喜悦的心情接受了这个新福音。这位预言者即"圣母使者"很快就名扬四方。一批批朝圣者从奥登林山，从美因河、科赫尔河、亚格斯特河一带，甚至从巴伐利亚、士瓦本和莱茵河地区向他涌来。人们辗转传述他所创造的奇迹；人们跪倒在他面前并向他祈祷，就像向圣者祈祷一样；人们争相拔取他的帽子上蓬乱的绒毛，就仿佛得到了圣物和护身符。僧侣出来反对他，把他的目睹神灵的本领说成是鬼怪的妖术，把他的奇迹说成是恶魔的诈骗，但是这一切都是枉然。信仰者急剧增加，革命的教派开始形成，这个造反的牧人的礼拜日布道竟吸引了4万多人齐集尼克拉斯豪森。

吹鼓手小汉斯一连几个月向群众布道。但是，他的目的并不限于布道。他同尼克拉斯豪森的教士秘密交往，还同两个骑士秘密交往。这两个骑士就是孔茨·冯·图恩费尔德和他的儿子，他们都接受新教义，而且预定担任计划中的起义的军事首领。在圣基利安节前的礼拜日，吹鼓手小汉斯终于觉得自己的势力已经足够强大，于是发出了信号。在布道结束时，他说：

"现在你们回家吧，回去仔细想想至圣至尊的圣母向你们宣告了什么。下礼拜六，请你们把妇女、小孩和老人都留在家里；而你们，男人们，在圣玛加累特节，就是下礼拜六，再到尼克拉斯豪森来。把你们的弟兄和朋友都约请来，越多越好。但你们来时不要拿朝圣手杖，而要全副武装，一手拿朝圣的蜡烛，一手拿

剑和矛或戟。到时候，圣母将要向你们宣告她希望你们做什么。”①

可是，在农民大批到来之前，主教②的骑兵已经在夜间把这位反叛的预言者抓去，并把他带到维尔茨堡的城堡里去了。在预定起事的那一天，大约来了34 000名武装农民，但是，他被捕的消息使农民们感到十分沮丧。绝大部分人纷纷散去；较坚定的一部分人集结了将近16 000名群众，在孔茨·冯·图恩费尔德和他的儿子米夏埃尔率领下一同来到城堡前。主教许下各种诺言劝说他们回家；可是，他们刚刚开始散去，就遭到主教骑兵的袭击，很多人被捕，两个人被斩首，吹鼓手小汉斯本人则被烧死。孔茨·冯·图恩费尔德逃脱了，直到他把全部财产交给修道院，才允许他回来。后来到尼克拉斯豪森朝圣的活动还继续了一些时候，但最后还是被镇压下去了。

在这第一次发动起义的尝试之后，德国又沉静了较长一段时间。直到90年代末，新的农民起义和密谋才又开始。

1491—1492年荷兰农民举行起义，在海姆斯凯尔克会战中被萨克森的阿尔布雷希特公爵镇压下去；同一时期，上士瓦本肯普滕修道院管区的农民也举行过起义；1497年前后夏尔德·埃尔瓦领导了弗里斯兰起义③，结果也遭到了萨克森的阿尔布雷希特的镇压；所有这些起义，我们就不一一论述了。一则因为这些起义离真正的农民战争的战场太远，再则因为它们迄今都是自由农民反对企图把封建制度

①威·威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1年斯图加特版第1卷第121—122页。——编者注

②鲁道夫第二·冯·谢伦贝格。——编者注

③弗里斯兰农民起义于1500年爆发。“1497年前后”是恩格斯从威·威美尔曼的著作中引用来的。——编者注

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斗争。我们现在就来谈谈为农民战争作了准备的两大密谋组织:**鞋会**和**穷康拉德**。

在尼德兰导致农民起义的那一次物价猛涨,于1493年在阿尔萨斯促使农民和平民建立了一个秘密同盟,参加这一同盟的还有地道的市民反对派中的人物,甚至一部分下层贵族也或多或少地同情这个同盟。同盟的所在地是施勒特施塔特、苏尔茨、丹巴赫、施托茨海姆和舍尔韦勒等地区。这些谋反者要求掠夺和消灭在当时和现在都一贯通过高利贷榨取阿尔萨斯农民脂膏的犹太人,要求举行一次把所有债务都一笔勾销的欢乐年,要求取消关税、杂捐以及其他各种负担,要求撤销教会法庭和罗特韦尔帝国法庭,要求征税批准权,要求把僧侣的薪俸限定在每人50—60古尔登,要求废除秘密忏悔,要求在每个教区都建立独立的、通过自行选举组成的法庭。谋反者的计划是,一旦力量足够强大,就袭击城防坚固的施勒特施塔特,没收修道院金库和城市金库,并从该城发难,在整个阿尔萨斯发动起义。预定在起义时刻打出的同盟旗帜,上面画着一只系着长长的皮带的农民鞋,这就是所谓的**鞋会**[*Bundschuh*],从这时起,到以后20年间,农民在密谋造反时都以此为标志和名称。

谋反者常常在夜间到僻静的洪格贝格山上集会。入会时要举行极其秘密的仪式,并且规定,如有背叛行为,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尽管如此,在1493年复活节前一周,正当谋反者准备向施勒特施塔特发动攻击的时候,事情还是泄露了。官方马上采取行动,许多谋反者被捕,遭到严刑拷打,有的人被肢解或斩首,有的人被砍掉双手或指头,驱逐出境。一大批人逃往瑞士。

但是,鞋会经受这第一次镇压之后并没有被消灭。相反,这个组织还是秘密地继续存在,而且,许多散居于瑞士和德国南部的流亡者

都变成了密使，他们到处都发现同样的压迫激起了同样的起义情绪，因而就乘机扩建鞋会组织，使它遍布于现今的巴登全境。德国南部的农民坚韧不拔、百折不挠，从1493年起，他们就密谋造反，历时30年之久；他们克服了分散居住的农村生活方式对于建立人数众多而集中的联合组织所造成的重重障碍，在无数次遭到镇压和失败以及首领被杀之后，仍然再接再厉，重整旗鼓，直到最后大规模起义的机会来到——这种顽强坚韧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1502年，包括布鲁赫萨尔区在内的施派尔主教管区已经出现了秘密的农民运动的迹象。鞋会在这里实际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组。大约有7 000人加入了鞋会组织，总部设在布鲁赫萨尔和魏恩加滕之间的下格龙巴赫，其分支在莱茵河下游遍及美因河一带，溯河而上则直达封疆伯爵领地巴登。他们的条款规定：不再向诸侯、贵族和僧侣缴纳任何息金、什一税、赋税或关税；废除农奴制度；**没收**寺院以及其他**教会财产分给人民，除皇帝以外不承认其他任何统治者。**

我们在这里看到，农民第一次提出了将教会财产收归俗用以造福人民和建立统一而不可分的德意志君主国这两项要求。从这时起，这两项要求经常由比较先进的农民和平民集团提出，直到托马斯·闵采尔把**分配**教会财产的要求转变成**没收**教会财产以利于实行**财产公有制**的要求，并把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要求转变成建立统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的要求为止。

再度兴起的鞋会同原先的鞋会一样，也有秘密的集会地点，有保密的誓约，有入会的仪式，有鞋会的旗帜，上面写着“上帝的公道高于一切！”它的行动计划同阿尔萨斯鞋会的计划相似。计划规定，要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夺取大多数居民都已经加入鞋会的布鲁赫萨尔，要在那里组成一支鞋会军队，并且把这支军队派去作为周围各诸侯领

地的一个流动性的集合中心。

有一个谋反者在忏悔时把上述计划告诉了教士，于是，这个教士把计划披露了。各地政府立即采取对策。阿尔萨斯的各帝国等级和士瓦本联盟[189]对此都深感震惊，由此可以看出鞋会组织分布之广。当局调集军队，大肆逮捕。马克西米利安皇帝，这“最后一个骑士”，颁布了极其残忍的惩治法令来对付农民的闻所未闻的行动。农民在各处集合，进行武装反抗；可是分散的农民队伍毕竟不能持久。谋反者有的被处死刑，有的逃跑了；但是因为严守秘密，所以大部分谋反者，甚至包括首领在内，都还能留在本地或者邻近的封建主的领地，完全没有受到惊扰。

在再次遭到失败之后，阶级斗争似乎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趋于平息。而实际上，斗争仍在悄悄地继续进行。早在16世纪最初几年，穷康拉德就已经在士瓦本建立了组织，它显然同被驱散的鞋会会员有联系；在黑林山地区，鞋会以单个小组的形式继续存在，直到十年以后，出现一个活动能力很强的农民领袖，才把分散的线索重新联结起来，组成一个巨大的密谋团体。在1513—1515这几年动荡不宁的时期，这两个密谋组织相继开始进行公开活动。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瑞士农民、匈牙利农民和斯洛文尼亚农民同时掀起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暴动。

莱茵河上游的鞋会的重建者是下格龙巴赫的**约斯·弗里茨**，他在1502年密谋失败后逃亡，当过兵，是一个在各方面都超群出众的人物。他逃亡以后，在博登湖和黑林山之间的许多地方逗留过，最后在布赖斯高的弗赖堡城附近的莱恩定居下来，甚至在那里当了土地看守人。关于他如何以那里为据点对组织进行改造，如何巧妙地把各式各样人物吸收进组织，在法庭侦查案卷中都有极其有趣的

翔实记载。这位典型的密谋家具有外交才能和百折不挠的毅力，他能够把各个阶级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大批地吸收到鞋会中来，其中有骑士、僧侣、市民、平民和农民；他很可能还组织了各种层次不同的密谋活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他都极其审慎而又练达地加以利用。除了让立场坚定的密使化装成五花八门的人奔走于全国各地之外，他还让一些流浪汉和乞丐去完成不太重要的任务。约斯同乞丐头子们直接往来，并通过他们把人数众多的流浪汉统统掌管起来。这些乞丐头子在他的密谋活动中起了重大的作用。他们都是一些非常奇特的人物：有一个乞丐头子带着一个女孩到处漂泊，诡称女孩的脚受了伤，从而沿街乞讨；他的帽子上有八个以上徽章，其中有“十四救难神”、圣奥迪莉娅、圣母等等，他留着长长的红胡子，拿着一根带匕首和钉子的多节手杖。另一个乞丐头子用圣瓦伦廷的名义要求施舍，拿着香料和苦艾向行人兜售，穿一件铁褐色长外衣，戴一顶红色四角帽，帽上有一个特里安的小娃娃，身边佩着一把长剑，腰带上挂着许多小刀和一把匕首。其他一些乞丐头子则故意露出伤疤，也都穿着类似的古怪服装。在这些乞丐头子中，至少有十个人为了获取2 000古尔登的报酬，奉命将在阿尔萨斯、封疆伯爵领地巴登和布赖斯高这三个地方同时放火，并在察伯恩区的教堂建堂节那一天至少带着他们手下的2 000人到罗森城去，在曾任雇佣兵上尉的格奥尔格·施奈德的指挥下攻取此城。在真正的鞋会会员中间，建立了一处又一处联络站，约斯·弗里茨同他的主要密使——弗赖堡人施托费尔经常骑着马在各处巡回，并在夜间检阅新招来的兵员。关于鞋会在莱茵河上游和黑林山地区的分布情况，法庭侦查案卷中有充分材料可资证明；这些材料中还有这个地区各地的大批会员的名单，并附有各人的形貌特征。其中最多的是

手工业帮工，其次是农民和小店主，还有一些贵族、僧侣（包括莱恩本地的僧侣），以及失业的雇佣兵。我们从这些成员中可以看出，鞋会在约斯·弗里茨领导下已比过去有了很大的发展；城市平民分子已经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密谋组织的分支遍及阿尔萨斯全境，遍及现今的巴登，一直到符腾堡和美因河畔。在偏僻的山上有时举行较大的集会，例如在克尼比斯等等山上都开过会，讨论鞋会的事务。首领们集会时往往约请当地的会员以及较远地区的代表参加，这些集会都是在莱恩附近的哈特马特山上举行的，也正是在这里，通过了鞋会的十四条款：除皇帝和教皇（关于后者是根据几个人的意见）以外不承认其他任何统治者；撤销罗特韦尔帝国法庭，教会法庭只能裁决宗教事务；凡所付息金已同本金数目相等，则不应再付息；利率不得高于5%；自由渔猎，自由放牧，自由伐木；僧侣每人以领一份薪俸为限；没收教会财产和寺院珍宝以充鞋会军费；废除一切不公平的赋税和关税；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实现持久和平；采取有力措施对付鞋会的一切反对者；征收会税；夺取牢固设防的城市弗赖堡作为鞋会的中心；一俟鞋会队伍集结起来，就开始同皇帝谈判，如果皇帝拒绝，就同瑞士谈判——以上就是一致通过的各项条款。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农民和平民的要求已经越来越明确和坚决，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对温和怯懦分子作出相应的让步。

原定在1513年夏末秋初举事。只是鞋会会旗还没有置办，约斯·弗里茨就到海尔布隆去让人绘制会旗。会旗上除了各种徽记图案之外，还画着一只农民的鞋，写着一行字：愿上帝保佑神圣的正义事业。但是，当约斯·弗里茨离开驻地的时候，其他人过早地企图袭击弗赖堡，而且事前走漏了风声，加上宣传工作中的一些疏忽，致使弗赖堡

市政会和巴登的封疆伯爵①发现了线索，最后，由于两个谋反者的叛变，全部密谋计划终于暴露无遗。封疆伯爵、弗赖堡市政会和恩西斯海姆的帝国政府立即出动密探和士兵；许多鞋会会员被逮捕，受刑讯，被处死；可是这一次大多数人，特别是约斯·弗里茨都逃脱了。瑞士各州政府这一回十分凶狠地迫害逃亡者，甚至还处决了许多人。但是，瑞士各州政府同它们的邻邦一样，也无法阻止绝大多数逃亡者继续藏匿在原居留地附近，那些逃亡者后来甚至又渐渐地回来了。最疯狂的是恩西斯海姆的阿尔萨斯政府[153]，它竟下令将很多人处以斩首、车裂、四马分尸等极刑。约斯·弗里茨本人多半藏身于瑞士境内的莱茵河畔，但他常常到黑林山这一边来，而从来没有被抓住过。

瑞士人这一次之所以要同邻邦政府联合起来对付鞋会会员，其原因从第二年即1514年在伯尔尼、索洛图恩和卢塞恩爆发的农民起义②就可以看出。那一次起义彻底扫除了贵族政府和城市贵族。除此以外，农民们还争得了一些特别的权利。瑞士的这些地方性起义之所以取得成功，原因很简单，就是瑞士的中央集权还远不如德国。农民在1525年也到处战胜了地方的统治者，但却被诸侯的有组织的大军击败了，而这种大军在瑞士是不存在的。

在符腾堡形成的第二个密谋组织与巴登的鞋会同时存在，而且显然与该鞋会有直接的联系。据文献记载，这个组织从1503年起就已经存在，因为自从下格龙巴赫人遭到镇压以后，使用鞋会这一名称过于危险，所以这个组织就取名为**穷康拉德**。它的根据地是霍亨施陶芬山麓的雷姆斯河谷，它的存在至少在人民中间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①克里斯托夫第一。——编者注

②这次起义最初于1513年爆发。——编者注

了。乌尔里希政府的无耻压迫以及有力地促使1513年和1514年运动爆发的连年饥馑，都使加入该密谋组织的人数不断增加；新征收的酒税、肉税、面包税以及每一古尔登每年要交一分尼的资本税，导致了运动的爆发。绍恩多夫城的刀匠卡斯帕尔·普雷吉策尔的家是密谋首领的集会地点，他们计划先夺取该城。1514年春，起义爆发了。3 000名农民（一说是5 000名农民）开到城下，但又被公爵的官吏用种种动听的诺言劝退了。乌尔里希公爵在答应废除新税之后就带着80名骑兵匆匆赶来，这时他发现，由于他已经许下诺言，一切都已经归于平静。他许诺召集邦议会来审议一切申诉。但是，密谋组织的首领们深知乌尔里希只不过是在向人民玩弄缓兵之计，一旦招募到足够的军队并把它们调集在一起，他就要毁约并强行征税。因此，他们就从卡斯帕尔·普雷吉策尔的家，也就是从"穷康拉德总部"发出邀请，要求各处派人前来参加同盟代表大会，并且向四面八方派出密使促进这一工作。雷姆斯河谷第一次起义所取得的成就提高了运动在各地人民中间的威信；文告和密使到处受到欢迎，所以，符腾堡各地区派了很多代表参加了5月28日在下蒂克海姆举行的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尽快继续进行鼓动，一有机会就在雷姆斯河谷发难，并从那里使起义向四面八方扩展。当代廷根的一个退伍士兵班特尔汉斯和维尔廷根的一个受人尊敬的农民辛格尔汉斯动员施瓦本山的居民加入组织的时候，起义已经在各地爆发了。虽然辛格尔汉斯遭到袭击并被俘虏，可是巴克南、温嫩登、马克格勒宁根等城市却都落入同平民结盟的农民手中，从魏恩斯贝格到布劳博伊伦，从布劳博伊伦到巴登边境，整个地区都掀起了公开的暴动；乌尔里希不得不让步。但是，他一面宣布6月25日召开邦议会，一面却写信向周围地区的诸侯和自由市求援以平息起义，信中说起义危及帝国境内所有诸侯、官府和名门望

族，还说起义“有俨如鞋会的举动”。

在这期间，邦议会，即各城市的代表和许多要求在邦议会上享有席位的农民的代表已于6月18日在斯图加特开会。高级教士还没有到会，骑士根本没有被邀请。斯图加特的城市反对派以及近在咫尺、声势逼人的莱昂贝格和雷姆斯河谷两支农军都支持农民的要求。农民的代表被邀参加了议会，会上通过下列决议：把公爵手下三个可恨的顾问朗帕尔特、图姆布和洛歇尔撤职查办；由四个骑士、四个市民和四个农民组成一个参事会辅助公爵；发给公爵固定的年俸；没收修道院和寺院的财产以充国库。

乌尔里希公爵用政变的手段对抗这些革命的决议。6月21日，他率领他的骑士和顾问驰赴蒂宾根，高级教士也跟着他赶到那里。他命令市民们也到那里去，市民们也就照办了。于是，他就在那里继续召开没有农民参加的邦议会。在那里，市民们慑于军队的威胁出卖了自己的同盟者——农民。7月8日，达成了蒂宾根协议，规定公爵所负的将近100万的债务均由本邦居民偿还，而公爵本人则应受若干限制，可是他从未遵守这些限制；协议用一些空洞的词句搪塞农民，并且还用严禁暴动和结社的惩治法令对付他们。至于农民在邦议会中的代表权，当然就只字不提了。农民们声讨这种叛卖行径；但是，自从各等级为公爵承担了债务以后，公爵又借到了钱，所以他立即招募军队，而他的邻邦，特别是普法尔茨选帝侯[①]，也派来了援军。这样一来，到7月底，蒂宾根协议就被整个邦所接受，人们又重新宣誓，表示效忠于官方。只有穷康拉德在雷姆斯河谷进行抵抗；公爵亲自驰赴该地，几乎被杀。农民在卡珀尔山扎下了营寨。可是事情拖延下去，大多数起

①路德维希五世。——编者注

义者因缺乏口粮而自行散去，剩下的人也因同几个邦议会议员达成一项模棱两可的协议而各自回家了。这时，各城市都因为自己的要求已经达到，就掉过头来疯狂地反对农民，它们自愿派队伍去增援乌尔里希的军队，于是乌尔里希就毁约袭击雷姆斯河谷，把那里的城市和村庄洗劫一空。1 600个农民被捕，其中有16人立即被斩首，其余的大多数人被判处苛重的罚款，归入乌尔里希的金库。很多人长期被禁锢狱中。当局颁布了严厉的惩治法令，禁止农民重建组织，禁止农民举行任何集会。士瓦本贵族组织了一个专门的联盟以镇压一切起义的尝试。穷康拉德的主要首领们在这期间幸而都逃往瑞士，并且大多数都在几年后又从瑞士陆续回家。

与符腾堡运动同时，在布赖斯高和封疆伯爵领地巴登也出现了新的鞋会反抗运动的征兆。6月间，在比尔附近曾有过起义的尝试，但立即被封疆伯爵菲力浦击溃，其首领巴斯蒂安·古格尔在弗赖堡被捕并被斩首。

就在同一年，即1514年，也是在春天，**匈牙利**爆发了一场全面的农民战争。当时人们正在进行有关十字军征讨土耳其人的宣传。人们同往常一样许诺说，农奴和依附农只要参加十字军就可以获得自由。将近6万人参加了军队，由盖尔盖伊·多扎任指挥；他是塞克勒人[190]，曾在以往历次对土耳其的战争中崭露头角，并因此取得贵族封号。但是，匈牙利骑士和贵族不愿意进行这次十字军征讨，因为这次征讨势必要使他们失去财产和农奴。他们追赶各支农民队伍，采用武力和残暴的手段夺回他们的农奴。当这件事在十字军中传开时，被压迫的农民怒不可遏。劳伦蒂乌斯和瓦尔纳瓦这两个最热忱的十字军传教士发表了革命讲演，使十字军对贵族的仇恨变得更加强烈。多扎本人同他的部队一样痛恨反叛的贵族；十字军变成了革命军，多扎亲自领导

这个新的运动。

多扎同他的农民队伍一起驻扎在佩斯城附近的拉科什原野。他们在附近村落以及佩斯城郊同贵族方面的人员发生冲突，于是就开始了敌对行动；不久就发生了小规模战斗，最后，农民对落入他们手中的所有贵族都采取了西西里晚祷[191]那样的行动，并把附近的所有城堡统统烧光。宫廷出面恫吓，但无济于事。在首都城下对贵族进行第一次人民审判时，多扎就进一步采取行动。他把他的军队分为五路。两路被派往匈牙利北部山区，以便在那里掀起全面暴动并剿灭贵族。第三路由佩斯城的一个市民安布罗什·萨莱雷什指挥，留守拉科什监视首都。第四路和第五路在多扎和他的兄弟格雷戈尔率领下向塞格丁进发。

在这期间，贵族汇集于佩斯城，并向特兰西瓦尼亚总督约翰·扎波略求援。在萨莱雷什带着农民军中的市民阶级分子投敌以后，贵族便同布达佩斯的市民们一起击溃并消灭了驻扎在拉科什的军团。大批俘虏都被残酷地处决，剩下的俘虏则被割去耳鼻遣散回家。

多扎在塞格丁城下战败，转而向乔纳德进发，他在击溃了伊什特万·巴托里和查基主教统率的贵族军队后占领了乔纳德，并对包括主教和王室司库泰列基在内的俘虏进行了流血的镇压，以清算他们在拉科什犯下的严重罪行。多扎在乔纳德宣告成立共和国，宣告废除贵族，宣告人人平等和由人民行使主权，然后向巴托里据守的泰梅什堡进发。但是，在他围困这个要塞达两月之久，并得到由安塔尔·霍苏率领的一支新军的增援时，匈牙利北部的两支军队却经过多次战斗被贵族击败，而约翰·扎波略则率领特兰西瓦尼亚军队向多扎进击。农民遭到扎波略的袭击而溃散了，多扎本人被俘，并被放在烧红的铁椅上炙烤，在他一息尚存时，敌人强迫他的部下来吃他的肉，并规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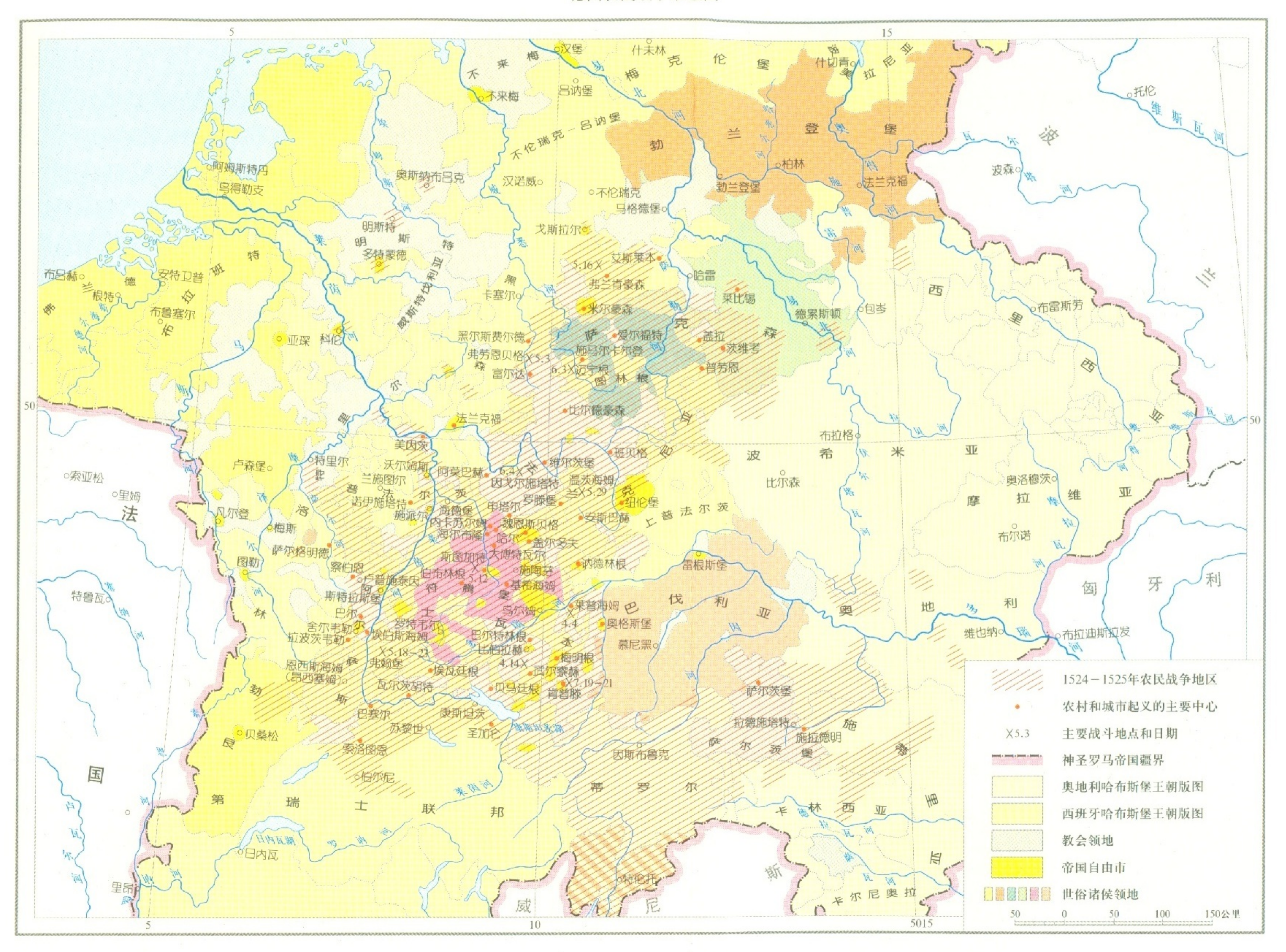
只有吃了他的肉的人才能免受极刑。溃散了的农民由劳伦蒂乌斯和霍苏重新集结起来。但后来又一次被击破，所有落入敌人手中的人都被刺死或被绞死。几千具农民尸体高高挂在路旁，或者挂在已成一片焦土的村庄入口处。据说，战死或被杀的农民竟达6万人。贵族们费尽了心机，要在下次邦议会上把奴役农民再度定为国家的法律。

这一时期在“温迪施边区”（即克恩滕、克赖因和施泰尔马克）爆发的农民起义，是由一个类似鞋会的密谋团体组织的。这个地区受到贵族和帝国官吏敲骨吸髓的盘剥，惨遭土耳其人侵者的蹂躏，饱受饥馑之苦；早在1503年，这里就成立了上述密谋团体，并且举行了一次起义。这个地区的斯洛文尼亚农民和德国农民在1513年又举起了stara prawa（旧权利）的战旗。然而这一年，他们再度接受了和平解决的方案；1514年，当他们以更大的声势集结起来的时候，由于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声明同意恢复旧权利，他们又接受劝告解散了。鉴于上述情况，一再受骗的人民就在1515年春天掀起了一场来势更猛的复仇战争。同匈牙利的情况一样，各处的城堡和修道院都被捣毁，农民陪审法官将被俘的贵族判刑和斩首。在施泰尔马克和克恩滕，帝国步兵统领迪特里希施坦很快就把起义扑灭了。在克赖因，敌人偷袭了赖恩城（1516年秋），接着又采用了与匈牙利贵族的无耻行径如出一辙的无数奥地利式的残暴手段，才把起义镇压下去。

在遭受一连串如此惨重的失败之后，在经受贵族大规模的残酷镇压之后，德国农民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悄无声息了，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密谋活动和局部起义并没有完全绝迹。1516年，鞋会和穷康拉德的大多数逃亡者都已经重返士瓦本和莱茵河上游地区；1517年，鞋会在黑林山又完全恢复活动。约斯·弗里茨本人一直把1513年的鞋会旧旗藏在怀里，随身携带，此刻他又奔走于黑林山各地，积极

活动。密谋活动又重新组织起来了。同四年前一样，人们又预定在克尼比斯山上集会。但是由于人们没有严守机密，政府了解了有关情况，于是便采取措施进行干预。很多人被捕被杀；最积极最能干的会员，包括约斯·弗里茨在内，都不得不逃走。这一次，约斯·弗里茨还是没有被抓住，但是，大概不久以后他就死在瑞士，因为从那以后就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了。

德国农民战争示意图



1524－1525年农民战争地区
农村和城市起义的主要中心
X5.3 主要战斗地点和日期
神圣罗马帝国疆界
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版图
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版图
教会领地
帝国自由市
世俗诸侯领地
50 0 50 100 150公里
勃兰登堡
梅克伦堡
波美拉尼亚
不来梅
不伦瑞克－吕讷堡
威斯特伐利亚
萨克森
图林根
黑森
西里西亚
波希米亚
摩拉维亚
奥地利
巴伐利亚
上普法尔茨
法兰克尼亚
士瓦本
阿尔萨斯
洛林
瑞士联邦
蒂罗尔
萨尔茨堡
施蒂里亚
卡林西亚
卡尔尼奥拉
法国
波兰
匈牙利
汉堡
吕讷堡
柏林
法兰克福
波森
不来梅
不伦瑞克
马格德堡
莱比锡
德累斯顿
布拉格
维也纳
纽伦堡
米尔豪森
弗兰肯豪森
爱尔福特
奥格斯堡
斯特拉斯堡
巴塞尔
苏黎世
伯尔尼
日内瓦
萨尔茨堡
因斯布鲁克
阿姆斯特丹
乌得勒支
亚琛
科伦
明斯特
特里尔
美因茨
沃尔姆斯
海德堡
梅斯
里昂

四

正当鞋会的第四次密谋活动在黑林山遭到镇压的时候，路德在维滕贝格发出了行将席卷各个等级并震撼整个帝国的运动的信号。这个图林根的奥古斯丁派提出的论纲就像闪电击中火药桶一样，引起了大火。[192]骑士和市民，农民和平民，觊觎大权的诸侯和低级僧侣，隐蔽的神秘派和博学多才的、专写讽刺诙谐作品的反对派作家，他们追求的目标千差万别而又纷纭错杂，但路德的论纲一时却成了他们的普遍的、共同的语言，这种共同语言以出人意料的速度使他们团结起来。这个由一切反对派分子仓促形成的联盟虽然没有维持多久，但它却使运动的惊人力量突然地显示出来，而且更迅猛地把运动推向前进。

然而，正是由于运动发展得这样迅猛，运动中潜在的分裂萌芽也就势必很快地发展起来，至少在被鼓动起来的群众中，那些由于自身的整个生活地位而相互直接对立的部分，势必又相互分裂开来，重新回到平常那种彼此敌对的状态。早在宗教改革的最初几年，围绕着两个引力中心的形形色色反对派群众就已经向两极分化了；贵族和市民无条件地团结在路德周围；农民和平民并没有看出路德是自己直接的敌人，但也同从前一样形成一个单独的革命反对派。不过这时的运动已经比路德出场以前要普遍得多，深入得多，因而必然引起两个派别之间的尖锐对立和直接冲突。这种直接对立很快就表面化了。

路德和闵采尔在出版物中和讲坛上展开了斗争；而诸侯、骑士和城市的军队（绝大部分是由路德派或至少是倾向于路德派的分子组成的）则击溃了农民和平民的队伍。

早在农民战争以前，贵族就企图反对诸侯和僧侣以实现自己的要求，这样的企图已经表明，参加宗教改革的各种成分之间的利害和要求究竟有多大分歧。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德国贵族在16世纪初期处于什么地位。他们正沦为日益强大的世俗诸侯和僧侣诸侯的附庸。同时他们也看到，随着他们的没落，帝国政权也在没落，整个帝国正在解体，分成许多独立自主的诸侯领地。对他们来说，他们的没落必然要同德意志民族的没落同步发生。这里还要指出，贵族，尤其是帝国直属贵族，由于他们担任的军职以及他们相对于诸侯所处的地位，他们是最能代表帝国和帝国政权的等级。当时贵族是最有民族意识的等级；帝国政权越强大，诸侯越弱越少，德国越统一，他们也就越强大。因此，骑士等级普遍地对德国可怜的政治地位感到不满；对帝国在对外关系上的软弱无力感到不满，而这种软弱无力的程度还随着皇室通过继承权把新的省份接二连三地收归帝国版图而日益加深；骑士等级对外国列强在德国内部策划阴谋感到不满；对德国诸侯勾结外国反对帝国政权也感到不满。所以，贵族的各种要求都必然首先归结为改革帝国这一要求，而改革帝国就要使诸侯和高级僧侣成为牺牲品。进行这种归纳总结工作的人就是德国贵族在理论方面的代表人物**乌尔里希·冯·胡登**，同他一起进行这项工作的还有贵族在军事方面和政治方面的代表人物**弗兰茨·冯·济金根**。

胡登以贵族的名义很明确、很激进地提出了改革帝国的要求。这种要求无非就是要废黜一切诸侯，把僧侣诸侯的领地和教会财产

全部收归俗用，建立以君主为首的**贵族民主制**，大致就像从前的波兰共和国在鼎盛时代所建立的那种贵族民主制。胡登和济金根相信，只要建立起贵族的即主要是军人阶级的统治，只要废黜那些分裂国家的罪魁即诸侯，只要取消僧侣的权力，使德国摆脱罗马教权的统治，就可以使帝国重新走向统一、自由和富强。

建立在农奴制基础上的贵族民主制，例如波兰的贵族民主制，又例如被日耳曼人占领的各帝国在最初几个世纪里实行的形式略有不同的贵族民主制，都是属于最原始的社会形式中的一种形式，后来都自然而然地发展成为完备的封建等级制度，而封建等级制度显然已经是更高的阶段了。所以，要建立纯粹的贵族民主制，在16世纪的德国是不可能的。贵族民主制已经不可能建立，因为当时在德国已经有了一些很有影响的、强大的城市。另一方面，也不可能建立像英国那种使封建等级君主制转变成资产阶级立宪君主制的下层贵族同城市的联盟。在德国，旧贵族都保存下来了；而在英国，旧贵族却被蔷薇战争[193]消灭得只剩下28家，并且为资产阶级出身和带有资产阶级倾向的新贵族所代替。在德国，农奴制依然存在，贵族的收入来源是**封建性的**；在英国，农奴制几乎完全被废除了，贵族就是单纯的资产阶级地主，其收入来源是**资产阶级性的**：地租。最后，专制君主制的中央集权制，在法国从路易十一以来就由于贵族同市民阶级之间的对立而产生并且日臻完备，但这种中央集权制在德国则行不通，因为在德国，实施全国性中央集权制的条件尚未具备，或者极不完备。

在这种情况下，胡登越是致力于实际推行他的理想，就越需要作出更多的让步，他的帝国改革计划的轮廓也就必然越模糊。贵族同诸侯较量，日益显得无力，可见贵族光靠自己是没有足够力量完成改革大业的。贵族需要有同盟者，而唯一可能的同盟者只有城市、农民

以及颇有影响的宗教改革运动理论家。但是，城市对贵族早就领教够了，不会再去信任他们，不肯再去同他们结成任何联盟。农民身受贵族敲骨吸髓的剥削和虐待，理所当然地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死敌。而那些理论家不是站在市民、诸侯一边，就是站在农民一边。既然帝国改革所追求的主要目标始终是提高贵族的地位，那么，贵族又怎能保证市民和农民从这场改革中得到什么好处呢?在这种情况下，胡登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在他的宣传文件中很少提到或绝口不提贵族、城市和农民将来的相互关系，他把一切罪恶都归之于诸侯和僧侣以及对罗马的依赖关系，并且向市民指出：为了自身的利益，市民们在即将来临的诸侯同贵族的斗争中至少也应保持中立。胡登只字不提废除农奴制以及取消农民向贵族缴纳捐税的问题。

当时德国贵族对农民的态度，同波兰贵族在1830—1846年暴动中对本国农民的态度完全一样。同现代波兰起义中出现的情况一样，当时在德国只有一切反对党派结成联盟，尤其是贵族同农民结成联盟，才能使运动获得成功。但是，由于以下两种情况，这种联盟恰恰是**不可能的**。贵族既没有落到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政治特权，放弃对农民行使封建特权的地步，革命农民也不会根据笼统而又渺茫的希望就同贵族结盟，也就是同压迫他们最厉害的那个等级结成联盟。同1830年波兰的情况一样，1522年的德国贵族已经争取不到农民了。除非完全废除农奴制和依附农制，取消一切贵族特权，农民才可能同贵族联合。但是，贵族同一切特权等级一样，根本不愿意自动放弃特权，放弃自己的整个特殊地位以及绝大部分收入来源。

因此，当斗争爆发的时候，贵族到头来是独力对付诸侯的。诸侯在过去200年间就不断地夺取贵族的地盘，这一次也轻而易举地制服了贵族。这一切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四

斗争过程本身是大家知道的。胡登和早被公认为德国中部贵族政治军事首领的济金根于1522年在兰道组成了一个以六年为期的莱茵、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的贵族同盟，声称目的是为了自卫。济金根一方面靠自己筹款，一方面靠同附近的骑士实行联合，组成了一支军队。他在法兰克尼亚、莱茵河下游、尼德兰和威斯特伐利亚组织了募兵和增援的工作，并于1522年9月向特里尔选帝侯大主教[①]宣战，开始采取敌对行动。但当济金根进驻特里尔城郊的时候，他的援军由于诸侯迅速出兵干涉而被截断了；黑森邦伯[②]和普法尔茨选帝侯[③]都驰援特里尔，济金根不得不退守兰施图尔城堡。胡登及其战友虽然竭力求援，可是，与之结盟的贵族被诸侯集中而迅速的行动吓倒，竟置济金根于不顾。济金根本人身负重伤，放弃兰施图尔，随即死去。胡登不得不逃往瑞士，几个月后就死在苏黎世湖中的乌弗瑙岛上。

随着这次斗争的失败和两位领袖的去世，贵族势力作为一个不依附于诸侯的独立集团就被粉碎了。从此以后，贵族只得为诸侯效劳并听从诸侯指挥。此后不久爆发的农民战争迫使贵族更进一步置身于诸侯直接或间接的庇护之下，同时也证明了德国贵族宁肯在诸侯统治之下继续剥削农民，也不愿意同**解放了的**农民结成公开的同盟去打倒诸侯和僧侣。

①理查(格赖芬克劳的)。——编者注

②菲力浦一世。——编者注

③路德维希五世。——编者注

五

路德对天主教教阶制度宣战，把德国一切反对派分子都发动了起来，从此以后，农民没有一年不起来重提自己的要求。从1518年到1523年，在黑林山和上士瓦本，地方性的农民起义接连不断。从1524年春天以后，这些起义就都带有系统性了。同年4月，马希塔尔修道院管区的农民拒绝服徭役和纳贡赋；5月，圣布拉辛的农民拒绝履行农奴义务；6月，梅明根附近的施泰因海姆的农民宣布拒缴什一税以及其他杂费；7月和8月，图尔高的农民举行起义，但是，一则由于苏黎世人的调停，再则由于瑞士联邦实行残酷镇压，处死了很多人，起义又被平息下去。最后，在邦伯领地施蒂林根爆发了一次更为坚决的起义，这次起义可以看成是**农民战争的序幕**。

施蒂林根的农民突然拒绝向邦伯①交纳贡赋，他们结成强大的队伍，并在**布尔根巴赫的汉斯·弥勒**率领下，于1524年8月24日向瓦尔茨胡特进发。在这里，他们同市民联合创立了一个新教兄弟会。市民之所以很愿意促成这种联合，是因为他们当时正在反对奥地利边区政府[153]对他们的传教士巴尔塔扎尔·**胡布迈尔**进行宗教迫害，此人是托马斯·闵采尔的朋友和弟子。兄弟会规定，每星期要交三个克劳泽的会费（就当时币值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还派遣密使到

①鲁·冯·苏尔茨。——编者注

阿尔萨斯、摩泽尔、整个上莱茵以及法兰克尼亚等处吸收农民入会，宣告兄弟会的目标是要废除封建统治，摧毁所有城堡和寺院，消灭除皇帝一人以外的一切统治者。会旗就是**德意志三色旗**[194]。

起义迅速蔓延到现在的上巴登全境。上士瓦本的贵族惊恐万状，当时他们的军队几乎全都在意大利同法国弗朗索瓦一世作战。他们无计可施，只好通过谈判拖延时日，以便筹款招兵，待到力量足够强大，便以"烧杀掳掠"去惩罚无法无天的农民。从此以后，开始出现了种种周密策划的叛变倒戈、背信食言和阴谋活动。贵族和诸侯在整个农民战争期间都以玩弄这一套手法而臭名昭著，而这一套手法也正是他们对付分散而难于组织起来的农民的最有力的武器。德国西南部的诸侯、贵族和帝国直辖市结成的士瓦本联盟[189]出面斡旋，但是并没有向农民保证要作出任何实际的让步。农民仍然继续行动。从9月30日到10月中，布尔根巴赫的汉斯·弥勒穿过黑林山到达乌拉赫和富特旺根，把他的队伍扩充到3 500人，并率领这支队伍在埃瓦廷根(离施蒂林根不远)布防。贵族可以调动的力量不超过1 700人，而且这些人都相当分散。贵族被迫进行停战谈判，后来确实也在埃瓦廷根营地达成了协议。贵族答应同农民订立友好的条约，或者由双方直接订立，或者通过仲裁法庭来订立；贵族还答应由施托卡赫地方法院来审理农民提出的申诉。贵族军队和农民都一概解散。

经农民一致同意，拟定了十六条款，要求施托卡赫法院批准。条款都很温和。农民要求废除狩猎权和徭役制，要求取消苛重的赋税和全部领主特权，要求保证不受任意逮捕，要求保证不受法庭任意作出的不公正判决的侵害——此外别无他求。

可是，农民一回到家里，贵族又马上要求他们继续缴纳全部尚有争议的贡赋，直到法院作出裁决为止。农民当然拒绝这一要求，他

们让贵族老爷到法庭去解决这个问题。斗争又再次爆发。农民又聚集起来，诸侯和贵族老爷也集中了他们的军队。这次运动又扩大了，超出了布赖斯高，深入到符腾堡地区。**瓦尔德堡的格奥尔格·特鲁赫泽斯**在农民战争中扮演了阿尔瓦的角色，他率领军队监视农民，袭击各路援军，但不敢进攻主力。格奥尔格·特鲁赫泽斯同农民首领进行谈判，有时也达成了一些协议。

12月底，施托卡赫地方法院开始审理案件。农民对法院全由贵族组成提出抗议，而贵族却宣读了一篇皇帝的诏书，[195]作为对农民的答复。审理旷日持久，而贵族、诸侯和士瓦本联盟当局都在这期间备战。这时，斐迪南大公除了统治当时还是奥地利的世袭领地以外，还统治着符腾堡、巴登的黑林山和阿尔萨斯南部，他下令用最残酷的手段对付造反的农民。他下令拘捕农民，严刑拷打，杀而勿赦，随心所欲地消灭他们，烧毁他们的家产，把他们的妻子儿女逐出家园。由此可见，诸侯和老爷究竟是怎样实行停战的，他们所说的善意调停和审理农民申诉究竟意味着什么。斐迪南大公向奥格斯堡的韦尔泽家族借来一笔钱，迫不及待地扩充军队；士瓦本联盟还规定要分三期募齐款项和招满兵员。

以上这些起义恰恰是托马斯·闵采尔在南部高地[196]逗留的五个月中发生的。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他对运动的爆发和进展曾经产生过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已经间接地完全得到了证实。农民中较坚决的革命者大都是他的弟子，他们都拥护他的思想。当时的人都认定十二条款和南部高地农民的书简出自闵采尔之手，其实，至少十二条款肯定不是闵采尔拟定的。闵采尔在回图林根的途中还给造反的农民发出一个坚决革命的文告[197]。

与此同时，从1519年起就被逐出符腾堡的乌尔里希公爵也想借

农民之力实现他收复本邦失地的阴谋。他从被逐以来就力图利用革命派并且不断支持革命派，这的确是事实。在1520—1524年间，黑林山和符腾堡地区发生的大多数地方性骚乱都同他的名字有所牵连，而这时他却准备从他的霍恩特维尔城堡出发直接袭击符腾堡。不过，他只是被农民利用，对农民从来没有什么影响，更谈不上取得农民的信任了。

当年冬季就这样过去了，双方都没有采取什么重大步骤。诸侯老爷已经销声匿迹，农民起义却得到了发展。1525年1月，多瑙河、莱茵河和莱希河之间的整片土地上群情激昂；2月，风暴骤起。

正当布尔根巴赫的汉斯·弥勒统率的**黑林山—黑高农军**同符腾堡的乌尔里希一道密谋起事，并且还有一部分农军参加了乌尔里希发起的向斯图加特进军的徒劳行动的时候（1525年2—3月），农民于2月9日在乌尔姆城南边的里德举行了起义，他们集结在巴尔特林根附近一个由沼泽掩蔽着的营地里，竖起**红旗**，组成**巴尔特林根农军**，由乌尔里希·施米德率领。这支农军有10 000—12 000人。

2月25日，7 000名**上阿尔高农军**在舒森河集结，因为传闻官方军队将开来对付这里的不满分子。肯普滕人民在整个冬季都同他们的大主教①争执不休，他们也在2月26日集结起来，并同上阿尔高农军联合在一起。梅明根和考夫博伊伦这两个城市有条件地参加了运动；可是，这两个城市在斗争中的暧昧态度，在这里已经暴露出来了。3月7日，梅明根十二条款在梅明根被上阿尔高全体农民接受。

湖军是在接到阿尔高农民的消息后由艾特尔·汉斯领导在博登湖建立的。这支湖军也很快扩大了。司令部设在贝马廷根。

①塞·冯·布赖滕施泰因。——编者注

在下阿尔高，在奥克森豪森和谢伦贝格地区，在蔡尔和瓦尔德堡地区，在特鲁赫泽斯的领地，农民也举行了起义，而且早在3月初起义就爆发了。这支**下阿尔高农军**有7 000人之众，驻扎在武尔察赫附近。

这四支农军都接受了梅明根条款。梅明根条款比黑高农军条款还要温和得多，而且在牵涉到武装农民对贵族和政府的态度的各点上，明显地表现出优柔寡断。农民有时也有一点果断精神，但都是在战争过程中，即在他们对敌人的花招有了体会之后，才表现出来的。

与这些农军同时，在多瑙河畔创建了第六支农军。农民从乌尔姆直到多瑙沃特的整个地区，从伊勒河、罗特河、比伯河这几条河的河谷来到莱普海姆，并在这里安营扎寨。15个地区的有作战能力的男人都赶来了，从117个地区派来了援军。**莱普海姆农军**的领袖是乌尔里希·雪恩，他的传教士是莱普海姆的教士雅科布·韦厄。

所以，在3月初，上士瓦本六处营寨约3万—4万名起义农民都武装起来了。按性质来说，这些农军是很复杂的。革命派——闵采尔派——在各支农军中只占少数。但尽管如此，他们在各处都成为农民营寨的核心和骨干。农民群众希望用威胁手段迫使贵族让步；只要贵族保证对农民让步，农民群众总是愿意同贵族达成协议的。可是当事情一拖再拖而诸侯军队又日益逼近的时候，他们就会产生厌战情绪，那些生怕失去自己拥有的一点财产的农民，多半都会跑回家去。此外，当时还有到处流浪的流氓无产阶级大批加入农军，这帮人败坏纪律，瓦解农民斗志，而且经常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这些情况足以说明，为什么农军一开始就到处采取守势，而且各营寨士气普遍低落；这些情况还说明，即使撇开农军战术不精和良将奇缺这两点不谈，他们也绝不是诸侯军队的对手。

五

还在农军集结期间，乌尔里希公爵就带着招募来的军队和一些黑高农民从霍恩特维尔向符腾堡进击。如果农民这时从另一方面进攻瓦尔德堡的特鲁赫泽斯的军队，士瓦本联盟[189]就溃败了。但是，由于农军只采取守势，特鲁赫泽斯竟能立即同巴尔特林根农军、阿尔高农军以及湖军缔结停战协定，准备进行谈判，并确定在鸠迪加礼拜日[198]（4月2日）了结此事。在这期间，他得以进攻乌尔里希公爵，占领斯图加特，并迫使乌尔里希公爵于3月17日再度撤离符腾堡。然后，他回过头来对付农民，但是，他自己军队中的雇佣兵竟抗命拒绝进攻农民。特鲁赫泽斯对叛乱者加以安抚，稳定了军心，于是他把军队开往乌尔姆，在那里集结了新的援军。他派了一个警戒营留守在基希海姆-温特泰克。

士瓦本联盟终于腾出手来，并纠集了它的第一批由各方派出的兵员。于是它抛开了自己的假面具，宣称它“决心依靠武器和上帝的帮助，来对付农民们的无法无天的举动”。[199]

在这期间，农民们严格地遵守了停战协定。为了准备鸠迪加礼拜日的谈判，他们拟定了自己的要求，即著名的**十二条款**。他们要求由全体教徒选举和罢免神职人员，废除小什一税，把大什一税[158]中除支付教士薪俸之外的全部余款均用于公共事业，废除农奴制、渔猎权和死亡税，限制苛重的徭役、赋税和土地税，归还从教会和个人那里夺去的林地、牧场和特权，消除司法和行政部门的专横跋扈。由此可见，在各农军中温和妥协派还占很大优势。革命派以前在《**书简**》中早就提出了自己的纲领。这封向全体农民发出的公开书简要求农民参加“基督教同盟与兄弟会”，要求他们或者通过和平手段——“这大概是办不到的”——或者用暴力来取消一切负担。书简还用“世俗绝罚”威胁所有拒绝参加的人，这就是说，谁拒绝参加就把谁排除于社

会活动之外，完全隔绝他与同盟成员来往。所有城堡、寺院和教堂也都要按照世俗绝罚的要求加以处理，除非贵族、僧侣和修道士自愿离开这些地方，同其他人一样搬进普通住宅，并参加基督教同盟。这篇激进的宣言显然是在1525年春天起义**之前**拟定的，它的主题就是革命，就是彻底战胜现存统治阶级，而“世俗绝罚”的规定所涉及的只是压迫者和叛徒，以及城堡、寺院和教堂；按照这种规定，必须把压迫者和叛徒处死，把城堡焚毁，把寺院和教堂没收，并把那里的财宝换成现金。

然而，在农民把他们的十二条款提交给被指定的仲裁法庭法官之前，他们已经得到士瓦本联盟毁约和军队逼近的消息。他们立即采取措施。阿尔高人、巴尔特林根人和湖军农民在盖斯博伊伦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四支农军合在一起，改编成四个新的纵队；农民还决定没收教会财产，变卖其中的珠宝以充军费，并焚毁各地的城堡。于是书简也同正式的十二条款一起成为他们的作战准则，而原定缔结和约的鸠迪加礼拜日就成了**总起义**的日期。

各处群情日益激昂，农民同贵族之间的地方性冲突层出不穷，六个月来黑林山的起义日益扩大并且蔓延到多瑙河地区和莱希河地区的消息不断传来，这一切足以说明，在德国三分之二的地区为什么农民起义会接连不断地迅速发生。此外，各处起义同时发生这一事实，也证明领导运动的人就是通过再洗礼派[182]以及其他密使去组织运动的那些人。在符腾堡地区，在内卡河下游，在奥登林山，在下法兰克尼亚和中法兰克尼亚，都是在3月下半月就已经出现风潮；各处事前都已经指定4月2日这个鸠迪加礼拜日为总暴动的日子，各处在4月的第一个星期就已经进行决定性的出击，举行群众起义。阿尔高农民、黑高农民和湖军农民也于4月1日通过敲起警钟和召开群众大会

的办法，把全部有作战能力的男人都召入营寨，并且同巴尔特林根农民同时对各城堡和寺院采取敌对行动。

在**法兰克尼亚**，运动集中在六个中心，在4月的最初几天里，各处都爆发了起义。这时在**讷德林根城**附近建立起两处农民营寨，在农民的帮助下，以**安东·福尔讷**为首的城市革命派占了优势，福尔讷被任命为市长，该城同农民采取一致行动。在**安斯巴赫**地区，农民从4月1—7日到处举行起义，起义还从这里蔓延到巴伐利亚。在**罗滕堡**地区，农民从3月22日起就已经拿起武器；罗滕堡城名门望族的统治于3月27日被斯蒂凡·冯·**门钦根**领导的小市民和平民推翻了，但是，由于农民的贡赋恰恰是该城的主要财源，所以，新政府对农民的态度是动摇的、暧昧的。在**维尔茨堡**主教教堂议事会[200]管区内，农民和各小城市在4月初普遍举行了起义；在**班贝格**主教管区内，总暴动在五天之内就迫使主教①屈服。最后，在北方，在图林根边境，也安下了强大的**比尔德豪森农民营寨**。

在**奥登林山**，革命派的首领是**文德尔·希普勒**和**格奥尔格·梅茨勒**。希普勒是一个贵族，曾任霍亨洛埃伯爵的总管；梅茨勒是克劳特海姆附近的巴伦贝格的小店主。在这里，3月26日就已经掀起了风暴。农民从四面八方奔向陶伯河。从罗滕堡郊外营寨来的2 000人也参加了行动。所有援军会合以后，就在格奥尔格·梅茨勒率领下于4月4日向亚格斯特河畔的申塔尔寺院进军，**内卡河谷的农民**也在这里同他会师。内卡河谷的农民是由海尔布隆附近的伯金根的小店主**耶克莱恩·罗尔巴赫**领导的，他们于鸠迪加礼拜日在弗莱恩、松特海姆等地宣布起义，而文德尔·希普勒则率领一批密谋者奇袭厄林根，并

①韦甘德（雷德维茨的）。——编者注

把附近的农民都吸引到运动中来。在申塔尔，有两支联合成“**华美军**”的农民军队接受了十二条款，并组织向各城堡和寺院发起攻击。华美军约有8 000人的兵力，装备了火炮，还拥有3 000支枪。法兰克尼亚的一个骑士**弗洛里安·盖尔**也加入了华美军并组成黑军，这是一支主要是从罗滕堡和厄林根的后备军中征集来的人员组成的精锐部队。

驻内卡苏尔姆的符腾堡地方长官路德维希·黑尔芬施太因伯爵开始采取敌对行动。他把落到他手中的农民不问青红皂白一律处死。华美军向他发起了进攻。由于黑尔芬施太因杀人如麻，由于刚刚传来了关于莱普海姆农军败北、雅科布·韦厄被杀以及特鲁赫泽斯施行残酷手段等消息，农民们怒不可遏。黑尔芬施太因逃往魏恩斯贝格，他在那里遭到攻击，城堡受到了弗洛里安·盖尔猛攻。经过长时间的鏖战，盖尔终于攻下城堡，路德维希伯爵同许多骑士一起被俘。第二天，即4月17日，耶克莱恩·罗尔巴赫和农军中最坚决的一些人共同审讯这批俘虏，并强迫以黑尔芬施太因为首的14名战俘穿过手持梭镖奋力刺杀的士兵行列。过去黑尔芬施太因就是用这种最具有侮辱性的方式来处死俘虏的。占领魏恩斯贝格的行动以及耶克莱恩对黑尔芬施太因采取的恐怖报复手段，对贵族们起到了震慑作用。勒文施泰因的伯爵们参加了农民联盟；霍亨洛埃的伯爵们早就参加了，可是还没有出过力立过功，他们马上送来了必需的火炮和弹药。

首领们商议是否要拥立葛兹·冯·伯利欣根为领袖，“因为他可以把贵族拉到这一边来”。这个建议得到了赞同；但弗洛里安·盖尔从农民和首领们的这种情绪中看出了反动的苗头，于是就带着他的黑军脱离华美军，独自行动，最初走遍了内卡河流域，后来又在维尔茨堡地区活动，到处捣毁城堡和僧侣巢穴。

剩下的农军先是向海尔布隆进发。在这个强大的帝国直辖自由

市，和几乎所有地方一样，同名门望族对峙的是市民反对派和革命反对派。革命反对派同农民达成了秘密协议，他们在骚乱过程中于4月17日打开城门迎接格奥尔格·梅茨勒和耶克莱恩·罗尔巴赫。农民的领袖们带领自己的人占领了这座城市；城市被吸收加入兄弟会，并提供了1 200古尔登现款，还提供了一个中队的志愿兵。只有僧侣和德意志骑士团[201]成员的产业遭到了洗劫。22日，农民留下少数驻防部队就撤走了。海尔布隆被指定为各地农军的联络中心，事实上各地农军也派来了代表，商议农民的共同行动和共同要求。但是，市民反对派以及自从农民进城以来就同市民反对派结成联盟的名门望族这时又在这座城市占了优势，他们对任何坚决的步骤都加以阻挠，只等待着诸侯军队的到来，以便最后出卖农民。

农民向奥登林山进发。4月24日，葛兹·冯·伯利欣根（此人在这以前的几天内曾先去投靠普法尔茨选帝侯①，然后又来投靠农民，后来又去投靠选帝侯）这时不得已而加入新教兄弟会，并担任华美白军（与弗洛里安·盖尔的黑军相对而言）的总指挥。可是，他同时又是农民的俘虏，农民十分警觉地监视着他，并责成他按首领们的意见行事，未经首领同意不得擅自行动。葛兹和梅茨勒率领农民群众通过布亨开往阿莫巴赫，他们在那里从4月30日驻扎到5月5日，并在整个美因茨地区掀起暴动。各地的贵族被迫参加暴动，借此保全他们的城堡；只有寺院遭到焚烧和洗劫。这时农军士气明显下降；最坚决果断的人都同弗洛里安·盖尔或者同耶克莱恩·罗尔巴赫一道离开了队伍。罗尔巴赫在农军占领海尔布隆以后已经离队出走，显然是因为他审判过黑尔芬施太因伯爵，所以不可能在一支想同贵族妥协的农军

①路德维希五世。——编者注

中久留。迫不及待地想同贵族取得谅解这件事本身，就已经是农军士气低落的标志。此后不久，文德尔·希普勒提出了一个非常合适的改组农军方案：录用每天前来应募的雇佣兵，不要像以往那样，每个月都征召新兵、遣散老兵，从而使兵员不断更新，而应当使这支武装起来的、多少受过训练的队伍保持稳定。可是，全军大会把这两点建议都否决了；农民们已经忘乎所以，竟把整个战争看做是一种聚众掠夺的勾当，既然如此，雇佣兵的竞争就不可能合乎他们的心意，而且，他们一旦填满私囊，就会随心所欲地返回家园。在阿莫巴赫，事情甚至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海尔布隆的市政会成员汉斯·贝林竟说服农军的首领和顾问通过了《十二条款陈情书》，这是一封公函，其中删去了十二条款中仅有的一些尖锐词句，改成了恭顺的请愿语言，并且硬说这些语言出自农民之口。这一回，农民对事情忍无可忍了，他们纷纷发出强烈的呼声，拒绝同意这个陈情书，而坚持原来的条款。

在这期间，维尔茨堡地区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4月初，当农民起义刚刚爆发的时候，主教[①]就退守到维尔茨堡附近的坚固设防的弗劳恩贝格，并驰书各方求援，结果徒劳，终于被迫暂时屈服。5月2日召开邦议会，出席会议的也有农民代表。但是，会议还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就查获了一批信件，证实了主教的叛变阴谋活动。邦议会立即散去，造反的市民和农民同主教的部队之间又开始敌对行动。主教本人于5月5日逃往海德堡；第二天，弗洛里安·盖尔及其黑军就来到了维尔茨堡，同他一起来的还有**法兰克尼亚陶伯河农军**，这支军队是由梅根特海姆农民、罗滕堡农民和安斯巴赫农民组成的。5月7日，葛兹·冯·伯利欣根也率领华美白军来到，并开始围攻弗劳恩贝格。

---

①康拉德三世。——编者注

在林普格地区以及埃尔旺根和哈尔一带，早在3月底4月初就建立起另一支农军，即盖尔多夫农军或称**普通华美军**。这支农军势如破竹，把整个地区都卷入暴动，烧毁了许多寺院和城堡，霍亨施陶芬城堡也在其中；农军还强迫所有的农民跟随队伍行动，强迫所有的贵族，甚至包括林普格的酒店老板在内，都加入基督教兄弟会。5月初，这支农军准备袭击符腾堡，但经过别人劝诱以后撤退了。当时，德意志小邦分立的割据状态也同1848年一样，使各邦的革命者很难采取共同的行动。盖尔多夫农军被限制在一个小小的地区里，这支队伍在当地战胜了一切反抗之后，势必自行瓦解。他们同格明德城达成了协议，只留下500名武装农民就解散了。

在**普法尔茨**，4月下旬就在莱茵河两岸建立了农军。他们破坏了许多城堡和寺院，并于5月1日占领了哈尔特山麓诺伊施塔特，而在此以前几天，布鲁赫莱茵农民已经渡河，迫使施派尔城缔结协定。冯·哈伯恩元帅只率领少数选帝侯部队，无法对付农民。5月10日，选帝侯不得不同造反的农民缔结协定，他在协定中向农民保证要召开一次邦议会以解除农民的负担。

最后，在**符腾堡**，起义很早就在个别地区爆发了。在乌拉赫山，农民们早在2月间就已经结成了反对僧侣和领主的同盟，3月底，布劳博伊伦、乌拉赫、明辛、巴林根、罗森费尔德等地的农民都举行了起义。盖尔多夫农军在格平根附近，耶克莱恩·罗尔巴赫在布拉肯海姆附近，被击败的莱普海姆农军残部在普富林根附近，都袭击符腾堡并策动农民举行起义，在其他地方也出现了大规模的风潮。普富林根在4月6日就已经不得不向农民投降。奥地利大公[①]的政府狼狈不堪。它

①斐迪南一世。——编者注

根本没有钱，军队也很少。各城市和各城堡的形势极其危急，既无守军，又无军火。甚至阿斯佩格也几乎毫不设防。

政府企图集中各城市的后备军去对付农民，结果倒使它自己一时遭到了失败。4月16日，博特瓦尔的后备军拒绝开拔，不愿前往斯图加特，而进入博特瓦尔附近的温嫩施泰因山，他们在那里成了市民和农民营寨的核心，而这个营寨也很快得到了发展。同一天，察伯高也爆发了起义；毛尔布龙寺院遭到了抢劫，不少寺院和城堡都被摧毁了。援军从邻近的布鲁赫莱茵赶来支持农民队伍。

温嫩施泰因山上的农军首领是**马特恩·费尔巴哈尔**。费尔巴哈尔是博特瓦尔市政会成员，是市民反对派领袖之一，他是不得已才作出妥协跟农民走的。在这期间他仍然持非常温和的态度，阻止在各城堡执行书简条款，总是试图在农民与温和派市民之间进行调解。他阻挠符腾堡农民同华美白军联合，后来还劝说盖尔多夫农军退出符腾堡。由于他倾向于市民，因而曾于4月19日被撤职，但第二天又被任命为首领。这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甚至耶克莱恩·罗尔巴赫于22日带着200名坚定分子前来援助符腾堡农民队伍时，也毫无办法，只有让费尔巴哈尔继续留任，而自己只能严密监视他的行动。

4月18日，政府试图同温嫩施泰因山上的农民进行谈判。农民坚持要政府接受十二条款，政府的全权代表们自然不能同意。于是农军开始行动。20日，农军抵达劳芬，并在此地最后拒绝了政府代表的提议。22日，6 000之众的农军进驻比蒂希海姆，并威胁斯图加特。该城的市政会成员大半都已经逃走，由一个市民委员会主持行政工作。当地的市民，也同其他城市一样，都分裂成名门望族、市民反对派、革命平民派三派。革命平民派于4月25日给农民打开了城门，斯图加特立即被占领。此时，符腾堡的起义农民已经自称为**华美基督教农军**，这

支农军的组织工作就是在斯图加特完成的；对薪饷、战利品分配以及给养等等也制订了严格的规章。托伊斯·格尔伯带领了一个中队的斯图加特军加入农军。

4月29日，费尔巴哈尔率领整支农军去抵挡在绍恩多夫附近侵入符腾堡地区的盖尔多夫农军，他把整个地区都吸收入同盟，因而就劝说盖尔多夫农军撤退了。费尔巴哈尔就这样防止了他自己的农军中由罗尔巴赫领导的革命分子同无所顾忌的盖尔多夫农军混合，因而也就防止了这些革命分子增强力量而危及他本身。他在得到特鲁赫泽斯逼近的消息以后，就从绍恩多夫开拔去迎击特鲁赫泽斯，并于5月1日驻扎在基希海姆-温特泰克。

以上我们描述了德国境内第一批农军活动的那一地区的起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在我们详尽地陈述其他各批农军活动情况（图林根和黑森、阿尔萨斯、奥地利和阿尔卑斯山区）之前，我们必须先介绍一下特鲁赫泽斯的进军情况，他在这次进军过程中最初是孤军作战，后来在许多诸侯和城市的支持下，消灭了这第一批起义农民。

关于特鲁赫泽斯，我们在上文叙述了他到达乌尔姆附近的情况，此后就一直没有提到他；3月底，他在基希海姆-温特泰克留下一支由迪特里希·施佩特指挥的警戒部队以后，即转往乌尔姆。特鲁赫泽斯的军团，包括到乌尔姆来集中的联盟援军在内，总共近1万人，其中有7 200名步兵，这是唯一的一支能向农民进攻的军队。各路援军向乌尔姆汇合的行动极为缓慢，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爆发起义的各邦很难征募兵员，一方面是由于各地政府缺少经费，另一方面还由于各地要留少数部队坚守要塞和城堡，绝对不能调动。至于不属于士瓦本联盟的诸侯和城市所能调动的部队究竟少到何种程度，我们在上文已经作了介绍。所以，格奥尔格·特鲁赫泽斯率领的联盟军队能

否取得成就，将决定整个局势的发展。

在这期间，**巴尔特林根农军**已开始在里德周围地区摧毁城堡和寺院，特鲁赫泽斯首先向这支农军发起攻击。农民们在联盟军队逼近时立即退却，被迫绕道逃出沼泽地带，渡过多瑙河，进入施瓦本山的峡谷和森林。在这些地带，作为联盟军队主力的骑兵和火炮对农民们是无可奈何的，因此，特鲁赫泽斯停止追击，转而进攻莱普海姆农军；这支农军有5 000人驻扎在莱普海姆附近，有4 000人驻扎在明德尔河谷，有6 000人驻扎在伊勒蒂森附近，他们在整个地区掀起暴动，毁坏寺院和城堡，准备调动所有这三支部队向乌尔姆挺进。然而，这里的农民看来也有点士气低落，所以，农军在战斗中已经没有任何把握，原因就在于雅科布·韦厄从一开始就谋求同特鲁赫泽斯进行谈判。但是，特鲁赫泽斯这时已经有足够的兵力作后盾，所以根本不予理会，反而于4月4日在莱普海姆附近向农军主力发起进攻，结果彻底击溃了这支队伍。雅科布·韦厄和乌尔里希·雪恩以及另外两位农民领袖被俘斩首；莱普海姆投降了，经过在附近地区几番追击之后，整个地区也都被征服了。

特鲁赫泽斯的雇佣兵因为要求抢劫和额外加薪而再次发生哗变，这件事又一次打乱了特鲁赫泽斯4月10日以前的军事行动。在这以后，他才向西南方进击**巴尔特林根农军**，原来在此期间，这支农军侵入了他的领地瓦尔德堡、蔡尔和沃尔夫埃格，并围攻了他的各处城堡。特鲁赫泽斯在这里也发现农民是四分五裂的，于是他就在4月11日和12日采取了各个击破的办法，把巴尔特林根农军先后完全击溃。农军残部在教士弗洛里安率领下向**湖军**方面撤退。于是，特鲁赫泽斯又转而进攻湖军。在这期间，湖军不仅多次出击，而且使布赫霍恩（腓特烈港）和沃尔马廷根这两个城市加入了兄弟会；这支湖军于

13日在萨莱姆寺院召开了大规模的军事会议，决定迎击特鲁赫泽斯。于是，各处立即敲响了警钟，在贝马廷根营寨集结了1万人，被击败的巴尔特林根农军也来同他们汇合。4月15日，他们与特鲁赫泽斯交战并获得胜利，特鲁赫泽斯不想把他的军队在一次决战中孤注一掷，而宁愿谈判，当他听说阿尔高农军和黑高农军也逼近时，就更急于谈判了。因此，他于4月17日在魏恩加滕同湖军和巴尔特林根农军缔结了一项从表面看对农军相当有利的协定，农军竟毫不迟疑地同意了。特鲁赫泽斯进而诱使上下阿尔高农军代表也都接受这项协定，然后开往符腾堡。

特鲁赫泽斯的奸诈使他从已成定局的覆灭中挣脱出来。假如他不善于愚弄那些软弱、狭隘而且绝大部分已经士气低落的农民，不善于愚弄那些多半懦弱无能而又贪图贿赂的农民首领，他同他那支小小的队伍早就遭到至少由25 000—30 000人组成的四个纵队兵力的包围，而且无疑已经被消灭了。但是，他的敌人目光短浅，而这一点在农民群众身上一直是难以避免的，因此，特鲁赫泽斯就有可能恰恰是在敌人只需一击即可结束整个战争——至少在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的时刻从敌人手中逃脱。湖军农民信守协定，以致拿起武器去反对自己的同盟者黑高农军，最后当然还是被欺骗了；阿尔高农军也在他们的首领指使下卷进了这种背叛活动，虽然他们马上就退出了这一行动，可是在这期间却使特鲁赫泽斯摆脱了险境。

黑高农军当时虽然没有参加魏恩加滕协定，可是紧接着却干了一件带有极端的地方狭隘性和顽固的乡土观念的事，结果断送了整个农民战争。在特鲁赫泽斯同他们谈判一无所得而向符腾堡开拔以后，他们尾随着他并且继续驻守在他的侧翼，可是他们竟从未想到同符腾堡华美基督教农军采取一致行动，其理由是因为符腾堡农民和

内卡河谷农民一度拒绝援助他们。因此,当特鲁赫泽斯已经远离他们的家乡时,他们就泰然自若地撤回并且向弗赖堡开去。

我们已经叙述了由马特恩·费尔巴哈尔率领的符腾堡农民驻扎在基希海姆-温特泰克,而由特鲁赫泽斯留下的交给迪特里希·施佩特指挥的警戒部队则从这里向乌拉赫返回的情况。费尔巴哈尔在企图攻取乌拉赫失利之后即转往尼尔廷根,并写信向邻近所有的起义农军求援,以便进行决定胜负的一战。果然,从符腾堡平原地区和戈伊相继开来了大批援军。特别是戈伊农民,他们在一直撤退到符腾堡西部的莱普海姆农军残部的周围集结起来,并且使内卡河谷和纳戈尔德河谷上游一直到伯布林根和莱昂贝格的整个地区都掀起了暴动;戈伊农民分成了两支强大的农军,于5月5日在尼尔廷根同费尔巴哈尔会师。特鲁赫泽斯在伯布林根附近同联合起来的农军遭遇。农军的人数、火炮和他们的阵地使特鲁赫泽斯为之震惊;他重演故技,立即开始同农民谈判,并且同他们缔结了一项停战协定。他刚刚借此骗得农民的信任,就于5月12日在**停战期间**袭击农民,迫使他们进行决定胜负的一战。农民们进行了英勇持久的抵抗,直到伯布林根最后由于市民阶级的叛变而落入特鲁赫泽斯手里为止。农民左翼因此失掉了根据地,遭到袭击和包抄。于是结局已定。缺乏纪律性的农民陷于混乱,随即狂奔逃命;凡是未被联盟的骑兵杀戮或俘虏的人,也纷纷丢掉武器仓皇逃回老家。“华美基督教农军”瓦解了,整个符腾堡的暴动也随之完全平息了。托伊斯·格尔伯逃往埃斯林根,费尔巴哈尔逃往瑞士,耶克莱恩·罗尔巴赫被俘,并被戴上镣铐押送到内卡加塔赫,特鲁赫泽斯在那里把他捆在一根柱子上,周围堆满木柴,用火慢慢地把他活活烤死,而特鲁赫泽斯本人则同他的骑士们在一旁宴饮取乐,欣赏这种骑士的活剧。

特鲁赫泽斯从内卡加塔赫侵入克赖希高，以支援普法尔茨选帝侯的军事行动。普法尔茨选帝侯在此期间集结了部队，在接到特鲁赫泽斯获胜的消息后，立即撕毁同农民缔结的协定，于5月23日袭击布鲁赫莱茵，在遭到猛烈抵抗之后，攻克并烧毁了马尔施，洗劫了许多村庄，占领了布鲁赫萨尔。与此同时，特鲁赫泽斯还袭击了埃平根并俘虏了当地运动的首领安东·艾森胡特。选帝侯下令立即把艾森胡特和其他12位农民领袖一起处死。布鲁赫莱茵和克赖希高就这样被平定了，还被搜刮了将近4万古尔登。特鲁赫泽斯的军队在以上各次战斗之后只剩下6 000人，选帝侯的军队则剩下了6 500人，这两支军队联合起来，向奥登林山农民发起了攻击。

伯布林根失败的消息到处流传，使起义者感到恐惧。处于农民高压之下的各个帝国直辖自由市一下子都松了一口气。海尔布隆是第一个采取步骤同士瓦本联盟[189]妥协的帝国直辖自由市。海尔布隆设有农民办公室，各路农军代表在这里进行协商，准备以全体起义农民的名义向皇帝①和帝国提出建议。这些协商本来是要达成一个普遍适用于整个德国的提案，但协商过程再次表明：当时还没有任何一个等级已经发展到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去革新整个德国局面的程度，连农民等级也没有发展到这种程度。形势很快就表明，要达到上述目的，就必须争取贵族，尤其是必须争取市民阶级。这样一来，**文德尔·希普勒**就掌握了协商的领导权。在运动的所有领袖中，文德尔·希普勒对当时形势的认识最正确。他不是像闵采尔那样有远见的革命家，也不是像梅茨勒或罗尔巴赫那样代表农民的人物。他那多方面的经验，他那对各个等级相互间的态度的实际了解，都使得他不会只代

①查理五世。——编者注

表卷入运动的等级中的某个等级来反对其他等级。闵采尔是完全处于当时正式社会联系之外的那一阶级的代表人物，也就是初期无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在形势的推动下已经预感到共产主义必将实现；正如闵采尔一样，文德尔·希普勒可以说是全民族一切进步成分中起中介作用的代表人物，他也已经预感到**近代资产阶级社会**必将实现。诚然，他所主张的原则和他所提出的要求都不是很快就能实现的，但这些原则和要求却是封建社会正在出现的解体状态的稍加理想化的必然结果；农民一旦决心为整个帝国制定法律草案，就不能不接受他的原则和要求。所以，农民所要求的中央集权就在海尔布隆采取了一种更为明确的形式，而这种形式同农民对中央集权的想法有天渊之别。例如，这种中央集权在统一币制和度量衡，以及在废除境内关税等方面作了比较详尽的规定，简言之，这类规定所涉及的都是那些十分明显地维护城市市民利益而不是维护农民利益的要求。所以，当时对贵族作了许多让步，这些让步十分接近现代的赎买办法，其最终目的是要把封建土地所有制转变为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总而言之，农民的要求一经被概括为一种"帝国改革"方案以后，即使不从属于市民的当前要求，也必然从属于市民的最终利益。

当人们还在海尔布隆对这一帝国改革方案进行辩论的时候，《十二条款陈情书》的作者汉斯·贝林已出城迎接特鲁赫泽斯，准备以名门望族和市民阶级的名义同他商谈有关交出该城的问题。城里反动派的活动支持了这一背叛行为，文德尔·希普勒不得不和农民一起逃走。他前往魏恩斯贝格，企图在那里召集符腾堡农军残部和少数有了战斗准备的盖尔多夫农军。但是，普法尔茨选帝侯和特鲁赫泽斯又逼近了，他不得不离开此地而去维尔茨堡发动华美白军。联盟部队和选帝侯部队当时已经征服了整个内卡河地区，迫使农民重新宣誓效

忠，焚毁了许多村庄，刺死或绞死了所有曾经逃跑而被他们俘获的农民。为了给被杀的黑尔芬施太因报仇，他们把魏恩斯贝格烧成了一片焦土。

这时，在维尔茨堡近郊汇合的农军包围了弗劳恩贝格，并于5月15日在缺口尚未攻破之前就向堡垒发起勇猛的冲锋，但没有成功。城壕里留下了400名最优秀的人员，多半属于弗洛里安·盖尔的黑军，其中有的阵亡有的负伤。两天之后，即17日，文德尔·希普勒来到这里，召开了一次作战会议。他提议只留4 000人在弗劳恩贝格郊外，同时，可以在特鲁赫泽斯视线之内调集全部约2万人之众的主力部队，前往亚格斯特河畔克劳特海姆附近安营扎寨，所有援军都可以到那里去集中。这个计划非常出色；只有通过团结群众并依靠人多势众才有希望打败当时已经拥有13 000人的诸侯军队。然而，农军军心涣散和士气低落的情况过于严重，已经无法采取任何坚决果敢的军事行动。葛兹·冯·伯利欣根在此后不久就公开成为叛徒，他当时可能也曾竭力阻碍农军的行动，因此，希普勒的计划始终没有付诸实施，而农军却像往常一样陷于分裂状态。直到5月23日，华美白军在法兰克尼亚农民答应尽速接应之后才开始行动。26日，驻扎在维尔茨堡的封疆伯爵安斯巴赫各中队在接到封疆伯爵已经对农民开始采取敌对行动的消息以后都被调回来了。围城军队的残部同弗洛里安·盖尔的黑军一起在离维尔茨堡不远的海丁斯费尔德附近严阵以待。

华美白军于5月24日来到克劳特海姆，已经放松了战斗的准备。许多人在这里听说他们的村子当时已经宣誓效忠于特鲁赫泽斯，也就以此为借口各自回家了。农军继续向内卡苏尔姆开去，并于5月28日同特鲁赫泽斯谈判；同时，派遣使者到法兰克尼亚、阿尔萨斯和黑林山—黑高农军驻地要求火速驰援。葛兹从内卡苏尔姆撤回厄林根。

农军的兵力日益减少；葛兹·冯·伯利欣根也在行军途中不见了；他骑着马回了家，在此以前，他早就通过他的老战友迪特里希·施佩特为他倒戈的事同特鲁赫泽斯谈妥。在厄林根附近，由于误传敌人逼近的消息，突然使束手无策、垂头丧气的群众感到惊恐万状；农军秩序大乱，四散逃走，梅茨勒和文德尔·希普勒费了很大力气才集合了大约2 000人，再次开到克劳特海姆去。在这期间，法兰克尼亚征集的5 000名战士来到这里，可是由于葛兹显然为了叛变而安排的从侧面通过勒文施泰因到厄林根的行军计划，这支农军并没有同华美军相遇，就开到内卡苏尔姆去了。这个由华美白军的几个中队占领的小城遭到了特鲁赫泽斯的围攻。法兰克尼亚农军于夜间到达并已经看见联盟军队营寨的火光，但是，农军首领们不敢进行袭击，而退到克劳特海姆去了，最后他们在那里找到了华美白军残部。内卡苏尔姆既无援军解救，就于29日向联盟军队投降了。特鲁赫泽斯立即下令杀害了13个农民，然后追击农军，一路烧杀劫掠，无所不为。在整个内卡河谷、科赫尔河谷以及亚格斯特河谷中，凡是特鲁赫泽斯所过之处，都是一片瓦砾，树上挂着农民的尸体。

联盟军队在克劳特海姆附近同一些农民相遇，这些农民由于受到特鲁赫泽斯从侧翼发动的攻击，被迫向陶伯河畔柯尼希斯霍芬撤退。农民总共有8 000人，拥有32门大炮，他们就在此地严阵以待。特鲁赫泽斯在丘陵和森林的掩护下悄悄逼近农民，命令几个纵队迂回过来，于6月2日以优势兵力发起突然袭击。农民尽管以几个纵队的兵力进行极其顽强的抵抗，一直战斗到深夜，但结果还是被彻底击溃了。同以往一样，这一次“农民的死神”即联盟军队的骑兵也充当了消灭起义军队的主力，这支骑兵在农民遭到枪炮和梭镖的进攻而感到惊恐之后便猛冲过去，把他们完全击溃，然后一个个杀死。特鲁赫泽

斯究竟用他的骑兵进行了怎样的战争，曾参加农民军的300个柯尼希斯霍芬市民的命运就可作证。这300个市民在战斗中被杀得只剩下15人，而这15人中有4人后来被斩首了。

特鲁赫泽斯用这种办法镇压了奥登林山、内卡河谷和下法兰克尼亚的农民之后，便进行扫荡，焚毁所有村庄，处死无数农民，从而平定了整个地区，然后就向维尔茨堡进发。他在中途获悉，由弗洛里安·盖尔和布格贝恩海姆的格雷戈尔率领的第二支法兰克尼亚农军正驻扎在苏尔茨多夫附近，于是他立即向这支农军进攻。

弗洛里安·盖尔在猛攻弗劳恩贝格失利以后，主要致力于同各个诸侯和各个城市，特别是同罗滕堡城和安斯巴赫封疆伯爵卡齐米尔就加入农民兄弟会问题进行谈判，但柯尼希斯霍芬失败的消息突然打断了谈判。弗洛里安·盖尔的农军就同布格贝恩海姆的格雷戈尔率领的安斯巴赫农军联合在一起。这支农军是新建立的。卡齐米尔封疆伯爵善于用真正的霍亨索伦方式，即一半用花言巧语，一半用大军威胁，借以控制其境内的农民起义。任何外地农军，只要不吸收安斯巴赫的臣民参加，他就对他们完全保持中立。他设法把农民的仇恨主要转移到教会机构上去，并企图通过最终查抄这些机构来中饱私囊。同时他不断扩充军备，伺机而动。伯布林根之战的消息一到，他立即对其境内的造反农民采取敌对行动，掠夺并焚毁了许多村庄，下令绞死和屠杀了许多农民。然而农民迅速地集结起来，在布格贝恩海姆的格雷戈尔指挥下，于5月29日在温茨海姆附近打败了他。当农民还在追击他的时候，从处境困难的奥登林山农民那里传来了求援的消息，农民立即向海丁斯费尔德进发，并从那里同弗洛里安·盖尔一起又开往维尔茨堡（6月2日）。在这里，他们一直得不到有关奥登林山农军的消息，就留下5 000人，而派4 000人尾随其他农军开去——其余的

人则都散去了。他们听信了讹传的关于柯尼希斯霍芬战果的消息，深感安全，不料就在**苏尔茨多夫**附近遭到特鲁赫泽斯的袭击，结果大败。特鲁赫泽斯的骑兵和雇佣兵照例屠杀农民，以致血流成河。弗洛里安·盖尔集合他的黑军残部600人杀出重围，开往因戈尔施塔特村。200人占领了教堂和公墓，400人占领了城堡。普法尔茨选帝侯军队跟踪追击，一支1 200人的纵队攻占了该村，并放火烧毁了教堂；未被烧死的农民统统被杀死。然后，普法尔茨军队在年久失修的城堡墙垣打开缺口，企图发起冲锋。但两次冲锋都被隐蔽在一堵内墙后面的农民击退了，普法尔茨军队轰倒了这第二堵墙，然后发起第三次冲锋，这一次终于得逞了。盖尔的人有一半被杀，他幸而同最后的200人一起逃出险境。但是，他的隐匿处第二天（圣灵降临节后的星期一）就被发现了；普法尔茨军队包围了他所隐匿的森林，把这支农军斩尽杀绝。在这两天之中，普法尔茨军队只俘虏了17人。弗洛里安·盖尔同很少几个最坚决的人一起又杀出重围，去投奔盖尔多夫农军，这支农军当时又集结了7 000人之众。但是，当他来到的时候却发现，由于令人沮丧的消息从各方面传来，这支农军中的大多数人已经散去了。他还力图把离散在森林中的农民集结起来，可是在6月9日，他就在哈尔附近遭到了官军袭击，在战斗中阵亡。

特鲁赫泽斯早在柯尼希斯霍芬获胜之后就立即报信给弗劳恩贝格的被围者，此刻他就向维尔茨堡进军。市政会已经和他暗中串通，所以联盟军队于6月7日夜里就把该城连同驻扎在城内的5 000个农民包围起来，并于翌晨不费一兵一弹就开进了由市政会自行打开的各个城门。由于维尔茨堡“名门望族”的这次叛变，最后一支法兰克尼亚农军就被解除了武装，所有首领统统被俘。特鲁赫泽斯立即下令将81人斩首。于是法兰克尼亚的形形色色的诸侯接踵来到维尔茨

堡，其中有维尔茨堡本地的主教[1]本人，有班贝格主教[2]，有勃兰登堡—安斯巴赫封疆伯爵。这帮显贵分别承担了各种任务。特鲁赫泽斯和班贝格主教一起进军，这个主教立刻撕毁了他和当地农民缔结的协定，让联盟军队的兵痞在他的领地上恣意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卡齐米尔封疆伯爵蹂躏了他自己的领地。代宁根被焚毁；无数村庄被洗劫或付之一炬；同时，这个封疆伯爵在每一个城市都进行了血腥的审判。他在艾施河畔诺伊施塔特下令将18个造反者斩首，在马克特贝格尔下令将43个造反者斩首。他从那里开往罗滕堡，当时罗滕堡的名门望族已经在进行反革命活动，并逮捕了斯蒂凡·冯·门钦根。以前，罗滕堡的小市民和平民对待农民的态度极其暧昧；他们直到最后一刻还拒绝给农民以任何援助，他们生性狭隘自私，为了城市行会的利益，坚持压制农村手工业，只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才勉强放弃了城市从农民的封建贡赋中取得的收入，现在，他们不得不自食其果了。封疆伯爵下令将他们当中的16个人斩首，门钦根当然首当其冲。维尔茨堡主教以同样的方式在他的管区进行扫荡，到处掠夺焚烧，庐舍为墟。他在胜利进军中处决了256个造反者，在回到维尔茨堡的时候，还将13个维尔茨堡市民斩首以庆祝大功告成。

在美因茨地区，当地的地方长官斯特拉斯堡的主教威廉没有遭到抵抗就恢复了该地区的平静。他只处决了4个人。莱茵高本来也发生过骚动，可是，大家早就各自回家了，而弗罗文·冯·胡登（乌尔里希的堂兄弟）还要补劓一番，杀了12个谋反头目，于是莱茵高就完全“平定”了。法兰克福也曾经历巨大的革命运动，最初是靠市政会的退

①康拉德三世。——编者注

②韦甘德（雷德维茨的）。——编者注

让，后来则靠征集军队控制住了局势。在莱茵普法尔茨，在选帝侯毁约以后大约又有8 000个农民集结起来，再次烧毁寺院和城堡；但是，特里尔大主教[①]得到冯·哈伯恩元帅的支援，于5月23日在普费德斯海姆附近击败了农民。随着惨案不断发生(仅在普费德斯海姆一地，就有82人被杀)，随着魏森堡于7月7日被占领，这里的起义就最终结束了。

这时，在所有的农军中只剩下两支没有被征服：黑高—黑林山农军和阿尔高农军。斐迪南大公曾经利用这两支农军进行阴谋活动。就像卡齐米尔封疆伯爵以及其他诸侯企图利用起义来吞并教会地产和诸侯领地一样，斐迪南大公也企图利用起义以扩大奥地利王室的权力。他曾经和阿尔高农军首领瓦尔特·巴赫和黑高农军首领布尔根巴赫的汉斯·弥勒进行谈判，要求他们俩说服农民宣布站在奥地利一边；这两个首领虽然都是可收买的人，可是，他们在农军中也不能为所欲为，他们所能做到的只不过是使阿尔高农军和斐迪南大公缔结停战协定，并对奥地利保持中立，仅此而已。

黑高农军在从符腾堡地区撤退途中破坏了一批城堡，并从巴登封疆伯爵境内争取到了一些援军。5月13日他们向弗赖堡进军，18日开始轰击该城，23日该城投降，他们高举旗帜进入城内。他们从这里开往施托卡赫和拉多尔夫采尔，并同两城守军进行小规模持久战，但并没有取得战果。这两个城市以及贵族和邻近各城市都根据魏恩加滕协定向湖军农民求援，而湖军中昔日的造反者竟有5 000人之众起来反击自己的同盟者。这些农民的地方狭隘性实在太严重了。只有600人拒绝战斗，他们想加入黑高农军，结果被杀害。然而，在卖身投

①理查(格赖芬克劳的)。——编者注

敌的布尔根巴赫的汉斯·弥勒策动下，黑高农军放弃了围攻；汉斯·弥勒随即逃走，而农军也大半散去了。农军的残部借助于希尔青根的狭窄而陡峭的山间小路以自卫，7月16日，他们在当地被抽调前来的官军击败并被消灭了。瑞士若干城市出面为黑高农军斡旋而缔结了一项协定，然而该协定最终并不能使汉斯·弥勒幸免于难，他虽有背叛农民之功，但仍在劳芬堡被捕并被斩首。在布赖斯高，弗赖堡这时(7月17日)也背叛了与农民的同盟，而且派军队来对付农民；但由于诸侯军力单薄，也于9月18日在这里缔结了奥芬堡条约[202]，松德高也一同签署了该条约。黑林山的八路联军和克莱特高农民都还没有解除武装，这时为冯·苏尔茨伯爵的苛政所逼，再次举行起义，于10月间被击溃。11月13日，黑林山农军被迫签订条约[203]，12月6日，上莱茵起义的最后一个堡垒瓦尔茨胡特城陷落了。

自从特鲁赫泽斯撤军以来，**阿尔高农军**又向各寺院和城堡进击，并对联盟军队的蹂躏进行有力的报复。他们遭遇的官军为数不多，这种军队只能进行零星的小规模袭击，决不能深入森林追击农军。6月间，在一向恪守中立的梅明根城爆发了反对名门望族的运动。这次运动只是由于偶然碰上了几路能及时赶来支援名门望族的联盟军队，才被镇压下去。平民运动的传教士和领袖沙佩勒尔逃往圣加仑。农民奔往城郊，正想轰击城垣，这时他们获悉特鲁赫泽斯正从维尔茨堡朝他们逼近。7月27日，农民兵分两路取道巴本豪森和上金茨堡迎击特鲁赫泽斯。斐迪南大公再次企图把农民争取到奥地利王室一边来。他根据同农民缔结的停战协定，要求特鲁赫泽斯不要再向农民进逼。可是，士瓦本联盟却命令特鲁赫泽斯向农民进攻，只是不许纵火；然而特鲁赫泽斯非常精明，即使他能够驾驭那些一贯在博登湖到美因河一带逞凶肆虐的雇佣兵，他也决不会放弃他的这种首要的、

最起决定性作用的战争手段。农民以伊勒河与洛伊巴斯河为掩护设防，他们约有23 000人之众。特鲁赫泽斯用11 000人面对农民阵地布阵。两军阵地都很坚固。骑士在那样的地势下发挥不了作用。特鲁赫泽斯的雇佣兵在组织、军需供应和纪律方面都比农民强，而阿尔高农军却有大批久经战阵的士兵和经验丰富的军官，并且有很多性能良好的火炮。7月19日，联盟军队开始连续炮击，20日，双方继续炮战，但不分胜负。21日，格奥尔格·冯·弗伦茨贝格率领3 000名雇佣兵加入特鲁赫泽斯的队伍。弗伦茨贝格认识农军中的许多军官，这些军官在远征意大利时曾经是他的部下。于是他就同他们取得联系，进行商谈。在军事手段无济于事的情况下，倒戈阴谋却奏效了。瓦尔特·巴赫和其他许多军官和炮手都被收买。他们竟让人将农民的全部库存弹药统统毁掉，并劝说农军作迂回运动。但是，农军刚刚离开原来的坚固阵地，马上就陷入埋伏，这是特鲁赫泽斯在同巴赫和其他叛徒串通以后，为对付农军而预设的埋伏。农军的首领已经成为叛徒，这些人借口进行侦察而离开了队伍，并启程前往瑞士，因此，农军就更加无法进行自卫了。两个农军纵队全被击溃，只有洛伊巴斯河的克诺普夫率领的第三纵队还能秩序井然地撤退。这个纵队在肯普滕附近的科伦贝格山重整旗鼓，却遭到特鲁赫泽斯的包围。特鲁赫泽斯在这里也不敢进攻他们；他切断了农军的补给线，并下令放火焚烧周围大约200个村庄，企图以此来瓦解农军的斗志。农民们忍受着饥饿，眼看着自己的家园被大火焚毁，终于被迫投降了（7月25日）。有20多人立即被处死。洛伊巴斯的克诺普夫是这路农军中唯一不举降旗的领袖，他逃到了布雷根茨；但是在那里被捕，经过长期监禁之后，被处以绞刑。

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农民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六

正当士瓦本地区的那些早期运动爆发的时候，**托马斯·闵采尔**又赶回**图林根**，并且从2月底或3月初开始定居于帝国直辖自由市**米尔豪森**，这里是他那一派的力量最强的地方。他掌握了整个运动的领导权；他深知在德国南部即将普遍掀起风暴，就着手把图林根变成德国北部运动的中心。他找到的是一块大有可为的地盘。图林根是宗教改革运动的策源地，这里群情万分激昂；由于革命的宗教政治理论广泛传播，特别是由于被压迫农民物质生活十分贫困，邻近的各邦——黑森、萨克森以及哈茨山区也都具备了发动总起义的条件。尤其是在米尔豪森，整个小市民阶级的群众都已经被争取到闵采尔的激进路线一边，并且急切地等待时机，以便凭借他们在人数方面的优势同不可一世的名门望族进行较量。闵采尔为了避免在适当时机到来以前操之过急，不得不亲自出面劝告大家保持冷静；然而他的弟子、在米尔豪森领导运动的普法伊弗却已经动手蛮干起来，将局面弄到使闵采尔无法再延迟起义的地步。1525年3月17日，即还在德国南部总起义之前，米尔豪森就已经发生了革命。原有的城市贵族市政会被推翻了，政权掌握在新选出来的“永久市政会”手中，而永久市政会的主席就是闵采尔[204]。

对于激进派的领袖来说，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在运动还没有达到成熟的地步，还没有使他所代表的阶级具备进行统治的条件，而且

也不可能去实行为维持这个阶级的统治所必须贯彻的各项措施的时候，就被迫出来掌握政权。他**所能**做的事，并不取决于他的意志，而取决于不同阶级之间对立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历来决定阶级对立发展程度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发展程度。他**所应**做的事，他那一派要求他做的事，也并不取决于他，而且也不取决于阶级斗争及其条件的发展程度；他不得不恪守自己一向鼓吹的理论和要求，而这些理论和要求又并不是产生于当时社会各阶级相互对立的态势以及当时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或多或少是偶然的状况，而是产生于他对于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的一般结果所持的或深或浅的认识。于是他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无法摆脱的进退维谷的境地：他**所能**做的事，同他迄今为止的全部行动，同他的原则以及他那一派的直接利益是互相矛盾的；而他**所应**做的事，则是无法办到的。总而言之，他被迫不代表自己那一派，不代表自己的阶级，而去代表在当时运动中已经具备成熟的统治条件的那个阶级。他不得不为运动本身的利益而维护一个异己阶级的利益，不得不以空话和诺言来对自己的阶级进行搪塞，声称那个异己阶级的利益就是本阶级的利益。谁要是陷入这种窘境，那就无可挽回地要遭到失败。我们在最近还看到过这样的事例；只要回顾一下无产阶级的代表们[205]在最近法国临时政府中的处境就足以证明这一点，虽然他们本身代表的只是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低阶段。在有了二月政府——姑且不谈我们的高贵的德国临时政府和帝国摄政政府[206]——的经验以后，谁还指望获得官方地位，那他必定是目光短浅到了极点，再不然就至多是口头上的激进革命派罢了。

然而闵采尔作为米尔豪森永久市政会首脑所处的地位，要比任何一个现代革命执政者所处的地位面临更大的风险。不仅当时的运

动，就连他所生活的整个世纪，也都没有达到实现他自己刚刚开始隐约意识到的那些思想的成熟地步。他所代表的阶级刚刚处于形成阶段，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也远远没有具备征服和改造整个社会的能力。他所幻想的那种社会变革，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还缺乏基础，这些物质条件甚至正在孕育产生一种同他所梦想的社会制度恰恰相反的社会制度。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不得不恪守自己一向宣讲的关于基督教平等以及按照新教精神实行财产公有的教义；他不能不为实现他的教义至少作一番尝试。当时已经宣布一切财产都归公有，一切人都有同等的劳动义务，一切政府机构都应取消。可是，实际上米尔豪森仍然是一个共和制帝国直辖市，仅仅略带几分民主色彩，拥有一个处于市民大会监督之下的由普选产生的参议会，拥有一个草草组成的贫民救济机构。当时的新教市民们一听说推翻现存社会就惊恐万状；而所谓推翻现存社会，事实上仅限于进行一种软弱而不自觉的尝试，其目的就是提前建立后来的资产阶级社会。

闵采尔本人似乎也感觉到了他的理论同他所直接面临的现实之间有一条鸿沟；他的天才观点在他的大批拥护者的愚钝的头脑中越遭到歪曲，这条鸿沟就越明显地呈现在他的面前。他以前所未有的热忱投身于扩大和组织运动的工作；他向四面八方发出信件，派遣使者和密使。他在信件和传教中流露出一种革命的狂热情绪，这种狂热情绪甚至同他本人的早期著作相比也令人震惊。闵采尔在革命前所写的小册子中的那种天真烂漫的幽默情趣完全消失了，他早年惯用的那种思想家的平静练达的笔调再也看不到了。闵采尔此时已经完全成为革命的先知；他不断激起群众对统治阶级的仇恨，激发狂放不羁的热情，所用的完全是旧约中的先知表达宗教狂热和民族狂热的那种激烈的语调。从闵采尔这时努力追求的文风就可以看出，他所要

影响的民众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文化水平。

米尔豪森的示范作用和闵采尔的宣传鼓动很快就在远近各地产生了影响。在**图林根**，在**艾希斯费尔德**，在**哈茨山**，在**萨克森公爵领地**，在**黑森**和**富尔达**，在**上法兰克尼亚**，在**福格特兰**，农民到处起义，集结成农军并烧毁城堡和寺院。闵采尔一般被公认为整个运动的领袖，而米尔豪森始终是运动的中心。这时在爱尔福特有一个纯粹市民阶级的运动获得了胜利，在当地占统治地位的一派一直对农民采取暧昧的态度。

在图林根，诸侯面对农民一开始也惊惶失措、束手无策，就同法兰克尼亚和士瓦本的情况一样。直到4月的最后几天，黑森邦伯才拼凑成一支军队——这个邦伯就是菲力浦，新教和资产阶级有关宗教改革的史籍对他的虔诚盛加赞扬，而我们却要在这里简要地揭露他对农民采取的卑鄙手段。菲力浦邦伯通过几次迅速进兵和断然行动，很快就平定了他的绝大部分领地，然后招募新兵，侵入直到当时还是他的采邑领主的富尔达修道院院长[①]的领地。5月3日，他在弗劳恩贝格击败了富尔达的农军，平定了全境，并乘此机会不仅摆脱了修道院院长的统治，甚至还把富尔达修道院院长领地变成一块黑森采邑——当然，他是准备日后再把这些教会领地变为世俗领地。然后他就攻下爱森纳赫和朗根萨尔察，并同萨克森公爵部队汇合，进攻起义大本营米尔豪森。闵采尔在弗兰肯豪森附近集结了他的大约8 000人的军队，并配备了一些大炮。图林根农军的战斗力远不及上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的部分农军在同特鲁赫泽斯周旋时所发挥的战斗力；这支农军装备很差，纪律松弛，打过仗的老兵很少，各级领导者都非常缺乏。

①约·亨讷贝格。——编者注

闵采尔本人显然没有任何军事知识。尽管如此，诸侯还是认为在这里适于采取特鲁赫泽斯常常用以取胜的策略：背信食言。5月16日，他们开始谈判，缔结了一项停战协定，但后来却在停战期满之前，突然袭击农民。

闵采尔率领他的人马驻扎在今天仍称为战斗山的阵地上，以车垒[207]为掩护。农军士气日益低落。诸侯许下诺言，如果农军活捉闵采尔并且把他献出来，就可以得到宽赦。闵采尔让大家围成一个圆圈，并让大家讨论诸侯的要求。一个骑士和一个教士表示赞成投降；闵采尔立刻喝令把他们俩带到圆圈中间，当场斩首示众。这一果断有力的威慑行动受到了坚定的革命者的欢呼，农军又略为稳住了阵脚；但是，如果后来不是有人发现诸侯雇佣兵在包围全山之后不顾停战协定而以密集队形攻上山来，绝大部分农军最后还是会不战而逃的。农军在车垒后面迅速摆开阵势，但是炮弹和枪弹已经向自卫能力丧失殆半而又不习惯于作战的农民飞来，雇佣兵已经冲到车垒前面了。经过短暂的抵抗之后，车垒防线被突破，农民的大炮被夺，整个队伍都被击溃了。他们四散奔逃，溃不成军，结果就更容易落入包抄过来的部队和骑兵的手中，这些部队杀得农民尸横遍野，血流成渠。8 000个农民中有5 000多人被杀；剩余的农军逃往弗兰肯豪森城中，而诸侯的骑兵也同时进了城。该城失守。闵采尔头部负伤，在一间房子里被发现而就擒。5月25日，米尔豪森也宣布投降；一直留守该城的普法伊弗逃脱了，但在爱森纳赫地区被捕。

闵采尔在诸侯面前遭到严刑拷问，然后被斩首。他毕生英勇果敢，在走向刑场时，依然充满大无畏的精神。他被害时至多不过28岁。普法伊弗也被斩首，此外还有无数人也遭到杀害。在富尔达，那位上帝的虔诚信徒黑森的菲力浦开始制造血案；他和萨克森诸侯下令

用剑杀死造反的人，在爱森纳赫杀死24人，在朗根萨尔察杀死41人，在弗兰肯豪森战斗以后杀死300人，在米尔豪森杀死100多人，在格尔马尔附近杀死26人，在廷格达附近杀死50人，在桑格豪森附近杀死12人，在莱比锡杀死8人，至于被打成残废的、受刑较轻的，以及城市村庄被洗劫被焚毁的事，就更不在话下了。

米尔豪森不得不放弃帝国直辖自由市的权利而被并入萨克森领土，正如富尔达的修道院辖区被并入黑森邦伯领地一样。

诸侯率军穿过图林根林山，这时从比尔德豪森营寨开来的法兰克尼亚农民已经在这里同图林根农民会合，并烧毁了许多城堡。诸侯军队同农民会战于迈宁根城下；农民被击败，向城中撤退。迈宁根城突然关闭城门，并威胁要从背后进攻他们。农军因同盟者倒戈而陷入困境，只好向诸侯投降，并且还在谈判过程中就已经溃散了。比尔德豪森营寨早已解散；因此这支农军溃散以后，萨克森、黑森、图林根和上法兰克尼亚的起义者最后的残部就被消灭了。

阿尔萨斯的起义比莱茵河右岸的起义爆发得晚一些。斯特拉斯堡主教管区的农民临近4月中才开始起义，接着，上阿尔萨斯和松德高农民也揭竿而起。4月18日，一支下阿尔萨斯农军洗劫了阿尔托夫寺院；另外几支农军在埃伯斯海姆和巴尔附近以及在维勒河谷和乌尔比斯河谷也建立起来了。这些农军很快就集结在一起，组成了下阿尔萨斯农民大军，并筹划攻占城市和村镇、捣毁寺院。各地都要求每三个男人就要征召一人编入农军。这支农军的十二条款比士瓦本—法兰克尼亚农军的条款要激进得多[208]。

下阿尔萨斯农军的一个纵队于5月初集中在圣伊波利特附近，企图夺取该城而没有成功，但是他们在各地市民的赞同下，于5月10日占领了贝格海姆，13日占领了拉波茨韦勒，14日占领了赖兴魏

尔。在此期间，第二个纵队由埃拉斯穆斯·格尔伯率领踏上征途，试图袭击斯特拉斯堡，但没有成功，于是这个纵队就向孚日山脉进发，捣毁了毛尔斯明斯特寺院并围攻察伯恩，该城于5月13日向农军投降。他们由此地向洛林边境进发，并在与边境毗连的公爵领地上发动起义，同时还在山区各关隘布防。农军在萨尔河畔埃比泽姆附近和诺伊堡附近建立了庞大的营寨；在萨尔格明德附近有4 000个德意志的洛林农民构筑了防线；最后还有两支农军先头部队掩护前线和右翼，一支是孚日山脉的科尔本农军在斯蒂泽尔布罗恩附近，一支是克莱堡农军在魏森堡附近，而左翼则延伸到上阿尔萨斯农军的驻地。

上阿尔萨斯农军从4月20日开始行动，相继于5月10日、5月12日、5月15日迫使苏尔茨、盖布韦勒、森海姆及其附近地区同农民结盟。奥地利政府同周围的帝国直辖市虽然立即联合起来反对他们，但由于力量太弱，无法对他们进行顽强的抵抗，更不用说进攻他们了。因此，除了少数几个城市以外，整个阿尔萨斯到5月中旬都已经掌握在起义者手中。

但是，这时官军已经逼近，准备镇压奋起造反的阿尔萨斯农民。这些官军是**法国人**，他们在这里复辟了贵族统治。洛林的安东公爵早在5月6日就率领一支3万人的队伍出发了，这支队伍里有法国贵族的精兵，有西班牙、皮埃蒙特、伦巴第、希腊和阿尔巴尼亚的援军。5月16日，安东公爵在卢普施泰因附近同4 000名农民遭遇，不费什么气力就把农民打败了，17日他已迫使被农民占领的察伯恩向他投降。可是，还在洛林官军进城并解除农民武装的过程中，投降协议就被撕毁了；毫无防备的农民遭到了雇佣兵袭击，绝大部分被杀。其余的下阿尔萨斯农军各部队都自行解散了，于是安东公爵就向上阿尔萨斯

农军进攻。上阿尔萨斯农军曾经拒绝开到察伯恩支援下阿尔萨斯农军，此时就在舍尔韦勒附近遭到洛林官军的全力猛击。他们抵抗得非常勇敢，但由于敌人拥有极大的优势——3万人对7 000人，由于一部分骑士，特别是赖兴魏尔城的地方长官①投敌叛变，所以他们虽然以巨大的勇气拼死抵抗，但结果仍然遭到挫败。上阿尔萨斯农军被彻底击败而溃散了。于是公爵以惯用的残酷手段平定了阿尔萨斯全境。只有松德高没有受到公爵的蹂躏。奥地利政府于是扬言要把公爵请到国内来，胁迫本国农民于6月初缔结了恩西斯海姆协定。但是过了不久，奥地利政府就撕毁了这个协定，并把运动的鼓吹者和领袖成批绞死。农民于是再次举行起义，这次起义一直到松德高农民加入奥芬堡协定时(9月18日)才告结束。

现在只剩下**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的农民战争还需要加以介绍。自从恢复旧权利运动以来，这一地区以及毗邻的**萨尔茨堡大主教管区**始终都在反对政府和贵族，这里也是广泛传播改革教义的沃土。宗教迫害和横征暴敛促使起义爆发。

萨尔茨堡城在农民和矿工的支持下，从1522年以来就因该城的城市特权和宗教事务而同大主教②发生争执。1524年底，大主教命令招募来的雇佣兵袭击这座城市，用城堡上的大炮进行威胁，并迫害异教的传教士。同时，他还征收新的苛捐杂税，从而激起了全城居民的极大愤慨。1525年春，就在士瓦本—法兰克尼亚起义和图林根起义爆发的时候，整个萨尔茨堡地区的农民和矿工也突然举行起义，组成以**普拉斯勒**和**魏特莫泽尔**为首领的农军，解放了这座城市，并围攻萨

①乌·拉波尔特施泰恩。——编者注

②马·朗格。——编者注

尔茨堡城堡。他们同德国西部农民一样结成基督教同盟，并且把他们的要求编成条款。这里的条款有十四条。

在**施泰尔马克**、**上奥地利**、**克恩滕**和**克赖因**，新的非法的赋税、关税和规定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的切身利益，农民于1525年春举行起义。他们占领了一些城堡，并且在哥伊斯附近打败了曾经镇压过恢复旧权利运动的老将——步兵统领迪特里希施坦。虽然政府采取欺骗手法招抚了一部分起义者，可是大多数人仍然保持团结，并同萨尔茨堡农民实现了联合，这样一来，农民和矿工就控制了整个萨尔茨堡地区以及上奥地利、施泰尔马克、克恩滕和克赖因的绝大部分区域。

在蒂罗尔，改革的教义同样深入人心。闵采尔的密使曾在这里进行活动，其成效甚至比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其他各地更为明显。斐迪南大公也在这一地区迫害新教义的传教士，并且也以新的专横的财政措施侵犯居民权利。结果同其他各地一样，这里也在1525年春爆发了起义。起义者的最高首领盖斯迈尔是闵采尔派，他是全部农民首领中唯一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人。起义者夺取了许多城堡，并对僧侣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尤其在南部，在埃奇河地区更是如此。福拉尔贝格农民也举行了起义，并参加了阿尔高农军。

大公从各方面受到了压力，于是接二连三地对造反者作出让步，可是就在不久以前，他还企图用烧杀掳掠的手段消灭这些造反者。他召集了各世袭领地的议会，并在议会开会前同农民缔结了停战协定。在这期间他集结力量，以求尽快地用另一套语言去教训这些奋起造反的人。

这个停战协定自然没有实施多久。迪特里希施坦由于耗尽了钱财，便开始在公爵领地内进行搜刮。他的斯拉夫族部队和马扎尔族部

队又肆意对居民进行无耻的蹂躏。于是施泰尔马克人民再次举行起义，在7月2—3日的夜间，他们在施拉德明袭击步兵统领迪特里希施坦，把所有不说德语的人都杀了。迪特里希施坦本人被俘。3日早晨，农民组成陪审法庭，把俘虏中的40个捷克贵族和克罗地亚贵族判处死刑。这些贵族立即被斩首。这件事起了作用；大公立刻答应了五个公爵领地（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施泰尔马克、克恩滕、克赖因）内各等级的一切要求。

在蒂罗尔，议会的要求也得到批准，因而北部就被平定了。然而南部人民仍然坚持原先的要求，不同意议会的软弱决议，仍然没有放下武器。直到12月，大公才在这里用武力恢复了秩序。他毫不犹豫地处决了一大批落到他手中的暴动策划者和领袖。

8月，格奥尔格·冯·弗伦茨贝格率领1万名巴伐利亚士兵向萨尔茨堡开来。由于这支强大军队的到来，加上农民之间出现了纷争，这就促使萨尔茨堡起义者同大主教缔结协定。协定在9月1日订立，大公也对此表示接受。然而这两个诸侯在此期间增补了足够的兵力以后，便立即撕毁协定，因而迫使萨尔茨堡农民再次举行起义。起义农民坚持了一个冬天；春天，盖斯迈尔来到他们这里，并同来自各方面的官军展开了战绩辉煌的较量。在1526年5—6月间，他在一系列出色的战斗中先后打败了巴伐利亚军、奥地利军、士瓦本联盟军和萨尔茨堡大主教雇佣兵，并且阻击了各路敌军，使之久久不能汇合。在这期间，盖斯迈尔还找到了围攻拉德施塔特的机会。最后，由于被优势敌军团团围住，他被迫退却，杀出重围，率领残部穿过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到达威尼斯境内。威尼斯共和国和瑞士成了这位不屈不挠的农民领袖进行新的密谋活动的据点；他活动了一年之久，想把这两个国家卷入对奥战争，如果成功了，那他就有可能重新掀起农民起义。可

是在洽谈过程中，他竟死于刺客之手。只要盖斯迈尔还活着，斐迪南大公和萨尔茨堡大主教[1]就不得安宁。他们收买了一个匪徒，这个匪徒于1527年杀害了这位危险的造反者。[2]

①马·朗格。——编者注

②米·盖斯迈尔于1532年4月15日被杀害。——编者注

七

盖斯迈尔退到威尼斯境内以后,农民战争的最后一幕就告结束了。各处农民再度遭受他们的教会领主、贵族领主或城市贵族领主的奴役;各地同农民缔结的协定都被撕毁,胜利者对战败者极尽掠夺搜刮之能事,因而使农民承受的负担比以前更加沉重了。德国人民进行的最伟大的革命尝试,以屈辱的失败而告终,而且一时还受到加倍的压迫。然而从长远来看,农民阶级的状况并没有因为起义遭到镇压而更加恶化。凡是贵族、诸侯和僧侣能够年复一年地从农民身上榨取的东西,他们在战前就已经榨取到了;当时德国农民从自己的劳动产品中所得到的份额,仅限于维持自己生存以及延续后代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一部分生活资料,这一点同现代无产者是一样的。所以,一般说来农民身上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榨取了。许多富裕中农自然是破了产,大批依附农则被迫去充当农奴,公社的整片地产被没收,大批农民由于家宅被毁、田园荒芜,由于社会动荡而被迫流浪,或成为城市平民。但是战争和破坏是那个时代习以为常的现象,而且一般说来,农民阶级的生活水平已经低到极点,以致不可能通过增加赋税而使他们的生活状况持续恶化下去。接踵而来的历次宗教战争,以及最终爆发的那场一再造成巨大破坏和人口锐减的三十年战争[209],使农民遭受灾难的深重程度远远超过农民战争;尤其是三十年战争,毁灭了农业生产中最主要的一部分生产力,同时又摧毁了许多城市,从而

使农民、平民和破产市民长期陷入一贫如洗的苦难深渊。

遭受农民战争打击最大的是**僧侣**。他们的寺院和教堂被焚毁，他们的金银财宝被抢走，不是卖给外国，就是入炉熔化了，他们贮存的物资都耗尽了。他们在各地的抵抗力最薄弱，而人民仇恨的怒火完全集中在他们身上。其他等级，即诸侯、贵族和市民阶级，甚至眼看高级教士陷入窘境成了众矢之的而暗中称快。农民战争普遍推广了将教会财产收归俗用以利农民的做法，而世俗诸侯以及一些城市则极力设法按照对**他们**最有利的方式将教会财产收归俗用，在新教各邦中，高级教士的产业很快就转入诸侯或名门望族手中。甚至连僧侣诸侯的权势也已受到侵犯，世俗诸侯则很善于从这方面去利用人民的仇恨。例如，我们看到，富尔达修道院院长[①]是如何从黑森的菲力浦的采邑领主地位降为他的臣属的。又如，肯普滕城竟强迫拥有诸侯封号的修道院院长[②]把他在该城享有的一系列重要特权廉价地卖给该城。

贵族也同样受到沉重的打击。他们的城堡大半被毁，一些极其显赫的家族破落了，只有靠为诸侯效劳来维持生存。他们在农民面前无疑是不堪一击的；他们到处都被击败，被迫投降；只有诸侯的军队才挽救了他们。他们日益丧失其帝国直属等级的重要地位而处于诸侯的统治之下。

整个看来，**城市**也没有从农民战争中得到什么好处。名门望族的统治几乎到处都重新得到巩固；市民阶级反对派很久都不能复原。城市贵族旧时的陈规惯例一直沿袭到法国革命时期，使工商业在各

①约·亨讷贝格。——编者注

②塞·冯·布赖滕施泰因。——编者注

个方面都受到了束缚。诸侯们认为，市民派或平民派在斗争期间只是靠了城市才得势于一时，所以城市要对此事负责。一些原先就隶属于诸侯领地的城市（例如弗兰肯豪森、阿恩施塔特、施马尔卡尔登、维尔茨堡等）遭到了残酷的敲诈勒索，这些城市的特权被剥夺，面对贪婪专横的诸侯，只能任其摆布；另一些帝国直辖市（例如米尔豪森）则被并入诸侯领地，或者像法兰克尼亚的许多帝国直辖市那样，至少要由毗邻的诸侯兼管。

在这种情况下，唯一从农民战争的结局中捞到好处的是**诸侯**。本文一开头就已经谈到，德国工商业和农业的发展水平不高，使德国人根本不可能通过集权构成一个**国家**，这种发展状况只能造成局部的和省区的集权，因而在分裂状态下代表这种局部的和省区的集权势力的诸侯，便成了从现存社会政治关系的每一次变动中都必然得到好处的唯一等级。当时德国的发展水平是如此低下，同时各省区的发展水平又是如此参差不齐，致使在世俗诸侯领地之外，还有行使主权的僧侣管区、城市共和国以及拥有主权的伯爵和男爵能够同时并存；但是这种发展尽管十分迟缓无力，却不断地推动**省区的**集权，也就是说，它迫使其余的帝国等级屈从于诸侯的统治。因此，在农民战争结束的时候，只有诸侯才能从中得利。事实也正是如此。诸侯不仅由于僧侣、贵族和城市这些竞争者被削弱而得到相对的好处，他们还从其他所有等级那里夺走了主要战利品［spolia opima］，从而得到绝对的好处。教会财产以最有利于他们的方式变成了世俗财产；一部分接近破落或完全破落的贵族不得不逐渐屈服于他们的统治；向城市和农民搜刮勒索来的金钱都源源流入他们的金库，同时由于取消了那么多城市特权，他们在财政措施上就更可以为所欲为了。

德国分裂割据状态的加剧和巩固是农民战争的主要结果，同时

也是农民战争失败的原因。

我们已经看到，德国当时处于怎样的分裂割据状态，它不仅分成无数独立的、彼此毫不相干的省区，而且整个国家在每一个这样的省区都分裂为多层次的等级和等级集团。除了诸侯和僧侣之外，在农村中还有贵族和农民，在城市里还有城市贵族、市民和平民，所有这些等级的利益即使不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也是彼此毫不相干的。在所有这些复杂的利害关系之上，还有皇帝和教皇的利害关系。我们已经看到，这些不同的利害关系最后是怎样缓慢地、勉强地、因地而异地形成了三大派；尽管好不容易才形成这几派，每一等级却还是违背现存条件给国家发展所规定的方向，各行其是地去开展自己的运动，因而不仅同所有的保守派等级发生冲突，而且也同其他所有的反对派等级发生冲突，最后势必遭到失败。济金根起义中的贵族是这样，农民战争中的农民是这样，整个温和的宗教改革运动中的市民也是这样。甚至农民和平民在德国大多数地区也没有采取共同行动，而是互相掣肘。我们也已经看到，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阶级斗争如此零散，因而使革命运动遭到完全失败，使市民阶级运动半途而废。

地方和各省区的分裂割据状态以及由此必然产生的地方和省区的狭隘性断送了整个运动；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和平民都没有采取过集中的全国性的行动；例如农民们在每个省区都各行其是，从来不愿支援邻区的起义农民，因而在各次战斗中相继被官军歼灭，而官军人数往往不到起义者总数的十分之一——所有这一切，读者都可以从上面的阐述中看得一清二楚。某些农军同敌人缔结的各种停战协定和协议无异于对共同事业的背叛，而唯一能使各路农军实现联合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自己或多或少地采取了共同的行动，而在于使他们吃了败仗的各种各样的敌人采取了共同的行动，这种情形最

鲜明地说明了各省区农民互不关心的毛病严重到了什么程度。

我们在这里又很自然地看到同1848—1850年的运动相似的情况。在1848年，反对派各阶级的利益也互相冲突，每一个阶级都自行其是。资产阶级虽然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以致无法再忍受封建官僚专制制度，但是，它的力量还不足以马上使其他阶级的要求服从它自己的要求。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很薄弱，不能指望它迅速跳过资产阶级阶段而立即夺取政权，但是，它在专制制度下已经深刻地体验到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滋味，而且总的说来，它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因而决不会再把资产阶级的解放看成它自身的解放。本国的多数群众，即小资产者、小资产者的同伴（即手工业者）和农民，已经被暂时还是他们的天然同盟者的资产阶级所抛弃，因为资产阶级认为他们过于革命；在某些地方，他们又被无产阶级所抛弃，因为无产阶级认为他们不够先进；而他们自己中间也存在分歧，所以一事无成，而且对左右两面同是反对派的人们都持反对态度。最后可以这样说，1525年在农民中表现出来的地方狭隘性并不比1848年参加运动的所有阶级所表现的地方狭隘性更严重。成百次的地方性革命，紧跟着发生的成百次横行无阻的地方性反革命，小邦分立状态保持不变等等，这一切都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上述情况。**谁要是在1525年和1848年两次德国革命及其结局之后还想入非非地谈论什么联邦共和国，那么他就没有别的去处，只配送入疯人院。**

然而这两次革命，即16世纪的革命和1848—1850年的革命，尽管十分相似，但也有很明显的本质的区别。1848年的革命即使没有证明德国的进步，却也证明了欧洲的进步。

从1525年的革命中得到好处的是谁呢？诸侯。从1848年的革命中得到好处的是谁呢？**大**诸侯，即奥地利和普鲁士。站在1525年的小

诸侯背后的，是用赋税锁链把这些小诸侯束缚起来的小市民，站在1850年的大诸侯背后，即站在奥地利和普鲁士背后的，是很快就通过国债制服这些大诸侯的现代大资产者。而站在大资产者背后的则是无产者。

1525年的革命是一次德国的地方性事件。当德国人进行农民战争的时候，英国人、法国人、波希米亚人、匈牙利人都已进行过他们的农民战争了。德国当时已经四分五裂，而欧洲四分五裂的状况就更为严重。1848年的革命并不是德国的地方性事件，它是伟大的欧洲事件的一个部分。在1848年革命的整个进程中，它的动因并不是局限于一个国家的狭窄范围之内，甚至也不是局限于一个洲的狭窄范围之内。可以说，曾经作为这次革命的舞台的那些国家，对于这次革命的发生所起的作用恰恰最少。这些国家或多或少是一些没有意识、没有意志的原料，将在目前席卷整个世界的一场运动的进程中受到改造。这场运动在我们的现存社会制度下看起来当然只能是一种外来的力量，但它归根结底正是我们自己的运动。因此，1848—1850年的革命就不可能像1525年的革命那样结束。

弗·恩格斯写于1850年夏秋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6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0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7卷翻译

弗·恩格斯

*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条件与前景[210]

我认为，1852年巴黎任何一次革命取得胜利，都必然会立即引起神圣同盟对法国的战争。

这次战争将完全不同于1792—1794年的战争[211]，那时的事件决不能与之相比。

一

国民公会[49]在军事上粉碎联军这样的奇迹，比较仔细地加以研究之后，就显得大为减色；拿破仑藐视国民公会的14个军团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在许多方面颇有理由。拿破仑常说，联军的错误起了主要作用，这完全正确。甚至在圣赫勒拿岛上，他仍然认为卡诺是庸才。

1792年8月，9万普奥军队侵入法国。普鲁士国王①原想直捣巴黎，但不伦瑞克公爵和奥地利的将军们却不同意。于是指挥便不统一了；时而踌躇不前，时而快速推进，计划经常改变。在越过了阿戈讷高地的隘路后，杜木里埃在瓦尔米和圣默努尔德挡住了他们的道路。联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编者注

军本来可以绕过他，让他安然留在原地不动，然后他也许不得不尾随联军向巴黎推进，而且只要联军的行动不出大错，他甚至从后方也不会使联军遭受危险。联军甚至可以比较安全地前进，并把他打垮，这并不费力，因为正如法国人自己也承认的，联军的数量多并且质量又好。联军没有这样做，而是在瓦尔米对他进行令人可笑的炮击，在战斗过程中，甚至在以纵队攻击之际，联军将军们还一再改变主意，时而莽撞，时而畏葸。两次攻击，无论就军队的数量来看，还是就力量和士气来看，都是很可怜的，过错不在士兵，而在指挥上举棋不定。这不是什么攻击，充其量不过是装装样子。如果全线坚决猛攻，无疑会使法国义勇军和士气沮丧的步兵团陷于覆没。在战斗以后，联军又不知所措地停在原地，一直到士兵染上疾病为止。

热马普会战，杜木里埃之所以获胜，是因为他第一次半本能地用集中众多兵力的方法去对抗奥地利式封锁线体系、无限地拉长战线（由奥斯坦德到马斯河）的方法。但在第二年春天，他由于执意要夺取荷兰而犯了同样的错误，而奥军则集中兵力进攻。结果便造成内尔温登会战和比利时的丧失。在内尔温登会战中，特别是在这次会战的较小的战斗中，可以看出，法国义勇军，这些大受称赞的英雄们，如果不是在杜木里埃的指挥下，打起仗来并不比1849年南德的“人民自卫团”更好。不久杜木里埃叛变，旺代暴动[50]，军队溃散，士气沮丧。如果13万奥军和英军坚决向巴黎挺进，革命就会被镇压下去，巴黎也就会被夺取。正像一年以前一样，他们如果不是做了蠢事，就会攻下巴黎了。但是联军首脑们没有那样做，他们停止在要塞前面，并竭尽全力，不惜大量采用战略上陈旧的办法来逐一争取点滴小利，在这上面他们整整费去了六个月的时间。

在拉斐德叛变之后，仍集结在一起的法军有近12万人。1792

年，义勇军大约有6万人。1793年3月，又征集了30万人。这样一来，在8月间宣布全民征集制[212]以前，法国军队至少应有30万—35万人。全民征集制的实行使这个数字增加了约70万人。除去一切减员，法国人在1794年初，大约能出兵75万人去抵抗联军，远远多于进攻法国的联军。

1793年4—10月，法国人到处挨打，只不过由于联军的拖延战术，这些打击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战果。从10月起，双方互有胜负，到冬季暂时休战；1794年春，根据全民征集制征集的军队开赴前线，全部投入了战斗；结果，5月在所有战线上都取得了胜利，最后于6月在弗勒吕斯的胜利[211]决定了革命的命运。

可见，国民公会及其以前的8月10日的内阁[213]，是有足够时间作军事准备的。但是从1792年8月10日到1793年3月，人们一直无所事事；几乎没有把义勇军当成一回事。1793年3月才征集了30万人；自此时起至第二年3月，国民公会有充分的时间和自由来进行军事准备，有整整一年的时间，而其中有10个月，由于吉伦特党人的垮台，革命的政党摆脱了一切束缚。在一个拥有2 500万人口的国家中，只要能持武器的居民的比例正常，如果有一年的时间，召集100万士兵，建立75万人的现役部队（人口的3%）去抵抗外敌，是不需要任何魔法的，虽然这在当时是尚无先例的事。

所有国内的暴动，除了旺代以外，我认为在军事上都没有任何意义。除了里昂和土伦暴动[214]以外，其余的都仅在六个星期内不费一枪一弹就被扑灭了。里昂是被按全民征集制征集的部队夺回的，而土伦则是因为拿破仑巧妙的袭击和坚决的进攻，以及它的守卫者的错误而被收复的。

在1794年与联军作战的75万人中，至少有君主政体下的老兵10

万人和其他士兵15万人，其中一部分是义勇军，一部分则是由最初征集的30万人中招来的，他们已经连续作战有的18个月，有的12个月，这些人对于战争已经习惯。此外，在50万新兵中，至少有一半参加过1793年9、10、11月的战斗，至于刚入伍的新兵，在开赴前线作战之前也必须至少受过三个月的训练。拿破仑在远征西班牙时，曾经计算过随营训练所需的时间是三四个星期。如果不把下级和中级军官计算在内（当时联军方面一般来说这类军官的素质较好），那么1794年的法国军队绝对不是一群粗野的、没有受过训练的、受“为共和国捐躯”的思想所鼓舞的志愿兵，而是无疑与敌军相当的一支优良的军队，因为他们当时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组训，而联军又采用了一种始终劳而无功的战法，这种战法使久经锻炼而特别适于进攻的军队军心涣散，而使年轻的处于守势的敌军受到训练并习惯于战争。毫无疑问，1794年法国将军们虽然也犯了不少错误，但是比敌方将军们高明得多；断头台保证了指挥的统一和行动的协调，而国民公会的代表们自己做了一些蠢事的某些特殊情形则不在此例。尊贵的圣茹斯特就犯过一些这样的错误。

关于众兵战术的几点说明：(1)众兵战术的初始想法源于热马普那次幸运的机动，这次机动与其说是出于军事计谋，毋宁说是出于本能。这个想法产生于法军极差的素质，他们需要数量上的优势，只是为了使自己在军事上多少具有一点自信心；他们不得不用数量来弥补训练的不足。卡诺对这一发明究竟起过什么作用，完全不清楚。(2)众兵战术还处于极不成熟的状态，例如，在1794年图尔宽和弗勒吕斯会战[211]中，这种战术就完全没有采用（当时法军和卡诺本人犯了极大的错误），一直到1796年拿破仑在他六天的皮埃蒙特远征[215]中，成功地各个歼灭了优势的敌人兵力以后，才向人们表明了这种战

术的意义，而在这以前，人们对它并不了解。(3)至于卡诺本人，这个家伙越来越使我怀疑。我自己显然不能对他作确定的判断，因为我手头没有他给将军们的指令。但是就已有的材料来判断，他主要的功劳似乎就在于他的前任帕希和布绍特的极端愚昧和无能，以及救国委员会[89]中其余所有的人对军事一窍不通。这真是“盲人国里独眼龙称王”。卡诺是老工兵军官，曾在北方军团中任国民公会的代表。他知道，要塞、军队需要什么样的物资等等，特别是知道法军缺少什么。当然，他在一定程度上也懂得，像法国这样的国家要用什么方法才能动员军事资源；因为在实行革命的全民征集制的情况下，反正会有许多浪费，只要能达到主要的目的——迅速动员资源，这些资源或多或少的浪费是可以不计较的。所以，不必认为卡诺有什么了不起的天才，以便说明他所获得的成就。尤其使我对众兵作战是卡诺发明的这一说法发生怀疑的是，他所作的1793—1794年的全面计划，恰恰是建筑在相反的作战方法之上的；他没有集中，而是**分散了**法国军队，并对敌人侧翼作战，使敌人反而能够**集中自己的力量**。卡诺后来的经历：他在执政内阁等时期充当道德卫士；他的勇敢的安特卫普保卫战[216]（一般地说，要塞的防卫正是使平庸的、墨守成规的、但是赋有一定顽强精神的军官出名的一种差事，况且1814年对安特卫普的围攻持续不到三个月）；最后，他硬要拿破仑在1815年采用1793年的方法，与集中了120万人而且完全按照另外一种作战体系行事的联军相对抗；还有他一贯的庸俗作风——所有这一切都不能说明卡诺有天才。一个正直的人能够像他那样在热月、果月、雾月等政变[217]之后居然还站得住脚，这是从没有见过的！

总而言之，国民公会之所以得救，唯一原因是联军的兵力**没有集中**，这就使国民公会有整整一年的时间进行军事准备。它得救的原

因和老弗里茨在七年战争[218]中得救的原因是一样的；和1809年威灵顿在西班牙得救的原因也是一样的，虽然当时法军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比全部敌军至少强大三倍，但只是因为拿破仑不在西班牙，法军元帅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相互倾轧，从而使自己的大批兵力处于瘫痪状态。

二

目前，联军早已摆脱了1793年所干的蠢事，他们出色地集中了自己的兵力，而且在1813年就已经能这样做了。1812年，俄国战局使俄国成为整个神圣同盟[60]在大陆战争中的中心。俄国军队构成主力，普鲁士、奥地利和其他国家的军队后来才集结在它的周围。俄国军队在联军侵入巴黎之前一直是主力。亚历山大（更确切地说是他背后的俄军总参谋部）事实上是各国军队的总司令。但是从1848年起，神圣同盟就已经建立在更加坚固的基础上了。1849—1851年反革命的发展，使法国以外的整个欧洲大陆对俄国的关系成为纯粹的附庸关系，就像莱茵联邦[219]和意大利对拿破仑的关系一样。尼古拉，或者说帕斯凯维奇，是神圣同盟战时的必然的独裁者，正如同涅谢尔罗德是平时的必然的独裁者一样。

此外，至于现代的军事艺术，拿破仑已经使它十分完善了。在下面将要谈到的某些情况出现之前，人们除了在情况许可时仿效拿破仑，便没有什么别的可做了。但是，这种现代的军事艺术已经举世皆知。在普鲁士，每个少尉还在佩缨候补军官考试之前，就早已背熟了其中可以死记硬背的部分。至于奥军，他们在匈牙利战局

中认清并撤换了他们那些糊涂的、地地道道奥地利式的将军们：文迪施格雷茨、韦尔登、格茨之辈，以及其他老朽。而拉德茨基在意大利的两次战局——因为我们已经不再为《新莱茵报》写文章了，也就不必再抱任何幻想——则与匈牙利战局相反，第一次非常之好，第二次是杰作。在这方面他得到了谁的帮助，是无关紧要的，至少这个老头子头脑非常清晰，能吸取别人天才的思想 。如果不是意大利将军们指挥拙劣、互不配合、经常举棋不定，查理-阿尔伯特施展阴谋，以及敌对营垒内反动贵族和僧侣的援助，使拉德茨基更容易固守，那么1848年在佩斯基耶拉、曼图亚、莱尼亚戈和维罗纳四个要塞之间的防御阵地（这个阵地在四边形的四周都有很好的掩护）以及拉德茨基在这个起义的国家中间在未获援助之前对这个阵地所进行的防御，可以说是杰作。同样也不应当忘记：他驻屯在世界上最富饶的国家，因此不必担心他的军队的给养。但是，1849年战争**对奥地利人来说是史无前例的**。皮埃蒙特人不集中兵力在诺瓦拉和莫尔塔拉（这条阵线约3德里[①]长）附近切断通往都灵的道路（这原本是上策），或者从该线上以两三个纵队向米兰前进，而是陈兵于塞斯托至皮亚琴察一线。这条战线长达20德里，从一翼到另一翼的距离足有三四日的强行军路程，而皮埃蒙特军的人数为7万人，就是说每德里只有3 500人。这是对于米兰的一次可怜的分进合击，他们的兵力到处都太薄弱了。 拉德茨基看出了意军采取的是1792年奥军的旧方式，所以他完全采用拿破仑的方式与他们作战。皮埃蒙特军的战线被波河截为两段，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拉德茨基就在波河附近突破战线，打入一个6万人的楔子，由此就把

---

①1德里等于7 420米。——编者注

南面的两个师与北面的三个师隔断；然后迅速地以他的全部兵力进攻北面的三个师（集结了将近35 000人），把他们驱逐到阿尔卑斯山，从而使皮埃蒙特军的两个军彼此隔断，同时也与都灵隔断。这个在三天内结束战局的机动，几乎完全是抄袭拿破仑1809年在阿本斯贝格和埃格米尔附近的机动[220]（拿破仑式机动中最天才的一次），它至少证明了：奥军已经远远摆脱了像阅兵式那样"永远缓步前进"①的旧习惯。这里决定一切的恰恰就是迅速。贵族和拉莫里诺的叛变，特别是这次叛变给奥军提供了意军阵地和计划的确实情报，使奥军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他们的任务。萨瓦旅在诺瓦拉不作战而肆意抢掠的卑劣行为也起了同样作用。但从军事的观点来看，皮埃蒙特军的不合理部署和拉德茨基的机动已经足以说明取胜的原因。这两个事实在任何情形下都必然会造成这样的结果。最后，俄国人由于其军队的性质而不得不采取一种与现代作战体系十分接近的作战体系。俄军主力是由大量半野蛮因而行动笨拙的步兵和人数众多的、同样半野蛮的非正规的轻骑兵（哥萨克）组成的。在决定性的战斗中，在大的会战中，俄军都是以众多兵力作战的。苏沃洛夫还在强攻伊兹梅尔和奥恰科夫的时候就已经懂得了这一点。这个军队所缺乏的运动性，部分地为非正规的骑兵所弥补，因为后者从四面八方围绕着它行动，由此就隐蔽了它的一切运动。但正是由于俄国军队显著的众多性，它才最适合于构成联军的核心、支柱和骨干，因为联军的行动总是要比一国军队的行动缓慢一些。俄军在1813和1814年出色地发挥了这种作用，在这几年中几乎没

①1813年流行于普鲁士的民歌《来自偏僻村庄的后备军》的副歌。——编者注

有一次会战计划不是人数众多的俄军纵队以其纵深和密度超过其他一切军队而立即引人注目的。

1812年以后，法军几乎不能再被看做是拿破仑传统的主要体现者。这个传统或多或少已经被一切大的欧洲军队所接受。主要在帝国的最后几年间，这个传统在所有这些军队中都引起了革命。拿破仑的体系，只要适合于某一个军队的性质，就在战略上和战术上为所有这些军队所采用。在这里也表现出资产阶级时代的把一切拉平的趋势；旧的民族的特点在军队里也正在消失：法国军队、奥地利军队、普鲁士军队以及在相当程度上甚至包括英国军队，现在都是几乎同样出色地组织拿破仑式机动的机器。这并不妨碍它们在其他方面，例如在战斗等等方面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但是，在一切欧洲(大的)军队中，只有半野蛮的俄国军队能运用特有的战术和战略，因为只有它还没有成熟到采用充分发展了的现代作战体系的程度。

至于法国人，由于他们在阿尔及利亚进行小型战争，甚至中断了拿破仑大规模作战的传统。这种强盗式的战争对纪律所造成的损害是否能为使军队适应这种战争的优点所补偿；这种战争究竟是使士兵们习惯于吃苦耐劳，还是使他们因过度疲劳而沮丧；最后，这种战争是否会使将军们丧失大规模作战所需要的眼力——这些将来肯定会弄清楚的。但无论如何，法国骑兵在阿尔及尔或多或少是变糟了。它已忘记了自己的长处——密集的攻击，而习惯于散兵队形，在这方面，哥萨克人、匈牙利人和波兰人总是比它高明。在那些将军当中，乌迪诺在罗马城下大出洋相，只有卡芬雅克一人在6月战斗中出了名；[221]但是，所有这些都还不算是大的考验。

因此，总的说来，采用占优势的战略和战术的机会在联军方面和革命方面至少是相同的。

三

但是，把一个全新的阶级推向统治地位的新的革命，难道不会像第一次革命那样，催生出新的作战手段和新的作战方法吗？这种新的作战方法，将会使现在的拿破仑式的作战方法显得过时和无用，正像第一次革命时期的作战方法使七年战争时期的作战方法显得过时和无用一样。

现代的作战方法是法国革命的必然产物。它的前提是**资产阶级和小农**的社会解放和政治解放。资产阶级出钱，小农当兵。两个阶级摆脱封建的与行会的枷锁，是创建现今的庞大的军队所必需的条件；而与社会发展的这个阶段相联系的富裕程度和文化程度，同样是保证现代军队有必要数量的武器、弹药、粮食等物资，培养必要数量的有素养的军官，以及士兵本身获得必要智力所必需的条件。

我现在就以拿破仑使之完善的那种现代作战体系来做例子。现代作战体系的两个枢轴是：人员、马匹和火炮这些进攻手段的众多性和这些进攻手段的运动性。运动性是众多性的必然结果。现代的军队不能像七年战争时期的小部队那样，几个月内只在20德里的区域内运动。他们不能把全部需要的粮食都携带在随营仓库中。他们不得不像成群的蝗虫那样扰害某个地区，在骑兵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四面八方去征集粮秣，而且当一切都吃尽的时候就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仓库贮藏只要能供应意外的需要就够了。这些仓库时常告罄而又重新补充，它们必须跟随军队迅速转移，所以很少能够满足军队哪怕仅仅一个月的需要。因此，现在的作战体系不可能在贫困的、半野蛮的和人口稀少的国家长期采用。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法军慢慢地在西班牙并

很快地在俄国崩溃。但是另一方面，西班牙人也因法军的侵略而崩溃，他们的国家被弄得枯竭不堪。而且俄军甚至在波兰也不能长期采用它所特有的不灵活的众兵作战体系，至于在俄国领土内，只要还没有铁路，这个体系就根本不能应用。如果俄国在第聂伯河或者德维纳河进行防御，那它就会土崩瓦解了。

但是，军队的这种运动性，也要求士兵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因为他们在许多场合必须善于独立行动。巡逻、粮秣征集、前哨勤务等范围已经大为扩展，每个士兵必须具有较大的主动性，士兵常常必须单独行动并且依靠自己的智力行事，散兵战获得重大意义，而其结果则视每一单个士兵的知识、眼力和精力如何而定，所有这一切都要以军士和士兵具有比在老弗里茨军队里曾经有过的更高的文化程度为前提。但是，在野蛮的或半野蛮的民族中，群众没有这样的文化程度，还不能使未经筛选而征召来的50万—60万人，既能被训练成为守纪律的像机器那样动作的士兵，同时又能获得或者保持在小规模战争中所需的这种眼力。野蛮人生来就具有这种强盗式的眼力，例如哥萨克就是这样；但是他们也因此而不适合于执行正规的军事勤务，正如同农奴出身的俄国步兵不适合于真正的散兵战一样。

现代作战体系要求每个士兵具有的这种普遍的平均文化程度，只有在最发达的国家才有：例如在英国，士兵即使是粗野的农民出身，也受到过城市的文明教育；在法国，军队是由解放了的小农和城市平民（代服兵役者）组成的；在德意志北部，封建制度或者已经消灭，或者多多少少采取了资产阶级的形式，所以在那里军队有相当一部分名额由城市补充；最后，从最近几次战争来判断，至少在从封建成分最少的地区所招募的那一部分奥地利军队中，这样的文化程度

看来也是有的。除了英国以外，小农经营到处都成为军队的基础，而且小农在地位上越接近于自由的所有者，则军队就越适合于现代的作战体系。

但是不仅是单个士兵的运动性，而且整个军队的运动性也以资产阶级时代的文化程度为前提。革命前的军队的不灵活，正是同封建制度相联系的；仅仅运载军官的大量辎重和随从就阻碍了每一个运动。军队也同整个运动一样缓慢地爬行。专制君主制度中正在兴起的官僚机构在物资管理方面进行了一些整顿，但同时它和大金融资本结合在一起却引起了大规模的侵吞。如果说官僚机构曾经给军队带来某些利益的话，那么它把形式主义的和迂腐的思想带给军队，则加倍地危害着军队。老弗里茨这个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俄国直到今天还受害于所有这些弊病。到处受欺骗、遭克扣的俄国军队真是饥肠辘辘，士兵在行军中像苍蝇似地一群群死去。只有资产阶级国家才有能力供养军队，因而才能指望他们的军队有运动性。

因此，就运动性而言，它在各方面都是资产阶级军队的特性。但是，运动性不仅是军队众多性的必要的补充，甚至还常常代替后者（例如1796年拿破仑的皮埃蒙特之战）。

但是众多性和运动性一样，也是现代文明军队的特征。

不管补充军队的方法（如征兵制、普鲁士的后备军制[222]、瑞士的民军制[223]、法国的全民征集制[212]）多么不同，但是近60年来的经验证明：在资产阶级和小自由农的制度下，在任何一个全民战争中，被召入伍的都没有超过全部人口的7%，而实际作战的大约只有5%。在法国，1793年秋人口大约为2 500万，那么根据这个比例计算，总计应有士兵175万人，其中实际作战的应为125万人。当时，在边境、在土伦附近和在旺代（这里把交战双方的人数都计算在内），125万人

差不多是有的。在普鲁士，现有人口为1 600万，其7%和5%应分别为112万人和80万人。但普鲁士兵力的总和，连正规军和后备军合计在内，也很难达到60万人。这个例子证明：对于一个国家甚至5%已经是够多的了。

好吧！如果说法国和普鲁士能够比较容易地召集人口的5%，在紧急时甚至7%，那么奥地利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充其量也只能召集到5%，而俄国则3%也不易办到。就奥地利来说，如果人口为3 500万，那么5%便应为175万人。1849年，奥地利竭尽全力也只动员了约55万人。匈牙利军队——其兵力由于发行了科苏特纸币而多了一倍——大概有35万人。如果再加上不是逃避了征集便是在皮埃蒙特军队中服役的5万伦巴第人，那么总数就是95万人，也就是说不到全部人口的$2\frac{2}{3}$%。同时，生活在特殊条件之下的克罗地亚边境居民至少能征调**自己**人口的15%。俄国根据最低的计算有人口7 200万，按5%的比例，应该能征集360万人。但是，它的正规军和非正规军合在一起从来没有超过150万人；其中，在本土内，它最多能出动100万人对敌作战。也就是说，它的总兵力从未超过总人口的$2\frac{1}{12}$%，而现役兵力则从未超过$1\frac{7}{18}$%或$1\frac{39}{100}$%。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地广人稀，交通工具少，国民生产低。

进攻手段的众多性和运动性一样，也是文明发展到较高阶段的必然结果，特别是武装力量和人口总数在现代的比例，是资产阶级解放以前的任何一个社会发展阶段都达不到的。

因此，现代的作战方法以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解放为前提，它是这种解放在**军事上的表现**。

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同样也将有特殊的表现，并且将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新的作战方法。这是很清楚的。现在甚至已经可以确

定：这种新的作战方法的物质基础将是什么。

但是，可以期待的革命最初采用的作战方法，距真正解放了的无产阶级将要采用的方法还很远，正如现在混杂的、有一部分还构成其他阶级尾巴的德法无产阶级的单纯夺取政权，距无产阶级的真正解放还很远一样，因为无产阶级的真正解放在于消灭一切阶级对立。

在德国和法国，无产阶级真正解放、一切阶级差别全部消灭和一切生产资料完全集中的前提是：英国也要一起行动；德法现有的生产资料至少增加一倍。而新的作战方法也同样正是以此为前提的。

拿破仑在军事科学上的卓越发现不能靠奇迹来消除。新的军事科学只能是新的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正如同当年由革命和拿破仑所创造的军事科学是革命所产生的新关系的必然结果一样。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就工业来说，问题不在于消灭蒸汽机，而在于增加它的数量，同样，就作战方法来说，问题不在于减少军队的众多性和运动性，而在于把两者提到更高的水平。

增长了的生产力是拿破仑作战方法的前提；新的生产力同样是作战方法上每一步新的完善的前提。如今在欧洲战争中，铁路和电报一定会给有才干的将军或陆军部长一个采取全新的战法的机会。生产力的逐渐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的逐渐增多，同样也提供了征集数量更为众多的兵员的可能性。如果法国的人口不是2 500万而是3 600万的话，那么总人口的5%就不是125万人，而是180万人。在这两种情况下，文明国家的实力与野蛮国家的相比，都相应地增强了。只有文明国家才有庞大的铁路网，那里的人口增长迅速，比如与俄国相比要快一倍。所以说，所有这一切计算都证明：西欧对俄国的**长期**臣服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且越来越不可能。

但是，随着阶级的消灭而产生的新的作战方法，其力量并不在

于随着人口的增多，一个国家可动员的5%将成为一个越来越大的数字；而只能在于可服兵役的人数已不是全部人口的5%或7%，而是12%—16%，就是说，占成年男性人口（由18岁到30岁甚至到40岁的一切健康的男子）的一半到三分之二。但是，如果说俄国若不在其国内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组织上，首先是在生产上进行彻底的革命，就不能把它可动员的力量由2%—3%提高到5%，那么德国和法国若不在生产上进行革命，并使生产增加一倍以上，也同样不能把它们可以动员的力量由5%增加到12%。只有通过机器等的使用使人均劳动生产率比现在增加一倍，才能使从生产中解脱出来的人数增加一倍，而这也只能维持一个较短的时期，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长期维持这个5%的比例。

如果具备了这方面的条件，如果国民生产能得到充分提高和集中，如果消灭了阶级——这是绝对必要的（普鲁士的一年制志愿兵[224]，只要还未成为军士或后备军军官，由于他的贵族的社会地位，永远不会成为与农民和工匠并肩战斗的能打仗的士兵）——那么，只有能持武器的人口的限度才是实际征募的限度；也就是说，在危急之际可在最短时间内武装15%—20%的人口，并真正使12%—15%的人口对敌作战。但这样庞大的人数是以一种甚至完全不同于目前军队的运动性为前提的。如果没有完备的铁路网，这样庞大的人数便无法集中，无法保证供给粮食和弹药，无法运动。而不采用电报，就绝对不可能指挥他们。而且因为在这样人数众多的情况下，战略家和战术家（战场上的指挥官）不能集于一身，所以在这里就要有分工。战略行动，即各军行动的协调，必须由一个电报中枢来指挥；而战术行动则由各个将军来指挥。显而易见，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战争能够而且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结束，甚至比拿破仑所

需要的时间还要短。就花费来讲，这样做是必要的，而且这样众多的人数所实施的每一次突击都必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又使得这样做成为必然的。

因此，按众多性和战略的运动性来说，这些军队必将具有空前惊人的力量。而这样的士兵在执行巡逻勤务时，在成散兵线时，以及在战场上的战术运动性，也将达到更高的程度。这些士兵一定会比现代社会所能有的一切士兵更加健壮、更加灵活和更加机智。

可惜的是，所有这一切只有经过许多年以后才能实现；而到那时，由于没有势均力敌的敌人，这样一种众兵作战就再也不可能发生了。但是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初期，所有这一切还缺少基本的条件；至少1852年是这样。

现在法国无产阶级占人口的百分比，同1789年相比还没有增加一倍。无产阶级当时——至少在1792和1794年间——是充满激情的、振奋的，在不久的将来也必定是这样。但是那时已经可以看出，在伴随着激烈的内部动荡而产生的革命战争中，**无产阶级大部分人的用武之地必定是在国内**。同样的情形现在也将要出现，并且恐怕出现的机会要比以前更多，因为立即爆发内战的可能性将随着联军的前进而增加。因此无产阶级只能派出较少的一部分人到现役军队里去。征募的主要来源仍然是平民和农民。也就是说，革命将不得不采用现代一般作战所采用的那些手段和方法来进行战争。

只有意识形态家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能不能在现役军队占人口4%—5%的条件下找出新的战法和发明一种新的惊人的用兵方法。如果不用蒸汽力代替人力，也就是说，如果不创造与旧的手工织机大不相同的新的生产手段，织布机的生产率便不能增加两倍，同样，在军事艺术上也不可能用旧的手段取得新的成果。只有创造新

的、更有威力的手段，才能取得新的、更重大的成果。每个在战史上因为采用新的战法而创造了新纪元的伟大统帅，不是亲自发明了新的物质手段，就是首先发现了正确运用在他之前所发明的新的物质手段的方法。在蒂雷纳和老弗里茨的时代之间，在步兵学领域发生了革命，由刺刀和燧发枪取代了长矛和火绳枪。老弗里茨在军事科学上的划时代的成就在于：他在当时通常的作战方法的范围内改造并完善了旧的战术，使之适合于新式武器。同样，拿破仑的划时代的成就在于：他发现了在战术和战略上唯一正确使用庞大的众多军队的方法，而这人数众多的庞大军队的出现只是由于革命才成为可能；并且他把这种方法发展到非常完善的程度，以致现代的将军们一般地无法超越他，而只能试图在自己最光辉和最巧妙的作战行动中仿效他罢了。

总之，革命必将运用现代的作战手段和现代的军事艺术来同现代的作战手段和现代的军事艺术作战。施展军事才能的机会，在联军方面至少和在法军方面是同样大的：多兵之旅必胜。

四

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一下，人们究竟能将多少兵力调动到战场上去，并能怎样运用它们。

(1)**俄国**　俄国军队平时定额号称110万人，实际上大约只有75万人。1848年后，俄国政府就一直努力使战时定额达到150万人，尼古拉和帕斯凯维奇尽可能亲临各地视察。俄国现在至少已经实际达到平时定额110万人的满额；从这个数目中最多扣除：

用于高加索的兵力	10万人
用于俄国本土的兵力	15万人
用于波兰各省的兵力	15万人
病员、各种分遣队等	15万人
总计	55万人

因此，只剩下**55万人**可以用于国外的军事行动。这比俄国在1813年实际派遣到国外的多不了多少。

(2)**普鲁士** 如果第一类和第二类后备军、编外人员以及一切可能征召的人员都被征召入伍，这支优秀的军队至少可以有65万人。但现在政府至多仅能动员55万人。我现在就仅以50万来计算。从这个数目中只需要派出比第二类后备军（15万人）略多的兵力去执行守备等任务。各地都在逐步召集的编外人员和下年度新应征人员（尼古拉将会对此十分关注），以及不断过境的俄国军队，可以组成足够的预备队，以防止国内的任何暴乱企图。而且普鲁士军队的病员也会较少，因为他们是在本国集中，他们到莱茵河的行军路程比俄国军队短。但是，就像对俄国军队一样，我减去其中的一半，剩下另外一半，即**25万人**可以动用。

(3)**奥地利** 现役的和休假的士兵——后者是可以和普鲁士的后备军一样迅速归队的——至少有60万人。这里，我照样减去一半，因为对于帝国三分之二的版图来说，随奥地利军队之后行进的俄国军队，在奥地利新的预备队没有编成之前，至少可以当做国内的预备队，控制起义的群众。因此，剩下**30万人**可用来对付敌人。

(4)**德意志联邦** 因为这些邦的首脑都居住在莱茵河附近，同时全部联军都要通过它们的领土，所以它们几乎不需要本国的守备部队去对付内地；在联军对法作战初战获胜后，各邦的预备军将由北

到南遍布德国全境。所以德意志联邦至少可以出动**12万人**。

(5)意大利各国政府、丹麦、比利时、荷兰、瑞典等国的军队,我暂以**8万人**来计算。

按上述的计算,联军的总数为130万人,他们有的已经在服役,有的可以立即征召入伍。所有这些数字都是故意缩小的。我对病员作了很大的扣除,因此在战争开始后的两个月内,仅康复者及其他人员就可以在法国边境附近编成第二支拥有35万人的军队。而且这支军队的数量一定还会大得多,因为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会这样愚蠢,以致在战争开始,现役军队出动后,不立即尽量多地征召新兵,紧接着第一支军队之后出动。

第一支军队(130万人)的各部队大约可在两个月之内以下面的方式全部集中起来:普军和奥军能够将上述定员于两月之中完全动员起来,这一点从去年11月备战以来就用不着怀疑了;至于俄军,它的三个确定的集中地点首先是柏林、布雷斯劳和克拉科夫或维也纳(见下文)。以每天5德里计算,由彼得堡到柏林差不多有45日的行程,由柏林到莱茵河有16日的行程,总共61日的行程。由莫斯科到布雷斯劳有48日的行程,由布雷斯劳到美因茨有20日的行程,总共68日的行程。由基辅到维也纳有40日的行程,由维也纳到巴塞尔有22日的行程,总共62日的行程。如果再加上俄国军队在上述强行军过程中所绝对必需的休息日,那么显而易见:就是驻防在莫斯科、彼得堡和基辅的军队,也只需要**三个月**的时间就完全能够到达莱茵河畔;而且假定军队完全是徒步行进,不乘火车和马车。而这两种运输工具在德国几乎到处可以使用,在俄国和波兰至少部分地区可以使用;这两种工具的使用一定会使军队的运输缩短15—20日。但是俄国军队的主力现在已经集结在波兰各省,而且因为政局有发生危机的可能,

还会有更多的部队派到那里去。所以，俄军行军的出发地点将不是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而是里加、维尔纳、明斯克、杜布诺和卡缅涅茨，就是说大约缩短了60德里的行程，相当于12个行军日和4个休息日。同时，大部分步兵，特别是驻屯在较远的营地的步兵，可以在休息日（每隔三天）至少乘车移动5德里；这样，对于这一部分军队，休息日也可以计算在行军的日数里。炮兵器材、弹药和粮食，可以自由地利用铁路运输。炮兵的车马和炮手可以行进或乘车，所以无论如何要比用以前的方法更早到达目的地。

综上所述，我认为，在革命爆发后两个月，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碍联军按以下序列集中到莱茵河畔：

第一支军队

1. 在莱茵河畔和皮埃蒙特附近的第一线：

普军、奥军等	75万人
俄军	30万人
	105万人

2. 第二线：

相隔10日行程的预备队——俄军	25万人
总计	130万人
	（如上所述）

第二支军队

1. 联军各小成员国的预备队，正在集中的普军、奥军等	20万人
2. 行进中的相隔20日行程的俄军预备队	15万人
	35万人
两支军队总计	165万人

实际上，在目前的情况下，只要五六个星期就可以把30万俄军调动到莱茵河畔，而在同一时间，普军、奥军和联军各小成员国的军

队的上述兵员也可以到达莱茵河畔；但是考虑到任何联军都可能发生的意外的障碍，我就算它整整两个月。当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回来的时候，联军的部署，就向法国进军这一点来说，还不像现在这样有利。尽管如此，当拿破仑与英军和普军在滑铁卢交战的时候，俄军还是到达了莱茵河畔。

法国能派出多少兵力来抵御联军呢？

(1)正规军约45万人，其中5万人在阿尔及尔，不能调出；在其余40万人当中还应当减去病员、最低数量的要塞守备队以及在国内形势不稳定地区驻屯的少数分遣队；因此可以调用的至多25万人。

(2)现在红色党派惯用的方法——重新征召服役期满的士兵入伍——作为强迫手段至多对于六个年龄段的人，也就是对于27—32岁的成年人是有效的。每一个年龄段的可征召人数是8万人。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和气候造成的损失、12年内的正常死亡率、不适合于服兵役者的被淘汰、侨民以及在行政机构本来就已经陷于混乱的时候善于以各种方式逃避归队的人，所有这些使这六个年龄段的48万退伍兵中，真正能重新入伍的士兵减少到不足30万人。其中还应当除去补充要塞守备队的15万人，这15万人主要靠比较年长的并且大多是已婚的人来补充。还剩15万人。只要方法得当，这15万人就能毫无困难地在两个月内动员起来。

(3)人民自卫团、志愿军、义勇军、全民征集制武装，或是其他被称为次等炮灰的人。除了将要征集的约一万多人的别动队之外，在上述武装中，没有人比德国的任何一个市民自卫团士兵更善于使用武器。固然，法国人学这一行要快一些，但是两个月还是太短了。拿破仑之所以能够使他的新兵在四个星期之内完成随营训练，只是因为他有优秀的干部；可是下一次革命的第一个结果将是现役干部队伍的

瓦解。而且大家知道，我们的法国革命者是有传统的，他们将首先高喊：实行全民征集制！200万士兵到国境上去！如果联军还会重复1792—1793年那样的蠢事，如果有时间来逐步训练这200万士兵，那么有200万士兵当然是件好事。可是这是谈不上的。必须估计到，在两个月内敌方会有100万现役士兵出现在国境上，因此问题将在于如何胜利抗击这百万大军。

如果法国人重新盲目地抄袭1793年的传统，那么他们又将以200万人使历史重演，也就是说，他们做的事情过多，由于时间短促，他们实际上将一无所获。在没有干部的条件下，八个星期内训练和编组150万人，实际结果就是无谓地消耗一切资源，使军队甚至连一个可用于作战的营都增加不了。

但是，如果他们有一个称职的陆军部长，懂得一点革命战争和迅速编组军队的方法，并且没有人因为不学无术和追求名望给他造成愚蠢的障碍，那么，他将在可能的范围内自主行事，能够大有作为。那样，大体上必须按如下计划行事：

武装力量首先由两个部分构成：(1)担任国内勤务的城市无产阶级自卫军和可靠的乡村农民自卫军；(2)抵抗侵略的正规军。要塞勤务由无产阶级自卫军和农民自卫军来执行。军队只派出最必要的分遣队。为了保卫巴黎、斯特拉斯堡、里昂、梅斯、里尔、瓦朗谢讷这些最重要的要塞兼大城市，除了它们自己的自卫军和近郊的若干农民支队以外，再有少数现役部队就够了。由失业工人组成的可以执行国内勤务的那部分无产阶级自卫军，将集中在训练营，由不宜于野战勤务的老军官和军士来训练，以补充现役部队中的缺额。训练营可以建在奥尔良附近，这样它也可以用来威胁正统派[40]的区域。

现役部队，要是留在法国境内，就必须增加两倍，即从40万人增

加到110万人。这一步可以用这样的办法来实现，即把每一个营变为一个团，同时不可避免地普遍提升军官和军士的职务，在促使他们尊重革命方面，提升的作用将不亚于断头台和军事法庭。干部队伍的必然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尽可能逐步实现。同时把军官中能争取的尽量争取过来。在不可能用魔法于两个月内变出军官的情况下，这是非常重要的。法国军队的中下级军官本来就普遍具有足够的民族意识，因而在稍加提升和得到陆军部有力领导的条件下，如果能看到战争胜利的机会，特别是对叛乱者和逃兵实行惩一儆百，那么这一类军官从一开始就会干得很出色。军校的学生以及桥梁公路工程局的职员可以充当出色的炮兵军官和工兵军官；并且经过几次行动之后，那种在法军中极为常见的下级军官的军事才干就会开始发挥出来：他们只要经过一次战火的锻炼，便能够指挥一个步兵连。

至于士兵本身：

现役士兵	40万人
再次应征服役的士兵	30万人
有待召集和训练的士兵	50万人

总计120万人，如果去掉10万病员，则为110万人。其中可以用于作战的：

现役士兵	25万人
再次应征服役的士兵	15万人
新兵	40万人
总计	80万人

这些兵员可以用来做什么，很快就会清楚的。40万—50万新兵补充现役军队，并且把他们同在编的和再次应征服役的士兵混编在

各团各营里进行两个月的训练，只要在革命后的第二天就立即着手工作，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所有这些兵员都可以用来补充步兵和炮兵，因为在两个月之内完全可以把一名新兵训练成步兵和能初步操纵火炮的炮手，但不可能训练成骑兵。所以骑兵数量不会有很大的增长。

这个完整的武装计划要求有一位称职的陆军部长，他必须善于正确地估计政治局势，掌握各兵种的战略、战术和具体知识，同时还要具有应有的精力、机敏和果断。另外还需要那些和他在政府中共事的笨伯们给他以完全的行动自由。但是，法国的“红色”党派到哪里去找这样一个人呢！相反，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像通常一样，出现一个不学无术的家伙，被认为而且也自认为是一个杰出的民主主义者，理所当然能胜任各种职务，他企图扮演卡诺的角色，颁布全民征集令，圆满地解决一切问题；他很快就会智穷才竭，于是一切事都听任下级旧官吏按常规处理，让敌军兵临巴黎城下。但是今天要抵抗欧洲的联军，需要的不是帕希、布绍特，甚至也不是卡诺，而必须是拿破仑这样的人，除非敌人特别愚蠢，而自己又特别走运。

不应当忽视，在对联军兵力的所有计算中，对总兵力都作了最低的估计，而对各项扣除则作了最高的估计；因此，只要指挥稍微令人满意一点，可供使用的军队数量就会多于上面的估计，而集中这些军队所需的时间将少于上面的估计。而对法国的估计则正相反，对法国人可支配的时间尽可能估计得长一些，对他们所能编组的总兵力估计得很高，而各项减员则估计得很少；因此，对可供使用的军队数量作了最大限度的高估。总而言之，所有这些推算（没有把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和联军可能犯的大错估计在内）描绘出了一幅对革命尽可能有利的情景。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前提是：革命和敌军的入侵不会立即在国内引起内战。在法国最后一次内战60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不能肯定，狂热的正统派在多大程度上还能发动一场短命的暴动。但是显而易见，随着联军的前进，发生像1793年里昂、土伦等地那种暴动[214]的可能性将会增长，一切在政治上被击败的阶级和派别暂时联合的机会也将会增长。但是纵然如此，我们也还可以设想一种对革命最有利的情况：革命的无产阶级自卫军和农民自卫军能够顺利地解除暴乱的各省和各阶级的武装。

至于德国、意大利等国的起义能给革命造成的有利条件，我们下面就要谈到。

五

现在我们来谈谈实际的作战方法。

假如在地图上把圆规的一脚立在巴黎，而以巴黎到斯特拉斯堡的距离为半径围绕巴黎画一个圆的话，那么这个圆周在南部将在蓬德博瓦桑附近与格勒诺布尔和尚贝里之间的法国边境相交，再沿边境向北经过日内瓦、汝拉山、巴塞尔、斯特拉斯堡和哈格瑙，然后沿莱茵河一直到达河口，圆周虽在个别地方偏离莱茵河，但是偏离的距离也不超过两天的行程。如果莱茵河成为法国的边境，那么从这条边境上不再以阿尔卑斯山脉为屏障的地点起一直到北海止，巴黎与这一边境的任何一点都是等距离的。这样一来，以巴黎为中心的法国的军事体系和它的全部地理条件就相适应了。由尚贝里到鹿特丹的这条单弧线，使法国边境上唯一暴露的并且最靠近首都的那段上的各点，

到巴黎的距离相等，约为70德里，即14日的行程，同时这一段边境又为宽阔的河流所掩护。认为莱茵河是法国自然疆界的这种论断在军事上的现实根据就在于此。

但是莱茵河的这种特殊的地形，又使它成为一切向巴黎分进合击的出发点，因为要使各路军队能够同时到达巴黎并同时从各方面威胁它，就必须从与巴黎等距离的各个地点同时出动。当集结地点位于敌军的势力范围内，甚至在敌军的作战根据地内，这种分进合击行动是非常危险的。尽管如此，一切反革命的联军军队对法国所发动的军事行动都必然采取分进合击，因为：(1)占领巴黎即等于征服了法国；(2)位于法军行动范围内的任何一段边境都不得出现漏洞，否则法军就可以向联军境内及其军队的后方派遣军队从而引起骚动；(3)每一支联军对法国作战都需要投入大量军队，为了保证给养就需要开辟多条战线。

双方军队都必须加以掩护的这段边境，是由尚贝里到鹿特丹。西班牙边境暂时可以不予考虑。由瓦尔河到伊泽尔河的意大利边境有阿尔卑斯山脉作为屏障，而且离巴黎越来越远，因为它是上述圆周的切线。这段边境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须注意：(1)萨瓦山筑垒的隘口，特别是塞尼山筑垒的隘口掌握在法军手中的时候；(2)企图在沿海地区采取牵制行动的时候，而这一定要有特殊的理由；(3)法国军队在边境其他一切地点都有安全保证之后，企图像1796年拿破仑那样，在这里采取攻势的时候。就一切其他情况而言，这一段边境就离得太远了。

因此，无论对于联军还是对于法军来说，积极的军事行动，都只限于从尚贝里或者伊泽尔河到北海一线，以及这一线和巴黎之间的那部分领土。而正是法国的这一部分领土的地形，好像专为防御而

设，这里的山脉和河流的分布，从军事观点来看恐怕是再好不过了。

从罗讷河到摩泽尔河的边境，为一条漫长而难行的，只有几个地方可以通过的山脉——汝拉山——所掩护；孚日山脉与之相接，在其延长线上有霍赫瓦尔德山和伊达尔林山。这两座山与边境平行延伸，此外，孚日山脉又为莱茵河所掩护。在摩泽尔河和马斯河之间，通向巴黎的道路为阿登高原所掩护，在马斯河的彼岸又为阿戈讷高地所掩护。只有桑布尔河到海边的这一区域无险可守，但是在这里，任何一支军队越前进其处境就越危险，因为如果有一支强大的法军稍稍采取巧妙的行动，他们就有从比利时方向被截断而被驱下海去的危险。不仅如此，由罗讷河到北海的全线布满要塞，其中有些要塞，例如斯特拉斯堡，控制着好几个省。

由汝拉山与孚日山脉的会合点向西南沿奥弗涅山脉蜿蜒着一条山脉，形成北海及大西洋这一边与地中海那一边之间的分水岭。由此向南流的是索恩河，而彼此平行向北流的则有摩泽尔河、马斯河、马恩河、塞纳河和约讷河。在上述的每两条河流之间，以及在约讷河和卢瓦尔河之间，分布着许多绵亘的山脉；这些山脉只有很少几条道路穿过，它们使各条河谷彼此分开。固然，整个山区大部分都适于各兵种作战，但是很贫瘠，没有一支大的军队能够在那里坚持很长的时间。

如果敌人的军队甚至翻越这个山区，以及翻越同样贫瘠的位于马斯河流域和塞纳河流域之间的香槟高原地带，那么他们就进入了塞纳河流域。正是在这里才充分显示出巴黎的位置在军事上的显著优势。

塞纳河流域由其发源地直到瓦兹河口，是由许多条几乎成平行的弧形流向西北的河流构成的，这些河流是约讷河、塞纳河、马恩河、

瓦兹河和埃纳河；它们中的每一条都有许多流向同一方向的支流。所有这些弧形的河谷都在彼此相去不远的距离内会合，而巴黎则位于这些会合点的中心。地中海和斯海尔德河之间的一切陆地边界通向巴黎的各主要道路都要穿过这些河谷，并且同这些河谷一起汇集到巴黎。因此，保卫巴黎的军队总是能比进攻的军队在更短的时间内集中起来并且从一个受威胁的地点转移到另一个地点，因为两个同心圆中内圆的周界较短。巧妙地发挥这种优势，也就是沿内圆的周界不懈地运动，曾经使拿破仑在他1814年著名的战争中能以少数兵力牵制全部联军于塞纳河流域达两个月之久。

弗·恩格斯写于1851年4月

载于1914—1915年《新时代》第33年卷第1册第9、10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0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7卷翻译

弗·恩格斯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225]

[一 革命前夕的德国]

欧洲大陆上的革命剧的第一幕已经闭幕了。1848年大风暴以前的“过去的当权者”，又成为“现在的当权者”了，而那些多少受人欢迎的短期掌权者，如临时执政者、三头执政、独裁者以及追随他们的议员、民政委员、军事委员、地方长官、法官、将军、军官、士兵等等，都被抛到异国，“赶到海外”，赶到英国或美国去了。他们在那里组织起新的“有名无实的”政府、欧洲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国民委员会，以堂哉皇哉的文告宣布它们的成立，那些文告的庄严堂皇，并不亚于真正当权者的文告。

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失败比大陆的革命党派(更确切地说是各革命党派)在全战线各个据点所遭受的失败更为惨重。但这有什么关系呢?为了争取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英国资产阶级不是经过了48年①，而法国资产阶级不是经过了40年②空前的斗争吗?资产阶级不正是在复辟了的君主制以为自己的地位比任何时候都巩固的时刻才最接近自己的胜利的吗?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那种迷信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

①指1640—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编者注

②指1789—1830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编者注

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保证立即获得成功；但是，任何人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越来越强烈，直到它把自己的枷锁打碎。所以，如果我们被打败了，那么我们除了从头干起之外再无别的办法。值得庆幸的是，在运动的第一幕闭幕之后和第二幕开幕之前，有一次大约很短暂的休息，使我们有时间来做一件很紧要的工作：研究这次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1848年2月和3月突然爆发的运动，不是个别人活动的结果，而是民族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每个国家的各个阶级对这种要求和需要的认识程度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已清楚地感觉到。这已经是一件公认的事实。而每当问及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这个先生或那个公民"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而且，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只是知道某某公民不可靠这一件事，那么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

此外，研究和揭示革命动荡及其被镇压下去的原因，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所有这些琐碎的个人争论和互相责备，所有这些互相矛盾的论断，说把革命之舟驶向暗礁以致使它触礁沉没的是马拉斯特，或者是赖德律-洛兰，或者是路易·勃朗，或者是临时政府的其他成员，或者是他们全体——这一切对于从远处来观察这种种运动、因而不了解事件的详情细节的美国人或英国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呢，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都永远不会相信，多半都是庸才、既不能为大善也不能作大恶的11

个人[①]能在三个月之内毁坏一个有3 600万人口的民族，除非这3 600万人和这11个人一样缺乏辨认方向的能力。问题正在于，这3 600万在一定程度上还在昏暗中摸索的人，怎么突然应当自己决定走什么道路，后来他们又怎么迷了路，而让他们从前的领袖暂时回到了领导地位。

因此，如果我们要向《论坛报》[226]的读者说明1848年德国革命必然发生以及它必然在1849年和1850年暂时遭到镇压的原因，那么我们无须叙述德国发生这些事件的全部历史。将来的事变和后代的评论会判定，在这一大堆杂乱的、看似偶然的、互不连贯而又矛盾的事实中，哪一部分将构成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解决这一任务的时候尚未到来。我们现在只限于在可能的范围内加以论述，如果我们能根据确凿的事实找出合理的原因来说明那个运动的主要事件和根本性的转折，使我们能够认清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出现的下一次爆发将指示给德国人民的方向，那么我们也就满足了。

那么，首先，革命爆发时德国处于怎样一种状况呢？

在德国，作为一切政治组织的基础的人民，其各个阶级的构成比任何别的国家都更为复杂。在英国和法国，集中在大城市，特别是集中在首都的强大而富裕的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消灭了封建制度，或者至少像在英国那样，已经使它沦为一些没有多大意义的形式，而德国的封建贵族却仍然保留着很大一部分旧日的特权。封建土地所有制差不多到处都还居于统治地位。封建领主甚至还保留着对租佃者的审判权。他们虽然被剥夺了政治上的特权——对各邦君主的控制权，但他们几乎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对他们领地上的农民的那种中世

①即1848年2月24日成立的法国临时政府的成员。——编者注

纪的统治权以及不纳税的权利。封建制度在有些地区比在另一些地区更为盛行，但是除了莱茵河左岸，它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完全被消灭。[227]这种封建贵族当时人数很多，一部分也很富裕，被公认为国内的第一“等级”。他们充任政府的高级官吏，军队里的军官也差不多全是他们。

当时德国的**资产阶级**远没有英国或法国的资产阶级那样富裕和集中。德国的旧式工业因蒸汽的采用和英国工业优势的迅速扩张而被摧毁了。在拿破仑的大陆体系[228]之下开始出现的、在国内其他地方建立的现代化的工业，既不足以补偿旧式工业的损失，也不能保证工业有足够强大的影响，以迫使那些对于非贵族的财富和势力的任何一点增强都心怀忌妒的各邦政府考虑现代工业的要求。法国在50年的革命和战争中成功地经营了自己的丝纺织业，而德国在这个时期却几乎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旧式的麻纺织业。此外，德国的工业区少而分散；它们深处内陆，主要是利用外国的——荷兰或比利时的——港口进行进出口贸易，所以它们与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大商港很少有或毫无共同的利益；而最重要的是，它们不能建立像巴黎和里昂、伦敦和曼彻斯特那样巨大的工商业中心。造成德国工业的这种落后状态的原因很多，但是只要举出两个就足以说明问题：国家的地理位置不利，距离已经成为世界贸易要道的大西洋太远；从16世纪到现在，德国不断卷入战争，而这些战争又都是在它的国土上进行的。英国**资产阶级**自1688年即已享有政治统治权，法国资产阶级自1789年也已夺到了这种统治权，但德国的资产阶级由于人数少，尤其是由于非常不集中，没有能够获得这种权力。可是，自从1815年以来，德国资产阶级的财富不断增加，而且随着财富的增加，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不断增长。各邦政府虽不愿意，却也不得不至少考虑一下它的

直接的物质利益。我们甚至可以直截了当地指出，各小邦宪法中给予资产阶级的每一点政治势力，在1815—1830年和1832—1840年这两个政治反动时期虽然都再度被剥夺了，但资产阶级却得到了更实际的利益作为补偿。资产阶级每次政治上的失败，都带来贸易立法方面的胜利。当然，1818年普鲁士的保护关税条例以及**关税同盟**的建立[229]，对于德国商人和工业家来说，要比在某一小公国的议会中拥有对嘲弄他们的表决权的大臣们表示不信任的那种不大可靠的权利重要得多。这样，随着财富的增多和贸易的扩展，**资产阶级**很快就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它发现自己最重要的利益的发展受到本国政治制度的约束，国家被36个意图和癖好互相矛盾的君主所任意分割，封建压迫束缚着农业和与之相联系的商业，愚昧而专横的官僚统治对资产阶级的一切事务都严加监视。同时，**关税同盟**的扩大与巩固，蒸汽在交通方面的普遍采用，国内贸易中日益加剧的竞争，使各邦各省的商业阶级互相接近，使它们的利益一致起来，力量集中起来了。这一情况的自然结果就是：它们全都转到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营垒中去了，德国资产阶级争取政治权力的第一次严重斗争获得了胜利。这个变化可以说是从1840年，即从普鲁士的**资产阶级**领导德国资产阶级运动的时候开始的。我们以后还要谈到1840—1847年的这个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运动。

国民的大部分既不是贵族，也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城市里的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和工人，以及农村中的农民。

在德国，由于大资本家和大工业家作为一个阶级尚不发达，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人数非常之多。在较大的城市中，它几乎占居民的大多数；在较小的城市中，由于没有更富裕的竞争对手同它争夺势力，它完全居于支配地位。这个阶级在所有现代国家和现代革命中，

都居于极重要的地位，而在德国则尤其重要，在最近德国的各次斗争中，它常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的地位是介于较大的资本家（商人和工业家）即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或产业工人阶级之间，这种地位就决定了它的特性。它力图爬上资产阶级的地位，但命运中的一点点不顺利就把这个阶级中的某些人抛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在君主制和封建制的国家里，这个阶级的生存要仰赖于宫廷和贵族的惠顾，失去这些主顾，这个阶级的大部分就会破产。在较小的城市里，驻军、地方政府、法院以及它们的属员，通常便是这个阶级繁荣的基础，没有这些，小店主、裁缝、鞋匠、木匠等就无法生存。因此，这个阶级永远摇摆在两者之间：既希望跻身于较富有的阶级的行列，又惧怕堕入无产者甚至乞丐的境地；既希望参与对公共事务的领导以增进自己的利益，又唯恐不合时宜的对抗行为会触怒主宰着他们的生存的政府，因为政府有权力使他们失掉最好的主顾；他们拥有的财产很少，而财产的稳固程度是与财产的数额成正比的，因此，这一阶级的观点是极端动摇的。它在强有力的封建制或君主制政府面前卑躬屈膝，百依百顺，但当资产阶级得势的时候，它就转到自由主义方面来；一旦资产阶级获得了统治权，它就陷入强烈的民主主义狂热，但当低于它的那个阶级——无产阶级企图展开独立的运动时，它马上就变得意气消沉，忧虑重重。我们以后将会看到，在德国，这个阶级如何在这种种不同的状态中变来变去。

德国工人阶级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发展比英国和法国的工人阶级落后，正像德国资产阶级比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落后一样。主人是什么样，仆人也是什么样。人数众多、强大、集中而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的演变，是与人数众多、富裕、集中而强有力的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的发展同时进行的。在资产阶级的各个部分，尤其是

其中最进步的部分即大工业家还没有获得政权并按照他们的需要改造国家以前,工人阶级运动本身就永远不会是独立的,永远不会具有纯粹无产阶级的性质。而在这以后,企业主与雇佣工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就会变得刻不容缓而再也不可能推迟;那时,工人阶级再也不可能被虚幻的希望和永不兑现的诺言所欺骗了;那时,19世纪的重大问题——消灭无产阶级的问题,就终于会十分明朗地毫无保留地提出来了。现在,德国工人阶级中的多数人并不是受雇于现代的工业巨头(大不列颠的工业巨头是最好的标本),而是受雇于小手工业者,他们的全部生产方法,只是中世纪的遗迹。就像棉纺织业大王与鞋匠或裁缝这些小业主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一样,繁华的现代工业中心的十分觉悟的工厂工人也根本不同于小城市里的温顺的裁缝帮工或细木工,后者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方法,与500年前没有多大差别。这种普遍缺乏现代生活条件、缺乏现代工业生产方法的情况,自然伴随着差不多同样普遍缺乏现代思想的现象;因此,在革命刚爆发时,工人阶级中的大部分人要求立即恢复行会和中世纪的享有特权的手工业公会,那是毫不奇怪的。然而,在现代生产方法占优势的工业区域的影响之下,由于交往便利,由于许多工人迁徙不定的生活使他们的智力有了发展,于是便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核心,这个核心关于本阶级解放的思想更加明确得多,而且更加符合现存的事实和历史的需要;但这些工人只是少数。如果说资产阶级的积极运动可以从1840年算起,那么工人阶级的积极运动则开始于1844年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的工人起义[230]。我们在下面很快就有机会来考察这一运动所经过的各个阶段。

最后,还有一个广大的小农业主阶级,农民阶级。这个阶级加上附属于它的农业工人,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但这个阶级本身又分为

不同的部分。第一是富裕的农民，在德国叫做**大农**和**中农**，这些人都拥有面积不等的大片农田，都雇用若干个农业工人。对这个处于不纳捐税的大封建地主与小农和农业工人之间的阶级来说，最自然的政治方针当然就是同城市中反封建的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第二是小自由农，他们在莱茵地区占据优势，因为这里的封建制度已经在法国大革命的有力打击之下垮台了。在其他省份的某些地区也有这种独立的小自由农存在，在这些地方，他们赎买了从前加在他们土地上的封建义务。可是这个阶级只是名义上的自由农阶级，他们的财产大都在极苛刻的条件之下抵押出去，以致真正的土地所有者并不是农民，而是放债的高利贷者。第三是封建佃农，他们不能轻易被赶出所租的土地，但他们必须永远向地主交租，或永远为地主服一定的劳役。最后是农业工人，在许多大农场中，他们的状况和英国的这个阶级的状况完全一样，他们由生到死都处在贫穷饥饿之中，做他们雇主的奴隶。农村居民中后面这三个阶级——小自由农、封建佃农和农业工人，在革命以前是从来不怎么关心政治的，但这次革命显然已经为他们开辟了一个充满光辉灿烂的前景的新天地。革命对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有利，因此可以预料，一旦运动全面展开，他们就会一个跟着一个参加进来。但同时有一点也同样是十分明显的，而且为各个现代国家的历史所证实，即农村居民由于分散于广大地区，难以达到大多数人的意见一致，所以他们永远不能胜利地从事独立的运动。他们需要更集中、更开化、更活跃的城市居民的富有首创精神的推动。

上面对在最近的运动爆发时构成德意志民族的各个最重要的阶级的概述，已经足以说明这次运动中普遍存在的不一致、不协调和明显的矛盾等情况的一大部分。当如此各不相同、如此互相矛盾而又如此奇异地互相交织的利益发生剧烈冲突的时候，当各地区各省的

这些互相冲突的利益以各种不同的比例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尤其是当德国没有伦敦或巴黎那样一个大的中心的时候(这种城市的各项权威性的决定，可以避免每一个地区每一次都要用斗争来重新解决同样的争论)，除了斗争被分解成许多不相联系的格斗，因而耗费大量的鲜血、精力和资本而仍然得不到任何有决定意义的结果之外，还能希望得到什么呢？

德国在政治上分解成36个大大小小的公国，也同样要用组成这个国家而在每个地方又各有特点的各种成分的混乱与复杂来解释。没有共同的利益，也就不会有统一的目的，更谈不上统一的行动。不错，德意志联邦[231]曾宣称是永远不可分割的，但联邦和它的代表机关联邦议会[232]，却从来没有代表过德国的统一。德国中央集权所达到的最高点，是**关税同盟**的成立。北海一带的各邦也曾经因此不得不组成它们自己的关税联盟[233]，而奥地利则仍然关起门来实行它自己单独的禁止性关税。这样，德国可以满意了，因为它为了自己的实际目的现在仅仅分成三个独立的势力，而不是36个。当然，1814年建立起来的俄国沙皇的无上权威，并没有因此而有所变动。

根据我们的前提得出这些初步结论之后，在下一篇里我们就要谈到德国人民的上述各个阶级怎样一个跟着一个卷入运动，以及这个运动在1848年法国革命爆发后所具有的性质。

1851年9月于伦敦

[二 普鲁士邦]

德国中等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可以从1840年算起。在这以前，已经有种种征兆表明，这个国家的拥有资本和工业的阶级已经成熟到这样一种程度，它再也不能在半封建半官僚的君主制的压迫下继续消极忍耐了。德国较小的君主们，都相继颁布了或多或少带有自由主义性质的宪法，这部分地是为了保证他们自己有更大的独立以对抗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霸权，或对抗他们自己邦内贵族的势力，部分地是为了把根据维也纳会议[234]而联合在他们统治之下的各个分散的地区团结成一个整体。这样做对他们自己是毫无危险的，因为，如果联邦议会——它只是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傀儡——要侵犯他们作为主权君主的独立性，他们知道，在反抗它的命令时舆论和本邦议会会做他们的后盾；反之，如果这些邦议会的势力太大时，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运用联邦议会的权力击败一切反对派。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或汉诺威的宪法所规定的制度，在这种情形下并不能推动争取政治权力的严重斗争；因此，德国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对于各小邦立法议会中的琐碎的争端，一般是不加过问的，他们清楚地知道，如果德国两个大邦的政治和国家制度没有根本改变，任何次要的努力和胜利都是没有用处的。但同时，在这些小邦议会中却涌现出一大批自由主义律师、职业反对派；罗泰克、韦尔克尔、勒麦、约尔丹、施蒂韦、艾森曼等等这类大“名人”（Volksmänner），在做了20年喧嚷然而总

是毫无成效的反对派之后，被1848年的革命浪潮推上了权力的顶峰，而他们在暴露了自己的极端无能和微不足道之后，顷刻之间就被推翻了。这是第一批德国土产的职业政客和反对派的样板；他们用演说和文章使德国人耳熟了立宪主义的语言，并用他们的存在本身预示着这样一个时刻即将到来，那时，资产阶级将利用这些夸夸其谈的律师和教授们所惯用然而却不大了解其真实意义的政治词句，并恢复它们本来的含义。

1830年的事件[235]使整个欧洲顿时陷入了政治骚动，德国文坛也受到这种骚动的影响。当时几乎所有的作家都鼓吹不成熟的立宪主义或更加不成熟的共和主义。用一些定能引起公众注意的政治暗喻来弥补自己作品中才华的不足，越来越成为一种习惯，特别是低等文人的习惯。在诗歌、小说、评论、戏剧中，在一切文学作品中，都充满所谓的“倾向”，即反政府情绪的羞羞答答的流露。为了使1830年后在德国盛行的思想混乱达到顶点，这些政治反对派的因素便同大学里没有经过很好消化的对德国哲学的记忆以及法国社会主义，尤其是圣西门主义的被曲解了的只言片语掺混在一起；这一群散布这些杂乱思想的作家，傲慢不逊地自称为青年德意志或现代派[236]。后来他们曾追悔自己青年时代的罪过，但并没有改进自己的文风。

最后，当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一书中宣称立宪君主制是最终的、最完善的政体时，德国哲学这个表明德国思想发展的最复杂同时也是最准确的温度计，就表示支持资产阶级。换句话说，黑格尔宣布了德国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时刻即将到来。他死后，他的学派没有停止在这一点上，他的追随者中最先进的一部分，一方面对一切宗教信仰给予严厉的批评，使基督教的古老建筑根本动摇，同时又提出了德

国人从未听到过的大胆的政治原则，并且企图恢复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的已故的英雄们的应有的荣誉。用来表达这些思想的晦涩的哲学语言，既把作者和读者都弄得昏头昏脑，同样也把检查官的眼睛蒙蔽了，因此“青年黑格尔派”的作家便享有文坛的其他任何一个分支都不能享有的新闻出版自由。

这就是说，德国的舆论界显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些在专制君主制度下因教育或生活状况而能够得到一些政治信息并形成某种独立政治见解的阶级，其中的大多数人渐渐地联合成了一个反对现存制度的强大集团。在评价德国政治发展缓慢时，任何人都不应该不考虑：在德国要得到任何问题的准确信息都是困难的；在这里，一切信息的来源都在政府控制之下，从贫民学校、主日学校以至报纸和大学，没有事先得到许可，什么也不能说，不能教，不能印刷，不能发表。就以维也纳为例，维也纳居民在勤劳和经营工业的能力方面在全德国可以说是首屈一指，论智慧、勇敢和革命魄力，他们更是远远超过别人，但他们对于自身的真正利益，却比别人无知，他们在革命中犯的错误也比别人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对于最普通的政治问题也几乎一无所知，这是梅特涅政府实行愚民政策的结果。

在这样一种制度下，不用再解释也很清楚，政治信息为什么几乎完全被社会中那些有钱私运政治信息到国内来的阶级，尤其是其利益受到现状侵害最严重的阶级——工商业阶级所一手垄断。因此，这些阶级首先联合起来反对继续保持在不同程度上伪装起来的专制制度；应当认为它们进入反对派队伍的时刻是德国的真正革命运动的开始。

德国资产阶级宣告反对政府，可以说是从1840年，即从普鲁士

前国王①——1815年神圣同盟[60]创始者中活到最后的人——死去时开始的。大家知道，新国王②不赞成他父亲的那种主要是官僚军阀式的君主制。法国的资产阶级在路易十六即位时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德国的资产阶级也希望在某种程度上从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那里得到。大家一致认为旧制度已经腐朽、衰败了，应该摒弃了；老国王在位时人们沉默地加以忍受的一切，现在都被大声疾呼地宣布为不能容忍的事情了。

可是，如果说路易十六——"受欢迎的路易"是一个平庸的不思进取的蠢材，他多少意识到自己的无能，没有任何主见，主要是按自己在受教育期间养成的习性行事，那么"受欢迎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则完全是另一种人物。他在性格软弱这一点上的确超过了他的法国先驱，但他却有自己的抱负、自己的见解，他涉猎了许多门科学的基本知识，因此便自以为具有足够的学识，可以对一切问题作出最后的裁决。他深信自己是一流的演说家，在柏林没有一个商品推销员能比他更善于卖弄聪明，更善于辞令。而最重要的是，他有自己的主见。他憎恨而且轻视普鲁士君主制的官僚主义因素，但这只是因为他完全同情封建主义因素。作为所谓历史学派[237]（该学派所信奉的是博纳尔德、德·梅斯特尔及其他属于第一代法国正统派的作家们的思想）的《柏林政治周刊》的创办人和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力图尽可能充分地恢复贵族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这位国王是他治域中的第一个大贵族；在他周围的首先是一班显赫的朝臣——有权势的陪臣、侯爵、公爵和伯爵，其次是许多富裕的下层贵族。他按照自己的意旨统治他

①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

②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那些忠顺的市民和农民。因此，他自己是社会各等级或阶层的至高无上的主宰。而各个等级或阶层都享有各自的特权，它们彼此之间应该用门第的或固定不变的社会地位的几乎不可逾越的壁垒分隔开来；同时，所有这些阶层或"王国的等级"都应该在权势方面恰好达到互相平衡，使国王能保持充分的行动自由，这就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过去准备实现而现在又在努力实现的**美好理想**。

不很了解理论问题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过了相当一段时间才看出了国王的真正意图。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了一个事实，即国王一心要做的和他们所需要的恰恰相反。新国王①刚一发现自己的"辩才"因他父亲之死而可以自由施展，他便在无数次的演说中宣布他的意图；但他的每次演说、每一行动，都使他更加失掉资产阶级对他的同情。如果不是一些严酷而惊人的现实打断了他的美梦，对这种情形他还会不大在意。可惜，浪漫主义不是很会算计，而封建主义自唐·吉诃德时代以来总是失算！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对于轻视金钱这种十字军后裔的最高贵的传统承袭得太多了。他在即位时发现，政府组织虽然已经相当节约，但用度依然浩繁，国库已经不太充裕。在两年之内，一切节余都在朝廷的喜庆宴会、国王巡狩，以及对贫困、破落而贪婪的贵族的赐赠资助等等上面用光了，正常的税收已不够宫廷和政府开支了。于是，国王陛下很快就发现自己处于严重的财政赤字和1820年法令的夹攻之下，1820年法令规定，不经"将来的人民代议机关"的认可，任何新的公债或增税都是非法的。而这时还没有这种代议机关；新国王甚至比他父亲更不愿意建立它；而即使他愿意建立的话，他也知道，自他即位以来，舆论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

①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的确，资产阶级曾经一度期望新国王会立刻颁布宪法，宣布新闻出版自由，实行陪审审判等等；总之，期望他自己会领导资产阶级取得政权所需要的和平革命。现在他们发觉自己错了，于是便转而对国王发动猛烈的攻击。在莱茵省（全普鲁士各地在不同程度上也是这样），他们的不满情绪如此强烈，以致在他们本身缺乏能够在报刊上代表自己意见的人才的情况下，竟然同我们在上面提到的那一极端的哲学派别结成了联盟。在科隆出版的《莱茵报》[238]，便是这个联盟的果实。这家报纸虽然在存在15个月之后就被查封，但可以说它是德国现代报刊的先驱。这是1842年的事。

可怜的国王在经济上的困难，是对他那些中世纪嗜好的最尖锐的讽刺；他很快就看出，如果他不向要求建立"人民代议机关"的普遍呼声作一些小小的让步，他便不能继续统治下去，这样的机关作为1813年和1815年那些早被遗忘的诺言的最后一点遗迹体现在1820年法令中。他觉得实施这个讨厌的法令的阻力最小的方法，就是把各省议会的等级委员会[239]召集在一起开会。各省议会是1823年成立的。王国八个省的省议会的成员包括：(1)上层贵族，德意志帝国原来的各个皇族，它们的首脑人物都是当然的议会成员；(2)骑士或下层贵族的代表；(3)城市的代表；(4)农民或小农业主阶级的代表。全部事情是这样安排的：在每个省都是两部分贵族在议会中占多数。八个省的省议会各选一个委员会，现在这八个委员会都被召到柏林，以便组成一个代表会议来投票决定发行国王所渴望的公债。据说国库是充裕的，发行公债不是为了当前的需要，而是为了建筑一条国有铁路。但联合委员会[240]断然拒绝了国王的要求，声言他们不能行使人民代议机关的职权，并要求国王陛下履行他父亲在需要人民帮助对抗拿破仑时许下的诺言——颁布一部代议制的宪法。

联合委员会的会议表明，怀有反政府情绪的已不只是资产阶级了。一部分农民已经站到他们一边；许多贵族也宣布反对政府，要求颁布一部代议制的宪法，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自己领地上的大农场主和做谷物、羊毛、酒精和亚麻生意的商人，他们同样需要获得反对专制制度、反对官僚制度、反对封建复辟的保障。国王的计划彻底破产了；他没有搞到钱，却增加了反对派的力量。此后接着召开的各省议会会议，更加不利于国王。所有省议会都要求改革，要求履行1813年和1815年的诺言，要求颁布宪法和给予新闻出版自由；有些议会的有关决议措辞颇为不恭，国王在盛怒之下所作的粗暴答复，使事态更加恶化。

同时，政府的财政困难日渐增加。由于缩减对各项公用事业的拨款，由于通过"海外贸易公司"[241]（它是一个由国家出资和承担风险做投机生意的商业机构，很早以来就充当国家借款的经纪人）进行欺诈交易，才得以暂时维持门面；增发国家纸币提供了一些财源，总的说来，这个秘密保守得颇为严紧。然而所有这些计谋很快就显得不够用了。于是又试行另一个计划：设立一个银行，其资本部分由国家，部分由私人股东提供，主要的管理权属于国家，这样一来，政府就能够大量取用这个银行的资金，从而继续进行已经不能再通过"海外贸易公司"进行的欺诈交易。但是，很自然，没有一个资本家愿意在这种条件下投资；只有修改银行章程，保证股东的财产不受国库的侵犯，然后才会有人认股。而当这个计划也失败之后，除了发行公债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但愿能够找到一批资本家，他们不要求那个神秘的"将来的人民代议机关"的允许和保证就愿意出借他们的现款。于是求助于路特希尔德，但他说，如果公债有"人民代议机关"作保，他马上就认购，否则，他决不打算谈这宗交易。

这样，搞到钱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想避开命中注定的“人民代议机关”已经不可能了。路特希尔德拒绝贷款是1846年秋天的事，次年2月国王就把所有八个省议会召集到柏林，把它们组成一个“联合议会”[54]。这个议会的任务，就是完成1820年法令规定在需要的情况下所要做的工作，即表决公债和增税，此外它不应该有任何权利。它对一般立法问题的意见，只是咨议性的；它开会无定期，国王想什么时候开就什么时候开；政府想让它讨论什么问题它就讨论什么问题。当然，议员们很不满足于让他们扮演这种角色。他们一再申述他们在各省议会开会时所表达的愿望；他们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很快就恶化了，而当要求他们同意发行仍然被说成是用来建筑铁路的公债时，他们又一次加以拒绝。

这个表决很快就使他们的会议结束了。越来越愤怒的国王对他们严加申斥并将他们遣散；但钱还是没有弄到手。的确，国王有充分理由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惊慌不安，因为他看到，以资产阶级为首的、包括大部分下层贵族和蕴积在各个下层等级中的各种各样的不满分子在内的自由派联盟，决心要获得它所要求的东西。国王在联合议会的开幕词中徒劳地宣称，他永远不会赐给现代意义上的宪法；自由派联盟坚决要求的正是现代的、反封建的代议制的宪法及其一切成果——新闻出版自由、陪审审判等等；在他们未得到这种宪法以前，他们是分文不给的。很明显，事情不能这样长久继续下去，必须有一方让步，否则就一定会发生破裂和流血斗争。资产阶级知道，它正处在革命的前夜，而且它已准备进行革命。它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争取城市的工人阶级和农业地区的农民的支持，而且大家知道，1847年底，在资产阶级中间几乎没有一个出名的政治人物不冒充“社会主义者”以取得无产阶级的同情，下面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这些“社会主义者”

的实际行动。

起领导作用的资产阶级急于至少是用社会主义来装点门面，是因为德国工人阶级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1840年起，一部分曾到过法国和瑞士的德国工人多少都受到了一些当时法国工人中间流行的粗浅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思想的熏染。1840年以来，这些思想在法国越来越引人注意，这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德国也成了时髦的东西，而且从1843年起，所有的报纸都絮絮不休地讨论起社会问题来了。德国很快就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学派[242]，这一学派的特点与其说是思想新颖不如说是思想含混。它的主要工作是把傅立叶派、圣西门派和其他派别的学说，从法文翻译成晦涩的德国哲学的语言。与这一宗派完全不同的德国共产主义学派，大致也在这个时候形成了。

1844年发生了西里西亚的织工起义，接着又发生了布拉格印花工厂工人的起义。这些被残酷镇压下去的起义，这些不是反对政府而是反对企业主的工人起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在工人中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宣传给予了新的推动。饥荒的1847年的粮食暴动也起了这种作用。简单地说，正像大部分有产阶级（大封建地主除外）团结在立宪反对派的旗帜周围一样，大城市的工人阶级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当做自己解放的手段，虽然在当时的新闻出版法之下，关于这些学说他们所能知道的只是很少一点。当时也不能希望他们对于自身的需要有很明确的认识；他们只知道，立宪派资产阶级的纲领不包含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他们的需要决不局限在立宪思想的范围之内。

当时德国没有单独的共和党。人们不是立宪君主派，就是或多或少比较明确的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

由于这些因素，最小的冲突也一定会引起一次大革命。当时只有上层贵族和上层文武官员是现存制度的唯一可靠的支柱；下层贵族，工商业资产阶级，各个大学、各级学校的教员，甚至一部分下级文武官员都联合起来反对政府；在这些人后面还有心怀不满的农民群众和大城市的无产者群众，他们虽然暂时支持自由主义反对派，但已在低声地说一些关于要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怪话；资产阶级准备推翻政府，无产者则准备随后再推翻资产阶级，而就在这样的时候，政府却顽固地沿着那条必然要引起冲突的道路走去。1848年初，德国已处在革命的前夜，即使没有法国二月革命的促进，这次革命也是一定要爆发的。

这次巴黎革命对于德国影响如何，我们将在下一篇中谈到。

1851年9月于伦敦

[三　德国其他各邦]

在前一篇中，我们几乎仅仅谈到1840年至1848年间在德国的运动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的那个邦，即普鲁士。现在我们则应该略微考察一下同一时期德国其他各邦。

自从1830年革命运动以后，各小邦完全处于联邦议会[232]的独裁之下，也就是处于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独裁之下。各邦制定的宪法既是用来抵御大邦的专横霸道，又是为了给制定宪法的君主们树立声望并把由维也纳会议[234]不依任何指导原则建立的各色各样的省议会统一起来。这些宪法虽然虚有其名，但在1830年和1831年的动荡时期，对各小邦君主的权力仍然是一种危险，所以它们几乎全部被废除，幸存下来的则更加有名无实，只有像韦尔克尔、罗泰克和达尔曼这帮絮絮不休的自我陶醉的人才会设想，他们在这些小邦的不起作用的议会里被允许表明的那种掺和着可耻谄媚的、谦卑的反对立场，能够获得什么结果。

这些小邦里比较坚决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1840年后很快就完全放弃了他们从前希望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这些附庸小邦里发展议会制度的一切想法。当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和同它联合起来的各阶级郑重表示决心，要为在普鲁士实行议会制度而斗争时，它们便立即被公认为除奥地利以外的全德国的立宪运动的领袖。现在，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中部德国那些后来退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243]并因他们

单独召开会议的地点而被称做哥达派[244]的立宪派核心分子，早在1848年以前就讨论过一个计划，1849年，他们把这个计划略加修改提交给全德国的代表。他们打算把奥地利完全排除于德意志联邦[231]之外，建立一个具有新的根本法和联邦议会的、在普鲁士保护之下的新的联邦，并且把小邦归并于大邦。只要普鲁士一实现立宪君主制，实行新闻出版自由，采取不依赖俄国和奥地利的独立政策，因而使各小邦的立宪派能够真正控制各邦的政府，上述一切便可以实现。这个计划的发明者是海德堡（巴登）的盖尔温努斯教授。这样一来，普鲁士资产阶级的解放，就预示着全德国资产阶级的解放，预示着一个对抗俄国和对抗奥地利的攻守同盟的建立。因为，正如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的那样，奥地利被认为是一个十分野蛮的国家，人们对它很少了解，而所了解的一点点，也不是奥地利人的什么光彩的事。因此，当时奥地利不被认为是德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至于各小邦里的其他社会阶级，它们都或快或慢地跟着它们的普鲁士弟兄跑。小资产阶级越来越不满意他们的政府，不满意加重捐税，不满意剥夺他们在同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专制的奴隶"相比时常常借以自夸的那些政治上的虚假特权。但在他们的反对立场中还没有任何明确的东西，表明他们是与上层资产阶级的立宪主义不同的一个独立的党派。农民中间的不满情绪也在增长，但大家都清楚地知道，除非在确立了普选权的国家，这一部分人在安静的和平的时期，从不会维护自身的利益，从不会采取一个独立阶级的立场。城市工业企业中的工人，已感染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毒素"。但是在除普鲁士以外的别的地方，重要城市很少，工业区更少，由于缺乏活动和宣传的中心，这个阶级的运动在各小邦发展得极为缓慢。

政治反对派所遇到的种种障碍，无论在普鲁士或各小邦都促成

了宗教反对派，即平行地进行活动的德国天主教[245]和自由公理会[246]。历史给我们提供了许多例子，说明在那些享受国教的祝福而政治问题的讨论却受到束缚的国家里，与世俗权力相对抗的危险的世俗反对派，常常隐藏在更加神圣的、看来更加无意于世俗利益而一意反对精神专制的斗争后面。很多政府不允许对自己的任何行动进行讨论，但它们却不敢贸然制造殉教事件和激起群众的宗教狂热。所以，1845年在德国的每一个邦里，或者是旧罗马天主教，或者是新教，或者是这两者，都被视为国家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每一个邦，这两个教派的或其中一派的教士，都是官僚政府机构的重要因素。因此，攻击新教或天主教正统，攻击教士，就等于变相攻击政府本身。至于德国天主教派，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德国，尤其是对奥地利和巴伐利亚的天主教政府的攻击；而这些政府也正是这样理解这一点的。自由公理会的信徒，反对国教的新教徒，有点像是英国和美国的一位论派[247]，他们公开宣称反对普鲁士国王①及其宠臣、宗教和教育事务大臣艾希霍恩先生的那种教权主义和严格的正统主义的倾向。两个新教派都曾一度得到迅速的发展，前者是在天主教国家，后者是在新教国家，二者除了起源不同之外，没有别的区别；至于教义，两派在最重要的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都认为一切已确定的教条是无效的。这种缺乏确定性便是它们的真正实质。它们自称要建筑一个伟大的神殿，使所有德国人都能在其屋顶下联合起来；这样它们就用宗教的形式表达了当时的另一种政治思想，即统一德国的思想。可是它们相互之间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取得一致。

上述的教派企图发明一种适合于所有德国人的需要、习惯和趣

①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味的特制的共同宗教，以便至少是在宗教方面实现德国的统一。这种思想的确传布很广，尤其是在各小邦中。自从德意志帝国[248]被拿破仑灭亡以后，要求将德国的一切**分散的成员**联合起来的呼声，已成为对于现状不满的最普遍的表示，在各小邦尤其是这样。因为在小邦里维持宫廷、行政机关、军队等等的巨大开支，简言之，沉重的捐税负担，与各邦的微小和贫弱成正比地增加着。但是，如果德国的统一得到实现的话，那么这种统一究竟应该怎样，在这一点上各党派的看法是有分歧的。不愿有严重革命动荡的资产阶级，满足于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的他们认为"切实可行的"东西，即要求在普鲁士立宪政府的领导下建立除奥地利之外的全德联盟。的确，既然要避免危险的风暴，当时所能做的也只能到此为止。至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如果说农民也愿意过问这类事情的话)，他们从来没有能够对他们后来所大声疾呼要求的德国统一有任何明确的观念；少数的梦想家，多半是封建的反动派，希望恢复德意志帝国；一些无知的**所谓的**激进派羡慕瑞士的制度(他们当时还没有实行那种制度的经验，后来这种经验才使他们十分滑稽地醒悟过来)，主张建立联邦共和国；只有最极端的党派敢于在当时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249]。因此，德国统一问题本身就孕育着分歧、争执，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孕育着内战。

我们可以对1847年底普鲁士和德国其他小邦的情况作如下的总结。资产阶级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决定不再忍受封建官僚专制制度用来束缚他们的商业事务、工业生产能力和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而进行的共同行动的枷锁；一部分土地贵族已变成了纯粹市场商品的生产者，因而他们同资产阶级利害相同、休戚与共；小资产阶级很不满意，埋怨捐税，埋怨对他们的业务设置的种种障碍，但是并没有

任何明确的、应保障他们在社会和国家中的地位的改革方案；农民在一些地方饱受封建的苛捐杂税的盘剥，在另一些地方则备受放债人、高利贷者和律师们的压迫；城市工人普遍不满，他们对政府和大工业资本家同样憎恨，并且深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感染。总之，反对政府的群众是由各种各样的成分组成的，它们的利益各不相同，但或多或少都受资产阶级领导，而走在资产阶级最前列的又是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尤其是莱茵省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各邦政府在许多问题上不一致，彼此互不信任，尤其不信任普鲁士政府，虽然它们不得不依靠它的保护。在普鲁士，政府已遭到舆论的唾弃，甚至遭到一部分贵族的唾弃，它所依赖的军队和官僚也一天比一天更多地感染了反政府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越来越受它的影响；除了这一切，这个政府又确实是一文不名，除了乞求资产阶级反对派，便不能得到一分钱去弥补日渐增多的赤字。有哪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在反对现存的政府、夺取政权时曾经处于比这更有利的地位呢？

1851年9月于伦敦

[四　奥地利]

我们现在应该来看看奥地利，这个国家在1848年3月以前不为外国人所了解，差不多就像最近一次同英国作战以前的中国①一样。

当然，我们这里只能研究德意志的奥地利。波兰、匈牙利或意大利的奥地利人，不属于本题范围；至于1848年后他们对德意志的奥地利人的命运的影响，我们将在以后来谈。

梅特涅公爵的政府所遵循的两个方针是：第一，使奥地利统治下的各民族中的每一个民族都受到所有其他处于同样境地的民族的牵制；第二，这向来是一切专制君主制的基本原则，即依靠封建地主和做证券交易的大资本家这两个阶级，同时使这两个阶级的权势和力量互相平衡，以便政府保留完全的行动自由。以各种封建收益作为全部收入的土地贵族，不能不支持政府，因为政府是他们对付被压迫的农奴阶级（他们靠掠夺这些农奴为生）的唯一靠山。而每当他们之中较不富裕的一部分起来反对政府的时候，例如1846年加利西亚的情形，梅特涅立刻就唆使这些农奴去反抗他们，因为这些农奴总是力图抓住机会狠狠地报复他们的直接压迫者。[250]另一方面，交易所的大资本家由于大量投资于国家的公债，也受到梅特涅政府的束缚。奥地利在1815年恢复了它的全部实力，1820年后又在意大利恢复和维

①即鸦片战争（1839—1842年）以前的中国。——编者注

持了专制君主制，1810年的破产[251]又免除了它的一部分债务，所以，在媾和之后，它很快就在欧洲各大金融市场重新建立了信用；而信用越是增长，它也就越是加紧利用这种信用。于是，欧洲的一切金融巨头都把他们的很大一部分资本投入奥地利的公债。他们全都需要维持奥地利的信用，而要维持奥地利的国家信用又总是需要新的借款，于是他们便不得不时常提供新的资本，以维持他们过去已经投资的债券的信用。1815年以后的长期和平，以及表面上看来奥地利这样一个千年王国不可能倾覆的假象，使梅特涅政府的信用惊人地增长，甚至使它可以不依赖维也纳的银行家和证券投机商了；因为只要梅特涅还能够在法兰克福和阿姆斯特丹得到足够的资金，他当然就心满意足地看着奥地利的资本家们被踩在他的脚下，而且，他们在其他方面也得仰承他的鼻息。银行家、证券投机商、政府的承包商虽然总是设法从专制君主制那里获得大宗利润，但这是以政府对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具有几乎是无限的支配权作为交换条件的，因此，不能期待这一部分人会对政府持任何反对态度。这样，梅特涅便有把握获得帝国中最有力量和最有权势的两个阶级的支持，此外他还拥有军队和官僚机构，它们被组织得最适合于为专制制度服务。奥地利的文武官员自成一个门第；他们的父辈是为奥皇效劳的，他们的子孙也将如此。他们不属于在双头鹰①的羽翼下联合起来的许多民族中的任何一族；他们经常从帝国的一端迁移到另一端，从波兰到意大利，从德意志地区到特兰西瓦尼亚。他们对匈牙利人、波兰人、德意志人、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克罗地亚人，对一切没有打上"皇家和王室"等等标记而具有某一民族特性的人同样予以轻视；他们没有民族性，或者

①神圣罗马帝国国徽。——编者注

更确切地说，正是他们构成了真正的奥地利民族。很明显，这样一个文武官员的特殊等级，在一个有才智有能力的统治者手里会是怎样一种驯顺而有力的工具。

至于居民中的其他阶级，梅特涅采取十足的**旧式政治家**的态度，不大重视他们的支持。他对待他们只有一个政策：通过赋税从他们身上尽可能多地进行榨取，同时使他们保持平静。工商业资产阶级在奥地利发展缓慢。多瑙河流域的贸易相对来说无足轻重；奥地利只有的里雅斯特一个港埠，而这个港埠的贸易也十分有限。至于工业家，他们受益于广泛实行的保护关税制度，这一制度在大多数场合甚至无异于完全排除了外国的竞争；但向他们提供这种优惠，主要是为了增加他们纳税的能力；不过，由于国内对工业的限制，由于行会和其他封建公会（在不妨碍政府实现它的目的和意图的情况下，它们是受到周密的保护的）的特权，这种优惠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抵消了。小手工业者被封闭在中世纪行会的狭窄框框内，这种行会使各个行业彼此不断地为争夺特权而斗争，同时它们使工人阶级的各个成员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使这些强制性的联合体的成员具有一种世袭的稳定性。最后，农民和工人只是被当做征税的对象；他们所得到的唯一的关心，就是要尽可能使他们保持当前的和以前其父辈所赖以生存的生活条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切旧的、既存的、世袭的权力，都像国家的权力一样受到保护；地主对小佃农的权力、厂主对工厂工人的权力、手工业师傅对帮工和学徒的权力、父亲对儿子的权力，到处都受到政府的极力维护，凡有不服从者，都像触犯法律一样，要受到奥地利司法的万能工具——笞杖的惩罚。

最后，为了把所有这些创造人为的安定的努力结成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被允许给予人民的精神食粮都要经过最审慎的选择，而且

极其吝啬。教育到处都掌握在天主教教士手里，而教士的首脑们像大封建地主一样，是迫切需要保存现有制度的。大学都办成这个样子：只容许它们造就充其量在种种专门知识领域可能有比较高深造诣的专家，但无论如何不允许进行在别的大学里可望进行的那种全面的自由的教育。除了匈牙利，根本没有报刊，而匈牙利的报纸在帝国一切其他地方都是违禁品。至于一般的著述，100年以来其发行范围不但毫未扩大，自约瑟夫二世死后反倒缩减了。在奥地利各邦与文明国家接壤的地方，除了关税官员的**警戒线**，还有书报检查官的**警戒线**；外国的任何书籍或报纸不经过两次三番的详细审查，查明它们丝毫没有沾染时代的恶毒精神，决不会让它们进入奥地利。

在1815年后的将近30年中，这种制度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奥地利几乎完全不为欧洲所了解，而欧洲也同样不为奥地利所了解。居民中各阶级和全体居民的社会状况，似乎都没有丝毫变化。不管阶级与阶级之间存在着怎样的怨仇（这种怨仇正是梅特涅统治的一个主要条件，他甚至有意加深这种怨仇，让上层阶级充当政府进行一切横征暴敛的工具，从而把憎恶引向它们），不管人民对国家下级官吏有怎样的憎恨，但整个说来，他们对于中央政府很少有或者根本没有不满情绪。皇帝受到崇拜，而事实似乎也证实了老弗兰茨一世的话。他曾经怀疑这种制度能否持久，但他接着就安慰自己说："在我和梅特涅在世的时候，它总还是会维持下去的。"

但是有一种徐缓的、表面上看不见的运动在进行着，它使梅特涅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财富和势力都增加了。工业中机器和蒸汽的采用，在奥地利，也像在所有别的地方一样，使社会各阶级的一切旧有关系和生活条件发生了变革；它把农奴变成了自由民，把小农变成了工业工人；它摧毁了旧的封建手工业行会，消

灭了许多这种行会的生存手段。新的工商业居民与旧的封建制度到处发生冲突。因业务关系日益频繁地去国外旅行的资产阶级，把关于帝国关税壁垒以外的各文明国家的某些神话般的知识介绍给国内；最后，铁路的建设加速了国内工业和智力的发展。此外，在奥地利的国家机构中，也存在一个危险的部分，这就是匈牙利的封建宪法、议会辩论以及反政府的大批破落贵族对政府及其同盟者豪绅显贵们进行的斗争。匈牙利的议会所在地普雷斯堡在维也纳的大门口。这一切因素都促使城市资产阶级产生一种情绪——这不是真正反政府的情绪，因为当时反政府还不可能，而是一种不满情绪，产生一种实行改革，主要是行政上的改革，而不是立宪性质的改革的普遍要求。也如在普鲁士一样，在这里一部分官僚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了。在这个世袭的官吏阶层中间，约瑟夫二世的传统还没有被遗忘；政府中受过较多教育的官员本身有时也幻想各种可能的改革，他们宁愿要这位皇帝的进步和开明的专制，而不愿要梅特涅的"严父般的"专制。一部分较穷的贵族也支持资产阶级，至于居民中一向有充分理由对上层阶级（如果不是对政府）不满的下层阶级，它们在大多数场合是不会不支持资产阶级的改革要求的。

大约正是在这个时候，即1843年或1844年，在德国创立了一个适应这种变革的特殊的著作部门。少数奥地利的作家、小说家、文艺批评家、蹩脚诗人（他们的才能都很平常，但都天生具有犹太人所特有的那种勤奋）在莱比锡以及奥地利以外的其他德国城市站住了脚，在这些梅特涅的势力所不及的地方出版了一些论述奥地利事务的书籍和小册子。他们和他们的出版商的这桩生意"十分兴隆"。全德国都急于想了解这个欧洲的中国的政治秘密；奥地利人本身通过波希米亚边境上进行的大批的走私而获得了这些出版物，他们的好奇心更

加强烈。当然，这些出版物中所泄露的秘密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它们的善意的作者所设计的改革计划非常天真，可以说在政治上十分纯朴。他们认为宪法和新闻出版自由对奥地利来说是难以得到的东西。实行行政改革，扩大省议会权限，允许外国书报入境，稍稍放松书报检查制度——这些善良的奥地利人的忠君守法的谦恭的要求，不过如此而已。

无论如何，要阻止奥地利与德国其他部分以及经过德国与全世界的文化交流，越来越不可能了，这种情况大大促进了反政府的舆论的形成，并且至少使奥地利居民中的一部分人获得了一些政治信息。于是在1847年底，当时盛行于全德国的政治的和政治宗教的鼓动也波及到奥地利，虽然在程度上较弱。这种鼓动在奥地利进行得较为沉寂，但它仍然找到了足以供它施加影响的革命因素。这些因素是：被地主或政府的横征暴敛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农民、农奴或封建佃农，在警察的棍棒下被迫在厂主随意规定的任何条件下做工的工厂工人，被行会条例剥夺了在自己的行业取得独立地位的任何机会的手工业帮工，在经营中处处被种种荒谬条例捆住手脚的商人，不断与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特权的手工业行会或贪婪而多事的官吏发生冲突的厂主，与无知而专横的教士或愚蠢而跋扈的上司进行徒劳无益的斗争的教师、学者和受过较高教育的官员。总之，没有一个阶级感到满意，因为政府有时不得不作的一些小小让步，并不是由它自己出资(国库是负担不了的)，而是靠上层贵族和教士出资进行的。至于大银行家和公债持有人，意大利最近的事变、匈牙利议会中日益加强的反对派，以及波及整个帝国的异常的不满情绪和要求改革的呼声，自然丝毫也不会加强他们对奥地利帝国的巩固与支付能力的信心。

这样，奥地利也在缓慢地但确定无疑地走向伟大的变革，而这

时法国突然爆发了事变，它使逼近的暴风雨立刻倾降下来，驳倒了老弗兰茨关于大厦在他和梅特涅在世的时候还是会维持下去的断语。

1851年9月于伦敦

[五 维也纳起义]

1848年2月24日，路易-菲力浦被赶出巴黎，法兰西共和国宣告成立。紧接着，在3月13日，维也纳人民摧毁了梅特涅公爵的政权，迫使他可耻地逃亡国外。3月18日，柏林人民举行武装起义，经过18小时顽强的战斗之后，满意地看到国王①向他们求饶乞降。同时，在德国各小邦的首府也都爆发了激烈程度不同但成果相同的骚动。如果说德国人民没有完成他们的第一次革命，那么他们至少是真正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我们不能在这里考察这许多次起义的细节；我们只想阐明这些起义的性质以及居民中各个阶级对起义所采取的立场。

维也纳的革命可以说几乎是全体居民一致完成的。资产阶级（银行家和证券投机商除外）、小资产阶级、全体工人，一致立即起来反对大家所憎恶的政府，这个政府如此普遍地被人憎恨，以致从前支持它的极少数贵族和金融巨头在它刚刚遭到攻击时也都隐藏起来了。梅特涅已使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无知到如此程度，以致他们对从巴黎传来的关于无政府状态、社会主义和恐怖的统治的消息，以及关于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即将展开斗争的消息完全不能理解。他们由于政治上的幼稚，不是完全不了解这些消息的意义，就是以为那

---

①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是梅特涅恶意捏造的，为的是恐吓他们，让他们再去服从他。而且，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工人作为一个阶级行动或者为自己本身的特殊的阶级利益而斗争。他们根据过去的经验，不能设想刚刚如此衷心地联合起来推翻大家一致憎恨的政府的各阶级之间可能产生任何分歧。他们看到工人在所有各点上——在宪法、陪审审判、新闻出版自由等等问题上——都与他们一致。于是，他们至少在1848年3月全身心地投入了运动，而另一方面，运动从最初起就使他们（至少在理论上）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

但是，不同阶级的这种联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向来是一切革命的必要条件，却不能持久，一切革命的命运都是如此。在战胜共同的敌人之后，战胜者之间就要分成不同的营垒，彼此兵戎相见。正是旧的复杂的社会机体中阶级对抗的这种迅速而剧烈的发展，使革命成为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正是新的党派的这种不断的迅速成长，一个接替一个掌握政权，使一个民族在这种剧烈的动荡时期5年就走完在普通环境下100年还走不完的途程。

维也纳革命使资产阶级成为理论上的统治阶级；也就是说，一旦从政府那里争取到的让步付诸实行，并且能够坚持一个时期的话，就一定会保证资产阶级的统治。可是，事实上这一阶级的统治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不错，由于国民自卫军的建立使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掌握了武器，资产阶级获得了力量和权势；不错，由于成立了“安全委员会”这种由资产阶级占支配地位的、对谁都不负责的革命政府，资产阶级取得了最高的权力。但同时一部分工人也武装起来了，每当发生战斗时，他们和大学生[252]总是承担起战斗的全部重任；约4 000名装备优良、训练远比国民自卫军要好的大学生，成为革命武装的核心和真正力量，他们决不愿意只是充当安全委员会手里的一个工具。

他们虽然承认安全委员会，甚至是它的最热烈的拥护者，可是他们成立了一种独立的而且颇不安分的团体，在“大礼堂”召开他们自己的会议，保持介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中间立场，以不断的鼓动阻止事物回复到旧日的平常状态，而且经常把自己的决议强加于安全委员会。另一方面，工人差不多完全失业了，国家不得不花钱雇用他们到公共工程中去做工，而用于这方面的款项当然必须取自纳税人的腰包或维也纳市的金库。这一切自然使维也纳的生意人很不愉快。该市的工业企业本来是为这个大国中的富豪和贵族的消费服务的，由于发生革命，由于贵族和宫廷的逃亡，这些企业自然完全停业了；商业陷于停顿，工人和大学生不断进行的鼓动和骚动，当然不是如当时人们常说的“恢复信任”的办法。这样，资产阶级与不安分的大学生和工人之间很快就出现了某种冷淡关系，而这种冷淡关系之所以在一个长时期中并没有转变为公开的敌对关系，那是由于内阁，尤其是宫廷急欲恢复旧秩序，因而不断证明比较革命的党派的疑虑和不安分的活动是有道理的，并且甚至当着资产阶级的面，不断地使旧日的梅特涅专制借尸还魂。由于政府企图限制或完全取消某些刚刚争得的新的自由，于是5月15日和5月26日先后两次发生了维也纳各阶级的起义。在这两次起义中，国民自卫军或武装的资产阶级、大学生以及工人之间的联盟又暂时得到巩固。

至于居民中的其他阶级，贵族和金融巨头们已经销声匿迹，农民则到处忙于铲除封建制度的残余。由于意大利的战争[253]，也由于宫廷忙于维也纳和匈牙利问题，农民得到了充分的行动自由，在奥地利，他们在解放事业中取得的成就，比在德国任何其他地方都大。在这之后不久，奥地利议会只好确认农民已经实际实行了的种种措施，不管施瓦尔岑堡公爵的政府还能够恢复别的什么东西，它永远不能

恢复对农民的封建奴役了。如果说奥地利目前又比较平静了，甚至强有力了，这主要是因为人民的大多数即农民真正从革命中得到了利益，还因为不管业已重建的政府侵犯了别的什么东西，农民所争得的这些实际的物质利益却没有受到侵犯。

1851年10月于伦敦

[六　柏林起义]

革命运动的第二个中心是柏林。根据前面几篇所叙述的情形，不难了解，为什么柏林的革命运动根本不像在维也纳那样得到几乎所有阶级的一致支持。在普鲁士，资产阶级早已经卷入了反政府的实际斗争；“联合议会”[54]造成了破裂；资产阶级革命日益迫近。如果不是由于巴黎二月革命[4]，这个革命在爆发之初也许会像维也纳革命一样万众一心。巴黎事变猛然促进了一切，但同时它是在另一旗帜下进行的，这面旗帜与普鲁士资产阶级准备进攻自己的政府时所举起的旗帜完全不同。二月革命在法国所推翻的那种政府，正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在自己国内所要建立的。二月革命声称自己是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它宣告了资产阶级政府的垮台和工人的解放。而普鲁士资产阶级最近则受够了自己国内工人阶级的骚扰。在西里西亚起义所引起的最初恐怖过去以后，他们甚至想为自身利益来利用这些骚扰。但他们对革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始终怀有本能的恐惧。因此，当他们看到巴黎政府的首脑人物正是被他们视为财产、秩序、宗教、家庭以及现代资产者的其他家神的最危险的敌人的时候，他们的革命热情马上一落千丈。他们知道，必须抓住时机，没有工人群众的帮助他们就会失败，可是他们没有勇气。因此，当外地刚一出现零星的发动时，他们便站在政府方面，努力使柏林的人民保持安定，因为五天以来人民一直聚集在王宫前讨论各种新闻，要求改组政府。而当

梅特涅被推翻的消息传来、国王终于作了一些小小的让步时，资产阶级便认为革命已经完成，跑去向陛下谢恩，说他已满足了他的人民的一切愿望。可是紧接着便出现了军队向群众进攻、街垒、战斗以及王室的溃败。于是一切都改变了。一直被资产阶级排挤到后面去的工人阶级，现在被推到斗争的前列，进行了战斗而且获得了胜利，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对于普选权、新闻出版自由、陪审权、集会权的限制——这些限制深受资产阶级的欢迎，因为受到限制的只是它下面的各阶级——现在已经不可能继续下去了。重演巴黎的"无政府状态"那一场戏的危险迫在眉睫。在这种危险面前，一切过去的分歧都消逝了。多年来的朋友和仇敌为了反对胜利的工人而联合起来了，虽然工人还并没有提出他们自己的任何特殊要求。资产阶级和被推翻的制度的拥护者在柏林的街垒上订立了联盟。他们彼此不得不作一些必要的让步，但也只限于势在必行的让步；成立了一个由联合议会中各反对派的领袖组成的内阁，为了酬答这个内阁保全王位的功绩，旧政府的一切支柱——封建贵族、官僚、军队都保证支持它，这就是康普豪森先生和汉泽曼先生组阁的条件。

新阁员们对于觉醒的群众非常恐惧，在他们眼里，任何能巩固已被动摇的政权的基础的手段都是好的。这些糊里糊涂的可怜虫以为旧制度复辟的一切危险都已经过去，因此便利用整个旧的国家机器来恢复"秩序"。文武官员没有一个被撤职；旧的管理国家的官僚制度丝毫没有变更。这些可爱的立宪责任内阁的阁员们，甚至把那些由于其过去的官僚暴行而被人民在最初的革命高潮中赶跑的官员也恢复了原职。在普鲁士，除了阁员更换而外，没有任何变更，甚至各部门的主管人员也都一个未动；所有那些在新擢升的统治者周围组成一个合唱队并希望分得一份权位的猎取官职的立宪派，都被

告知：应该等到秩序恢复安定时再来更换官员，因为现在就这样做是有危险的。

在3月18日起义以后极度沮丧的国王，很快就发觉这些“自由派”阁员需要他，正如他也需要他们一样。起义没有推翻王位；王位成了防范“无政府状态”的最后一个现存的屏障；因此自由派资产阶级及其现任阁员的领袖们，很愿意同国王保持最亲善的关系。国王和他周围的反动的宫廷奸党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于是便利用这种环境来阻碍内阁实行它有时打算进行的那些微不足道的改革。

内阁首先关心的事情，是要给最近的暴力变革一种合法的外貌。它不顾人民群众的反对，召集了联合议会，使之作为人民的合法的立宪机关，通过新的议会选举法，新选出的议会应与国王商定新的宪法。选举应当是间接的，选民先选举若干选举人，选举人再选出议员。虽然遭到各种反对，这种两级选举制还是通过了。接着又要求联合议会允许发行数目相当于2 500万美元的公债，人民党反对，但是议会又同意了。

内阁的这些行为，促使人民党，或者——像它现在自己称呼的那样——民主党异常迅速地发展起来。这个以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为首的党，在革命之初曾经把大多数工人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它要求法国已实行的那种直接的普遍的选举权，要求一院制的立法议会，要求完全和公开地承认3月18日的革命是新政府的体制的基础。这个党的较温和的一派认为可以对这样“民主化的”君主制表示满意；它的较先进的一派则要求彻底建立共和国。两派都同意承认德国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而立宪派和反动派对这个机构的最高权力却怀着很大的恐惧，他们宣布说他们认为这个议会太革命了。

工人阶级的独立运动被革命暂时打断了。运动的直接要求和环境不允许把无产阶级党的任何特殊要求提到首位。事实上，当工人进行独立行动的场地尚未扫清，直接的普遍的选举权尚未实现，36个大小邦照旧把德国分成无数小块的时候，无产阶级党除了注视对自己具有极重要意义的巴黎运动，以及和小资产阶级一起共同争取那些使他们日后能够为自身的事业进行斗争的权利以外，还能做些什么呢？

因此，当时无产阶级党在其政治活动中根本不同于小资产阶级，或者更确切地说根本不同于所谓的民主党之处，主要只有三点：第一，对于法国的运动的评价不同，民主派攻击巴黎的极端派，而无产阶级革命者却维护他们；第二，宣布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249]，而民主派中最最激进的分子也只敢希望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第三，在一切场合都表现出革命的勇气和行动的决心，而这却是任何以小资产者为首并主要由他们组成的党永远不会有的。

无产阶级的或真正革命的党只是逐渐地使工人群众摆脱了民主派的影响，而在革命初期工人是跟着民主派跑的。但是在一定的时刻，民主派领袖们的优柔寡断和软弱怯懦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而现在可以说，过去几年的动荡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在所有工人阶级相当集中的地方，工人们完全摆脱了民主派的影响，这种影响在1848年和1849年曾使他们犯了许多错误和遭到种种不幸。但我们不必去进行预测，这两年的事变将给我们充分的机会看到这些民主派先生们的实际行为。

普鲁士的农民，像奥地利的农民一样，曾经利用革命一举摆脱了一切封建枷锁，但其劲头较小，因为这里的农民所遭受的封建压迫

一般来说不那么厉害。可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这里的资产阶级立即转而反对自己最早的、最不可少的同盟者——农民。同资产者一样被所谓对私有财产的侵犯吓坏了的民主派，也不再支持农民；这样，在三个月的解放之后，在流血冲突和军事屠杀(尤其是在西里西亚)之后，封建制度便通过昨天还在反封建的资产阶级之手恢复了。再没有比这更可耻的事实可以用来谴责他们了。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党派这样出卖自己最好的同盟者，出卖自己。不管这个资产阶级党后来遭到怎样的侮辱与惩罚，单单由于它的这一种行为，它也完全是罪有应得。

1851年10月于伦敦

[七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读者大概还记得，我们在前六篇里叙述了德国的革命运动，直到维也纳3月13日和柏林3月18日两次人民的伟大胜利[53]。我们看到，在奥地利和普鲁士都建立了立宪政府，自由主义的或资产阶级的原则被宣布为未来整个政策的指导方针；这两大运动中心之间唯一显著的区别是：普鲁士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以康普豪森先生和汉泽曼先生这两位富商为代表，直接攫取了权柄；而奥地利的资产阶级所受的政治训练差得很远，自由派官僚们便走马上任，宣称自己是受资产阶级的委托来执掌政权。我们又看到，原来团结一致反对旧政府的各党派和各社会阶级，如何在胜利之后甚至在斗争进行中四分五裂；而独享胜利果实的上述自由派资产阶级，如何立即转而反对它昨天的同盟者，如何对一切较先进的阶级或党派采取敌对态度，并且同战败的封建官僚势力结成同盟。事实上，早在革命剧开演时就可以看出，自由派资产阶级只有依靠较激进的人民党的援助，才能守住自己的阵地，抵抗那些已被击败但未被消灭的封建官僚党；另一方面，为了对付这些较激进的群众的冲击，自由派资产阶级又需要封建贵族和官僚的援助。所以，很明显，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资产阶级没有掌握足够的力量保持自己的政权并使一切国家机构适应于自己的需要和理想。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内阁不过是一个中间站。从这里，按照事态的发展情况，国家或者将走向更高级的阶段——统一的共和国，或者将

重新堕入旧日封建教权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制度**中去。无论如何，真正的决战还在后面；三月事变只是战斗的开始。

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德国是居于支配地位的两个邦，因此维也纳或柏林的每个决定性的革命胜利，对全德国都有决定的意义。这两个城市1848年三月事变的发展，决定了全德国事态的进程。所以，如果不是由于各小邦的存在而产生了一个机构——这个机构的存在本身正是德国的不正常状态的最显著的证据，正是最近这次革命半途而废的证据——那么本来无须再叙述各小邦所发生的运动，我们的确可以只限于研究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情况了。上述机构如此不正常，它所处的地位如此滑稽可笑，可是又如此自命不凡，可以说，在历史上将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机构**。这个机构就是所谓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德国国民议会**[243]。

在维也纳和柏林的人民胜利之后，自然就产生了应当召开全德代表会议的问题。于是这个会议就被选举出来，在法兰克福开会，与旧的联邦议会[232]并存。人民希望德国国民议会解决一切有争议的问题，履行全德意志联邦[231]最高立法权力机关的职能。但召集国民议会的联邦议会，对于它的职权未作任何规定。谁也不知道它的法令是具有法律效力呢，还是需要经过联邦议会或各邦政府的批准。在这种混乱状况中，如果国民议会稍有一点力量，它就会把联邦议会这个在德国最不受欢迎的机构立即解散，使之寿终正寝，代之以从国民议会自己的议员中选举出来的人所组成的联邦政府。它就会宣布自己是德国人民的至高无上的意志的唯一合法代表，从而使自己的一切法令具有法律效力。最重要的是，它就会使自己在国内获得一支足以粉碎各邦政府的任何反抗的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在革命初期，这一切都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要求一个主要是由自由派律师和**学究式的**教

授们组成的议会做到这一点，那就未免太过分了，这个议会虽然自称体现了德国思想和学术的精华，而事实上它只是一个供老朽政客在全德国眼前表现他们不自觉的滑稽丑态和他们思想与行动上的无能的舞台。这个老太婆议会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害怕最小的人民运动甚于害怕全德各邦政府的所有一切反动阴谋。它在联邦议会的监视之下开会，不仅如此，它几乎是恳求联邦议会批准它的各项法令，这是因为它的最初一些决议必须由这个可憎的机关发布。它不坚持自己的最高权力，反而故意回避讨论任何这一类危险的问题。它不把人民的武装力量聚集在自己周围，而是闭眼不看各邦政府的暴行，直接就来讨论议事日程上的问题。这个国民议会眼看着美因茨实行戒严，该城的居民被解除武装，竟不闻不问。后来它选举了奥地利的约翰大公做德国的摄政，并宣称自己的一切决议都具有法律效力。但约翰大公只是在获得了各邦政府的同意之后才荣登新的高位，而且这不是由国民议会而是由联邦议会授予的。至于国民议会的法令的法律效力，这一点从来没有被各大邦政府所承认，而国民议会本身也不坚持，因此仍然是一个悬案。总之，我们看到一种奇异的景象：一个议会宣称自己是伟大的主权民族的唯一合法代表，但它从来既没有愿望也没有力量迫使别人承认自己的要求。这个机构中的辩论没有任何实际结果，甚至也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只不过是重复一些陈腐不堪的哲学学派和法学学派的最乏味的老生常谈；人们在这个议会中所说的，或者毋宁说是所嘟哝的每一句话，报刊上早已刊登过一千次，而且比他们说得要好一千倍。

总之，这个自称为德国新的中央政权的机构，使一切都保持原来的状态。它根本没有实现人们久已渴望的德国的统一，连统治德国的各邦君主中最无足轻重的君主也没有废除；它没有加强德国各个

分散的省份之间的联系；它从未采取任何步骤去摧毁分隔汉诺威和普鲁士、分隔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关税壁垒；它甚至完全没有打算废除在普鲁士到处妨碍内河航行的苛捐杂税。但是，这个议会做得越少，却喧嚷得越厉害。它建立了一个纸面上的德国舰队，它兼并了波兰和石勒苏益格；它允许德意志的奥地利对意大利作战，但在奥地利人安全退入德境时却禁止意大利人追击；它对法兰西共和国连呼万岁，并接纳了匈牙利的使者，后者回国时对德国的了解无疑是比出使时更加糊涂了。

在革命之初，全德各邦政府曾把这个议会看做一个可怕的怪物。它们估计这个议会可能采取十分专断而革命的行动，因为它的权限极不明确——当时对它的权限问题不作明确规定是必要的。于是，为了削弱这个可怕的机构的影响，各邦政府策划了一整套十分周密的阴谋；但事实证明，它们的幸运胜过聪明才智，因为这个议会替各邦政府办事比它们自己办得还要好。这些阴谋中主要的一招，就是召开地方的立法议会。结果，不仅各小邦召开了它们的立法议会，连普鲁士和奥地利也召开了制宪议会。在这些议会里，像在法兰克福议会里一样，也是自由派资产阶级或它的同盟者——自由派律师和官僚占据多数，而且所有这些议会的工作情况几乎完全一样，唯一的区别是：德国国民议会是一个假想的国家的议会，因为它拒绝建立它自身赖以存在的首要条件——统一的德国；它讨论一些它自己创造出来的假想的政府的各种假想的、永远不能实现的措施，它通过了一些谁也不感兴趣的假想的决议。而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制宪议会至少还是真正的议会，它们推翻了旧内阁并且任命了真正的内阁，而且至少曾一度强迫它们与之进行斗争的各邦君主实行它们的决议。它们也是怯懦的，也缺乏作出革命决断的远大见识，它们也背叛了人民，把政

权交还给了封建的、官僚的和军事的专制制度。但当时它们至少还是被迫讨论了一些有关目前利益的实际问题，被迫同别人一起生活在地上；而法兰克福的吹牛家们却以在“**梦想的空中王国**”①里遨游为无上的快乐。因此，柏林和维也纳制宪议会的辩论构成德国革命史的重要的一章，而法兰克福这群笨伯的苦心佳作，却只能使文献和古董收藏家感兴趣。

德国人民深深感到必须消除可恨的疆土分裂状态，因为这种状态分散和抵消了民族的集体力量，他们曾一度希望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至少是一个新纪元的开端，但这群自作聪明的蠢人的幼稚行为很快就使全国的热情冷却了。签订马尔默停战协定[254]这一可耻行为（1848年9月），使人民怒不可遏地起来反对这个议会；他们本希望它会给民族提供一个自由的活动场所，但它却无比怯懦而不知所措，只是使现在的反革命制度借以建立的各种基础恢复了它们从前的稳固。

1852年1月于伦敦

①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7章。——编者注

[八　波兰人、捷克人和德意志人]

从以上几篇的叙述中已经可以明显看出，除非1848年三月革命后紧接着再来一次新的革命，否则德国就不可避免地要恢复到这次事变以前的状态。但我们现在试图略加阐述的历史问题，性质非常复杂，因此，如果不考虑到可以称之为德国革命的国际关系的种种情况，便不能够充分了解后来的一些事件。而这些国际关系也像德国内部情形一样复杂。

大家都知道，在过去1 000年中，整个德国东半部，直到易北河、萨勒河和波希米亚林山，已经从斯拉夫族的入侵者手里夺回来了。这些地区的大部分都已日耳曼化，以至斯拉夫的民族性和语言几百年以前就已经完全消失；如果我们把少数完全孤立的残余（总共不到10万人，包括波美拉尼亚的卡舒布人、卢萨蒂亚的文德人或索布人）除外，这些地区的居民都已经是地地道道的德意志人了。但在所有同旧波兰接壤的地带和捷克语国家，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情形就不同了。在这些地方，两个民族在每个区域都混居杂处，城市一般地说在不同程度上属于德意志人，而农村中则是斯拉夫人占优势，不过在农村中斯拉夫人也因德意志人势力的不断增强而逐渐被瓦解和排挤。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自从查理大帝时代以来，德意志人就十分坚决顽强地力求征服欧洲东部，把它殖民地化，或至少文明化。

封建贵族在易北河与奥得河之间所进行的征服，武装骑士团在普鲁士和立窝尼亚一带所建立的封建殖民地，只是为德国工商业资产阶级所实行的一个规模更大和更有效得多的日耳曼化计划奠定了基础，因为在德国，正如在西欧其他国家一样，从15世纪起，资产阶级的社会和政治作用增长起来了。斯拉夫人，尤其是西方的斯拉夫人（波兰人和捷克人），主要是从事农业的民族，他们从来不怎么重视工商业。结果，随着这些地区人口的增加和城市的兴起，一切工业品的生产便落在德意志人移民的手里，这些商品与农产品的交换完全被犹太人所垄断，而这些犹太人，如果说他们属于什么民族的话，那么在这些国家里，他们当然与其说属于斯拉夫人，不如说属于德意志人。整个东欧的情形都是如此，虽然程度略轻。在彼得堡、佩斯、雅西，甚至在君士坦丁堡，直到今天，手工业者、小商人、小厂主都还是德意志人，而放债人、酒店老板和小贩（在这些人口稀少的国家，这种人是非常重要的）则大多数是犹太人，他们的母语是一种讹误百出的德语。在边境各斯拉夫人地区，德意志人的重要性随着城市和工商业的发达而增加，而当事实表明几乎一切精神文化都必须从德国输入时，他们的重要性就更大了。继德意志商人和手工业者之后，德意志牧师、教员和**学者**也到斯拉夫人的土地上安家立业。最后，侵略军的铁蹄或审慎周密的外交手段，不仅跟随在由于社会发展而发生的缓慢的但是肯定无疑的非民族化过程的后面，而且常常走在它的前面。因此，自从第一次瓜分波兰[255]以后，由于把官地卖给或赐给德意志殖民者，由于奖励德意志资本家在这些混居地区建立工业企业等等，以及由于经常对该地波兰居民采取极端横暴的手段，西普鲁士和波森的大部分就日耳曼化了。

因此，近70年来，德意志民族和波兰民族间的分界线完全改变

了。1848年的革命，立即唤醒一切被压迫民族起来要求独立和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所以很自然，波兰人也立即要求恢复他们在1772年以前旧波兰共和国疆界以内的国家。的确，就在当时，这个疆界作为德意志民族与波兰民族的分界线也已经过时了，而此后随着日耳曼化的进展，它更是一年比一年过时了；但是，既然德意志人当时曾经那样热情地宣布他们赞助波兰复国，那么，要求他们放弃他们所掠得的一部分领土作为体现他们同情心的第一个证据，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但另一方面，应不应该把主要是德意志人居住的大块大块的土地和完全属于德意志人的大城市，让给一个从未证明自己能够摆脱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封建状态的民族呢？这个问题十分复杂。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法是同俄国开战。那时，革命化了的各民族间的划界问题就会成为次要问题，而主要问题就将是确立一个对付共同敌人的安全的疆界。波兰人如果在东方获得广大的领土，他们在西方的要求便会比较温和而合理；总而言之，对他们来说，里加和米塔瓦也会同但泽和埃尔宾一样重要。因此，德国的先进政党认为，要支持大陆上的运动，就必须对俄国开战，而且它深信，即使是部分地恢复波兰的民族独立，也必然要引起这样的战争，所以它支持波兰人。而当权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党却很清楚地预见到，反对俄国的民族战争将使它自身崩溃，因为这种战争一定会使更活跃、更积极的人掌握政权；因此，它装出一副热心于德意志民族的扩张的样子，宣布普属波兰，即波兰革命鼓动的中心，是未来的德意志帝国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热情高涨的最初几天向波兰人许下的诺言，被可耻地背弃了。经政府批准而组成的波兰军队，被普鲁士的炮兵击溃和屠杀；到1848年4月，即柏林革命后六个星期，波兰的运动就被镇压下去了，而且波兰人和德意志人之间旧有的民族敌视复活了。为俄国专制君

主①立下这份无法估量的巨大功劳的是自由派商人阁员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应当附带说明，这次对波兰的战役，是改组和鼓舞普鲁士军队的第一步，正是这支军队后来推翻了自由派政党，摧毁了康普豪森先生和汉泽曼先生辛辛苦苦促成的运动。"恶有恶报"②，这就是从赖德律-洛兰到尚加尔涅、从康普豪森到海瑙，所有这些1848年和1849年的暴发户的共同的命运。

民族问题在波希米亚引起了另一场斗争。在这个居住着200万德意志人和300万捷克语斯拉夫人的地区，有不少伟大的历史事迹几乎都与捷克人先前的霸权相联系。但自从15世纪的胡斯战争[256]以后，斯拉夫族的这一支脉的势力就被摧毁了。捷克语地区分裂了：一部分形成了波希米亚王国，另一部分形成了摩拉维亚公国，第三部分——斯洛伐克人居住的喀尔巴阡山地则归入匈牙利。从那时起，摩拉维亚人和斯洛伐克人就已失掉一切民族意识和民族生命力的痕迹，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还保留着他们的语言。波希米亚被德意志人的地区三面包围。德意志人在波希米亚境内作出了很大的成绩，甚至在首都布拉格，这两个民族也完全势均力敌；而资本、商业、工业和精神文化则普遍掌握在德意志人手里。捷克民族的头号卫士帕拉茨基教授本人就是一个发了狂的博学的德意志人，直到今天他还不能正确地、不带外国腔调地讲捷克语。但是就像常有的情形那样，垂死的捷克民族——最近400年历史上的一切事实都证明它是垂死的——于1848年作了最后一次努力来恢复它从前的生命力，而这次努力的失败，撇开一切革命方面的考虑不谈，足以证明波希米亚此后只能作为德国

①亚历山大一世。——编者注

②引自《旧约外传·所罗门智训》。——编者注

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即使它的一部分居民在几百年之内继续说非德意志的语言。

1852年2月于伦敦

[九　泛斯拉夫主义。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战争]

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斯拉夫族的另一个离散的成员,它受匈牙利人的影响,就像波希米亚人受德意志人的影响一样),是欧洲大陆上所谓"**泛斯拉夫主义**"的发源地。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都没有强大到自身足以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它们各自的民族性都已逐渐被种种历史原因的作用所破坏,这些原因必然使它们为更强大的种族所并吞,它们只能寄希望于通过和其他斯拉夫民族联合起来而恢复一定的独立性。波兰人有2 200万,俄罗斯人有4 500万,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有800万,为什么不把所有这8 000万斯拉夫人组成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把侵入神圣的斯拉夫族领土的土耳其人、匈牙利人,尤其是那可恨而又不可缺少的*Niemetz*即德意志人驱逐出去或消灭掉呢?于是,就从几个斯拉夫族的历史学**爱好者**的书斋里发起了一个荒唐的、反历史的运动,其目的无非是要使文明的西方屈服于野蛮的东方,城市屈服于乡村,商业、工业和文化屈服于斯拉夫农奴的原始农业。但在这种荒唐的理论之后,还站着**俄罗斯帝国**这一可怕的现实;这个帝国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它想把整个欧洲变成斯拉夫族,尤其是斯拉夫族的唯一强有力的部分即俄罗斯人的领土的野心;这个帝国虽有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个首都,但只要被每个俄国农民视为其宗教和国家的真正首都的"**沙皇之城**"(君士坦丁堡,俄文为沙皇格

勒，即沙皇城）还没有成为俄国皇帝①的真正的都城，这个帝国就还没有找到自己的重心。过去150年以来，这个帝国在它所进行的每次战争中不仅从未失掉领土，而且总是获得领土。在中欧，人所共知，俄罗斯的政策是用种种阴谋手段支持新式的泛斯拉夫主义体系，这个体系的发明最适合于它的目的。因此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的泛斯拉夫主义者有的是自觉地、有的是不自觉地为俄国的直接利益服务；他们为了一个民族的幻影而出卖了革命事业，而这个民族的命运至多也不过同俄国统治下的波兰民族的命运一样。然而必须对波兰人加以赞扬：他们从来没有真正陷入这个泛斯拉夫主义的圈套；至于少数贵族变成了狂热的泛斯拉夫主义者，那是由于他们知道，他们在俄国统治下所受的损失，要比他们在自己的农奴起义时所受的损失轻微一些。

后来波希米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在布拉格召开了一个斯拉夫人代表大会[257]，筹备成立一个斯拉夫人大同盟。即使没有奥地利军队的干涉，这个大会也会遭到惨败。几种斯拉夫语言各不相同，就像英语、德语和瑞典语各不相同一样；因此在会议开始以后，那些发言人都无法讲一种大家都能听懂的共同的斯拉夫语言。曾经试用法语，但大多数人也不懂，于是，这些可怜的斯拉夫族狂热分子——他们的唯一的共同感情就是对德意志人的共同仇恨——最后不得不用与会者都听得懂的唯一语言，即可恨的德语来表达意见！但正在这个时候，在布拉格也召开了另外一个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参加这个大会的是加利西亚人的轻骑兵、克罗地亚人和斯洛伐克人的掷弹兵、波希米亚人的炮兵和重骑兵，而这个真正的武装的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在文迪

①亚历山大一世。——编者注

施格雷茨的指挥之下，不到24小时就把假想的斯拉夫人霸权的这些奠基者们驱逐出城，并把他们赶得东逃西散了。

奥地利制宪议会中的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达尔马提亚的代表和一部分波兰的代表（贵族），在这个议会中对德意志代表发动了有计划的斗争。德意志人和一部分波兰人（破产的贵族）在这个议会中是革命进步势力的主要支持者。对他们采取反对态度的大多数斯拉夫族代表，并不满足于这样明确表露自己整个运动的反动倾向，他们竟下贱地同驱散他们的布拉格会议的奥地利政府暗中勾结。他们的这种卑鄙的行为也得到了报应。斯拉夫代表在1848年十月起义（归根到底正是这次起义使他们在制宪议会中获得了多数）时支持政府，而在这之后，现在这个几乎是清一色的斯拉夫人的议会，也像布拉格代表大会一样被奥地利军队驱散了，这些泛斯拉夫主义者还被警告说，他们如果再有所动作，就将被关进监狱。他们得到的只是这样一个结果：斯拉夫人的民族性现在到处都被奥地利的中央集权所摧毁，而这是他们的幻想和愚蠢所应得的。

如果匈牙利和德国的边境问题还有任何疑问，那也一定会引起另一场争端。但是，幸亏没有任何口实，而且两个民族的利益密切相连，他们一起反对共同的敌人——奥地利政府和泛斯拉夫主义狂热。相互的善意谅解一刻也没有受到损害。但是意大利的革命至少使德国的一部分陷入了自相残杀的战争，而在这里必须指出一个事实，1848年的头六个月曾经在维也纳参加街垒战斗的人又满腔热情地参加了与意大利爱国者作战的军队，这证明梅特涅的统治多么严重地阻碍了社会意识的发展。不过，这种可悲的思想混乱并没有继续多久。

最后，还因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而发生了与丹麦的战

争。这两个地方在民族、语言和感情方面无疑都是德意志的，而从军事、海运和商业方面说，也是德国所需要的。这两地的居民在过去三年中曾经顽强地反对丹麦人的入侵。此外，根据条约，正义在他们方面。三月革命使他们与丹麦人发生公开冲突，德国援助了他们。可是，虽然在波兰、意大利、波希米亚，以及后来在匈牙利，战事进行得十分激烈，但在这个唯一得人心的、唯一至少具有部分革命性的战争中，却让部队采取了一系列毫无意义的前进和后撤行动，甚至屈从外国的外交干涉，在进行了许多次英勇的战斗之后，导致了十分悲惨的结局。德国各邦政府在这次战争中抓住一切机会出卖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革命军队，故意让丹麦人在这支军队被分散或分开的时候把它消灭，由德意志志愿兵组成的部队也遭到同样的待遇。

虽然德国的名字遭到普遍的憎恨，而德国各立宪派和自由派的政府却扬扬得意。它们把波兰人和波希米亚人的运动镇压下去了。它们到处重新挑起旧日的民族仇恨，这种仇恨直到今天还使德意志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彼此间不能有任何谅解和共同行动。它们使人民习惯于内战和军队镇压的场面。普鲁士军队在波兰，奥地利军队在布拉格都恢复了自信。当满怀着过分的爱国激情（即海涅所谓的“die patriotische Überkraft”）[①]的、热心革命但目光短浅的青年被引导到石勒苏益格和伦巴第去在敌人的霰弹下送死的时候，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正规军这些真正的作战工具，却得到机会以战胜外国人来重新赢得人心。但是我们要再说一遍：这些被自由派加强起来当做反对较先进的党派的作战工具的军队，刚刚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它们的自信和纪律，便翻脸反对自由派，而把政权交还给了旧制度的代表人

①海涅《夜巡来到巴黎》。——编者注

物。当拉德茨基在阿迪杰河彼岸他的军营中接到维也纳的“责任大臣们”的第一批命令时，他大喊道：“这些大臣是些什么人？他们并不是奥地利政府！奥地利现在只存在于我的军营中；我和我的军队就是奥地利；等将来我们把意大利人打败，我们就要为皇帝夺回帝国！”老拉德茨基是对的。但维也纳的没有头脑的“责任”大臣们却没有注意他。

1852年2月于伦敦

[十　巴黎起义。法兰克福议会]

早在1848年4月初，整个欧洲大陆上的革命洪流已经被那些从最初的胜利中获得利益的社会阶级同战败者立即缔结的联盟挡住了。在法国，小资产阶级和共和派资产阶级，同保皇派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在德国和意大利，胜利的资产阶级急忙乞求封建贵族、政府官僚和军队帮助他们对付人民群众和小资产者。联合起来的保守的和反革命的党派，很快又获得了优势。在英国，发动得不适时和准备得不充分的人民示威（4月10日），使从事运动的党派遭到了彻底的决定性的失败。[258]在法国，两次类似的运动（4月16日[259]和5月15日[79]）也同样被击败了。在意大利，炮弹国王在5月15日一举恢复了政权。[260]在德国，各个新的资产阶级政府和它们的制宪议会都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如果说在维也纳，多事的5月15日使人民获得了胜利，那么这毕竟只是一个次要的事变，可以认为这是人民的能量的最后一次胜利的闪耀。在匈牙利，运动看来是转入了完全合法的平静的轨道；至于波兰的运动，我们在前面一篇中已经提到，它刚刚萌芽就被普鲁士的刺刀镇压下去了。但是这一切并没有确定事态的最后结局，各革命党派在各国失去的每一寸土地，只是使它们更加团结自己的队伍，投入决定性的战斗。

决定性的战斗已经临近了。它只能在法国爆发；因为当英国没有参加革命战斗而德国仍然四分五裂的时候，法国由于国家的独立、

文明和中央集权，是唯一能够推动周围各国发生强烈震动的国家。所以，当1848年6月23日巴黎的流血斗争[5]开始的时候，当接二连三的电报和信件使欧洲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次斗争是在工人群众为一方和得到军队援助的巴黎居民的其他一切阶级为另一方之间进行的这样一个事实的时候，当战斗以现代内战史上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打了好几天，但双方都没有得到明显的胜利的时候，每个人都清楚地看到，这是一次伟大的决战，如果起义胜利，整个欧洲大陆就会掀起新的革命浪潮，如果起义失败，反革命统治就会至少暂时恢复。

巴黎的无产者被击败、被屠戮、被摧毁到这样的程度，以致直到现在他们还没有恢复元气。在整个欧洲，新旧保守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都立即肆无忌惮地抬起头来，这说明他们对这次事变的重要性了解得十分清楚。他们到处压制报刊，限制集会结社权，利用外地任何一个小城镇发生的任何细小事件来解除人民的武装，宣布戒严，并且用卡芬雅克传授给他们的新的策略和手段训练军队。此外，二月革命以后，大城市里的人民起义是不可战胜的这种说法第一次被证明是一种幻想；军队的荣誉恢复了；以前经常在重大的巷战中失败的队伍，现在重新获得了信心，相信自己也能胜任这样的斗争了。

在巴黎工人的这次失败之后，德国的旧封建官僚党便开始采取积极的步骤并制定明确的计划，甚至抛弃他们暂时的同盟者资产阶级，使德国恢复到三月事变以前的状态。军队又成为这个国家中的决定力量，而军队已不属于资产阶级而属于它自己了。甚至在普鲁士，那里一部分下级军官在1848年以前十分倾向于立宪制度，革命在军队中引起的混乱又使这些理智的年轻人像从前一样忠于职守了，只要普通士兵对于长官们稍微随便一点，长官就会立刻感到纪律和绝对服从的必要。被击败的贵族和官僚们现在开始看到自己的出路。空

前团结的军队由于在镇压小规模起义和对外战争中取得胜利而扬扬得意，羡慕法国士兵刚刚获得的大胜利。只要使这个军队不断和人民发生小冲突，一旦决定性的时刻到来，它就能够以强有力的一击粉碎革命党人，并把资产阶级议员们的傲慢不逊一扫而光，而进行这样一次决定性的打击的时刻很快就到来了。

关于德国各党派夏季所从事的那些有时令人感到新奇而多半令人感到厌烦的议会辩论和地方性斗争，我们就不谈了。只需要说明一点：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护者虽然在议会里取得多次胜利，但没有一次得到过任何实际效果，他们普遍感到，他们介于两个极端党派之间的地位一天天变得更不稳固了；因此，他们不得不今天力求同反动派结盟，明天又向比较民主的党派讨好。这种不断的摇摆使舆论界对他们嗤之以鼻，而按照事态发展的趋向来看，他们受人轻蔑，暂时主要是有利于官僚和封建主们。

到了秋初，各党派之间的关系已极其尖锐而紧张，使决战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民主派革命群众同军队之间在这场战争中的最初战斗发生在法兰克福。[261]虽然这次战斗并不十分重要，但是军队却是第一次在这里取得相对于起义的显著优势，而这产生了很大的精神上的效果。普鲁士根据十分明显的理由允许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所建立的虚有其名的政府同丹麦签订停战协定[254]，这个协定不但把石勒苏益格的德意志人交给丹麦人去横加报复，而且也完全否认了在丹麦战争中公认的多少带有革命性的原则。法兰克福议会以两三票的多数否决了这个停战协定。在这次表决之后发生了虚假的内阁危机。而三天以后议会重新审查了自己的决议，实际上取消了这个决议而承认了停战协定。这种可耻的行为激起了人民的愤怒。人们筑起了街垒，但法兰克福调来了足够的军队，经过六小时的战斗，起义便被镇

NEW-YORK DAILY TRIBUNE, TUESDAY, JULY 27, 1852.

GERMANY.

XV.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We now come to the last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German Revolution: the conflict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 with the Governments of the different States, especially of Prussia; the insurrection of Southern and Western Germany, and its final overthrow by Prussia.

We have already seen the Frankfort National Assembly at work. We have seen it kicked at by Austria, insulted by Prussia, disobeyed by the lesser States, duped by its own impotent Central "Government," which again was the dupe of all and every prince in the country. But at last things began to look threatening for this weak, vacillating, insipid legislative body. It was forced to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sublime idea of German Unity was threatened in its realization," —which meant neither more nor less than that the Frankfort Assembly, and all it had done and was about to do, were very likely to end in smoke. Thus it set to work in good earnest in order to bring forth as soon as possible its grand production, the "Imperial Constitution."

There was, however, one difficulty. What Executive Government was there to be? An Executive Council? No; that would have been, they thought in their wisdom, making Germany a Republic. A "President"? That would come to the same. Thus they must revive the old imperial dignity. But—as of course a prince was to be Emperor—who should it be? Certainly none of the *Dii minorum gentium*, from Reuss-Schleitz-Greitz-Lobenstein-Ebersdorf up to Bavaria; neither Austria nor Prussia would have borne that.

KARL MARX.

London, July, 1852.

载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的

《纽约每日论坛报》

压下去了。这次事件在德国其他地方(巴登、科隆)引起的类似的但声势不大的运动,也同样被镇压下去了。

这次前哨战给反革命党派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好处:完全由人民选举出来(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的唯一政府——法兰克福帝国政府,现在也像国民议会一样,在人民心目中破产了。这个政府和这个议会都不得不用军队的刺刀来反对人民意志的表现。它们已名誉扫地,虽然它们以前多少还能得到一点尊敬,但这次的忘本行为和这种依赖反人民的各邦政府及其军队的做法,却使帝国的摄政①,使他的大臣们和议员们此后都变成了毫无意义的摆设。我们不久就会看到,最先是奥地利,接着是普鲁士,后来是各小邦,都怎样轻蔑地对待这群无能的梦想家所发出的每一道命令、每一项要求、每一次委派。

现在我们来谈谈法国六月战斗在德国所引起的强有力的反响,来谈谈对德国有决定意义的——就像巴黎无产阶级的斗争对法国那样——事变。我们是指1848年10月维也纳的起义[262]和随之而来的对维也纳的攻击。但这次斗争的意义十分重大,说明对这次事件的进程产生比较直接影响的种种情况需要占《论坛报》很大篇幅,因此我们不得不专门写一篇通讯来加以阐述。

1852年2月于伦敦

---

①奥地利大公约翰。——编者注

[十一 维也纳起义]

现在我们来谈谈一个有决定意义的事变，即1848年10月的维也纳起义，它是巴黎六月起义在德国的革命的对应物①，它使优势一下子转到了反革命党派方面。

我们已经看到，3月13日革命胜利以后维也纳各阶级的状况如何。我们也已经看到，德意志的奥地利的运动如何同非德意志的奥地利各省的事变交错在一起并受到后者的阻碍。所以，我们现在只要简短地叙述一下引起德意志的奥地利这次最后且最勇猛的起义的原因就可以了。

上层贵族和做证券交易的资产阶级是梅特涅政府的非官方的主要支柱，他们在三月事变后仍然能够保持对政府的决定性影响。这是因为他们不仅利用了宫廷、军队和官僚，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利用了在资产阶级当中迅速蔓延的对"无政府状态"的恐惧。他们很快就大胆地放出了一些试探气球，这就是：新闻出版法[263]、不伦不类的贵族宪法和以旧日的"等级"区分为基础的选举法[264]。由怯懦无能的半自

①1852年3月1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原文"which formed the counter-revolutionary party in Germany, to the Parisian insurrection of June…"可能是印刷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11卷第54页上将这句话改为"which formed the revolutionary counterpart in Germany to the Parisian insurrection of June…"。——编者注

由派官僚组成的所谓宪制内阁，5月14日竟敢直接攻击群众的革命组织，解散了国民自卫军代表和大学生军团[252]代表的中央委员会（这个团体是专门为了监督政府并且在必要时动员人民群众的力量来反对它而组织的）。但这一行动激起了5月15日的起义，因此政府被迫承认了上述委员会，取消了宪法和选举法，并且授权由普选产生的制宪议会来制定新的根本法。这一切都由第二天的圣谕确认了。但是在内阁中拥有代表的反动党派，不久就促使自己的"自由派"同僚向人民的胜利成果发动新的进攻。大学生军团是从事运动的党派的堡垒，是经常的鼓动的中心，正因为如此，它就为较温和的维也纳市民所厌恶。5月26日，内阁下令把它解散了。如果只是由一部分国民自卫军来执行这个命令，这次打击也许能够成功，但是政府连国民自卫军也不相信，它调动了军队，于是国民自卫军立即倒戈，和大学生军团联合起来，从而破坏了内阁的计划。

但是与此同时，皇帝①和他的宫廷却于5月16日离开维也纳，逃往因斯布鲁克。在这里，他们被狂热的蒂罗尔人所包围，这些人由于看到撒丁—伦巴第的军队有入侵自己国家的危险，所以他们对皇室的忠心重新激荡起来；他们可以依靠驻在附近的拉德茨基的军队的支持，因斯布鲁克就在该军的大炮的射程之内。在这里，反动党派找到了一个避难所，可以摆脱任何监督和注视，毫无危险地集结自己已被击溃的力量，修补自己的阴谋之网，再次撒向全国。和拉德茨基、耶拉契奇、文迪施格雷茨以及各省行政官僚中可信赖的人们之间的联系恢复了，开始同斯拉夫族领袖们策划阴谋；这样一来，由反革命的宫廷奸党所掌握的一股真正的势力便形成了，而维也纳的无能的大

① 斐迪南一世。——编者注

臣们却只能在与革命群众不断的冲突中，在关于即将成立的制宪议会的辩论中败坏自己短暂而低微的声誉。因此，对首都的革命运动暂时听之任之的政策，在法国那样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中会使从事运动的党派变得无比强大，而在奥地利这样一个五光十色的政治结合体里则是重新组织反动力量的最可靠的方法之一。

维也纳的资产阶级以为，宫廷党在连续遭到三次失败之后，而且面临着由普选产生的制宪议会，已经不再是一个可怕的对手了，于是就越来越陷入厌倦和冷漠，总是呼吁遵守秩序和保持镇静；这个阶级在剧烈的动荡和由此产生的工商业混乱之后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情绪。奥地利首都的工业，几乎只是生产奢侈品，而对奢侈品的需求，自从革命爆发和宫廷逃亡以后，当然是大大缩小了。要求恢复正常的政府组织和宫廷还都（这二者都被指望会带来商业的重新繁荣），现在已成为资产阶级的普遍呼声。7月间制宪议会的召开被当做革命时代的终结而受到热烈欢迎；宫廷还都也受到同样的欢迎[265]，而宫廷在拉德茨基在意大利获胜和多布尔霍夫反动内阁上台之后，感到自己已经足以抵挡住人民的浪潮，同时它认为也需要回到维也纳以完成它同在议会中占多数的斯拉夫议员策划的阴谋。当制宪议会讨论把农民从封建束缚下解放出来并且免除他们为贵族服劳役的法律的时候，宫廷耍了一个巧妙的手腕。8月19日，皇帝①被安排去检阅国民自卫军，皇室、廷臣和将军们竞相恭维这些武装的市民，这些市民看到自己被公开承认为国家的一支重要力量而扬扬得意。紧接着发布了一道由内阁中唯一有声望的大臣施瓦策先生签署的命令，取消国家一向发给失业工人的补助金。诡计得逞了。工人阶级举行了示威；

①斐迪南一世。——编者注

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宣称拥护他们的大臣的命令；他们向“无政府主义者”进攻，像猛虎一样扑向手无寸铁、毫未抵抗的工人，在8月23日那天屠杀了许多工人。革命力量的团结和实力就这样被摧毁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维也纳也演变成了流血的搏斗，而反革命的宫廷奸党则看到，它可以进行致命打击的日子已经临近了。

匈牙利的事态很快就给反革命的宫廷奸党提供了一个机会，公开宣布他们行动中所要遵循的原则。10月5日官方的《维也纳日报》发表一道皇帝敕令（敕令没有一个匈牙利责任大臣副署），宣布解散匈牙利议会并且任命克罗地亚总督耶拉契奇做该国的军政首脑；耶拉契奇是南方斯拉夫反动派的领袖，他实际上与匈牙利合法政权处于交战状态。同时，维也纳的部队奉令出动，加入支持耶拉契奇政权的军队。可是，这么一来马脚就过于明显地露出来了；每一个维也纳人都觉得，向匈牙利开战，就等于向立宪制度的原则开战。这个原则在这个敕令中已经遭到蹂躏，因为皇帝企图不经责任大臣的副署就使自己的命令发生法律效力。10月6日，人民、大学生军团和维也纳的国民自卫军举行了大规模的起义，阻止部队出发。一些掷弹兵转到人民方面来；人民的武装力量和部队发生了短时间的冲突；陆军大臣拉图尔被人民杀死，到晚间人民取得了胜利。在施图尔韦森堡被佩尔采尔击败的耶拉契奇总督，这时逃到了维也纳附近的德意志的奥地利领土上。本应开去援助他的维也纳卫戍部队，现在也对他采取显然敌对和戒备的态度；皇帝和宫廷再次逃亡，逃到了半斯拉夫人的领土奥尔米茨。

宫廷在奥尔米茨的处境和它从前在因斯布鲁克时的处境完全不同。它现在已经能够直接进攻革命了。它被成群流入奥尔米茨的制

宪议会的斯拉夫族议员，以及帝国各个部分的斯拉夫族狂热分子所包围。在他们看来，这次战役应当是斯拉夫人复兴的战争，是歼灭侵入他们认为是斯拉夫人领土的两个入侵者——德意志人和马扎尔人——的战争，布拉格的征服者，现在集结在维也纳四周的军队的司令官文迪施格雷茨，一下子变成了斯拉夫民族的英雄。他的军队迅速地从各方面集中。一团一团的军队从波希米亚、摩拉维亚、施蒂里亚、上奥地利和意大利开往维也纳，与耶拉契奇的部队和原来的首都卫戍部队会合。这样，到10月底就集结了6万多人，他们立刻从四面八方把帝国的首都包围起来，到10月30日，他们已经推进到可以大胆发动决定性攻击的位置了。

这时，维也纳一片混乱与无措。资产阶级刚刚获得胜利，就又对“无政府主义的”工人阶级抱定从前那种不信任的态度。工人们也还清楚地记得六个星期以前武装的生意人对待他们的态度，记得整个资产阶级的摇摆不定的政策，因此不愿意指靠他们去保卫维也纳城，而要求获得武器，成立自己的军事组织。热望与君主专制作斗争的大学生军团，完全不能了解两个阶级彼此隔膜的真正原因，或者说完全不能了解当前局势的需要。公众思想混乱，各领导机构也是一片混乱。议会中剩下的人，即德意志族议员和几个给自己在奥尔米茨的朋友做侦探的斯拉夫族议员（几个革命的波兰议员除外）没完没了地开会。但是他们并不采取坚决的行动，却把全部时间消耗在能不能不越出宪法惯例的范围抵抗帝国军队这种无聊的辩论上。差不多全部由维也纳各民众团体的代表组成的安全委员会虽然决心抵抗，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多数是市民和小生意人，这些人永远不允许它采取坚决果敢的行动路线。大学生军团的委员会虽然通过了一些英勇的决议，但它根本不能掌握领导权。不受信任、没有武装、也没有组织起来

的工人阶级，刚刚解脱旧制度的精神枷锁，刚刚觉醒，尚未认识到而只是本能地感觉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应当采取的政治行动路线。他们只能在喧嚷的示威中表现自己；不能指望他们去克服当时的种种困难。但是只要能得到武器，他们是准备战斗到底的，在德国革命时期他们一向都是这样。

这就是维也纳当时的情形。在城外，经过整编的奥地利军队，由于拉德茨基在意大利的胜利而士气大振，其人数共有六七万，装备精良、组织良好，尽管指挥不力，但至少总还有指挥官。在城内，人心惶惶，阶级矛盾重重，一片混乱；国民自卫军有一部分决定根本不打，一部分犹豫不决，只有一小部分准备行动；无产阶级群众虽然人数众多，但是没有领袖，没有受过任何政治教育，容易惊慌失措，或者几乎是无缘无故地怒不可遏，盲目听信一切流言飞语；他们决心战斗，但是至少开始是没有武装的，而当最后被带去打仗的时候，也是装备不全、组织很差；议会束手无策，在火差不多已经烧着屋顶的时候，还在讨论一些琐碎的理论问题；领导委员会[266]既无魄力，又无能力。一切情形都与3月和5月的那些日子不同了，那时反革命营垒中一片混乱，唯一有组织的力量是革命所创造的力量。这样一场斗争的结局如何，几乎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还有什么疑问，那么10月30、31日和11月1日的事变也已经作出解答了。

1852年3月于伦敦

[十二　对维也纳的攻击。对维也纳的背叛]

当文迪施格雷茨调集的军队最终对维也纳发动进攻的时候，能够用于防御的兵力极其不足。国民自卫军只有一部分可以调到战壕中去。不错，无产阶级的自卫军最后终于仓促组成了，但是决定这样来利用人数最多、最勇敢、最坚决的这一部分居民为时已晚，所以他们未能充分学会使用武器和受到最基本的军纪训练，因而不能胜利地抗击敌人。因此，有三四千之众、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勇敢热情的大学生军团，从军事观点来说便成为能够胜任自己任务的唯一的一支部队了。但他们，再加上少数可靠的国民自卫军和一群纷乱的武装起来的无产者，同文迪施格雷茨的人数多得多的正规军比较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更不要说耶拉契奇的那帮土匪了，他们由于生活习惯，十分擅长于那种争夺一幢幢房屋和一条条胡同的巷战。文迪施格雷茨肆无忌惮地动用了许多装备完善的大炮，而起义者除了几门陈旧不堪、装配不好、使用不灵的火炮而外，还有什么呢？

危险越迫近，维也纳城内就越惊慌失措。直到最后一刻，议会还不能下决心向驻扎在离首都几英里的佩尔采尔的匈牙利军队求援。安全委员会通过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决议，它也像武装的人民群众一样，随着各种互相矛盾的谣言的起伏而情绪时高时低。只有一件事是全体都同意的——尊重财产；而这种尊重在当时的情况下几乎达到了滑稽可笑的程度。在最后制订防御计划方面没有做什么事情。如果

说当时还有人能挽救维也纳的话，那么贝姆便是唯一的一个，他是一个本籍斯拉夫族的、在维也纳几乎没有人知道的外国人；而由于大家对他不信任，他放弃了这个任务。如果他坚持下去，他也许要被当做叛徒而遭到私刑拷打。起义部队的指挥官梅森豪泽作为小说家的才能远远超过他甚至作为下级军官的才能，因此他根本不适合承担这个任务；可是，在八个月的革命斗争之后，人民党并没有造就或者物色到一个比他更能干的军事人才。战斗就这样开始了。维也纳人既十分缺少防御手段，又非常缺乏军事训练和组织，但他们还是作了最英勇的抵抗。贝姆担任指挥官时所发布的命令——"坚守阵地到最后一人"，在很多地方都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但是，毕竟寡不敌众。在构成近郊的主要交通线的又长又宽的林荫道上，街垒一个接着一个被帝国炮兵扫除了；战斗到第二天晚上，克罗地亚人便占领了旧城斜堤对面的一排房屋。匈牙利军队的无力而零乱的攻击完全被击退了；在休战期间，旧城里的队伍有的投降了，有的踌躇动摇，惊慌失措，剩下来的大学生军团在构筑新的工事，而帝国军队就在这时攻入城内，趁着城内的一片混乱占领了旧城。

这次胜利的直接后果就是种种暴行和许多人被依军法处死，进入维也纳的斯拉夫族匪帮的各种骇人听闻的无耻兽行；这些事大家知道得太清楚了，用不着在这里详细叙述。这次胜利的更深远的后果，即维也纳革命的失败使德国事态发生的全新的转变，我们下面再谈。关于对维也纳的攻击，还有两点需要加以考察。这个首都的人民有两个同盟者：匈牙利人和德意志人民。在这个考验的时刻他们在哪里呢？

我们已经看到，维也纳人以刚获解放的人民的全部慷慨胸怀挺身起来捍卫的事业，虽然归根到底也是他们自己的事业，但首先是而

且主要是匈牙利人的事业。他们不让奥地利军队开去进攻匈牙利，而宁愿自己首当其冲地承受这些军队的最凶猛的攻击。当他们这样高尚地挺身出来援助他们的同盟者的时候，成功地抵挡住了耶拉契奇的匈牙利人却把他赶向维也纳，用自己的胜利增强了准备进攻维也纳的兵力。在这种情形下，匈牙利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应该是毫不迟延地以一切可供使用的兵力去援助维也纳——不是援助维也纳议会，也不是援助安全委员会或维也纳的任何其他官方机构，而是援助**维也纳革命**。如果说匈牙利甚至忘记了维也纳为匈牙利打了第一仗，那么，它为了自己的安全，也不应该忘记维也纳是维护匈牙利独立的唯一前哨，如果维也纳陷落，便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帝国军队向匈牙利推进。现在我们已经完全弄清匈牙利人为他们在维也纳被包围和被攻击时按兵不动作辩护的种种借口：他们自己的战斗力量不足，维也纳议会或任何其他官方机构都拒绝向他们求援，他们必须坚持宪法立场而避免和德国中央政权发生纠纷。至于匈牙利军队实力不足，事实是这样的：在维也纳革命和耶拉契奇到来以后最初几天，完全可以不需要什么正规军队，因为当时奥地利的正规军还远远没有集中起来；如果在第一次击败耶拉契奇后乘胜进行勇猛无情的追击，那么单是在施图尔韦森堡作战的**后备军**的力量也足以和维也纳人会合，而使奥地利军队的集中迟延半年。在战争中，尤其是在革命战争中，在没有获得某种决定性的胜利之前，迅速行动是一个基本规则；而且我们可以断然地说，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看，佩尔采尔在和维也纳人会合以前是不应该停止行动的。事情当然是有些危险，但有谁打胜仗而不曾冒一点危险呢？当40万维也纳人把要开去征服1 200万匈牙利人的军队吸引来攻击他们自己的时候，难道他们就不冒一点危险吗？在奥地利人集结起来以前一直采取观望态度，以及后来在施韦夏特发

动软弱无力的佯攻(结果当然遭到了不光彩的失败)——这种军事错误同坚决向维也纳进军去追击耶拉契奇的溃散了的匪军相比所招致的危险肯定更大。

可是,据说匈牙利人如果不经官方机构的同意就这样进兵,便是侵犯德国领土,便会和法兰克福的中央政权发生纠纷,最重要的是,这就意味着背弃合法的和立宪的政策,而这种政策据说正是匈牙利人的事业的力量所在。可是要知道,维也纳的官方机构不过是形同虚设!奋起保卫匈牙利的难道是议会或什么民众委员会吗?难道不是维也纳的人民(而且只有他们)拿起武器为匈牙利的独立而打先锋吗?问题不在于必须支援维也纳的这个或那个官方机构,因为所有这些机构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可能而且很快就会被推翻;问题在于革命运动的高涨,在于民众行动的不断发展本身,只有这些才能保障匈牙利不被侵略。当维也纳和整个德意志的奥地利仍是匈牙利人反抗共同敌人的同盟者的时候,革命运动以后可能采取怎样的形式,这是维也纳人而不是匈牙利人的事情。但问题是:匈牙利政府这样坚持要取得某种所谓合法的认可,我们是否应当从中看出这是追求一种颇为可疑的合法性的第一个明显的征兆。这种追求虽然没有能够挽救匈牙利,但后来至少给英国资产阶级的公众留下了不坏的印象。

至于借口说可能和法兰克福的德国中央政权发生冲突,这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法兰克福当局**事实上**已经被维也纳反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假使革命能在那里找到为击败它的敌人所必需的帮助的话,该当局也同样会被推翻。最后,一个重要理由是,匈牙利不能离开合法的和立宪的基础;这种说法也许会得到英国的自由贸易派[109]的交口称赞,但历史永远不会承认这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假如维也纳人在3月13日和10月6日拘泥于"合法的和立宪的"手段,那么那种"合法

的和立宪的”运动的命运，以及所有那些第一次使匈牙利为文明世界所注意的光荣战斗的结局又会怎样呢？据说，匈牙利人在1848年和1849年曾立足于合法的和立宪的基础之上，而这个基础正是维也纳人民在3月13日用极端不合法的和非立宪的起义给他们争取到的。我们不打算在这里考察匈牙利的革命史，但我们应该指出，只用合法手段去反抗对这种循规蹈矩报以嘲笑的敌人，那是完全不适当的；还应该指出，如果不是这样一味声称要坚持合法性，使戈尔盖得以利用这种合法性来反对匈牙利政府，戈尔盖的军队就不会服从自己的统帅，就不会出现维拉戈什的那种可耻的灾祸[267]。而当1848年10月底匈牙利人为挽救自己的名誉终于渡过莱塔河的时候，那不是和任何直接的坚决的攻击一样不合法吗？

大家知道，我们对匈牙利并不怀有任何不友好的情感。在斗争中我们是维护它的；我们有权利说，我们的报纸——《新莱茵报》[80]，为在德国宣传匈牙利人的事业而做的工作，比任何其他报纸做得都要多。[268]它阐释了马扎尔族和斯拉夫族之间的斗争的性质，发表了一系列评论匈牙利战争的文章。这些论文得到了这样的荣誉，几乎后来出版的关于这一问题的每一本书都抄袭它们，连匈牙利本国人和“目击者”的著作也不例外。我们甚至现在也还认为，在欧洲大陆将来的任何动荡中，匈牙利仍然是德国的必需的和天然的同盟者。但我们一向对自己的同胞是很严厉的，所以我们也有权对我们的邻居直言不讳。其次，在这里我们应以历史学家的公正态度记述事实，所以我们必须说，在这个特定的事例中，维也纳人民豪迈的英勇精神，比匈牙利政府的小心谨慎态度不仅高尚得多，而且有远见得多。而作为德国人，我们还可以说，我们不愿意拿匈牙利战役中的一切煊赫胜利和辉煌战斗同我们的同胞维也纳人的那种自发的、独力进行的起义和

英勇的抵抗相交换，是他们使匈牙利有时间去组织能够完成如此伟大业绩的军队。

维也纳的第二个同盟者是德国人民。但他们到处都被卷入了像维也纳人所卷入的那种斗争。法兰克福、巴登和科隆都刚刚遭到失败并被解除武装。在柏林和布雷斯劳，人民和军队双方都剑拔弩张，战事一触即发。每一个地方的运动中心的情况也都是这样。到处问题都争执不下，只有靠武力来解决；保持德国过去的分裂和涣散状态的不幸后果，现在才第一次被痛切地感觉到。各邦、各省和各城市的各种不同的问题，实质上是一样的；但它们在各个地方是以不同的形式和借口提出的，它们在各个地方成熟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因此就发生了这种情形：虽然每个地方都感觉到了维也纳事变的决定性意义，但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实行一次重要的打击，以便帮助维也纳人，或牵制住敌人的力量；这样，能够帮助维也纳人的就只有法兰克福的议会和中央政权了。各方面都向它们呼吁；但它们做了些什么呢？

法兰克福议会[243]和由于它同旧联邦议会私通而产生的私生子——所谓的中央政权，因维也纳的运动而暴露了它们的彻头彻尾的无能。我们已经说过，这个可鄙的议会早就丧失了它的贞操，它尽管还年轻，但已白发苍苍，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各种胡扯瞎诌和娼妓式的八面玲珑的伎俩。议会最初曾对德国的强盛、复兴和统一满怀梦想和幻想，可是现在剩下的只是到处重复的条顿人的哗众取宠的夸夸其谈，以及每个议员都坚信自己十分重要而公众则诚实可欺。最初的质朴被抛弃了；德国人民的代表变成了一些讲求实际的人，就是说，他们发现，他们做得越少，说得越多，他们作为德国命运的裁决者的地位就越稳固。他们并不认为他们的许多会议是多余的；完全相反。但他们已经看出，一切真正重大的问题，对于他们都是禁区，他们最

好置之不理。于是他们像一群东罗马帝国[269]的拜占庭学者一样，以骄傲而勤恳的态度(他们后来的命运正是这种勤恳的报酬)讨论在文明世界的一切地方都早已解决了的理论教条，或者讨论一些永远得不到任何实际结果的显微镜下的实际问题。这样，议会就成了一所兰开斯特学校[270]。议员们在这里互教互学，因而这个议会对他们具有重大意义。他们都相信，这个议会所做的事情甚至超过了德国人民对它的希望，他们认为，谁要是再无耻地要求它取得什么成果，谁就是祖国的叛徒。

当维也纳起义爆发时，关于这个事件曾经有过许多质问、辩论、建议和修正，这一切当然毫无结果。中央政权准备加以干涉，它派了两个专员——过去的自由党人韦尔克尔先生以及莫斯莱先生——到维也纳去。同这两位德国统一的游侠骑士的英勇事迹和令人惊异的冒险行为比较起来，唐·吉诃德和桑乔·潘萨的旅行可以算得上是奥德赛。他们不敢到维也纳去，文迪施格雷茨恫吓他们，愚蠢的皇帝①不理解他们，施塔迪昂大臣公然无礼地愚弄他们。他们的公文和报告也许是法兰克福记录中可以在德国文献里占一席之地的唯一的一部分；这是一部卓越的、道地的讽刺小说，是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及其政府树立的永久性耻辱纪念碑。

国民议会的左派也派了两个专员——福禄培尔先生和罗伯特·勃鲁姆先生——到维也纳去，以维持他们在那里的声望。当危机临近的时候，勃鲁姆正确地断定，德国革命的大会战将在这里进行，并且毫不迟疑地决心为此而献出自己的头颅。福禄培尔却相反，他认为必须保全自己，以便承担他在法兰克福的岗位上的重要职责。勃鲁姆被

①斐迪南一世。——编者注

认为是法兰克福议会里最善于雄辩的人才之一，他当然是最得人心的。他的辩才恐怕在任何一个富有经验的议会里都经不起考验；他太喜欢德国非国教派传教士的那种浅薄的空谈，而他的论据既缺乏哲学的锐敏，又缺乏实际知识。在政治上他属于"温和的民主派"，这是一个相当暧昧的派别，但正是这种在原则问题上的模棱两可，受到一些人的喜爱。虽然如此，罗伯特·勃鲁姆按其天性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然而又是文质彬彬的平民，在决定性的关头，他的平民的本能和平民的气魄战胜了他的模棱两可以及由此造成的动摇不定的政治信念和见解。在这种时刻，他的才干远远超过了他平日的水平。

因此，他一到维也纳便看出他的国家的命运要在这里决定，而不是在法兰克福那些堂而皇之的辩论中决定。他立刻下定决心，抛弃了一切退却思想，挑起了指挥革命军的担子，行动异常冷静而果断。正是他使维也纳城的陷落迟延了很长一段时间，并且烧毁了多瑙河上的塔博尔桥，使该城的一面没有受到攻击。大家都知道，在维也纳被攻陷以后他就被捕，被军事法庭审判并处死。他英勇地牺牲了。而法兰克福议会虽然吓得发抖，却装出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接受了这种血腥的侮辱。它通过了一个决议，就其措辞的和缓和克制来说，与其说是对奥地利的诅咒，不如说是对被害的殉难者坟墓的侮辱。但是，难道能够指望这个卑劣的议会对它的一个议员——尤其是一个左派领袖——的被杀害表示愤怒吗？

1852年3月于伦敦

[十三 普鲁士制宪议会。国民议会]

维也纳于11月1日陷落，而同月9日柏林制宪议会的解散说明这一事变怎样立刻助长了全德国反革命党派的气焰和势力。

1848年夏季普鲁士的事变很快就传开了。制宪议会，或者更确切地说，“为了与国王商定宪法而选出的议会”，以及它的由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构成的多数，由于害怕居民中较积极的分子而同宫廷勾结起来进行种种阴谋，早已威信扫地。他们承认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恢复了令人憎恨的各种封建特权，因而出卖了农民的自由和利益。他们既没有能够起草宪法，也没有能够对总的立法作任何改进。他们差不多只是忙于弄清一些理论上的细微差别、纯粹的形式问题和制宪的仪式问题。事实上，这个议会与其说是一个能够代表人民的任何一点利益的机关，不如说是一个供议员们学习议会**礼仪**的学校。另外，议会中没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多数，而且这个多数差不多总是由动摇的“**中间派**”来决定，它的**忽**左**忽**右的摇摆，起初推翻了康普豪森内阁，后来又推翻了奥尔斯瓦尔德和汉泽曼内阁。但当自由派在这里也像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坐失时机的时候，宫廷却把它在贵族、最落后的农村居民以及在军队和官僚中的各种力量重新组织起来。在汉泽曼倒台以后，建立了一个由官僚和军官、由一切顽固的反动派组成的内阁，而这个内阁装出一副样子，好像它准备考虑议会的要求。议会采取“重要的是措施而不是人”这一变通原则使自己大受愚弄，竟对

这个内阁鼓掌称赞;这样,它当然就看不到这个内阁几乎公开地在纠集和组织反革命势力的事实。最后,维也纳的陷落发出了信号;国王①把大臣们都撤了职,用现任的内阁首相曼托伊费尔先生为首的"实干家"代替了他们。于是梦中的议会才突然惊醒,意识到大难临头。它通过了一个不信任内阁案,但是对此的回答是立刻来了一道命令,责令议会从柏林,从这个在发生冲突时议会可以指望得到群众支持的地方,迁到勃兰登堡——一个完全处在政府控制之下的外地小城镇。但议会宣称,除非它本身同意,既不能推延它的会期,也不能把它迁移或解散。这时候,弗兰格尔将军统率约4万大军进入柏林②。市政当局和国民自卫军军官会议决定不予抵抗。于是,制宪议会和它的后盾——自由派资产阶级听任联合起来的反动党派占据了一切重要阵地,并从他们手里夺去了几乎所有的防御手段,在这以后,就开始演出了一场"消极合法抵抗"的大喜剧,他们想把这种抵抗变成对汉普敦和美国人在独立战争期间最初行动[271]的光荣模仿。柏林宣布了戒严,但仍然平静无事;国民自卫军被政府解散,它规规矩矩地缴了械。在两个星期中,议会被军队从一个开会地点赶到另一个地点,到处都被驱散,而议员们却要求市民保持镇静。最后政府宣布议会已被解散时,议会才通过一项决议,宣布征税是非法的,随后议员们奔走全国,组织抗税。[272]但他们发现,他们选择这种手段是个大错误,在令人忐忑不安的几个星期之后,政府对反对派采取了严厉手段,于是所有的人都不愿再拒绝纳税以取悦于一个甚至连自卫的勇气都没有的已经死去的议会了。

①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②实际只有13 000名士兵。——编者注

在1848年11月初进行武装抵抗是否已经太迟，或者一部分军队如果遇到严重反抗是否会转到议会方面来，从而使事态的结局有利于议会，这也许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在革命中，也像在战争中一样，永远需要勇敢地面对敌人，而进攻者总是处于有利地位。在革命中，也像在战争中一样，在决定性关头，不计成败地孤注一掷是十分必要的。历史上没有一次胜利的革命不证明这个原理的正确。1848年11月，普鲁士革命的决定性关头来到了，正式领导整个革命运动的议会，不但没有勇敢地面对敌人，反而节节后退；进攻就更谈不上了，因为它连自卫都宁肯放弃。在弗兰格尔率领4万人叩打柏林大门的决定性关头，完全出乎他和他的军官们的意料，他看到的不是布满街垒的街道和变成枪眼的窗口，而是敞开的城门，街道上唯一的障碍物是和平的柏林市民，他们欣赏着自己同他开的这次玩笑——他们把自己手脚全都捆绑起来而听任那些惊异不止的士兵的处置。不错，议会和人民如果进行抵抗，也许会被击败；柏林也许会遭到炮击，也许会有千百人死亡，而仍然不能阻止保皇党的最后胜利，但这并不能作为他们立刻缴械乞降的理由。顽强奋战后的失败是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1848年6月巴黎的失败和10月维也纳的失败，在使这两个城市人民的头脑革命化方面所起的作用，无疑是2月和3月的胜利所不可比拟的。也许，议会和柏林的人民会遭到和上述两个城市同样的命运，但那时他们虽败犹荣，他们会在活着的人的心里留下一种复仇的渴望，而在革命时期，这种渴望是采取坚决激烈的行动的最有力的刺激之一。当然，在一切斗争中，应战的人都有被击败的危险，但这难道能作为不抽刀应战就承认战败、甘受奴役的理由吗？

在革命中，占据决定性阵地而不迫使敌人进攻以试其身手就把

这种阵地丢弃的人，永远应该被视为叛徒。

普鲁士国王解散制宪议会的同一道敕令也宣布了新的宪法，这个宪法是以该议会的一个委员会所拟定的草案作为基础的；不过，它在某些条款中扩大了国王的权限，而在另外一些条款中使议会的权力大成问题。根据这个宪法建立了两个议院，这两个议院应该在短期内开会，以便批准和修订宪法。

几乎用不着再问：当普鲁士的立宪派进行“合法而又和平的”斗争的时候，德国国民议会究竟在什么地方。像通常在法兰克福所见的情形一样，它忙于通过一些很温和的决议，谴责普鲁士政府的行动，而称赞“全体人民消极地、合法地和一致地抵抗暴力的壮观”。中央政府派专员到柏林去调解内阁和议会间的纠纷，但他们遭到了和他们的前任在奥尔米茨所遭受的同样命运——被客气地送出来了。国民议会的左派即所谓激进派，也派遣了他们的专员，这些专员在确信柏林议会完全无用并承认自己也同样无用之后，便回到法兰克福去报告事情的经过，并证实柏林居民的令人称道的和平行为。不仅如此，当中央政府的一个专员巴塞尔曼先生报告说，因为近来常看见各种各样粗野的人物在柏林街头徘徊，而在一切无政府主义运动发生之前总是有这类人物（后来这类人物就被称为“巴塞尔曼式的人物”）出现，所以普鲁士内阁最近所采取的严厉手段并非毫无理由的时候，这些可敬的左派议员和革命利益的坚决捍卫者便真的站起来赌咒发誓，证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此，在两个月当中，已经明显地证明了法兰克福议会的完全无能。这再清楚不过地证明，这个机构完全不能履行其职责，甚至不明白自己的职责究竟是什么。革命的命运在维也纳和柏林都已被决定了，而在这两个首都解决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的时候，人们好像根本不知道有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存在似的。仅仅这

个事实就足以证明，这个机构不过是一个由一群轻信的笨伯组成的辩论俱乐部。他们让各邦政府把自己当做议会傀儡，登场演戏，使各小邦和小城市的小店主和小手工业者开心，因为政府认为暂时有必要转移一下这一部分人的视线。这种做法需要保持多久，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但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这个议会的所有的“卓越”人物中，任何一个人都丝毫没有感觉到人家要他扮演的是什么角色，甚至直到今天，法兰克福俱乐部的旧日的成员们也还原封未动地保留着他们所特有的历史感觉器官。

1852年3月于伦敦

[十四　秩序的恢复。议会和议院]

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利用1849年的最初几个月来扩大上一年10月和11月的战果。自从维也纳被占领以后，奥地利的议会就在摩拉维亚的一个叫做克雷姆西尔的小镇上继续其有名无实的存在。斯拉夫族议员和选派他们的人曾经充当奥地利政府用来摆脱虚脱状态的主要工具，在这里，他们因为自己背叛欧洲革命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政府一经恢复了力量，便用极端轻蔑的态度来对待议会和构成议会多数的斯拉夫族议员；当帝国军队的最初的胜利已经预示匈牙利战争将很快结束的时候，议会便在3月4日被解散了，议员们也被武力驱散了。这时斯拉夫人才终于看到他们受了愚弄，于是他们大声疾呼：我们要到法兰克福去继续我们在这里不能进行的反对派活动！但这时已经太迟了，而他们除了安分守己或者参加无能的法兰克福议会以外再无别的选择，单是这个事实也足以表明他们已完全无可奈何了。

德国的斯拉夫人恢复独立的民族生存的尝试，现在而且很可能是永远地就这样完结了。有许多民族的零星残余，它们的民族性和政治生命力早已被消灭，因此它们在近1 000年以来总是不得不尾随一个更强大的民族即它们的征服者，就像过去威尔士人在英国，巴斯克人在西班牙，下布列塔尼人在法国一样，也像今天西属或法属克里奥尔人在最近被英裔美国人占领的北美洲那些地方一样。这些垂死的

民族，如波希米亚人、卡林西亚人、达尔马提亚人等等，都力图利用1848年的普遍混乱恢复他们在公元800年时的政治状况。过去1 000年的历史应该已经向他们表明，这样开倒车是不行的；如果说易北河和萨勒河以东的全部领土的确曾一度被斯拉夫血统的人所占据，那么这个事实只能证明德意志民族征服、并吞和同化它的古老的东方邻人的历史趋势以及它的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德意志人进行并吞的趋势过去一向是，现在也还是西欧文明传播到东欧的最有力的方法之一；只有当日耳曼化的过程进行到那些能够保持独立民族生存、团结统一的大民族（匈牙利人是这种民族，在某种程度上波兰人也是这种民族）的边界时，这种趋势才会停止；因此，这些垂死的民族的自然而不可避免的命运，就是让它们的强邻完成这种瓦解和并吞它们的过程。当然，这对曾经把一部分波希米亚人和南方斯拉夫人鼓动起来的泛斯拉夫主义梦想家的民族野心来说，并不是一种很惬意的前途；但是他们怎么能够希望历史为了让少数病弱者称心而倒退1 000年呢？这些人在他们居住的所有地方到处都是和德意志人混居杂处并且为后者所包围，他们几乎从很久以来为了满足文明的需要除了德语以外就再没有别的语言，而且他们甚至缺乏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众多的人口和整片的领土。因此，泛斯拉夫主义的浪潮，在德国和匈牙利的斯拉夫人地区，到处都掩盖着所有这些无数的小民族力求恢复独立的企图，到处都与欧洲的革命运动相冲突，同时，斯拉夫人虽然自称为自由而战，却总是（除了波兰的一部分民主派之外）站在专制主义和反动势力一边。在德国、匈牙利是这样，甚至在土耳其某些地方也是这样。他们是人民事业的叛徒，是奥地利政府的各种阴谋的拥护者和主要支持者，在所有革命的民族的心目中，他们是罪人。虽然任何地方的人民群众都没有参加泛斯拉夫运动的领袖们所

制造的关于民族问题的琐碎的纷争——这完全是因为他们过分无知，但永远不应忘记：在布拉格这个半德意志的城市里，成群的狂热的斯拉夫人曾经一再高呼："宁受俄罗斯的鞭笞也不要德意志的自由！"在他们1848年的初次尝试遭到失败以后，在奥地利政府给了他们教训以后，下次遇有机会他们大概不会再这样做了。但如果他们再一次准备以类似的借口去和反革命势力联合，那么德国的职责就很明显了，没有一个处于革命状态并卷入了对外战争的国家，能够容忍一个**旺代**50处在自己的心腹之中。

至于皇帝①在解散议会的同时所颁布的宪法，没有必要再谈它，因为它从未生效，现在则已完全废除了。从1849年3月4日起，在奥地利已经完全恢复了专制制度。

在普鲁士，各议院曾在2月开会，审查和批准国王②所颁布的新宪法。它们开了差不多六个星期的会，对政府的态度十分谦卑恭顺，但它们当时还没有充分的决心完全遵照国王和他的大臣们的愿望办事。因此，时机一到它们就被解散了。

于是，奥地利和普鲁士都暂时摆脱了议会监督的束缚。两邦政府现在已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里，并且能够在一切需要的场合使用这种权力。奥地利用它对付匈牙利和意大利，普鲁士用它对付德意志。因为普鲁士也准备进行一次战役来恢复各小邦的"秩序"。

现在，在德国的两个巨大的运动中心维也纳和柏林，反革命占了上风，只是在各小邦里斗争尚未见分晓，虽然在那里力量的对比

①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编者注

②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也日渐不利于革命方面。我们已经说过，这些小邦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243]里找到了共同中心。虽然这个所谓的国民议会的反动性质早已十分明显，连法兰克福的人民都武装起来反对它，但是它的产生却多少带一点革命性。1月间它曾经采取过一反常态的革命立场；它的权限从未确定，但它却终于能够作出一项决议，说它的决定具有法律效力——虽然各大邦从未承认这个决议。在这种情况下，在立宪君主派看到正在恢复元气的专制派已经夺取了它的阵地的时候，差不多全德国的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自然都把他们的最后希望寄托在这个议会的多数派身上，而小商人的代表，民主派的核心，在日渐困难的境遇中团结在这个议会的少数派周围，这个少数派的确是民主派在议会中最后的密集的方阵。另一方面，各大邦的政府，尤其是普鲁士的内阁，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不正常的民选机关和德国已经复辟的君主制度是不能相容的，而它们所以没有要求立刻把它解散，那只是因为时机未到，也因为普鲁士还希望先利用它去达到沽名钓誉的目的。

同时，这个可怜的议会本身也一天比一天更加狼狈。在维也纳和柏林，它派去的代表和专员都遭到极端的轻蔑；它的一个议员①在维也纳被当做一个普通造反者处以死刑，虽然他具有议员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它的法令到处都没有人理睬。如果说各大邦还曾经提到这些法令，那只是在抗议书中提到，这些抗议书否认议会有权通过它们的政府必须执行的法律和决定。代表这个议会的中央行政权，几乎和全德各邦的内阁都发生了外交争辩，而且不管议会和中央政府如何努力，它们都没有能够使奥地利和普鲁士说明它们的意图、计划和

①罗·勃鲁姆。——编者注

要求究竟是什么。最后，议会终于开始清楚地看到，至少是看到了这样一点：它已失去了一切权力，它本身也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掌握中；如果它真打算给德国制定全联邦宪法，它就必须立刻认真地开始做这件事情。许多动摇的议员也都清楚地看到，他们被各邦政府大大地愚弄了。但他们既然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现在他们又能做什么呢？唯一能挽救他们的办法是迅速而坚决地投入人民的营垒，但就是采取这个步骤，成功的希望也是很渺茫的。其次，这是一伙软弱无能、优柔寡断、目光短浅、自以为是的人，当各种互相矛盾的谣言和外交照会的没完没了的嘈杂声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的时候，他们却在不断重复的誓言中寻求慰藉和支持，说什么他们是国家最优秀、最伟大、最英明的人物，只有他们能够拯救德国。一年的议会生活已使他们变成了道地的白痴，难道在这伙可怜虫中间能找到可以作出迅速明确的决定的人吗？至于行动坚决果断的人，那就更不用说了！

奥地利政府终于丢掉了假面具。在3月4日颁布的宪法中，它宣称奥地利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君主国，财政、关税制度和军事编制完全统一；这样便抹去了德意志省份和非德意志省份之间的一切界线和差别。它这样宣布，是与法兰克福议会已经通过的决议和已经通过的草拟中的联邦宪法的条文相抵触的。这是奥地利对议会的挑战，而可怜的议会除了应战之外，再没有别的选择。它虚张声势地应战一番，但奥地利很明白它自己的力量，也很了解议会一文不值，所以根本不予理睬。而这个自以为是宝贝的代议机关，为了报复奥地利对它的这种侮辱，竟想不出任何更好的办法，而只好自缚手足，跪倒在普鲁士政府面前。说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它向之屈膝跪拜的，正是它曾经斥之为违背宪法和敌视民意并坚持要撤换而没有撤换掉的那些大

臣,这种可耻的行径和后来发生的悲喜剧事件的详情,将是我们下一篇的内容。

1852年4月于伦敦

[十五　普鲁士的胜利]

我们现在来谈德国革命史的最后一章：国民议会与各邦政府尤其是普鲁士政府的冲突，德国南部和西部的起义及其最后为普鲁士所镇压。

我们已经看到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工作情况了。我们已经看到，奥地利践踏它，普鲁士侮辱它，各小邦不服从它，它自己的无能的中央“政府”[273]愚弄它，而这个中央政府本身又被全国各邦的每个君主所愚弄。到最后，这个软弱、动摇、无聊的立法机关终于感到事态的严重了。它被迫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统一德国这个崇高思想的实现受到了威胁。”而这恰恰等于说，法兰克福议会以及它做过的和要做的一切，看来即将成为泡影。因此它以最认真的态度开始工作，以便尽快地完成它的杰作——“帝国宪法”。

但是这里有一个难题。行政权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是一个行政委员会吗？不行，明智的议会考虑到：那样就会使德国成为一个共和国。是一个“总统”吗？那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因此，必须恢复旧日的皇帝尊严。但是皇帝总是要由一个君主来做的，究竟谁该做皇帝呢？自然不能是罗伊斯-施莱茨-格赖茨-洛本施泰因-埃伯斯多夫公爵[①]以至巴伐利亚君主这些**二流人物**；无论奥地利或普鲁士都不能

①指亨利希七十二世。——编者注

容忍那样做。只有奥地利或普鲁士才有这样的资格。但是怎样二者择一呢?毫无疑问,如果环境更好的话,如果不是奥地利政府斩断戈尔迪之结因而使议会解脱了麻烦的话,这个崇高的议会可能直到今天还在开会,还在讨论这个重要的左右为难的问题而得不出结论。

奥地利十分清楚,一旦它把自己的一切省份驯服,而重新以一个强大的欧洲大国出现在欧洲,政治引力定律本身就会把德国其余部分拉入它的势力范围之内,而不需要借助于法兰克福议会授予它的皇冠可能使它获得的威信。奥地利自从扔掉那个毫无实际意义的德皇皇冠之后,已经更加强盛得多了,行动也更加自由得多了。那个皇冠妨碍了它实行独立的政策,而并没有在德国国内国外给它增加丝毫力量。如果奥地利不能在意大利和匈牙利保持自己的阵地,那么它在德国也会土崩瓦解、一败涂地,永远也别想拿回它在全盛时期就已失去的皇冠。因此,奥地利立刻宣称它根本反对复活皇权,而明确地要求恢复德意志联邦议会——即被1815年的各个条约提到和承认的唯一的德国中央政府。它在1849年3月4日颁布的宪法,则明确宣布奥地利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中央集权的和独立的君主国,它甚至与法兰克福议会所要改组的那个德国毫不相干。

这种公开宣战使得法兰克福的那些自作聪明的人实在没有别的选择,只得把奥地利摒除于德国之外,而把德国的其余部分建成一个东罗马帝国[269]式的国家——“小德意志”;把它那相当粗陋的皇袍加在普鲁士国王陛下的身上。应该提到,这是6—8年前德国南部和中部的一批自由主义**空论家们**所提倡的那种旧的计划的更新,这些人把这种有失体面的状况视为天赐的良机,因为在这种状况下,可以把自己旧日的奇怪念头重新提出来,作为拯救祖国的最后的“新招”。

因此,1849年2月和3月间,他们结束了关于帝国宪法以及权利

宣言和帝国选举法的讨论，同时不得不在许多地方作了十分矛盾的让步——时而向议会中的保守派或者更确切地说向反动派让步，时而又向较进步的派别让步。事实上，很明显，原来属于右派和右翼中间派（保守派和反动派）的议会领导权，现在逐步地（虽然是徐缓地）转到议会中的左派或民主派方面来。议会已把奥地利摒除于德国之外，但奥地利代表仍被邀请参加会议和进行表决，这些代表的暧昧立场，也促使议会中的均势遭到破坏；因此，早在2月底，左翼中间派和左派就常常由于奥地利代表的支持而居于多数地位，虽然有的时候保守的奥地利代表好像开玩笑似的忽然在投票时又追随右派，使天平又倒向另一边。他们使议会这样**忽左忽右**，其目的是想让它为人所轻视，但这是完全用不着的，因为人民群众早已认识到法兰克福所做的一切纯粹是空洞无益的事情。不难想象，在当时这种左右摇摆的情形下拟定的宪法，究竟是怎样一种东西了。

议会中的左派（他们自信是革命德国的**精英**和骄傲），完全陶醉于依靠受奥地利专制制度唆使并为它效劳的一些奥地利政客的好意（更确切地说是恶意）而取得的微小的胜利。每当一种稍稍接近于他们自己的那些不很明确的原则的主张，以一种用顺势疗法冲淡了的形式获得法兰克福议会的某种批准时，这些民主派就宣称他们已经挽救了国家和人民。这些可怜的蠢人，在他们的整个说来十分暗淡的一生中，绝少遇到胜利一类的事情，以致他们真正相信，以两三票的多数通过的他们的毫无价值的修正案，会改变欧洲的面貌。他们从开始立法生涯时起，就比议会中任何其他派别更深地感染了**议会迷**这种不治之症，这种症候使它的不幸的患者满怀一种庄严的信念：整个世界，它的历史和它的未来，都要由有幸以他们为议员的这个代议机关的多数票来支配和决定；他们议院四壁以外发生的所有一切——

战争、革命、铁道建设、所有新大陆的殖民地化、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中美洲运河、俄罗斯的军队以及任何其他多少可以影响人类命运的事情——同与目前正受到他们可敬的议院关注的那个重要问题紧密联系的那些重大事件比较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于是，议会中的民主派由于成功地往“帝国宪法”里偷偷塞进了自己的一些灵丹妙药，便认为自己首先有义务对它加以支持，虽然这部宪法的每一重要条款都和他们自己所常常宣扬的原则正相矛盾。最后，当这部不伦不类的作品被它的主要作者们抛弃并遗赠给民主派的时候，后者就接受了这份遗产，并且坚持这部**君主制的**宪法，甚至反对任何**当时**主张民主派自己的**共和主义**原则的人。

但是应该承认，这里的矛盾不过是表面的。帝国宪法的不明确、自相矛盾和不成熟的性质，恰好反映了这些民主派先生们的不成熟、混乱和自相矛盾的政治思想。如果说他们自己所说的话和所写的文章——就他们所能够写出的而言——还不能充分证明这一点，那么他们的行为就是充分的证据。因为对头脑正常的人来说，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我们以后还会看到，德国民主派的这些英雄们的行动足以说明他们自己。不管怎样，帝国宪法及其一切附属物和装饰品的确被通过了，3月28日，普鲁士国王①在248票弃权和大约29位议员缺席的情况下，以290票当选为**除奥地利之外**的德国皇帝。这真是历史的一个绝大的讽刺：在1848年3月18日革命的后三天，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惊愕的柏林的街道上上演了一出皇帝的滑稽剧[274]，当时的情形如果是在别处，他也许会被认为触犯

①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了缅因州的禁酒令，而恰好在一年之后，这个令人厌恶的滑稽剧却被一个虚构的全德代表会议所批准。德国革命的结果就是这样！

1852年7月于伦敦

[十六　国民议会和各邦政府]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243]把普鲁士国王选为德国(奥地利**除外**)皇帝以后，便派遣一个代表团到柏林去授予他皇冠，然后就宣告休会。4月3日弗里德里希-威廉接见了代表们。他告诉他们说，虽然他接受人民代表投票所赋予他的凌驾于德国其他各邦君主之上的权利，但他在还没有确信其余各邦君主承认他的最高统治权和承认赋予他这些权利的帝国宪法以前，不能接受皇冠。他接着说，考虑这个宪法是否可以予以批准，这是德国各邦政府的事。最后他说，做皇帝也好，不做皇帝也好，他时刻都准备着以武力打击内部或外来的敌人。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他以使国民议会十分吃惊的方式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法兰克福的那些自作聪明的人经过一番深刻的外交研究之后，终于得出结论说，作这种答复就等于拒绝皇冠。于是他们(在4月12日)作出一项决议：帝国宪法是国家的法律，必须遵守。但是，由于他们根本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他们就选举了一个三十人委员会，要它就如何才能实施这部宪法提出建议。

这项决议就是法兰克福议会和德国各邦政府之间现在已爆发的冲突的信号。

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立即宣布拥护新的法兰克福宪法。他们不能再等待"终结革命"的时刻了。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由于武力的干涉，革命当时已经终结。上述各阶级本想选择一个较和平的

方式来实现这个行动，但他们没有得到机会。事已如此，他们只能好自为之，这就是他们立即作出的并坚决执行的决定。在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的各小邦，资产阶级早已重新陷入那种最合他们心意的、表面上轰轰烈烈但由于没有实力而毫无成效的议会鼓动。这样一来，德国的每一个邦，单独看来，好像都获得了据说能使它们今后走上和平立宪发展道路的新的最终形式。只留下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即关于德意志联邦[231]的新的政治组织的问题。这个唯一的、看来还包含着危险的问题必须立刻得到解决。因此资产阶级就对法兰克福议会施加压力，敦促它尽快制定宪法；因此上层和下层资产阶级都决心接受并支持这部不管是什么样的宪法，以便立即造成一个稳定的局面。总之，要求制定帝国宪法的鼓动一开始就是出于一种反动的情感，并且是在那些早已厌倦革命的阶级中产生的。

但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未来的德国宪法的首要的基本的原则，在1848年春夏的最初几个月就已被表决通过了；当时，人民运动还处于高潮。那时通过的决议虽然**在当时来说**是十分反动的，但在经历了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的暴虐行为之后，现在看起来它们却是十足自由主义的，甚至是民主主义的了。进行比较的标准变了。法兰克福议会如果不愿在道义上自杀，就不能勾销已经通过的这些条款，而根据在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的刀剑的威逼下制定的那些宪法去仿造一部帝国宪法。此外，我们已经说过，议会中多数派的地位已经掉换，自由派和民主派的势力不断增大。因此，帝国宪法的特色是：它不仅在表面上完全出自民意，同时，虽然充满了矛盾，却仍然是全德国最富于自由主义精神的宪法。它的最大缺点在于它只是一纸空文，它的条款没有实力作为后盾。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民主派即小资产阶级群众抱住帝国宪法

不放，那是很自然的。这一阶级在提出自己的要求方面，向来比拥护立宪君主制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更先进；它曾经表现出比较强硬的态度，常常以武力对抗相要挟，经常慷慨地宣称，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不惜牺牲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但是有许多事实证明，一到危急关头它就不见了，而在遭到彻底失败的第二天，它却觉得再舒服不过了，这时虽然一切都已失掉，但它至少可以自慰的是：它知道，无论如何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当大银行家、大工厂主和大商人对法兰克福宪法的拥护比较慎重，只是简单地对它表示赞成的时候，紧挨在他们下面的阶级——我们的勇敢的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却堂而皇之地出来亮相，像往常一样地宣称，他们宁愿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让帝国宪法完蛋。

得到这两派——拥护立宪君主制的资产者和多少带有民主主义倾向的小资产者——支持的、要求立即实施帝国宪法的运动进展很快，它在几个邦的议会中得到了最强有力的表现。普鲁士、汉诺威、萨克森、巴登和符腾堡的议院都宣称赞成这部宪法。各邦政府和法兰克福议会之间的斗争尖锐化了。

可是，各邦政府迅速行动起来了。普鲁士的两院被解散了，这是违宪的，因为应由它们审查和批准普鲁士宪法；政府故意在柏林激起了骚动；过了一天，即4月28日，普鲁士内阁发布了一个通告，声称帝国宪法是一个极端无政府主义的和革命的文件，德国各邦政府必须予以审订并使之纯正。普鲁士就这样直截了当地否认了法兰克福的那些聪明人常常夸耀而从未真正实现过的自主的制宪权。于是召集了一个各邦君主会议[275]，即死灰复燃的旧联邦议会，来讨论已被宣布为法律的宪法。同时，普鲁士把军队集中于离法兰克福只有三天路程的克罗伊茨纳赫，并且号召各小邦效法它的榜样，只要各小邦的议

院支持法兰克福议会，就立即予以解散。汉诺威和萨克森马上照着这个榜样做了。

显然，斗争的结局要靠武力来决定，这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各邦政府的敌对态度和人民中的骚动，一天比一天明显。具有民主情绪的市民到处力图影响军队，并且在德国南部取得了很大成绩。各地举行群众大会，会上通过决议准备在必要时以武力支持帝国宪法和国民议会。科隆为此召开了一个莱茵普鲁士各市议会代表会议[276]。在普法尔茨、在贝格区、在富尔达、在纽伦堡、在奥登林山，农民成群地举行集会，情绪十分激昂。这时，法国的制宪议会被解散了，各地都在激烈的骚动中准备新的选举；而在德国的东部边境，匈牙利人通过连续不断的光辉的胜利，在不到一个月的期间把奥地利的侵略浪潮从蒂萨河压回到莱塔河，每天都有攻下维也纳的可能。总之，人民的想象力到处都达到了最高点，而各邦政府的挑衅政策也一天天更加露骨，暴力冲突是必不可免了，只有怯懦的低能儿才会相信斗争可以和平解决。但这种怯懦的低能儿在法兰克福议会里却大有人在。

1852年7月于伦敦

[十七　起　　义]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德国各邦政府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冲突，终于在1849年5月初爆发为公开的敌对行动。被奥地利政府召回的奥地利议员，除了少数左派或民主派议员外，已经离开议会回家去了。大多数保守派议员看到事态的动向，甚至不等他们各自的政府提出要求就退出了议会。因此，即令撇开前几篇中所指出的左派势力得以加强的种种原因不谈，仅仅右派议员的离职，就足以使议会里以前的少数派转变为多数派了。以前从未梦想到会获得这种好运的新的多数派，过去曾经利用自己的反对派地位尽情揭发旧多数派及其帝国摄政府的软弱、犹豫和怠惰，现在**他们**竟然突然要来代替那个旧多数派了。现在**他们**要表明他们能做什么。当然，**他们的**活动应该是有魄力、有决心而充满生气的。**他们**，德国的**精英**，很快就能推动老朽的帝国摄政①和他的动摇的大臣们前进，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他们就要——这是毫无疑问的——以人民主权的力量废除这个无能的政府，用一个精干的、不知疲倦的行政权代替它，这个行政权一定能挽救德国。可怜的家伙们！**他们的**统治——如果没有一个人服从也能称为统治的话——比他们的前任的统治更加荒唐可笑。

新的多数派宣称：尽管有种种障碍，帝国宪法必须付诸实行，并

①奥地利大公约翰。——编者注

且必须**立即**付诸实行；7月15日人民要选举新议院的议员，而这个议院将于8月15日在法兰克福开会。这是向未承认帝国宪法的各邦政府——首先是占德国人口四分之三以上的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公开宣战；各邦立即接受了宣战。普鲁士和巴伐利亚也召回了由它们境内派往法兰克福的代表，并加紧反对国民议会的军事准备。另一方面，民主派（在议会以外）为拥护帝国宪法和国民议会而举行的示威，也一天比一天更加激烈，工人群众在激进党人的领导下，决心拿起武器捍卫一项事业。虽然这不是他们自己的事业，但是使德国摆脱旧的君主制枷锁至少给他们提供了在某种程度上达到自己目的的机会。于是人民和政府到处为此而剑拔弩张；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地雷已经装好，一点火星就可以使它爆炸。萨克森议院的解散、普鲁士后备军的征召、各邦政府对帝国宪法的公开反对就是这样的火星。火星落下了，于是全国马上燃起了熊熊大火。德累斯顿的人民在5月4日胜利地占领了该城，驱逐了国王[①]；同时一切邻近的地区都派遣援军帮助起义者。在莱茵普鲁士和威斯特伐利亚，后备军拒绝出征，占领了兵工厂，武装起来捍卫帝国宪法。在普法尔茨，人民逮捕了巴伐利亚的政府官吏，夺取了公款，组织了一个保卫委员会，保卫委员会宣布该省受国民议会的保护。在符腾堡，人民强迫国王[②]承认了帝国宪法。在巴登，军队和人民联合起来迫使大公[③]逃亡，并建立了临时政府。在德国其他地方，人民都在等待着，只要国民议会发出决定性的信号，就武装起来听它指挥。

虽然国民议会过去的活动不大光彩，现在它的处境却出乎意料

①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二世。——编者注

②威廉一世。——编者注

③莱奥波德。——编者注

的好。德国的西半部已经拿起武器来捍卫议会；军队到处都发生动摇，在各小邦，军队无疑都支持运动。匈牙利人胜利地挺进已使奥地利精疲力竭，俄罗斯——德国各邦政府的后台则正在以全副精力帮助奥地利对抗马扎尔军队。只有普鲁士尚待制服；由于该邦存在着对革命的同情，达到这一目的的机会肯定是存在的。总之，一切都取决于议会的行动。

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它要遵守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如果被忽视，那么忽视它们的政党就会遭到灭亡。这些规则是从各政党的性质和在这种情况下所要对待的环境的性质中产生的逻辑推论，它们是如此浅显明白，1848年的短时期的经验已经使德国人十分熟悉它们了。第一，不要玩弄起义，除非你有充分的准备应付你所玩弄的把戏的后果。起义是一种用若干极不确定的数进行的演算，这些不确定数的值每天都可能变化。敌人的战斗力量在组织、训练和传统的威望方面都占据优势；如果你不能集中强大的优势力量对付敌人，你就要被击溃和被消灭。第二，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它将使起义在和敌人较量以前就遭到毁灭。必须在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每天都必须力求获得新的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必须保持起义的最初胜利给你造成的精神上的优势；必须把那些总是尾随强者而且总是站在较安全的一边的动摇分子争取过来；必须在敌人还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力量来攻击你以前就迫使他们退却；用迄今为止人们所知道的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话来说，就是要：**“勇敢，勇敢，再勇敢！”**①

---

①雅·丹东1792年9月2日在立法议会上的演说。——编者注

那么，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要想逃脱它必然要灭亡的命运，它应当怎么办呢？首先，要把局势弄清，并且要认识到，现在除了无条件地向各邦政府屈服或者毫不动摇地坚决实行武装起义以外别无选择。其次，要公开承认一切已经爆发的起义，并号召各地的人民拿起武器保卫国民代议机关，宣布一切敢于反对有主权的人民（由受委托者代表他们）的君主、大臣以及其他人都不受法律保护。第三，要立即废除德意志帝国摄政，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活跃的、**毫不退缩的**行政权；召集起义部队到法兰克福来直接保护它，从而给起义的扩展一个合法的借口；要把它所指挥的一切战斗力量组织成为一个严密的整体。总之，要迅速而坚决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来巩固自己的阵地，削弱敌人的阵地。

法兰克福议会里善良的民主派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这些可敬的先生们不满足于听任事变自然发展，而且走得更远，竟用自己的反对行动扼杀一切正在准备中的起义运动。例如，卡尔·福格特先生在纽伦堡就是这样做的。他们任凭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和威斯特伐利亚的起义被镇压下去而不予任何援助，只是在事后对普鲁士政府的残酷暴行表示了感伤的抗议。他们和德国南部的起义暗中保持着外交关系，但从未以公开承认的方式来支持这些起义。他们知道帝国摄政站在各邦政府方面，但却呼吁**他**反对这些政府的阴谋，而他对此要求始终无动于衷。帝国的大臣们即旧日的保守派，每次开会都嘲笑这个无能的议会，他们却加以容忍。当西里西亚的议员、《新莱茵报》的编辑之一威廉·沃尔弗要求他们宣布帝国摄政不受法律保护，公正地指出帝国摄政是帝国第一个和最大的叛徒时，他却被这些激愤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全场一致地哄下了台！[277]简单说来，他们继续清谈、抗议、发宣言，但一直没有采取行动的勇气或意识；各邦政府派来的敌

军日渐逼近，而他们自己的行政官帝国摄政却忙于和各邦君主密谋尽快地消灭他们。这样一来，这个可耻的议会连最后一点威信也失去了；那些起来保护它的起义者也不再关心它了。最后，当它那可耻的末日到来时，正如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的那样，它就寿终正寝了，它的不光彩的死亡没有引起任何人的任何注意。

1852年8月于伦敦

[十八　小资产阶级]

在我们的前一篇中，我们指出了德国各邦政府和法兰克福议会之间的斗争终于达到了如此激烈的程度，以致在5月初德国很大一部分地区都爆发了公开的起义：首先在德累斯顿，接着在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在莱茵普鲁士的部分地区，最后在巴登。[93]

在这一切场合，起义者**真正的战斗**主力，即首先拿起武器与军队作战的主力，是由**城市工人阶级**组成的。一部分穷苦的农村居民，即雇农和小农，一般在冲突真正爆发后参加了工人的队伍。资本家阶级以下的一切阶级中的大多数青年至少曾一度参加了起义军的队伍，但这一群颇为混杂的青年人，一到事态的严重时刻，便很快减少了。尤其是喜欢自称为“知识界的代表”的大学生，如果不是由于获得军官头衔而被留住，他们便首先抛弃自己的旗帜，可是，他们担任军官根本就不够格。

工人阶级参加了这次起义，正像它也会参加其他起义一样，只要这种起义能清除它在取得政治统治和实行社会革命道路上的某些障碍，或者至少可以迫使那些势力较大而勇气较小的社会阶级采取一种比它们以前所采取的更坚决更革命的方针。工人阶级拿起武器时已清楚地认识到，从事件的直接目的来说，这次起义并不是它自己的斗争；但它仍然执行了对它来说是唯一正确的策略：不让任何以它为垫脚石的阶级（像资产阶级在1848年所干的那样）巩固其阶级统

治,除非这一阶级至少给工人阶级提供一个为自身的利益而斗争的自由场地;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使事态发展成为危机,这种危机不是使整个民族坚决果断地走上革命道路,就是使革命前的状况尽量恢复,从而使新的革命不可避免。在这两种场合,工人阶级都代表整个民族的真正的和被正确理解的利益,因为它尽量加速革命的进程,而这个革命对于文明欧洲的任何一个旧社会都已成为历史的必然,没有这个革命,文明欧洲的任何一个旧社会都休想较安稳较正常地继续发展自己的力量。

至于参加这次起义的农村居民,他们大半是这样投入革命派的怀抱的:部分地是由于捐税过重,部分地是由于压在他们身上的封建义务过重。他们本身没有任何主动性,总是尾随在参加起义的其他阶级的后面,在工人与小资产阶级之间摇摆。他们站在哪一边几乎总是由他们各自所处的不同的社会地位决定的。农业工人通常是支持城市工人的;小农则倾向于和小资产阶级携手。

我们已经几次提到过这个小资产阶级的重大作用和影响,可以认为这个阶级是1849年五月起义[93]的领导阶级。因为,在这一次,没有一个德国大城市是运动的中心,所以通常在中小城市中占优势的小资产阶级便能够掌握运动的领导权。而且我们已经知道,这次维护帝国宪法和德国议会权利的斗争,正是同这个阶级的利益密切相关的。在一切起义地区①所组织的临时政府中占大多数的都是这一部分人的代表,因此,他们能走多远,这完全可以作为衡量德国小资产阶级有多大能耐的尺度。我们将要看到,它除了使托付给它的运动遭到失败而外,什么能耐也没有。

①即萨克森、巴登和普法尔茨等地。——编者注

小资产阶级擅长吹牛，在行动上却十分无能，而且不敢作任何冒险。这个阶级的商业交易和信贷业务的**小本经营**，很容易给它的性格打上缺乏魄力和进取心的烙印，因此它的政治活动也自然具有同样的特点。所以小资产阶级是用漂亮的言词和吹嘘它要完成什么功绩来鼓动起义的；一旦完全违背它的愿望而爆发了起义，它就迫不及待地攫取权力；但它使用这种权力只是为了毁灭起义的成果。每当一个地方的武装冲突使事态发展到了危急关头，小资产阶级就十分害怕他们所面临的危险局势，害怕人民真正接受了他们号召武装起来的高调，害怕已经落到他们手里的政权，尤其是害怕他们被迫采取的政策会给他们自己、给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他们的财产带来的后果。人们不是希望他们真的像他们常说的那样，为了起义的事业，可以不惜牺牲"生命财产"吗？他们在起义时不是被迫担任官方职务，因而在失败时就有失去自己的资本的风险吗？而在起义胜利时，他们不是深信自己会立即被赶下台，并且眼看着他们的全部政策被作为他们的战斗部队主力的胜利的无产阶级根本改变吗？这样，小资产阶级就被种种互相对立的危险团团包围，它除了让一切都听天由命之外，再也不知道如何使用它的权力；因此，它当然也就失去了本来可能有的取得胜利的小小的机会，而把起义完全断送了。小资产阶级的策略，或者更确切地说，小资产阶级的毫无策略，到处都是一样的，所以1849年5月德国各个地方的起义，也都是由一个模子铸出来的。

在德累斯顿，巷战继续了四天之久。德累斯顿的小资产阶级、"市自卫军"，不仅没有参加斗争，反而在许多场合支持军队镇压起义者的行动。起义者又几乎全是周围工业区的工人。他们找到了一个**能干的、头脑冷静的指挥者——俄国的流亡者米哈伊尔·巴枯宁**，后来他被俘了，现在被囚禁在匈牙利的蒙卡奇监牢里。人数众多的普鲁士军

队的干涉，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了。

在莱茵普鲁士，实际的战斗规模不大。所有的大城市都是被许多炮台所控制的堡垒，起义者只能进行一些小的战斗。一旦调集了足够数量的部队，武装反抗就终止了。

在普法尔茨和巴登则相反，起义者占领了一个富饶的省份和一个整个的邦。金钱、武器、士兵、军需品这里应有尽有。正规军的士兵们本身就参加了起义队伍；在巴登他们甚至是起义的先锋。萨克森和莱茵普鲁士的起义作了自我牺牲，为组织德国南部的运动赢得了时间。一省范围内的地方起义，还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有利的条件。巴黎有爆发革命的可能；匈牙利人已兵临维也纳城下；在德国中部各邦，不仅人民，连军队也都坚决支持起义，等到有适当机会就公开加入起义。可是运动既然被小资产阶级所控制，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遭到毁灭。小资产阶级的统治者，尤其是以布伦坦诺先生为首的巴登小资产阶级统治者，无论如何也忘不了他们篡夺"合法的"君主即大公[①]的地位和特权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他们坐在大臣的坐椅里深感内疚。能够希望这些懦夫有什么作为呢？他们不仅对起义放任自流，使之分散因而毫无结果，并且还竭力磨去运动的锋芒，阉割和摧毁运动。由于一批深谋远虑的政客即"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英雄们的热诚支持，他们做到了这一点；这些英雄们当真相信，他们让布伦坦诺之流的少数狡猾之徒牵着鼻子走的时候，是在"拯救祖国"。

至于军事方面，从没有见到过比原正规军尉官巴登总指挥济格尔指挥的军事行动更草率、更蠢笨的了。一切都杂乱无章，一切有利时机都放过了，一切宝贵的时刻都浪费在考虑一些庞大而不能实现

①莱奥波德。——编者注

的计划上。到最后，当能干的波兰人梅洛斯拉夫斯基担任指挥的时候，军队已经是组织涣散、迭遭败北、士气沮丧、给养恶劣，却面对着四倍于己的敌人。所以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在瓦格霍伊瑟尔进行战斗。这一仗虽未打胜但打得很英勇，接着实行了机智巧妙的退却，在拉施塔特城下进行了最后一次绝望的战斗他便辞职了。像在任何起义战争中一样，部队是由老练的士兵和新召入伍的士兵混合组成的，所以在这支部队中虽然有许多英雄事迹，但同时也有许多次士兵所不应有的、常常是不可理解的惊慌失措。但是，尽管有这种种不可避免的缺陷，这支军队至少有一点是可以对自己表示满意的，这就是：人们承认四倍的优势兵力还不足以把它击溃，10万正规军在对付2万起义者的战役中，在军事上对后者如此高度重视，就好像要同拿破仑的老近卫军作战一般。

起义在1849年5月爆发；7月中旬完全被镇压下去。第一次德国革命就此完结了。

[十九　起义的终结]

当德国的南部和西部举行公开起义的时候，当各邦政府费了十多个星期的时间——从德累斯顿的军事行动开始到拉施塔特投降——来扑灭第一次德国革命的这最后一团火焰的时候，国民议会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它的退场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我们已经谈到，法兰克福的这个崇高的机关处于狼狈不堪的境地，因为各邦政府对它的尊严进行放肆的攻击，因为它自己所创立的中央政权既软弱无能又怠惰得等同于背叛，因为拥护它的小资产阶级和追求更革命的最终目的的工人阶级纷纷起义。悲观和失望完全支配了它的议员们；事变立刻形成了如此明确而肯定的态势，以致在几天之内，这些博学的立法者关于他们有真正力量和势力的幻觉就完全破灭了。保守派在各邦政府的示意下，早已退出了这个除非向各个合法当局挑战，否则今后便不能够再存在下去的机关。慌乱的自由派认为事情已无可挽救，他们也抛弃了议员的职务。这些可敬的先生们成百地开了小差。议员最初有800—900人，但是这个数目急速地减少，以致法定人数只好规定为150人，而几天之后又改为100人。但是甚至这么一点人也很难召集起来，虽然全体民主派都还留在议会里。

剩下的议员应当遵循什么方针，这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只需公开而坚决地站在起义方面，从而给予起义以合法性所能赋予它的一切力量，他们自己也就立刻获得了一支实行自卫的军队。他们应该要

求中央政权立即制止一切军事行动，如果像可以预见到的那样，这个政权既不能也不愿这样做，那就立即废除它而代之以一个更有力量的政府。如果不能把起义部队调到法兰克福（起初，当各邦政府缺乏准备、还犹豫不决的时候，这一点并不难做到），那么可以立即把议会迁移到起义区域的中心地点去。如果在5月中或5月底以前迅速地、坚决地做到了这一切，起义和国民议会就还有取胜的机会。

但是谁也不能指望德国小市民阶级的代表会采取这样坚决的方针。这些抱负不凡的政治家一点也不能抛开他们的幻想。那些已经失去自己对议会的力量和不可侵犯性的倒霉信念的议员们，已经溜之大吉，要让留下的民主派放弃他们一年来所怀抱的对于权力和虚荣的梦想又很不容易。他们忠实于他们以前所采取的方针，百般回避坚决的行动，直到最后失去了一切胜利的机会，甚至一切光荣失败的机会。为了开展装模作样的无事忙的活动（这种活动的毫无效果和它的虚张声势，只是使人觉得既可怜又可笑），他们继续向毫不理睬他们的帝国摄政和公开同敌人勾结的大臣们发布一些低三下四的决议、文告和请求。而最后，当施特里高的议员、《新莱茵报》的编辑之一、整个议会中唯一的真正革命者**威廉·沃尔弗**宣称，如果他们说话算数，那就最好结束空谈，立刻宣布德国最大的叛徒帝国摄政不受法律保护时，这些议员先生们积蓄已久的义愤一下子全都爆发出来了，其猛烈的气势，连政府一再凌辱他们的时候也从没有看到过。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沃尔弗**的提议是圣保罗教堂①四壁之内说出的第一句通情达理的话。因为他所说的正是必须做的，而话又说得那么直截

①法兰克福国民议会1848年5月18日—1849年5月30日开会的会址。——编者注

了当，所以不能不使那班敏感的人感到受了侮辱。这些人只有在不坚决这一点上是坚决的，他们胆小怕事，而且下了永久不变的决心：什么都不做——这就是他们所应该做的事情。每一句像闪电一样拨开了蒙蔽他们的头脑而他们自己又有意加以保持的迷雾的话，每一个能把他们引出他们要尽可能在里面多待一些时候的迷宫的建议，每一种对于实际情况的清楚的见解，当然都是对这个自主的议会的尊严的冒犯。

法兰克福的可敬的议员先生们虽然发表了种种决议、呼吁、质问和宣言，但他们的地位已经不能再维持下去，此后不久他们就退却了，但不是退到起义地区去，因为采取这一步骤未免太大胆了，他们到了斯图加特，那里的符腾堡政府保持着观望的中立态度。在这里，他们终于废黜了帝国摄政，从自己人中间选举了一个五人摄政。这个摄政立刻通过了民军法，并按规定手续通告了德国各邦政府。它们，议会的真正敌人，被命令去征兵以保卫议会！于是便创造了——当然是在纸上——一支保卫国民议会的军队。师、旅、团、炮队，一切都被规定好和安排好了。所缺乏的只是实在的东西，因为这支军队当然从来没有出世。

还有最后一个方案呈现在国民议会面前。民主派民众，从全国各地派来代表团请求议会出面指挥，并催促它采取坚决的行动。人民知道符腾堡政府的真正意向，恳求国民议会强迫这个政府同各邻邦一道公开而积极地参加起义。但是白费气力，国民议会一迁到斯图加特，就完全听从符腾堡政府的摆布。议员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便压制人民中间的骚动。这样一来，他们便丧失了他们还可以保持的最后一点点影响。他们获得了应得的轻蔑；符腾堡政府在普鲁士和帝国摄政的逼迫下结束了这出民主的滑稽剧，在1849年6月18日封闭了议

会开会的大厅，命令摄政成员离开该邦。

于是他们前往巴登，去参加起义者的阵营，但现在他们在那里已经毫无用处了。没有一个人理睬他们。可是摄政仍然以有自主权的德国人民的名义在继续努力拯救祖国。它企图获得外国列强的承认，凡是愿意领取**护照**的人都一律发给。它不断发表宣言，派专员到符腾堡那些它曾经拒绝及时给予积极支援的地区去发动起义；这一切当然没有成功。现在我们手边有一篇报告原件，是这些专员之一律斯勒先生（厄尔斯的议员）寄给摄政的，它的内容很能说明问题。报告注明“1849年6月30日于斯图加特”。律斯勒先生在描述六位委员筹措现金毫无收获的奇遇之后，举了一大堆理由说明他为什么尚未到达指定的岗位，接着又就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和符腾堡之间可能发生的纷争及其可能引起的后果发表了很有分量的见解。但是，他详细地考察了这一切之后，得出结论说，再也没有任何指望了。其次，他提议建立由可靠人员组成的驿站式的机构以传递消息，并建立谍报系统以侦察符腾堡内阁的意向和军队的调动情形。这封信没有寄到收信人手里，因为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摄政”已完全转变为“外交部门”，也就是搬到瑞士去了。当可怜的律斯勒先生正在为一个第六等王国的可怕内阁的意向而绞尽脑汁的时候，10万普鲁士的、巴伐利亚的和黑森的士兵，已经在拉施塔特城下的最后一战中把全部问题解决了。

德国的议会就这样消失了，德国革命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作品也随之消失了。议会的召开是德国的确**曾发生过**革命的首要证据；这个议会一直存在到这第一次现代的德国革命完结之时。在资本家阶级的影响下由分裂涣散的、多半是刚刚从封建制度的愚昧中觉醒过来的农村居民选举出来的这个议会，其作用是把1820—1848年间

一切有名的大人物统统集中在政治舞台上,然后又把他们彻底葬送。这里集中了资产阶级自由派所有的知名人士。资产阶级期待出现奇迹,但是却为自己和自己的代表赢得了耻辱。工商业资本家阶级在德国遭受的失败,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加惨重。最初他们在德国各邦被打败,被击溃,被逐出官场,后来在德国的中央议会里遭到痛击,遭到侮辱和嘲笑。政治自由主义,即资产阶级的统治,不管是采取君主政体还是共和政体的形式,在德国永远不可能实现了。

德国议会在其存在的后期,使1848年3月以来领导官方反对派的那一帮人,那些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并部分地代表农民阶级的利益的民主派,蒙受永久的耻辱。这一阶级在1849年5月和6月,曾得到机会来表明它有办法在德国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我们已经看到它遭到了怎样的失败;这与其说是由于环境不利,不如说是由于它在革命爆发以来的一切紧急关头一贯畏缩不前;它遭到这种失败是由于它在政治上也同样目光短浅、畏首畏尾和动摇不定,这正是它的商业活动的特点。1849年5月,它由于这种行为已经失去了欧洲所有起义的真正战斗力量——工人阶级的信任。可是当时它还有取得胜利的机会。德国的议会在反动派和自由派退出以后,完全在它的掌握之中。农村居民也都赞助它。只要它认清形势,坚决地、勇敢地行动起来,各小邦三分之二的军队,普鲁士三分之一的军队,普鲁士后备军(预备队或民军)的大多数,都准备和它一致行动。但领导这一阶级的政客们,并不比追随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更有洞察力。他们甚至比自由派更糊涂,更迷恋于他们有意保持着的幻觉,更容易上当受骗,更缺乏正视事实的能力。他们的政治作用也降到了零度以下。但是由于事实上他们还没有实现他们那些陈腐的原则,所以在**十分**有利的环境下,他们本来还能够再活跃一个短暂的时期;但是,最后的

这一点希望也被**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剥夺了，正像他们的法国"纯民主派"伙伴们一样。

德国西南部起义的失败和德国议会的解散，结束了第一次德国革命的历史。最后，我们还需要看一下获得胜利的反革命联盟的成员们。这我们将在下一篇通讯来谈。[278]

1852年9月24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51年8月17日—1852年9月23日

载于1851年10月25和28日，11月6、7、12和28日，1852年2月27日，3月5、15、18和19日，4月9、17和24日，7月27日，8月19日，9月18日，10月2和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1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11卷翻译



卡·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279]



Die Revolution,

Eine Zeitschrift in zwanglosen Heften.

Herausgegeben von

J. Weydemeyer.

Erstes Heft

Der 18te Brumaire des Louis Napoleon

von

Karl Marx.

New-York.

Expedition: Deutsche Vereins-Buchhandlung von Schmidt und Helmich.

William-Street Nr. 191.

1852.

最先刊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

《革命。不定期刊物》第一期的扉页



1869年第二版序言

我的早逝的朋友**约瑟夫·魏德迈**[①]曾打算从1852年1月1日起在纽约出版一个政治周刊。他曾请求我给这个刊物写政变的历史。因此,我直到2月中旬为止每周都在为他撰写题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论文。这时,魏德迈原来的计划遭到了失败。作为变通办法,他在1852年春季开始出版名为《革命》的月刊,月刊第一期的内容就是我的《雾月十八日》。那时这一刊物已有数百份输送到德国,不过没有在真正的书籍市场上出售过。当我向一个行为极端激进的德国书商建议销售这种刊物时,他带着真正的道义上的恐惧拒绝了这种"不合时宜的要求"。

从上述事实中就可以看出,本书是在形势的直接逼迫下写成的,而且其中的历史材料只截止到(1852年)2月。现在把它再版发行,一方面是由于书籍市场上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由于我那些在德国的朋友们的催促。

在与我这部著作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论述同一问题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只有两部:**维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仑**》和**蒲鲁东**的《**政变**》[②]。

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主要发动者作了一些尖刻的和机智

①约·魏德迈在美国内战时期担任过圣路易斯区的军事指挥官。

②即蒲鲁东的《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编者注

的痛骂。事变本身在他笔下被描绘成了一个晴天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某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性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物而是写成巨人了。蒲鲁东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在他那里关于政变的历史构想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角所作的历史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编纂学家所犯的错误。相反，我则是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现在如果对本书加以修改，就会使它失掉自己的特色。因此，我只限于改正印错的字，并去掉那些现在已经不再能理解的暗示。

我这部著作的结束语："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280]顶上倒塌下来。"——这句话已经实现了。

沙尔腊斯上校在他论述1815年会战的著作①中，开始攻击对拿破仑的崇拜。从那时起，特别是在最近几年中，法国的出版物借助历史研究、批评、讽刺和诙谐等等武器彻底破除了关于拿破仑的奇谈。在法国境外，这种与传统的民众信仰的断然决裂，这个非同寻常的精神革命，很少有人注意，更不为人所理解。

最后，我希望，我这部著作对于清除那种特别是现今在德国流行的所谓**凯撒主义**的书生用语，将会有所帮助。在作这种肤浅的历史对比时，人们忘记了主要的一点，即在古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富有的自由民与贫穷的自由民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

①即让·巴·沙尔腊斯的《1815年滑铁卢会战史》。——编者注

的舞台台柱。人们忘记了**西斯蒙第**所说的一句名言：罗马的无产阶级依靠社会过活，现代社会则依靠无产阶级过活。[281]由于古代阶级斗争同现代阶级斗争在物质经济条件方面存在这样的根本区别，由这种斗争所产生的政治怪物之间的共同点也就不可能比坎特伯雷大主教与最高祭司撒母耳之间的共同点更多。

卡尔·马克思

1869年6月23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写于1869年6月23日

载于1869年7月在汉堡出版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2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6卷翻译

恩格斯写的1885年第三版序言

《雾月十八日》在初版问世33年后还需要印行新版，证明这部著作就是在今天也还丝毫没有失去自己的价值。

的确，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当时事变像晴天霹雳一样震惊了整个政治界，有的人出于道义的愤怒大声诅咒它，有的人把它看做是脱离革命险境的办法和对于革命误入迷途的惩罚，但是所有的人对它都只是感到惊异，而没有一个人理解它；紧接着这一事变之后，马克思立即写出一篇简练的讽刺作品，叙述了二月事变[4]以来法国历史的全部进程的内在联系，揭示了12月2日的奇迹[282]就是这种联系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而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对政变的主角除了给予其应得的蔑视以外，根本不需要采取别的态度。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高明，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实际。他对活生生的时事有这样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样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像马克思那样深知法国历史。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统一的等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它在大革命中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

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正在上升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不仅特别热衷于研究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时事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因此，各种事变从未使他感到意外。

此外还有另一个情况。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重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这个规律在这里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在这部著作中，他用这段历史检验了他的这个规律；即使已经过了33年，我们还是必须承认，这个检验获得了辉煌的成果。

弗·恩·

弗·恩格斯写于1885年

载于1885年在汉堡出版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3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1卷翻译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一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283]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比尔，1848—1851年的山岳党代替1793—1795年的山岳党[81]，侄子代替伯父。在使雾月十八日事变得以再版的种种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①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

①在1852年版中这一段是这样写的："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伟大的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卑劣的笑剧出现。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比尔，1848—1851年的山岳党代替1793—1795年的山岳党，伦敦的特别警察和十来个负债累累的尉官代替小军士[284]及其一桌元帅！白痴的雾月十八日代替天才的雾月十八日！在使雾月十八日事变得以再版的种种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第一次是法国站在破产的边缘，这一次是波拿巴自己站在债务监狱的边缘；当初是大国联盟站在边境，这一次是卢格和达拉什联盟在英国，金克尔和布伦坦诺联盟在美国；当初是爬过一座圣伯纳德山[285]，这一次是派一个中队宪兵越过汝拉山脉[286]；当初是不止获得一个马伦戈，这一次是应当得到圣安德烈大十字勋章[287]和丧失柏林《国民报》的尊敬。"——编者注

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自己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例如，路德换上了使徒保罗[288]的服装，1789—1814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而1848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拙劣地时而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就像一个刚学会一种新语言的人总是要把它翻译成本国语言一样；只有当他能够不必在心里把新语言翻译成本国语言，能够忘掉本国语言而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才算是运用自如。

在观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行动时，立即就会看出它们之间的显著差别。旧的法国革命时的英雄卡米耶·德穆兰、丹东、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拿破仑，同旧的法国革命时的党派和人民群众一样，都穿着罗马的服装，讲着罗马的语言来实现当代的任务，即解除桎梏和建立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前几个人打碎了封建制度的基础，割去了长在这个基础上的封建头脑；另一个人在法国内部创造了一些条件，从而才保证有可能发展自由竞争，经营分成小块的地产，利用解除了桎梏的国内的工业生产力，而他在法国境外则到处根据需要清除各种封建的形式，为的是要给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在欧洲大陆上创造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适当环境。但是，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连同复活的罗马古董——所有这些布鲁土斯们、格拉古们、普卜利科拉们、护民官们、元老们以及凯撒本人就都消失不见了。冷静务实的资产阶级社会把萨伊们、库辛们、鲁瓦耶-科拉尔们、本杰

明·贡斯当们和基佐们当做自己真正的翻译和代言人；它的真正统帅坐在营业所的办公桌后面，它的政治首领是肥头肥脑的路易十八。资产阶级社会完全埋头于财富的创造与和平竞争，竟忘记了古罗马的幽灵曾经守护过它的摇篮。但是，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需要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间战斗的。在罗马共和国的高度严格的传统中，资产阶级社会的斗士们找到了理想和艺术形式，找到了他们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狭隘内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自我欺骗。例如，在100年前，在另一个发展阶段上，克伦威尔和英国人民为了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借用过旧约全书中的语言、热情和幻想。当真正的目的已经达到，当英国社会的资产阶级改造已经实现时，洛克就排挤了哈巴谷[289]。

由此可见，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务，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

在1848—1851年间，只有旧革命的幽灵在游荡，从改穿了老巴伊的服装的戴黄手套的共和党人马拉斯特，到用拿破仑的死人铁面具把自己的鄙陋可厌的面貌掩盖起来的冒险家①。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亡的时代；而为了不致对倒退产生错觉，于是就使那些早已成为古董的旧的日期、旧的纪年、旧的名称、旧的敕令以及好像早已腐朽的旧宪兵复活起来。一个民族的感觉，就好像贝德勒姆②那里的一个

①路易·波拿巴。——编者注

②伦敦的疯人院。——编者注

癫狂的英国人的感觉一样，他设想自己生活在古代法老的时代，每天悲痛地埋怨繁重的劳役，因为他要在地下监狱般的埃塞俄比亚矿场挖掘金矿，头顶一盏暗淡的油灯，背后站着手持长鞭的奴隶监工，洞口站着一群乱哄哄的野蛮士兵，他们既不了解矿山苦役犯，相互之间也不了解，因为大家讲着不同的语言。疯癫的英国人叹道："我这个生来自由的不列颠人被迫忍受这一切，为的是要替古代法老找金子。"法兰西民族则叹道："为的是要替波拿巴家族还债。"这个英国人在头脑清醒的时候总不能撇开找金子这种固定观念。而法国人在从事革命的时候总不能摆脱对拿破仑的追念，12月10日的选举[290]就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害怕革命的危险，他们曾怀念埃及的肉锅[291]，1851年十二月二日事件便是对于这一点的回答。他们所得到的不只是一幅老拿破仑的漫画，他们得到的是漫画化的老拿破仑本身，是在19世纪中叶所应当出现的老拿破仑。

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19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①，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

二月革命[4]对于旧社会是一个突然袭击，是一个**意外事件**，而人民则把这个突然的**打击**宣布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壮举，认为它开辟了一个新纪元。12月2日，二月革命被一个狡猾的赌徒的骗术所葬送，结果，被消灭的不再是君主制度本身，而是一个世纪以来的斗争

①《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8章第22节。——编者注

从君主制度方面夺取来的自由主义的让步。结果，不是**社会**本身获得了新的内容，而只是**国家**回到了最古的形态，回到了宝剑和袈裟的极端原始的统治。1851年12月的轻率行为报复了1848年2月的勇敢打击。来得容易去得快。然而这两个事变之间的时间并不是白过了的。在1848—1851年期间，法国社会总算获得了教训和经验，而且是以革命的，因而是速成的方式获得的。这些教训和经验在正常的即所谓按部就班的发展进程中，本来应该在二月革命以前预先获得，如果这次革命不只是一种表面的动荡的话。看起来仿佛社会现在退到它的出发点后面去了，实际上社会首先要为自己创造革命所必需的出发点，创造唯一能使现代革命成为真正的革命的形势、关系和条件。

资产阶级革命，例如18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彩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学会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长期沉溺于消沉状态。相反，无产阶级革命，例如19世纪的革命，则经常自我批判，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它把敌人打倒在地，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汲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前面挺立起来；它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局势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292]

但是，每个平庸的观察家，即使他没有逐步研究过法国的发展

进程，也不免要预感到，这次革命必将遭受前所未闻的屈辱。只要听一听民主派先生们当时那种自鸣得意的胜利叫嚣就够了，这些先生们曾以此互相祝贺，以为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293]一定会带来良好的结果。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在他们头脑中成了一种固定观念，成了一个教条，正如在锡利亚[176]信徒脑子里基督再临和千年王国到来的那个日子一样。弱者总是靠相信奇迹求得解救，以为只要他能在自己的想象中驱除敌人就算打败了敌人；他总是对自己的未来，对自己打算建树，但现在还言之过早的功绩信口吹嘘，因而失去对现实的一切感觉。这些英雄是想以彼此表示同情和结成团伙，来驳倒关于他们显然庸碌无能的意见。他们收拾起自己的家私，预先拿起自己的桂冠，准备把他们的有名无实的共和国(这些共和国的政府人员已由他们毫不挑剔地在暗中确定了)拿到交易所里去贴现。12月2日对他们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人民在意气消沉的时代总是乐意用大喊大叫来抑制内心的不安，这一次他们也许已经确信：鹅的叫声能够拯救卡皮托利诺[294]的那种时代已经过去了。

宪法、国民议会、保皇党[295]、蓝色的和红色的共和党人[296]、非洲的英雄[297]、讲坛的雷鸣声、报刊的闪电、整个著作界、政治声望和学者的名誉、民法和刑法、自由、平等、博爱以及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所有这一切，都好像一片幻影在一个人的咒文面前消失不见了，而这个人连他的敌人也不认为是一个魔法师。普选权还保持了一刹那，好像仅仅是为了在全世界瞩目下亲笔写下自己的遗嘱，并以人民自己的名义宣布："一切现存的东西，都一定要死亡。"①

像法国人那样说他们的民族遭受了偷袭，那是不够的。一个民

---

①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3场《书斋》。——编者注

族和一个妇女一样，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让随便一个冒险者能加以奸污，也是不可宽恕的。这样的言谈并没有揭开这个谜，而只是把它换了一个说法罢了。还应当说明，为什么一个有3 600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偷袭而毫无抵抗地做了俘虏。

现在我们来把法国革命从1848年2月24日到1851年12月所经过的阶段大致总结一下。

总共有以下三个明显的主要时期：**二月时期**；**共和国建立时期，或制宪国民议会时期**（从1848年5月4日到1849年5月28日）；**立宪共和国时期，或立法国民议会时期**（从1849年5月28日到1851年12月2日）。

第一个时期，从1848年2月24日到5月4日，即从路易-菲力浦被推翻起到制宪议会开幕之日止（这是本来意义上的**二月时期**），这个时期可以称为革命的**序幕**。这个时期的性质，正式表现于这一时期仓促建立的政府自己宣布自己是**临时性的**。在这个时期所采取、试行和发表的一切，都像政府一样，一概宣布自己只是**临时性的**。无论什么人和什么机构，都不敢承认自己有权长期存在，有权真正有所作为。所有一切准备了或决定了革命的分子——王朝反对派[65]、共和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小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派工人，都在二月**政府**中临时取得了位置。

情况只能是这样。二月事变原先的目标是选举改革，以求扩大有产阶级内部享有政治特权者的范围和推翻金融贵族独占的统治。但是，当事变已演进到引起实际冲突，当人民已投入街垒战，当国民自卫军采取消极的态度，军队不进行认真抵抗而王室已经逃走的时候，成立共和国似乎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每个政党都按自己的观点去解释共和国。手持武器夺得了共和国的无产阶级，在共和国上面

盖上了自己的印记，并把它宣布为**社会共和国**。这样就表露出了现代革命的总的内容，这个内容和在当时的情况与条件下、在群众已达到的教育水平上用现成材料所能立刻直接实现的一切都是极为矛盾的。另一方面，其余一切曾经促成二月革命的分子，因获得了政府中的绝大多数位置而心满意足了。正因为如此，任何其他时期都没有当时那样错综复杂：浮夸的空话同实际上的犹豫不决和束手无策相混杂，热烈谋求革新的势力同墨守成规的顽固积习相混杂，整个社会表面上的和谐同社会各个成分的严重的彼此背离相混杂。当巴黎无产阶级还陶醉于为它开辟的伟大前景并且认真地埋头讨论各种社会问题时，旧的社会力量却在集结、联合、醒悟，并获得了国内群众的意外支持，即获得了那些在七月王朝这个障碍物被推翻后立刻跃上政治舞台的农民和小资产者的意外支持。

第二个时期，从1848年5月4日到1849年5月底，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创立、奠定的时期**。紧跟在二月事变之后，不仅王朝反对派被共和派弄得惊慌失措，共和派被社会主义者弄得惊慌失措，而且全法国都被巴黎弄得惊慌失措了。由国民选出而于1848年5月4日开幕的国民议会，是代表国民的。这个议会是对二月事变的奢望所提出的活的抗议，并且要把革命的结果降低到资产阶级的水平。巴黎无产阶级一下子就看出了这个国民议会的性质，所以他们在国民议会开幕后不几天，即在5月15日，就企图用强力停止其存在，把它解散，将国民中起反动作用的思潮所借以威胁他们的这个机体重新分解为各个构成部分，但是这个企图没有成功。大家知道，五月十五日事变[79]的结果，不过是使布朗基及其同道者，即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领袖们，在我们所考察的整个周期中退出社会舞台罢了。

继路易-菲力浦的**资产阶级君主制**之后，只能有**资产阶级共和**

国，就是说，以前是由资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在国王的招牌下进行统治，今后将由全体资产阶级借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巴黎无产阶级所提出的要求，是必须终止的狂妄空想。对制宪国民议会的这个声明，巴黎无产阶级以**六月起义**作了回答，这是欧洲各国内战史上最大的一次事变。获得胜利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方面的有金融贵族、工业资产阶级、中间等级、小资产者、军队、组成别动队[71]的流氓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牧师和农村居民。而站在巴黎无产阶级方面的却只有它自己。资产阶级共和国胜利以后，起义者被屠杀的有3 000多人，未经审判就被放逐的有15 000人。无产阶级从这次失败后，就退到革命舞台的**后台**去了。每当运动好像又重新开始时，无产阶级就企图再向前推进，可是劲头越来越弱，成效也越来越小。每当无产阶级上面的某个社会阶层进入革命动荡时，无产阶级就跟它缔结同盟，从而分享了各个政党依次遭受到的全部失败。但是，这些相继而来的打击，随着力量分摊到全部社会的整个表面，也越来越弱了。无产阶级在议会和报刊方面的一些比较有影响的领袖，相继被捕判罪，代替他们挂帅的是些愈益模棱两可的人物。无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醉心于**教条的实验**，醉心于**成立交换银行和工人团体，换句话说**，醉心于**这样一种运动，即不去利用旧世界自身所具有的一切强大手段来推翻旧世界，却企图躲在社会背后，用私人的办法，在自身的有限的生存条件的范围内实现自身的解救，因此必然是要失败的。**当六月事变中无产阶级与之斗争的**一切阶级**还没有在无产阶级身边倒下的时候，无产阶级大概既不能使本身恢复自己原有的革命的伟大，也不能从重新缔结的联盟中获得新的力量。但是，无产阶级至少是带着进行过世界历史性的伟大斗争的光荣而失败的；不仅法国，而且整个欧洲都被六月的地震所惊动，而各个上层阶级后来的失败的

代价却如此便宜，以致得胜的党派只有公然无耻地加以夸张，才可以把这些失败说成是事变。同时，失败的政党离开无产阶级政党越远，这些失败就越是可耻。

六月起义者的失败，固然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奠基和建立准备和扫清了基地，但同时它也表明，欧洲的问题并不是争论“共和国还是君主国”的问题，而是别的问题。它揭示出，**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里是表示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它表明，在那些阶级构成发达、具备现代生产条件、拥有通过百年来的努力而使一切传统观念都融于其中的精神意识的旧文明国家里，**共和国一般只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变革形式**，而不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保守的存在形式**，例如，像北美合众国那样，在那里，虽然已有阶级存在，但它们还没有固定下来，它们在不断的运动中不断变换自己的组成部分，并且彼此互换着自己的组成部分；在那里，现代的生产资料不仅不和停滞的人口过剩现象同时发生，反而弥补了头脑和人手方面的相对缺乏；最后，在那里，应该占有新世界的那种狂热而有活力的物质生产运动，没有给予人们时间或机会来结束旧的幽灵世界。

在六月的日子里，一切阶级和党派都团结成一个**维护秩序的党**来反对无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党**。它们从“**社会之敌**”手里“救出了”社会。它们选择了旧社会的格言“**财产、家庭、宗教、秩序**”作为自己的军队的口令，并用“在此标记下你必胜！”[298]这句话激励反革命十字军征讨。从这时起，许多曾经团结在这个旗号下反对过六月起义者的政党中的任何政党只要企图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守住革命战场，它就要被“财产、家庭、宗教、秩序！”这一口号所战胜。每当社会的统治者集团范围缩小时，每当比较狭小的利益压倒比较广大的利益时，社会就得救了。任何最单纯的资产阶级

财政改革的要求、任何最平凡的自由主义的要求、任何最表面的共和主义的要求、任何最浅薄的民主主义的要求，都同时被当做“侵害社会的行为”加以惩罚，被当做“社会主义”加以指责。最后，连那些“宗教和秩序”的最高祭司自己也被踢出他们的皮蒂娅的座椅，半夜里被拖下床，关进囚车，投入监狱或流放；他们的神殿被拆毁，他们的嘴被封住，他们的笔被折断，他们的法律被撕毁，这一切都是为了宗教、财产、家庭和秩序。一群群酩酊大醉的士兵对那些站在自己阳台上的资产者即秩序的狂信者开枪射击，亵渎他们的家庭圣地，炮击他们的房屋以取乐，这一切都是为了财产、家庭、宗教和秩序。最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败类组成**维护秩序的神圣队伍**，而主人公克拉普林斯基[①]就以“**社会救主**”的资格进入了土伊勒里宫[②]。

①暗指路易·波拿巴。——编者注

②巴黎的一座皇宫。——编者注

二

现在让我们再接着谈下去。

六月事变以后的**制宪国民议会**的历史，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统治和瓦解的历史**，这个派别是以三色旗共和党人、纯粹的共和党人、政治的共和党人、形式主义的共和党人等等称呼闻名的。

这个派别在路易-菲力浦的资产阶级君主制度下是**官方的**共和主义**反对派**，因而是当时政界中一个公认的构成部分。议院中有它的代表，在报界它也有相当大的势力。它在巴黎的机关报《国民报》，和《辩论日报》一样，算是受人尊敬的。它的性质和它在立宪君主制度下的这个地位也是相称的。它并不是一个因有某些重大的共同利益而紧密团结、因有特殊生产条件而独树一帜的资产阶级集团。它是由一些抱有共和主义思想的资产者、作家、律师、军官和官吏组成的一个派系，这个派系之所以有影响，是由于全国对路易-菲力浦个人的反感，由于对旧的共和国的怀念，由于一群幻想家的共和主义信仰，而主要是由于**法国人的民族主义**。这个派别对于维也纳条约[82]和同英国联盟，始终怀有这种民族主义的仇恨。在路易-菲力浦的统治下，《国民报》的很大一部分拥护者都是因为它鼓吹这种隐蔽的帝制思想而获得的，也正因为如此，后来在共和国时期，这种帝制思想就能以路易·波拿巴为代表，作为一个置人于死地的竞争者来同《国民报》本身对立。《国民报》也和其余一切资产阶级反对派一样，曾经对金融贵

族作过斗争。反对预算案的论争在当时的法国是同反对金融贵族的斗争完全相吻合的，这个论争既然能博得非常便宜的声望，并吸取非常丰富的材料来写清教徒式的社论，因而是不能不大受利用的。工业资产阶级感激《国民报》，是因为它奴颜婢膝地拥护法国的保护关税制度，而它维护这个制度又多半是出于民族的动机，而不是出于国民经济学的动机。整个资产阶级感激它，则是因为它恶毒地诽谤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此外，《国民报》派是**纯粹的共和派**，就是说，它要求把资产阶级统治的形式由君主国改为共和国，首先是要求保证自己能在这个统治中占优势。对于这一变革的条件，它的认识极其模糊。但有一点它看得十分清楚，而且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末期的改革运动的宴会[63]上，这一点已很明显地表露出来了，这就是它在民主派小资产者中间，特别是在革命无产阶级中间是不受欢迎的。这些纯粹的共和党人，真是名副其实的纯粹的共和党人，本来已经准备好在开始时满足于奥尔良公爵夫人摄政[299]，恰好这时爆发了二月革命，因而他们那些最有名的代表人物都在临时政府里获得了位置。他们当然是一开始就受到资产阶级的信任并在制宪国民议会中占了多数。临时政府中的**社会主义**分子马上被排挤出国民议会开幕后成立的执行委员会[78]；《国民报》派利用六月起义的爆发解散了**执行委员会**，从而清除了它的最切近的对手，即**小资产阶级的**或**民主主义的共和党人**(赖德律-洛兰等人)。卡芬雅克，这个指挥了六月战斗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将军，获得了一种独裁的权力，代替了执行委员会。《国民报》的前任总编辑马拉斯特，成了制宪国民议会的常任议长；政府各部部长以及其他一切重要职位，都由纯粹的共和党人占据了。

这样，实际情况超过了早就自命为七月王朝[58]的合法继承人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理想。但是，这个派别取得统治权并不像它在路易-菲

力浦时期所幻想的那样，是通过资产阶级举行反对国王的自由主义叛乱，而是由于无产阶级对资本举行了被霰弹镇压下去的起义。资产阶级共和派认为**最革命的**事件，实际上却是**最反革命的**事件。果实落到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怀里，但它不是从生命树上落下来的，而是从知善恶树上落下来的。

资产阶级共和派独占的**统治**，只是从1848年6月24日起存在到12月10日止。这种统治的结果就是**拟定共和主义宪法**和**宣布巴黎戒严**。

新的**宪法**实质上不过是1830年宪章[300]的共和主义化的版本。七月王朝的过高的选举资格限制，甚至把资产阶级的一大部分人也排挤在政治统治之外，这是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存在不相容的。二月革命立刻取消了这种选举资格限制而宣布了直接的普遍的选举权。资产阶级共和派无法挽回这一事件。他们只得补充了一个限制条款，规定选民必须是在选区居住满六个月的。旧有的行政、市政、司法和军队等等组织，仍然原封不动，宪法对其所作的变更，只涉及目录而没有涉及内容，只涉及名称而没有涉及事物。

1848年各种自由的必然总汇，人身、新闻出版、言论、结社、集会、教育和宗教等自由，都穿上宪法制服而成为不可侵犯的了。这些自由中的每一种都被宣布为法国公民的**绝对**权利，然而总是加上一个附带条件，说明它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制时才是无限制的，而这些法律正是要使各种个人自由彼此之间以及同公共安全协调起来。例如：“公民有权成立团体，有权和平地、非武装地集会，有权进行请愿并且通过报刊或用其他任何方法发表意见。**对于这些权利的享受，除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限制外，不受其他限制。**”（法国宪法第2章第8条）“教育是自由的。教育的

自由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并在国家的最高监督下**享用之**。"(同上,第9条)"每一公民的住所是不可侵犯的,**除非**按照法定手续办事。"(第1章第3条)如此等等。所以,宪法经常提到未来的**基本**法律;这些基本法律应当详细地解释这些附带条件并且调整这些无限制的自由权利的享用,使它们既不致互相抵触,也不致同公共安全相抵触。后来,这些基本法律由秩序之友制定出来了,所有这些自由都得到调整,结果,资产阶级可以不受其他阶级的同等权利的任何妨碍而享受这些自由。至于资产阶级完全禁止"他人"享受这些自由,或是允许"他人"在某些条件(这些条件都是警察的陷阱)下享受这些自由,那么这都是仅仅为了保证"**公共安全**",也就是为了保证资产阶级的安全,宪法就是这样写的。所以,后来两方面都有充分权利援引宪法:一方面是废除了所有这些自由的秩序之友,另一方面是要求恢复所有这些自由的民主党人。宪法的每一条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所以,当自由这个**名字**还备受尊重,而只是——当然是通过合法途径——对它的真正实现设下了种种障碍时,不管这种自由在**日常**现实中的存在怎样被彻底消灭,它在宪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无损、不可侵犯的。

然而,用这么巧妙的方法使之不可侵犯的这个宪法,如同阿基里斯一样,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只是这个弱点不是在脚踵上,而是在头脑上,或者不如说,是在两个头脑(在这里宪法误入了迷途)上:一个是**立法议会**,另一个是**总统**。只要把宪法浏览一遍,就可以看出:只有那些确定总统对立法议会的关系的条文,才是绝对的、肯定的、没有矛盾的、不容丝毫曲解的。要知道,这里所谈的问题,是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可靠地位。宪法第45—70条规定,国民议会可以用合

乎宪法的办法排除总统，而总统要排除国民议会却只能用违背宪法的办法，即只有取消宪法本身。可见，这里宪法本身是在号召以暴力来消灭自己。宪法不仅像1830年的宪章那样尊崇分权制，而且把这种分权制扩大到矛盾重重的地步。基佐曾经把立法权和行政权在议会内的争吵称为**宪法的权力的赌博**，在1848年的宪法中，这种赌博一直是孤注一掷的。一方面是由普选产生并享有连选连任权的750名人民代表构成一个不受监督、不可解散、不可分割的国民议会，它拥有无限的立法权力，最终决定宣战、媾和及商约等问题，独揽大赦权，因自己不间断地召集会议而经常站在政治舞台最前面。另一方面是具有王权的一切特性的总统，他有权不经国民议会而任免自己的内阁阁员，他掌握行政权的一切手段，可以分封一切官职，从而在法国操纵着至少150万人的命运，因为有这么多的人在物质生活上依靠于50万各级官吏和各级军官。他统率一切武装力量。他享有赦免个别罪犯、解散国民自卫军以及——经国务会议同意——罢免由公民自己选出的省委员会、县委员会、市镇委员会的特权。同外国缔结条约时，他具有倡议和领导的作用。国民议会永远留在舞台上，是公众日常批评的对象，而总统却在极乐世界[301]过着隐居的生活，不过他眼前和心里老是有宪法第45条在提醒他："兄弟，要准备牺牲！"[302]你的权力在你当选的第四年，在美丽的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就要完结了！那时你的荣华就要完蛋了，这出戏是不会再演的，如果你负有债务，你就及时用宪法规定给你的60万法郎的薪俸一律偿清，不然你就不免要在美丽的5月的第二个星期一进入克利希！①这样，宪法就把实际权力授给了总统，而力求为国民议会保证道义上的权力。

①1826—1867年巴黎的债务监狱。——编者注

可是，不用说，法律条文不可能创造道义上的权力，宪法在这方面也是自己否定自己，因为它规定总统由所有的法国人直接投票选举。全法国的选票是分散在750个国民议会议员之间，可是在这里选票就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每一单个人民代表不过是某个政党、某个城市、某个桥头堡的代表，甚至只是表示必须选出一个人来凑足750个人民代表，人们并不去特别注意事情本身和被选举者本人，可是总统是由全国人民选出的，选举总统是行使主权的人民每四年运用一次的王牌。民选的国民议会和国民只有形而上学的联系，而民选的总统却和国民发生个人联系。国民议会的确通过它的各个代表反映着国民精神的多种多样的方面，而总统却是国民精神的化身。和国民议会不同，总统是一种神权的体现者，他是人民恩赐的统治者。

海洋女神西蒂斯曾经预言阿基里斯要在盛年夭折。像阿基里斯一样有个致命弱点的宪法，也像阿基里斯一样预感到它命该早死。根本用不着西蒂斯离开海洋向制宪的纯粹的共和派泄露这个秘密，这些共和派只要从自己的理想共和国的高空云层间俯瞰一下罪孽的尘世，就可以看到，他们越是接近于完成他们那个伟大的立法艺术创作，保皇派、波拿巴派、民主派和共产主义者的傲慢自负以及他们自己的不孚众望，也就与日俱增。他们力图用立宪的狡猾手腕，用宪法第111条来躲过厄运，根据这条规定，任何**修改宪法**的提案都必须经过每次相距一个月的三次讨论，至少必须由四分之三的票数通过，而且参加表决的至少必须有500个国民议会议员。可是这只是为了在他们将来成为议会少数派时（他们现在已经预感到这一点）继续行使权力的一种无力的尝试，现在当他们还在议会中占多数并且握有一切政府权力手段时，这种权力就已经一天天地从他们的软弱的手中滑出去了。

最后，在一个特别滑稽的条文中，宪法把自己托付给“全体法国人民和每一个法国人的警惕性和爱国心”，而在前面的另一条文中，它已经把有“警惕性”和“爱国心”的法国人托付给它专门发明出来的特别最高法庭(“haute cour”)所实行的温柔的刑事监护了。

1848年的宪法就是这样。它在1851年12月2日不是被人头撞倒，而只是被一顶帽子碰倒了，诚然，这顶帽子是三角拿破仑帽。

当资产阶级共和派在国民议会内忙于构思、讨论和表决这个宪法时，卡芬雅克却在国民议会外把**巴黎**控制在**戒严状态**中。巴黎戒严是处于分娩共和国的产前阵痛中的制宪议会的助产婆。如果说后来宪法被刺刀葬送了，那么不要忘记，当它还在母胎中时，刺刀，而且是对准人民的刺刀就保护过它，而且它是在刺刀帮助下出世的。“正直的共和派”的先辈们曾经拿着他们的象征即三色旗走遍了全欧洲。正直的共和派自己也作出了一项发明，这项发明自己给自己开拓了通向整个大陆的道路，但是它又怀着永不熄灭的爱回到法国，直到它终于在法国的半数的省里取得公民权为止。这项发明就是**戒严**。这是一项卓越的发明，每当法国革命进程处于危急关头，它就要被周期地加以运用。但是，既然兵营和露营这样周期地重重压在法国社会头上，要压制这个社会的意识并制服这个社会；既然马刀和毛瑟枪周期地受命进行审判和管理，进行监护和检查，执行警察和更夫职务；既然胡子和军服周期地被宣布为社会的最高智慧和指导者，那么兵营和露营、马刀和毛瑟枪、胡子和军服又怎么能不终于得出一个结论：最好是宣布自己的统治是最高的统治，并使资产阶级社会根本不必关心自治问题，从而一劳永逸地拯救社会！兵营和露营、马刀和毛瑟枪、胡子和军服必然要产生这种想法，尤其是因为它们在这种场合下可以希望自己所建树的更高的功劳得到更多的现金报酬，而当它们按

某一派资产阶级的命令实行周期戒严和暂时拯救社会的时候，它们除了几个人的死伤和资产者的一些假笑之外，是很少获得实际利益的。为什么军方不可以最终为自己的利益搞一次对自己有好处的戒严，同时把资产者的交易所也围攻一下呢？而且还不应忘记（我们顺便提一提），**贝尔纳上校**，即在卡芬雅克时期未经审判就把15 000名起义者放逐的那位军事委员会主席，现在又是巴黎各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了。

如果说正直的、纯粹的共和派宣布巴黎戒严，从而创设了后来1851年12月2日的近卫军[303]所赖以成长的苗床，那么同时属于他们的还有另一种功绩：在路易-菲力浦时期他们还点燃民族情感，而现在，当他们掌握了全国的力量的时候，他们却向国外列强跪拜，不去解放意大利，反而让奥地利人和那不勒斯人再一次来奴役意大利。[88]路易·波拿巴在1848年12月10日当选为总统，结束了卡芬雅克的独裁和制宪议会。

宪法第44条说："曾经丧失过法国公民资格的人不能担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不只丧失过法国公民资格，不只当过英国特别警察[284]，而且是一个已经归化了的瑞士人[304]。

关于12月10日选举的意义，我在另一个地方已经详细谈过①，这里就不再谈了。这里只须指出，12月10日的选举是曾经不得不支付二月革命的费用的**农民反对**国内其他各个阶级的**表现**，是**农村反对城市的表现**。这次选举得到军队方面的巨大同情，因为军队从《国民

①见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第2章《1849年6月13日》（本卷第106—137页）。——编者注

报》派共和党人那里既没有取得荣誉，也没有领到附加军饷；这次选举还受到大资产阶级方面的巨大同情，大资产阶级欢迎波拿巴是把他作为恢复君主制度的一个跳板；选举也受到无产者和小资产者的巨大同情，他们欢迎波拿巴是把他作为对卡芬雅克的一种惩罚。下边我还要更详细地谈谈农民对法国革命的态度。

从1848年12月20日到1849年5月制宪议会解散这个时期，包括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灭亡的历史。资产阶级共和派为资产阶级建立了共和国，把革命无产阶级赶下台，一时堵住了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的嘴，此后自己也就被资产阶级群众所排斥，这批资产阶级群众有权利把共和国据为**自己的财产**。可是这批资产阶级群众是**保皇派**，其中一部分，即大土地所有者，曾经在**复辟**时期居于统治地位，因而是**正统派**；另一部分，即金融贵族和大工业家，曾经在七月王朝时期居于统治地位，因而是**奥尔良派**。军队、大学、教会、律师界、学院和报界的显要人物，都分属于上述两派，虽然所占比例各不相同。这两部分资产阶级都把这个既不叫做**波旁**，也不叫做**奥尔良**，而是叫做**资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当做它们能够**共同**进行统治的国家形式。六月起义已经把他们联合成"秩序党"[90]，现在首先应该把还在国民议会中占有席位的一帮资产阶级共和派排斥出去。这些纯粹的共和派曾经极其残暴地滥用武力对付人民，而现在，当需要捍卫他们自己的共和主义和自己的立法权以对抗行政权和保皇党人时，他们却极其怯懦地、畏缩地、沮丧地、软弱无力地放弃了斗争。我用不着在这里叙述他们解体的可耻历史。他们不是灭亡了，而是消亡了。他们已经最终演完了自己的角色。在往后的时期中，不论在议会内或议会外，他们都仅仅表现为对过去的回忆，只要涉及到共和国的名称，只要革命冲突有下降到最低水平的危险，这些回忆便又复活起来。顺便指出，把自己的名

称交给这个派别的《国民报》，在后来一个时期就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去了。①

在结束这一时期之前，我们还应该回顾一下两种力量，这两种力量从1848年12月20日起到制宪议会结束时止是结为连理的，而在1851年12月2日那天，其中的一种力量消灭了另一种力量。我们所指的一方是路易·波拿巴，另一方是联合的保皇党，即秩序党，大资产阶级的党。波拿巴就任总统后立即组织了以奥迪隆·巴罗为首（请注意，是以议会资产阶级的最自由主义的一派的老领袖为首）的秩序党内阁。巴罗先生终于获得了他1830年以来朝思暮想的内阁职位，并且是内阁总理的职位。然而这个位置并非像他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所幻想的那样，是以议会反对派的最先进领袖的身份得到的，而是以他的一切死敌即耶稣会和正统派的同盟者的身份得到的，而且他的任务就是把议会送进坟墓。他终于迎娶了新娘，然而只是在新娘失身以后才娶回家的。波拿巴本人好像完全退隐了，代他行动的是秩序党。

在内阁第一次会议上就决定派远征军去罗马，并且商定要瞒着国民议会来安排这件事，而经费却要假造口实向国民议会索取。这样，内阁就开始以欺骗国民议会和暗中勾结外国专制势力的办法来对付革命的罗马共和国了。波拿巴也用同样的方法和同样的手段准

①在1852年版中这一段之后还有如下一段话："这样，法兰西共和国创立或奠定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1848年5月4日—6月24日，在二月事变中联合起来的所有阶级和附属阶级在资产阶级共和派的领导下反对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一败涂地；1848年6月25日—1848年12月10日，资产阶级共和派当政，制定宪法，巴黎戒严，卡芬雅克专政；1848年12月20日—1849年5月底，波拿巴和秩序党反对共和派制宪议会，共和派制宪议会失败，资产阶级共和派覆灭。"——编者注

备了反对保皇党立法议会及其立宪共和国的十二月二日政变。不要忘记，在1848年12月20日组成波拿巴内阁的那个政党，又是1851年12月2日的立法国民议会中的多数。

8月间制宪议会曾经决定，在制定并公布一套补充宪法的基本法律以前，它不解散。1849年1月6日，秩序党通过议员拉托建议议会不要去搞什么基本法律，最好是通过一项关于议会**自行解散**的决议。这时，不仅以奥迪隆·巴罗先生为首的内阁，而且国民议会中的全体保皇党议员，都以命令口吻对国民议会说：为了恢复信用，为了巩固秩序，为了终止不确定的暂时状态而建立完全确定的状态，必须解散国民议会；议会妨碍新政府进行有效的工作，它只是由于执迷不悟才企图延长自己的生命；它已经使全国感到厌恶了。波拿巴把这一切攻击立法权的说法都记在心里，背得烂熟，并在1851年12月2日向议会保皇派证明，他确实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他把他们自己的口号拿来反对他们。

巴罗内阁和秩序党往前更进了一步。他们在全法国掀起了**向国民议会请愿的运动**，客客气气地请求国民议会隐退。这样，他们就把无组织的人民群众引入反对国民议会、反对依照宪法组织起来的民意表现的斗争。他们教会波拿巴从诉诸议会转而诉诸人民。1849年1月29日那天，制宪议会终于不得不解决关于自行解散的问题了。这一天，军队占据了国民议会举行会议的场所；总揽国民自卫军和正规军指挥大权的秩序党将军尚加尔涅，就像是处于临战状态那样在巴黎举行了大规模的阅兵，而联合起来的保皇党人威胁制宪议会说，如果它不表示顺从，就将使用暴力。国民议会果然表示愿意顺从，但商定再苟延一个短短的时期。1月29日不就是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吗？不过这次是由保皇党人协同波拿巴反对共和派国民议会罢了。保

皇党老爷们没有看到或是不愿意看到，波拿巴利用1849年1月29日事变，为的是让一部分军队在土伊勒里宫前受他检阅；他贪婪地抓住这个公然诉诸武力来反对议会权力的初次尝试，为的是提醒大家想起卡利古拉[305]。他们当然只看见了他们的尚加尔涅。

特别推动秩序党使用暴力去缩短制宪议会生命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些补充宪法的**基本**法律——教育法、宗教法等等。联合的保皇党人认为极其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制定这些法律，而不是让那些疑虑重重的共和党人去制定。可是，在这些基本法律中，还有一个关于共和国总统的责任的法律。1851年立法议会正从事于制定这个法律，波拿巴就以12月2日的政变防止了这一政变。联合的保皇党人在1851年冬季议会行动时期，是多么希望有一个现成的总统责任法，并且是由疑虑重重的、敌对的共和派议会制成的总统责任法啊！

在制宪议会于1849年1月29日自己毁坏了自己最后的武器以后，巴罗内阁和秩序之友便将它置于死地。他们不放过任何机会来贬低它，强迫这个软弱无力的和对自己绝望的议会通过一些使它失去最后一点社会尊敬的法律。波拿巴沉溺于自己的固定的拿破仑观念①，竟然肆无忌惮地公开利用对议会势力的这种贬低。例如，当国民议会1849年5月8日因乌迪诺将军占领奇维塔韦基亚而通过谴责内阁议案，并命令罗马远征军回到它所谓的目标时，当天晚上波拿巴就在《通报》上发表了致乌迪诺的一封信，祝贺这位将军建树了英雄的功绩，并且和那些卖弄笔墨的议员相反，假装成军队的宽大为怀的庇护者。保皇党人对此加以讥笑。他们认为他不过是个笨蛋。最后，当制宪议会议长马拉斯特偶尔担忧国民议会的安全，根据宪法责令一

①暗指路易·波拿巴在英国写的《拿破仑观念》一书。——编者注

个上校率领所部开来保护国民议会时，那个上校却以军纪为借口拒绝调动，并建议马拉斯特去跟尚加尔涅交涉，而尚加尔涅也拒绝了马拉斯特的要求，并且刻毒地说，他不喜欢能思想的刺刀。1851年11月，联合的保皇党人在准备开始同波拿巴作决定性的斗争时，曾经企图在他们的声名狼藉的**议会总务官法案**[306]中规定国民议会议长能直接调动军队的原则。他们的一位将军勒夫洛签署了这个法案。但是，尚加尔涅白白地投票赞成了这一法案，梯也尔也白白地赞扬了已故制宪议会的有远见的智慧。**陆军部长圣阿尔诺**像尚加尔涅回答马拉斯特一样回答了他，而且博得了山岳党的鼓掌！

当**秩序党**还只是内阁而不是国民议会的时候，它就这样玷污了**议会制度**。而当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把议会制度逐出法国的时候，它就叫喊起来了！

我们祝议会制度一路平安！

三

立法国民议会于1849年5月28日开会，到1851年12月2日被解散。这一时期是**立宪共和国或议会制共和国**的存在时期。①

在第一次法国革命中，**立宪派**统治以后是**吉伦特派**[307]的统治；**吉伦特派**统治以后是**雅各宾派**[308]的统治。这些党派中的每一个党派，都是以更先进的党派为依靠。每当某一个党派把革命推进得很远，以致它既不能跟上，更不能领导的时候，这个党派就要被站在它后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开并且送上断头台。革命就这样沿着上升的路线行进。

1848年革命的情形却相反。当时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属物。后者背叛了它，并使它在4月16日[259]、5月15日[79]和6月的日子[5]里遭受了失败。民主派又全靠资产阶级共和派双肩的

①在1852年版中这一段是这样写的："立法国民议会于1849年5月28日开会，到1851年12月2日被解散。这一时期是**立宪共和国或议会制共和国**的存在时期。这一时期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1849年5月28日—1849年6月13日，民主派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小资产阶级或民主主义政党的失败**；1849年6月13日—1850年5月31日，资产阶级，即联合的奥尔良派和正统派或秩序党的议会专政，这个专政是在**废除普选权**之后实行的；1850年5月31日—1851年12月2日，资产阶级和波拿巴的斗争，**推翻资产者的统治，立宪共和国或议会制共和国的覆灭。**"——编者注

支持。资产阶级共和派刚刚感到自己站稳脚跟，就把这个麻烦的伙伴抛弃，自己又去依靠秩序党双肩的支持。但秩序党耸了耸肩膀，抛开资产阶级共和派，自己赶忙站到武装力量的双肩上去；它还一直以为它是坐在武装力量的肩膀上，却忽然有一天发现肩膀已经变成了刺刀。每个党派都向后踢那挤着它向前的党派，并向前伏在挤着它后退的党派身上。无怪乎它们在这种可笑的姿势中失去平衡，并且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鬼脸，奇怪地跳几下，就倒下去了。革命就这样沿着下降的路线行进。二月革命的最后街垒还没有拆除，第一个革命政权还没有建立，革命就已经这样开起倒车来了。

我们所谈的这个时期，各种尖锐的矛盾极其错综复杂：立宪派公然图谋反对宪法，革命派公开承认自己拥护立宪；国民议会想左右一切，却总是按议会方式进行活动；山岳党以忍耐为天职，并以预言未来的胜利来补偿现在的失败；保皇派扮演着共和国的元老院议员的角色，为环境所迫，不得不在国外支持他们所依附的互相敌对的王室，而在法国内部却支持他们所憎恨的共和国；行政权把自己的软弱当做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招来的轻蔑看做自己的威信；共和国不过是两个王朝——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卑鄙方面在帝国的招牌下的结合；联盟的首要条件是分离；斗争的首要准则是不分胜负；放肆地无谓地煽动，是为了安宁；最隆重地宣扬安宁，是为了革命；有热情而无真理，有真理而无热情；有英雄而无功绩；有历史而无事变；发展的唯一动力仿佛是日历，它由于相同的紧张和松弛状态的不断反复而使人倦怠；对立形势周期地达到高度尖锐化，好像只是为了钝化和缓和，但始终不能得到解决；一方面是装腔作势的努力和害怕世界灭亡的市侩恐怖心理，另一方面却是救世主们玩弄极其卑微的倾轧手段和演出宫廷闹剧，他们这种漫不经心的做法使人想起的不是末日

的审判，而是弗伦特运动[309]时期的情景；法国的全部官方天才，由于一个人的狡猾的愚钝而破灭；国民的共同意志每次通过普选权来表现时，都试图在群众利益的昔日的敌人身上得到适当的体现，直到最后它在一个海盗的固执的意志上得到了体现。如果历史上曾经有一页是被涂抹得一片灰暗的话，那就正是这一页。人物和事变仿佛是一些颠倒的施莱米尔——没有肉体的影子。革命自己麻痹自己的体现者，而把热情的强力完全赋予自己的敌人。如果说，反革命派不停地召唤来的“赤色幽灵”[310]终于出现，那么它出现时就不是戴着无政府主义的弗利基亚帽[311]，而是穿着秩序的制服、**红色的军裤**。

我们已经看到，波拿巴在1848年12月20日他自己的升天节这一天所组成的内阁，是秩序党的内阁，即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联合内阁。这个或多或少用强力缩短了共和派制宪议会寿命的巴罗—法卢内阁，直到制宪议会死后还在执掌政权。联合保皇党人的将军尚加尔涅继续执掌着正规军第一师和巴黎国民自卫军的最高统帅权。最后，普选保证秩序党在国民议会中取得大多数的席位。在国民议会中，路易-菲力浦的众议院议员和贵族院议员，已同一群神圣的正统主义者汇合起来了，对于这些正统主义者来说，国民的大量的选票变成了政治舞台的入场券。波拿巴派的议员人数太少，不足以构成一个独立的议会党。他们只不过是秩序党的一个可怜的附属物。这样，秩序党就掌握了政府权力、军队和立法机关，一句话，掌握了全部国家政权；而且这个党在精神上是靠着把它的统治炫示为民意表现的普选、靠着反革命势力在整个欧洲大陆上同时获得胜利而加强起来的。

从来还没有一个党派拥有这样强有力的手段和在这样良好的征兆下开始斗争。

罹难的**纯粹的共和派**[64]在立法国民议会中只剩下一个以非洲的

将军卡芬雅克、拉莫里谢尔和贝多为首的、大约50人组成的集团。大的反对党是**山岳党**——这是**社会民主派**给自己取的议会名称。在国民议会750个席位中，它占有200多个，所以它至少是和秩序党三个派别中的任何一个派别同等强大。它和整个保皇派联盟相比之下所占的相对少数地位，好像是由于特殊情况而趋于平衡了。不仅各省的选举表明山岳党在农村居民中获得很多拥护者，而且差不多全体巴黎议员都是属于山岳党的；军队以选出三个下级军官来表明它的民主主义信念，而山岳党的首领赖德律-洛兰与秩序党的一切代表不同，是由于五个省的选票集中到他身上而被抬上议员宝座的。这样，在1849年5月28日，山岳党在保皇党内部以及在整个秩序党和波拿巴之间必然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看来有获胜的一切条件。可是，两星期以后，它竟失掉了一切，包括声誉在内。

在我们继续叙述议会的历史以前，为了避免在估计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代的总的性质时通常易犯的错误，需要作几点说明。在民主派看来，无论在制宪国民议会时期或在立法国民议会时期，问题都不过是共和党人和保皇党人之间的斗争。他们把运动本身概括为一个词："**反动**"——黑夜，这时所有的猫都是灰的，而他们也可以滔滔不绝地倾泻出他们的更夫的老生常谈。当然，初看起来，秩序党好像是各种保皇派集团的结合体，这些集团不仅互相倾轧，以便把自己的王位追求者捧上王位，把对方的王位追求者排挤掉，而且它们一致对"共和国"表示仇恨，一致对"共和国"进行斗争。和这些保皇派的阴谋家相反，山岳党好像是"共和国"的代表。秩序党似乎是永远忙于"反动"，而这种"反动"完全像在普鲁士一样，是针对新闻出版、结社等等的，并且还像在普鲁士一样，是以官僚、宪兵和法庭进行粗暴的警察干涉的方式实现的。"山岳党"同样毫不停息地忙于抵抗这种攻击，以

此来保护“永恒的人权”，就像近150年以来每个所谓的人民党派所多多少少做过的那样。可是，只要更仔细地分析一下情况和各个党派，这种遮蔽着**阶级斗争**和这个时期特有面貌的假象就消失了。

我们已经说过，正统派和奥尔良派是秩序党中的两个大集团。什么东西使这两个集团依附于它们的王位追求者并使它们互相分离呢？难道只是百合花[85]和三色旗，波旁王室和奥尔良王室，各种色彩的保皇主义？难道真是它们的保皇主义信仰？在波旁王朝时期进行统治的是**大地产**连同它的僧侣和仆从；在奥尔良王朝时期进行统治的是金融贵族、大工业、大商业，即**资本**和它的随从——律师、教授和阿谀者。正统王朝不过是地主世袭权力的政治表现，而七月王朝则不过是资产阶级暴发户篡夺权力的政治表现。所以，这两个集团彼此分离决不是由于什么所谓的原则，而是由于各自的物质生存条件，由于两种不同的财产形式；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旧有的对立，由于资本和地产之间的竞争。当然，把它们同某个王朝联结起来的同时还有旧日的回忆、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这有谁会否认呢？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其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如果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这两个集团中的每一个集团，都硬要自己和别人相信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它们对两个不同王朝的忠诚，那么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的却恰恰相反，正是它们利益的对立才使得这两个王朝不能合二为一。正如在日常生活中应当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

样，在历史的斗争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奥尔良派和正统派同处于共和国中并提出同样的要求。如果一方不管另一方力求**复辟**它**自家的王朝**，那么这只是表明，**资产阶级**分裂成的**两大集团**（地产和资本），都力图恢复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使对方处于从属地位。我们谈论资产阶级的两大集团，是因为大地产虽然还摆着封建主义的姿态，抱着高贵门第的高傲态度，但是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影响下已经完全资产阶级化了。例如，英国的托利党人曾长期认为，他们是热衷于王权、教会和旧日英国制度的美好之处，直到危急关头才被迫承认，他们仅仅是热衷于**地租**。

联合的保皇党人在报刊上，在埃姆斯[99]，在克莱尔蒙特[101]，在议会之外，总是互相倾轧。在幕后，他们又穿起他们旧时的奥尔良派的和正统派的制服，进行他们的旧时的比武。但是在公开的舞台上，在大型政治历史剧演出时，在扮演一个议会大党的角色时，他们对自己的可敬的王朝只是敬而远之，无止境地推迟君主制的复辟。他们在从事自己的真正事业时是以**秩序党**的姿态出现，即凭着**社会的**资格，而不是凭着**政治的**资格；是作为资产阶级世界秩序的代表者，而不是作为出游公主的护卫骑士；是作为和其他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而不是作为和共和党人对立的保皇党人。作为秩序党，他们也比先前任何时候，比复辟时期或七月王朝时期，享有更加无限和更加稳固地统治其他社会阶级的权力。这样的权力只有在议会制共和国的形式下才可能存在，因为只有在这种国家形式下，法国资产阶级的两大集团才能联合起来，从而把本阶级的统治提到日程上来，以代替本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集团的统治。如果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以秩序党的身份痛骂共和制，发泄他们对共和制的憎恶，那么这就不仅是出于保皇主义的回

忆了。本能告诉他们，共和制虽然完成了他们的政治统治，同时却破坏着这一统治的社会基础，因为他们现在必须面对各个被奴役的阶级并且直接和它们斗争，没有人调解，没有王冠作掩护，也不能用相互之间以及和王权之间的次要斗争来转移全国的视线。由于感觉到自己软弱无力，他们才不得不在他们阶级统治的完备的条件面前退缩下来，力图返回到那些不大完备、不大发达、因而危险也较少的阶级统治的形式上去。相反地，每当联合的保皇党人和敌视他们的王位追求者即波拿巴发生冲突时，每当他们担心行政权危害他们的议会的万能权力时，每当他们因此必须亮出自己统治的政治资格时，他们就不是以**保皇党人**的身份出现，而是以**共和党人**的身份出现，从奥尔良派的梯也尔到正统派的贝里耶都是如此：前者曾向国民议会担保说，关于共和国的问题，他们的意见分歧最少；后者曾缠着三色绶带，以护民官的姿态，在1851年12月2日代表共和国向集合在第十区市政厅前面的人民群众发表演说。的确，有一阵讥笑的回声响应着他：亨利五世！亨利五世！

与联合的资产阶级相对抗的，是小资产者和工人的联合，即所谓的**社会民主派**。1848年六月事变以后，小资产者发觉自己受到了亏待，自己的物质利益受到威胁，而那些应当保证它有可能捍卫这种利益的民主保障，也受到了反革命的危害。因此，它就和工人接近起来。另一方面，它在议会中的代表，即在资产阶级共和派专政时期被排挤到后台去的**山岳党**，在制宪议会存在的后半期，因为同波拿巴及保皇派阁员们进行了斗争，又重新获得了已失去的声望。山岳党和社会主义的领袖们结成了同盟。1849年2月举行了和解宴会，制定了共同纲领，设立了共同的选举委员会，提出了共同的候选人。无产阶级的社会要求已被磨掉革命的锋芒，发生了民主主义的转折，小资产阶

级的民主主义要求则丢掉了纯政治的形式而显露出社会主义的锋芒。这样就产生了**社会民主派**。由这种联合产生出来的新**山岳党**所包含的成员，除了几个工人阶级出身的配角和几个社会主义的宗派分子，还是和旧山岳党所包含的成员一样，不过是人数多点罢了。但是，逐渐地它就随着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一同变化了。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把民主共和制度作为手段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无论它提出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个目标，无论目标本身涂上的革命颜色是淡是浓，其内容始终是一样的：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然而也不应该狭隘地认为，似乎小资产阶级原则上只是力求实现其自私的阶级利益。相反，它相信，保证它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同时也就是唯一能拯救现代社会并避免阶级斗争的**一般**条件。同样，也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崇拜小店主的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者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界代表**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明显地看出，当山岳党为了共和国和所谓的人权不断同秩序党作斗争时，共和国或人权并不是它的最终目的，正像一支将被缴械的军队进行反抗和投入战斗并不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武器一样。

国民议会刚一开幕，秩序党就向山岳党挑战。资产阶级这时已感到必须制服民主派小资产者，正如他们在一年以前感到必须整垮革命无产阶级一样。不过这次对手的情况已是另一个样子了。无产阶级党的力量是在街上，小资产者的力量却在国民议会中。因此必须趁时间和形势还没有把这种力量巩固起来的时候，就把它从国民议会引诱到街上，使它自己摧毁它在议会中的力量。山岳党便纵马飞奔到陷阱中去了。

把山岳党引入陷阱的诱饵是法军炮轰罗马。这次炮轰违反了宪法第5条，因为该条禁止法兰西共和国使用自己的兵力侵犯他国人民的自由。此外，宪法第54条还禁止行政权不经国民议会同意宣布战争，而制宪议会在5月8日的决议中曾指责远征罗马的举动。赖德律-洛兰以此为根据在1849年6月11日对波拿巴和他的部长们提出弹劾案。赖德律-洛兰被梯也尔的刻毒的讥刺激怒，威胁说将用一切手段，甚至将使用武力来保卫宪法。山岳党全体一致起立，重申这个使用武力的号召。6月12日，国民议会否决了弹劾案，于是山岳党就退出了议会。六月十三日事变[312]大家都知道：一部分山岳党人发表宣言，宣布波拿巴和他的部长们“不受宪法保护”；民主派的国民自卫军徒手举行示威游行，遇到尚加尔涅的军队就逃散了，如此等等。一部分山岳党人逃到国外，另一部分被交付布尔日特别最高法庭审讯，余下的山岳党人按照议会规则[313]受到国民议会议长吹毛求疵的监管。巴黎重又宣布戒严，巴黎国民自卫军中的民主派部分被解散了。山岳党在议会中的影响和小资产者在巴黎的力量就这样被消灭了。

里昂——在那里六月十三日事变成了工人流血起义的信号[314]——也和邻近的五个省同时宣布了戒严。戒严状态一直继续到现在。

山岳党大多数背弃了自己的先锋队，拒绝在它的宣言上签名。

报刊也临阵脱逃了，只有两家报纸①敢于登载这个宣言。小资产者背叛了自己的代表，国民自卫军没有露面，即使在某处露面，也只是阻挠构筑街垒。代表们欺骗了小资产者，军队中的所谓同盟者根本没有露过面。最后，民主派不但没有从无产阶级中汲取力量，反而把自己的懦弱传染给无产阶级，并且正如民主党人的一切重大行动中常有的情形那样，领袖们为了安慰自己，可以责备他们的"人民"背叛了他们，人民为了安慰自己，可以责备他们的领袖欺骗了他们。

很少看到有什么事情比山岳党当前的进军喧嚷得更厉害；很少看到谈论什么事情像现在吹嘘民主派必胜这样自信、这样迫不及待。显然，民主党人是相信使耶利哥城墙应声倒塌的号角声[315]的力量的。每当他们站在专制制度的城墙面前时，他们就力图重复这个奇迹。如果山岳党真想在议会中获得胜利，它就不应该号召使用武力。如果它在议会中号召使用武力，它就不应该在街头采取议会式的行动。如果它真的想举行和平示威，那么没有预见到示威将受到武力的干涉，就很愚蠢了。如果它想投入实际的战斗，那么放下战斗所必需的武器，就是件怪事了。可是问题在于，小资产者和他们的民主派代表人物提出革命威胁，不过是企图吓唬一下敌人罢了。当他们误入死胡同时，当他们丢尽了面子，以致不得不把自己的威胁付诸实行时，他们就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尽力避免采取可能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急于寻找失败的借口。一旦必须实地战斗时，震耳欲聋的宣战前奏曲就变成怯懦的唠叨；演员不再认真表演了，戏也就停止了，像吹胀了的气球一样，针一刺就破了。

没有一个党派像民主党这样夸大自己的力量，也没有一个党派

①《改革报》和《和平民主日报》。——编者注

像民主党这样轻率地错误估计局势。当一部分军队投票赞成山岳党的时候，山岳党就认为，军队会举行起义来拥护它。而根据是什么呢？就是根据这样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在军队看来只有一个意思，即革命家站在罗马士兵方面反对法国士兵。另一方面，人们对1848年的六月事变还记忆犹新，以致无产阶级对国民自卫军深恶痛绝，秘密团体的领袖们对民主派的领袖们表示很不信任。要消除这些矛盾，必须有受到威胁的重大的共同利益出现。宪法某一抽象条文遭破坏，并不能激起这种利益。如民主党人自己所说，难道宪法不是已经被人破坏了许多次吗？难道最大众化的报纸不是已经责骂宪法是反革命的拙劣作品吗？但是，民主党人代表小资产阶级，即体现两个阶级的利益互相削弱的那个**过渡阶级**，所以民主党人自以为完全超然于阶级对抗之上。民主党人认为，和他们对立的是一个特权阶级，而他们和全国所有其他阶层一起构成了**人民**。他们所维护的是**人民的权利**；他们所关心的是**人民的利益**。因此，他们没有必要在临近斗争时考察各个不同阶级的利益和立场。他们不必过分仔细地估量自己的力量。他们只要发出一个信号，**人民**就会用它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冲向**压迫者**。可是，如果事实表明民主党人的利益没有吸引力，他们的力量是软弱的，那么这就应该归罪于危险的诡辩家，他们把**统一的人民**分成了各个敌对的阵营；或者是由于军队太野蛮，太没有理智，不能把民主党人的纯正目的当做自己的至宝；再不然就是由于执行中的某个细节使全盘皆输，或者是由于某个意外的偶然事件使这一次行动又被挫败了。不管怎样，民主党人逃出最可耻的失败时总是洁白无瑕的，正像他们陷入这种失败时是纯洁无辜的一样；他们摆脱失败时信心更加坚定了，他们以为他们一定会胜利，以为不是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党应该放弃旧的观点，相反地，是形势应该来适应他们的旧观点。

三

因此，不应当以为人数大大削减、备受挫折并被新的议会规则所侮辱的山岳党是太不幸运了。虽然六月十三日事变排挤了它的领袖，但是这一天又给第二流的能者腾出了位置，这个新地位使得他们得意忘形。虽然他们在议会中软弱无力的情况已经毋庸置疑，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有理由把他们的行动局限于道义上的愤怒和虚张声势的言论了。虽然秩序党把他们这些最后正式代表革命的人物看做无政府状态一切可怕现象的体现者，但是他们在实际上已经能够表现得更平庸、更温和了。关于6月13日的失败[312]，他们意味深长地安慰自己说，只要谁敢动一动普选权，只要敢动一下，我们就让他知道我们的厉害！走着瞧吧！

至于那些逃到国外的山岳党人，这里只须指出：赖德律-洛兰在不到两星期的时间内就把他所领导的强大的党无可挽回地断送了，在这以后，他竟觉得自己负有使命组织一个有名无实的法国政府；他这个远离行动舞台的人物，似乎将随着革命水平的下降，随着官方法国的官方大人物变得愈益矮小而愈益高大起来；在1852年，他能以共和派竞选人的资格出面；他不断向瓦拉几亚人和其他民族发出通告，威胁说要以他自己和他的同盟者的壮举来对付大陆上的专制暴君。蒲鲁东曾向这班老爷们说过："你们就是会吹牛皮！"他这样说难道没有一点道理吗？

6月13日，秩序党不仅击溃了山岳党的势力，同时还执行了**宪法应服从国民议会多数的决议的原则**。它对共和国的理解是：在共和国里，资产阶级通过议会形式实现统治，不像在君主国里那样，既要受行政权的否决权的限制，又要受行政权解散议会的权力的限制。这就是梯也尔所说的**议会制共和国**。可是，如果说资产阶级在6月13日保证自己在议会大厦内取得了无限的权力，那么它把议会中最孚众望

的议员排除出去，岂不是严重地削弱了议会对付行政权和人民的力量，因而使议会本身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吗?它既然毫不客气地把许多议员交付法庭审判，也就是废弃了它本身的议会不可侵犯性。它迫使山岳党议员遵守的那个屈辱性的规则，大大提高了共和国总统的地位，因而也就大大贬低了每一个人民代表。它指责为保护立宪制宪法而举行的起义是图谋颠覆社会的无政府行动，也就是自己剥夺了自己在遭受行政权违反宪法的侵犯时诉诸起义的机会。历史真能捉弄人！1851年12月2日，秩序党痛哭流涕、但徒劳无益地向人民推荐了一位抵御波拿巴并保护宪法的将军**乌迪诺**，而这位将军曾按照波拿巴的命令炮轰了罗马，因而成为6月13日护宪骚动的直接原因。6月13日的另一个英雄**维埃伊拉**，曾经率领一帮属于金融贵族的国民自卫军在民主派报社内胡作非为，因而受到来自国民议会讲坛的称赞；而这个维埃伊拉竟参与了波拿巴的阴谋，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国民议会在生死关头失掉了国民自卫军方面的任何援助。

6月13日的事变还有另一种意思。山岳党曾力求把波拿巴交付法庭审判。所以，山岳党的失败也就是波拿巴的直接胜利，也就是波拿巴个人对他那些民主派敌人的胜利。秩序党赢得了这个胜利，而波拿巴只要坐享其成就行了。他这样做了。6月14日，巴黎各处墙壁上张贴了一个布告，据布告所说，总统好像并没有参与这一切，好像他也并不愿意，只是为事变所迫才离开他的僧院式的隐居生活，他以被人误会的善人的口吻抱怨敌人对他的诽谤，他仿佛把他个人和秩序的事业等同起来，实际上却是把秩序的事业和他个人等同起来。此外，虽然国民议会后来批准了对罗马的征讨，但这次征讨是由波拿巴发起的。波拿巴恢复了最高祭司撒母耳在梵蒂冈的权力以后，便可以指望以大卫王的姿态进入土伊勒里宫了。[316]他已把僧侣拉到自己方

面来了。

我们已经说过,6月13日的骚动只不过是一次和平的街头游行。所以,对付这次游行,是说不上什么军事勋业的。然而,在这个很少有英雄人物和事变的时期,秩序党却把这个不流血的战斗变成了第二个奥斯特利茨[317]。讲坛和报刊都称赞军队,说它是秩序用来对抗那些体现无政府状态的软弱无力的人民群众的一种力量,而尚加尔涅则被称颂为"社会中坚"——这个骗局,最后连他自己也信以为真了。这时,那些看来怀有二心的军队,都被悄悄地调出了巴黎;那些在选举中表露出浓厚的民主倾向的团队,都从法国调往阿尔及尔去了;士兵中不安分的分子,都被送入了惩罚队;最后,报刊渐渐和兵营完全隔绝,而兵营渐渐和市民社会完全隔绝了。

在这里我们已经谈到了法国国民自卫军历史上的决定性的转折点。1830年,国民自卫军决定了复辟的垮台。在路易-菲力浦时期,如果国民自卫军站在军队一边,每次暴动都要遭到失败。当国民自卫军在1848年的二月事变中对镇压起义采取消极的态度,而对路易-菲力浦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时,路易-菲力浦就认定自己要完蛋,而事情果然也就是这样。于是就确立了这样一种信念:革命**没有**国民自卫军便不能胜利,而军队如果**反对**国民自卫军便不能获胜。这是军队对市民万能的一种迷信。在1848年六月事变中,当全部国民自卫军协同正规军镇压了起义的时候,这种迷信更加牢固了。从波拿巴就任总统时起,由于违反宪法地把国民自卫军的指挥权和正规军第一师的指挥权统一在尚加尔涅一人身上,国民自卫军的地位才有所降低了。

国民自卫军的指挥权在这里好像成了最高军事统帅的一种属性,同样,国民自卫军本身也好像只是正规军的附属物。最后,在6月

13日国民自卫军已经被粉碎，这不仅是由于从这一天起它在法国全国各地都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被解散，直到只剩一些碎屑为止。6月13日的示威游行首先是国民自卫军中民主派的示威游行。固然，他们用来和军队对抗的，不是自己的武器，而只是自己的军装；可是，护身符就在于这个军装。军队知道，这种军装不过是一块普普通通的毛料。魔法消失了。1848年六月事变时，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国民自卫军为代表同军队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1849年6月13日，资产阶级在军队的帮助下驱散了小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1851年12月2日，资产阶级自己的国民自卫军也已经不存在了，当波拿巴后来签署解散国民自卫军的法令时，他只是确认了既成的事实。资产阶级就这样自己毁坏了自己对抗军队的最后一个武器，但是自从小资产阶级已不像一个忠顺的臣仆支持它而像一个反叛者反对它的时候，资产阶级就已经不得不毁坏这个武器了。一般说来，资产阶级一旦自己成为专制者的时候，就不得不亲手把自己用来对付专制制度的一切防御手段尽行毁坏。

这时候，秩序党却在庆祝政权重新回到它手里（1848年它失掉了这个政权，好像只是为了1849年它摆脱一切羁绊的时候重新把政权收回来），它对共和国和宪法横加侮辱，咒骂未来、现在和过去的一切革命，甚至连它自己的领袖所完成的革命都包括在内，最后还颁布了钳制报刊言论、消灭结社自由和把戒严状态规定为正常制度的法律。接着，国民议会从8月中旬到10月中旬休会，任命了休会期间的常任委员会。在休会期间，正统派在埃姆斯进行阴谋活动，奥尔良派在克莱尔蒙特进行阴谋活动，波拿巴借皇帝式的巡游来进行阴谋活动，而各省议会则在为修改宪法召开的会议上施展阴谋，这是国民议会定期休会期间照例经常发生的一些事实。这些事实只有在它们具

有事变的性质时，我才较为详细地予以论述。不过这里还应该指出，国民议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退出舞台，只留下路易·波拿巴这一个——虽然是可怜的——人物在众目睽睽之下占据共和国首脑的地位，国民议会的这种举动是失策的，而这时秩序党却分解为保皇派的各个构成部分，发泄其彼此敌对的复辟欲望，使公众为之哗然。每当这种休会期间**议会**的喧闹声趋于沉寂而议会的身体消融到国民里去的时候，就显然可以看出，这个共和国为要显出自己的真面目来，只缺少**一件东西——使议会的**休会继续不断，并把**共和国的**“自由，平等，博爱”这句格言代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

四

1849年10月中，国民议会复会。11月1日，波拿巴送给议会一份咨文①，说巴罗—法卢内阁已经被免职，新内阁已经组成，这使议会大为震惊。就是驱逐一个仆人也不会像波拿巴驱逐自己的内阁阁员那样蛮横无礼。预定要向国民议会踢去的一脚，先踢到巴罗和他的同僚身上了。

我们已经说过，巴罗内阁是由正统派[40]和奥尔良派[77]组成的。这是秩序党的内阁。波拿巴需要这个内阁，是为了要解散共和派制宪议会，实现对罗马的征讨，并摧毁民主派的力量。那时他好像躲在这个内阁背后，把政府权力让给了秩序党，戴上了路易-菲力浦时期报刊的责任发行人戴的谦虚的性格面具，即代理人戴的面具。现在他把面具丢掉了，因为这个面具已不是一块使他能够隐藏自己的面容的薄纱，而是已变成一个妨碍他显示出自己的本来面目的铁制面具了。他任命巴罗内阁，是要借秩序党的名义驱散共和派的国民议会；他解散这个内阁，是要宣布他自己的名字和这个秩序党的国民议会无关。

要解散巴罗内阁是不乏正当借口的。巴罗内阁在对待共和国总统这个和国民议会并存的权力时，甚至连必须遵守的礼节都忽视了。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波拿巴发表了给埃德加·奈伊的信，其中好像

①1849年11月1日巴黎《总汇通报》第305号。——编者注

是指责教皇①的自由主义行动[318]，正像他曾同制宪议会相对抗，发表了称赞乌迪诺进攻罗马共和国的信一样。当国民议会表决远征罗马的拨款时，维克多·雨果从所谓的自由主义出发提起了这封信的问题。秩序党在表示轻蔑和怀疑的叫声下，根本埋葬了认为波拿巴的狂妄举动可能有什么政治意义的念头。内阁阁员没有一个人出来替波拿巴应战。又一次，巴罗以他特有的空洞的热情，在讲坛上愤愤不平地讲到据他说是在总统亲信人物中进行的"可憎的阴谋"。最后，内阁从国民议会中为奥尔良公爵夫人争得了寡妇抚恤金，却坚决拒绝向国民议会提出增加总统年俸的议案。在波拿巴身上，王位追求者和破产冒险家的身份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因此，认定他自己负有恢复帝国的使命这一伟大思想，总是由认定法国人民负有替他偿清债务的使命的另一伟大思想来补充。

巴罗—法卢内阁是波拿巴所成立的第一个同时又是最后一个**议会制内阁**。所以，这个内阁的解散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随着这个内阁的解散，秩序党就不可挽回地丧失了为维持议会制度所必需的支柱——掌握行政权。显然，在法国这样的国家里，行政权支配着由50多万人组成的官吏大军，也就是经常和绝对控制着大量的利益和生存；在这里，国家管制、控制、指挥、监视和监护着市民社会——从其最广泛的生活表现到最微不足道的行动，从其最一般的生存形式到个人的私生活；在这里，这个寄生机体由于极端的中央集权而无处不在、无所不知，并且极其敏捷、极其灵活，而现实的社会机体却极无独立性、极不固定；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国民议会如果不同时简化国家管理，不尽可能缩减官吏大军，最后，如果不让市民社会和

①庇护九世。——编者注

舆论界创立本身的、不依靠政府权力的机关，那么它一旦失掉分配阁员位置的权限，也就失掉任何实际影响了。但是，法国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恰恰是和保持这个庞大而分布很广的国家机器最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它在这里安插自己的多余的人口，并且以国家薪俸形式来补充它用利润、利息、租金和酬金形式所不能获得的东西。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又迫使它每天都要加强压制，即每天都要增加国家政权的经费和人员，同时又必须不断地进行反对社会舆论的战争，并由于猜疑而去摧残和麻痹独立的社会运动机关，如果不能把它们根本割掉的话。这样，法国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就迫使它一方面要根本破坏一切议会权力、包括它自己的议会权力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则使得与它相敌对的行政权成为不可抗拒的权力。

新内阁叫做奥普尔内阁。这并不是说奥普尔将军得到了内阁总理的职位。自从巴罗被免职时起，波拿巴甚至废除了这个职位，因为事实上这个职位使共和国总统成为在法律上微不足道的立宪君主，这个立宪君主没有王位和王冠，没有权杖和宝剑，没有不被追究责任的特权，没有世袭的最高国家权位，而最糟糕的是没有王室费。奥普尔内阁里只有一个人拥有议员头衔，这就是高利贷者**富尔德**，他是金融贵族中恶名昭彰的一个。财政部长的位置就落到他手上。只要看看巴黎交易所的行市表，就可以看出，从1849年11月1日起，法国的证券是随着波拿巴的股票的涨跌而涨跌的。这样，波拿巴在交易所中找到了同盟者，同时又通过任命卡尔利埃为巴黎警察局长而把警察抓到自己手里。

可是，内阁更迭的后果，只有在事变继续发展的进程中才能显露出来。波拿巴暂时只向前进了一步，好像是为了更清楚地表明自己

被抛到后面去了。他送了一份粗鲁的咨文以后，接着就极为卑屈地表示听命于国民议会。每当内阁阁员们敢于小心翼翼地试图把他个人的奇奇怪怪的想法制定成法案的时候，他们好像只是迫于本身地位违心地执行他们事先已确信不会有什么效果的滑稽的委托。每当波拿巴在内阁阁员们背后泄露出他的意图并玩弄他的“拿破仑观念”的时候，他的内阁阁员就在国民议会的讲坛上表示不同意他的主张。看来他说出篡夺权位的欲望，只是为了使他的敌人们的幸灾乐祸的笑声不致沉寂下去。他扮演了一个不被赏识而被全世界当做傻瓜的天才角色。他还从来没有像这个时期这样遭到一切阶级的极度的轻蔑。资产阶级还从来没有这样绝对地统治过，还从来没有这样高傲地炫耀过自己的统治的象征物。

我的任务不是在这里叙述资产阶级立法活动的历史。它的立法活动在这个时期只限于制定两个法律：一个是恢复**葡萄酒税**的法律[104]，另一个是废除无神思想的**教育法**[319]。当法国人难以喝上葡萄酒的时候，真正的生命之水①却供应得更加充裕。资产阶级以葡萄酒税的法律宣布了旧时的可恨的法国税制的不可侵犯性，同时又力图以教育法使群众保存他们能够容忍这一税制的旧时的心境。有人感到奇怪，为什么奥尔良派，自由派资产者，这些伏尔泰主义和折中派哲学的老信徒们，竟把指导法国人的精神的工作委托给他们的宿敌耶稣会[87]。可是，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虽然在王位追求者这个问题上有分歧，但是他们双方都懂得，他们的共同统治要求把两个时期的压迫手段结合起来，七月王朝时期的奴役手段必须用复辟时期的奴役手段来补充和加强。

①参看《新约全书·约翰启示录》第22章。——编者注

农民的一切希望都落了空，他们一方面比任何时候都苦于粮价低落，另一方面又苦于赋税和抵押债务日益加重，于是他们在各省开始骚动起来。他们所得到的回应是：迫害教师，使他们服从于僧侣；迫害镇长，使他们服从于省长；最后是施行控制一切人的侦探制度。在巴黎和各大城市，反动派本身具有自己时代的特征，挑衅行为多于压制。在乡村，反动派卑鄙龌龊、琐碎小气、可恶可厌，一句话，就是宪兵。显然，受过牧师制度祝福的宪兵制度三年来对愚昧的群众的腐蚀该是多么深。

虽然秩序党在国民议会讲坛上热情奔放，大发议论反对少数派，但是它的言词始终是单音节的，正如基督徒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①]不论是讲坛上或报刊上的言论，都很单调，和预先知道答案的谜语一样平淡无味。不管是谈请愿权还是葡萄酒税，不管是谈新闻出版自由还是贸易自由，不管是谈俱乐部还是市政机构，也不管是谈保障人身自由还是决定国家预算，发出的口号总是一样，题目总是一个，判词总是早已准备妥帖而且总是一成不变地说："**社会主义**！"甚至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也被宣布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也被宣布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财政改革也被宣布为社会主义。在已有运河的地方建筑铁路也是社会主义，用木棍抵御刀剑的袭击也是社会主义。

这并不只是一句空话、一种时髦或一种党派斗争手腕。资产阶级正确地了解到，它为反对封建制度而锻造出来的各种武器都倒过来朝向它自己了，它所创造的一切教育手段都转过来反对它自己的文明了，它所创造的所有的神都离弃了它。它了解到，一切所谓的市

①参看《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5章第37节。——编者注

民自由和进步机关，都侵犯它的**阶级统治**，并且既威胁它的社会基础，又威胁它的政治上层，因此这些东西就成了“**社会主义的**”了。在这种威胁和这种侵犯中，它正确地看出了社会主义的秘密，所以它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和趋势的评价，比所谓的社会主义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更正确些。而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因此也就不能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对它一味表示反对——不管它是在为人类的痛苦感伤地哭泣，不管它是在宣扬基督的千年王国和博爱，也不管它是在用人道主义态度漫谈精神、教育和自由，或是在空泛地臆造一切阶级的协调和幸福的制度。资产阶级只是没有了解到一点：如果推论下去，那么它**自己的议会制度**，它的整个**政治统治**，现在也应该被普遍指责为**社会主义的东西**了。当资产阶级的统治还没有充分组织起来，还没有获得自己的纯粹的政治表现时，其他各个阶级的对抗也不能以纯粹的形式出现，而在出现这一对抗的地方，它也不能实现那种使一切反对国家政权的斗争转化为反对资本的斗争的危险转变[①]。既然资产阶级认为任何一种社会生活表现都危害“安宁”，那么它又怎能希望在社会上层保持**不安宁的制度**，即保持自己那个——照它的一位发言人的说法——生存在斗争中并且靠斗争生存的**议会制度**呢？靠辩论生存的议会制度怎能禁止辩论呢？既然这里每种利益、每种社会措施都被变成一般的思想，并被当做一种思想来讨论，那么在这种条件下怎么能把某种利益、某种措施当做一种高出思维的东西而强使人们把它当做信条来接受呢？发言人在讲坛上的斗争，引起了报界低级作家的斗争；议会中的辩论俱乐部必然要由沙龙和酒馆中的辩论俱乐部

①在1852年版中这句话是这样写的：“它也不能实现那种立刻危及财产、宗教、家庭和秩序，使一切反对国家政权的斗争转化为反对资本的斗争的危险转变。”——编者注

来补充；议员们经常诉诸民意，就使民意有理由在请愿书中表示自己的真正的意见。既然议会制度将一切事情交给大多数决定，那么议会以外的大多数又怎能不想作决定呢？既然你们站在国家的顶峰上拉提琴，那么站在下面的人跟着跳舞不正是意料之中的事吗？

总之，既然资产阶级把它从前当做“**自由主义**”颂扬的东西指责为“**社会主义**”，那么它就是承认：它本身的利益要求它逃避**自身统治**的危险；要恢复国内的安宁，首先必须使它的资产阶级议会安静下来，要完整地保持它的社会权力，就应该摧毁它的政治权力；只有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政治上注定同其他阶级一样毫无价值，个别资产者才能继续剥削其他阶级，安逸地享受财产、家庭、宗教和秩序；要挽救它的钱包，必须把它头上的王冠摘下，并且把保护它的剑像达摩克利斯剑一样悬在它自己的头上。

在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方面，国民议会表现得非常无能。例如1850年冬季开始的关于修筑巴黎—阿维尼翁铁路问题的讨论，直到1851年12月2日还没有结果。国民议会只要不从事压迫，不进行反动活动，它就患了不可救药的不妊之症。

当波拿巴的内阁中的一部分人倡议制定符合秩序党精神的法律，一部分人还在夸大这些法律在实施和运用中的严酷性的时候，波拿巴本人却企图以一些幼稚荒唐的提案来博得声望，强调自己对于国民议会的敌意，并暗示有某种神秘的藏宝处，只是由于环境的阻碍暂时还不能把所藏的财宝奉献给法国人民。例如，给下级军官每天增加四个苏的津贴的提案，以及为工人创设信誉贷款银行的提案。金钱的馈赠和金钱的借贷，这就是他希望用以诱惑群众的远景。馈赠和贷款，这无非就是显贵的和卑贱的流氓无产阶级的财政学。波拿巴所善于运用的妙诀只此而已。还从来没有一个王位追求者像他这样庸俗

地利用群众的庸俗习气来进行投机勾当。

国民议会眼看着波拿巴这样明显地企图靠损害它来博取声望，眼看着这个被债主催逼而又毫无值得珍惜的声誉的冒险家越来越可能干出某种极冒险的勾当，曾不止一次地表示狂怒。秩序党和总统之间的分歧已经具有危险性，一个出乎意料的事件又迫使总统怀着忏悔的心情重新投入秩序党的怀抱。我们指的是**1850年3月10日的补选**。这次选举是为了填补六月十三日事变后被监禁或被驱逐出国的议员所空下来的席位。巴黎只选了社会民主派的候选人①，并且绝大部分选票都投给了参加过1848年六月起义的德弗洛特。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巴黎小资产阶级，就这样报复了1849年6月13日的失败。看来，小资产阶级在危急关头离开战场，只是为了要在顺利的情况下以更大的战斗力量和更勇敢的战斗口号重新进入战场。看来有一种情况更加重了这次选举胜利的危险性。军队在巴黎投票选举了六月起义的一个参加者来对抗波拿巴的内阁阁员拉伊特，而在各省，军队中大部分人投了山岳党人的票，山岳党人在这些地方虽然不像在巴黎那样占有绝对优势，但也比对手占有优势。

波拿巴突然看到自己又面对着革命了。和1849年1月29日及1849年6月13日一样，1850年3月10日他又躲到秩序党背后去了。他屈服了，他怯懦地请罪，表示决心遵照议会多数的意旨来组织任何一个内阁，他甚至恳求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首领们，梯也尔们、贝里耶们、布罗伊们和摩莱们，一句话，就是恳求所谓的卫戍官们[120]亲自掌握政权。秩序党未能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它不但没有大胆地抓住这个送到手上的政权，甚至也没有强迫波拿巴恢复他在11月1日

①拉·伊·卡诺、保·德弗洛特和弗·维达尔。——编者注

所解散的内阁；它满足于用自己的宽恕羞辱波拿巴，并使**巴罗什**先生加入奥普尔内阁。这个巴罗什作为公诉人曾经在布尔日特别最高法庭疯狂地攻击过五月十五日事件中的革命者和六月十三日事件中的民主派，两次都指控他们危害国民议会。以后波拿巴的任何一个内阁阁员，都没有再敢像巴罗什那样侮辱国民议会，而在1851年12月2日以后，我们发现，他又得到了参议院副议长这个官高禄厚的职位。他把痰吐在革命者的菜汤中，为的是让波拿巴把它喝掉。

社会民主派这边似乎只是在寻找借口，以便再度使自己的胜利成为问题并削弱这一胜利的意义。巴黎新选出的议员之一维达尔，同时在斯特拉斯堡也当选了。他被说服放弃巴黎的选举而接受了斯特拉斯堡的选举。这样，民主派就没有把自己在投票站的胜利变成最终的胜利，从而激起秩序党立刻在议会中对这个胜利提出异议，它没有迫使对手在人民热情高昂和军队情绪良好的时机出来斗争，反而在3月和4月间用新的竞选把巴黎弄得疲惫不堪，使人民的激昂的感情在这一新的临时竞选把戏中消耗掉，使革命的精力满足于宪制的成就，把革命精力浪费于细小的攻讦、空洞的宣言和表面的运动，让资产阶级集合起来并做好准备，最后，以4月补选的感伤主义的注解（欧仁·苏当选）减弱了3月选举的意义。一句话，社会民主派让3月10日受了4月愚人节的愚弄。

议会中的多数派了解自己对手的弱点。因为波拿巴让多数派领导和负责攻击，多数派的17个卫戍官拟定了新选举法，法案的报告人是要求这种荣誉的福适先生。5月8日，福适提出了这个法案，其内容是要废除普选权，并规定选举人必须在他们所在的选区内居住三年，最后，工人在选区的居住年限应由他们的雇主来作证。

民主派在宪制选举斗争时期曾满怀革命的激情，当现在应该拿

起武器来证明自己的选举胜利的重大意义的时候,他们却以宪制精神鼓吹秩序,宣扬庄严的宁静(calme majestueux)和合法行为,也就是盲目地服从自封为法律的反革命势力的意志。在辩论的时候,山岳党[81]力图羞辱秩序党,以一个遵守法制的正直庸人的冷漠态度来对抗它的革命热情,严厉责备它的革命行为,从而把它置于死地。甚至新当选的议员们也极力想以自己的谨慎而有礼的举动来向大家证明:责骂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把他们的当选解释成革命的胜利,是一种怎样的误解。5月31日,新选举法[320]通过了。山岳党把抗议书塞进总统的衣袋里就心满意足了。继选举法之后又通过了一个彻底消灭革命报刊的新的新闻出版法[97]。革命报刊遭到这种厄运是活该。在这场大洪水以后,革命的最前哨就只剩下《国民报》和《新闻报》这两个资产阶级的报纸了。

我们已经看到,民主派的领袖们在3月和4月间曾竭力把巴黎人民拖入虚构的斗争,而在5月8日以后又竭力阻止巴黎人民进行实际的斗争。此外,我们还不应当忘记,1850年是少有的工商业繁荣的年头,所以当时巴黎的无产阶级有充分就业的机会。可是1850年5月31日的选举法根本剥夺了无产阶级参政的权利,甚至断绝了他们接近战场的机会。这个法律使工人回复到他们在二月革命以前所处的贱民地位。面对着这样的事变,他们却让民主派来驾驭自己,为了一时的安逸而忘记了自己阶级的革命利益,由此放弃了作为制胜力量的光荣,屈服于自己的命运,并且表明,1848年6月的失败使他们多年丧失了战斗能力,最近的历史进程又要撇开他们而自行发展。至于在6月13日曾大嚷大叫"只要敢动一动普选权,那就对他不客气!"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现在却自慰说:反革命给他们的打击根本不是打击,而5月31日的法律也根本不是法律。在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

日,每个法国人都将一手拿着选票,一手拿着利剑来到投票站。他们用这样的预言来安慰自己。最后,军队为了1850年3月和4月的选举而受到上级的处罚,正如他们曾经为了1849年5月29日的选举而受到处罚一样。可是这一次军队坚决地对自己说:“第三次我们再不会上革命的当了!”

1850年5月31日的法律[320],是资产阶级的政变。资产阶级过去所有各次对革命的胜利,都只具有临时的性质。只要现届国民议会一退出舞台,这些胜利就成为问题了。这些胜利是取决于新的普选中的偶然情况的,而自从1848年以来,选举的历史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资产阶级的实际统治越强大,它对人民群众的精神统治就越软弱。普选权在3月10日直接表明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就以取消普选权进行了报复。所以,5月31日的法律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必然表现。另一方面,按宪法规定,共和国总统的当选至少要有200万票才算有效。如果总统候选人中没有一个人获得这个最低限度的票数,国民议会就有权从得票最多的三个候选人中选出一个来当总统。当制宪议会制定这个法律的时候,选民册中共有1 000万选民。所以,按照这个法律,只要取得占选民总数五分之一的票数,总统当选就算有效了。5月31日的法律至少从选民册中勾销了300万个选民,这样就把选民人数减低到700万人,但是当选总统需要获得200万选票的法定最低限额却依然保留着。这样一来,法定的最低限额就从总选票的五分之一几乎提高到三分之一。换句话说,这个法律用尽一切办法把总统选举从人民手里暗中转到国民议会手里。总之,秩序党好像是用5月31日的选举法加倍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因为它已经把国民议会议员的选举和共和国总统的选举转交给社会的保守部分了。

五

革命危机刚一过去，普选权刚一废止，国民议会和波拿巴之间的斗争就重新爆发了。

宪法规定发给波拿巴的薪俸是每年60万法郎。他就职后不到半年工夫，就把这个数额增加了一倍，因为奥迪隆·巴罗硬要制宪议会每年发给60万法郎的津贴作为所谓交际费。在6月13日以后，波拿巴又提出过类似的要求，可是巴罗这次并没有听从。现在，在5月31日以后，波拿巴立即利用这个有利的时机，通过他的内阁阁员们向国民议会要求每年发给300万法郎的总统年俸。长期的流浪生活使这个冒险家长出非常发达的触角，能探知可能向资产者勒索金钱的时机。他采取了十足的敲诈手段。国民议会在他的协助和同意下污辱了人民的主权。他威胁说，如果国民议会不松开钱袋，不以每年300万法郎来买他的沉默，他就要向人民法庭告发国民议会的犯罪行为。国民议会剥夺了300万法国人的选举权，他要求把每一个不流通的法国人换成一个流通的法郎，正好是300万法郎。他是由600万人选出来的，他要求赔偿他在事后被剥夺掉的票数。国民议会的委员会拒绝了这种厚颜无耻的要求。波拿巴派的报纸进行威胁。国民议会能够在它从原则上彻底和国民群众决裂的时候又同共和国总统决裂吗？国民议会虽然否决了每年的总统年俸，但同意一次性增发216万法郎。国民议会既已答应给钱，同时又以自

己的烦恼表明自己这样做是出于不得已，因而就暴露了双倍的软弱。波拿巴为什么需要这笔款子，我们往后就可以看到。在废除普选权后，接踵而至的是令人气恼的尾声，在这尾声当中波拿巴对于篡权的议会的态度已经从3月和4月危机时期的恭顺平和变成了挑战式的骄横，而国民议会在这个尾声后却休会三个月，从8月11日到11月11日。它在休会期间留下了一个由28人组成的常任委员会，代行它的职能。这其中没有一个波拿巴分子，但是有几个温和的共和派。1849年的常任委员会完全是由秩序党和波拿巴分子组成的。但是，那时是秩序党以革命的经常反对者自命，现在则是议会制共和国以总统的经常反对者自命了。5月31日的法律通过后，秩序党要对付的只是这个敌手了。

1850年11月国民议会复会的时候，过去国民议会和总统之间的一些小小的冲突看来势必要转化为两个权力之间的大规模的无情战斗，转化为两个权力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同1849年间一样，这一年议会休会期间，秩序党又分解成了各个派别，每一派别都忙于自己的复辟阴谋，这种阴谋因路易-菲力浦之死而更加活跃起来。正统派的国王亨利五世甚至任命了一个组织完备的内阁驻在巴黎，其中有几个常任委员会委员。因此，波拿巴也有理由巡游法国各省，并按照他所临幸的每个城市的情绪，或者隐晦地或者公开地吐露自己的复辟计划，为自己张罗选票。波拿巴的这次巡游，自然被大型的官方报纸《通报》和小型的波拿巴私人通报捧做胜利的游行。在这次巡游期间，到处都有**十二月十日会**[125]的会员们随驾陪行。这个团体在1849年就成立了。它名义上是个慈善会，实际上是由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一些秘密宗派，每一个宗派都由波拿巴的走狗们领导，总领导人是一个波拿巴派的

将军①。在这个团体里，除了一些生计可疑和来历不明的破落放荡者，除了资产阶级中的败类和冒险分子，就是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释放的刑事犯、脱逃的劳役犯、骗子、卖艺人、游民、扒手、玩魔术的、赌棍、皮条客、妓院老板、挑夫、下流作家、拉琴卖唱的、捡破烂的、磨刀的、补锅的、叫花子，一句话，就是被法国人称做浪荡游民的那个完全不固定的、不得不只身四处漂泊的人群。波拿巴把这些跟他同类的分子组成十二月十日会即“慈善会”的核心，因为这个团体的所有成员都和波拿巴一样感到自己需要靠国内的劳动群众来周济。波拿巴是**流氓无产阶级的首领**，他只有在这些流氓无产者身上才能大量地重新找到他本人所追求的利益，他把这些由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看做他自己绝对能够依靠的唯一的阶级。这就是真实的波拿巴，不加掩饰的波拿巴。②他这个老奸巨猾的痞子，把各国人民的历史生活和他们所演出的大型政治历史剧，都看做最鄙俗的喜剧，看做专以华丽的服装、辞藻和姿势掩盖最鄙陋的污秽行为的化装舞会。例如，在进攻斯特拉斯堡时，一只受过训练的瑞士兀鹰就扮演了拿破仑之鹰的角色。当他在布洛涅登陆时，他给几个伦敦仆役穿上了法国军装，于是他们就俨然成了军队。[322]在他的十二月十日会中，他搜罗了1万个游手好闲分子，要他们扮演人民，正像尼克·波顿扮演狮子③一样。当资产阶级毫不违反法国演剧格式的迂腐规则，十分严肃地表演最纯粹的喜剧时，当它一半被骗一半信服自己的

①让·皮·皮亚。——编者注

②在1852年版中这句话是：“这就是真实的波拿巴，不加掩饰的波拿巴，他后来除了革命者之外，还把他的一部分昔日的共谋者送到卡宴[321]，从而以万能的方式还清了欠他们的债，这充分地显示出波拿巴的本色。”——编者注

③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第1幕第2场。——编者注

大型政治历史剧的庄严时，一个把喜剧仅仅看做喜剧的冒险家当然是要获得胜利的。只有当他扫除了盛装的敌人，并且认真演起自己的皇帝角色，戴上拿破仑的面具装做真正的拿破仑以后，他才会成为他自己的世界观的牺牲品，成为一个不再把世界历史看做喜剧而是把自己的喜剧看做世界历史的认真的丑角。十二月十日会是波拿巴特有的一种党派战斗力量；它对于波拿巴的意义，正如国家工场[73]对于社会主义工人，别动队对于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意义一样。在他巡游期间，十二月十日会的会员们成群地聚集在沿途各火车站，装做迎驾的群众，并表示人民的热情，高叫"皇帝万岁！"，侮辱和殴打共和党人——所有这些，当然都是在警察保护下干出来的。在他返回巴黎的途中，这些人就充当了前卫，防止或驱散敌对性的示威游行。十二月十日会属于他，是**他**创造出来的，是完全出自他自己的主意。在其他方面，他据为己有的东西，都是由于形势关系落到他手中的；他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形势替他做好或者是他模仿别人的行为罢了。他公开地对资产者大打其关于秩序、宗教、家庭、财产的官腔，暗地里却依靠着舒夫特勒和斯皮格尔勃之流的秘密团体，依靠着无秩序、卖淫和偷窃的团体。这是波拿巴的本色，而十二月十日会的历史便是他本人的历史。有一次破例地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有几个秩序党议员挨了十二月十日会会员的木棍。更有甚者，指派给国民议会负责其保卫事宜的警官伊雍，根据一个名叫阿莱的人的口供向常任委员会报告，说十二月十日会的一个支部决定暗杀尚加尔涅将军和国民议会议长杜班，并且已经指定了凶手。可以想象，杜班先生该是多么惊恐。看来，议会对十二月十日会的调查，即对波拿巴秘密内幕的揭发，是不可避免的了。可是，在国民议会即将开会的时候，波拿巴却早有戒备地解散了自己的这个团体，不过这种解散当然只是在纸面上，因为1851

年底,警察局长卡尔利埃还在一个详尽的报告书中徒劳地劝他真正解散十二月十日会。

当波拿巴还未能把国家军队变成十二月十日会时,十二月十日会仍然是他的私人军队。波拿巴在国民议会休会不久就在这方面作了初次的尝试,而且用的是他刚刚从国民议会手中索取来的钱。他是一个宿命论者,相信有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是人们特别是军人们所抵抗不住的。而首先被他列入这种力量的就是雪茄烟和香槟酒、冷盘禽肉和蒜腊肠。所以他一开始就在爱丽舍宫的大厅里用雪茄烟、香槟酒、冷盘禽肉和蒜腊肠款待了军官和军士。10月3日他在圣莫阅兵时,又对军队采用了这种办法;10月10日他在萨托里阅兵时,又更大规模地重复了这种办法。伯父回忆亚历山大远征亚洲,侄子就回忆巴克科斯在同一地方的征伐。不错,亚历山大是半神,而巴克科斯却是神,并且是十二月十日会的庇护神。

10月3日检阅后,常任委员会曾把陆军部长奥普尔召来质问,后者保证这类违反纪律的事情不再发生。大家知道,波拿巴怎样在10月10日履行了奥普尔的诺言。这两次阅兵都是由巴黎军队总司令尚加尔涅担任指挥的。这个尚加尔涅既是常任委员会的委员,又是国民自卫军的司令官;既是1月29日和6月13日的"救星",又是"社会中坚";既是秩序党的总统候选人,又是两个王朝的意中的蒙克;他以前从来没有承认自己是陆军部长的部属,一向公开嘲笑共和国宪法,以模棱两可的高傲的庇护态度追逐着波拿巴。现在他却热烈地拥护军纪,反对陆军部长;拥护宪法,反对波拿巴了。当10月10日有一部分骑兵高呼"拿破仑万岁!腊肠万岁!"时,尚加尔涅竟作了安排,至少使他的朋友诺马耶率领去受检阅的步兵严守沉默。在波拿巴的怂恿下,陆军部长为了惩罚诺马耶将军,以任命他为第十四师和第十五师的

司令官为借口，解除了他在巴黎的职位。诺马耶拒绝调换职务，因而被迫辞职。尚加尔涅于11月2日发布命令，禁止军队在持军械的情况下呼喊任何政治口号和进行任何示威。爱丽舍宫方面的报纸[323]攻击尚加尔涅；秩序党的报纸攻击波拿巴；常任委员会接连不断地召开秘密会议，会上一再提议宣布祖国处于危急状态；军队好像已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阵营，有两个敌对的总参谋部，一个在波拿巴的官邸爱丽舍宫，另一个在尚加尔涅的官邸土伊勒里宫。看来只需国民议会召开会议来发出战斗的信号了。法国公众对波拿巴和尚加尔涅之间这次纠纷的评判，和一位英国记者的评论相同，这位记者写道：

> “法国的政治女仆们正在用旧扫帚扫除革命的灼热熔岩，而她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又互相争吵得不可开交。”

这时，波拿巴急忙免除了陆军部长奥普尔的职务，随即把他派到阿尔及尔去，任命施拉姆将军继任陆军部长。11月12日波拿巴向国民议会送去了一篇美国式的冗长咨文①，其中充满了琐事，渗透着秩序的臭味，渴望调和，表示服从宪法，谈论到所有一切，只是没有谈论到当前的紧急问题。他好像是顺便指出，根据宪法的明确规定，军队的指挥权完全属于总统。这篇咨文是以下面一段极其庄严的词句结尾的：

> “**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　我只受誓言约束，我将谨守这个誓言给我划定的狭隘界限……**　至于我个人，我是人民选出的，我的权力完全是人民赋予的，我将永远服从人民的合法表示的意志。如果你们在本届会期中决定要修正宪法，那就由制宪议会来调整行政权的地位。否则人民将于1852年庄严地宣布自己的决定。可是不论将来的结局如何，我们总应该取得一种共识，永远不让

①1850年11月13日巴黎《总汇通报》第317号。——编者注

一个伟大民族的命运由热情、意外事故或暴力来主宰…… 我首先注意的问题不是弄清楚谁将在1852年治理法国，而是要运用我所能支配的时间使这个过渡时期不发生风波和乱子。我对诸位是开诚布公的。望你们以信任来回答我的诚意，以襄助来回答我的善念，其余的一切上帝会来照顾。”

资产阶级的有礼貌的、伪善而温和的、庸俗慈善的腔调，在十二月十日会的专权者兼圣莫和萨托里的野餐英雄的口中，暴露了它那最深长的含义。

关于这种内心剖白是否值得信任的问题，秩序党的卫戍官们总是心中有数的。誓言他们早已听厌了，他们自己的人中间就有许多政治上发伪誓的老手和巧匠；不过关于军队的那一段话，他们倒是没有听漏。他们愤懑地发觉：这个咨文非常烦琐地列举了最近颁布的各种法律，但是故意不提最重要的法律——选举法；不仅如此，在不修改宪法的情况下，这个咨文把1852年的总统选举委诸人民。选举法是拴在秩序党脚上的铅球，妨碍他们行动，当然更妨碍他们冲击！此外，波拿巴以正式解散十二月十日会和免除奥普尔的陆军部长职务的手法，亲手把替罪的羔羊献到祖国的祭坛上。他把预期发生的尖锐冲突缓和了下来。最后，秩序党自己也胆怯地竭力回避、缓和并抹杀和行政权发生的决定性的冲突。由于害怕失去在和革命进行斗争中所获得的一切，它让敌手攫取了它所获得的果实。“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秩序党从2月起就开始对革命这样叫喊；现在波拿巴在他的咨文中又对秩序党这样叫喊。“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波拿巴采取了图谋篡夺权位的行为，但是当秩序党因为这种行为而吵吵嚷嚷并且神经过敏地加以解释的时候，它就造成了“不安宁”。只要没有人谈到萨托里的腊肠，这腊肠是根本不会说话的。“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所以波拿巴要求让他安安静静地干他的事情，而议会党却由于双重

的恐惧而动弹不得：一怕重新引起革命的不安宁状态，二怕自己在本阶级即资产阶级眼中成为造成不安宁的人。既然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所以秩序党也就不敢用“战争”来回答波拿巴咨文中的“和平”了。公众本来以为在国民议会开会时准有好戏看，结果却大失所望。反对派议员要求常任委员会交出它关于十月事件的记录，但这个要求被多数否决了。人们根本规避一切可能激动人心的辩论。国民议会在1850年11月和12月的工作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直到12月底，才开始在议会的个别特权问题上爆发一场游击战。自从资产阶级以废止普选权暂时避开了阶级斗争的时候起，运动就沦为两个权力之间为特权问题发生的小小的口角。

有一位人民代表，名叫莫甘，因负债被法庭判罪。司法部长鲁埃在回答法院院长的询问时宣称，应当径直下令把负债者拘捕起来。于是莫甘就被投入债务监狱。国民议会得知这种谋害行为时，大为愤懑。它不仅决定立即释放被捕者，而且当晚[①]就通过自己的法警强制地把他从克利希监狱放出来了。可是，为了要证明自己信仰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并且暗中打算将来在必要时能够把讨厌的山岳党人安置到收容所去，国民议会又宣布说：在事先取得它的同意后，拘捕负债的人民代表是容许的。国民议会忘记宣布总统也可以因负债被捕入狱。国民议会把自己议员的不可侵犯权的最后一点影子都消灭无余了。

上面已经讲过，警官伊雍根据一个名叫阿莱的人的供词，告发了十二月十日会的一个支部阴谋暗杀杜班和尚加尔涅两人的计划。因此，议会总务官在第一次会议上[②]就提议设立一种特殊的议会警

①1850年12月28日晚。——编者注

②1850年12月29日举行的会议。——编者注

察，由国民议会本身的预算中的经费维持，完全不受警察局长管辖。内务部长巴罗什提出了抗议，说这是一种侵害他的职权的行为。结果双方达成了可怜的妥协，规定议会警官应由议会预算中的经费维持并由议会总务官任免，但是事先必须取得内务部长的同意。这时，政府已对阿莱提起诉讼，政府方面很容易就把阿莱的供词宣布为凭空捏造，并通过公诉人的嘴把杜班、尚加尔涅、伊雍和整个国民议会嘲笑了一顿。然后，12月29日，巴罗什部长又写信给杜班，要求把伊雍免职。国民议会委员会决定伊雍留任原职，可是国民议会由于自己在莫甘案件中采取了强制性的行动而忐忑不安，它习惯于在每次给予行政权打击后受到它两次回击，因此没有批准这个决定。国民议会为酬答伊雍的忠诚尽职而免了伊雍的职，因而丧失了自己所享有的一种议会特权，但这种特权对它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它所要对付的那个人，不是一个夜间决定白天要干什么的人，而是一个白天作决定夜间采取行动的人。

我们已经看到，国民议会在11月和12月间，总是极力避免和拒绝在重大的、迫切的问题上和行政权进行斗争。现在我们却看到，它不得不为了最微不足道的理由投入战斗。在处理莫甘案件时，它原则上已经允许逮捕负债的人民代表，不过有个条件，即这个原则只能运用于它不喜欢的人民代表身上，它为了这种可耻的特权和司法部长[①]发生了争执。国民议会没有利用关于有人准备谋杀杜班和尚加尔涅两人的消息要求追查十二月十日会的活动，并在法国和欧洲面前彻底揭穿波拿巴作为巴黎流氓无产阶级首领的真面目，它竟把冲突归结为在警官应由谁任免的问题上跟内务部长的争吵。这样，我

①欧·鲁埃。——编者注

们就看到，秩序党在这个时期始终都因自己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而不得不把自己反对行政权的斗争缩小为关于权限问题的无谓争吵，变成吹毛求疵、无谓争讼以及关于界限问题的争论，把最无聊的形式问题变成了自己的活动的内容。当斗争具有原则意义，行政权真正名誉扫地，国民议会的事业成为国民的事业的时候，秩序党不敢斗争，因为它如果要斗争，就会对国民发出一种进军令，而发动国民正是它最害怕的事情。因此，在这种场合，它总是否决山岳党的提案而转入日常议程。当秩序党已经放弃了大规模的斗争之后，行政权就静待时机，以便有可能当斗争只具有可以说是议会性的局部利害关系时，借一些无关紧要的理由重新开始这种斗争。那时秩序党将发泄出满腔的愤怒，拉开后台的幕布，揭开总统的面具，宣布共和国处境危急，然而那时它的热情令人感到荒唐，斗争的理由是一种虚伪的口实或根本不值得斗争的东西。议会的风暴原来不过是一杯水中的风暴，斗争不过是阴谋，冲突不过是吵架。各革命阶级都幸灾乐祸地观望着国民议会受屈辱，因为它们对国民议会的议会特权热心的程度，和国民议会对社会自由热心的程度一样；同时，议会外的资产阶级却不了解，为什么议会内的资产阶级居然把时间浪费在这样琐碎的纠纷上，为什么它竟这样无聊地跟总统对抗，从而危害安宁。当大家都在等候作战的时候进行媾和，而当大家都以为和约已经缔结的时候却又开始进攻，这种战略把议会外的资产阶级弄糊涂了。

12月20日，帕斯卡尔·杜普拉就发行金条彩票一事向内务部长提出质问。这彩票是“来自爱丽舍园的女儿”[324]。波拿巴和他的亲信把它献给人世，而警察局长卡尔利埃则把它置于自己的正式保护之下，虽然法国的法律除了以救济为目的的彩票外禁止发行任何其他彩票。彩票发行了700万张，每张一法郎，所得纯利据说是用来遣送

巴黎的游民到加利福尼亚去。一方面是为了用黄金梦来排除巴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梦想，用可望中头彩的诱人幻景来驱除作为教义的劳动权。自然，巴黎的工人们没有认出加利福尼亚的耀眼的金条就是从他们口袋里骗去的无光彩的法郎。无论如何，这种彩票不过是一种骗局而已。妄想不离开巴黎就能发现加利福尼亚金矿的游民，正是波拿巴本人和他的负债累累的亲信。国民议会同意给他的300万法郎已经用光，无论如何总得重新填满空虚的钱库。波拿巴为建立所谓的工人村曾向全国募集捐款，并且他自己在认捐名册上第一个认捐了一大笔款子，但他只是徒劳了一番。冷酷的资产者抱着不信任的态度等待他付出认捐的款子；而这笔款子自然是没有付出，于是利用社会主义空中楼阁进行的投机把戏就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金条的吸引力较大。波拿巴和他的同谋者并不满足于把700万法郎中扣除应兑现的金条以后的一部分纯收益装进自己的腰包，他们还制造了假彩票，同一个号码的彩票发出了10张、15张以至20张，这真是十二月十日会的金融手段啊！这里，国民议会所碰到的不是名义上的共和国总统，而是有血有肉的波拿巴。这里，国民议会可以在他犯罪——不是违反宪法，而是违反刑法典——的现场把他当场捉住。如果说国民议会以转入日常议程回答了杜普拉的质问，那么，它这样做不只是因为日拉丹要国民议会宣布自己“满意”的提案提醒了秩序党人想起他们自己的一贯的贪污行为。资产者，尤其是高升为政治家的资产者，总是用理论上的浮夸来弥补自己实践上的卑下。资产者身为政治家时，也和同他相对立的国家权力一样，俨然成为至高无上之物，因而与他作斗争时，也只能采取高尚的庄严的方式。

波拿巴是一个浪荡人，是一个骄横的流氓无产者，他比无耻的资产者有一个长处，这就是他能用下流手段进行斗争。现在，在国民

议会亲手帮助他顺利地走过了军人宴会、阅兵、十二月十日会以及违反刑法典等几处很容易滑倒的地点以后，他看到，他可以由伪装的防御转为进攻的时刻已经到了。司法部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和财政部长①所遭到的那些小小的失败，即国民议会借以表示愤懑的失败，很少使波拿巴感到不安。他不仅阻止了部长们辞职，从而阻止了承认行政权服从议会。他现在已经能完成他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就已经开始做的事情：军权和议会分立，**把尚加尔涅免职**。

爱丽舍宫的一家报纸发表了5月间似乎是向第一师颁发的一项紧急命令（因而是出自尚加尔涅的命令），劝告军官们遇有叛乱时不要宽容自己队伍中的叛徒，要立刻将他们枪毙，并且不要按国民议会的要求派遣军队。②1851年1月3日，内阁因这一紧急命令受到了质问。为了调查这一事件，内阁起初要求的限期是三个月，继则一个星期，最后仅仅是24小时，国民议会要求立即予以解释。尚加尔涅站起来声明说：从未下过这个紧急命令。他还补充说，他随时都准备执行国民议会的要求；遇有冲突发生时，国民议会可以信赖他。国民议会以狂热的鼓掌欢迎他的声明，并对他投了信任票。国民议会既委身于一个将军的私人保护之下，也就是放弃了权力，宣告自己的软弱和军队的万能。但是这位将军弄错了，因为他居然想把他只是由于波拿巴的封赏才持有的权力交付给国民议会去反对同一个波拿巴，并且盼望从这个议会，从他的需要保护的被托管者那里获得保护。可是尚加尔涅相信资产阶级从1849年1月29日起赋予他的那种神秘力量。他以为自己是和其他两个国家权力相鼎立的第三个权力。他所遭遇到的命运，也和当代的其他英雄，更确切地说，和当代的圣者们所遭遇

①欧·鲁埃、让·保·亚·施拉姆、罗·约·德福塞和阿·富尔德。——编者注

②1851年1月2日巴黎《祖国报》。——编者注

到的命运一样，这些人物的伟大只在于他们的党派故意替他们宣扬，而到局势要求他们创造奇迹时，他们就显得平庸无奇了。一般说来，不信神是这些假英雄和真圣者的死敌。因此，他们对那些冷酷无情的讽刺者和讥笑者表示庄严的道义的愤懑。

当晚[1]，内阁阁员们被召请到爱丽舍宫，波拿巴坚持要撤换尚加尔涅，五个阁员[2]拒绝署名。《通报》宣布内阁危机，而秩序党的报纸则以组织由尚加尔涅指挥的议会军相威胁。根据宪法，秩序党是有权这样做的。它只要任命尚加尔涅为国民议会议长，并调来任何数量的军队来保护自己的安全就够了。由于尚加尔涅实际上还统率着军队和巴黎国民自卫军，并且正等待和军队一起被调用，所以秩序党是可以更加放心地这样做的。波拿巴派的报纸甚至还不敢对国民议会直接调动军队的权利提出疑问，提出这种法律上的问题在当前局势下是不会有什么成效的。军队将听从国民议会调遣，这是可能的，要知道，波拿巴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才在巴黎找到两位将军（巴拉盖·狄利埃和圣让·丹热利）愿意在把尚加尔涅撤职的命令上签名。但是秩序党本身是否能在自己的队伍中和议会里找到通过这样一个决议所必需的票数，就很成问题了，要知道，过了一个星期就有286个议员脱离了秩序党，而且山岳党甚至在1851年12月，在最后的决定性的时刻还否决了一个类似的提议。不过，卫戍官们这时也许还能发动他们党内的群众去建立丰功伟绩，即藏身于枪林之后，并利用投到它阵营中的军队的帮助。可是，卫戍官先生们并没有这样做，1月6日晚上他们到爱丽舍宫去，希望用政治手段和论据规

①1851年1月3日晚。——编者注

②皮·茹·巴罗什、罗·约·德福塞、让·厄·杜·拉伊特、玛·路·皮·费·帕略和欧·鲁埃。——编者注

劝波拿巴放弃把尚加尔涅撤职的决定。劝谁就是承认谁是主事人。波拿巴由于卫戍官们的这种做法而增加了勇气，1月12日任命了新内阁，旧内阁的首领富尔德和巴罗什两人继续留任。圣让·丹热利当了陆军部长。《通报》刊载了把尚加尔涅撤职的命令，他的职权划分给指挥第一师的巴拉盖·狄利埃和指挥国民自卫军的佩罗了。社会中坚退职了，这虽然并没有使一块瓦片从屋顶上掉下来，但是使交易所的行情上涨了。

秩序党既然推开了由尚加尔涅作代表表示愿意听它指挥的军队，因而把这个军队永不复返地让给了总统，这就表明资产阶级已经丧失了统治的使命。议会制内阁已经不存在了。秩序党现在既已丧失了控制军队和国民自卫军的权力，那么它还剩下什么强制手段来同时保持议会用以统治人民的篡夺来的权力和议会用以防止总统侵犯的宪法的权力呢？什么也没有了。它现在只好求助于一些无力的原则，就连它自己也经常把这些原则看做只是责成第三者遵守而使自己能更加从容行动的一般规则。我们所研究的时期，即秩序党和行政权斗争的时期的前一部分，就以尚加尔涅被撤职和军权落入波拿巴之手而结束。现在，两个权力之间的战争已经正式宣布并且已在公开进行，不过是在秩序党既失去武器又失去士兵以后罢了。国民议会已经没有内阁，没有军队，没有人民，没有社会舆论，从5月31日通过选举法起就不再是有主权的国民的代表者了，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牙齿，没有一切，①逐渐变成了一个**旧法国高等法院**325，它让政府去行动，自己则满足于在事后发出唠叨的抗议。

秩序党以狂怒迎接了新内阁。贝多将军提醒大家记住常任委员

① 莎士比亚《皆大欢喜》第2幕第7场。——编者注

会在议会休会期间的温和态度，记住它由于过分慎重而拒绝把自己的议事记录公布出来。这时内务部长①自己也坚持公布这些记录，因为这些记录现在当然就像不新鲜的水一样已经走味，它暴露不出任何新的事实，对于厌倦的公众也不会有任何影响了。根据雷缪扎的建议，国民议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任命了一个“非常措施委员会”。巴黎未越出自己平常生活的常轨一步，尤其是因为这时贸易繁荣，工厂开工，粮价低廉，食品丰富，储蓄银行每天都收到新存款。议会所喧嚷的“非常措施”，不过是在1月18日通过了对内阁的不信任案罢了，而关于尚加尔涅将军连提都没有提到。秩序党不得不这样来提出自己的不信任案，是为了保证自己取得共和党人的票数，因为在内阁的一切措施中，共和党人只赞成尚加尔涅被撤职一项，而秩序党实际上也不能非难其余的措施，因为这些措施是它自己迫使内阁采取的。

1月18日的不信任案以415票对286票通过，就是说，只是由于极端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同纯粹共和党人和山岳党人的**联合**才得以通过。这就证明，秩序党不只失去了内阁，不只失去了军队，而且在自己和波拿巴的冲突中失去了自己的独立的议会多数；由于狂热地倾向妥协，由于害怕斗争，由于软弱，由于顾及亲属而眷恋国家薪俸，由于指望获得阁员的空缺（如奥迪隆·巴罗），由于那种经常使平庸的资产者为某种个人动机而牺牲本阶级的总的利益的庸俗的利己主义，一部分议员已经从秩序党阵营中开了小差。波拿巴派的议员们从最初起就只是在对革命进行斗争时才依附于秩序党。天主教党的首领蒙塔朗贝尔在那时已经把他个人的势力投到波拿巴方面，因为他已不相信议会党的生命力了。最后，这个党的首领们，奥尔良

①皮·茹·巴罗什。——编者注

派的梯也尔和正统派的贝里耶，不得不公开宣称自己是共和派，不得不承认，虽然他们的心是保皇派，而头却是共和派，议会制共和国是整个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唯一可能的形式。因此，他们不得不在资产阶级眼前把他们在议会背后继续努力从事的复辟计谋咒骂为危险而愚蠢的阴谋。

1月18日的不信任案是对内阁阁员的打击，而不是对总统的打击。可是撤换尚加尔涅的并不是内阁，而是总统。秩序党不应当向波拿巴本人问罪吗?不应当以他的复辟欲望作为罪名吗?可是，这种复辟欲望只不过是补充了秩序党自己的复辟欲望罢了。不应当以他在阅兵和十二月十日会中的阴谋活动作为罪名吗?可是秩序党早已把这些问题埋葬在一堆日常议程下面了。不应当以他撤换1月29日和6月13日的英雄，即撤换1850年5月曾威胁遇有叛乱发生时就四处放火烧光巴黎的那个人作为罪名吗?可是，秩序党的山岳党同盟者和卡芬雅克甚至根本不让它以正式表示同情来把倒台的社会中坚扶起来。秩序党自己不能否认总统拥有宪法赋予他的撤换将军的权力。秩序党之所以气愤，只是因为总统把宪法赋予他的权力当做反对议会的手段。可是，秩序党自己岂不是也不断地(特别是在废除普选权时)把它的议会特权当做违反宪法的手段吗?因此，秩序党只好严格地在议会范围内活动。1848年以来，在全欧洲大陆上流行着一种特殊的病症，即**议会迷**，染有这种病症的人就变成幻想世界的俘虏，失去一切理智，失去一切记忆，失去对外界世俗事物的一切理解——只有这种议会迷才可以说明，为什么秩序党在它已亲手消灭了议会势力的一切条件并在它反对其他阶级的斗争中不得不消灭了这些条件之后，仍然把它的议会胜利看做胜利，并且以为打击了总统的内阁阁员也就是打击了总统本人。这样，秩序党只是让总统得到一次机会在国

民面前重新凌辱国民议会罢了。1月20日,《通报》报道说,内阁全体辞职已被批准。波拿巴以已经没有一个议会党占据多数(这一点已由1月18日的投票,即山岳党和保皇党联合产生的果实所证明),而新的多数又尚待形成为借口,任命了一个所谓的过渡内阁,其中没有一个人是议会议员,全都是些毫不知名的和微不足道的人物,这是个纯粹由一些听差和文书组成的内阁。秩序党现在可以把自己的精力花费在跟这些傀儡打交道上面了;而行政权则不再认为自己在国民议会中需要有什么认真的发言人了。波拿巴的内阁阁员越是成为单纯的哑配角,波拿巴就越是明显地把全部行政权集中在他一人身上,越容易利用行政权来达到个人目的。

为了报复,秩序党和山岳党联合起来,否决了给予总统180万法郎补助金的提案,这个提案是由十二月十日会的首领命令他的听差阁员们提出来的。这一次,问题是由不过102票的多数票决定的,由此可见,秩序党从1月18日以来又丧失了27票;它的解体又进了一步。同时,为了使人不致对它和山岳党联合的用意发生丝毫怀疑,它甚至对189名山岳党人联名提出的关于大赦政治犯的议案不屑一顾。只要那个叫做瓦伊斯的内务部长出来声明说,安宁只是表面的安宁,有人在加紧进行秘密鼓动,到处都有人组织秘密团体,民主派报纸又准备重新出版,从各省传来不利的消息,日内瓦的流亡者正在主持一个通过里昂遍及法国南部全境的阴谋活动,法国处于工商业危机的前夜,鲁贝市的厂主们缩短了工作时间,贝勒岛[326]的囚犯已经骚动起来——只要瓦伊斯这么一个人唤来赤色幽灵,秩序党不经讨论就立刻否决了一个将使国民议会获得极大的声望并迫使波拿巴重新投入它的怀抱的提案。秩序党本来不应当被行政权所描绘的新骚动的远景吓住,而应当让阶级斗争有些活动余地,以便把行政权控

制在从属于自己的地位。可是，秩序党没有感觉到自己有能力担负这种玩火的任务。

可是，所谓的过渡内阁却一直勉强维持到4月中旬。波拿巴不断地以组织新内阁的把戏来搅扰和愚弄国民议会。他时而表示要组织一个有拉马丁和比约参加的共和党内阁，时而表示要组织一个不免要有奥迪隆·巴罗（凡是需要有个易于愚弄的蠢才时总是少不了他）参加的议会制内阁，时而又表示要组织一个有瓦蒂梅尼尔和贝努瓦·达济参加的正统派内阁，时而又表示要组织一个有马尔维尔参加的奥尔良派内阁。波拿巴用这种方法使秩序党各派之间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并以共和党内阁的出现以及因此必然会使普选权恢复的远景来恫吓整个秩序党，同时又竭力让资产阶级相信，他组织议会制内阁的真诚努力由于保皇派集团的不调和态度而受挫。而日益逼近的普遍商业危机越是为社会主义在城市中招募信徒，低落得招致破产的粮价越是为社会主义在农村中招募信徒，资产阶级就越是响亮地要求“强有力的政府”，越是认为使法国陷于“没有行政”的状态是不可宽恕的。商业萧条日益加重，失业者显著增多，巴黎至少有上万的工人没有饭吃，在鲁昂、米卢斯、里昂、鲁贝、图尔宽、圣艾蒂安、埃尔伯夫等地，无数的工厂停了工。在这种情况下，波拿巴就敢于在4月11日恢复了1月18日的内阁，除了鲁埃、富尔德、巴罗什及其他先生们而外，还添进了莱昂·福适先生，这个福适先生曾因散发伪造的电讯而被制宪议会在最后几天一致（除五个内阁阁员外）投了不信任票。这样，国民议会曾在1月18日取得了对内阁的胜利，它和波拿巴斗了三个月，只不过是为了在4月11日让富尔德和巴罗什能够把清教徒福适当做第三者接受到自己的内阁同盟中去而已。

1849年11月，波拿巴满足于**非议会制**内阁，1851年1月，他满足

于**超议会制**内阁，而到4月11日，他已经觉得有充分的力量来组织一个**反议会制**内阁了，这一内阁把两个议会——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即共和派议会和保皇派议会所表示的不信任协调地结合在自己身上。内阁的这种演变，是议会可以用来测定其体温下降的温度计。这种体温到4月底已经降得非常之低，以致佩尔西尼能够在私人谈话中建议尚加尔涅投到总统方面去。他向尚加尔涅保证：波拿巴认为国民议会的势力已经彻底被消灭，并且已经拟定了预备在政变后发表的宣言，这个政变已经经过深思熟虑，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才又延迟下来。尚加尔涅把这个讣告通知了秩序党的首领们。但是谁会相信臭虫咬人能致人于死命呢？议会虽然已经虚弱无力，完全瓦解，奄奄一息，但是它毕竟还不能使自己把和十二月十日会[125]的小丑一般的头目的决斗看做一种不同于和臭虫的决斗。然而波拿巴像阿革西拉乌斯回答国王亚奇斯那样回答了秩序党：**“你把我看做蚂蚁，但是总有一天我会成为狮子的。”**[327]

六

秩序党在徒劳地力图保持军权和夺回已经丧失的对于行政权的最高领导权时，不得不去跟山岳党和纯粹共和党人进行联合，这就确凿地证明，秩序党已经失去了独立的**议会多数**。日历的无情的力量、钟表的时针，在5月28日发出了秩序党彻底瓦解的信号。5月28日是国民议会生命的最后一个年头的开始。国民议会现在必须解决一个问题：是原封不动地保存宪法呢，还是把它加以修改。但是，修改宪法就不只意味着，是资产阶级统治还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统治，是民主主义还是无产阶级无政府状态，是议会制共和国还是波拿巴，而且意味着，是奥尔良王朝还是波旁王朝！这样，在议会内部就出现了厄里斯的金苹果，秩序党内利益彼此矛盾的各个敌对派别将围绕着它展开公开的斗争。秩序党是各种不同社会成分的结合体。修改宪法的问题造成了一种政治热度，它使这个产物重又分解为它原来的各个构成部分。

波拿巴派关心修改宪法的原因很简单。他们首先想废除禁止再度选举波拿巴的第45条和延长他的权力期限。共和派的立场也很简单。他们无条件地反对任何修改，认为修改宪法是反对共和国的周密的阴谋。因为他们在国民议会中拥有**四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依照宪法又必须要有四分之三的票数赞成才能合法地决定修改宪法和召集修改宪法的专门会议，所以他们只要计算一下自己的票数，就可以相

信自己必获胜利了。他们当时确实是相信自己一定会胜利的。

和这些明确的立场相反，秩序党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中。如果它拒绝修改宪法，它就会使现状受到威胁，因为这样就会使波拿巴只有使用暴力一个出路，并且会使法国在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这个决定时刻听任革命的无政府状态摆布，那时，总统是失去了权威的总统，议会是早已没有权威的议会，人民则是企图重新争得权威的人民。如果它投票支持按照宪法修改宪法，那么它知道自己的投票是枉然的，一定会被共和派按照宪法进行的否决所推翻。如果它违背宪法，宣布只要有简单多数通过就够了，那么它就只有在自己完全服从行政权的条件下才能有希望制服革命；这样它就把宪法、宪法的修改和它本身一并交给波拿巴掌握了。为延长总统权力而作局部的修改，将为帝制派篡夺权力开辟道路。为缩短共和国寿命而作全面的修改，又必然会引起各个王朝的要求之间的冲突，因为波旁王朝复辟的条件和奥尔良王朝复辟的条件不仅各不相同，而且是互相排斥的。

议会制共和国已不仅是法国资产阶级中的两派（正统派与奥尔良派，即大地产与工业）能够平分秋色的中立地盘。它还是他们**共同**进行统治的必要条件，是他们的共同阶级利益借以支配资产阶级各派的要求和社会其他一切阶级的唯一的国家形式。作为保皇派，他们又重新陷入他们旧有的对抗状态，卷入地产和金钱争夺霸权的斗争，而这种对抗状态的最高表现，这种对抗状态的化身，就是他们各自的国王，他们各自的王朝。正因为如此，秩序党总是反对**召回波旁王族**。

奥尔良派的人民代表克雷通，在1849年、1850年和1851年曾定期地建议废除放逐王族的法令。议会同样定期地表演保皇派集会顽强地阻挡其被逐国王返国的场面。理查三世在杀死亨利六世时曾对

他说，他太好了，这个尘世容纳不了他，他的位置在天上[①]。保皇派认为法国太坏了，不配再有自己的国王。形势迫使他们成为共和派并一再认可人民作出的把他们的国王逐出法国的决定。

修改宪法（而这个问题由形势所迫又不得不加以考虑）不仅会使共和国成为问题，而且会使资产阶级两派的共同统治成为问题；不仅会使君主国有恢复的可能，而且会复活君主国曾轮流优先代表的那些利益之间的竞争，复活两派之间争夺霸权的斗争。秩序党的外交家们希望以两个王朝的结合，即以各个保皇派和它们的王室的所谓**融合**来中止这一斗争。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真正融合便是议会制共和国，在这一共和国中，奥尔良派和正统派双方的色彩都脱落了，各类的资产者都消融为一般的资产者，消融为资产者这个类属了。现在奥尔良派应当变成正统派，正统派应当变成奥尔良派。体现着他们的互相对抗的君主国，应当成为他们彼此统一的化身；他们互相排斥的派别利益的表现，应当成为他们的共同的阶级利益的表现；这个君主国应当完成只有在废除两个君主国的情况下共和国才能完成和已经完成的任务。这就是秩序党的术士们绞尽脑汁制造出来的哲人之石。仿佛正统派的君主国可能在什么时候变成工业资产者的君主国，或是资产者王权可能在什么时候变成世袭土地贵族的王权。仿佛地产和工业能够在**同一顶**王冠下面称兄道弟，可是王冠只能落到一个人头上——不是落到哥哥头上，就是落到弟弟头上。仿佛在地产还没有决心自动变成工业财产以前，工业可以完全和地产和解。如果亨利五世明天逝世，巴黎伯爵不会因此就成为正统派的国王，除非他不再是奥尔良派的国王。但是，从事融合的哲人随着宪法修改问题被提到

①莎士比亚《理查三世》第1幕第2场。——编者注

突出地位而自我膨胀起来，把《国民议会报》变成自己的正式的机关日报，并且现在（1852年2月）又在努力活动——这些哲人认为一切困难都是由于两个王朝的对抗和竞争。想使奥尔良王室和亨利五世和解的尝试，从路易-菲力浦逝世时就已经开始，但这种尝试也像只是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在幕间休息时，在后台进行的一切王朝阴谋一样，与其说是郑重的事情，不如说是对旧日的迷信暗送秋波，这种尝试现在已经变成大型政治历史剧，秩序党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把它当做票友戏，而是把它搬上公开的舞台。信使不断从巴黎奔到威尼斯①，再从威尼斯奔到克莱尔蒙特[101]，又从克莱尔蒙特奔到巴黎。尚博尔伯爵发表了一个宣言，他在这个宣言中"在他全家族的支持下"，宣布"国民的"，而不是他自己的复辟。奥尔良派的萨尔万迪跪倒在亨利五世脚下，正统派的首领贝里耶、贝努瓦·达济和圣普里跑到克莱尔蒙特去劝说奥尔良王室，但是徒劳无功。融合派在太晚的时候才觉察到，资产阶级两派的利益既然集中地表现为家族利益即两个王室的利益，那么它们的利益就会互相排斥，而不会互相通融。假定亨利五世承认巴黎伯爵是他的继承人（这是融合派在最好的情况下所能指望的唯一成就），那么奥尔良王室除了因亨利五世没有后嗣本来就一定能够获得的东西外，并不会获得别的权利，可是它会因此丧失它从七月革命获得的一切权利。奥尔良王室将放弃自己旧日的要求，放弃它在差不多100年的斗争中从波旁王室长系手里夺得的一切权利，它将要为了宗族的特权而放弃自己的历史特权，即现代君主国的特权。所以，融合无非就是奥尔良王室自愿退让，向正统派让权，忏悔地从新教国教后退到天主教国教。这种后退甚至不可能把奥尔良王

---

①19世纪50年代尚博尔伯爵住在威尼斯。——编者注

室送上它所失去的王位，而只能把它送上它诞生时所占据的通向王位的台阶。旧日的奥尔良派阁员基佐、杜沙特尔等人，也赶快跑到克莱尔蒙特那里去为融合游说，实际上他们只是表现了对七月革命的悔恨，表现了对资产者王权和资产者所拥有的王权的失望，表现了对正统派的迷信，把它作为防止无政府状态的最后的护符。他们自命为奥尔良王室和波旁王室之间的调停者，事实上他们只不过是奥尔良派的变节分子，而茹安维尔亲王就是把他们当做这种人来看待的。然而，奥尔良派富有生命力的、好战的那部分人，如梯也尔、巴兹等，却因此更容易使路易-菲力浦家族确信，既然君主制的任何直接的复辟都要以两个王朝的融合为前提，而任何这样的融合又都要以奥尔良王室引退为前提，那么，暂且承认共和国，等到事变允许把总统的安乐椅变成王位时再说，这样做是和他们先辈的传统完全相适合的。起初有传言说茹安维尔要当共和国总统的候选人，公众的好奇心被激发起来了，过了几个月，到9月间，在宪法修改案已被否决以后，这个候选人就被公开宣布了。

这样一来，奥尔良派和正统派之间搞保皇主义融合的尝试，不仅遭到了失败，而且还破坏了他们在**议会中的融合**，破坏了把他们联合起来的共和国形式，把秩序党又分解成原来的各个构成部分。但是，克莱尔蒙特和威尼斯之间越是疏远，它们之间的和解越是近于破裂，支持茹安维尔的煽动越是加紧，波拿巴的内阁阁员福适和正统派之间的谈判，也就越是热烈，越是认真了。

秩序党的解体还不止于分解成原来的构成部分。这两大派别中的每一派，又都继续分解下去。看来，先前两大营垒中的每一个营垒（不论是正统派或奥尔良派）内部曾经互相斗争互相排斥的一切旧有色彩，如同干纤毛虫碰到了水一样，又都重新活起来了。看来，他们又

重新获得了充分的生命力，能够形成具有互相对立的独立利益的各个派别了。正统派在梦中回味土伊勒里宫和马松阁之间的争吵、维莱尔和波林尼雅克之间的争吵。[328]奥尔良派重温基佐、摩莱、布罗伊、梯也尔和奥迪隆·巴罗之间比武的黄金时代。

秩序党中有一部分人赞成修改宪法，可是对于修改的范围，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在这部分人中，有贝里耶和法卢为一方、拉罗什雅克兰为另一方所领导的正统派，有摩莱、布罗伊、蒙塔朗贝尔和奥迪隆·巴罗所领导的那些疲于斗争的奥尔良派；这部分人和波拿巴派的议员一致提出了如下一个含义广泛而不明确的建议：

> “下面署名的议员建议对宪法进行修改，目的在于把国民主权的完整行使权还给国民。”

同时，这些议员通过自己的报告人托克维尔一致声称：国民议会无权建议**废除共和国**，这个权利只能属于为修改宪法而召集的议会。此外，他们声称，宪法只能在**“合法的”基础**上，就是说，只有在按照宪法规定的四分之三多数票赞成修改时才能修改。经过六天的激烈讨论之后，7月19日，宪法修改案果然被否决了。赞成修改的有446票，反对修改的有278票。极端的奥尔良派梯也尔、尚加尔涅等人在表决时和共和派及山岳党采取了一致行动。

这样，议会的多数表示反对宪法，而宪法本身却表明支持议会的少数，表明议会少数的决议是具有约束力的。可是，秩序党在1850年5月31日和1849年6月13日不是曾经使宪法服从议会多数吗？它以前的全部政策不都是以宪法条文服从议会多数决议为基础的吗？它不是曾经让民主派以迷信旧约的态度去对待法律的字眼，并因为这种迷信而处罚了民主派吗？可是目前，修改宪法无非就是要延长总统

掌权的期限，而延长宪法的寿命无非就是要罢免波拿巴。议会表示拥护波拿巴，而宪法表明反对议会。所以，当波拿巴撕毁宪法时，他的行动是合乎议会精神的，而当他解散议会时，他的行动又是合乎宪法精神的。

议会宣布了宪法，同时也就是宣布议会本身的“不依靠多数”的统治；议会以自己的决议废除了宪法，延长了总统掌权的期限，同时也就是宣布，只要它本身还继续存在，宪法就不可能死亡，总统的权力也不可能生存。它未来的掘墓人已经站在门前了。当议会正忙于讨论修改宪法的问题时，波拿巴撤销了表现得不坚决的巴拉盖·狄利埃将军第一师指挥官的职务，任命马尼昂将军继任该职，这位将军是里昂的胜利者[314]，十二月事变的英雄，波拿巴的爪牙之一，早在路易-菲力浦时期就由于布洛涅征讨事件而在某种程度上代替波拿巴出了丑。

秩序党关于修改宪法的决议表明，它既不能统治，又不能效劳；既不能生，又不能死；既不能容忍共和国，又不能推翻共和国；既不能维护宪法，又不能废除宪法；既不能和总统合作，又不能和总统决裂。它究竟是期待谁来解决一切矛盾呢？期待日历，期待事变的进程。它不再相信自己有能力控制事变。因此，它就把自己交给事变支配，交给一种力量支配，它在反对人民的斗争中已经向这种力量让出了一个又一个阵地，直至它自己在这种力量面前变得毫无权力为止。为了使行政权的首脑能够更顺利地拟订出对付它的战斗计划，加强自己的进攻手段，选择自己的工具和巩固自己的阵地，秩序党在这个紧急关头决定退出舞台，使议会从8月10日到11月4日休会三个月。

不仅议会党分裂为原来的两大集团，不仅其中的每一个集团又各自再行分裂，而且议会内的秩序党和议会外的秩序党也分裂了。资产阶级的演说家和作家，资产阶级的讲坛和报刊，一句话，资产阶级

的意识形态家和资产阶级自己，代表者和被代表者，都互相疏远了，都不再互相了解了。

外省的正统派，由于眼界狭小和过分狂热，责备他们的议会领袖贝里耶和法卢投奔波拿巴阵营和背叛了亨利五世。他们的百合花[85]的头脑只相信造孽行为，不相信外交手腕。

商业资产阶级和它的政治家之间的分裂更加危险，更具有决定的意义。正统派责备自己的政治家背弃了原则，而商业资产阶级却正好相反，责备自己的政治家固守已经变得无用的原则。

前面我已经指出，自从富尔德加入内阁以来，那一部分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握有绝大部分权力的商业资产阶级，即**金融贵族**，已经变成波拿巴派了。富尔德不仅在交易所中维护波拿巴的利益，而且也在波拿巴面前维护交易所的利益。关于金融贵族的态度，他们的欧洲机关刊物即伦敦的《经济学家》杂志中的一段话作了最贴切的说明。这个杂志在1851年2月1日那一期上发表了如下的巴黎通讯：

> “现在我们从各方面都得到证实，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总统在他致立法议会的咨文中声明了这一点；国民讲台上也有人响应了这一点；报纸上再三重复说到这一点；教堂的教坛上也宣扬这一点；**国债券对于最小的破坏安宁的事件的敏感及其在行政权每次获胜时的稳定，也证明这一点。**”

《经济学家》杂志在1851年11月29日那一期上以自己的名义宣称：

> **“在欧洲所有的证券交易所中，总统现在已被公认为秩序的卫士。”**

可见金融贵族指责秩序党对行政权进行的议会斗争是**破坏秩序**，而把总统对秩序党那些所谓的代表的胜利当做**秩序的胜利**来欢

呼。这里所说的金融贵族,应当理解为不只是那些国债的大债权人和大投机者,这些人的利益当然是和国家政权的利益相吻合的。全部现代金融业、全部银行业,都是和公共信用极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银行的部分营业资本必然要投入容易兑现的国债券以收取利息。银行存款,即交给银行并由银行在商人和工业家之间分配的资本,有一部分是从国债债权人的红利中得来的。既然在一切时代国家政权的稳定对整个金融市场和这种金融市场的牧师们来说是摩西和先知,那么现在,当任何大洪水都有把旧国债同旧国家一齐从地面上冲掉的危险时,又怎能不是这样呢?

狂热地渴望秩序的**工业资产阶级**,也对议会内的秩序党和行政权争吵不休感到烦恼。梯也尔、昂格勒斯、圣贝夫等人在1月18日因尚加尔涅免职事件投票以后,也受到他们的选民们(而且正是工业区的选民)的公开谴责,特别是他们跟山岳党成立联盟的行为被指斥为背叛秩序。如果说,像我们已经看到的,秩序党和总统的斗争不过是些言过其实的嘲弄和琐屑无聊的攻讦,不配受到好的待遇,那么,另一方面,对这部分要求自己的代表们顺从地把军权从自己的议会手中奉送给冒险的王位追求者去掌握的资产阶级,就连那些曾为他们的利益而采用过的攻讦手段也不值得采取了。这部分资产阶级表明,为了保持他们的**公共**利益、他们本**阶级的利益**、他们的**政治权力**而进行的斗争,是有碍于他们私人的事情的,因而只是使他们感到痛苦和烦恼。

当波拿巴巡游各地时,外省城市的资产阶级显贵、市政官员、商业法庭的法官等等,到处都几乎毫无例外地以极卑屈的态度迎接他,甚至当他在第戎肆无忌惮地攻击国民议会,特别是攻击秩序党的时候,也是这样欢迎他。

当商业情况良好的时候(1851年初还是这样),商业资产阶级激烈地反对任何议会斗争,生怕这种斗争会使商业吃亏。当商业情况不好的时候(从1851年2月底起已成为经常现象了),商业资产阶级就抱怨议会斗争是商业停滞的原因,并要求为了活跃商业停止这种斗争。关于修改宪法的讨论恰好发生在这种不景气的时期。因为当时涉及到现存政体的生死存亡问题,所以资产阶级就更有理由要求它的代表们终止这种痛苦的过渡状态,同时又保持现状。这里面没有任何矛盾。它所理解的终止过渡状态,正是延长过渡状态,将应当做出决断的时刻拖延到遥远的将来。保持现状只能有两种方法:一是延长波拿巴掌权的期限,一是让波拿巴按照宪法退职,选出卡芬雅克来。一部分资产阶级倾向于后一种解决方法,可是他们除了叫他们的代表保持沉默,不去触动这个迫切的问题以外,提不出更好的建议。他们以为,如果他们的代表不出来讲话,波拿巴就不会行动了。他们希望有一个为了不让人看见而把头藏起来的鸵鸟议会。另一部分资产阶级希望让已经坐在总统位子上的波拿巴留任总统,一切照旧不变。他们感到愤慨的是,他们的议会没有公开违背宪法和率直地放弃权力。

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从8月25日起先后召开会议的各省委员会(大资产阶级的地方代议机关),几乎一致表示赞成修改宪法,即反对议会,拥护波拿巴。

资产阶级对于自己的著作界代表和自己的报刊所表现的愤怒,比它跟**议会代表们**的破裂更为明显。只要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抨击一下波拿巴篡夺权力的欲望,只要报刊企图保护一下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不受行政权侵害,资产者陪审团就判以数额异常巨大的罚款和不光彩的监禁,这种情况不仅使法国,而且使整个欧洲都感到

惊愕。

前面我已经指出，**议会内的秩序党**由于叫嚣要安宁而自己也得安宁，它在反对其他社会阶级的斗争中亲手破坏了自己的制度即议会制度的一切条件，从而宣布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同资产阶级的安全和生存是不相容的，相反，**议会外的资产阶级群众**却对总统奴颜婢膝，诋毁议会，粗野地对待自己的报刊，要求波拿巴压制和消灭资产阶级中从事宣讲和写作的分子，即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著作家、资产阶级的讲坛和报刊，以便能够在不受限制的强硬的政府的保护下安心地从事他们私人的事情。议会外的资产阶级毫不含糊地声明说，它渴望摆脱自己的政治统治地位，以便摆脱这种统治地位带来的麻烦和危险。

这个议会外的资产阶级，对于为它本阶级的统治而进行的单纯的议会斗争和文字斗争表示激愤，并且出卖了这一斗争的领袖人物；但是现在它却敢于在事后责备无产阶级没有为它进行你死我活的流血战斗！这个资产阶级时刻都为最狭小最卑鄙的私人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全阶级的利益即政治利益，并且要求自己的代表人物也作同样的牺牲；但现在它却哀叫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物质利益而牺牲了它的理想的政治利益。它装得像个好心肠的人，而被社会主义者引入歧途的无产阶级却不了解它，并且在紧要关头抛弃了它。它的这种哀叫在整个资产阶级世界中得到了普遍的共鸣。自然，这里我不是指德国那些小政客和浅学之辈。我指的是例如前面提到过的那个《经济学家》杂志。这个杂志在1851年11月29日，即政变前四天还宣布波拿巴是“秩序的卫士”，而梯也尔和贝里耶是“无政府主义者”，到1851年12月27日，当波拿巴驯服了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之后，它又大叫大喊，说什么“无知的、没有教养的、愚蠢的无产阶级群众”背叛了“社会中

等和上等阶层的才能、知识、纪律、精神影响、智力源泉和道德威望”。而愚蠢、无知和卑鄙的一群不是别人，正是资产阶级本身。

的确，法国在1851年是遭受了一次小小的商业危机。2月底，出口比1850年减少了；3月，商业衰落，工厂关闭；4月，各工业省的情况好像和二月事变后一样令人失望；5月，情况还没有好转；6月28日，法兰西银行的结算仍以存款数量猛增和贴现数量锐减表明了生产的停滞；直到10月中旬，情况才逐渐好转。法国资产阶级把这种商业停滞说成是纯粹由于政治原因，由于议会和行政权之间的斗争，由于临时政体的不稳定，由于1852年5月第二个星期日[293]的可怕远景。我并不否认所有这些情况都对巴黎和各省的某些工业部门的衰落有影响。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政治局势的影响只是局部的，而且是很微小的。商业开始好转正是在10月中旬，恰好是在政治局势恶化、政治的地平线上笼罩着乌云、每分钟都可能从爱丽舍园打来霹雳的时候，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虽然法国的资产者所具有的“才能、知识、洞察力和智力源泉”越不出他们自己的鼻尖，但是他们在伦敦工业博览会[329]整个会期内总能用鼻子触到自己的商业情况不利的原因吧。当法国工厂关闭的时候，英国爆发了商业破产。法国在4月和5月达到顶点的是工业恐慌，而英国在4月和5月达到顶点的则是商业恐慌。无论是在法国或英国，毛纺织业和丝纺织业的情况都很不妙。虽然英国的棉纺织工厂还在继续生产，但是它们所获得的利润已不像1849年和1850年那样大了。不同点只在于法国发生的是工业危机，而英国发生的则是商业危机；法国是工厂关闭，而英国则是生产扩大，不过是在不如前几年那样顺利的条件下扩大的；在法国，受打击最重的是出口，而在英国则是进口。其共同原因（当然不应在法国政治地平线的范围内去寻找）是显而易见的。1849年和1850年是物质

大繁荣和生产过剩的两个年头，这种生产过剩本身直到1851年才显露出来。这年年初，生产过剩因工业博览会即将举行而特别加重了。除此以外，还有下面一些特殊情况：起初是1850年和1851年的棉花歉收，然后是人们确信棉花的收成会比预期的好，棉价起初是上涨，后来突然跌落，一句话，就是棉价涨跌不定。生丝产量至少在法国是低于平均产量。最后是毛纺织业自1848年以来飞速发展，使得羊毛的生产跟不上，而原毛的价格上涨与毛纺织品的价格相比非常不相称。这样，我们就在上述三个世界性工业部门所需的原料方面找到引起商业停滞的三重原因。除了这些特殊情况以外，1851年的表面上的危机，无非是在生产过剩与过度投机还未用尽所有力量疯狂地跑完工业循环的最后阶段并重新回到自己的出发点，即回到**普遍的商业危机**去以前，每次在工业循环中都会造成的那种停顿。在商业史上的这种间隙时期中，英国发生了商业的破产，而法国却是工业本身陷于停顿，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法国工业已经经受不住英国人的竞争而被排挤出所有的市场，另一方面是由于法国工业是奢侈品工业，每当出现商业的停滞，它都首当其冲。这样一来，法国除了普遍危机之外，还经受本国的商业危机，不过，这种商业危机为世界市场一般情况所决定和制约的程度，比它受法国地方影响决定和制约的程度要大得多。这里不妨把英国资产者的推断拿来和法国资产者的偏见对比一下。利物浦的一家大商行在1851年的年度商业报告中写道：

“很少有哪一年像刚刚过去的这一年这样辜负人们年初对它所寄托的希望了。这一年不但没有大家一致预期的大繁荣，反而成了最近25年来最令人沮丧的年头。这自然只是对商业阶级，而不是对工业阶级而言。可是，在这年年初，无疑是有可靠的根据来预期相反的情形：产品贮藏很少，资本充足，食品价格低

廉，秋季丰收在望；在大陆有稳固的和平，在本国又没有任何政治上或财政上的困难，的确，看来商业是完全可以展翅高飞的…… 这一不幸的结果究竟应归罪于什么呢？我们认为应归罪于进出口**贸易额过分庞大**。如果我们的商人自己不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较狭小的范围内，那么，除了三年一度的恐慌以外，什么东西也不会使我们保持均衡。”

现在我们想象一下法国资产者在这种商业恐慌中的情形：他们的生意经的病态头脑每天都被这样一些东西所折磨、搅扰和麻痹，这就是关于政变和恢复普选权的种种谣传、议会和行政权的斗争、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攻讦、法国南部共产主义的密谋活动、涅夫勒省和谢尔省臆想的农民起义、各个总统候选人的自吹自擂、报纸上各种大肆宣扬的口号、共和派要以武力保卫宪法和普选权的威胁、流亡国外的英雄们预告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将是世界末日的文告，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资产者在融合、修改、延期、宪法、密谋、联合、亡命、篡权和革命等难以形容的喧嚣的混乱中气急败坏地向自己的议会制共和国喊道：**“无终结的恐怖，还不如以恐怖告终！”**

波拿巴懂得这种喊声。债权人急躁情绪的日益增长，使得他的理解力更加敏锐。这些债权人发觉，每当太阳落山，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天即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就愈益临近，这是天上星辰的运行在反对他们的人间的票据。债权人变成了真正的占星家了。国民议会使波拿巴丧失了靠宪法来延长其掌权期限的希望，茹安维尔亲王的候选人资格已不允许他再犹豫动摇了。

如果说有过什么事变在它尚未到来之前老早就把自己的影子先投射出来的话，那么这就是波拿巴的政变了。波拿巴早在1849年1月29日，即在他当选刚过一个月的时候，就已向尚加尔涅提出了这

种建议。关于政变的政策，他自己的内阁总理奥迪隆·巴罗在1849年夏天委婉地谈到过，而梯也尔则在1850年冬天公开地揭露过。1851年5月，佩尔西尼曾经再度企图取得尚加尔涅对于政变的赞同，而《国民议会通报》公布了这些谈判。每逢议会发生风波时，波拿巴派的报纸就以政变相威胁；危机越是接近，它们的声调就越放肆。在波拿巴每夜和打扮成绅士淑女的骗子欢聚的狂宴上，一到午夜，当豪饮使他们畅所欲言并激起他们的幻想时，政变总是指定在第二天早晨举行。利剑出鞘，酒杯相碰，议员被抛出窗外，皇袍加在波拿巴身上，而一到早晨，幽灵便又消失，吃惊的巴黎从直率的修女和不慎重的武士们的口里才知道它又度过了一次危险。在9月和10月两个月间，关于政变的谣传一刻也没有停息过。影子像彩色的银版相片一样已染上了各种色彩。只要翻一翻9月和10月的欧洲报纸，就可以找到这类情况的报道："巴黎到处流传着政变的谣言。听说首都今天夜间就要被军队占领，而明天早晨就会有解散国民议会、宣布塞纳省戒严、恢复普选权并诉诸人民的法令出现。听说波拿巴正在寻找阁员来执行这些非法的法令。"提供这些消息的报道总是以不祥的"**延期**"一语结束。政变始终是波拿巴的固定观念。他是抱着这个观念重回法国的。他满脑子都是这个观念，以致经常流露于言谈之间。他十分软弱，因此又经常放弃这个观念。对巴黎人来说，这个政变的影子像幽灵一样习以为常，以致当这个政变终于有肉有血地出现时，巴黎人还不愿意相信它。可见，政变之所以成功，根本不是由于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严守秘密和国民议会方面受到没有预料到的袭击。不管**波拿巴**怎样泄露秘密，不管**国民议会**怎样事先完全知悉内情，这个政变都是会成功的，因为这是先前的事变进程的必然而不可避免的结果。

10月10日，波拿巴向内阁阁员们宣布他决定恢复普选权；10月

16日内阁阁员辞职;10月26日巴黎知道了托里尼内阁组成的消息。同时,警察局长卡尔利埃由莫帕代替,而第一师师长马尼昂把最可靠的团队调到了首都。11月4日国民议会宣布复会。国民议会除了把它已学过的课程按简单扼要的提纲复习一遍并证实自己是在死后才被埋葬之外,是别无他事可做了。

国民议会在和行政权的斗争中失掉的第一个阵地就是内阁。国民议会不得不把纯系摆样子的托里尼内阁当做完备的内阁接受下来,以此来庄严地承认这个失败。当日罗先生以新内阁名义向常任委员会作自我介绍时,常任委员会报之以嘲笑。一个这么软弱的内阁竟要来执行像恢复普选权这样强硬的措施!可是,问题正是在于什么事情都不**通过**议会,一切事情都**违背**议会。

国民议会在它复会的当天就接到了波拿巴的咨文,在咨文中他要求恢复普选权和废除1850年5月31日的法律。当天他的阁员们就提出了一项以此为内容的法令。国民议会立即否决了阁员们的紧急提案,而在11月13日以355票对348票否决了这个法令本身。这样,议会就再度撕毁了自己的委任状,又一次证实它已从自由选出的人民代议机关变成了一个阶级的篡权议会,再度承认它自己割断了联结议会头部和国民身躯的肌肉。

如果说行政权建议恢复普选权是表示从诉诸国民议会转向诉诸人民,那么立法权提出它的议会总务官法案则是表示从诉诸人民转向诉诸军队了。国民议会是想通过这个法案来确立自己直接调动军队的权力,确立自己创建议会军的权力。国民议会就这样一方面指定军队来充当自己和人民之间、自己和波拿巴之间的仲裁者,承认军队是国家的决定性力量,另一方面它也不得不确认,它自己早已放弃统率这种力量的要求了。它不是立刻调动军队,而是把自己调动军队

的权力当成讨论的题目，这就暴露了它对于自己的力量的怀疑。它否决了议会总务官法案，于是就公开承认了自己的软弱无力。这个法案因为只得到108票的少数而失败了。山岳党决定了它的命运。当时山岳党所处的地位就像布利丹的驴子一样，不同的地方只在于不是要在两袋干草之间决定哪一边诱惑力更大，而是要在两顿棒打之间决定哪一边打得更痛。一边怕尚加尔涅，另一边怕波拿巴。老实说，这种处境决不是英雄好汉的处境。

11月18日，有人对秩序党提出的市镇选举法提出了一个修正案，规定市镇选举人在选区内居住的最低期限不是三年，而是一年。这个修正案仅以一票之差被否决了，但是立刻就发现这一票是废票。秩序党由于分裂成各个敌对的派别，早就丧失了自己的独立的议会多数。这时它表明，议会内根本没有什么多数可言了。国民议会**丧失了通过决议的能力**。已经没有什么聚合力能够把它的原子般的构成部分再结合在一起，它已经断了气，它已经死了。

最后，在大难临头的前几天，议会外的资产阶级群众又一次庄严地证实自己已与议会内的资产阶级决裂。梯也尔这个议会英雄特别严重地患了议会迷[330]这个不治之症，他在议会死后还协同国务会议想出了一个新的议会阴谋——制定责任法，把总统牢牢地约束在宪法范围之内。在9月15日巴黎的新集市大厅举行奠基典礼时，波拿巴简直像马赞尼洛那样把那些女商贩和女渔贩迷惑了一番（不错，一个女渔贩的实际力量等于17个卫戍官[120]）；在议会总务官法案提出之后，他曾使他在爱丽舍宫设宴招待的那些尉官们喜出望外，同样，到了11月25日，他又把聚会在马戏场想从他手中领取伦敦工业博览会[329]奖章的工业资产阶级吸引过来了。现在我把《辩论日报》上他的演说中最典型的一段话引录如下：

“这样出乎意料的成绩使我有权再说一遍，如果法兰西共和国有可能关心自己的实际利益和改组自己的机构，而不是一再容忍蛊惑者和君主主义幻想的骚扰，那么法兰西共和国该是多么伟大啊。(圆形剧场里到处响起雷鸣般的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君主主义的幻想妨碍任何进步和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没有进步，只有斗争。我们看到，从前热烈拥护国王的权威和特权的人，现在成为国民公会的党徒，只求削弱从普选权中产生的权威。(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我们看到，从前吃革命的苦头最多和最怨恨革命的人，现在却煽动新的革命，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要束缚国民的意志……　我保证你们将来能得到安宁……(好！好！暴风雨般的叫好声。)”

工业资产阶级就这样卑躬屈膝地鼓掌欢迎了12月2日的政变，欢迎了议会的灭亡，欢迎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毁灭和波拿巴的独裁。12月4日轰隆的炮击声[331]报答了11月25日轰隆的鼓掌声，而鼓掌鼓得最起劲的萨兰德鲁兹先生的房子挨的炮弹也最多。

克伦威尔在解散长期国会[332]时独自一人进入会场，从口袋里拿出表来，为的是不让国会比他所指定的期限多存在一分钟，接着就以愉快的幽默的嘲笑把每一个国会议员赶出会场。拿破仑虽然比他的榜样矮小，但他毕竟在雾月18日跑到立法机关去向它宣读了(虽然是以颤抖的声调)死刑判决书。第二个波拿巴所拥有的行政权无论和克伦威尔或拿破仑所拥有的比起来都完全不同，他不是在世界史册中，而是在十二月十日会的史册中，在刑事法庭的史册中为自己寻找榜样。他从法兰西银行窃取了2 500万法郎，用100万法郎收买了马尼昂将军，用15法郎加烧酒收买一个个士兵，他像贼一样夜间偷偷地去跟自己的同谋者相会，命令他们闯入最危险的议会首领们的住宅，把卡芬雅克、拉莫里谢尔、勒夫洛、尚加尔涅、沙尔腊斯、梯也尔、巴兹等人从床上绑架走，用军队占领巴黎各重要据点和议会大厦，第二天一早就在各处墙上张贴广告般的告示，宣告国民议会和国务会议已

被解散，普选权已经恢复，塞纳省处于戒严状态。稍后，他就在《通报》上登出了一个伪造的文件，说什么在他周围已聚集了许多议会权威人士，他们已组成一个咨政会。

议会里剩下的人，主要是正统派和奥尔良派，集合在第十区市政厅内开会，反复高呼"共和国万岁！"，决定罢免波拿巴，毫无成效地向站在市政厅门前张望的人群呼吁，直到最后被非洲猎兵押送到多尔塞兵营，然后又装进囚车转送到马扎斯、阿姆和万塞讷等地的监狱。秩序党、立法议会和二月革命的结局就是如此。在抓紧作结论之前，我们且把它们的历史作个简括的概述。

I. **第一个时期**，从1848年2月24日起到5月4日止。二月时期。序幕。普遍友爱的骗局。

II. **第二个时期**，共和国成立和制宪国民议会时期。

(1)从1848年5月4日起到6月25日止。一切阶级同无产阶级进行斗争。无产阶级在六月事变中遭受失败。

(2)从1848年6月25日起到12月10日止。纯粹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专政。起草宪法。宣布巴黎戒严。资产阶级专政因12月10日波拿巴当选为总统而废除。

(3)从1848年12月20日起到1849年5月28日止。制宪议会同波拿巴以及和波拿巴联合起来的秩序党进行斗争。制宪议会灭亡。共和派资产阶级遭受失败。

III. **第三个时期，立宪共和国和立法国民议会**时期。

(1)从1849年5月28日起到1849年6月13日止。小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波拿巴进行斗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遭受失败。

(2)从1849年6月13日起到1850年5月31日止。秩序党实行议会专政。秩序党以废除普选权而完成自己的统治，但失去议会制内阁。

(3)从1850年5月31日起到1851年12月2日止。议会资产阶级和波拿巴进行斗争。

(a)从1850年5月31日起到1851年1月12日止。议会失去军队总指挥权。

(b)从1851年1月12日起到4月11日止。议会重新支配行政权的企图遭到失败。秩序党失去独立的议会多数。秩序党同共和派和山岳党联合。

(c)从1851年4月11日起到10月9日止。尝试修改宪法，企图实现融合和延长任期。秩序党分解为各个构成部分。资产阶级议会和资产阶级报刊同资产阶级群众最后决裂。

(d)从1851年10月9日起到12月2日止。议会和行政权公开决裂。议会正在死亡和崩溃，被自己的阶级、军队以及其余各阶级所抛弃。议会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统治覆灭。波拿巴获得胜利。对帝制复辟的拙劣可笑的模仿。

七

社会共和国在二月革命开始的时候是作为一个词句、作为一个预言出现的。1848年六月事变时，它被扼杀在**巴黎无产阶级**的血泊中，但是它像幽灵一样出现在戏剧的下几幕中。**民主共和国**登上了舞台。它在1849年6月13日和它那些四散奔逃的**小资产者**一同消失了，但是它在逃走时却随身散发了大吹大擂的广告。**议会制共和国**同资产阶级一起占据了全部舞台，在它的整个生存空间为所欲为，但是1851年十二月二日事件在联合的保皇党人的"共和国万岁！"的惊慌叫喊声中把它埋葬了。①

法国资产阶级反对劳动无产阶级的统治，它把政权送给了以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为首的流氓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使得法国一想到红色无政府状态的可怕前景就心惊肉跳。12月4日，当那些为烧酒所鼓舞的秩序军队根据波拿巴的命令，对蒙马特尔林荫道上和意大利林荫道上的凭窗眺望的显贵资产者射击的时候，波拿巴就把这一可怕前景贴现给了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曾把马刀奉为神，马刀统治了它。资产阶级消灭了革命的报刊，它自己的报刊也被消灭了。它把人民的集会置于警察监视之下，它自己的沙龙也遭到了警察的监视。它

①在1852年版中这一段后面还有如下一段话："社会共和国和民主共和国失败了，而议会制共和国、保皇派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已经覆灭，同样，纯粹的共和国、资产者共和派的共和国也已经覆灭。"——编者注

解散了民主派的国民自卫军，它自己的国民自卫军也被解散了。它实行了戒严，戒严也实行到了它头上。它用军事委员会代替了陪审团，它自己的陪审团也被军事委员会代替。它把国民教育置于教士的支配之下，教士也把它置于自己的教育之下。它不经审判就流放囚犯，它自己也未经审判就被流放了。它以国家权力镇压社会的一切运动，它自己的一切社会运动也遭到了国家权力的镇压。它因偏爱自己的钱袋而反对自己的政治家和著作家，它的政治家和著作家被排除了，但是它的钱袋也在它的口被封死和笔被折断后被抢劫了。资产阶级曾不倦地像圣徒阿尔塞尼乌斯对基督徒那样向革命叫喊道："Fuge，tace，quiesce！——快跑，住嘴，安静！"波拿巴也向资产阶级叫喊道："Fuge，tace，quiesce！——快跑，住嘴，安静！"

法国资产阶级早已把拿破仑的"50年后欧洲是共和制的欧洲还是哥萨克式的欧洲"[①]这个二难推理给解决了。它以"哥萨克式的共和国"解决了这个二难推理。无须瑟西的魔法就把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杰作变成一个畸形怪物了。这个共和国除了外表的体面之外，什么也没有丧失。今天的法国采用了议会制共和国这一成熟的形式。只要刺刀一戳，水泡就破了，怪物就出现在眼前。[②]

---

①艾·拉斯卡斯《圣赫勒拿岛回忆录》。——编者注

②在1852年版中这一段话后面是这样写的："二月革命的最近的目标是推翻奥尔良王朝和在奥尔良王朝时期当政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到1851年12月2日才达到这个目标。这时，奥尔良王室的大量财产，即它的影响的物质基础，被没收了。二月革命后人们所期待的，在12月以后出现了，自1830年以来那些以自己的大喊大叫弄得法国精疲力竭的人遭到监禁、流亡、撤职、放逐、缴械、嘲笑。然而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执政的，只是商业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它的其他派别形成一个王朝反对派和一个共和主义反对派，或者完全站在所谓合法国土之外。只有议会制共和国把商业资产阶级的所有派别吸收到它的国家范

为什么巴黎无产阶级在12月2日后没有举行起义呢?

当时资产阶级的倾覆还只见之于法令，而法令还没有被执行。无产阶级的任何重大起义都会立刻使资产阶级重新活跃起来，使它和军队协调起来，从而为工人造成第二个六月失败。

12月4日，资产者和小店主唆使无产阶级起来战斗。当天晚上，国民自卫军的几个联队答应拿着武器穿着军装到战场上来。因为资产者和小店主已经得知波拿巴在12月2日的一项命令中废除了秘密

围里。另外，在路易-菲力浦时期，商业资产阶级排斥了占有土地的资产阶级。只有议会制共和国使他们彼此处于平等地位，让七月王朝和正统王朝联姻并把财产统治的两个时期合而为一。在路易-菲力浦时期，资产阶级的享有特权的部分将其统治隐匿于王冠之下，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资产阶级统治在联合了它的所有的构成部分并把它的帝国扩展为它的阶级的帝国之后，赤裸裸地露出头角。因此，革命本身首先必须创造一种形式，使资产阶级统治在这种形式下可以得到最广泛、最普遍、最彻底的表现，因而也可以被推翻，再也不能站立起来。

直到这时才执行了2月宣布的对奥尔良派资产阶级，即法国资产阶级中最有生命力的派别的判决。它的议会、律师协会、商业法庭、地方代议机关、公证处、大学、讲坛和法庭、报刊和书籍、行政收入和法院诉讼费、军饷和国债，它的精神和肉体都被击溃了。布朗基把解散资产阶级自卫军作为向革命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曾经在2月阻挡过革命前进的资产阶级自卫军在12月从舞台上消失了，万神庙又重新变成了普通的教堂。曾经把资产阶级制度的18世纪的发起人神圣化的魔法也同资产阶级制度的最后形式一起破灭了。当基佐得知12月2日的政变成功时，他宣告：C'est le triomphe complet et définitif du Socialisme!**这是社会主义的完全而彻底的胜利!**也就是说：这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彻底而完全的灭亡。

为什么无产阶级没有拯救资产阶级呢?这个问题转化为另一个问题：”——编者注

投票，命令他们在正式登记名册上把“赞成”或“反对”写在他们的名字后边。12月4日的抵抗吓坏了波拿巴。夜间他就下令在巴黎各个街口张贴了广告，宣布恢复秘密投票。资产者和小店主认为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次日早晨留在家里的正是小店主和资产者。

12月1日深夜，波拿巴以突然的袭击使巴黎的无产阶级失掉了它的领袖，失掉了街垒战的指挥者。这支没有指挥官的军队，由于对1848年六月事变、1849年六月事变和1850年五月事变记忆犹新，不愿意在山岳党的旗帜下作战，于是就听凭自己的先锋队即秘密团体去挽救巴黎的起义的荣誉，这种荣誉已被资产阶级如此恭顺地交给兵痞们去蹂躏，以致波拿巴后来能够用一个刻薄的理由解除国民自卫军的武装：他担心无政府主义者滥用国民自卫军的武器来反对国民自卫军自己！

“这是社会主义的完全而彻底的胜利！”——基佐曾这样评论12月2日的政变。但是，如果说议会制共和国的倾覆包含有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萌芽，那么它的直接的具体结果就是**波拿巴对议会的胜利，行政权对立法权的胜利，不讲空话的权力对讲空话的权力的胜利。**①在议会中，国民将自己的普遍意志提升为法律，即将统治阶级的法律提升为国民的普遍意志。在行政权面前，国民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意志，而服从于他人意志的指挥，服从于权威。和立法权相反，行政权所表现的是国民的他治而不是国民的自治。这样，法国逃脱一个阶级的专制，好像只是为了服从于一个人的专制，并且是服从于一个没有权威的人的权威。斗争的结局，好像是一切阶级都同样软弱无力地和同

①在1852年版中这句话后面还有这样一句话：“这样，旧国家的一种权力首先只是从它自身的局限中解放了出来，变成了无限制的绝对的权力。”——编者注

样沉默地跪倒在枪托之前了。

然而革命是彻底的。它还处在通过涤罪所的历程中。它在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事业。1851年12月2日以前，它已经完成了前一半准备工作，现在它在完成另一半。它先使议会权力臻于完备，为的是能够推翻这个权力。现在，当它已达到这一步时，它就来使**行政权**臻于完备，使行政权以其最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使之孤立，使之成为和自己对立的唯一的对象，以便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行政权。而当革命完成自己这后一半准备工作的时候，欧洲就会从座位上跳起来欢呼：掘得好，老田鼠！①

这个行政权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50万人的官吏大军和50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专制君主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土地所有者和城市的领主特权转化为国家权力的同样众多的属性；封建的显贵人物转化为领取薪俸的官吏；互相对抗的中世纪的无限权力的五颜六色的样本转化为确切规定了的国家权力的方案，国家权力的运作像工厂一样有分工，又有集中。第一次法国革命的任务是破坏一切地方的、区域的、城市的和各省的特殊权力以造成全国的公民的统一，它必须把专制君主制已经开始的事情——中央集权加以发展，但是它同时也就扩大了政府权力的容量、属性和走卒数目。拿破仑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正统王朝和七月王朝并没有增添什么东西，不过是扩大了分工，这种分工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分工愈益造成新的利益集团，即造成用于国家管理的新材料，

①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1幕第5场。——编者注

而愈益扩大起来。每一种**共同的**利益，都立即脱离社会而作为一种最高的**普遍的**利益来与社会相对立，都不再是社会成员的自主行动而成为政府活动的对象——从某一村镇的桥梁、校舍和公共财产，直到法国的铁路、国家财产和国立大学。最后，议会制共和国在它反对革命的斗争中，除采用高压手段外，还不得不加强政府权力的工具和中央集权。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那些相继争夺统治权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胜利者的主要战利品。

但是在专制君主时代，在第一次革命时期，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官僚不过是为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进行准备的手段。在复辟时期，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官僚虽力求达到个人专制，但它终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

只是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和市民社会相比，国家机器已经大大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它现在竟能以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一个从外国来的、被喝醉了的兵痞拥为领袖的冒险家做首脑，而这些兵痞是他用烧酒和腊肠收买过来的，并且他还要不断地用腊肠来讨好他们。由此便产生了怯懦的绝望和遭受奇耻大辱的情感，这种情感压住法国的胸膛，让它喘不过气来。法国觉得自己被凌辱了。①

①在1852年版中这一段是这样写的："只是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于社会并对它进行奴役的东西。行政权具有明显的独立性，这时它的首脑不再需要天赋，它的军队不再需要声誉，它的官僚不再需要道义上的权威，便可以合法存在。和市民社会相比，国家机器已经大大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它现在竟能以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一个从外国来的、被喝醉了的兵痞拥为领袖的冒险家做首脑，而这些兵痞是他用烧酒和腊肠收买过

虽然如此，国家权力并不是悬在空中的。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

正如波旁王朝是大地产的王朝，奥尔良王朝是金钱的王朝一样，波拿巴王朝是农民的王朝，即法国人民群众的王朝。被农民选中的不是服从资产阶级议会的那个波拿巴，而是驱散了资产阶级议会的那个波拿巴。城市在三年中成功地曲解了12月10日选举的意义，辜负了农民恢复帝国的希望。1848年12月10日的选举只是在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中才得以实现。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而形成的，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

来的，并且他还要不断地用腊肠来讨好他们。由此便产生了怯懦的绝望和遭受奇耻大辱的情感，这个情感压住法国的胸膛，让它喘不过气来。法国觉得自己被凌辱了。如果说拿破仑还勉强能够以为法国争自由作为借口，那么第二个波拿巴已不再可能以让法国受奴役作为借口。"——编者注

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①]

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送还他们。于是就出现了一个人来冒充这个人，因为他取名为拿破仑，而且拿破仑法典规定："不许寻究父方"。经过20年的流浪生活和许多荒唐的冒险行径之后，预言终于实现了，这个人成了法国人的皇帝。侄子的固定观念实现了，因为这个观念是和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阶级的固定观念一致的。

但是，也许有人会反驳我说：在半个法国不是发生过农民起义吗？军队不是围攻过农民吗？农民不是大批被捕，大批被流放吗？[333]

从路易十四时起，法国农民还没有"因为蛊惑者的阴谋"而遭到过这样的迫害。

但是，要正确地理解我的意思。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其社会生存条件即小块土地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种条件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

---

①在1852年版中这句话是这样写的："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议会，国家支配社会。"——编者注

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是相反，是愚蠢地固守这个旧制度，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自己和自己的小块土地并赐给自己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不是农民的现代的塞文[334]，而是农民的现代的旺代。[50]

议会制共和国三年的严酷统治，使一部分法国农民摆脱了对于拿破仑的幻想，并使他们（虽然还只是表面上）革命化了；可是，每当他们发动起来的时候，资产阶级就用暴力把他们打回去。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法国农民的现代意识同传统意识展开了斗争。这一过程是以教师和教士之间不断斗争的形式进行的。资产阶级打垮了教师。农民第一次力图对政府的行动采取独立的态度；这表现在镇长和省长之间的不断冲突上。资产阶级撤换了镇长。最后，法国各地农民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曾起来反对他们自己的产物，即军队。资产阶级用宣布戒严和死刑惩罚了他们。这个资产阶级现在却公然叫喊什么群众是可鄙的群氓，十分愚蠢，说这些群众把它出卖给波拿巴了。它自己曾以暴力加强了农民阶级对帝制的信赖，它曾把这种农民宗教产生的条件保留下来。当群众墨守成规的时候，资产阶级害怕群众的愚昧，而在群众刚有点革命性的时候，它又害怕起群众的觉悟了。

在政变以后发生的各次起义中，一部分法国农民拿起武器抗议他们自己在1848年12月10日的投票表决。1848年以来的教训，使他们学聪明了。但是他们已经投身于历史的地狱，历史迫使他们履行诺言，而大多数农民当时还抱有成见，以致恰恰是在最红的省份中农村居民公开把选票投给波拿巴。在他们看来，国民议会妨碍了波拿巴的活动。波拿巴现在只是打破了城市加之于乡村意志的桎梏。在有些地方，农民甚至荒唐地幻想在拿破仑身旁建立一个国民公会。

七

第一次革命把半农奴式的农民变成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之后，拿破仑巩固和调整了某些条件，以保证农民能够自由无阻地利用他们刚得到的法国土地并满足其强烈的私有欲。可是法国农民现在没落的原因，正是他们的小块土地、土地的分割，即被拿破仑在法国固定下来的所有制形式。这正是使法国封建农民成为小块土地的所有者，而使拿破仑成为皇帝的物质条件。只经过两代就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结果：农业日益恶化，农民负债日益增加。"拿破仑的"所有制形式，在19世纪初期原是保证法国农村居民解放和致富的条件，而在本世纪的进程中却已变成使他们受奴役和贫困化的法律了。而这个法律正是第二个波拿巴必须维护的"拿破仑观念"中的第一个观念。如果他和农民一样，还有一个错觉，以为农民破产的原因不应在这种小块土地所有制中去探求，而应在这种土地所有制以外，在一些次要情况的影响中去探求，那么，他的实验一碰上生产关系，就会像肥皂泡一样破灭。

小块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发展根本改变了农民与其他社会阶级的关系。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农村土地的小块化补充了城市中的自由竞争和正在兴起的大工业。[①]农民阶级是对刚被推翻的土地贵族的普遍抗议。[②]小块土地所有制在法国土地上扎下的根剥夺了封建制度的一切营养物。小块土地的界桩成为资产阶级抵抗其旧日统治者的一切攻击的自然堡垒。但是在19世纪的进程中，封建领主已被城

①在1852年版中这之后还有如下几句话："对农民阶级实行优待本身有利于新的资产阶级制度。这个新造就的阶级是资产阶级制度向城市以外的地区的全面伸延，是资产阶级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编者注

②在1852年版中这之后还有如下一句话："如果说它首先受到优待，那么它也首先为封建领主的复辟提供了进攻点。"——编者注

市高利贷者所代替；土地的封建义务已被抵押债务所代替；贵族的地产已被资产阶级的资本所代替。农民的小块土地现在只是使资本家得以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而让农民自己考虑怎样去挣自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法国土地所负担的抵押债务每年从法国农民身上取得的利息，等于英国全部国债的年债息。受到资本这样奴役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而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招致这样的奴役）使法国的一大半国民变成穴居人。1 600万农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居住在洞穴中，大部分的洞穴只有一个洞口，有的有两个小洞口，最好的也只有三个洞口。而窗户之于住房，正如五官之于脑袋一样。资产阶级制度在本世纪初曾让国家守卫新产生的小块土地，并对它尽量加以赞扬，现在却变成了吸血鬼，吸吮它的心血和脑髓并把它投入资本的炼金炉中去。拿破仑法典现在至多不过是一个执行法庭判决、查封财产和强制拍卖的法典。在法国，除了官方计算的400万（包括儿童等等）乞丐、游民、犯人和妓女之外，还有500万人濒于死亡，他们或者是居住在农村，或者是带着他们的破烂和孩子到处流浪，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由此可见，农民的利益已不像拿破仑统治时期那样同资产阶级的利益、同资本相协调，而是同它们相对立了。因此，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做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可是，**强有力的和不受限制的政府**（这是第二个拿破仑应该实现的第二个“拿破仑观念”）应该用强力来保卫这种“物质的”制度。这种“物质制度”也是波拿巴反对造反农民的一切文告中的口号。

小块土地除了肩负资本加于它的抵押债务外，还肩负着**赋税**的重担。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来源，一句话，它是行政权的整个机构的生活来源。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是一回事。小

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说来是无数全能的官僚立足的基础。它造成全国范围内各种关系和个人的均质的水平。所以，它也就使得一个最高的中心对这个均质的整体的各个部分发生均质的作用。它消灭人民群众和国家权力之间的贵族中间阶梯。所以，它也就引起这一国家权力的全面的直接的干涉和它的直属机关的全面介入。最后，它造成无业的过剩人口，使他们无论在农村或城市都找不到容身之地，因此他们钻营官职，把官职当做一种体面的施舍，迫使增设官职。[①] 拿破仑借助于他用刺刀开辟的新市场，借助于对大陆的掠夺，连本带利一并偿还了强制性赋税。这种赋税曾是刺激农民发展产业的手段，而现在赋税却使这些产业失去最后的资源，失去抵御贫困化的能力。大批衣着华贵和脑满肠肥的官僚，是最符合第二个波拿巴心意的一种"拿破仑观念"。既然波拿巴不得不创造一个同社会各真实阶级并列的人为等级，而对这个等级来说，维护波拿巴的政权就成了饭碗问题，那么，事情又怎能不是这样呢?正因为如此，他的最初的财政措施之一就是把官吏薪俸提高到原来的水平，并添设了领干薪的新官职。

另一个"拿破仑观念"是作为政府工具的**教士**的统治。可是，如果说刚刚出现的小块土地由于它和社会相协调，由于它依赖自然力并且对从上面保护它的权威采取顺从态度，因而自然是相信宗教的，那

① 在1852年版中这后面还有如下一段话："在拿破仑时期，这一大批政府人员不仅仅直接提供生产成果，因为他们在公共工程等等的形式下采用国家的强制手段为新形成的农民阶级做出了资产阶级在私人产业的道路上还不可能做出的事情。国家赋税是维持城市和农村之间交换的必要的强制手段，否则，小块土地所有者就会像在挪威和瑞士的部分地区那样，由于农民的自给自足而破坏同城市的联系。"——编者注

么，债台高筑、同社会和权威反目并且被迫越出自己的有限范围的小块土地自然要变成反宗教的了。苍天是刚刚获得的一小块土地的相当不错的附加物，何况它还创造着天气；可是一到有人硬要把苍天当做小块土地的代替品的时候，它就成为一种嘲弄了。那时，教士就成为地上警察的涂了圣油的警犬——这也是一种“拿破仑观念”。①对罗马的征讨下一次将在法国内部进行，不过它的意义和蒙塔朗贝尔先生所想的[335]正好相反。

最后，“拿破仑观念”登峰造极的一点，就是**军队**占压倒的优势。军队是小农的光荣，军队把小农造就成为英雄，他们保护新得的财产免受外敌侵犯，颂扬他们刚获得的民族性，掠夺世界并使之革命化。军服是他们的大礼服，战争是他们的诗篇，在想象中扩大和完整起来的小块土地是他们的祖国，而爱国主义是财产观念的理想形态。可是，现在法国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所要对付的敌人，已不是哥萨克，而是法警和税吏了。小块土地已不是躺在所谓的祖国中，而是存放在抵押账簿中了。军队本身已不再是农民青年的精华，而是农民流氓无产阶级的败类了。军队大部分都是招募来的新兵，都是些顶替者，正如第二个波拿巴本人只是一个招募来的人物，只是拿破仑的顶替者一样。现在军队是在执行宪兵勤务围捕农民时树立英雄业绩的；所以，如果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在其制度内在矛盾的驱使下到法国境外去用兵，那么军队在干了几桩强盗勾当后就不是获得荣誉，而是遭到痛打了。

这样，我们就看到，**一切“拿破仑观念”都是不发达的、朝气蓬勃**

---

①在1852年版中这后面还有如下一句话：“和拿破仑时期不同，在第二个波拿巴时期，地上警察的使命不是监视农民体制在城市里的敌人，而是监视波拿巴在农村里的敌人。”——编者注

的小块土地所产生的观念；对于已经衰老的小块土地说来，这些观念是荒谬的，只是它垂死挣扎时的幻觉，只是变成了空话的词句，只是变成了幽灵的魂魄。但是，为了使法国国民大众解脱传统的束缚，为了使国家权力和社会之间的对立以纯粹的形态表现出来，一出模仿帝国的滑稽剧是必要的。随着小块土地所有制日益加剧的解体，建立在它上面的国家建筑物将倒塌下来。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国家中央集权制，只能在军事官僚政府机器的废墟上建立起来，这种军事官僚政府机器是在同封建制度的对立中锻造而成的。①

12月20日和21日大选之谜，要从法国农民的状况中找到解答。这次大选把第二个波拿巴推上西奈山[336]，并不是为了让他去接受法律，而是为了让他去颁布法律。②

---

①在1852年版中没有最后这两句话，本段的结尾是这样写的："打碎国家机器不会危及中央集权制。官僚政治不过是中央集权制还受其对立物即封建制度累赘时的低级和粗糙形态。法国农民一旦对拿破仑帝制复辟感到失望，就会把对于自己小块土地的信念抛弃；那时建立在这种小块土地上面的全部国家建筑物都将会倒塌下来，于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形成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编者注

②在1852年版中这段话是这样写的："12月20日和21日**大选**之谜，要从法国农民的状况中找到解答。这次大选把第二个波拿巴推上西奈山，并不是为了让他去接受法律，而是为了让他去颁布和执行法律。的确，法兰西民族在那些灾难的日子里犯了反对民主主义的滔天大罪。民主主义跪倒在地，每天祷告：神圣的普选权，求您帮帮我们！普选权的信奉者自然不愿意放弃一种神奇的力量，因为它可以使他们成就大业，可以把第二个波拿巴变成拿破仑，把扫罗变成保罗，把西门变成彼得。国民精神通过选票箱对他们说话，就像先知以西结对枯干的骸骨说话：'Haec dicit dominus deus ossibus suis: Ecce, ego intromittam in vos Spiritum et vivetis.''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编者注

显然，资产阶级现在除了投票选举波拿巴之外，再没有别的出路了。①当清教徒[187]在康斯坦茨宗教会议[337]上诉说教皇生活淫乱并悲叹必须改革风气时，红衣主教彼得·大利向他们大声喝道："现在只有魔鬼还能拯救天主教会，而你们却要求天使！"法国资产阶级在政变后也同样高声嚷道：现在只有十二月十日会[125]的头目还能拯救资产阶级社会！只有盗贼还能拯救财产，只有假誓还能拯救宗教，只有私生子还能拯救家庭，只有无秩序还能拯救秩序！

波拿巴作为行政权的自主的力量，自命为负有保障"资产阶级秩序"的使命。但是这个资产阶级秩序的力量是中等阶级。所以他就自命为中等阶级的代表人物，并颁布了相应的法令。可是，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人物，只是因为他摧毁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摧毁这个中等阶级的政治力量。所以他又自命为中等阶级的政治力量和著作力量的敌人。可是，既然他保护中等阶级的物质力量，那么就不免要使这个阶级的政治力量重新出现。因此，必须保护原因并在结果出现的地方把结果消灭掉。但是，原因和结果总不免有某些混淆，因为原因和结果在相互作用中不断丧失自己的特征。于是就有抹掉界限的新法令出现。同时波拿巴针对资产阶级，自命为农民和人民大众的代表，想使人民中的下层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内得到幸福。于是就有一些预先抄袭"真正的社会主义者"[338]的治国良策的新法令出现。但是波拿巴首先觉得自己是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是流氓无产阶级的代表。他本人、他的亲信、他的政府和他的军队都属于这个阶级，而这个阶级首先关心的是自己能生活得舒服，是从国库中抽取加利

①在1852年版中这后面还有如下一句话："专制或者无政府主义，它自然投票赞成专制。"——编者注

福尼亚的彩票。于是他就以颁布法令、撇开法令和违反法令来证实他真不愧为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

这个人所负的这种充满矛盾的使命，就可以说明他的政府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行动。这个政府盲目摸索前进，时而拉拢这个阶级，时而又拉拢另一个阶级，时而侮辱这个阶级，时而又侮辱另一个阶级，结果使一切阶级一致起来和它作对。他这个政府在实际行动上表现的犹豫，和他从伯父那里盲目抄袭来的政府法令的独断果敢的风格形成一种十分可笑的对照。①

工业和商业，即中等阶级的事业，应该在强有力的政府治理下像温室中的花卉一样繁荣。于是就让出了无数的铁路承租权。但是波拿巴派的流氓无产阶级是要发财致富的。于是就有事先知悉秘密的人在交易所进行承租权上的投机。但是又没有建筑铁路的资本。于是就强令银行以铁路股票作抵押来发放贷款。但是银行同时要由波拿巴本人来经营，因此就要优待银行。于是银行就免除了公布每周结算的义务，它和政府订立了只对它有利的契约。人民应该有工作。于是就安排公共工程。但是公共工程增加人民的税负。因此必须对食利者下手，把利息由五厘改为四厘半，以此来减低税额。但是必须再给中间等级一些甜头。因此零买酒喝的大众的葡萄酒税增加了一倍，而大批买酒喝的中间等级的酒税却减低了一半。现有的工人团体被解散了，但是许诺将来会出现团体兴旺的奇迹。必须帮助农民。于是要有抵押银行，以加重农民债务并加速财产集中。但是必须利用这些银行来从被没收的奥尔良王室财产中榨取金钱。可是没有一个资本家同

①在1852年版中这里还有一句话："因此，这些互相矛盾的行动的匆忙和草率，应该模仿皇帝的面面俱到和善于应对。"——编者注

意这个在法令中没有规定的条件，结果抵押银行也就始终只是一纸法令，如此等等。

波拿巴想要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但是，他要是不从一个阶级那里取得一些什么，就不能给另一个阶级一些什么。正如吉斯公爵在弗伦特运动时期由于曾把自己的一切财产变成他的党徒欠他的债务而被称为法国最该受感激的人一样，波拿巴也想做法国最该受感激的人，把法国所有的财产和所有的劳动都变成欠他个人的债务。他想窃取整个法国，以便将它再赠给法国，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以便能够用法国的钱再来收买法国，因为他作为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就不得不收买应归他所有的东西。于是所有一切国家设施，即参议院、国务会议、立法机关、荣誉军团勋章、士兵奖章、洗衣房、公共工程、铁路、没有士兵的国民自卫军司令部以及被没收的奥尔良王室财产，都成了用于收买的设施。军队和政府机器中的每一个位置，都成了收买手段。然而在这种先把法国攫取过来，然后再把它交给法国自己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东西还是在买卖过程中流到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和会员的腰包里去的利润。莫尔尼先生的情妇L.伯爵夫人，对没收奥尔良王室财产一事曾说过这样一句俏皮话："C'est le premier vol de l'aigle"（"这是鹰的最初的飞翔"①），这句俏皮话对于这只更像是**乌鸦**的**鹰**的每一次飞翔都适用。一个意大利的加尔都西会339修士曾对一个夸耀地计算自己还可以受用多年的财产的守财奴说过："Tu fai conto sopra i beni, bisogna prima far il conto sopra gli anni."②波拿巴和他的信徒每天都对自己说这句话。为了不致算错年月，他们按

①vol有"飞翔"和"盗窃"两个意思。

②"你总是计算你的财产，但你最好是先计算一下你的年岁。"

分钟来计算。钻进宫廷，钻进内阁，钻进行政机关和军队的上层去的是一群连其中最好的一个也来历不明的流氓，是一群吵吵嚷嚷的、声名狼藉的、贪婪的浪荡者。他们穿着缀有标志级别的金银边饰的制服，装出俨如苏路克的高官显宦那样可笑的庄严的样子。如果人们注意到，**韦隆-克勒维尔**①是十二月十日会的道德说教者，**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是它的思想家，那么人们对这个会的上层人物就能有个清楚的概念了。基佐主持内阁的时候，曾在一家地方小报上利用这个格朗尼埃作为攻击王朝反对派的工具，并且总是给他如下的赞语："C'est le roi des drôles"，"这是丑角之王"。[340]如果把路易·波拿巴的朝廷和家族拿来跟摄政时期[341]或路易十五统治时期对比，那是不公正的。因为"法国已不止一次地有过姘妇的政府，但是从来还没有过面首的政府"。②

波拿巴既被他的处境的自相矛盾的要求所折磨，同时又像个魔术师，不得不以不断翻新的意外花样吸引观众把视线集中在他这个拿破仑的顶替者身上，也就是说，他不得不每天发动小型政变，使整个资产阶级经济陷于混乱状态，侵犯一切在1848年革命中显得不可侵犯的东西，使一些人容忍革命而使另一些人欢迎革命，以奠定秩序为名造成无政府状态，同时又使整个国家机器失去圣光，渎犯它，使它成为可厌而又可笑的东西。他模仿特里尔的圣衣[342]的礼拜仪式在巴黎布置拿破仑的皇袍的礼拜仪式。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在

①巴尔扎克在其长篇小说《贝姨》中，把克勒维尔描绘为最淫乱的巴黎庸人，这个克勒维尔是以《立宪主义者报》报社主人韦隆博士为模特描摹出来的。

②马克思在这里加了一个注："德·日拉丹夫人的话。"在1852年版中本段的结尾还有一句话："卡托为了在极乐世界同英雄相会，宁愿一死！可怜的卡托！"——编者注



1930年上海江南书店和1940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译本

（旧译《拿破仑第三政变记》）

路易·波拿巴身上，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280]顶上倒塌下来。

卡·马克思大约写于1851年12月中—1852年3月25日

载于1852年5月《革命。不定期刊物》第1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1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8卷翻译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SATURDAY, APRIL 19, 1856

卡·马克思

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343]

1856年4月14日在伦敦

所谓的1848年革命，只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事件，是欧洲社会干硬外壳上的一些细小的裂口和缝隙。但是它们却暴露出了外壳下面的一个无底深渊。在看来似乎坚硬的外表下面，现出了一片汪洋大海，只要它动荡起来，就能把由坚硬岩石构成的大陆撞得粉碎。那些革命吵吵嚷嚷、模模糊糊地宣布了无产阶级解放这个19世纪的秘密，本世纪革命的秘密。

的确，这个社会革命并不是1848年发明出来的新东西。蒸汽、电力和自动走锭纺纱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但是，尽管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大气把两万磅重的压力加在每一个人身上，你们可感觉得到吗？同样，欧洲社会在1848年以前也没有感觉到从四面八方包围着它、压抑着它的革命气氛。

这里有一件可以作为我们19世纪特征的伟大事实，一件任何政党都不敢否认的事实。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兆，

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有些党派可能为此痛哭流涕；另一些党派可能为了要摆脱现代冲突而希望抛开现代技术；还有一些党派可能以为工业上如此巨大的进步要以政治上同样巨大的倒退来补充。可是我们不会认错那个经常在这一切矛盾中出现的狡狯的精灵。我们知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工人也同机器本身一样，是现代的产物。在那些使资产阶级、贵族和可怜的倒退预言家惊慌失措的现象当中，我们认出了我们的勇敢的朋友好人儿罗宾，这个会迅速刨土的老田鼠、光荣的工兵——革命。英国工人是现代工业的头一个产儿。他们在支援这种工业所引起的社会革命方面肯定是不会落在最后的，这种革命意味着他们的本阶级在全世界的解放，这种革命同资本的统治和雇佣奴隶制具有同样的普遍性质。我知道英国工人阶级从上世纪中叶以来进行了多么英勇的斗争，这些斗争只是因为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把它们掩盖起来和隐瞒不说才不为世人所熟悉。为了报复统治阶

级的罪行，在中世纪的德国曾有过一种叫做“菲默法庭”[344]的秘密法庭。如果某一所房子画上了一个红十字，大家就知道，这所房子的主人受到了“菲默法庭”的判决。现在，欧洲所有的房子都画上了神秘的红十字。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

载于1856年4月19日《人民报》第207期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14卷翻译

卡·马克思

法国的动产信用公司[345]

（第三篇论文）

波拿巴家族的财政即将破产的迹象接二连三地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5月31日，蒙塔朗贝尔伯爵在反对提高一切印刷品、书籍等的邮费的法案时，发表了以下这篇惶恐不安的演说：

“任何政治生活都受到压抑，但代替它的是什么呢？投机之风。伟大的法兰西民族不能沉睡不醒，无所作为。代替政治生活的是投机的狂热，对财富的贪婪，对有价证券买卖的迷恋。每个地方，甚至在我们的小城镇，甚至在我们的乡村，人们都在为牟取暴利——无须忙碌奔波，不费力气，往往是不顾脸面取得的暴利——而发狂，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我用不着再寻找其他证据，你们刚才已经拿到那份反对**两合公司**的法案了。法案的副本刚刚发给我们，我还没有时间加以研究，但是我愿意支持它，尽管我认为其中有些规定太严酷了。如果急需治疗，又必须痛下针砭，那么，病情想必是不轻的。这种疾病的真正原因就是，法国的一切政治思想都沉寂了……　但是，我所指的疾病，并不是由同一个原因造成的唯一的后果。当上层阶级和中层阶级这些老的政治阶级醉心于投机活动时，另一种活动便在社会的下层阶级中间开展起来，法国所经历的一切革命几乎都是由此而产生的。有价证券买卖几乎把整个法国变成一个大赌场。目睹这种可怕的有价证券买卖狂热，一部分受到社会主义者影响的人也空前地被发财欲腐蚀了。因此，秘密公司大增，那种自称为社会主义其实可以说是败坏社会主义的疯狂激情更加强烈。不久前，在巴黎、昂热等地的审判案中，这种激情表现得很强烈。”①

---

①见1856年6月5日《泰晤士报》第22386号。——编者注

这就是这家波拿巴家族企业的最早的股东之一蒙塔朗贝尔为了维护秩序、宗教、财产和家庭而说的话！

据伊萨克·贝列拉说，**动产信用公司**的秘密之一就是这样一个原则：增加自己的业务和减少自己的风险，办法是参与各种各样的企业和尽快地退出这些企业。但是，如果剥掉圣西门主义的华丽辞藻的外衣，这个原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大量认购股票，用它们进行大量的投机活动，在赚取贴水以后，尽快地把这些股票抛售出去。这就是说，证券交易应当是工业发展的基础，或者更确切地说，一切工业活动只应当是证券交易的借口。**动产信用公司**用什么工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有什么方法能使它"增加自己的业务"和"减少自己的风险"呢？那就是罗所用的方法。因为**动产信用公司**是享有特权的公司，它得到政府支持并拥有大量资本和贷款，相对而言，它所建立的每一个新企业的股票刚一发行，就肯定能在市场上赚到贴水。**动产信用公司**从罗那里学会了在自己的股东中分配新股票的办法，即其票面价格同这些股东在母公司中所拥有的股票数量成一定比例。用这种办法保证这些股东得到的利润，首先，对**动产信用公司**本身的股票价值产生影响；其次，这些股票的行市高又保证新发行的股票的价值也高。**动产信用公司**就是用这种办法来控制用于工业企业投资的大部分借贷资本。

总之，获取贴水是**动产信用公司**运转的真正轴心，除此以外，其目的显然是用同商业银行的运营完全相反的方法对资本发生作用。商业银行用贴现、贷款和发行银行券使固定资本暂时得到自由的运用，而**动产信用公司**实际上是把游资固定起来。例如，铁路股票可以非常自由地流通，但是这些股票所代表的资本，即投放在铁路建设上的资本却是固定的。如果厂主在购置厂房和机器设备方面投放的那

一部分资本与用于支付工资和购买原料的那一部分资本比例不恰当，他就不得不马上关厂。对于国家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现代的几乎每一次商业危机都同游资和固定资本之间应有的比例关系遭到破坏有关。而像**动产信用公司**这样的机构，它的直接目的是尽量把国内的借贷资本固定起来，投放到铁路、运河、矿山、船坞、轮船、炼铁厂和其他工业企业，而不考虑国家的生产能力，那么它的活动会有怎样的结果呢？

动产信用公司的章程规定，它只能保护那些由匿名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的工业企业。结果必然会产生一种倾向，即尽量多地建立这种公司，使一切工业企业具有这种公司的形式。当然，不能否认，把股份公司的形式运用于工业，标志着现代各国经济生活中的新时代。一方面，它显示出过去料想不到的联合的生产能力，并且使工业企业具有单个资本家力不能及的规模；另一方面，不应当忘记，在股份公司中联合起来的不是单个人，而是资本。通过这一套做法，所有者变成了股东，即变成了投机家。资本的积聚加速了，其必然结果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破产也加速了。某种工业巨头出现了，他们的权力同他们的责任成反比，因为他们只对他们持有的股票负责，而支配的却是公司的全部资本。他们形成一个比较固定的集团，而大多数股东却不断变更。工业巨头依靠公司的影响和财富，能够收买个别不安分的成员。在寡头董事会之下，有一个由从事实际工作的公司管理人员和代理人组成的官僚集团，他们直接管理着大批数量日益增加的普通雇佣工人。随着雇用工人的资本数量的增加，工人的依赖程度和孤立无援的程度也相应地加深，但是随着代表这种资本的人数的减少，他们也越来越具有危险性。傅立叶的不朽功绩在于，他预言了这种现代工业形式，把它称为**工业封建主义**。[346]毫无疑问，伊萨克·贝列拉

先生也罢，埃米尔·贝列拉先生也罢，莫尔尼先生也罢，波拿巴先生也罢，都不能发明工业封建主义。在他们以前的时代，也有向工业股份公司提供贷款的银行。他们发明的是股份银行，它力图垄断私人放债者从前分散的和名目繁多的活动，其指导原则是建立大量的工业公司，不是为了进行生产上的投资，而只是想取得证券投机利润。他们的这种新思想，就是把工业封建主义变成证券投机的纳贡者。

根据章程，**动产信用公司**的资本定为6 000万法郎。这份章程还准许公司接受活期存款的寄存代付金，总数可以是资本额的两倍即12 000万法郎。因此，受公司支配的款项总额为18 000万法郎。同保护法国整个工业的大胆计划相比，这当然是一个很小的数目。但是这笔款项的三分之二——因为它是一旦有提取要求就必须支付的——未必可以用来购买工业股票或那些不能保证可以立即兑现的债券。由于这个原因，章程为**动产信用公司**另辟了一个资金来源。章程准许公司发行总数为原始资本10倍即6亿法郎的债券，换句话说，这个企图给全世界发放贷款的机构，有权作为负债10倍于自有资本的借债人进入市场。贝列拉先生说：

> “我们的债券有两种。一种是短期的，它应当同我们各种暂时的投资额相适应。”①

对于这种债券，我们在这里不感兴趣，因为根据章程第八条，发行这种债券，只是为了补足应当从活期存款得来的并且过去也完全是这样得来的12 000万法郎可能的缺额。至于另一种债券，

> “它的支付期限很长，可以用赎回的办法来清偿，并且应当与同类性质的、

①见1856年4月26日《总汇通报》第117号。——编者注

我们在公债方面或工业公司的股票和债券方面的投资额相适应。根据资金制度——它是我们这个公司的基础——这些有价证券不仅要有在政府监督下购买的相应数额的公债作担保(由于采用互惠原则,所有这些公债将提供补偿和分担风险的好处),而且还要有我们为此目的已经增加到相当大数额的资本作担保”。①

可见,**动产信用公司**的这些债券纯粹是仿效铁路债券,即在一定期限内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赎回并能带来固定利息的债券。但是也有区别。铁路债券常常是以铁路本身作抵押来担保,而**动产信用公司**的债券以什么来担保呢?**动产信用公司**是用拿自己的债券购买的公债、工业公司的股票、债券以及诸如此类的证券作担保的。那么,发行债券能得到什么好处呢?能得到**动产信用公司**的债券应支付的利息同该公司用以放款的股票和其他有价证券可得到的利息之间的差额。为了使这项业务十分有利可图,**动产信用公司**应当把发行债券所得的资本投放在能够取得最大回报的地方,即投放在价格波动和变化很大的股票上。因此,该公司的债券主要由它自己所创建的那些工业公司的股票来担保。

因此,铁路债券至少有比它大一倍的资本担保,而**动产信用公司**的债券只有名义上同它相等的资本担保,每逢证券交易所的行市下降时,这种资本也必定缩小。由此看来,这些债券的持有者要分担股东的全部风险,却不能分享他们的利润。上年度的报告书说:

“但是,债券的持有者不仅有它[即**动产信用公司**]以放款进行的投资作担保,而且还有它的原始资本作担保。”①

对12 000万法郎存款负担保之责的6 000万法郎的原始资本,除

①见1856年4月26日《总汇通报》第117号。——编者注

了必须向**动产信用公司**有权创建的无数企业提供担保以外，还要作为6亿法郎债券的担保。如果该公司能够把所有的工业公司的股票都换成它自己的债券，那么，它的确会成为法国整个工业的最高指挥者和所有者，而许多过去的所有者则像拿年金似的得到同债券利息相等的固定收入。但是，在实现这一目的的道路上，由于上述经济条件而随之发生的破产，会使大胆的冒险家受阻。其实，**动产信用公司**的真正创办人并未忽略这件小事，相反地，他们已经考虑到了。当破产发生时，在众多法国人的利益被牵连进去之后，波拿巴政府似乎就有理由去干涉**动产信用公司**的事务，就像英国政府在1797年干涉英格兰银行的事务[347]那样。法国的摄政王①，路易-菲力浦的值得尊敬的先辈，曾企图把国家债券换成罗氏银行的债券以摆脱国家的债务，路易·波拿巴这位皇帝社会主义者则企图把**动产信用公司**的债券换成国家债券以掌握法国工业。是不是他比**动产信用公司**更有偿付能力呢？问题就在这里。

卡·马克思写于1856年6月底

载于1856年7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751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15卷翻译

①菲力浦第二，奥尔良公爵。——编者注

卡·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348]

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第一册论述资本，其第一篇由下列各章组成：(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一般。前两章构成本分册的内容。我面前的全部材料[349]形式上都是专题论文，它们是在相隔很久的几个时期内写成的，目的不是为了付印，而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至于能否按照上述计划对它们进行系统整理，就要看环境如何了。

我把已经起草的一篇总的导言[350]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不过在这里倒不妨谈一下我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

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做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238]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泽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351]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当时，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von

Karl Marx.

Erstes Heft.

Berlin.
Verlag von Franz Duncker.
(W. Besser's Verlagshandlung.)

1859.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一版的扉页



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我倒非常乐意利用《莱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销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352]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353]，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而移居布鲁塞尔[354]，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

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①（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

①指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编者注

(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①)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②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在我们当时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众表达我们见解的各种著作中,我只提出恩格斯与我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和我自己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③。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④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我用德文写的关于《雇佣劳动》⑤一书,汇集了我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355]上对于这个问题的讲演,这本书的印刷由于二月革命[4]和我因此被迫离开比利时而中断。

1848年和1849年《新莱茵报》[80]的出版以及随后发生的一些事变,打断了我的经济研究工作,到1850年我才能在伦敦重新进行这一工作。英国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看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新的材料。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编者注

②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编者注

③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编者注

④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编者注

⑤即《雇佣劳动与资本》,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编者注

及似乎完全属于本题之外的学科，在这方面不得不多少费些时间。但是使我所能够支配的时间特别受到限制的，是谋生的迫切需要。八年来，我一直为第一流的美国英文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226]（写作真正的报纸通讯在我只是例外），这使我的研究工作必然时时间断。然而，由于评论英国和大陆突出经济事件的论文在我的投稿中占很大部分，我不得不去熟悉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本身范围以外的实际的细节。

我以上简短地叙述了自己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研究的经过，这只是要证明，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①

卡尔·马克思

1859年1月于伦敦

卡·马克思写于1859年1月

载于1859年6月在柏林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一书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2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3卷翻译

①但丁《神曲·地狱篇》第3部第14—15行。——编者注

弗·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356]

1859年柏林弗兰茨·敦克尔出版社版

一

德国人早已证明，在一切科学领域内，他们与其余的文明民族不相上下，在大部分领域内甚至胜过它们。只有一门科学，在它的大师们当中，没有一个德国人的名字，这就是政治经济学。原因很清楚。政治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因此它以发达的资产阶级关系为前提，而在德国，这种关系在自从宗教改革战争和农民战争[357]，特别是自从三十年战争[209]以来的几百年间，都没有可能产生。荷兰同帝国的脱离，把德国从世界贸易中排挤出来，使它的工业发展一开始就限于极小的规模；[358]当德国人如此艰辛如此缓慢地从内战的破坏中恢复过来的时候，当他们把从来就不很大的全部市民精力耗费于毫无结果的斗争，以反对每个小邦主和帝国小贵族强加在其臣民的产业上的关税壁垒和专横的贸易条例的时候，当帝国直辖市在行会习气和贵族骄横中衰落下去的时候，荷兰、英国和法国在世界贸易中取得了首要地位，开拓了一个又一个殖民地，使工场

手工业的发展达到最高度的繁荣，直到最后，英国由于蒸汽使它的煤铁矿有了价值，站到现代资产阶级发展的最前列。但是，陈腐可笑的中世纪残余直到1830年还束缚着德国资产阶级的物质发展，当还需要同这种残余进行斗争的时候，就不可能有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只是随着关税同盟[229]的建立，德国人才能够**理解**政治经济学。从这时起，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学才实际上开始输入，以适应德国资产阶级的需要。不久，学者和官僚就抓住了输入的材料，用一种并不替"德意志精神"特别增光的方式对它进行加工改造。于是，从那些耍笔杆的投机家、商人、学究和官僚等各色人物中，产生了德国的经济学著作，这种著作就其乏味、肤浅、空洞、冗长和抄袭情况来说，只有德国的长篇小说才能与之相比。在那些讲求实际的人们当中，最先形成了工业家的保护关税派。他们的权威是李斯特，虽然他的全部洋洋大作是从大陆体系[228]的理论创立者法国人费里埃那里抄来的，但是总不失为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中最优秀的作品。[359]同这一派相对立，在40年代产生了波罗的海沿岸各省份商人的自由贸易派，他们怀着幼稚的然而自私的信仰，重复英国自由贸易派[109]的论据。最后，在从理论方面研究这门学科的学究和官僚中，有像劳先生那样干瘪而无批判能力的采集家；有像施泰因先生那样把外国的原理译成没有弄懂的黑格尔语言的自作聪明的思辨哲学家；还有像黎尔先生那样在"文化史"方面舞文弄墨拾人唾余的人。从这一切最终得出的是官房学[360]，这是一种浇上了一些折中主义经济学调味汁的无所不包的大杂烩，对于准备应考官职的人倒是有用的。

当德国的资产阶级、学究和官僚把英法经济学的初步原理当做不可侵犯的教条死记硬背，力求多少有些了解的时候，德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出现了。它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它一出现，

科学的、独立的、**德国的经济学**也就产生了。这种德国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后者的要点，在本书的序言中已经作了扼要的阐述。①这篇序言的主要部分已经在《人民报》上刊载过，因此我们请读者去参看一下。下面这个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个原理非常简单，它对于没有被唯心主义的欺骗束缚住的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这个事实不仅对于理论，而且对于实践都是最革命的结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②由此可见，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强大的、

---

①见本卷第588—594页。——编者注

②见本卷第591—592页。——编者注

一切时代中最强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面前。

人们的意识取决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政治论证的全部传统方式崩溃了;爱国的义勇精神愤慨地起来反对这种无礼的观点。因此,新的世界观不仅必然遭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对,而且也必然遭到一群想靠**自由**、**平等**、**博爱**的符咒来翻转世界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反对。这种世界观激起了德国庸俗的民主主义空喊家极大的愤怒。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力图剽窃新的思想,然而对这些思想又极端无知。

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二月革命把我们党推上了政治舞台,因此使它不可能进行纯科学的探讨。虽然如此,这个基本观点却像一根红线贯穿着党的一切文献。在所有这些文献中,每个场合都证明,每次行动怎样从直接的物质动因产生,而不是从伴随着物质动因的词句产生,相反地,政治词句和法律词句正像政治行动及其结果一样,倒是从物质动因产生的。

1848—1849年革命失败之后,这样一个时期到来了,在这个时期,从国外来影响德国越来越不可能了,我们党把流亡者之间争吵——因为这成了唯一可能的行动——的场所让给了庸俗民主派。他们心满意足地热衷于争吵,今天大吵大闹,明天握手言欢,后天又公开自己的丑事,他们在美洲到处行乞,接着立刻在瓜分几文讨来的银钱上重

新出丑。在这个时候,我们党却因为重新得到了几分宁静从事研究工作而高兴。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制定这个世界观就已经够忙了;单是这一点,我们党就决不可能堕落到像流亡中的“大人物”①那样深的程度。

这些研究的最初成果就是我们面前的这本书。

---

①参看马克思和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二

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决不是对经济学的个别章节作零碎的批判，决不是对经济学的某些争论问题作孤立的研究。相反，它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既然经济学家无非是这些规律的代言人和辩护人，那么，这种阐述同时也就是对全部经济学文献的批判。

自从黑格尔逝世之后，把一门科学在其固有的内部联系中来阐述的尝试，几乎未曾有过。官方的黑格尔学派从老师的辩证法中只学会搬弄最简单的技巧，拿来到处应用，而且常常笨拙得可笑。对他们来说，黑格尔的全部遗产不过是可以用来套在任何论题上的刻板公式，不过是可以用来在缺乏思想和实证知识的时候及时搪塞一下的词汇语录。结果，正如一位波恩的教授所说，这些黑格尔主义者懂一点“无”，却能写“一切”。情况的确如此，这些先生们虽然自命不凡，却深感自己的虚弱，因此尽可能回避一切重大的问题；陈腐的旧科学由于具有实证知识方面的优势而保持着它的地盘；只是在费尔巴哈宣布废弃思辨概念以后，黑格尔学派才逐渐销声匿迹，于是，旧的形而上学及其固定不变的范畴似乎在科学中又重新开始了它的统治。

这个现象是有它的自然原因的。黑格尔学派的狄亚多希[361]的统治在空谈中结束之后，自然就出现了一个科学的实证内容重新胜过其

形式方面的时代。同时，德国以异乎寻常的精力致力于自然科学，这是与1848年以来资产阶级的强大发展相适应的；在这种科学中思辨倾向从来没有多大地位，随着这种科学的时兴，旧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包括沃尔弗式的极端浅薄的陈词滥调，也就重新流行起来。黑格尔被遗忘了，新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在理论上同18世纪的唯物主义几乎完全没有差别，它胜于后者的地方主要只是拥有较丰富的自然科学的材料，特别是化学和生理学的材料。我们从毕希纳和福格特身上看到这种康德以前的狭隘庸俗思维方式的极为浅薄的翻版，甚至信奉费尔巴哈的摩莱肖特也极其可笑地每时每刻都在最简单的范畴上纠缠不清。平庸的资产阶级理智这匹驽车的笨马，在划分本质和现象、原因和结果的鸿沟面前当然就一筹莫展了；可是，在抽象思维这个十分崎岖险阻的地域行猎的时候，恰好是不能骑驾车的马的。

由此可见，在这里必须解决与政治经济学本身无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应该用什么方法对待科学？一方面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它具有完全抽象的“思辨的”形式，黑格尔就是以这种形式把它留下来的；另一方面是平庸的、现在重新时兴的、实质上是沃尔弗式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这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他们那些缺乏内在联系的大部头著作时采用的方法。后一种方法，曾被康德特别是黑格尔在理论上摧毁，只是由于惰性和缺乏一种别的**简单**方法，才使它能够在实际上继续存在。另一方面，黑格尔的方法以其**现有的**形式是完全不能用的。它实质上是唯心的，而这里要求发展一种比从前所有世界观都更加唯物的世界观。它是从纯粹思维出发的，而这里必须从最过硬的事实出发。一种自己承认是“从无通过无到无”①的方法，以这种形式在这

①引自黑格尔《逻辑学》第1部第2编。——编者注

里是根本不适用的。虽然如此，它却是一切现有逻辑材料中至少可以加以利用的唯一材料。它没有受到过批判，没有被驳倒过；任何反对这位伟大的辩证论者的人都没有能够在这个方法的巍然大厦上打开缺口；它被遗忘，是因为黑格尔学派不知道可以用它干些什么。因此，首先应当对黑格尔的方法作一番透彻的批判。

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做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平行着，而后者按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验证。真正的关系因此颠倒了，头脚倒置了，可是实在的内容却到处渗透到哲学中；何况黑格尔不同于他的门徒，他不像他们那样以无知自豪，而是所有时代中最有学问的人物之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尽管他的历史哲学中的许多东西现在在我们看来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辈，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在《现象学》、《美学》、《哲学史》[362]中，到处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到处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虽然是抽象地歪曲了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的。

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直接的理论前提，单单由于这种历史观，也就为逻辑方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如果这个被遗忘了的辩证法从"纯粹思维"的观点出发就已经得出这样的结果，而且，如果它轻而易举地就结束了过去的全部逻辑学和形而上学，那么，在它里面除了诡辩和烦琐言辞之外一定还有别的东西。但是，对这个方法的批判不是一件小事，全部官方哲学过去害怕而且现在还害怕干这件事。

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

二

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形式的简单形态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做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

对经济学的批判，即使按照已经得到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既然在历史上也像在它的文献的反映上一样，大体说来，发展也是从最简单的关系进到比较复杂的关系，那么，政治经济学文献的历史发展就提供了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线索，而且，大体说来，经济范畴出现的顺序同它们在逻辑发展中的顺序也是一样的。这种形式表面上看来有好处，就是比较明确，因为这正是跟随着**现实的**发展，但是实际上这种形式至多只是比较通俗而已。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并且，写经济学史又不能撇开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这就会使工作漫无止境，因为一切准备工作都还没有做。因此，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

我们采用这种方法，是从历史上和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关系出发，因而在这里是从我们所遇到的最初的经

济关系出发。我们来分析这种关系。既然这是一种**关系**，这就表示其中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我们分别考察每一个方面；由此得出它们相互关联的性质，它们的相互作用。于是出现了需要解决的矛盾。但是，因为我们这里考察的不是只在我们头脑中发生的抽象的思想过程，而是在某个时候确实发生过或者还在发生的现实过程，因此这些矛盾也是在实践中发展着的，并且可能已经得到了解决。我们考察这种解决的方式，发现这是由建立新关系来解决的，而这个新关系的两个对立面我们现在又需要展开说明，等等。

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开始，即从产品由个别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换的时刻开始。进入交换的产品是商品。但是它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在这个**物**中、在这个产品中结合着两个人或两个公社之间的**关系**，即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两者已经不再结合在同一个人身上了。在这里我们立即得到一个贯穿着整个经济学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头脑中引起过可怕混乱的特殊事实的例子，这个事实就是：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诚然，这个或那个经济学家在个别场合也曾觉察到这种联系，而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这种联系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从而使最难的问题变得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现在也能理解了。

如果我们从不同的方面来考察商品，并且所考察的是充分发达了的商品，而不是在两个原始公社之间自然形成的物物交换中刚在艰难地发展着的商品，那么，它在我们面前就表现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方面，这里，我们立即进入了经济学的争论范围。谁想要找一个鲜明的例子，来证明现今发展阶段上的德国的辩证方法比旧时

庸俗唠叨的形而上学方法优越，至少像铁路比中世纪的交通工具优越一样，那就请他读一读亚当·斯密或其他某位著名的官方经济学家的著作，看看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使这些先生受了多大折磨，看看把两者分清并理解它们每个特有的规定性对这些人来说是多么困难，然后再把马克思的简单明了的说明与之对比一下。

在说明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后，商品就被按照它进入**交换过程**时那样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直接统一来叙述。这里产生了怎样的矛盾，读者可以在第20—21页①上看到。我们仅仅指出，这些矛盾不只有理论的、抽象的意义，而且同时反映出从直接的交换关系，即简单的物物交换的本性中产生出来的困难，反映出这种最初的粗陋的交换形式所必然遇到的不可能性。解决这种不可能性的办法，就是把代表一切其他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特性转给一种特殊的商品——**货币**。然后，在第二章中阐述货币或简单流通，即(1)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并且在这里，用货币计量的价值即**价格**得到了更切近的规定；(2)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3)作为两个规定的统一体，作为**实在的货币**，作为资产阶级一切物质财富的代表。第一分册的叙述到此为止，从货币到资本的转化留待第二分册叙述。

我们看到，采用这个方法时，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相反，逻辑的发展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因此这里插入了各种各样的例证，有的指出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现实历史进程，有的指出经济文献，以便从头追溯明确作出经济关系的各种规定的过程。对于个别的、多少是片面的或混乱的见解的批判，实质上在逻辑发展本身中已经作出了，因此可以叙述得很简略。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35—437页。——编者注

在第三篇论文中，我们将说明本书的经济学内容。

弗·恩格斯写于1859年8月3—15日

载于1859年8月6日和20日《人民报》第14期和16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3卷翻译

卡·马克思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363]

有一位思想极其深刻但又怪诞的研究人类发展原理的思辨哲学家①，常常把他所说的两极相联规律赞誉为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在他看来，"两极相联"这个朴素的谚语是一个伟大而不可移易地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是哲学家所离不开的定理，就像天文学家离不开开普勒的定律或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

"两极相联"是否就是这样一个普遍的原则姑且不论，中国革命②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却是这个原则的一个明显例证。欧洲人民的下一次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决定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决定于现存其他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决定于俄国的威胁及其带来的可能发生全欧战争的后果。这看来像是一种非常奇怪、非常荒诞的说法，然而，这决不是什么怪论，凡是仔细考察了当前情况的人，都会相信这一点。

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经延续了约十年之久，现在汇合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发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

①黑格尔。——编者注

②太平天国革命。——编者注

鸦片的麻醉剂。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这种联系从那时起就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黄金[364]的吸引之下迅速地发展起来。同时，这个帝国的银币——它的血液——也开始流向英属东印度。

在1830年以前，中国人在对外贸易上经常是出超，白银不断地从印度、英国和美国向中国输出。可是从1833年，特别是1840年以来，由中国向印度输出的白银，几乎使天朝帝国的银源有枯竭的危险。因此皇帝①下诏严禁鸦片贸易，结果引起了比他的诏书更有力的反抗。除了这些直接的经济后果之外，和私贩鸦片有关的行贿受贿完全腐蚀了中国南方各省的国家官吏。正如皇帝通常被尊为全中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认为对他们各自的管区维持着这种父权关系。可是，那些靠纵容私贩鸦片发了大财的官吏的贪污行为，却逐渐破坏着这一家长制权威——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存在这种情况的地方，主要正是首先起义的南方各省。所以几乎不言而喻，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统治权。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

中国过去几乎不输入英国棉织品，英国毛织品的输入也微不足道，但从1833年对华贸易垄断权由东印度公司[365]手中转到私人商业手中之后，这两种商品的输入便迅速地增加了。从1840年其他国家特别是我国[366]也开始参加和中国的通商之后，这两项输入增加得更

①道光帝。——编者注

多了。这种外国工业品的输入，对本国工业也发生了类似过去对小亚细亚、波斯和印度所发生的那种影响。中国的纺织业者在外国的这种竞争之下受到很大的损害，结果社会生活也受到了相应程度的破坏。

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工业的破坏性影响、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更重更难负担，旧税之外又加新税。因此，1853年1月5日皇帝①在北京下的一道上谕中，就责成武昌、汉阳南方各省督抚减缓捐税，特别是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准额外加征；否则，这道上谕中说，“小民其何以堪？”又说：

“……庶几吾民于颠沛困苦之时，不致再受追呼迫切之累。”367

这种措辞，这种让步，记得在1848年我们从奥地利这个日耳曼人的中国也同样听到过。

所有这些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的破坏性因素，到1840年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之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可是现在，当英国引起了中国革命的时候，便发生一个问题，即这场革命将来会对英国并且通过英国对欧洲发生什么影响？这个问题是不难解答的。

①咸丰帝。——编者注

我们时常提请读者注意英国的工业自1850年以来空前发展的情况。在最惊人的繁荣当中，就已不难看出日益迫近的工业危机的明显征兆。尽管有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发现，尽管人口大量地、史无前例地外流，但是，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事情的话，到一定的时候，市场的扩大仍然会赶不上英国工业的增长，而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也将像过去一样，必不可免地要引起新的危机。这时，如果有一个大市场突然缩小，那么危机的来临必然加速，而目前中国的起义对英国正是会起这种影响。英国需要开辟新市场或扩大旧市场，这是英国降低茶叶税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英国预期，随着茶叶进口量的增加，向中国输出的工业品也一定会增加。在1833年取消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以前，联合王国对中国的年输出总值只有60万英镑，而1836年达到了1 326 388英镑，1845年增加到2 394 827英镑，到1852年便达到了300万英镑左右。从中国输入的茶叶数量在1793年还不超过16 067 331磅，然而在1845年便达到了50 714 657磅，1846年是57 584 561磅，现在已超过6 000万磅。

上一季茶叶的采购量从上海的出口统计表上可以看出，至少比前一年增加200万磅。新增加的这一部分应归因于两种情况：一方面，1851年底市场极不景气，剩下的大量存货被投入1852年的出口；另一方面，在中国，人们一听到英国修改茶叶进口的法律的消息，便把所有可供应的茶叶按提高很多的价格全部投入这个现成的市场。可是讲到下一季的茶叶采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一点可以从伦敦一家大茶叶公司的下面一段通信中看出：

“上海的恐慌据报道达到了极点。黄金**因人们抢购贮藏**而价格上涨25%以上。白银现已不见，以致英国轮船向中国交纳关税所需用的白银都**根本弄不到**。因此，阿礼国先生同意向中国当局担保，一俟接到东印度公司的票据或其他有

信誉的有价证券，便交纳这些关税。从商业的最近未来这一角度看，**金银的缺乏**是一个最不利的条件，因为它恰恰是发生在最需要金银的时候。茶和丝的收购商有了金银才能够到内地去采购，因为采购**要预付大量金银，以使生产者能够进行生产**…… 每年在这个时候都已开始签订新茶收购合同，可是现在人们不讲别的问题，只讲如何保护生命财产，一切交易都陷于停顿…… 如不备好资金在四五月间把茶叶购妥，那么，包括红茶绿茶的精品在内的早茶，必然要像到圣诞节还未收割的小麦一样损失掉。”①

停泊在中国领海上的英、美、法各国的舰队，肯定不能提供收购茶叶所需的资金，而它们的干涉却能够很容易地造成混乱，使产茶的内地和出口茶叶的海港之间的一切交易中断。由此看来，收购目前这一季茶叶势必要提高价格——在伦敦投机活动已经开始了，而要收购下一季茶叶，肯定会缺少大量资金。问题还不止于此。中国人虽然也同革命震荡时期的一切人一样，愿意将他们手上全部的大批存货卖给外国人，可是，正像东方人在担心发生大变动时所做的那样，他们也会把他们的茶和丝贮存起来，非付给现金现银是不大肯卖的。因此，英国就不免要面临这样的问题：它的主要消费品之一涨价，金银外流，它的棉毛织品的一个重要市场大大缩小。甚至《经济学家》杂志，这个善于把一切使商业界人心不安的事物化忧为喜的乐观的魔术师，也不得不说出这样的话：

“我们千万不可沾沾自喜，以为给我们向中国出口的货物找到了同以前一样大的市场…… 更可能的是：我们对中国的出口贸易要倒霉，对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的产品的需求量要减少。”①

不要忘记，茶叶这样一种必需品涨价和中国这样一个重要市场缩小的时候，将正好是西欧发生歉收因而肉类、谷物及其他一切农产品涨

①见1853年5月21日《经济学家》第508期。——编者注

价的时候。这样，工厂主们的市场就要缩小，因为生活必需品每涨一次价，国内和国外对工业品的需求量都要相应地减少。现在大不列颠到处都在抱怨大部分庄稼种植情况不好。关于这个问题《经济学家》说：

> “在英国南部，不但会有许多田地错过各种作物的农时而未播种，而且已经播种的田地有许多看来也会是满地杂草，或者是不利于谷物生长。在准备种植小麦的阴湿贫瘠的土地上，显然预示着灾荒。现在，种饲用甜菜的时节可以说已经过去了，而种上的很少；为种植芜菁备田的季节也快要过去，然而种植这一重要作物的必要的准备工作却一点也没有完成…… 雪和雨严重地阻碍了燕麦的播种。早播种下去的燕麦很少，而晚播种的燕麦是很难有好收成的…… 许多地区种畜损失相当大。”①

谷物以外的农产品的价格比去年上涨20%—30%，甚至50%。欧洲大陆的谷物价格比英国涨得更高。在比利时和荷兰，黑麦价格足足涨了100%，小麦和其他谷物也跟着涨价。

在这样的情况下，既然英国的贸易已经经历了通常商业周期的大部分，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这将是一个奇观：当西方列强用英、法、美等国的军舰把“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运河口的时候，中国却把动乱送往西方世界。这些贩卖“秩序”，企图扶持摇摇欲坠的满族王朝的列强恐怕是忘记了：仇视外国人，把他们排除在帝国之外，这在过去仅仅是出于中国地理上、人种上的原因，只是在满族鞑靼人②征服了全国以后才形成为一种政治

①见1853年5月14日《经济学家》第507期。——编者注

②西方通常将中国北方诸民族泛称为“鞑靼”。所谓“满族鞑靼人”也就是满族。——编者注

原则。毫无疑问，17世纪末竞相与中国通商的欧洲各国彼此间的剧烈纷争，有力地助长了满族人实行排外的政策。可是，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个新的王朝害怕外国人会支持一大部分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出于此种考虑，它那时禁止外国人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要来往只有通过离北京和产茶区很远的一个城市广州。外国人要做生意，只限同领有政府特许执照从事外贸的行商[368]进行交易。这是为了阻止它的其余臣民同它所仇视的外国人发生任何联系。无论如何，在现在这个时候，西方各国政府进行干涉只能使革命更加暴烈，并拖长商业的停滞。

同时，从印度这方面来看还必须指出，印度的英国当局的收入，足足有七分之一要靠向中国人出售鸦片，而印度对英国工业品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取决于印度的鸦片生产。不错，中国人不大可能戒吸鸦片，就像德国人不可能戒吸烟草一样。可是大家都知道，新皇帝①颇有意在中国本土种植罂粟和炼制鸦片，显然，这将使印度的鸦片生产、印度的收入以及印度斯坦的商业资源同时受到致命的打击。虽然利益攸关的各方或许不会马上感觉到这种打击，但它到一定的时候会实实在在地起作用，并且使我们前面预言过的普遍的金融危机尖锐化和长期化。

欧洲从18世纪初以来没有一次严重的革命事先没发生过商业危机和金融危机。1848年的革命是这样，1789年的革命也是这样。不错，我们每天都看到，不仅称霸世界的列强和它们的臣民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阶级和阶级之间发生冲突的迹象日趋严重，而且现时的列强相互之间的冲突正在一步步尖锐，乃至剑拔弩张，非由国君们来

①咸丰帝。——编者注

打最后的交道不可了。在欧洲各国首都，每天都传来全面大战在即的消息，第二天的消息又说和平可以维持一星期左右。但是我们可以相信，无论欧洲列强间的冲突怎样尖锐，无论外交方面的形势如何严峻，无论哪个国家的某个狂热集团企图采取什么行动，只要有一丝一毫的繁荣气息，国君们的狂怒和人民的愤恨同样都会缓和下来。战争也好，革命也好，如果不是来自工商业普遍危机，都不大可能造成全欧洲的纷争，而那种危机到来的信号，总是来自英国这个欧洲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代表。

现在，英国工厂空前扩充，而官方政党都已完全衰朽瓦解；法国的全部国家机器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从事诈骗活动和证券交易的商行；奥地利则处于破产前夕；到处都积怨累累，行将引起人民的报复；反动的列强本身利益互相冲突；俄国再一次向全世界显示出它的侵略野心——在这样的时候，上述危机所必将造成的政治后果是毋庸赘述的。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5月31日前后

作为社论载于1853年6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9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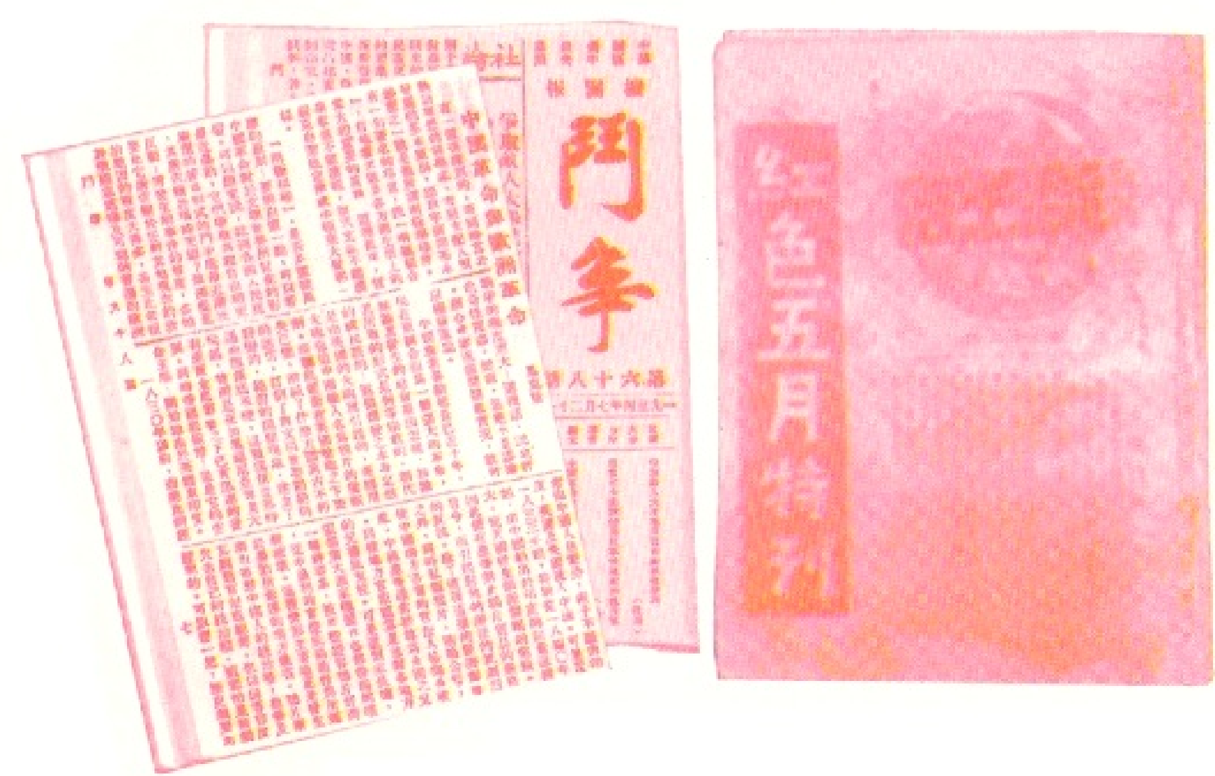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2卷翻译


馬克思主義的民族革命論

中國及歐洲的革命

民族革命原理


鬥爭

第六十八期

中國革命與歐洲革命

紅色五月特刊

1926—1934年间载有《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译文的部分书刊

卡·马克思

*俄国的对华贸易

在对华贸易和交往方面，帕麦斯顿勋爵和路易-拿破仑采用武力来进行扩展，而俄国所处的地位却显然令人大为羡慕。真的，非常可能，从目前同中国人发生的冲突中，俄国不要花费一个钱，不用出动一兵一卒，到头来能比任何一个参战国都得到更多的好处。

俄国同中华帝国的关系是极为奇特的。当英国人和我们[366]自己——至于法国人，他们参加目前的军事行动只能算是客串，因为他们实际上没有同中国进行贸易——连跟两广总督直接联系的权利都得不到的时候，俄国人却享有在北京派驻使节的特权。固然，据说这种特权是俄国甘愿被天朝计入中华帝国的纳贡藩属之列才换得的。但这毕竟使俄国外交在中国，也像在欧洲一样，能够产生一种决不仅限于纯粹外交事务的影响。

因为俄国人被排除在同中国的海上贸易之外，所以他们过去和现在同有关这个问题的纠纷，都没有任何利害关系或牵连；他们也没有尝到中国人对外国人的那种反感——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从海上来到他们国家的一切外国人抱有反感，而且并非毫无根据地把他们同那些看来总是出没于中国沿海的海盗式冒险家相提并论。然而俄国人却自己独享内地陆路贸易，这成了他们被排除于海上贸易之外的一种补偿。看来，在内地陆路贸易中，他们不会有什么竞争者。这种贸易是依照1768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时订立的一项条约[369]进行

的，以恰克图作为主要的（如果不算是唯一的）活动中心。恰克图位于西伯利亚南部和中国的鞑靼[①]交界处、在流入贝加尔湖的一条河上、伊尔库茨克城以南约100英里的地方。这种一年一度的集市贸易，由12名代理商管理，其中6名俄国人，6名中国人；他们在恰克图会商并规定双方商品交换的比率，因为贸易完全是用以货易货的方式进行的。中国人方面拿来交换的货物主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主要是棉织品和毛织品。近年来，这种贸易似乎有很大的增长。10年或12年以前，在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平均不超过4万箱；但在1852年却达175 000箱，其中大部分是上等货，即在大陆消费者中间享有盛誉的所谓商队茶，完全不同于由海上进口的次等货。中国人卖出的其他商品是少量的食糖、棉花、生丝和丝织品，不过这一切数量都很有限。俄国人则付出数量大致相等的棉织品和毛织品，再加上少量的俄国皮革、金属制品、毛皮，甚至还有鸦片。买卖货物的总价值——按照公布的账目来看，货物定价都不高——竟达1 500万美元以上的巨额。1853年，因为中国内部不安定[②]以及产茶省区的通路被明火执仗的起义者队伍占领，所以运到恰克图的茶叶数量减少到5万箱，那一年的全部贸易额只有600万美元左右。但是在随后的两年内，这种贸易又恢复了，运往恰克图供应1855年集市的茶叶不下112 000箱。

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要塞和集市地点发展成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它被选中成为这一带边区的首府，荣幸地驻上了一位军事司令官和一位民政长官。同时，恰克图和距离它约900英里的北京之间，最近建立了直接的、定期的

①西方通常将中国北方诸民族泛称为“鞑靼”，此处显然指蒙古。——编者注

②指太平天国革命。——编者注

邮政交通以传递公文。

很显然，如果同中国的海上贸易由于现在发生的军事行动而停止，欧洲所需的全部茶叶可能就只有靠这条商路供应了。实际上，有人认为，即使在海上贸易畅通的情况下，俄国在完成了它的铁路网建设以后，也会在供应欧洲市场茶叶方面成为海运国家的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这些铁路将直接沟通喀琅施塔得和利包两港同俄国内地的古城——下诺夫哥罗德（在恰克图经商的商人居住的地方）之间的交通。欧洲将从这条陆路得到茶叶的供应，自然比使用我们[366]拟议中的太平洋铁路来达到这一目的可能性要大。中国的另一宗主要出口物——丝，也是一种体积小价值大因而完全可以由陆路运输的货物；同时，同中国的这种贸易也为俄国的工业品打开了在别处找不到的销路。

然而，可以看出，俄国的努力决不只限于发展这种内陆贸易。它占领黑龙江沿岸的地方——当今中国统治民族的故乡——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370]它在这方面的努力，在上次战争[371]期间曾受阻中断，但是，无疑它将来会恢复并大力推进这种努力。俄国占领了千岛群岛和与其毗邻的堪察加沿岸。它在这一带海面上已经拥有一支舰队，无疑它将来会利用可能出现的任何机会来谋求参与同中国的海上贸易。不过对它说来，这与扩大已经为它所垄断的陆路贸易相比，其重要性就差多了。

卡·马克思写于1857年3月18日前后

作为社论载于1857年4月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981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15卷翻译

卡·马克思

*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

几年以前，当在印度施行的可怕的刑讯制度在议会中被揭露的时候，极可尊敬的东印度公司[365]的董事之一詹姆斯·霍格爵士曾厚颜无耻地硬说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可是后来的调查证明，这种说法有事实作根据，而且这些事实对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来说应当是十分清楚的。因此，詹姆斯爵士对于东印度公司被指控的那些可怕的事情，只有或者承认是“有意不闻”，或者承认是“明知故纵”。看来，英国现任首相帕麦斯顿勋爵和外交大臣克拉伦登伯爵现在也处于同样的窘境。首相在市长①不久前举行的宴会上的演说②中，企图为施于中国人的残暴行为进行辩护，他说：

> “如果政府在这件事情上赞同采取无理的行动，毫无疑问，它走的就是一条应受议会和全国谴责的道路。但是相反，我们深信这些行动是必需的和至关重要的。我们认为，我国受到了严重的欺凌。我们认为，我国同胞在地球的遥远地方遭到了种种侮辱、迫害和暴虐，对此我们不能默不作声。（喝彩声）我们认为，我国根据条约应享有的权利已遭到破坏，而在当地负责保护我国在世界那个地区利益的人员，不仅有理由而且有义务尽量利用他们所能采取的手段来表示对这些暴行的义愤。我们认为，如果我们不赞同采取那些在我们看来是正确的，而且我们设身处地也会认为自己有责任采取的行动，那我们就是辜负了我国同胞对我们所寄予的信任。（喝彩声）”

---

①托·奎·芬尼斯。——编者注

②亨·帕麦斯顿《1857年3月20日在市长官邸举行的宴会上的演说》，载于1857年3月21日《泰晤士报》第22634号。——编者注

但是，无论英国人民和全世界怎样为这些讲得头头是道的解释所欺骗，勋爵大人自己肯定不会相信这些解释的真实性，要是他认为这些都是真的，那就暴露出他是有意不去了解真实情况，同"明知故纵"几乎同样是不可原谅的。自从英国人在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第一个消息传来以后，英国政府报纸和一部分美国报刊就连篇累牍地对中国人进行了大量的斥责，大肆攻击中国人违背条约的义务、侮辱英国的国旗、羞辱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如此等等。可是，除了亚罗号划艇事件[372]以外，它们举不出一个明确的罪名，举不出一件事实来证实这些指责。而且就连这个事件的实情也被议会中的花言巧语歪曲得面目全非，以至使那些真正想弄清这个问题真相的人深受其误。

亚罗号划艇是一只中国小船，船员都是中国人，但是为几个英国人所雇用。这只船曾经取得暂时悬挂英国国旗航行的执照，可是在所谓的"侮辱事件"发生以前，这张执照就已经满期了。据说，这只船曾被用来偷运私盐，船上有几名歹徒——中国的海盗和走私贩，当局早就因为他们是惯犯而在设法缉捕。当这只船不挂任何旗帜下帆停泊在广州城外时，缉私水师得知这些罪犯就在船上，便逮捕了他们。要是我们的港口警察知道附近某一只本国船或外国船上隐匿水贼和走私贩，也一定会这样做的。可是因为这次逮捕妨碍了货主的商务，船长就向英国领事①控告。这位领事是个就职不久的年轻人，据我们了解是一个性情暴躁的人。他亲自跑到船上，同只是履行自己职责的缉私水师大吵大闹，结果一无所得。随后他急忙返回领事馆，用命令式的口吻向两广总督提出书面要求：放回被捕者并道歉，同时致书香

①斯·巴夏礼。——编者注

港的约翰·包令爵士和海军将军西马糜各厘，说什么他和英国国旗遭到了不可容忍的侮辱，并且相当明显地暗示说，期待已久的向广州来一次示威的良机到来了。

叶总督有礼貌地、心平气和地答复了激动的年轻英国领事的蛮横要求。他说明捕人的理由，并对因此而引起的误会表示遗憾。同时他断然否认有丝毫侮辱英国国旗的意图，而且送回了水手，因为尽管这些人是依法逮捕的，但他不愿为拘留他们而招致这样严重的误会。然而这一切并没有使巴夏礼领事先生感到满意，他坚持要求正式道歉和以隆重礼节送回被捕者，否则叶总督必须承担一切后果。接着西马糜各厘将军率领英国舰队抵达，旋即开始了另一轮公函往来：海军将军态度蛮横，大肆恫吓，中国总督则心平气和、冷静沉着、彬彬有礼。西马糜各厘将军要求在广州城内当面会商。叶总督说，这违反先例，而且乔治·文翰爵士曾答应不提这种要求。如果有必要，他愿意按照常例在城外会晤，或者采取其他不违反中国习惯与相沿已久的礼节的方式来满足将军的愿望。但是这一切都未能使这位英国强权在东方的好战的代表称心如意。

这场极端不义的战争就是根据上面简单叙述的理由而进行的——现在向英国人民提出的官方报告完全证实了这种叙述。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站不住脚的借口下发生的！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至少那些愿意弄清这个问题的人们——都知道这些非难是多么虚伪和空洞。有人企图转移对主要问题的追究，给公众造成一个印象：似乎在亚罗号划艇事件以前就有大量的伤害行为足以构成开战的理由。可是这些不分青红皂白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英国人控告中

国人一桩，中国人至少可以控告英国人九十九桩。

英国报纸对于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在英国庇护下每天所干的破坏条约的可恶行为真是讳莫如深！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外国人经常贿赂下级官吏而使中国政府失去在商品进出口方面的合法收入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对那些被卖到秘鲁沿岸去当不如牛马的奴隶、被卖到古巴去当契约奴隶的受骗契约华工横施暴行"以至杀害"的情形[373]，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外国人常常欺凌性情柔弱的中国人的情形以及这些外国人带到各通商口岸去的伤风败俗的弊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我们所以听不到这一切以及更多得多的情况，首先是因为在中国以外的大多数人很少关心这个国家的社会和道德状况；其次是因为按照精明和谨慎的原则不宜讨论那些不能带来钱财的问题。因此，坐在家里而眼光不超出自己买茶叶的杂货店的英国人，完全可以把政府和报纸塞给公众的一切胡说吞咽下去。

与此同时，在中国，压抑着的、鸦片战争时燃起的仇英火种，爆发成了任何和平和友好的表示都未必能扑灭的愤怒烈火。[374]

卡·马克思写于1857年3月22日前后

作为社论载于1857年4月1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984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15卷翻译

弗·恩格斯

波斯和中国

英国人在亚洲刚结束了一场战争[375]，现在又开始进行另一场战争[376]了。波斯人对英国侵略的抵抗和中国人迄今对英国侵略所进行的抵抗，形成了值得我们注意的对照。在波斯，欧洲式的军事组织被移植到亚洲式的野蛮制度上；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则用自己的手段与欧洲人进行斗争。波斯被打得一败涂地，而绝望的、陷于半瓦解状态的中国，却找到了一种抵抗办法，这种办法实行起来，就不会再有第一次英国对华战争①那种节节胜利的形势出现了。

波斯的状况与1828—1829年俄土战争[377]时土耳其的状况相同。英国的、法国的、俄国的军官曾先后尝试过组织波斯的军队。各种办法相继采用，但是每一种办法都行不通，因为那些本来应在这些办法的实施下成为欧洲式军官和士兵的东方人忌妒、阴险、愚昧、贪婪而又腐败。新式的正规军从来没有机会在战场上考验一下自己的组织性和战斗力。它的全部战绩只限于对库尔德人、土库曼人和阿富汗人的几次征讨，而在这几次征讨中，它只是作为波斯数量众多的非正规骑兵的某种核心或预备队。实际作战的主要是非正规骑兵，而正规军通常只是利用它那表面威武的阵势来吓唬敌人而已。最后，同英国的战争终于爆发了。

① 即1840—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编者注

英军进攻布什尔，遇到了虽然无效但却勇敢的抵抗。但是在布什尔作战的并不是正规军，而是从住在海滨地区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中征召兵员编成的非正规部队。正规军当时还正在大约60英里以外的山区集结。最后，他们向前挺进了。英印军队与他们在中途相遇；虽然波斯人很熟练地运用了自己的大炮，并按照最佳原则排列了方阵，但是仅仅一个印度骑兵团的一次冲杀，就把整个波斯军队，无论警卫部队还是基干部队，完全扫出了战场。要想知道这些印度正规骑兵自己作战的本领如何，只要看看诺兰上尉写的一本关于骑兵的书[①]就够了。英印军官认为他们无用已极，远不如英印非正规骑兵。诺兰上尉找不出一个能说明他们表现良好的战例。可是600名这样的骑兵竟能打跑1万名波斯军队！波斯正规军如此心寒胆裂，以致从那以后，除炮兵外，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进行过一次抵抗。在穆罕默腊，他们远远地避开危险，让炮兵单独防守炮台，炮台一被打哑，他们就立即撤退；当英军为了进行侦察，派300名步兵和50名非正规骑兵登陆时，波斯全军即行退却，把辎重、军需品和枪炮都留给了侵略者——你不能把这些英国人叫做胜利者。

但是不应根据这一切来指责波斯人是懦夫的民族，也不应由此认为不能教东方人学欧洲式战术。1806—1812年俄土战争[378]和1828—1829年俄土战争提供了许多这方面的事例。抵抗俄军最有力的都是非正规部队，这些非正规部队的兵员既有从设防城市征召来的，也有从山区省份征召来的。正规军只要一上战场，就立刻被俄军击溃，并且常常刚一听到枪炮声就逃跑；而一个由阿尔瑙特人[②]编成

①刘·爱·诺兰《骑兵的历史与战术》。——编者注

②土耳其人对阿尔巴尼亚人的称呼。——编者注

的非正规连，竟在瓦尔纳的一个深谷中成功地抵抗俄军的围攻达几星期之久。但是在最近的那场战争中，从奥尔泰尼察和切塔泰到卡尔斯和因古里河，土耳其的正规军每次交战都击败了俄军。379

事实是：把新的军队按欧洲方式来加以编组、装备和操练，还远不能算是完成了把欧洲的军事组织引用于野蛮民族的工作。这只是第一步。采用某种欧洲式的军事条令，也是不够的；欧洲式的军事条令不能保证培养出欧洲式的纪律，就如同一套欧洲式的操典本身不能产生欧洲式的战术和战略一样。主要的问题，同时也是主要的困难就在于：需要造就一批按照欧洲的现代方式培养出来的、在军事上完全摆脱了旧的民族偏见和习惯的、能使新部队振作精神的军官和士官。这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一定还会遇到东方人的愚昧、急躁、偏见以及东方宫廷所固有的宠辱无常等因素的最顽强的抗拒。只要士兵在检阅时可以列队行进，在转换方向、展开队形和排成纵队时不致乱成一团，那么苏丹或沙赫就会很容易认为自己的军队已经无所不能了。至于军事学校，由于它们收效很慢，所以在东方政府不稳定的情况下，很难期望收到任何效果。甚至在土耳其，受过训练的军官也很少，土耳其军队如果不是有大量的叛教者①和欧洲军官，它在最近那次战争中就根本打不了仗。

到处都成为例外的唯一兵种是炮兵。东方人在这方面太无知无能了，他们只好把炮兵的管理完全交给欧洲教官。结果，在波斯也像在土耳其一样，炮兵比步兵和骑兵强得多。

英印军队是所有按照欧洲方式组织起来的东方军队中最老的一支，也是唯一不隶属于东方政府而隶属于纯粹欧洲式政府，并且差

①指原信基督教后改信伊斯兰教的人。——编者注

不多完全由欧洲军官指挥的军队。很自然，在上述那种情况下，这样一支军队，又有大量英国后备部队和强大海军做后盾，是不难把波斯的正规军击溃的。挫折越严重，对于波斯人越有好处。正如土耳其人已经懂得的那样，波斯人现在也会懂得：欧洲式的服装和阅兵操练本身还不是一种护符；再过20年以后，波斯人可能就会像个样子了，就像土耳其人在最近的各次胜利中所表现的那样。

据说，攻克布什尔和穆罕默腊的军队将立即调往中国。在中国，他们将遇到不同的敌人。抗击他们的将不是依照欧洲方式部署的部队，而是大群亚洲人摆成的不规则的战阵。毫无疑问，他们将不难对付这种队伍。可是，如果中国人发起全民战争来抵抗他们，如果野蛮人毫无顾虑地运用他们善于运用的唯一武器，英国人又怎么办呢？

现在，中国人的情绪与1840—1842年战争①时的情绪已显然不同。那时人民保持平静，让皇帝的军队去同侵略者作战，失败之后，则抱着东方宿命论的态度屈从于敌人的暴力。但是现在，至少在迄今斗争所及的南方各省，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他们经过极其冷静的预谋，在供应香港欧洲人居住区的面包里大量地投放了毒药。（有几只面包送交李比希化验。他发现面包的各个部分都含有大量的砒霜，这表明在和面时就已掺入砒霜。但是药量过大，结果一定是变成了呕吐剂，因而抵消了毒效。）他们暗带武器搭乘商船，而在中途杀死船员和欧洲乘客，夺取船只。他们绑架和杀死所能遇到的每一个外国人。连移民到外国去的苦力都好像事先约定好了，在每一艘移民船上起来暴动，夺取船只，他们宁愿与船同沉海底

①第一次鸦片战争。——编者注

或者在船上烧死，也不投降。甚至国外的华侨——他们向来是最听命和最驯顺的臣民——也进行密谋，突然在夜间起事，如在沙捞越就发生过这种情形；又如在新加坡，当局只是靠武力和戒备才压制住他们。是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造成了这一所有中国人普遍奋起反抗所有外国人的局面，并使之表现为一场灭绝战。

军队对于采取这种作战方法的民族有什么办法呢？军队应当在什么地方进入敌国，深入到什么地方和怎样在那里坚守下去呢？这些把炽热的炮弹射向毫无防御的城市、杀人又强奸妇女的文明贩子们[380]，尽可以把中国人的这种抵抗方法叫做卑劣的、野蛮的、凶残的方法；但是只要这种方法有效，那么对中国人来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既然英国人把他们当做野蛮人对待，那么英国人就不能反对他们充分利用他们的野蛮所具有的长处。如果他们的绑架、偷袭和夜间杀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卑劣行为，那么这些文明贩子们就不应当忘记：他们自己也承认过，中国人采取他们通常的作战方法，是不能抵御欧洲式的破坏手段的。

简言之，我们不要像道貌岸然的英国报刊那样从道德方面指责中国人的可怕暴行，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①，这是一场维护中华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虽然你可以说，这场战争充满这个民族的目空一切的偏见、愚蠢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野蛮，但它终究是人民战争。而对于起来反抗的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规则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反抗的民族所刚刚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

这一次，英国人陷入了窘境。直到现在，中国的民族狂热似乎还

①西塞罗《论神之本性》第3章第40页。——编者注

只限于南方未参加大起义①的几个省份。战争是否将以这几个省为限呢?这样,它就不会得到任何结果,因为中国的一切要害地方都不会受到威胁。而如果这种狂热延及内地的人民,那么这场战争对于英国人将是非常危险的。广州城可以被整个毁掉,沿海能攻占的一切据点都可以被攻占,可是英国人所能调集的全部兵力都不足以攻取并守住广东和广西两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能再干些什么呢?广州以北到上海、南京一带的地区都掌握在中国起义者手里,触犯他们,那将是下策;而南京以北唯一可能在袭击后收到决定性效果的地点是北京。这样就得在海岸上建立有防御工事和守备部队的作战基地,进军途中要克服一个一个的障碍,要留下分遣队以保证同海岸的交通,而且要以大军压境之势抵达这座与伦敦一样大、离登陆地点100英里远的城池之下。可是所需的军队在哪里呢?另一方面,对京城的示威行动如果成功,就会从根本上动摇中华帝国本身的存在,就会加速清王朝的倾覆,就会给俄国而不是给英国铺平前进的道路。

新的英中战争形势极为复杂,使人根本无法预料它将如何发展。在几个月内兵力不足以及在更长时间内缺乏决心,将使英军不会有什么行动,只有在某个不重要的地方或许出现例外,在目前情况下广州也可以算是这样的地方。

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旧中国的死亡时刻正在迅速临近。国内战争已经把帝国的南方与北方分开,看来起义者之王②在南京不会受到帝国军队的危害(当然不能说不会受到他自己手下人阴谋之害[381]),正如天朝皇帝③在北京不会受到起义者的危害一样。广

①指太平天国革命。——编者注

②洪秀全。——编者注

③咸丰帝。——编者注

州迄今是在独自进行着一种反对英国人、也是根本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战争；正当英法两国的海陆军向香港集结之际，西伯利亚边界线上的哥萨克缓慢地但是不停地把他们的驻屯地由达斡尔山向黑龙江沿岸推移，俄国海军陆战队则构筑工事把满洲的良好港湾包围起来。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本身，似乎表明他们已觉悟到旧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弗·恩格斯写于1857年5月20日前后

载于1857年6月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032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15卷翻译

卡·马克思

鸦片贸易史

一

联军全权代表强迫中国订立新条约①的消息，看来引起了以为贸易将有大规模扩展的狂想，同第一次对华战争结束后1845年时商人们头脑中产生的狂想完全一样。即使彼得堡的电讯所传属实，是否能完全肯定，通商口岸一增多，对华贸易就必然会扩大呢？是否能够指望1857—1858年的战争会比1841—1842年的战争导致更好的结果呢？有一件事是肯定无疑的：1843年的条约并没有使美国和英国对中国的出口增加，倒是起了加速和加深1847年商业危机的作用。现时的这个条约也是一样，它使人们梦想得到一个无穷尽的市场，使人们产生不切实际的希望，可能就在世界市场刚刚从不久以前的普遍恐慌中逐渐复原的时候，又促进新危机的形成。除了这个消极后果以外，第一次鸦片战争还刺激了鸦片贸易的增长而损害了合法贸易；只要整个文明世界的压力还没有迫使英国放弃在印度强制种植鸦片和以武力在中国推销鸦片的做法，那么这第二次鸦片战争就会产生同样的后果。我们不想详述这种贸易的道德方面，关于这种贸易，连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都这样写道：

①1858年天津条约。——编者注

"不是吗,'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都要算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毁灭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的思想,也没有毁灭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以后,还杀害他们的肉体;每时每刻都有新的牺牲者被献于永不知饱的摩洛赫①之前,英国杀人者和中国自杀者竞相向摩洛赫的祭坛上供奉牺牲品。"②

中国人不能既购买商品又购买毒品;在目前条件下,扩大对华贸易也就是扩大鸦片贸易;增加鸦片贸易是和发展合法贸易不相容的。这些论点早在两年以前已经得到相当普遍的承认。1847年为调查英中贸易状况而委派的一个下院委员会曾提出报告说: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一段时间以来,同这个国家的贸易处于很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扩大我们交往的结果竟一点也没有实现我们的合理期望**,而这种期望本来是在**能够更自由地进入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大市场**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 我们发现,贸易受到阻碍并不是因为中国不需要英国商品或别国竞争加强…… **花钱买鸦片**……消耗了白银从而大大妨碍了中国人的一般贸易;实际上就必须用茶叶和丝来偿付其他商品。"

1849年7月28日的《中华之友》在概括同一种观点时,十分肯定地说:

"鸦片贸易在不断地增长。英国和美国对于茶叶和丝的需求增大,只会使鸦片贸易继续增长;制造商的情况是毫无希望的。"

一位在中国的美国大商人,在1850年1月份汉特的《商人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里,把对华贸易的全部问题归结为如下一点:

---

①古腓尼基人所奉祀的火神,以人做祭品。——编者注

②蒙·马丁《论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1847年伦敦版第2卷。——编者注

"停止哪一种贸易——鸦片贸易还是美英产品的出口贸易?"

中国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正是这样。蒙哥马利·马丁说:

"我曾问过上海道台,促进我们对华贸易的最好办法是什么。他当着女王陛下的领事巴富尔上尉的面立刻回答我说:'别再向我们运送那么多鸦片,我们就能够买你们的产品。'"

最近八年来全部贸易的历史给这个论点提供了新的、十分明显的说明;但是在分析鸦片贸易对合法贸易的有害影响以前,我们先来简单地回顾一下这种触目惊心的贸易的产生和发展。这种贸易,无论就可以说是构成其轴心的那些悲惨冲突而言,还是就其对东西方之间一切关系所发生的影响而言,在人类历史记录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在1767年以前,由印度输出的鸦片数量不超过200箱,每箱重约133磅。中国法律许可鸦片作为药品输入,每箱鸦片抽税3美元左右;当时从土耳其贩运鸦片的葡萄牙人几乎是唯一给天朝帝国输入鸦片的商人。

1773年,堪与埃芒蒂耶之流、帕尔默之流以及其他世界闻名的毒品贩子并驾齐驱的沃森上校和惠勒副董事长,建议东印度公司[365]同中国进行鸦片贸易。于是在澳门西南的一个海湾里下碇的船只上,建立起了鸦片堆栈。但是这种投机买卖最后失败了。1781年,孟加拉省政府派了一艘满载鸦片的武装商船驶往中国;1794年,东印度公司就派了一艘运载鸦片的大船停在黄埔——广州港的停泊处。看来,黄埔做堆栈比澳门更便利,因为黄埔被选定做堆栈以后才过两年,中国政府就觉得有必要颁布法令,用杖责和枷号示众来震慑中国的鸦片走私者了。大约在1798年,东印度公司不再是鸦片的直接出口商,

而成了鸦片的生产者。在印度,实行了鸦片垄断,同时东印度公司伪善地禁止自己的船只经营这种毒品的买卖,而该公司发给同中国做买卖的私人船只的执照中却附有条件,规定这些船只如载运非东印度公司生产的鸦片要受处罚。

180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经达到2 000箱。在18世纪,东印度公司与天朝帝国之间的斗争,具有外国商人与一国海关之间的一切争执都具有的共同点,而从19世纪初起,这个斗争就具有了非常突出的独有的特征。中国皇帝[①]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下令同时禁止外国人输入和本国人吸食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和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①嘉庆帝。——编者注

二

正因为英国政府在印度实行了鸦片垄断，中国才采取了禁止鸦片贸易的措施。天朝的立法者对违禁的臣民所施行的严厉惩罚以及中国海关所颁布的严格禁令，结果都毫不起作用。中国人的道义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人员和所有的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风，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的。

东印度公司一手扶植的、北京中央政府抵制无效的鸦片贸易规模日益增大，到1816年，鸦片年贸易额已将近250万美元。就在这一年印度的贸易开放了，只有茶叶贸易一项例外，仍由东印度公司继续垄断。印度贸易的开放又大大推动了英国鸦片走私商的活动。1820年，偷运入中国的鸦片增加到5 147箱，1821年达7 000箱，1824年达12 639箱。在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向外国商人提出严重警告，同时惩办了被认为是与外国商人同谋共犯的行商[368]，大力查办了本国的鸦片吸食者，并且在自己的海关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最终的结果，一如1794年所做的同样努力，只是把鸦片堆栈由一个不牢靠的地点驱赶到一个更便于经营的基地。鸦片堆栈从澳门和黄埔转到了珠江口附近的伶仃岛；在那里，全副武装、人员众多的船只上建起了固定的鸦片堆栈。同样地，当中国政府暂时制止住了广州旧有窑

口①的营业时，鸦片贸易只是转了一道手，转到比较小的商人手里，他们不惜冒一切危险采用任何手段来进行这种贸易。在由此产生的更有利的条件下，鸦片贸易在1824年到1834年的10年当中，就由12 639箱增加到21 785箱。

1834年，也像1800年、1816年、1824年一样，在鸦片贸易史上标志着一个时代。东印度公司不仅在那一年失去了经营中国茶叶的特权，而且必须完全停止一切商务。由于东印度公司从商务机构改组为纯粹的政府机构，对华贸易就向英国私人企业敞开了大门，这些企业干得非常起劲，尽管天朝政府拼命抵制，在1837年还是把价值2 500万美元的39 000箱鸦片顺利地偷运进了中国。这里有两件事实要注意：第一，从1816年起，在对华出口贸易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上，鸦片走私贸易总是占着大得极不相称的比例。第二，就在英印政府在鸦片贸易上明显的商业利益逐渐消失的同时，它在这种非法贸易上的财政利益却越来越重要了。1837年，中国政府终于到了非立即采取果断行动不可的地步。因输入鸦片而造成的白银不断外流，开始扰乱天朝帝国的国库收支和货币流通。中国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许乃济，曾提议使鸦片贸易合法化而从中取利；但是经过帝国全体高级官吏一年多的全面审议，中国政府决定："此种万恶贸易毒害人民，不得开禁。"[382]早在1830年，如果征收25%的关税，就会带来385万美元的收入，到1837年，就会双倍于此。可是，天朝的野蛮人当时拒绝征收一项随着人民堕落的程度而必定会增大的税收。1853年，当今的咸丰帝虽然处境更加困难，并且明知为制止日益增多的鸦片输入而作的一切努力不会有任何结果，但仍然恪守自己先人的坚定政策。顺便要

①私卖鸦片烟的店铺。——编者注

指出的是:这位皇帝把吸食鸦片当做邪教一样来取缔,从而使鸦片贸易得到了宗教宣传的一切好处。中国政府在1837年、1838年和1839年采取的非常措施——这些措施的最高潮是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和按照他的命令没收、销毁走私的鸦片——提供了第一次英中战争的借口,这次战争带来的后果就是:中国发生了起义①;帝国国库完全空虚;俄国顺利地由北方进犯;鸦片贸易在南方达到巨大的规模。尽管英国在结束这场为保护鸦片贸易而发动和进行的战争时所签订的条约禁止鸦片贸易②,可是从1843年以来,鸦片贸易实际上却完全不受法律制裁。1856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总值约3 500万美元,同年英印政府靠鸦片垄断获取了2 500万美元的收入,正好是它财政总收入的六分之一。作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借口的那些事件,是不久以前才发生的,无需赘述。

这个题目讲到最后,不能不特别指出摆出一副基督教伪善面孔、标榜文明的英国政府本身的一个明显的矛盾。作为帝国政府,它假装同违禁的鸦片贸易毫无关系,甚至还订立禁止这种贸易的条约。②可是作为印度政府,它却强迫孟加拉省种植鸦片,使该省的生产力受到极大的损害;它强迫一部分印度莱特[383]种植罂粟,用贷款的办法引诱另一部分印度莱特也去种植罂粟。它严密地垄断了这种毒品的全部生产,借助大批官方侦探来监视一切:种植罂粟,把罂粟交到指定地点,按照中国吸食者的口味提炼和调制鸦片,把鸦片打成便于偷运的货包,最后运往加尔各答,由政府拍卖,国家官吏把鸦片移交给投机商人,然后又转到走私商人手里,由他们运往中国。英国政府在每

①指太平天国革命。——编者注

②1842年订立的中英南京条约并无禁止鸦片贸易的条款。——编者注

箱鸦片上所花的费用约250卢比，而在加尔各答拍卖场上的卖价是每箱1 210—1 600卢比。可是，这个政府并不满足于这种实际上的共谋行为，它直到现在还公然同那些干着毒害一个帝国的冒险营生的商人和船主们合伙经营，赔赚与共。

英国政府在印度的财政，实际上不仅要依靠对中国的鸦片贸易，而且还要依靠这种贸易的不合法性。如果中国政府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同时允许在中国种植罂粟，英印政府的国库会遭到严重灾难。英国政府公开宣传毒品的自由贸易，暗中却保持自己对毒品生产的垄断。任何时候只要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英国的自由贸易的性质，我们大都会发现：它的“自由”说到底就是垄断。

卡·马克思写于1858年8月31日—9月3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8年9月20日和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433号和5438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16卷翻译

卡·马克思

*英 中 条 约

1842年8月29日亨利·璞鼎查爵士签订的、并且像新近与中国订立的条约[①]一样也是在炮口下强加给对方的对华条约[②]，从商务观点来看，其结果是不成功的。这是一个连那家著名的英国自由贸易派机关刊物伦敦《经济学家》也正在重温的事实。这家杂志曾是不久前入侵中国一事的最忠实的辩护者之一，现在它觉得自己应该“抑制”一下在其他各界所造成的乐观期望了。《经济学家》杂志把1842年的条约对英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看做是“我们借以防止错误行动后果的一个前车之鉴”。这当然是正确的忠告。但是，威尔逊先生为了解释首次企图用武力为西方产品扩大中国市场遭到失败而举出的理由，却远不能作为定论。

他举出的造成这次大失败的第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璞鼎查签订条约以后的最初三年中，中国市场被盲目过量涌进的商品所充斥，英国商人不注意中国人需求什么。英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在1836年是1 326 388英镑，在1842年下降到969 000英镑。此后四年中又连续迅速增长，从下列数字可以看出：

1842年 ……………………………… 969 000 英镑
1843年 ……………………………… 1 456 000 英镑

①1858年天津条约。——编者注

②1842年南京条约。——编者注

1844年	2 305 000 英镑
1845年	2 395 000 英镑

可是，到1846年，不仅出口额降低到1836年的水平以下，而且伦敦从事对华贸易的商行在1847年危机时期所遭到的灾难还证明：官方报告统计表中所列的1843—1846年出口的**计算**价值同真正**实现的**价值完全不符。如果说由此可以看出，英国出口商在向中国消费者出售商品的数量方面犯了错误，那么他们在商品的品种方面也同样犯了错误。为了证明后一个论断，《经济学家》杂志援引了前伦敦《泰晤士报》驻上海和广州通讯员温·库克先生的一段话：

"1843年、1844年和1845年，当北方各通商口岸刚刚开放的时候，我们国内的人兴奋若狂。设菲尔德一家有名的商行向中国运去了大批餐刀和餐叉，并表示它准备给全中国供应此类餐具…… 这些商品的卖价几乎抵不上运费。一家著名的伦敦商行向中国运去了大批钢琴，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刀叉和钢琴的遭遇，毛织品和棉织品也遇到了，不过形式没有那么显著…… 曼彻斯特在各通商口岸开放的时候盲目地做了一番巨大的努力，这种努力归于失败。从此以后，它就冷漠消沉，听天由命了。"

最后，《经济学家》为了证明贸易的缩减、稳定和增长取决于对消费者需求的考察，还从上述那位作者那里引用了1856年的材料：

	1845年	1846年	1856年
精梳毛织物（匹）	13 569	8 415	7 428
驼毛呢	13 374	8 034	4 470
粗哔叽	91 530	75 784	36 642
粗梳毛织物	62 731	56 996	38 553
印花棉布	100 615	81 150	281 784
素色棉布	2 998 126	1 859 740	2 817 624
棉纱（磅）	2 640 090	5 324 050	5 579 600

但是,所有这一切论据和例证,除了说明1843—1845年贸易过热所引起的反应以外,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贸易骤增之后又出现剧烈的缩减,一个新的市场从一开始就为过剩的英国商品所窒息,人们把商品投入这个市场而没有很好地估计消费者的实际需要和支付能力,这些现象决不是对华贸易所特有的。实际上,这是世界市场历史上经常有的现象。拿破仑垮台以后,欧洲大陆开放通商,那时英国的出口同大陆的购买能力很不相称,以致"由战争转向和平"倒比大陆封锁[228]更具有灾难性。坎宁对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独立的承认,也促进了1825年商业危机的发生。为适应莫斯科的气候而制造的商品,当时被运往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再说,今天甚至连澳大利亚,尽管它具有很大的伸缩性,也没有摆脱一切新市场所共有的命运——市场上的商品既超过了它的支付能力也超过了它的消费能力。中国市场所特有的现象是:自从1842年的条约使它开放以来,中国出产的茶叶和丝向英国的出口一直不断增长,而英国工业品输入中国的数额,整个说来却停滞不变。中国方面的这种持续增长的贸易顺差,可以说同俄国和英国之间贸易差额的状况相似;不过后一种情况,一切都可以用俄国的保护关税政策来解释,可是中国的进口税却比任何一个同英国通商的国家都低。1842年以前,中国对英国的出口总值约为700万英镑,1856年约达到950万英镑。输入英国的茶叶数量,在1842年以前从未超过5 000万磅,而在1856年就增加到约9 000万磅。另一方面,英国进口的中国丝,只是从1852年起才占有重要地位。其增长情况,可以从下列数字中看出:

	1852年	1853年	1854年	1855年	1856年
丝的进口额(磅) 价值(英镑)	2 418 343 —	2 838 047 —	4 576 706 3 318 112	4 436 862 3 013 396	3 723 693 3 676 116

另一方面，我们再看一看英国对中国的出口额的变动：

1834年……　842 852 英镑	1836年……1 326 388 英镑
1835年……1 074 708 英镑	1838年……1 204 356 英镑

关于1842年市场开放和英国取得香港以后的时期，我们有下列材料：

1845年……2 359 000 英镑	1853年……1 749 597 英镑
1846年……1 200 000 英镑	1854年……1 000 716 英镑
1848年……1 445 950 英镑	1855年……1 122 241 英镑
1852年……2 508 599 英镑	1856年……2 000 000 英镑以上

《经济学家》企图以外国的竞争来解释为什么英国工业品对中国市场的输入会停滞和相对减少，并且再一次援引库克先生的话来加以论证。据这位权威人士看来，在中国市场上许多贸易门类中英国人都被公平的竞争所击败。他说，美国人在粗斜纹布和被单布方面压倒了英国人。1856年输入上海的美国粗斜纹布是221 716匹，而英国是8 745匹；美国被单布是14 420匹，而英国是1 240匹。另外，在毛织品贸易方面，据说德国和俄国对他们的英国竞争者排挤得很厉害。我们不需要其他的证明，单凭这一例证就可以确信：库克先生和《经济学家》对中国市场的估计都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只限于英中贸易的那些特点，其实也恰恰是美国和天朝帝国之间的贸易的特点。1837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超过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约86万英镑。在1842年条约订立以来的时期中，美国每年平均得到200万英镑的中国产品，而我们[366]付出的是90万英镑的美国商品。1855年上海的进口，不包括硬币和鸦片，总额达1 602 849英镑，其中英国所占份额是1 122 241英镑，美国所占份额是272 708英镑，其他国家

所占份额是207 900英镑；而上海的出口总额达12 603 540英镑，其中对英国出口是6 405 040英镑，对美国出口是5 396 406英镑，对其他国家出口是102 088英镑。把美国对上海的272 708英镑出口额同美国从上海进口的500多万英镑的数额对比一下吧。如果连美国的竞争也使英国的贸易蒙受到了明显的损害，那么可见，中国市场为全部外国贸易提供的活动场所是多么有限。

中国的进口市场自1842年开放以来，其意义之所以不大的最后一个原因据说就是中国革命①；可是，尽管发生了这次革命，1851—1852年对中国的出口，还是随着全面的贸易增长而相对地增长了，而且鸦片贸易在整个革命时期不但没有缩减，反而迅速达到了巨大的规模。然而无论如何，应该承认的是：由于最近这次海盗式的战争和统治王朝遭到的许多新屈辱，外国进口所遇到的产生于帝国内部动乱状态的一切障碍，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我们仔细考察了中国贸易的历史以后感觉到，一般说来，人们过高地估计了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和支付能力。在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根本谈不上大宗进口外国货。虽然如此，只要取消鸦片贸易，中国还可以逐渐地再多吸收一些英美商品，数额可达800万英镑——粗略算来这也就是中国对英美贸易总顺差的数目。这个结论是从分析下面这个简单事实而自然得出的：尽管有着贸易顺差，中国的财政和货币流通却由于总额约达700万英镑的鸦片进口而陷于严重的混乱。

然而，惯于吹嘘自己道德高尚的约翰牛，却宁愿隔一定的时候就用海盗式的借口向中国勒索军事赔款，来弥补自己的贸易逆差。只

---

①指太平天国革命。——编者注

是他忘记了：如果兼施并用迦太基式的和罗马式的方法[384]去榨取外国人民的金钱，那么这两种方法必然会相互冲突、相互消灭。

卡·马克思写于1858年9月10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8年10月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446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16卷翻译

卡·马克思

中国和英国的条约

英国政府终于公布的关于英中条约①的正式摘要,同由其他各种渠道已经传开的消息比较,大体上所增无几。第一款和最后一款实际上包括了条约中纯粹有关英国利益的各点。根据第一款,南京条约缔结以后所规定的"善后旧约并通商章程""作为废纸"②。这一补充条约曾规定:驻香港和驻五个为英国贸易开放的中国口岸的英国领事,如遇装载鸦片的英国船只驶入其领事裁判权所辖地区,应与中国当局协同处理。③这样,英国商人在形式上被禁止输入这种违禁的毒品,而且英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天朝帝国的一个海关官吏角色。第二次鸦片战争以解除第一次鸦片战争还在表面上加于鸦片贸易的束缚而告终,看来是十分合乎逻辑的结果,是那些特别热烈鼓掌欢迎帕麦斯顿施放的广州焰火[380]的英国商界殷切期望得到的成就。可是,如果我们以为英国正式放弃它对鸦片贸易的假惺惺的反对,不会导致与预期完全相反的结果,那就大错特错了。中国政府请英国政府协同取缔鸦片贸易,也就是承认了自己依靠本身的力量不能做到

---

①1858年天津条约。——编者注

②"善后旧约并通商章程""作为废纸"依据的是天津条约中文本原文。——编者注

③"这一补充条约"即上面的"善后旧约并通商章程",亦即虎门条约。该条约并无此项规定。——编者注

这一点。南京条约的补充条约是为了借助外国人的帮助来取缔鸦片贸易而作的最大的、也可以说是绝望的努力。既然这种企图遭到了失败——而且现在是公开宣布失败，既然鸦片贸易就英国来说现在已经合法化了，那么毫无疑问，中国政府无论从政治上或财政上着想，都将会试行一种办法，即从法律上准许在中国种植罂粟并对进口的外国鸦片征税[385]。不论当前的中国政府意向如何，天津条约给它造成的处境本身就给它指出了这条路。

这种改变一经实行，印度的鸦片垄断连同印度的国库一定会一起受到致命的打击，而英国的鸦片贸易会缩小到寻常贸易的规模，并且很快就会成为亏本生意。到目前为止，鸦片贸易一直是约翰牛用铅心骰子进行的一场赌博。因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最明显的结果，看来就是它本身的目的落了空。

对俄国宣布了"正义战争"的慷慨的英国，在订立和约时没有要求任何军事赔款。另一方面，英国虽然一直声称同中国处于和平状态，却因此而不能不迫使中国偿付连英国现任大臣们都认为是由英国自己的海盗行为所造成的耗费。不管怎么样，天朝人将偿付1 500万或2 000万英镑的消息一传来，对于最清高的英国人的良心起了安定作用。《经济学家》杂志以及一般撰写金融论文的作者们，都兴致勃勃地计算着中国的纹银对贸易差额和英格兰银行贵金属储备的状况将发生多么有利的作用。但是遗憾得很！帕麦斯顿派的报刊煞费苦心地制造和宣扬的那些最初印象太脆弱了，经不起真实消息的冲击。

有一专条规定："以200万两白银"偿付"因广州中国当局处理不当而使英国臣民所遭受的损失，另以200万两偿付"军费。[386]

这两笔款项总共才1 334 000英镑，而在1842年，中国皇

帝[①]偿付的是420万英镑，其中120万英镑赔偿被没收的走私鸦片，300万英镑赔偿军费。由420万英镑外加香港，减少到只有1 334 000英镑，这毕竟不像是一桩漂亮的买卖；可是，最糟糕的我们还没有讲呢。中国皇帝[②]说，既然你们不是同中国作战，而只是同广州进行“地方性战争”，那就请你们自己设法去从广东省挤出那笔由你们亲善的军舰逼迫我批给你们的损失费吧。同时，你们那位赫赫有名的斯特劳本齐将军不妨把广州作为物质保证，并继续使英国武器成为连中国兵勇都会耻笑的笑柄。乐观的约翰牛因1 334 000英镑的小战利品所附带的这些条件而产生的苦恼，已经表现为可以听到的呻吟。伦敦有一家报纸写道：

“不仅不能调回我们的53艘军舰并看到它们载着几百万两中国纹银凯旋归来，我们可以指望的好运气反倒是必须派遣5 000名士兵去重新占领和守住广州，并帮助海军去进行我们的代理领事[③]所宣布的地方性战争。可是这场地方性战争，除了把我们的贸易从广州赶到中国其他口岸以外，会不会造成其他结果？…… 继续进行战争〈地方性战争〉会不会使一大部分茶叶贸易落到俄国手里？欧洲大陆和英国本身会不会变得必须依靠俄国和美国供给茶叶？”

约翰牛担心“地方性战争”会影响茶叶贸易，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从麦格雷戈的《商业税则》[④]中可以看出：在第一次对华战争的最后一年内，俄国经由恰克图得到12万箱茶叶。在英国同中国媾和后的一年内，俄国对茶叶的需求减少了75%，总共只有3万箱。不管

---

①道光帝。——编者注

②咸丰帝。——编者注

③斯·巴夏礼。——编者注

④即《欧美若干国家的商业税则、条例、资源和贸易》1847年伦敦版。——编者注

怎样,英国人为占据广东而将继续耗费的钱财,一定会大大增加收支的逆差,以致这第二次对华战争将是所得难偿所失。埃默森先生说得对,在英国人看来这真是莫此为甚的大错。

在第五十一款上载有英国侵略所取得的另一个大胜利。按照这一条款,“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①。约翰牛不坚持要称自己为神国或圣朝,只要正式文件中除去表示“蛮夷”意思的字样就满意了。在自称“天朝”的中国当局的眼里,约翰牛该是多么恭顺啊!

条约中的商务条款,并未向英国提供它的竞争者享受不到的任何利益,而且这些条款在目前条件下只是空洞的诺言,其中大部分价值还不如书写条约用的羊皮纸。第十款规定:

> “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只俱可通商,唯现在江上下游,均有贼匪,除镇江一年后立口通商外,其余俟地方平靖,大英钦差大臣与大清特派之大学士尚书会议,准将自汉口溯流至海各地,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船出进货物通商之区。”①

按照这一条款,英国人实际上是被禁止进入全帝国的通商大动脉,这条大动脉,正如《晨星报》所正确指出的,是“英国人能将自己的工业品销往内地的唯一通路”。如果他们肯当乖孩子,帮助帝国政府将起义者②逐出其目前所占领的区域,那时他们才或许可以在长江航行,但也只限于特定的口岸。至于新开放的海港,最初听说是开放“一切”口岸,现在已缩减为除南京条约所规定的五个口岸外,再开放五个口岸[387]了,而且如一家伦敦报纸所说,这些口岸“一般都是偏僻的或者位于海岛上”。此外,那种以为贸易的发展会与所开放的通

①引自中英天津条约中文本原文。——编者注

②指太平军。——编者注

商口岸数目成正比的错觉，时至今日已该破除了。请看英国、法国和美国海岸上的港口，有几个发展成了真正的商业中心？在第一次对华战争以前，英国人只限于到广州进行贸易。让出五个新口岸，并没有造成五个新的商业中心，而是使贸易渐渐地由广州转移到上海，这一点可以从引自1856—1857年关于各地贸易状况的议会蓝皮书[388]的下列数字看出来。同时还应该记住，广州的商品进口额中也包括由广州转运到厦门和福州的进口商品。

年 份	由英国进口的贸易额（美元）		对英国出口的贸易额（美元）	
	广　州	上　海	广　州	上　海
1844	15 500 000	2 500 000	17 900 000	2 300 000
1845	10 700 000	5 100 000	27 700 000	6 000 000
1846	9 900 000	3 800 000	15 300 000	6 400 000
1847	9 600 000	4 300 000	15 700 000	6 700 000
1848	6 500 000	2 500 000	8 600 000	5 000 000
1849	7 900 000	4 400 000	11 400 000	6 500 000
1850	6 800 000	3 900 000	9 900 000	8 000 000
1851	10 000 000	4 500 000	13 200 000	11 500 000
1852	9 900 000	4 600 000	6 500 000	11 400 000
1853	4 000 000	3 900 000	6 500 000	13 300 000
1854	3 300 000	1 100 100	6 000 000	11 700 000
1855	3 600 000	3 400 000	2 900 000	19 900 000
1856	9 100 000	6 100 000	8 200 000	25 800 000

“条约中的商务条款不能令人满意”——这就是帕麦斯顿最卑鄙的走卒《每日电讯》所得出的结论。但是这家报纸却欣赏“条约中最妙的一点”，即“将有一位英国公使常驻北京，同时也将有一位满清大员常驻伦敦，他还可能会邀请女王参加在阿尔伯特门举行的舞会呢”。然而，无论约翰牛觉得这有多么开心，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有谁会在

北京拥有政治影响，那一定是俄国，俄国由于上一个条约[389]得到了一块大小和法国相等的新领土，这块领土的边境大部分只和北京相距800英里。约翰牛自己通过进行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俄国得以签订一个使它有权沿黑龙江航行并在陆上边界自由贸易的条约；而通过进行第二次鸦片战争，又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价值无量的地域——这是俄国无限垂涎的一块地方，从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图把它弄到手。这一切对于约翰牛来说决非愉快的回忆。伦敦《泰晤士报》为此感到很不是滋味，所以它在刊登来自圣彼得堡的过分渲染大不列颠占便宜的新闻时，特意将电讯中提到俄国依照条约获得黑龙江流域的那一部分删去了。

卡·马克思写于1858年9月28日

载于1858年10月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455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16卷翻译

弗·恩格斯

*俄国在远东的成功

俄国由于自己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外遭到军事失败而要对法国和英国进行的报复，现在刚刚实现。虽然赫拉克利亚半岛上顽强而持久的战斗伤害了俄国的民族自豪感，并使它丧失了一小块领土，[390]但是俄国在战争结束后还是得到了明显的好处。“病夫”的状况大为恶化[391]；欧洲土耳其的基督教居民，无论是希腊人还是斯拉夫人，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望摆脱土耳其的束缚，更加把俄国看成是自己唯一的保护人。毫无疑问，现在在波斯尼亚、塞尔维亚、黑山以及克里特岛上所发生的一切暴动和阴谋，都有俄国的代理人插手其中；但是土耳其在战争中就已经暴露出来的、并且被和约强加于它的义务所加剧了的那种极度衰颓和软弱，已足能说明苏丹的基督教臣民为什么会这样普遍躁动不安了。可见，俄国虽然把一条窄小的土地暂时牺牲——因为显然它一有机会一定收回，却换得了在实现自己对土耳其的谋划方面的长足进展。加紧分裂土耳其和对土耳其基督教臣民行使保护权，这就是俄国在战争肇始时所追求的目的；谁能说现在俄国不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在更大的程度上行使着这种保护权呢？

可见俄国甚至在这场失利的战争中也是唯一的得利者。但是俄国还得进行报复，于是它选定了一个稳操胜券的领域——外交领域——来进行这种报复。当英国和法国对中国进行一场代价巨大的斗

争时，俄国保持中立，到战争快结束时才插手干预。结果，英国和法国对中国进行的战争只是让俄国得到了好处。这一回俄国的处境可真是再顺利没有了。摇摇欲坠的亚洲帝国正在一个一个地成为野心勃勃的欧洲人的猎获物。这里又有一个这样的帝国，它很虚弱，很衰败，甚至没有力量经受人民革命的危机，在这里，就连一场激烈爆发的起义也都变成了看来无法医治的慢性病；它很腐败，无论是控制自己的人民，还是抵抗外国的侵略，一概无能为力。正当英国人在广州同中国的下级官吏争执不下、英国人自己在讨论叶总督是否真是遵照中国皇帝①的意旨行事这一重要问题的时候，俄国人已经占领了黑龙江以北的地区和该地区以南的大部分满洲海岸；他们在那里建筑了工事，勘测了一条铁路线并拟定了修建城市和港口的规划。当英国终于决定打到北京，而法国也希望捞到一点好处而同英国联合起来的时候，俄国——尽管就在此时夺取了中国的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加在一起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竟能以处于弱者地位的中国人的无私保护人身份出现，而且在缔结和约时俨然以调停者自居；如果我们把各国条约[392]比较一下，就必须承认：这次战争不是对英、法而是对俄国有利，已成为昭然若揭的事实。

各参战国得到的好处——其中也有俄国和美国的份——纯属商业性质，而且正如我们前次所指出，这些好处大部分都是虚幻的②。在目前情况下，对华贸易，除鸦片和若干数量的东印度棉花外，只能仍以中国商品即茶叶和丝的出口为主；而这种出口贸易取决于外国的需求而不是取决于中国政府提供方便的多少。在南京条约订立以

①咸丰帝。——编者注

②见本卷第643—648页。——编者注

前，世界各国已经能够买到茶叶和丝；在这个条约订立以后，开放五个口岸的作用是使广州的一部分贸易转移到了上海。其他的口岸几乎根本没有什么贸易，而汕头这个唯一有点重要作用的，却并不属于那五个开放的口岸。至于深入长江通商，这一要求被机智地推迟了，要等到皇帝陛下[①]在那个动乱地区完全恢复了自己的统治时再说，也就是遥遥无期。此外，关于这个新条约的价值还产生了另一些怀疑。有人断言，英中条约第二十八款所提到的子口税是臆造的。过去人们之所以认为有这种税存在，纯粹是由于：中国人不大需要英国商品因而英国货根本没有打入内地。与此同时有一种适合中国人需要的、经由恰克图或西藏运去的俄国布匹，就千真万确地一直运销到沿海。人们忘记了，如果真有这种税存在的话，不管是英国货还是俄国货都一样要受到影响。有一点是肯定的，曾被专门派往内地的温格罗夫·库克先生，找不出什么地方有这种所谓的“子口税”，而且他在公开的场合被问及这方面的问题时承认，他已“惭愧地认识到，我们对中国的无知是十分明显的”[②]。另一方面，英国商业大臣约·沃·亨利在一封已经发表的信件中回答“是否有证据证明确实存在着这种内地税”的问题时，十分清楚地说道：“对于你们问到的关于中国内地税的证据问题，我无可奉告。”约翰牛本来就颇不愉快地想着：额尔金勋爵规定了赔款，竟未定出交款期限，把战事从广州转移到京都，竟只是订了一个让英军从京都再回到广州去打仗的条约。现在这样一来，约翰牛的心里又突然产生一个不妙的疑虑：恐怕得自掏腰包交付所规定的赔款了，因为第二十八款非常可能促使中

①咸丰帝。——编者注

②乔·库克《中国：1857—1858年〈泰晤士报〉特约中国通讯》1858年伦敦版第273页。——编者注

国当局对英国工业品规定7.5%的子口税，将来经过要求会改为2.5%的进口税。伦敦《泰晤士报》为了不让约翰牛过细考察自己的条约，觉得有必要装出对美国公使大为愤恨的样子，气势汹汹地骂他把事情弄糟了，虽然事实上他同第二次英中战争的失败就像月中人一样毫不相干。

因此，就英国商业来说，和约所带来的只是一项新的进口税和一系列条款，这些条款或者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或者是中国人无法履行的，因而随时可能成为挑起新战争的借口。英国没有得到任何新的领土，因为它无法提出领土要求而同时又不准法国这样做，而一场英国进行的战争如果使法国在中国沿海得到了领土，那是绝对没有好处的。至于俄国，情况完全不同。不但英、法所得的一切明显利益，不管是什么，俄国都有份，而且俄国还得到了黑龙江边的整个地区，这个地区是它早已悄悄占领的。俄国并不满足于此，它还取得了这样一个成果，即成立俄中委员会来确定边界。现在我们都知道这种委员会在俄国手里是什么货色。我们曾看到这种委员会在土耳其的亚洲边界上的活动情况，20多年来它们在那里把这个国家的领土一块一块地割去，直到最近这次战争才打断了它们的活动，而现在又该重新再来一遍了。其次，条约中还有关于恰克图和北京之间邮政管理的条款。从前不定期通行的、只是被容忍的交通线，现在要定期使用并作为一项权利加以规定。在这两个地点之间每月要有一次邮班，全程大约1 000英里，15天到达；而每三个月还要有一支商队走这同一条路线。很明显，将来中国人对这些业务要么是漫不经心，要么是力不胜任；既然交通线现在已作为权利为俄国所得，其结果就是这些业务将逐渐控制在俄国手中。我们曾看到，俄国人怎样在吉尔吉斯草原建立起自己的军事堡垒

线[①]；我们深信不疑，用不了几年，同样的一条路线将穿过戈壁沙漠，那时候英国统治中国的梦想将永成泡影，因为俄国军队不论哪一天都能够向北京进发。

不难想象，在北京设立常驻使馆将会产生什么作用。请回想一下君士坦丁堡或德黑兰吧。凡是俄国外交同英国外交或法国外交交锋的地方，俄国总是占上风。俄国公使在几年以后就可能在与北京相隔一个月路程的恰克图拥有一支足以达到任何目的的强大军队和一条供这支军队顺利进军的道路——这样一位俄国公使在北京将具有无上的威力，谁能怀疑这一点呢？

事实是，俄国正在迅速地成为亚洲的头等强国，它很快就会在这个大陆上压倒英国。由于征服了中亚细亚和吞并了满洲，俄国使自己的领地增加了一块像除俄罗斯帝国外的整个欧洲那样大的地盘，并从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进入了温带。中亚细亚各河流域和黑龙江流域，很快就会住满俄国的移民。这样获得的战略阵地对于亚洲，正如在波兰的阵地对于欧洲一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占领图兰威胁着印度；占领满洲威胁着中国。而中国和印度，两国共有45 000万人口，现在是亚洲举足轻重的国家。

弗·恩格斯写于1858年10月25日
前后

作为社论载于1858年11月18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484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英文版第16卷翻译

①见恩格斯《俄国在中亚细亚的进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2卷第638—639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

新的对华战争

一

当英国硬逼天朝人签订了天津条约而受到普遍祝贺的时候，我曾试图说明：实际上从这次海盗式的英中战争中取得实利的唯一强国是俄国，英国根据条约所得到的商业利益是很微小的；同时，从政治观点看来，这个条约不仅不能巩固和平，反而将使战争必然重起。①事变的进程，完全证实了这个看法。天津条约已成过去的事情，在战争的严酷现实面前，表面上的和平也已经消失。

首先让我来叙述最近大陆邮班传来的一些事实。

尊敬的普鲁斯先生在法国的全权公使布尔布隆先生偕同下，带着一支英国远征队出发。这支远征队的任务是沿白河上驶护送两国公使进北京。远征队由海军将军贺布统率，包括有7艘轮船、10艘炮艇、2艘载运部队和军需品的运输船，以及几百名海军陆战队和皇家陆军工兵队士兵。中国人方面反对公使取这条路进京。因此，贺布将军发现白河口已被防栅所阻塞；他在河口从6月17日至25日停留了9天以后企图用武力开路前进，因为两国公使已于6月20日来到舰队。贺布将军在到达白河口时，曾查明在上次战争中拆毁的大沽炮台确

① 见本卷第643—648、649—653页。——编者注

已修复，这里要顺便指出，此事他是应该早就知道的，因为"京报"[393]正式报道过。

6月25日，英国人企图强行进入白河时，约有2万蒙古军队[①]做后盾的大沽炮台除去伪装，向英国船只进行毁灭性的轰击。陆战水战同时并举，打得侵略者狼狈不堪。远征队遭重创后只得退却。它损失了3艘英国船：鸬鹚号、避风号和小鸻号，英军方面死伤464人，参加作战的60名法国人当中死伤14人。英国军官死5人，伤23人，连贺布将军自己也是带伤逃命的。这次失败以后，普鲁斯先生和布尔布隆先生就回到了上海，英国舰队则奉命停泊在宁波府镇海县外的海面。

当这些不愉快的消息传到英国时，帕麦斯顿派的报纸就立刻跨上不列颠狮子[394]，一致怒吼着要求实行大规模报复。当然，伦敦的《泰晤士报》在激发自己同胞们的嗜血本能时还多少故作庄重，但帕麦斯顿派的次等报纸却荒谬绝伦地扮演了疯狂的罗兰的角色。

例如，我们来听听伦敦《每日电讯》怎样说：

> "大不列颠应该对中国海岸线全面进攻，打进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取得物质上的保证，以免将来再受侵犯…… 我们应该用九尾鞭抽打每一个敢于侮辱我国民族象征的蟒衣官吏…… 应该把他们〈中国将军们〉个个都当做海盗和凶手，吊在英国军舰的桅杆上。把这些浑身纽扣、满面杀气、穿着丑角服装的坏蛋，在桅杆上吊上十来个示众，让他们随风飘动，倒是令人开心和大有裨益的场面。无论如何总得采取恐怖手段，我们已经过分宽大了！…… 应该教训中国人尊重英国人，英国人高中国人一等，应该做他们的主人…… 起码可以一试的是攻占北京，如果采取更大胆的政策，则接着就能把广州永远收归我国所有。我们会像占有加尔各答那样把广州保持在自己手里，把它变为我们在东方最东端的商业中心，使我们针对俄国在帝国的满蒙边疆所取得的势力，为自己找到补偿，奠定一个新领地的基础。"

---

①指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的军队。——编者注

我想现在还是丢开帕麦斯顿的笔杆子们的这些胡言乱语来谈谈事实,并根据现有的不多的一点材料尽可能地说明这个不快事件的真实意义。

这里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即使天津条约规定允许英国公使可以直接前往北京,中国政府反抗英国舰队强行驶入白河,是否就违反了这个用海盗式战争强加于它的条约呢?从大陆邮班传来的消息中可知,中国当局不是反对英国使节前往北京,而是反对英国武装船只上驶白河。他们曾经表示普鲁斯先生应由陆路入京,不得用武装护送。天朝人对炮轰广州事件[380]记忆犹新,所以不能不认为这种武装是实行入侵的工具。难道法国公使留驻伦敦的权利就能赋予他率领一支法国武装远征队强行侵入泰晤士河的权利吗?肯定可以这样说:英国人对英国公使前往北京的权利的这种解释,至少和英国人在上次对华战争中所发明的那种说法同样奇怪,当时他们说炮轰一个帝国的城市,并不是对该帝国本身作战,而只是与它的一个属地发生了局部的相互敌对行动。对于天朝人所提出的交还的要求[395],英国人的回答是——按照他们自己说的——"采取了一切周密措施,务求获准进入北京,必要时使用武力",以一支强大舰队上驶白河。就算是中国人必须接纳英国的和平公使入京,他们抵抗英国人的武装远征队也是完全有理的。中国人这样做,并不是违背条约,而是挫败入侵。

其次,人们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尽管天津条约已经赋予英国派驻使节的抽象权利,可是额尔金勋爵不是决定至少在目前暂不实际行使此项权利吗?如果翻阅一下《女王陛下特谕刊行的关于额尔金伯爵赴华特别使命的函件》,每个不存偏见的人都会深信:第一,准许英国公使进入北京一事不是在现在,而是在**较晚的时候**付诸实行;第二,英国公使留驻北京的权利附有各种条件;最后第三,条约英文本

中关于准许公使进入北京的那个专横的第三款，根据中国钦差们的要求在条约中文本中作了修改。额尔金勋爵自己也承认条约两个文本之间的这个不同之处，但是额尔金勋爵，据他本人说，

> “根据他所得到的训令，只好要求中国人接受他们一字不识的条约文本作为国际协定的正式文本”。

中国人根据条约的中文本行动，而不是根据连额尔金勋爵都承认与“该项规定的正确含义”有些偏离的英文本行动——难道可以凭这一点对他们加以非难吗？

最后，我要指出，前任英国驻香港首席检察官托·奇泽姆·安斯蒂先生在他致伦敦《晨星报》编辑的信中郑重宣称：

> “这个条约不论其本身如何，早已因英国政府及其官吏采取暴力行动而失效到这样的程度，即至少大不列颠王室得自这个条约的一切利益和特权均被剥夺。”

英国一方面受着印度的重重困难的拖累[396]，另一方面又为防备欧洲战争一旦爆发而进行着武装，所以中国的这场新的、大约是帕麦斯顿一手造成的灾难，很可能给英国带来巨大的危险。第二个结果必然是现政府的崩溃，因为该政府是以上次对华战争的制造者为首的，而它的主要成员又曾经对他们现在的首长因他进行那场战争而投过不信任票。不管怎样，米尔纳·吉布森先生和曼彻斯特学派[109]必须要么退出现在的自由党人联盟，要么——这个可能性不很大——同约翰·罗素勋爵、格莱斯顿先生及其皮尔派[397]同僚们一致行动，迫使他们的首长服从他们自己的政策。

二

内阁会议宣布在明天召开，会议的目的是要决定对于在中国的惨败采取什么对策。法国《通报》和伦敦《泰晤士报》煞费苦心写出的文章，使人确信帕麦斯顿和波拿巴已作出决定。他们想要再发动一场对华战争。我从可靠方面得来的消息说：在即将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米尔纳·吉布森先生首先将就主张战争的理由是否正当提出质问；其次他将抗议任何事先未经议会两院批准的宣战；如果他的意见为多数票否决，他将退出内阁，从而再次发出这样的信号，即帕麦斯顿的统治将要遭到新的冲击，曾使德比内阁倒台的这个自由党人联盟将要崩溃。据说帕麦斯顿对于米尔纳·吉布森先生企图采取的行动感到有些惊惶不安。吉布森是他的同僚中唯一使他害怕的人，而且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吉布森是一个特别善于“吹毛求疵”的人。可能和本篇通讯同时，你们会从利物浦收到关于内阁会议结果的消息。现在要对这里所谈的事件的真实情况作出最正确的判断，不能根据帕麦斯顿派报刊上登出来的东西，而要根据这些报刊在最初刊登上次大陆邮班带来的消息时故意不登的东西。

首先，他们隐瞒了中俄条约已经完成批准手续和中国皇帝[①]已经谕令他的官员接待并护送美国公使进京交换中美条约批准书的消

①咸丰帝。——编者注

息。隐瞒这些事实的目的，是为了制止一种自然会产生的猜疑，这就是：对英法公使执行职务时遇到阻碍这件事，应负责任的恐怕不是北京朝廷，而是他们自己，因为他们的俄国或美国同僚并未遭遇到这些阻碍。另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最初也为《泰晤士报》和其他帕麦斯顿派报刊所隐瞒，但现在它们已公开承认，这个事实就是：中国当局曾经声明愿意护送英法公使进京；而且中国官员们的确在白河的一个河口等候接待他们，并且表示，只要他们同意离开他们的兵舰和军队，就给他们派一支卫队。既然天津条约中并无条文赋予英国人和法国人以派遣舰队上驶白河的权利，那么非常明显，破坏条约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而且，英国人是蓄意要刚好在规定的交换批准书日期之前向中国寻衅。谁都不会相信，尊敬的普鲁斯先生对上一次对华战争表面上要达到的目的进行的这种干扰，是他本人自作主张的行动；相反，谁都会看出他只不过是执行了从伦敦接到的秘密训令而已。诚然，普鲁斯先生并不是由帕麦斯顿派遣而是由德比派遣去的。然而，我只需提醒这样一件事：在罗伯特·皮尔爵士首届内阁任内，阿伯丁勋爵任外交大臣期间，英国驻马德里公使亨利·布尔沃爵士向西班牙宫廷寻衅，结果被西班牙驱逐出境；上院在辩论这个“不快事件”时证明，布尔沃不执行阿伯丁的正式训令，而是按照当时坐在反对派席位上的帕麦斯顿的秘密训令行事。

最近几天，帕麦斯顿派的报刊又玩弄花招，这至少使熟悉近30年英国外交内幕的人们可以毫无疑问地断定，究竟谁是白河惨败和迫在眉睫的第三次英中战争的真正罪魁。《泰晤士报》暗示说，安装在大沽炮台上把英国舰队打得落花流水的大炮，是来自俄国而且是由俄国军官指挥操作的。另一家帕麦斯顿派的报刊说得更明白，现引述于下：

“现在我们看出俄国的政策与北京的政策如何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我们发觉在黑龙江一带有大规模的军队调动；我们了解到，大批哥萨克军队在贝加尔湖以东极遥远的地方、在迷迷茫茫的旧大陆边缘上的严寒奇境里进行演习；我们注意到无数辎重队的行踪；我们侦察到一位俄国特使（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将军）正带着秘密计划，从遥远的东西伯利亚向与世隔绝的中国京城进发；一想到外国势力曾参与使我们蒙受耻辱并屠杀我们的陆海军士兵这件事，我国的公众舆论当然会怒火冲天。”

这只不过是帕麦斯顿勋爵的一套老把戏。当俄国要跟中国缔结通商条约时，他用鸦片战争把中国推入它北方邻邦的怀抱；当俄国要求割让黑龙江时，他又用第二次对华战争促其实现；而现在俄国想要巩固它在北京的势力，他就弄出个第三次对华战争来。他在和亚洲弱国——中国、波斯、中亚细亚、土耳其等国的一切交往关系上，总是抱着这样一个始终不变的定则：在表面上反对俄国的阴谋，但不去向俄国寻衅，却向亚洲国家寻衅，采取海盗式的敌对行动使亚洲国家和英国疏远，用这种方法绕着圈子来迫使它们对俄国作出本来不愿做的让步。你们可以相信，帕麦斯顿过去全部的亚洲政策这次将要重新受到审查，因此，我请你们注意1859年6月8日下院命令刊印的阿富汗文件①。这些文件比以前发表过的任何文件都更能说明帕麦斯顿的险恶政策以及近30年来的外交史。简短地说，事情是这样的：1838年帕麦斯顿对喀布尔统治者多斯特-穆罕默德发动了战争[398]，结果使一支英军遭到覆没。发动这次战争的借口是：多斯特-穆罕默德同波斯和俄国缔结了一个反英秘密同盟。为了证明这种说法，帕麦斯顿于1839年向议会提出了蓝皮书[388]，其内容主要

①《东印度文件。喀布尔和阿富汗》，根据下院1859年6月8日的决议刊印。——编者注

是英国驻喀布尔的使节亚·伯恩斯爵士同加尔各答政府之间的来往信件。伯恩斯在喀布尔发生反抗英国侵略者的暴动时被刺杀，但是他生前由于对英国外交大臣不信任，曾把自己的某些公务信札的副本寄给住在伦敦的哥哥伯恩斯医生。关于1839年发表帕麦斯顿所编纂的《阿富汗文件》一事，伯恩斯医生曾指责他“篡改和伪造了已故的亚·伯恩斯爵士的信件”，并且为了证实他的声明，印发了一些信件的原文。[399]可是直到今年夏天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在德比内阁的时候，下院根据哈德菲尔德先生的提议，命令把所有关于阿富汗的文件一律全文发表。这个命令的执行使最愚钝的人也都懂得了：所提出的为了**俄国的利益**而篡改和伪造文件这一指控属实无误。在蓝皮书的扉页上印有下述字句：

“注：这些信札在以前的报告书中仅部分刊出，今将其全部发表，以前删节之处以括号（　）标出。”

保证这份报告书真实性的官员姓名是“约·威·凯，政务机要司秘书”；凯先生是“研究阿富汗战争的公正历史编纂学家”。

帕麦斯顿是借口反对俄国而发动阿富汗战争的，可是目前只需举出一个实例就足以说明他与俄国的真正关系了。1837年到达喀布尔的俄国代表维特凯维奇携有一封沙皇给多斯特-穆罕默德的信。亚历山大·伯恩斯爵士弄到了这封信的抄件，并把它寄给了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伯恩斯本人的信件以及他所附上的各种文件，都一再提到这件事。但沙皇书信抄件在1839年帕麦斯顿所提供的文件中被整个抹掉了，而且凡是提及此事的每一信件，出于隐瞒“俄国皇帝”同派人去喀布尔一事有关的需要，都做了删改。这样作假，其目的在于隐瞒那位独裁暴君与维特凯维奇之间有联系的证据。这个维特凯维奇回

到圣彼得堡后，尼古拉出于自己的需要正式声明自己与此人无涉。在蓝皮书第82页上有一个删改的例子，那里有一封给多斯特-穆罕默德书信的译文，译文列后，括号内的字句是当初被帕麦斯顿删去的。

> “由俄国（或皇帝）方面派遣的使节（从莫斯科）前来德黑兰，他奉命拜访坎大哈的酋长，然后从该地去晋见埃米尔…… 他携有（皇帝的密函和）俄国驻德黑兰公使的书信。俄国公使推荐此人极其可靠，并有全权（代表皇帝和他本人）进行任何谈判云云。”

帕麦斯顿为保全沙皇的脸面而干的诸如此类的作假行为并不是《阿富汗文件》所显示出的唯一怪事。帕麦斯顿为入侵阿富汗辩护的理由是：亚历山大·伯恩斯爵士曾建议采取这种行动，认为这是挫败俄国在中亚细亚的阴谋的适当手段。但是亚·伯恩斯爵士所做的恰好相反，因此他为多斯特-穆罕默德作的一切呼吁，在帕麦斯顿版的“蓝皮书”中就全被删除了；信件经过篡改和伪造被弄得与原意完全相反。

就是这样一个人，现在正准备用挫败俄国在中国的阴谋这一虚假借口发动第三次对华战争。

三

即将对天朝人进行另一次文明战争，看来现在被英国报刊相当普遍地认为是已成定论的事了。然而，自从上星期六举行了内阁会议以来，正是那些带头叫嚷要流血的报纸，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起初，伦敦《泰晤士报》像是着了爱国怒火的魔一样，雷霆般地斥责双重的背信弃义行为，这就是：卑怯的蒙古人用精心伪装和隐蔽炮队的办法来诱骗英国海军将军①这样的老实人，而北京朝廷更是不择手段，竟让这些蒙古吃人恶魔干这种该诅咒的恶作剧。说来奇怪，《泰晤士报》虽然是在狂热的浪涛中上下翻滚着，但在转载报道时却费尽心机把其中对该诅咒的中国人有利的各节，都小心翼翼地从原文中抹掉了。混淆事实也许是狂热时干的事，但篡改事实似乎只有冷静的头脑才能做到。不管怎么说，9月16日，恰好在举行内阁会议的前一天，《泰晤士报》来了一个大转弯，若无其事地把它那像雅努斯的两个面孔一样的双重指责砍掉了一个。该报说：

> “**我们恐怕**不能对那些抵抗我们攻打白河炮台的**蒙古人**控以背信弃义的罪名”；

但为了弥补后退的这尴尬的一步，该报益发死皮赖脸地硬说“**北京朝廷**存心背信弃义地破坏庄严的条约”。

①詹·贺布。——编者注

内阁会议举行后过了三天,《泰晤士报》经过进一步考虑,甚至认为

> “毫无疑问,如果普鲁斯先生和布尔布隆先生请求清朝官员护送他们进京,他们本来是会获准前去履行条约批准手续的”。

既然如此,北京朝廷还有什么背信弃义的地方呢?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而《泰晤士报》肚里倒留下两点疑虑。该报说:

> “企图用这样一支舰队去打开我们通往北京的道路,作为一种军事措施来说是否明智,可能值得怀疑。而哪怕是动用一点武力,作为外交手段来说是否可取,就更值得怀疑了。”

这“首家大报”那样义愤填膺地大发雷霆之后,得出的却是这样一个自打嘴巴的结论,不过,它以自己独有的逻辑,否定了进行战争的理由而并不否定战争本身。另一家半官方报纸,即曾以热心为炮轰广州辩护著称的《经济学家》,现在似乎更多地采取经济观点而较少空谈了,因为詹·威尔逊先生当上了印度财政大臣。《经济学家》就这个题目发表了两篇文章①,一篇是政治性的,另一篇是经济性的;前一篇文章的结尾说:

> “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显然,赋予我国公使以去北京或驻留北京之权的条款,确确实实是强加给中国政府的;如果认为使这个条款得到遵守对我们的利益来说是绝对必要的话,我们觉得在要求履行条款时,大有表现体谅与耐心的余地。毫无疑问,人们可以说:对中国这样的政府采取延缓和容忍的态度,会被认为是极端虚弱的表现,因而会是我们最大的失策。但是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有权利根据这样的理由,在对待这些东方国家政府方面,改变我们对任何文明国

---

①《中国的灾难》和《中国的贸易及其直接的与间接的重要意义》,载于1859年9月17日《经济学家》第838期。——编者注

家毫无疑义应该遵循的原则?我们已经利用他们的畏惧心理强迫他们作了一次不愉快的让步,那么再利用他们的畏惧心理,以对我们自己最便利的方式强迫他们立刻执行条约的规定,这也许是最首尾一贯的政策。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这时中国人克服了他们的畏惧心理,适当地显示一下武力,坚持要我们同他们协商以何种方式使条约生效——那么,我们能够理直气壮地责备他们背信弃义吗?他们不正是对我们采用了我们自己所用的说服方法吗?中国政府也许——很可能就是这样——是有意要引诱我们落入这个凶险的陷阱,而从未打算履行这个条约。如果事实确是如此,我们就必须而且应该要求赔偿。但是结果也可能证实是这样的:守卫白河口,以防止像额尔金勋爵上一年使用暴力进入河口那种事再度重演,并不含有任何背弃条约所有条文的意图。既然敌对行动完全出自我方,而且我们的司令官当然随时都能从中国方面只是为了保卫炮台才发射的凶猛炮火中退却,那么,我们就不能确证中国方面有任何背信弃义的企图。在还没有得到存心破坏条约的证明的时候,我们认为有理由暂时不作判断,而是仔细想一想,我们在对待野蛮人方面,是否没有采用一套同野蛮人用到我们身上的相差无几的原则。"

在同一论题的第二篇文章中,《经济学家》详细论述了英国对华贸易的直接的和间接的重要意义。在1858年,英国对中国的出口额上升到2 876 000英镑,而最近三年来英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价值平均每年在900万英镑以上,因此英国同中国的直接贸易总额估计在1 200万英镑左右。但是除这种直接交易之外,还有其他三种重要贸易,英国或多或少地同它们在圆圈式的交易中发生密切联系,这就是印度与中国、中国与澳大利亚、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经济学家》说:

"澳大利亚每年从中国得到大量茶叶,却没有什么可以在中国找到销路的货物作为交换。美国也得到大量茶叶和若干生丝,其价值远超过它直接对中国的出口额。"

这两个国家对中国的逆差,都必须由英国来弥补,英国因弥补这一交换上的不平衡而得到的报偿是澳大利亚的黄金和美国的棉

花。因此，英国除了它本身对中国的逆差外，又由于从澳大利亚进口黄金和从美国进口棉花而必须支付给中国大宗款项。目前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对中国的这个逆差，在很大程度上已由中国转移到印度，与中国在鸦片和棉花上面产生的对印度的逆差相抵消。我们这里要顺便指出，中国向印度输出的总额从未达到过100万英镑，而印度向中国输出的总额竟将近1 000万英镑。《经济学家》根据这些经济上的观察推论说：英国对华贸易的任何严重停顿，将"是一场很大的灾难，它比仅凭乍一看进出口数字所能想象的灾难还要大"；这一波动所引起的困窘，不仅在英国的直接茶丝贸易方面会反映出来，而且必然也会"影响"到英国对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贸易。当然，《经济学家》也注意到，在前次对华战争中，贸易并未像所担心的那样因战争而遭到很大的阻碍；而且在上海这个口岸，甚至丝毫没有受到影响。然而，《经济学家》要人们注意"当前争端中的两个新特点"，这两个新特点可能会根本改变新的对华战争给予贸易的影响；这两个新的特点是：目前的冲突具有"全帝国的"而非"地方的"性质；中国人反抗欧洲军队第一次获得了"大胜"。

《经济学家》的这种语言同它在划艇事件时的声嘶力竭的战争叫嚣相比，是多么不同啊。

正如我在前一篇通讯中所预示的[1]，米尔纳·吉布森先生果然在内阁会议上反对战争并威胁说，如果帕麦斯顿按照法国《通报》上所泄露的早已安排好的决定行动的话，他就退出内阁。帕麦斯顿暂时用这样一种声明防止了内阁的分裂和自由党人联盟的分裂，他说，保护英国贸易所必需的武力必须集结在中国海面，但在英国公使的更详

---

①见本卷第657页。——编者注

尽的报告到达以前，关于战争问题暂不作决定。这样一来，迫在眉睫的问题就得以延缓。然而帕麦斯顿的真正意图，却通过他的痞棍报刊《每日电讯》透露出来，该报最近有一期上说：

> “如果明年有任何事件导致不利于政府的表决，肯定必将诉诸选民……下院将用一项关于中国问题的决定来检验一下那些人活动的结果，因为必须看到，在以迪斯累里先生为首的职业恶棍之外，还有一批宣称道理完全在蒙古人一边的世界主义者呢。”

托利党人[55]由于自己上当而陷入替帕麦斯顿所策划、由他的两个代理人额尔金勋爵和普鲁斯先生（额尔金勋爵之弟）干出的事负责的窘境，这一情况我可能将另找机会加以评论。[400]

四

我在以前的一篇通讯中断言，白河冲突并非出于偶然，相反，是由额尔金勋爵事先策划的。他遵照帕麦斯顿的秘密训令行事，并把当时是反对派领袖的高贵子爵①的这套计划算到托利党外交大臣马姆兹伯里勋爵的账上。现在首先，中国的"意外事件"是由出自现任英国首相之手的"训令"所造成这一看法，决不是新的看法，早在辩论划艇战争时，一位非常了解情况的人士——迪斯累里先生——已经向下院作过这样的暗示，而且说也奇怪，竟为一位非常权威的人士——帕麦斯顿勋爵本人——所确认。1857年2月3日，迪斯累里先生曾用以下的话警告下院说：

"我不能不相信，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并不是产生于据称的那种原因，实际上产生于相当长时间之前**从国内收到的训令**。如果情况是这样，我觉得现在下院要是不认真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有背自己的职守。这个问题就是：下院有没有方法控制住一种在我看来保持下去会危害我国利益的**制度**。"

帕麦斯顿勋爵非常冷静地回答道：

"这位尊敬的先生说，事变进程似乎是**国内政府预定的某种制度**的结果。毫无疑问确是如此。"

现在，我们约略地看一下题为《关于额尔金伯爵赴华赴日特别

①亨·帕麦斯顿。——编者注

使命的函件。1857—1859年》的蓝皮书[388]就会知道，6月25日在白河发生的事件，额尔金勋爵在3月2日就已经有所预示了。在前述《函件》第484页，我们找到下面两封快函：

“额尔金伯爵致海军少将西马糜各厘爵士

1859年3月2日于怒涛号战舰

爵士阁下：兹就我于上月17日致阁下之快函向阁下谨陈：我以为，女王陛下政府就英国公使常驻北京问题所做之决定——此决定我在昨日之谈话中已告知阁下——或许可能促使中国政府在女王陛下代表前往北京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时给以适宜之接待。同时，毋庸置疑，此种可能亦有落空之虞。无论如何，我以为，**女王陛下政府将愿意**我国公使**前往天津时**有一支**大军**护送。据此，敢请阁下考虑，既然普鲁斯先生抵华之期不会延迟过久，是否宜在上海尽速集结一批**足够**之炮艇**以作此用**。

顺颂……

额尔金—金卡丁”

“马姆兹伯里伯爵致额尔金伯爵

1859年5月2日于外交部

勋爵阁下：阁下1859年3月7日快函已收到。现通知阁下，女王陛下政府同意阁下随函抄附的关于通知中国钦差大臣谓女王陛下政府将不坚持女王陛下公使常驻北京的照会。

女王陛下政府对**阁下业已建议**西马糜各厘海军少将在上海集结一批炮艇，以便护送普鲁斯先生**上驶白河**一事，亦表赞同。

马姆兹伯里”

可见，额尔金勋爵事先就知道英国政府“将愿意”用由“炮艇”组成的“一支大军”护送他的弟弟普鲁斯先生上驶白河，而且他曾命令海军少将西马糜各厘准备好一切“以作此用”。马姆兹伯里伯爵在他5月2日的快函中，赞同了额尔金勋爵对海军少将提出的建议。全部

信函表明额尔金勋爵是主人，马姆兹伯里勋爵是仆从。额尔金勋爵总是采取主动，根据原来从帕麦斯顿那里得到的训令行事，甚至不等待唐宁街[401]的新训令；而马姆兹伯里却甘心一味听从他那傲慢的僚属预期他领会到的“意愿”。额尔金说条约还没有批准，他们无权进入中国的任何江河，他点头称是；额尔金认为在执行条约中有关公使驻京条款的问题上，他们对中国人应持较多的容忍态度，他点头称是；额尔金直接违反自己过去讲过的话而声称有权用一支“由炮艇组成的大舰队”强行通过白河时，他也毫无难色地点头称是。他的点头称是，和道勃雷对教堂司事的提议点头称是①一模一样。

如果回想一下托利党内阁上台时伦敦《泰晤士报》及其他有势力的报纸所发出的叫喊，那么马姆兹伯里伯爵所显露出的那副可怜相和他的卑恭态度就容易理解了。这些报纸说托利党内阁的上台，对于额尔金勋爵遵照帕麦斯顿的指示而行将在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是严重的威胁；说托利党政府即使只是为了怄气，为了证明他们对帕麦斯顿炮轰广州事件投不信任票的正确性，也很可能要破坏这个成就。马姆兹伯里自己被这种叫喊吓住了。何况在他心目中还铭记着埃伦伯勒勋爵的命运。埃伦伯勒勋爵敢于公然抵制高贵的子爵②对印度的政策，为了酬答他的爱国勇气，他自己在德比内阁中的同僚竟把他做了牺牲品。[402]因此，马姆兹伯里就把全部主动权交到了额尔金手里，结果使额尔金能够执行帕麦斯顿的计划，而将责任推卸给帕麦斯顿的官场敌手——托利党。正是这种情况现在使托利党人在对白河事件应采取何种对策这一点上处于很尴尬的两难境地。他们必

①莎士比亚《无事生非》第4幕第2场。——编者注

②亨·帕麦斯顿。——编者注

须要么和帕麦斯顿一同鼓吹战争，从而使他继续当政；要么抛弃他们在最近一次意大利战争期间曾经令人作呕地拼命吹捧的这位马姆兹伯里。[403]

因为迫在眉睫的第三次对华战争并不受英国商界方面的欢迎，所以这个抉择更令人头痛了。在1857年，商界曾跨上不列颠狮子，因为他们当时指望从强迫开放的中国市场获得巨大的商业利润。现在却相反，眼见已经到手的条约果实忽然从他们手里被夺走，他们感到愤怒了。他们知道，即使不发生会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的大规模对华战争，欧洲和印度的形势看来也已经够严重的了。他们没有忘记，在1857年茶叶进口量减少了2 400多万磅，这种商品几乎完全是从广州输出的，而当时广州正好是唯一的战场。因此他们担心，这种因战争而妨碍贸易的现象，现在可能扩展到上海和天朝帝国的其他通商口岸。可是英国人在为鸦片走私的利益发动了第一次对华战争、为保护海盗划艇进行了第二次对华战争之后，为达到一个高潮，就只有在公使常驻首都这个使中国十分为难的问题上，再来一次对华战争了。

卡·马克思写于1859年9月13、16、20和30日

载于1859年9月27日，10月1、10和1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750、5754、5761和5768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16卷翻译

卡·马克思

对 华 贸 易

过去有个时候，曾经流行过一种十分虚妄的见解，以为天朝帝国“大门被冲开”一定会大大促进美国和英国的商业；当时我们曾根据对本世纪初以来中国对外贸易所作的较详尽的考察指出，这些奢望是没有可靠根据的。①我们曾认为，除我们已证明与西方工业品销售成反比的鸦片贸易之外，妨碍对华出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因素，是那个依靠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为了证实我们以前的论断，现在可以援引题为《关于额尔金伯爵赴华赴日特别使命的函件》的蓝皮书[388]。

每当亚洲各国的什么地方对输入商品的实际需求与设想的需求——设想的需求大多是根据新市场的大小、当地人口的多寡，以及某些重要的口岸外货销售情况等表面资料推算出来的——不相符时，急于扩大贸易地域的商人们就极易于把自己的失望归咎于野蛮政府所设置的人为障碍在作梗，因此可以用强力清除这些障碍。正是这种错觉，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使得英国商人拼命支持每一个许诺以海盗式的侵略强迫野蛮人缔结通商条约的大臣。这样一来，假想中对外贸易从中国当局方面遇到的人为障碍，事实上便构成了在商界人士眼中能为对天朝帝国施加的一切暴行辩护的极好借口。额尔金勋

---

①见本卷第637—642页。——编者注

爵的蓝皮书中所包含的宝贵材料，将会使一切没有成见的人大大消除这些危险的错觉。

蓝皮书中附有1852年广州的一位英国官员米切尔先生致乔治·文翰爵士的报告书。我们现在从这份报告书中摘录如下的一段：

> “我们与这个国家〈中国〉的通商条约充分生效至今〈1852年〉已将近10年。每一个可能设想的障碍都已清除，1 000英里长的新海岸已对我们开放，新的商埠已经在紧靠生产地区之处和沿海最方便的地点建立起来。但是，就我们所预期的对我国工业品消费数量的增加而论，其结果又怎样呢？老实说来结果就是：经过10年以后，商业部的表报告诉我们，亨利·璞鼎查爵士在1843年签订补充条约①时所见到的当时的贸易量，较之他的条约本身在1850年底给我们带来的还要大些〈！〉——这里是就我们本国制造的工业品而论的，我们本国制造的工业品是我们现在所考虑的唯一问题。”

米切尔先生承认，自从1842年条约②订立以来，几乎完全是以白银交换鸦片的中印贸易，已经大大发展。但即使是对于这种贸易，他也还补充说：

> “它从1834年到1844年的发展，与从1844年到现在的发展，速度是相同的，而在后一个时期内，可以认为它是在条约的保护之下进行的。另一方面，从商业部的表报上，我们看到一件非常突出的事实，即1850年底我们向中国出口的工业品，同1844年底相比，几乎减少了75万英镑。”

1842年条约在促进英国对华出口贸易方面，没有发生丝毫作用，这可以从下表看出：

---

①指南京条约的补充条约，即虎门条约。——编者注

②南京条约。——编者注

申报价值

	1849	1850	1851	1852	1853	1854	1855	1856	1857
棉织品	1 001 283	1 020 915	1 598 829	1 905 321	1 408 433	640 820	883 985	1 544 235	1 731 909
毛织品	370 878	404 797	373 399	434 616	203 875	156 959	134 070	268 642	286 852
其他商品	164 948	148 433	189 040	163 662	137 289	202 937	259 889	403 246	431 221
共计	1 537 109	1 574 145	2 161 268	2 503 599	1 749 597	1 000 716	1 277 944	2 216 123	2 449 982

现在我们把这些数字与据米切尔说1843年为175万英镑的中国对英国工业品的需求额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在最近九年内，英国的输出，有五年远远低于1843年的水平，而1854年只有1843年的$\frac{10}{17}$。米切尔先生首先用一些看来过于笼统而不能确切证明任何具体事物的理由来解释这一惊人的事实。他说：

“中国人的习惯是这样节俭、这样因循守旧，甚至他们穿的衣服都完全是以前他们祖先所穿过的。这就是说，他们除了必不可少的以外，不论卖给他们的东西多么便宜，他们一概不要。”“一个靠劳动为生的中国人，一件新衣至少要穿上三年，而且在这个期间还要能经得住干最粗的粗活时的磨损，不然他们是添置不起的。而像那样的衣服所用的棉花，至少要相当于我们运到中国去的最重的棉织品所用棉花重量的三倍，换句话说，它的重量必须相当于我们能运到中国去的最重的粗斜纹布和平布重量的三倍。”

没有需要以及对传统服式的偏爱，这些是文明商业在一切新市场上都要遇到的障碍。至于粗斜纹布的厚度和强度，难道英国和美国的制造商不能使他们的产品适合中国人的特殊需要吗?这里我们就接触到问题的症结了。1844年，米切尔先生曾将各种质料的土布样品寄到英国去，并且注明其价格。同他通信的人告诉他，按照他所开列的价格，他们在曼彻斯特不能生产那种布匹，更不能把它运往中国。为什么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制度生产出的产品，售价竟不能比最原始的织机上用手工织出的布更低廉呢?我们上面已经指出过的那

种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结合，解答了这个谜。我们再来引述米切尔先生的话吧：

"在收获完毕以后，农家所有的人手，不分老少，都一齐去梳棉、纺纱和织布；他们就用这种家庭自织的料子，一种粗重而结实、经得起两三年粗穿的布料，来缝制自己的衣服；而将余下来的拿到附近城镇去卖，城镇的小店主就收购这种土布来供应城镇居民及河上的船民。这个国家十分之九的人都穿这种手织的衣料，其质地各不相同，从最粗的粗棉布到最细的本色布都有，全都是在农家生产出来的，生产者所用的成本简直只有原料的价值，或者毋宁说只有他交换原料所用的自家生产的糖的价值。我们的制造商只要稍稍思索一下这种做法的令人赞叹的节俭性，以及它与农民其他活路的可以说是巧妙的穿插配合，就会一目了然，以粗布而论，他们是没有任何希望与之竞争的。每一个富裕的农家都有织布机，世界各国也许只有中国有这个特点。在所有别的国家，人们只限于梳棉和纺纱——到此为止，而把纺成的棉纱送交专门的织工去织成布匹。只有节俭的中国人才一干到底。中国人不但梳棉和纺纱，而且还依靠自己的妻女和雇工的帮助，自己织布；他的生产并不以仅仅供给自己家庭的需要为限，而且是以生产一定数量的布匹供应附近城镇及河上船民作为他那一季工作的一个主要部分。

因此，福建的农民不单单是一个农民，他既是庄稼汉又是工业生产者。他生产布匹，除原料的成本外，简直不费分文。如前所说，他是在自己家里经自己的妻女和雇工的手而生产这种布匹的；既不要额外的劳力，又不费特别的时间。在他的庄稼正在生长时，在收获完毕以后，以及在无法进行户外劳动的雨天，他就让他家里的人们纺纱织布。总之，一年到头一有可利用的空余时间，这个家庭工业的典型代表就去干他的事，生产一些有用的东西。"

下面是额尔金勋爵对他溯航长江时所见到的农民的描述，可以看做是对米切尔先生的记载的补充：

"我所看到的情形使我相信，中国农民一般说来过着丰衣足食和心满意足的生活。我曾竭力从他们那里获取关于他们的土地面积、土地占有性质、他们必须交纳的税金以及诸如此类的精确资料，虽所得无几，我已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大都拥有极有限的从皇帝那里得来的完全私有的土地，每年须交纳一定的不算过高的税金；这些有利情况，再加上他们特别刻苦耐劳，就能充分满足他们衣

食方面的简单需要。”

正是这种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过去长期阻挡了而且现时仍然妨碍着英国商品输往东印度。但在东印度，那种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是以一种特殊的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而英国人凭着自己作为当地最高地主的地位，能够破坏这种土地所有制，从而强使一部分印度自给自足的公社变成纯粹的农场，生产鸦片、棉花、靛青、大麻之类的原料来和英国货交换。在中国，英国人还没有能够行使这种权力，将来也未必能做到这一点。

卡·马克思写于1859年11月中

载于1859年12月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808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16卷翻译

卡·马克思

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404]

1853年6月10日星期五于伦敦

来自维也纳的电讯报道，那里都认为土耳其问题、撒丁问题和瑞士问题肯定会得到和平解决。

昨晚下院继续辩论印度问题，辩论情况同往日一样平淡无味。布莱克特先生责备查理·伍德爵士和詹·霍格爵士，说他们的发言带有假装乐观的味道。内阁和董事会①的一批辩护士对这个责难极力加以反驳，而无所不在的休谟先生则在结论中要大臣们把他们的法案收回。辩论暂停。

印度斯坦是亚洲规模的意大利。喜马拉雅山相当于阿尔卑斯山，孟加拉平原相当于伦巴第平原，德干高原相当于亚平宁山脉，锡兰岛相当于西西里岛。它们在土地出产方面是同样地富庶繁多，在政治结构方面是同样地四分五裂。意大利常常被征服者的刀剑压缩为各种大大小小的国家，印度斯坦的情况也是这样，在它不处于伊斯兰教徒、莫卧儿人[405]或不列颠人的压迫之下时，它就分解成像它的城镇甚至村庄那样多的各自独立和互相敌对的邦。但是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印度斯坦却不是东方的意大利，而是东方的爱尔兰。意大利和爱尔兰——一个淫乐世界和一个悲苦世界——的这种奇怪的结合，

①指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编者注

早在印度斯坦宗教的古老传统里已经显示出来了。这个宗教既是纵欲享乐的宗教，又是自我折磨的禁欲主义的宗教；既是崇拜林伽[406]的宗教，又是崇拜札格纳特[407]的宗教；既是僧侣的宗教，又是舞女的宗教。

我不同意那些相信印度斯坦有过黄金时代的人的意见，不过为了证实我的看法也不必搬出库利汗统治时期，像查理·伍德爵士那样①。但是，作为例子大家可以举出奥朗则布时期；或者莫卧儿人出现在北方而葡萄牙人出现在南方的时代；或者伊斯兰教徒入侵和南印度七国争雄[408]的年代；或者，如果大家愿意，还可以追溯到更远的古代去，举出婆罗门[409]本身的神话纪年，它把印度灾难的开端推到了甚至比基督教的世界创始时期更久远的年代。

但是，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所遭受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要深重得多。我在这里所指的还不是不列颠东印度公司[365]在亚洲式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欧洲式专制，这两种专制结合起来要比萨尔赛达庙[410]里任何狰狞的神像都更为可怕。这并不是不列颠殖民统治独有的特征，它只不过是对荷兰殖民统治的模仿，而且模仿得惟妙惟肖，所以为了说明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所作所为，只要把**英国的**爪哇总督斯坦福·拉弗尔斯爵士谈到旧日的荷兰东印度公司[411]时说过的一段话一字不改地引过来就够了：

“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心只想赚钱，它对它的臣民还不如过去的西印度种植

---

①见马克思《俄国的欺骗。——格莱斯顿的失败。——查理·伍德爵士的东印度改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134页)。——编者注

场主对那些在他们的种植场干活的奴隶那样关心，因为这些种植场主买人的时候是付了钱的，而荷兰东印度公司却没有花过钱，它开动全部现有的专制机器压榨它的臣民，迫使他们献出最后一点东西，付出最后一点劳力，从而加重了恣意妄为的半野蛮政府所造成的祸害，因为它把政客的全部实际技巧和商人的全部独占一切的利己心肠全都结合在一起。"①

内战、外侮、革命、征服、饥荒——尽管所有这一切接连不断地对印度斯坦造成的影响显得异常复杂、剧烈和具有破坏性，它们却只不过触动它的表面。英国则摧毁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重新改建的迹象。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传统，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

在亚洲，从远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就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者说，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战争部门，或者说，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以及其他地区，都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水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佛兰德和意大利，曾促使私人企业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壤肥沃程度的设施归中央政

①托·斯·拉弗尔斯《爪哇史》1817年伦敦版第1卷第151页。——编者注

府管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施立刻就会废置，这就可以说明一件否则无法解释的事实，即大片先前耕种得很好的地区现在都荒芜不毛，例如巴尔米拉、佩特拉、也门废墟以及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的广大地区就是这样。同时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就能够使一个国家在几百年内人烟萧条，并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

现在，不列颠人在东印度从他们的前人那里接收了财政部门和战争部门，但是却完全忽略了公共工程部门。因此，不能按照不列颠的自由竞争原则——自由放任[412]原则——行事的农业便衰败下来。但是我们在一些亚洲帝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败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在那里收成取决于政府的好坏，正像在欧洲随时令的好坏而变化一样。因此，假如没有同时发生一种重要得多的、在整个亚洲的历史上都算是一种新事物的情况，那么无论对农业的抑制和忽视多么严重，都不能认为这是不列颠入侵者给予印度社会的致命打击。从遥远的古代直到19世纪最初十年，无论印度过去在政治上变化多么大，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曾经造就无数训练有素的纺工和织工的手织机和手纺车，是印度社会结构的枢纽。欧洲从远古的时候起就得到印度制作的绝妙的纺织品，同时运送它的贵金属去进行交换，这样就给当地的金匠提供了材料，而金匠是印度社会必不可少的成员，因为印度人极其爱好装饰品，甚至社会最下层中的那些几乎是衣不蔽体的人们通常都戴着一副金耳环，脖子上套着某种金饰品。手指和脚趾上戴环戒也很普遍。妇女和孩子常常戴着沉甸甸的金银手镯和脚镯，而金银的小神像在很多家庭中都可以看到。不列颠入侵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英国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织品

挤出了欧洲市场，然后是向印度斯坦输入棉纱，最后就使英国棉织品泛滥于这个棉织品的故乡。从1818年到1836年，大不列颠向印度输出的棉纱增长的比例是1∶5 200。在1824年，输入印度的不列颠细棉布不过100万码，而到1837年就超过了6 400万码。但是在同一时期，达卡的人口却从15万人减少到2万人。然而，曾以纺织品闻名于世的印度城市的这种衰败决不是不列颠统治的最坏的结果。不列颠的蒸汽机和科学在印度斯坦全境彻底摧毁了农业和制造业的结合。

在印度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方面，印度人也像所有东方人一样，把他们的农业和商业所凭借的主要条件即大规模公共工程交给中央政府去管，另一方面，他们又散处于全国各地，通过农业和制造业的家庭结合而聚居在各个很小的中心地点。由于这两种情况，从远古的时候起，在印度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结合体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从过去英国下院关于印度事务的一份官方报告的下面一段描写中，可以看出这个制度的特殊性质：

“从地理上看，一个村社就是一片占有几百到几千英亩耕地和荒地的地方；从政治上看，它很像一个地方自治体或市镇自治区。它固有的管理机构包括以下各种官员和职员：**帕特尔**，即居民首脑，一般总管村社事务，调解居民纠纷，行使警察权力，执行村社里的收税职务——这个职务由他担任最合适，因为他有个人影响，并且对居民的状况和营生十分熟悉。**卡尔纳姆**负责督察耕种情况，登记一切与耕种有关的事情。还有**塔利厄尔**和**托蒂**，前者的职务是搜集关于犯罪和过失的情况，护送从一个村社到另一个村社去的行人；后者的职务范围似乎更直接地限于本村社，主要是保护庄稼和帮助计算收成。**边界守卫员**负责保护村社边界，在发生边界争议时提供证据。蓄水池和水道管理员主管分配农业用水。婆罗门*409*主持村社的祭祀。教师教村社的儿童在沙土上读写，另外还有管

历法的婆罗门或占星师等等。村社的管理机构通常都是由这些官员和职员组成;可是在国内某些地方,这个机构的人数较少,上述的某些职务有的由一人兼任;反之,也有些地方超过上述人数。从远古的时候起,这个国家的居民就在这种简单的自治制的管理形式下生活。村社的边界很少变动。虽然村社本身有时候受到战争、饥荒或疫病的严重损害,甚至变得一片荒凉,可是同一个村名、同一条村界、同一种利益、甚至同一个家族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保持下来。居民对各个王国的崩溃和分裂毫不关心;只要他们的村社完整无损,他们并不在乎村社转归哪一个政权管辖,或者改由哪一个君主统治,反正他们内部的经济生活始终没有改变。帕特尔仍然是居民的首脑,仍然充当着全村社的小法官或地方法官,全村社的收税官或收租官。"①

这些细小刻板的社会机体大部分已被破坏,并且正在归于消失,这与其说是由于不列颠收税官和不列颠士兵的粗暴干涉,还不如说是由于英国蒸汽机和英国自由贸易的作用。这些家庭式公社本来是建立在家庭工业上面的,靠着手织业、手纺业和手耕农业的特殊结合而自给自足。英国的干涉则把纺工放在兰开夏郡,把织工放在孟加拉,或是把印度纺工和印度织工一齐消灭,这就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为这摧毁了它们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

从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

①托·斯·拉弗尔斯《爪哇史》1817年伦敦版第1卷第285页。——编者注

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不开化的人的利己主义，他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一个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哪个侵略者肯于垂顾他们一下，他们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驯顺的猎获物。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有损尊严的、停滞不前的、单调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被动的生存，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杀生害命在印度斯坦成为一种宗教仪式。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小小的公社带着种姓[413]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污痕；它们使人屈服于外界环境，而不是把人提高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态变成了一成不变的自然命运，因而造成了对自然的野蛮的崇拜，从身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母牛撒巴拉虔诚地叩拜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种崇拜是多么糟蹋人了。

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总之，无论一个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来说是怎样难过，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

“我们何必因这痛苦而伤心，
既然它带给我们更多欢乐？
难道不是有千千万万生灵

曾经被帖木儿的统治吞没?”①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6月7日—10日之间

载于1853年6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04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2卷翻译

①歌德《致祖莱卡》。——编者注

卡·马克思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

1853年7月22日星期五于伦敦

在这篇通讯里，我打算归纳一下我对印度问题的意见。

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大莫卧儿[405]的无上权力被它的总督们摧毁，总督们的权力被马拉塔人[414]摧毁，马拉塔人的权力被阿富汗人摧毁；而在大家这样混战的时候，不列颠人闯了进来，把他们全都征服了。这是一个不仅存在着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的对立，而且存在着部落与部落、种姓[413]与种姓对立的国家，这是一个建立在所有成员之间普遍的互相排斥和与生俱来的排他思想所造成的均势上面的社会。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社会，难道不是注定要做征服者的战利品吗?就算我们对印度斯坦过去的历史一点都不知道，那么，甚至现在英国还在用印度出钱供养的印度人军队来奴役印度，这难道不是一个重大的、不容争辩的事实吗?所以，印度本来就逃不掉被征服的命运，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如果还算得上是什么历史的话，就是一次又一次被征服的历史。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我们通常所说的它的历史，不过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入侵者的历史，他们就在这个一无抵抗、二无变化的社会的消极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帝国。因此，问题并不在于英国人是否有权征服印度，而在于我们是否宁愿让印度被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国人

征服而不愿让它被不列颠人征服。

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相继侵入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不久就被**印度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不列颠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响的征服者。他们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崇高的一切,从而毁灭了印度的文明。他们在印度进行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很难说还有别的什么内容。他们的重建工作在这大堆大堆的废墟里使人很难看得出来。尽管如此,这种工作还是开始了。

使印度达到比从前在大莫卧儿人统治下更加牢固和更加扩大的政治统一,是重建印度的首要条件。不列颠人用刀剑实现的这种统一,现在将通过电报而巩固起来,永存下去。由不列颠的教官组织和训练出来的印度人军队,是印度自己解放自己和不再一遇到外国入侵者就成为战利品的必要条件。第一次被引进亚洲社会并且主要由印度人和欧洲人的共同子孙所领导的自由报刊,是改建这个社会的一个新的和强有力的因素。柴明达尔制度[415]和莱特瓦尔制度[383]本身虽然十分可恶,但这两种不同形式的土地私有制却是亚洲社会迫切需要的。从那些在英国人监督下在加尔各答勉强受到一些很不充分的教育的印度当地人中间,正在崛起一个具有管理国家的必要知识并且熟悉欧洲科学的新的阶级。蒸汽机使印度能够同欧洲经常地、迅速地交往,把印度的主要港口同整个东南海洋上的港口联系起来,使印度摆脱了孤立状态,而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

原因。在不远的将来，铁路加上轮船，将使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距离以时间计算缩短为八天，而这个一度是神话中的国度就将同西方世界实际地联结在一起。

大不列颠的各个统治阶级过去只是偶尔地、暂时地和例外地对印度的发展问题表示兴趣。贵族只是想征服它，金融寡头只是想掠夺它，工业巨头只是想通过廉价销售商品来压垮它。但是现在情势改变了。工业巨头们发现，使印度变成一个生产国对他们大有好处，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就要供给印度水利设备和国内交通工具。现在他们正打算用铁路网覆盖整个印度。他们会这样做。其后果将是无法估量的。

大家知道，由于印度极端缺乏运输和交换其各种产品的工具，它的生产力陷于瘫痪状态。尽管自然资源丰富，但由于缺乏交换工具而使社会非常穷困，这种情况在印度比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要严重。1848年在英国下院的一个委员会的会议上曾经证明：

> "在坎德什，每夸特粮食售价是6—8先令，而在布纳却高达64—70先令，那里的居民饿死在街头，粮食却无法从坎德什运来，因为道路泥泞不堪，无法通行。"①

铁路的敷设可以很容易地用来为农业服务，例如在建筑路堤需要取土的地方修水库，给铁路沿线地区供水。这样一来，作为东方农业的必要条件的水利事业就会大大发展，常常因为缺水而造成的地区性饥荒就可以避免。从这样的观点来看，铁路有多方面的重要性是很明显的，因为甚至在高止山脉附近地区，经过灌溉的土地也比面积相同而未经灌溉的土地多纳2倍的税，多用9—11倍的人，多得11—

---

①约·狄金逊《官僚制度下的印度管理》第81—82页。——编者注

14倍的利润。

铁路可以缩减军事机构的数量和开支。圣威廉堡[416]司令沃伦上校曾在下院的专门委员会中作过如下的说明：

> "如果不是像现在这样，要用几天甚至几个星期才能从这个国家的边远地区收到情报，而是用几小时就能收到，如果能在更短的时间内把命令连同军队和给养一起送到目的地，其意义将是不可估量的。军队可以驻扎在彼此距离比现在更远和更卫生的地方，这样就可以免得使许多人因疾病而丧生。仓库里的给养也用不着储存得像现在这样多，因而就能避免由于腐烂和天气不好而造成的损失。军队的人数也将因效率提高而相应地减少。"①

我们知道，农村公社的自治制组织和经济基础已经被破坏了，但是，农村公社的最坏的一个特点，即社会分解为许多固定不变、互不联系的原子的现象，却残留下来。村庄的孤立状态在印度造成了道路的缺少，而道路的缺少又使村庄的孤立状态长久存在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公社就一直处在既有的很低的生活水平上，同其他村庄几乎没有来往，没有推动社会进步所必需的愿望和行动。现在，不列颠人把村庄的这种自给自足的**惰性**打破了，铁路将造成互相交往和来往的新的需要。此外，

> "铁路系统的效果之一，就是它将把其他地方的各种发明和实际设备的知识以及如何掌握它们的手段带给它所经过的每一个村庄，这样就将使印度世代相传的、领取工薪的农村手工工匠既能够充分显示他们的才能，又能够弥补他们的缺陷。"（查普曼《印度的棉花和贸易》）

我知道，英国的工业巨头们之所以愿意在印度修筑铁路，完全是为了要降低他们的工厂所需要的棉花和其他原料的价格。但是，你

---

①《印度的铁路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附地图和附录》1848年伦敦第3版第20—22页。——编者注

一旦把机器应用于一个有铁有煤的国家的交通运输，你就无法阻止这个国家自己去制造这些机器了。如果你想要在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里维持一个铁路网，那你就不能不把铁路交通日常急需的各种必要的生产过程都建立起来，而这样一来，也必然要在那些与铁路没有直接关系的工业部门应用机器。所以，铁路系统在印度将真正成为现代工业的先驱。何况，正如英国当局自己所承认的，印度人特别有本领适应完全新的劳动并取得管理机器所必需的知识。在加尔各答造币厂操纵蒸汽机多年的本地技师们表现出来的本领和技巧，在布德万①煤区看管各种蒸汽机的本地人的情况以及其他许多实例，都充分证明了这个事实。甚至受东印度公司[365]的偏见影响很深的坎伯尔先生本人也不得不承认：

> “广大的印度人民群众具有巨大的**工业活力**，很善于积累资本，有清晰的数学头脑，有长于计算和从事精密科学的非凡才能。”他还说，“他们的智慧是卓越的。”②

由铁路系统产生的现代工业，必然会瓦解印度种姓[413]制度所凭借的传统的分工，而种姓制度则是印度进步和强盛的基本障碍。

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但是，有一点他们是一定能够做到的，这就是为这两者创造物质前提。难道资产阶级做过更多的事情吗？难道它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

---

①《纽约每日论坛报》误为“赫尔德瓦尔”。——编者注

②乔·坎伯尔《现代印度。民政管理制度概述》1852年伦敦版第59—60页。——编者注

蒙受苦难与屈辱就实现过什么进步吗?

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在比较遥远的未来,这个巨大而诱人的国家将得到重建。这个国家的人举止文雅,用萨尔蒂科夫公爵的话来说,甚至最下层阶级里的人都"比意大利人更精细更灵巧"①;他们的沉静的高贵品格甚至足以抵消他们所表现的驯服态度;他们虽然天生一副委靡不振的样子,但他们的勇敢却使英国军官大为吃惊;他们的国家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宗教的发源地,从他们的贾特[417]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古代日耳曼人的原型,从他们的婆罗门[409]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希腊人的原型。

在结束印度这个题目时,我不能不表示一些结论性的意见。

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资产阶级是财产的捍卫者,但是难道曾经有哪个革命党发动过孟加拉、马德拉斯和孟买那样的土地革命吗?当资产阶级在印度单靠贪污不能填满他们那无底的欲壑的时候,难道他们不是都像大强盗克莱夫勋爵本人所说的那样,采取了凶恶的勒索手段吗?当他们在欧洲大谈国债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难道他们不是同时就在印度没收了那些把私人积蓄投给东印度公司作股本的拉甲[418]所应得的红利吗?当他们以保护"我们的神圣宗教"为口实反对法国革命的时候,难道他

①阿·德·萨尔蒂科夫《印度信札》1848年巴黎版第61页。——编者注

们不是同时就在印度禁止传播基督教吗?而且为了从络绎不绝的朝拜奥里萨和孟加拉的神庙的香客身上榨取钱财,难道他们不是把札格纳特庙里的杀生害命和卖淫变成了一种职业吗?[419]这就是维护"财产、秩序、家庭和宗教"的人的真面目!

对于印度这样一个和欧洲一样大的、幅员15 000万英亩的国家,英国工业的破坏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是令人吃惊的。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这种作用只是整个现存的生产制度所产生的有机的结果。这个生产建立在资本的绝对统治上面。资本的集中是资本作为独立力量而存在所十分必需的。这种集中对于世界市场的破坏性影响,不过是在广大范围内显示目前正在每个文明城市起着作用的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内在规律罢了。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支配。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7月22日

载于1853年8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40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2卷翻译



注　释

索　引



注　　释

1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宣言》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明了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对资本主义作了深刻而系统的分析，科学地评价了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宣言》强调："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见本卷第45页）"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见本卷第52页）《宣言》论述了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伟大历史使命和建立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奋斗目标，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见本卷第53页）《宣言》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础，论述了共产党的性质、特点、基本纲领和策略原则，指出："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见本卷第44页）《宣言》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这些流派的界限，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战斗口号。《宣言》为无产阶级争取

自身解放的斗争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是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典范。列宁指出："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第50页）"这本书篇幅不多，价值却相当于多部巨著：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着、推动着文明世界全体有组织的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8页）

1847年11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大会上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大会经过辩论，接受了他们的观点，并委托他们为同盟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用德文写成了《共产党宣言》。

1848年2月底，《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德文单行本在伦敦出版。《宣言》一问世便被译成欧洲多种文字。在1848年的各个版本中作者没有署名。1850年英国宪章派机关刊物《红色共和党人》杂志登载《宣言》的英译文时，编辑乔·哈尼在序言中第一次指出了作者的名字。

1872年，《宣言》出版了新的德文版。这一版以及后来出版的1883年和1890年德文版，书名改用《共产主义宣言》。

《共产党宣言》曾有多种中译本。《宣言》的第一个全译本由陈望道翻译，1920年8月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1930年上海中外社会科学研究社出版了华岗翻译的中译本；1938年延安解放社出版了成仿吾、徐冰翻译的中译本；1943年延安解放社又出版了博古校译的中译本；1949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了《宣言》发表一百周年纪念版的中译本；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成仿吾的中译本。——3。

2 《1872年德文版序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新的德文版合写的第一篇序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序言中明确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又强调，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见本卷第5页）。他们还谈到，由于情况的变化，由于有了法国二月革命特别是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宣言》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但考虑到《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所以对内容未

作修改。

《共产党宣言》新的德文版由《人民国家报》编辑部倡议，于1872年在莱比锡出版。这一版只对个别用词作了改动。——5。

3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随着形势的发展，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终于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是正确的，并认识到必须使同盟摆脱旧的密谋传统和方式，遂于1847年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正义者同盟，协助同盟改组。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原则为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取代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举行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

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巴黎以后，巴黎于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驻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员。

1848年3月下半月—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下旬所写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当时，由马克思任主编的《新莱茵报》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指导中心。

虽然1848年二月革命的失败使共产主义者同盟遭受了打击，但同盟仍然于1849—1850年进行了改组并继续开展活动。1850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提出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反对该集团无视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德国及欧洲其他各国的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

1850年9月中，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最终导致同盟与该集团决裂。1851年5月，由于警察迫害和大批盟员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陷于停顿。1852年11月17日，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宣判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相当多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筹建工作。——5、11、188。

4 *二月革命*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年2月22—24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二月革命为欧洲1848—1849年革命拉开了序幕。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5、11、20、72、235、386、468、593。

5 *1848年六月起义*指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二月革命后，无产阶级要求把革命推向前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推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6月22日颁布了封闭“国家工场”的挑衅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强烈反抗。6月23—26日，巴黎工人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6月25日，镇压起义的让·巴·菲·布雷亚将军在枫丹白露哨兵站被起义者打死，两名起义者后来被判处死刑。经过四天英勇斗争，起义被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残酷镇压下去。马克思论述这次起义时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保存还是消灭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见本卷第101页)——5、20、80、106、108、112、134、208、407、494。

6 *巴黎公社*是1871年法国无产阶级在巴黎建立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1871年3月18日，巴黎无产者举行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28日巴黎公社宣告成立。公社打碎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废除常备军代之以人民武装，废除官僚制度代之以民主选举产生的、对选民负责的、受群众监督的公职人员。公社没收逃亡资本家的企业交给工人管理，并颁布一系列保

护劳动者利益的法令。5月28日，巴黎公社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打击下遭到失败，总共只存在了72天。——6。

7 《1882年俄文版序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的第二个俄译本合写的序言。该译本由格·普列汉诺夫翻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序言中强调："《共产主义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见本卷第8页）他们通过对俄美两国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分析，论证了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无产阶级运动不断扩大的趋势，指出俄国已经从欧洲全部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支庞大后备军变成了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并对当时俄国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的前途提出这样的设想："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见本卷第8页）

这篇序言最初于1882年2月5日在俄国民意党人的《民意》杂志第8—9期用俄译文发表。附有这篇序言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单行本于1882年在日内瓦作为《俄国社会革命丛书》之一出版。1882年4月，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准备发表这篇序言，因找不到德文原稿，只好请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将俄译文再转译成德文，于1882年4月13日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6号。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全文引用了他本人由俄文转译成德文的这篇序言，个别地方与德文原稿略有差别。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篇序言的德文手稿才被重新发现。1939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德文版《共产党宣言》首次按德文原文发表了这篇序言。——7。

8 1881年3月1日民意党人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以后，亚历山大三世因害怕民意党人采取新的恐怖行动，终日藏匿在彼得堡附近的加特契纳行宫内，因而被人们戏谑地称为"加特契纳的俘虏"。——8、18。

9 《1883年德文版序言》是恩格斯为1883年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第三个德文版写的序言，该版本是马克思逝世后经恩格斯同意出版的第一个德文本。序言明确表述了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

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见本卷第9页)恩格斯的这一表述,概括了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9。

10 《1888年英文版序言》是恩格斯为1888年在伦敦出版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写的序言。该版本由赛·穆尔翻译,恩格斯亲自校订并加了一些注释。恩格斯在序言中回顾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和《宣言》在各国的传播史,指出:“《宣言》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现代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见本卷第13页)恩格斯重申了1883年德文版序言所表述的《宣言》的基本思想,并强调“这一思想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见本卷第14页)。他还引录了1872年德文版序言的主要内容。——11。

11 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10月4日—11月12日)是普鲁士政府策动的一次挑衅性案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11名成员被送交法庭审判,其罪名是“进行叛国性密谋”。被指控的证据是普鲁士警探们假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原本记录》和其他一些伪造文件,以及警察局从已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那里窃得的一些文件。法庭根据伪造文件和虚假证词,判处七名被告三年至六年徒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一案件的策动者的挑衅行为和普鲁士警察国家对付国际工人运动的卑鄙手段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参看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和恩格斯《最近的科隆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11、20。

12 国际工人协会简称国际,后通称第一国际,是无产阶级第一个国际性的革命联合组织,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成立。马克思参与了第一国际的创建,是它的实际领袖,恩格斯参加了国际后期的领导工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下,第一国际领导了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积极支持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坚决地揭露和批判了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工联主义等机会主义流派,促进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第

一国际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了活动，1876年7月15日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0页）。——12、20。

13 英国工联即英国工会。1824年英国工人获得了自由结社的权利，工联遂在英国普遍建立起来。工联是按行业组织的，加入工联的人必须是满师的技术工人，须缴纳很高的会费；工联设有全国性的领导机关；工联的任务是维护本行业熟练工人的经济利益。工联的机会主义领袖把无产阶级的斗争局限于经济斗争，鼓吹阶级调和。许多工联组织曾经加入国际。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国际成立时起，就同工联领导人的机会主义，即工联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2、20。

14 蒲鲁东派是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的信徒。蒲鲁东派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批判资本主义，幻想使小私有制万古长存；主张建立“交换银行”和发放无息贷款，以维护小生产者的私有制；宣传用改良的办法消除资本主义“坏的”方面，保留资本主义“好的”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和政治斗争，主张取消任何政府和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际工人协会中对蒲鲁东派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2、20。

15 拉萨尔派是19世纪60—70年代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斐·拉萨尔的信徒，主要代表人物是约·巴·冯·施韦泽、威·哈森克莱维尔、威·哈赛尔曼等。该派的组织是1863年5月由拉萨尔创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反对暴力革命，认为只要进行议会斗争，争取普选权，就可以把普鲁士君主国家变为“自由的人民国家”；主张在国家帮助下建立生产合作社，把资本主义和平地改造为社会主义；支持普鲁士政府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统一德国的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拉萨尔派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875年拉萨尔派与爱森纳赫派合并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2、20。

16 1887年9月5—12日在英国斯旺西举行了工联年度代表大会，即斯旺西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建立单独的工人政党等项决议。恩格斯提到

的这句话引自斯旺西工联理事会主席比万在大会上的发言，比万担任这次代表大会的主席。这篇发言载于1887年9月17日伦敦《公益》周刊。——12、21。

17 《共产党宣言》第二个俄文本的译者不是维·查苏利奇，而是格·瓦·普列汉诺夫。恩格斯于1894年曾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指出，《宣言》的第二个俄文本是普列汉诺夫翻译的（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459页）。——13、17。

18 这里提到的《共产党宣言》丹麦文译本（1885年哥本哈根版）删去了一些重要的地方，因而不够完备；有些译文也不太确切。恩格斯在《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了这一点（见本卷第19页）。——13。

19 劳·拉法格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法文译本刊登在1885年8月29日—11月7日的《社会主义者报》上，以后又作为附录收入1886年在巴黎出版的梅尔麦著的《社会主义法国》。——13、19。

20 《共产党宣言》西班牙文译本发表在1886年7—8月的《社会主义者报》上，并出版过单行本。——13、19。

21 欧文派指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拥护者。欧文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才能克服社会的一切罪恶。他曾在美国试办共产主义移民区，实行集体劳动和生产资料公有，最后宣告失败。欧文反对宪章运动，不主张工人开展政治斗争。认为靠知识的传播可以消除社会弊病，解决社会矛盾，并把希望寄托在统治者身上。——13、21、64。

22 傅立叶派指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傅立叶的拥护者。傅立叶认为，现存制度应当由理想的和谐制度所取代。在这种和谐制度下，社会的基层单位是工农结合与城乡结合的生产消费协作社法郎吉（Phalange）。在法郎吉中，人人参加劳动，劳动者和资本家都可以入股，产品按资本、劳动和才能进行分配。协作社成员居住和劳动的场所称做法伦斯泰尔（Phalanstere）。傅立叶派在法国和美国都曾进行过法郎吉移民区实验，这些实验均以失败告终。——13、21、64。

23 埃·卡贝是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他认为人类的不平等是违反自然规律

的，人类最严重的错误是建立私有制。他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主张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实现人人平等和幸福的社会。但是，他反对暴力革命，主张通过和平宣传来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卡贝在1840年发表的《伊加利亚旅行记》中描绘了他的理想社会。——14、21。

24　威·魏特林是德国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空想共产主义者。魏特林在1842年出版了《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抨击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他的空想共产主义计划。他认为，理想的社会是和谐与自由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人从事劳动，产品平均分配；他承认使用暴力实现社会革命的必要性。魏特林的学说是一种粗陋的平均共产主义的理论，在早期德国工人运动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后来成为工人运动发展的障碍。——14、21。

25　关于"工人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这一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著作中都表述过。这一思想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是这样表述的："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226页）——14、21。

26　《*1890年德文版序言*》是恩格斯为1890年在伦敦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之一出版的德文版《共产党宣言》写的序言。该版本是经恩格斯同意出版的《宣言》第四个德文本。它除了发表恩格斯的新序言外，还收入了1872年和1883年德文版序言。1890年11月28日《工人报》第48号在庆祝恩格斯七十寿辰的社论中也摘要刊登了这篇新序言。恩格斯在序言中再次回顾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和《宣言》在各国的传播史，不仅全文引录了1882年俄文版序言，而且援引了1888年英文版序言的主要内容。——17。

27　《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的德文原稿后来找到了。恩格斯在这里引用的序言是他亲自从俄文翻译成德文的，个别地方同德文原稿有细微差别。参看注7。——17。

28　*日内瓦代表大会*是国际工人协会于1866年9月3—8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中央委员会，协会各支部以及英、法、德和瑞士的工人团体等的60名代表。大会批准了协会的章程和条例。由马克思执笔的《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若干问题的指示》（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作为中央委员会的正式报告提交大会讨论。参加大会的蒲鲁东主义者对《指示》几乎逐点加以反对。经过辩论,中央委员会的拥护者取得了胜利。《指示》九项内容中有六项作为大会决议通过,其中之一是要求法律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并把这一要求作为全世界工人阶级共同行动的纲领。

巴黎工人代表大会是1889年7月14—20日在巴黎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实际上是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来自欧美22个国家和地区的393名代表。大会主席是前巴黎公社委员爱·瓦扬和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威·李卜克内西。这次大会听取了各社会主义政党代表关于本国工人运动的报告并通过了一些重要决议,要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规定五月一日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战斗的节日。——22。

29 《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是恩格斯为1892年由波兰社会党人的《黎明》杂志出版社在伦敦出版的波兰文版《共产党宣言》写的序言。恩格斯在序言中指出:“近来《宣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测量欧洲大陆大工业发展的一种尺度。某一国家的大工业越发展,该国工人想要弄清他们作为工人阶级在有产阶级面前所处地位的愿望也就越强烈,工人中间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就越扩大,对《宣言》的需求也就越增长。”(见本卷第23页)他还指出,波兰的独立只有年轻的波兰无产阶级才能争得,而欧洲其余国家的工人也像波兰工人一样需要波兰的独立和复兴,因为“欧洲各民族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只有当每个民族自己完全当家作主的时候才能实现”(见本卷第24页)。这篇序言发表于1892年2月27日《黎明》杂志第35期。——23。

30 会议桌上的波兰指沙皇俄国根据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决定所吞并的波兰领土。维也纳会议后,波兰再度被俄、普、奥三国瓜分,沙皇俄国吞并了大部分波兰国土,成立了波兰王国,由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兼任国王。会议桌上的波兰或俄罗斯的波兰,即指这部分波兰领土。——23。

31 《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是恩格斯应意大利社会党领袖菲·屠拉梯的请求,用法文为1893年意大利文版《共产党宣言》写的序言。该版本由蓬·贝蒂尼翻译,序言由屠拉梯翻译,于1893年由社会党理论刊物《社会评论》杂志社在米兰出版。恩格斯在序言中回顾了1848年革命以来的历史进程,特

别是意大利、德国、匈牙利等民族取得统一和独立的进程，指出："1848年革命虽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它毕竟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了道路，为这个革命准备了基础。最近45年来，资产阶级制度在各国引起了大工业的飞速发展，同时造成了人数众多的、紧密团结的、强大的无产阶级；这样它就产生了——正如《宣言》所说——它自身的掘墓人。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见本卷第26页）——25。

32　1848年3月18日米兰人民举行了反对奥地利统治的武装起义，赶走了奥地利军队，成立了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民主派领导的临时政府，推动了意大利其他各地的革命。

同一天，柏林人民也发动了武装起义，迫使国王宣布立即召开国民议会，制定宪法，撤出城内驻军，改组政府。参看注53。——25。

33　马克思曾在许多著作里，特别是在《1859年的爱尔福特精神》（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3卷）一文中阐述过这样的思想：反动派在1848年以后扮演了特殊的革命遗嘱执行人的角色，不可避免地实现了革命的要求，尽管这是在一种滑稽可笑的歪曲的方式下进行的。——25。

34　**民族大迁徙**指公元3—7世纪日耳曼、斯拉夫及其他部落向罗马帝国的大规模迁徙。4世纪上半叶，日耳曼部落中的西哥特人因遭到匈奴人的进攻侵入罗马帝国。经过长期的战争，西哥特人于5世纪在西罗马帝国境内定居下来，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日耳曼人的其他部落也相继在欧洲和北非建立了独立的国家。民族大迁徙对摧毁罗马帝国的奴隶制度和推动西欧封建制度的产生起了重要的作用。——34。

35　**十字军征讨**指11—13世纪西欧天主教会、封建主和大商人打着从伊斯兰教徒手中解放圣地耶路撒冷的宗教旗帜，主要对东地中海沿岸伊斯兰教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因参加者的衣服上缝有红十字，故称"十字军"。十字军征讨前后共八次，历时近200年，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十字军征讨给东方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使西欧国家的人民遭受惨重的牺牲，但是，它在客观上也对东西方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34、138。

36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早期著作中曾经使用“出卖劳动”、“劳动价格”这些概念。马克思后来纠正了这一说法，认为工人出卖的不是他们的劳动，而是他们的劳动力。恩格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年单行本导言》中对此作了详细说明（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708—709页）。——38。

37　英国工人阶级从18世纪末开始争取用立法手段限制工作日，从19世纪30年代起，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投入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是英国议会在1847年6月8日通过的，作为法律于1848年5月1日起生效。该法律将妇女和儿童的日劳动时间限制为10小时。但是，许多英国工厂主并不遵守这项法律，他们寻找种种借口把工作日从早晨5时半延续到晚上8时半。工厂视察员伦·霍纳的报告就是很好的证明（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14—330页）。

恩格斯在《十小时工作日问题》和《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中对该法案作了详细分析。关于英国工人阶级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八章（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67—350页）中作了详细考察。——41。

38　*七月革命*指1830年7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814年拿破仑第一帝国垮台后，代表大土地贵族利益的波旁王朝复辟，竭力恢复封建专制统治，压制资本主义的发展，限制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加剧了资产阶级同贵族地主的矛盾，激起了人民的反抗。1830年7月27—29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金融资产阶级攫取了革命果实，建立了以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为首的代表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54、80、235。

39　*改革运动*指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发动的议会改革运动。英国资产阶级为了同土地贵族争夺政治权力，在19世纪20年代末提出了改革议会选举制度的要求，经过几年斗争，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迫使英国议会于1832年6月通过了选举法改革法案。这次改革削弱了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加强了工业资产阶级在议会中的地位。但是，由于财产资格的限制，为争取选举制度改革而斗争的主力军工人和手工业者仍未获得选举

权。——54。

40 **正统派**是法国代表大土地贵族和高级僧侣利益的波旁王朝(1589—1792年和1814—1830年)长系的拥护者。1830年波旁王朝第二次被推翻以后,正统派结成政党。在反对以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为支柱的当政的奥尔良王朝时,一部分正统派常常抓住社会问题进行蛊惑宣传,标榜自己维护劳动者的利益,使他们不受资产者的剥削。——55、86、99、126、341、510。

41 **“青年英国”**是由英国托利党中的一些政治活动家和著作家组成的集团,成立于19世纪40年代初,主要代表人物是本·迪斯累里及托·卡莱尔等。他们维护土地贵族的利益,对资产阶级日益增长的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不满,企图用蛊惑手段把工人阶级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并利用他们反对资产阶级。——55。

42 **宪章派**指宪章运动的参加者。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施人民宪章。人民宪章要求实行普选权并为保障工人享有此项权利而创造种种条件。宪章派的领导机构是“宪章派全国协会”,机关报是《北极星报》,左翼代表人物是乔·哈尼、厄·琼斯等。恩格斯称宪章派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17页)。按照列宁所下的定义,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2页)。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其衰落的原因在于英国工商业垄断的加强,工人阶级政治上的不成熟,以及英国资产阶级用超额利润收买英国工人阶级上层(“工人贵族”),造成了英国工人阶级中机会主义倾向的增长,其表现就是工联领袖放弃了对宪章运动的支持。——64。

43 **改革派**又称《改革报》派,是聚集在法国《改革报》周围的一个政治集团,包括一些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其首领是赖德律-洛兰和路易·勃朗等人。他们主张建立共和国并实行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64。

44 **北美土地改革派即全国土地改革派**,又称美国“全国改革协会”,成立于

1845年，是一个以手工业者和工人为核心的政治团体，宗旨是无偿地分给每一个劳动者一块土地。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协会宣传土地改革，反对种植场奴隶主和土地投机分子，并提出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废除农奴制、取消常备军等民主要求。许多德国手工业侨民参加了这一土地改革运动。——65。

45 波兰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曾准备在1846年2月举行起义。起义的主要发起人是波兰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埃·邓波夫斯基等人。但是，由于波兰小贵族的背叛以及起义的领袖遭普鲁士警察逮捕，总起义未能成功。仅在从1815年起由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共管的克拉科夫举行了起义，起义者在2月22日获胜并建立了国民政府，发表了废除封建徭役的宣言。克拉科夫起义在1846年3月初被镇压。1846年11月，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签订了关于把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帝国的条约。——65、83。

46 *《危机和反革命》*是马克思在德国1848—1849年革命时期写的一组评论柏林内阁危机的文章中的一篇。文章揭露了德国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行径，谴责资产阶级自由派掌权后不对反革命势力实行专政，不去粉碎和清除旧制度的残余，而是陶醉于立宪君主制的幻想，并采取专制的措施来对付民主派，从而使被打垮的反革命势力赢得了时间，在官僚机构和军队中巩固了自己的阵地。马克思由此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政局下都需要专政，并且是强有力的专政。"（见本卷第69页）

马克思评论柏林内阁危机的一组文章共四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469—478页），本文是其中的第三篇，发表在1848年9月14日《新莱茵报》第102号，发表时的标题是《危机》。——68。

47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1848年9月10日的信中同意内阁的意见，认为普鲁士国民议会1848年9月7日作出的关于要求陆军大臣发布一道命令，让反对立宪制度的军官辞职的决议，破坏了"立宪君主制的原则"，因此赞同内阁以辞职来抗议议会的这一行动。——68。

48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1848年5月22日在柏林召开的普鲁士国民议会称为"*协商议会*"。召开这个议会的目的是"同国王协商"制定宪法。议会把"同国王协商"作为自己行动的基础，从而放弃了主权属于人民的原则。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时把协商议会中的自由派称为协商派、妥协派等。

1848年11月，在反革命势力进攻下，该派曾作出拒绝纳税的决议，但由于他们仅限于消极抵抗，最终国民议会于1848年12月5日被解散。——70。

49　**国民公会**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建立的最高立法机关，从1792年9月存在到1795年10月。在雅各宾专政期间，即革命的第三阶段(1793年6月2日—1794年7月27—28日)，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国民公会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废除封建所有制，公布了法国第一部共和制的民主宪法，并同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后，国民公会遵循大资产阶级意旨，取消了雅各宾派颁布的主要革命措施，于1795年10月被解散。——70、130、140、197、320。

50　**旺代**是法国西部的一个省。1793年春季，该省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在贵族和僧侣的唆使和指挥下举行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暴动，围攻并夺取了共和国军队防守的索米尔城。暴动于1795年被平定，但是在1799年和以后的年代中，这一地区的农民又多次试图叛乱。旺代因此而成为反革命叛乱策源地的代名词。——70、321、431。

51　**制宪议会**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第一阶段(1789年7月14日—1792年8月10日)的革命领导机关和国家立法机关，从1789年7月存在到1791年9月，立宪君主派在议会中起主要作用。制宪议会曾于1789年8月4—11日通过法令，宣布废除封建制度，取消教会和贵族的特权。1789年8月26日通过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确立了资产阶级的人权、法制、公民自由和私有财产权等原则。——70。

52　**《资产阶级和反革命》**是马克思1848年底写的一组总结德国三月革命的文章中的一篇。这篇文章对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作了科学分析，指出了1848年德国三月革命同1648年英国革命和1789年法国革命的区别，阐明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所处的历史地位和自身状况，揭示了它必然背叛革命的原因和必然走向失败的趋势，从而为无产阶级确立革命目标、制定斗争策略指明了方向。马克思指出，当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时，无产阶级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因此德国资产阶级的前面和后面同时站着两个敌人：封建势力和无产阶级及其他革命阶层。这导致德国资产阶级在革命中表现出软弱性和保守性，“它一开始就蓄意背叛人民，而与旧社会的戴皇冠的代表人物妥协”(见本卷第75页)。

马克思总结德国三月革命的一组文章共四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第118—146页),本文是其中的第二篇,发表在1848年12月15日《新莱茵报》第169号。——72。

53 指柏林群众反对普鲁士政府的*三月革命*,这是德国1848—1849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端。1848年3月初,柏林群众举行集会,要求取消等级特权、召开议会和赦免政治犯。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调动军队进行镇压,遂发生流血冲突。3月13日,维也纳人民推翻梅特涅统治的消息传到柏林,斗争进一步激化。国王慑于群众的威力,并企图拉拢资产阶级自由派,阻止革命发展,于17、18日先后颁布特别命令,宣布取消书报检查制度;允诺召开联合议会,实行立宪君主制。资产阶级自由派遂与政府妥协。柏林群众要求军队撤出首都,在遭到军警镇压后,于3月18日构筑街垒举行武装起义,最终迫使国王于19日下令把军队撤出柏林。起义获得了胜利,但是起义的成果却被资产阶级窃取,3月29日普鲁士成立了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72、73、138、189、244、391。

54 *联合议会*或联合(省)议会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了获得向国外借款的保证以摆脱财政困难,于1847年4月11日—6月26日在柏林召开的各省等级议会的联合会议。联合议会的职权限于批准新的税收和贷款,在讨论法律草案时有发言和向国王呈交请愿书的权利。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第一届联合议会的开幕词中表示,他决不会让"君主与人民之间的天经地义的联系"变成"受到制约的、宪制的"联系;他决不会让一张"写上了字的纸"来代替"真正神圣的王权"。由于国王拒绝满足议会资产阶级多数派最低的政治要求,议会大多数代表拒绝给国王以新贷款的保证。国王出于报复于同年6月解散了联合议会。

1848年4月召开第二次联合议会,同意了一笔数额为2 500万塔勒的借款。——72、367、386。

55 *托利党*是英国的政党,于17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1679年,就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拥护詹姆斯继承王位的议员,被敌对的辉格党人讥称为托利。托利(Tory)为爱尔兰语,原意为天主教歹徒。托利党一贯捍卫反动的对内政策,维护国家制度中保守和腐朽的体制,反对国内的民主改革,曾与辉格

党轮流执政。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托利党逐渐失去了先前的政治影响和在议会中的垄断权。1832年议会改革使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入议会。1846年废除谷物法削弱了英国旧土地贵族的经济基础并造成了托利党的分裂。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老托利党的基础上成立了英国保守党。——72、667。

56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总结法国1848年革命经验的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等重大事件，剖析了法国的阶级结构以及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理论和策略，并第一次使用了“无产阶级专政”概念。他论述了六月起义的伟大意义和经验教训，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保存还是消灭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见本卷第101页）六月起义的失败使无产阶级认识了一条真理：“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见本卷第103页）无产阶级提出的革命战斗口号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见本卷第104页）马克思以此划清了革命的社会主义与各种空论的社会主义的界限，指出革命的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见本卷第166页）。针对空论的社会主义关于“劳动权”的幻想，马克思揭示了劳动权的科学内涵，指出：“其实劳动权就是支配资本的权力，支配资本的权力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配，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见本卷第113页）恩格斯认为，这是“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扼要表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536页）。马克思还提出了“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见本卷第161页）这个著名论点，并阐述了工农联盟的思想。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还分析了1848年革命后英法等国出现的工商业繁荣，指出：“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

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见本卷第176页）

这部著作是由马克思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撰写的一组文章组成的，写于1849年底—1850年3月底和1850年10月—11月1日。马克思原计划写四篇文章：《1848年的六月失败》、《1849年6月13日》、《6月13日在大陆上产生的后果》和《英国的现状》。但是在该杂志第1、2、3期上只发表了三篇文章，题目为：《1848年的六月失败》、《1849年6月13日》、《1849年六月十三日事件的后果》。这三篇文章发表时用的总标题为：《1848年至1849年》。关于1849年六月事件对大陆的影响以及英国的状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杂志的其他文章中，尤其是在他们合写的时评中作了阐述。

1895年，恩格斯将这组文章编成单行本在柏林出版，并将总标题改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为这个单行本写了导言，题为《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在导言中，恩格斯阐述了马克思这篇著作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同时根据资本主义新变化和工人运动新经验，深刻论述并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略思想。在编校过程中，恩格斯增添了第四章，即《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6期合刊发表的《时评。1850年5—10月》中有关法国事件的部分（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593—596、602—613页）。恩格斯还给这一章加了标题：《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他在1895年2月13日给理·费舍的信中说，这样“就真正使得这部著作完整了，否则小册子将显得残缺不全”（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685页）。在单行本中，前三章的标题改为：《从1848年2月到1848年6月》；《从1848年6月到1849年6月13日》；《从1849年6月13日到1850年3月10日》。在本卷中，前三章仍沿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发表时的标题，第四章则采用了1895年版的标题。

这篇著作的第一个中译本由柯柏年翻译，1942年延安解放社出版，书名为《法兰西阶级斗争》。——77。

57 1832年6月5—6日的巴黎起义是由共和党左翼以及包括人民之友社在内的秘密革命团体组织的。反对路易-菲力浦政府的马·拉马克将军的出殡是起义的导火线。这次起义第一次举起了红旗。当政府派出军队时，参加起义的工人构筑街垒，异常英勇顽强地进行自卫战，但最终仍被军队镇压下去。

1834年4月9—13日的里昂工人起义是在共和党的秘密组织人权公民权协会的领导下进行的，是法国无产阶级最早的群众性的行动之一。这次起义得到其他城市，特别是巴黎的共和党人的支持，但是最终被残酷地镇压下去。

1839年5月12日的巴黎起义是在奥·布朗基和阿·巴尔贝斯的领导下，由共和派社会主义的秘密组织四季社发动的，在这次起义中，革命工人起了主要作用。起义最终遭到军队和国民自卫军的镇压。起义失败后，布朗基、巴尔贝斯及其他一些起义者被流放。——80。

58　*七月王朝*指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见注38）至1848年二月革命（见注4）期间国王路易-菲力浦执政时期，即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统治时期。——81、84、132、482。

59　*宗得崩德*是瑞士七个经济落后的天主教州为对抗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和维护教会的特权于1843年缔结的单独联盟。其首领是天主教僧侣和城市上层贵族。宗得崩德的反动企图遭到了40年代在大部分州和瑞士代表会议里取得优势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和自由派的反对。1847年7月，瑞士代表会议决定解散宗得崩德，宗得崩德遂于11月初向其他各州采取军事行动。1847年11月23日宗得崩德的军队被联邦政府的军队击溃。天主教僧侣和城市上层贵族后来不止一次地利用一部分落后保守的农民企图抗拒自由主义的改革和夺取各州的政权。联邦政府的胜利和1848年宪法的通过，使瑞士由国家的联盟变成联邦国家。

在宗得崩德进行战争期间，曾加入神圣同盟的西欧强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企图干涉瑞士内政，维护宗得崩德。弗·基佐保护宗得崩德，实际上就是采取了支持这些强国的立场。

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用这个名称来讽刺搞分裂的宗派集团，尤其是1850年9月15日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另立自己的中央委员会的维利希—沙佩尔宗派集团。——83。

60　*神圣同盟*是欧洲各专制君主镇压欧洲各国进步运动和维护封建君主制度的反动联盟。该同盟是战胜拿破仑第一以后，由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倡议，于1815年9月26日在巴黎建立的，同时还缔结了神圣同盟条约。几乎所有的欧洲君主国家都参加了同盟。这些国家的君主

负有相互提供经济、军事和其他方面援助的义务，以维持维也纳会议上重新划定的边界和镇压各国革命。

神圣同盟为了镇压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先后召开过几次会议：1818年亚琛会议，1820—1821年特罗保会议，1821年5月莱巴赫会议以及1822年维罗纳会议。根据会议的决议，神圣同盟曾于1820—1821年间镇压意大利的革命运动，1823年武装干涉西班牙革命，并企图干涉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由于欧洲诸国间的矛盾以及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神圣同盟实际上已经瓦解。——83、105、112、325、363。

61 巴勒莫是意大利的一个城市。1848年1月12日当地人民举行起义，经过两周激战，波旁王朝的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二世被迫退出这座城市，巴勒莫建立了临时政府和议会。1848年意大利革命失败时，巴勒莫起义也被镇压。——83。

62 1847年春，法国安德尔省比藏赛发生了暴动。居住在附近农村的饥饿的工人带领居民们袭击了投机商的粮仓，与军队发生了流血冲突。政府对比藏赛事件的参加者进行了残酷的镇压，1847年3月底4月初对参加暴动的人进行审讯，其中有三人被判处死刑，很多人被罚做苦役。——84。

63 *宴会运动*指1847年7月—1848年1月之间，反对派利用宴会的形式进行的政治斗争。七月王朝末期，王朝反对派联合共和派为促进选举改革，征集请愿书签名，举行了大规模的宴会运动，资产阶级民主派也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在宴会上，各派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以发表公开演说，致祝酒词等方式陈述政见，宣传改革。第一次公开的宴会于1847年7月9日在巴黎的红宫舞厅举行，所有支持改革的派别都有代表参加，成分相当复杂。在这次宴会上，资产阶级民主派无论从人数方面还是思想方面都表现出自己极大的优势。宴会运动吸引了社会各个阶层，席卷了法国各个地区，仅1847年秋季的两个月内，全法国就举办了70次宴会，出席总人数多达17 000余人。每次宴会出席者少则数百人，多则千余人。工人代表也组织过自己的宴会。但是，原定于1848年2月22日举行的宴会遭到基佐政府的禁止，因为选举改革的运动给七月王朝带来了威胁。宴会运动为1848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二月革命拉开了序幕。恩格斯针对宴会运动

撰写过一系列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381—384、394—402、405—408、423—426以及430—437页）。——84、134、482。

64　指《国民报》派，又称三色旗共和派、纯粹的共和派，是法国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该派所依靠的是法国工业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国民报》是该派的机关报。1848年革命时期，《国民报》派的领导人进入了临时政府（1848年2月24日—5月4日），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马拉斯特、茹·巴斯蒂德和加尔涅-帕热斯。3月5日以后，加尔涅-帕热斯接替银行家米·古德肖的职务，任临时政府财政部长，后来靠卡芬雅克的帮助策划了对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大屠杀。——85、99、106、114、119、132、496。

65　王朝反对派是七月王朝时期法国众议院中以奥·巴罗为首的议员集团。这个集团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治观点，主张实行温和的选举改革，认为这样做能避免革命并维持奥尔良王朝的统治。该派也被称做议会反对派。——85、102、118、476。

66　在临时政府成立的最初几天就面临选择法兰西共和国国旗的问题。巴黎的革命工人要求宣布1832年六月起义时在巴黎工人区高举的红旗为国旗，资产阶级的代表则坚持要采用18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和拿破仑第一帝国时期所用的蓝白红三色旗，这种旗帜直到1848年革命时仍然是聚集在《国民报》周围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标志。工人代表最后被迫同意宣布三色旗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国旗，但是在旗杆上系上了红色的旗绦。——89、105。

67　高教会是英国国教会中的一派，产生于19世纪。高教会信徒主要是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他们主张保持古老的豪华仪式，强调与天主教徒的传统联系。英国国教会中与高教会相对立的另一派为低教会，其信徒主要是资产阶级和下层教士，具有新教倾向。——93。

68　1848年3月16日，法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决定对各种直接税每法郎增加45生丁（100生丁合1法郎）的附加税。这种附加税的负担主要落在农民身上，资产阶级共和派采取的这种政策使大地主和天主教僧侣借机策动农民反对巴黎的民主派和工人，壮大了反革命势力。——94、162。

69　指1825年法国国王拨给贵族的一笔款项，用以补偿贵族在18世纪末法国

资产阶级革命期间被没收的财产。——94。

70 *知善恶树上的苹果也叫禁果*。据圣经传说，伊甸园中有一棵果树，人若吃了这树上的果子就会眼睛明亮，知道善恶。上帝怕人们吃此果后能同他一样识别善恶，因而禁止人们摘食。——94、161。

71 *别动队*是根据法国临时政府1848年2月25日命令，为对付革命的人民群众而成立的。这支由15—20岁的巴黎流氓无产者组成的队伍曾被利用来镇压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当时任陆军部长的卡芬雅克将军亲自领导了这次镇压工人的行动。后来，波拿巴主义者将其解散，因为他们担心波拿巴与共和党人发生冲突时，别动队会站在共和党人一边。——95、111、124、478。

72 *拉察罗尼*是意大利游手好闲的流氓无产者的绰号。他们不止一次地被反动君主专制集团利用来反对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运动。——95。

73 *国家工场*是1848年二月革命后根据法国临时政府的法令仓促建立起来的。国家工场一律采取军事化方式进行生产，对工人实行以工代赈的办法，发给面包卡和军饷。临时政府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使路易·勃朗关于组织劳动的思想在工人中丧失威信，另一方面是想利用以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工场的工人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但是这个分裂工人阶级的计划没有成功，革命情绪在国家工场中继续高涨，于是政府便采取减少工人人数，将他们派到外省参加公共工程等办法来达到取消国家工场的目的。这些做法引起了巴黎无产阶级的极大愤怒，成了巴黎六月起义的导火线之一。起义者利用国家工场内部已有的军事组织采取行动。起义被镇压后，卡芬雅克政府于1848年7月3日下令解散了国家工场。——96、124、524。

74 *习艺所*是根据英国的《济贫法》设置的救济贫民的机构。1601年《济贫法》规定以教区为单位解决贫民的救济问题。1723年颁布的《济贫法》进一步作出规定，设立习艺所，受救济者必须入所接受救济。1782年又改为只对年老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采取集中救济的方法。1834年英国颁布的新济贫法对以前实施的《济贫法》作了修订，规定不得向有劳动能力的人及其家属提供任何金钱和食品的救济，受救济者必须在习艺所里从事强制性

劳动。习艺所里生产条件恶劣，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那里实行的制度与强迫囚徒从事苦役的牢狱制度不相上下，因此被贫民称为“济贫法巴士底狱”（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87页），马克思则称它为“无产者的巴士底狱”（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745页）。——96。

75　在16世纪特别是17世纪西班牙的喜剧中，常常是主人假扮成仆人，仆人假扮成主人，结果闹出了混乱而可笑的纠纷。——96。

76　指1848年3月18日国民自卫军总部的选举和4月9日制宪国民议会的选举。团结在奥·布朗基和泰·德萨米等人周围的巴黎工人坚持要求延期选举，理由是必须在居民中进行适当的解释工作。巴黎3月17日群众示威游行迫使正规军撤离首都（4月16日事件后又被召回），并迫使国民自卫军总部的选举推迟到4月5日，制宪国民议会的选举推迟到4月23日。——98。

77　*奥尔良派*是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保皇党，是1830年七月革命到1848年二月革命这段时期执政的波旁王朝幼系奥尔良公爵的拥护者。——99、126、510。

78　*执行委员会*是法国制宪议会1848年5月10日为取代辞职的临时政府而建立的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该委员会存在到1848年6月24日卡芬雅克上台为止，其成员多半是温和的共和派。赖德律-洛兰是执行委员会中的左翼代表。——100、106、482。

79　指1848年5月15日巴黎人民的革命行动。这一行动是在进一步推进革命和支持意大利、德国、波兰的革命运动的口号下进行的，参加游行的人数多达15万，其中主要是以奥·布朗基等为首的巴黎工人。游行者向正在讨论波兰问题的制宪议会进发，闯进了波旁王宫的会议大厅，要求议会兑现诺言，向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波兰提供军事援助，采取断然措施消除失业和贫困，给工人以面包和工作，成立劳动部。当这些要求遭到拒绝后，游行者试图驱散制宪议会，成立新的临时政府。5月15日的示威运动遭到镇压。运动的领导者布朗基、巴尔贝斯（他曾提出向富人征收10亿税款）、阿尔伯、拉斯拜尔等人遭逮捕。这次革命行动失败后，临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废除国家工场的措施，实施了禁止街头集会的法律，查封了许多民主派俱乐部。1849年3月7日—4月3日，当局在布尔日对1848年5月15日事件的参加

者进行了审判。巴尔贝斯被处以无期徒刑，布朗基被处以10年的单独监禁，德弗洛特、索布里埃、拉斯拜尔、阿尔伯等人被判处期限不等的徒刑，有的被流放到殖民地。——101、108、112、125、406、477、494。

80 指《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该报是德国1848—1849年革命时期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隆出版，马克思任主编；参加编辑部工作的有恩格斯、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尔斯。

《新莱茵报》起到了教育和鼓舞人民群众的作用。报纸发表的有关德国和欧洲革命重要观点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尽管遭到当局的种种迫害和阻挠，《新莱茵报》始终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势力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把他驱逐出境，同时又加紧迫害《新莱茵报》的其他编辑，致使该报被迫停刊。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第301号。报纸的编辑在致科隆工人的告别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第619页）——102、420、593。

81 山岳党即山岳派，在1793—1795年间是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民主派，因其在国民公会开会时坐在大厅左侧的最高处而得名。代表人物有罗伯斯比尔、让·保·马拉、若·雅·丹东等。其成员大都参加了雅各宾俱乐部。1792年10月，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退出雅各宾俱乐部后，山岳党实际上成为雅各宾派的同义语。

山岳党在1848—1851年间是指法国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中集合在《改革报》周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其领袖人物为赖德律-洛兰、费·皮阿等人。以路易·勃朗为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也参加了这一派。他们自称是1793—1795年法国国民公会中的山岳党思想的继承人。1849年2月后该派又称新山岳党。——106、118、126、139、176、470、519。

82 维也纳条约指在1814年9月—1815年6月维也纳会议上缔结的，旨在恢复各国王朝统治和满足战胜国领土要求的条约和协议。——112、481。

83 法兰西共和历是法国从1793年10月24日—1806年1月1日期间为取代格雷戈里历采用的新历法。为消除基督教的影响，该历法日和月的名称都取自自然界和不同的时令，如雾月、收获月等。附在格雷戈里历日期上的圣徒名字则代之以种子、树木、花卉和水果的名称。——112。

84 据圣经传说，犹太国的第一个国王扫罗在和腓尼基人作战中消灭了数千敌人，在扫罗庇护下的卫士大卫则消灭了数万人。扫罗死后，大卫继承了犹太的王位。——116。

85 百合花是波旁王朝的徽号，紫罗兰是奥尔良王朝的标志。——117、498。

86 这句话引自1848年12月21日《新莱茵报》第174号的12月18日巴黎通讯，通讯下面标有斐·沃尔弗的通讯代号。不过，这句话很可能是马克思本人写的，因为报纸的全部材料都经他缜密地校审过。——117。

87 伏尔泰是自然神论者，他对僧侣主义、天主教和专制政体的猛烈抨击曾对他的同时代人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伏尔泰主义特指18世纪末期进步的、反宗教的社会政治观点。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伏尔泰主义这一概念是指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所持的充满矛盾的思想观点和政治态度。当时，这个阶级一方面从自然神论的立场出发，反对宗教狂热和封建教权主义；另一方面又认为，为了对"贱民"实行统治，宗教的存在是必要的。

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修会之一，以对抗宗教改革运动为宗旨。耶稣会会士以各种形式渗入社会各阶层进行活动，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在欧洲声誉不佳。——119、162、165、513。

88 指1849年5—7月武装干涉罗马共和国一事。1848年秋，在欧洲革命的影响下，意大利境内重新掀起反对奥地利统治和争取统一的民族解放运动。1848年9月16日，罗马爆发人民起义。1849年2月9日，罗马由全民投票产生的制宪议会废除了教皇的世俗权力并宣布成立共和国，政权集中在以朱·马志尼为首的三执政手中。此后，庇护九世逃往那不勒斯的要塞加埃塔，卡芬雅克同意他到法国避难。得到法国政府支持的庇护九世于1848年12月4日号召所有天主教国家共同镇压罗马革命者，那不勒斯和奥地利立即响应。法国政府于1849年4月派出了由尼·乌迪诺将军率领的所谓意大利

远征军。4月27日法军在意大利要塞港口奇维塔韦基亚登陆，4月30日被朱·加里波第领导的罗马共和国军队击退，双方签订了停火协议。6月3日，乌迪诺撕毁协议，再次炮击罗马。法军于1849年7月1日占领罗马城。由于法国、奥地利和那不勒斯的武装干涉，罗马共和国于1849年7月3日被推翻。——128、135、138、488。

89 *救国委员会*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专政时的最高权力机构，1793年4月6日由国民公会创立。在雅各宾专政时期（1793年6月2日—1794年7月27日），救国委员会作为革命政府的中央机关，在同国内外反革命进行斗争并完成资产阶级革命任务的过程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热月九日反革命政变以后，救国委员会丧失了领导作用，并于1795年10月被解散。——130、144、324。

90 *秩序党*是1848年由法国两个保皇派，即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联合组成的保守的大资产阶级政党，从1849年到1851年12月2日政变，该党在第二共和国的立法议会中一直占据领导地位。——132、154、161、183、489。

91 指1849年3月7日—4月3日在布尔日对1848年五月十五日事件参加者进行的审判（见注79）。——134。

92 1849年沙皇军队为了镇压匈牙利资产阶级革命，恢复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对匈牙利进行了武装干涉。——138。

93 指*维护帝国宪法运动*。这是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阶段。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各邦拒绝承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帝国宪法，但是人民群众认为帝国宪法是唯一还没有被取消的革命成果。1849年5月初在萨克森和莱茵省，5—7月在巴伐利亚的巴登和普法尔茨相继爆发了维护帝国宪法的武装起义。6月初，两个普鲁士军团约6万人与一个联邦军团开始对两地起义者实行武力镇压，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却不给起义者任何援助。1849年7月，维护帝国宪法运动被镇压下去。——138、189、190、449、450。

94 山岳党活动家会议于1849年6月12日夜在傅立叶派的《和平民主日报》（该报于1843—1851年在巴黎出版，由维·孔西得朗任主编）编辑部举行。会议的参加者拒绝使用武力，决定只举行和平示威游行。——142。

95　1849年6月13日“宪法之友民主协会”在《人民报》第206号上发表宣言，号召巴黎公民参加和平示威游行，抗议政府的“蛮横要求”。——142。

96　山岳党的宣言载于1849年6月13日的《改革报》、《和平民主日报》以及蒲鲁东的《人民报》。——142。

97　*新的新闻出版法*于1850年7月16日由立法议会通过。这部法律的有关规定大大提高了报刊出版者应交付的保证金数额，并开始征收印花税，小册子也不例外。新的新闻出版法实际上是取消法国新闻出版自由的又一项反动措施。——145、178、519。

98　这里是指由三个红衣主教（德拉真加、瓦尼切利-卡索尼和路·阿尔蒂埃里）组成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在法国军队的支持下推翻了罗马共和国之后，在罗马恢复了反动的制度。——147。

99　*埃姆斯*是德国威斯巴登附近的一处疗养地。圣路易的孙子、法国王位追求者、自封为亨利五世的尚博尔伯爵经常住在此地。这里是指1849年8月当地举行的一次正统派代表大会，尚博尔也出席了这次会议。——148、499。

100　*潘都尔兵*是奥地利军队中一种特殊形式的非正规步兵。——148。

101　二月革命后，路易-菲力浦从法国出逃，曾住在伦敦附近的一个城堡克莱尔蒙特。这里是指奥尔良派同路易-菲力浦在那里进行的谈判。——149、499、543。

102　“*要么做凯撒，要么进债狱！*”是马克思套用了切·博贾的座右铭“要么做凯撒，要么一事无成”。博贾（1475—1507年）是意大利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子。尼·马基雅弗利在《君主论》中以博贾为“新时代君主”的楷模，鼓吹“欲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论调。——149。

103　“*出乎真意*”（motu proprio）是一种不必经红衣主教同意，一般只涉及教皇国内部事务的特别教皇文书的开头语。这里是指1849年9月12日教皇庇护九世发表的文告。——149。

104　这里涉及废除酒税的法案。制宪议会曾于1849年5月19日通过决定，从

1850年1月1日起废除酒税。关于废除酒税的法案于1849年12月18日提交国民议会进行讨论。在废除酒税的决定生效前10天，国民议会又通过了恢复这项税收的法律。——155、162、513。

105 加尔省由于议员让·巴·博恩死亡，举行了补选。拥护山岳党的候选人埃·欧·法旺在36 000票中获21 688票，以多数票当选。文中所说的红色议员、红色分子即指法旺。——161。

106 1850年3月10日立法议会举行补选，政府为了对选民施加压力，把法国领土分成了五大军区，这一做法使巴黎及其邻近的省份处在其他四个军区的包围之中，而这四个军区的领导人都是一些恶名昭彰的反动分子。共和派报纸强调指出，这些反动将军的无限权力和土耳其帕沙的专横权力一模一样。所以，这几个军区被称为帕沙辖区。——162。

107 指1849年10月31日路易·波拿巴总统给立法议会的咨文，他在咨文中通报，已批准巴罗内阁辞职，另组新阁。——162。

108 指再度被任命的巴黎警察局长皮·卡尔利埃在1849年11月10日发布的公告。他在公告中呼吁组织“反社会主义的社会联盟”，以保卫“宗教、劳动、家庭、财产和忠于政府”。公告发表在1849年11月11日《总汇通报》上。——162。

109 *自由贸易派*也称*曼彻斯特学派*，是19世纪上半叶英国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19世纪20—50年代，曼彻斯特是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该学派提倡自由贸易，要求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原则，要求减免关税并奖励出口，废除有利于土地贵族的、规定高额谷物进口关税的谷物法。1838年，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派建立了反谷物法同盟。19世纪40—50年代，该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成为自由党的左翼。——165、419、596、657。

110 *自由之树*是1848年二月革命胜利后在巴黎街道上种植的象征自由的树，通常是橡树或白杨。种植自由之树在18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期间就已经成了法国的传统，当时国民公会还为此做了明文规定。

1850年1月，政府当局借口排除街道交通障碍，在警察局长的命令下

砍倒了自由之树。——167。

111　*七月纪念柱*是为纪念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于1833—1840年在巴黎巴士底狱广场上修造的建筑物。它是一根镀有青铜的考林莘式圆柱，高50米，上面刻有1830年七月革命中牺牲的504位战士的姓名；圆柱底部的地下墓室安放着七月革命中殉难者的遗体。柱座的四只角上装饰着高卢雄鸡，柱顶立有青铜制作的自由守护神像。1848年二月革命后，柱体上又装饰了不谢花花环。——167。

112　*巴托洛缪之夜*指天主教徒在巴黎屠杀异教徒事件。1572年8月23—24日夜里，即圣巴托洛缪节的前夕，天主教徒在巴黎杀害了大批胡格诺教徒。——170。

113　据希腊神话传说，古希腊人攻打特洛伊城，很久未能攻克。后来，他们佯装撤退，在城下营房中留下了一匹腹内藏有一批勇士的大木马。特洛伊人不知道这是敌方的计策，把木马作为战利品拉进城去。深夜，勇士们走出木马，利用特洛伊人毫无戒备的时机，配合城外的军队，迅速夺取了特洛伊城。——170。

114　*科布伦茨*是德国西部的一座城市，在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流亡的贵族保皇党人策动对革命的法国进行干涉的中心。得到封建专制国家支持的，以路易十六极端反动的大臣沙·卡龙为首的流亡政府就设在这里。——171。

115　*宴会问题*的提法来源于宴会运动（见注63），这里实际上是指革命的导火线问题。——171。

116　指《*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12月创办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刊物。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出版的《新莱茵报》的续刊。该杂志从1850年3—11月底总共出了六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第5—6期合刊）。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印刷。封面上注明的出版地点还有纽约，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侨居美国的德国流亡者中间发行这个杂志。该杂志发表的绝大部分文章（论文、短评、书评）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他们也约请他们的支持者如威·沃尔弗、约·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该杂志发表的马克思、恩

格斯的重要著作有：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本卷第77—187页），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和《德国农民战争》（见本卷第201—319页）以及其他一些著作。这些著作总结了1848—1849年的革命，进一步制定了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和策略。1850年11月，由于德国警察的迫害和资金缺乏，杂志被迫停刊。——173、203。

117 蒲鲁东关于所谓“人民银行”的观点是在他批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弗·巴师夏的一篇论战文章中提出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849年11月—1850年2月的《人民之声》报上，1850年又以单行本形式在巴黎出版，标题是《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75。

118 1797年英国政府颁布了专门的银行限制法，该法规定英格兰银行券的强制性的牌价，并且停止用银行券兑换黄金。1819年通过了恢复银行券兑换黄金的法令。实际上这种兑换到1821年才完全恢复。——175。

119 亚·勒克莱尔是巴黎商人，他因以国民自卫军的身份和他的儿子们一起参加镇压1848年六月起义而获得荣誉勋章。恩格斯在《法国来信》一文中曾讽刺地称他为资产阶级的斯巴达人。——177。

120 《卫戍官》是维·雨果的一部描写德国中世纪生活的历史剧。在中世纪的德国，卫戍官是皇帝指派的城堡和地区的统治者。1850年5月1日，根据内务大臣的命令成立了立法议会新选举法起草委员会。该委员会的17名成员属于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由于贪图权力和立场反动而被称为卫戍官。——177、517、556。

121 指两份文件：一份是发表在1850年8月11日《1850年人民报》第6号的《山岳党告人民书》，另一份是发表在1850年8月14日该报第7号的《告人民书》。——180。

122 *拉摩勒特式的亲吻*（Baiser Lamourette）指发生在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段有名的插曲。1792年7月7日立法议会议员安·拉摩勒特提议以兄弟般的亲吻来结束一切党派纷争，于是，各敌对党派的代表彼此热情拥抱。但是不出人们所料，这种虚伪的“兄弟般的亲吻”第二天就被遗忘了。——181。

123　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第32条规定，在立法议会休会期间须成立一个常设委员会，由议会选出的25名委员和议会常务局组成。1850年，这个委员会实际上由39人组成：常务局11人，庶务3人以及选举产生的委员25人。——182。

124　指所谓的《威斯巴登宣言》，是由正统派在立法议会的秘书德·巴泰勒米受尚博尔伯爵的委托于1850年8月30日在威斯巴登草拟的。宣言规定了正统派执政后将采取的政策。尚博尔伯爵扬言要“正式地断然取消一切告人民书，因为这些文告就等于否定传统的君主政治的伟大的民族原则”。由于以议员昂·拉罗什雅克兰为首的一些君主主义者的抗议，这一宣言在报刊上引起了激烈的论战。——182。

125　十二月十日会是波拿巴派的秘密团体，以纪念其庇护人路易·波拿巴1848年12月10日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而得名。该组织成立于1849年，主要由堕落分子、政治冒险家、军人等组成。虽然该团体于1850年11月表面上被解散，但实际上其党羽仍然继续进行波拿巴主义的宣传，并积极参加了1851年12月2日政变。——184、522、539、574。

126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年3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德国1848—1849年革命经验的重要文献。他们在《告同盟书》中指出，《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同盟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观点，已被证明是唯一正确的观点，并说明了对同盟进行改组的必要性。他们从德国当时革命运动的实际情况出发，着重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策略，强调必须建立和保持独立的工人政党并坚持无产阶级独立的革命策略，工人政党在某些场合可以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联盟，但必须保持自己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独立性。他们第一次比较完整地阐述了“不断革命”的理论，指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掌握政权后只愿意实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有限改革，根本不愿意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变革整个社会，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断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部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只在于消灭私有

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见本卷第192页）。他们还指出，工人阶级在革命中必须始终保持独立的武装，对任何解除工人武装的企图都应予以回击；必须维护农村无产阶级的利益，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同农村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这份文件写于1850年3月24日以前，最初曾印成传单在同盟盟员中秘密散发。1851年这份文件被普鲁士警察查获，曾刊登在德国资产阶级报纸《科隆日报》、《德累斯顿新闻通报》上，后来又被警官卡·维尔穆特和威·施梯伯收入他们编写的《19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1885年，这份文件经恩格斯校订，作为附录收入马克思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

这篇告同盟书的中译文曾发表在北京《政治生活》1924年第14期，译者署名葵；1939年延安解放社又发表了王石巍、柯柏年等翻译的中译文。——188。

127 《德国农民战争》是恩格斯在总结德国1848—1849年革命经验的过程中撰写的一部重要的史学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德国历史，特别是德国农民战争史，透过复杂的历史现象揭示了历史发展规律。他分析了16世纪上半叶德国农民战争的性质和根源，高度评价了这场反封建战争的历史作用和农民中蕴藏的巨大革命积极性，并通过对德国农民战争和1848—1849年革命的比较研究，总结了这两次德国革命失败的原因及其主要教训。恩格斯批驳了把德国农民战争的原因归结为神学之争的错误观点，指出：“16世纪的所谓宗教战争首先也是为着十分实际的物质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这些战争同后来英国和法国的国内冲突完全一样，都是阶级斗争。”（见本卷第235页）他在分析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指出，16世纪的市民阶级同他们的后代即19世纪的资产阶级一样，在革命的后期背叛人民，出卖革命，从而使革命遭受失败；此外，德国的分裂割据状态以及由此必然产生的地方和省区的狭隘性，也是导致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和1848—1849年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追溯德国人民的革命传统，赞颂德国农民战争中涌现的大批杰出人物，要求德国工人阶级发扬先辈坚韧顽强的革命精神，同农民联合起来，共同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在这里，恩格斯将历史学的比较研究方法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基础上，使史学研究自觉地为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

服务，从而为创立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德国农民战争》写于1850年夏秋。恩格斯在写作过程中利用了德国历史学家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中的资料。恩格斯这部著作发表在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6期合刊上，1852年1月1日—1853年2月1日在纽约《体操报》第3—20号上转载。《德国农民战争》在恩格斯生前曾多次再版。德文第二版于1870年4月2日—10月15日在《人民国家报》第27—83号上连载，1870年10月在莱比锡出版单行本；德文第三版于1875年在莱比锡出版。

恩格斯1870年2月为《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撰写了序言，发表在1870年4月2、6日《人民国家报》第27、28号，并载入第二版单行本；1874年7月他对第二版序言又作了一些补充，全文载入第三版单行本。

恩格斯在第二版序言中分析了《德国农民战争》发表20多年来德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变化，指出无产阶级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迅速成长，并作为一个阶级独立采取行动；德国工人运动的最迫切的首要任务，就是唤起农业无产阶级并吸引它参加运动。恩格斯在对第二版序言的补充中进一步指出，德国工业的突飞猛进，已经把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提到显要地位。德国工人运动具有两大优越之处，一是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二是能够直接利用英国和法国工人运动用高昂代价换来的经验教训。因此在德国，“斗争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个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计划地推进”（见本卷第218页）。德国工人现在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要保持这一光荣地位，他们必须在各个方面加倍努力，特别是领导者有责任透彻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认真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来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见本卷第219页）

《德国农民战争》曾由钱亦石译成中文，1932年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1938年由上海生活书店再版。——201。

128　本篇序言是恩格斯为1870年10月在莱比锡出版的《德国农民战争》德文第二版而写的，写作时间是1870年2月11日前后。

序言在该书第二版问世以前曾刊登在1870年4月2日和6日《人民国家报》第27号和28号上。1874年恩格斯又对序言的内容作了补充，经过补充

的序言于1875年收入该书第三版。——203。

129　指1848—1849年革命期间设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全德国民议会中的极左派，它主要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但是也得到一部分德国工人的支持。——203。

130　指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这一著作写于1850年1月—11月1日，是一篇专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撰写的连载文章。——204。

131　1860年5月15日，普鲁士议会应政府的要求，就1861年6月30日前为军事部拨款900万塔勒"用以临时保证军队做好战斗准备，并增强其军事实力"一事举行投票。投票结果有315票赞成，2票反对，5票弃权，这表明普鲁士的资产阶级事实上已对政府改组军队作了让步。——205。

132　**民族自由党**是以普鲁士资产阶级为主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政党，于1866年秋在资产阶级的进步党分裂之后成立。民族自由党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而放弃了资产阶级争取政治统治的要求，把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统一德意志各邦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该党的政策反映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向俾斯麦政府投降的立场。——205。

133　指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这三个邦在1866年普奥战争之后尚未并入普鲁士，直到1870年才加入北德意志联邦。——206。

134　1866年普奥战争之后，普鲁士把汉诺威王国、黑森-卡塞尔选帝侯国和拿骚大公国并入了自己的版图。——206、213。

135　指**德国人民党**。该党成立于1865年，主要由德国南部各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因此又称为南德人民党或士瓦本人民党。德国人民党执行反普鲁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号，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宣传实行联邦制，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反映了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义意图。

1866年，以工人为基本核心的萨克森人民党并入德国人民党。人民党的这支左翼，除了反普鲁士的情绪和力求共同努力以民主方法解决国家的全民族统一问题之外，实质上与原来的德国人民党毫无共同之处，以后

它就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后来该党的基本成员脱离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于1869年8月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工作。——206。

136　指19世纪60年代在普鲁士实行的官僚主义的工业规章制度，这种制度对许多工业部门规定了特别许可（经营权）制，得不到特别许可，就不能从事工业活动。这种半中世纪式的经营法束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直到70年代，1870年6月11日法令才规定允许建立合股企业而无须事先获得许可。——207。

137　*萨多瓦会战*是1866年7月3日以奥地利和萨克森的军队为一方，普鲁士军队为另一方，在捷克萨多瓦村附近的克尼格雷茨（赫拉德茨-克拉洛韦城郊）进行的会战。这是1866年普奥战争中的一次决定性会战，以奥军败北而告终。历史上这次会战又称克尼格雷茨（赫拉德茨-克拉洛韦）会战。——209、213。

138　指*国际工人协会巴塞尔代表大会*。大会于1869年9月6—11日举行。马克思没有出席这次代表大会，但是积极参加了大会的准备工作。他在总委员会按大会议程进行讨论时就土地问题（1869年7月6日）、继承权问题（7月20日）和普及教育问题（8月10日和17日）发表了意见，发言记录被保存了下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第648—656页）。

巴塞尔代表大会再次讨论了土地问题，大多数代表赞成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公有制；通过了关于在全国范围和国际范围内把工会联合起来的决议，以及一系列关于从组织上巩固国际和扩大总委员会权力的决议。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和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追随者之间，在废除继承权的问题上发生了第一次公开的争论。——211。

139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三版准备付印时，对自己在1870年2月为该书第二版写的序言作了补充。经过补充的序言收入1875年莱比锡出版的《德国农民战争》第三版，恩格斯注明的写作日期是1874年7月1日。——213。

140　*色当会战*是1870年9月1—2日在色当（法国东北部城市）附近进行的会战。这是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一次决定性会战。在这次会战中，法军全部被击溃。按照法军司令部1870年9月2日签字的投降书，以拿破仑第三为首

的10万余名官兵全部成为俘虏。法军在色当会战中的惨败加速了第二帝国的灭亡，促使法兰西共和国遂于1870年9月4日宣告成立。——213。

141 指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德国皇帝）在凡尔赛宫宣告成立的德意志帝国。

这里套用了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962—1806年）的名称，以此强调指出，德国的统一是在普鲁士的霸权下实现的，与此同时还引起了德国各省的普鲁士化。——213。

142 *北德意志联邦*是1867年建立的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联邦国家，它取代了已经解体的德意志联邦。加入北德意志联邦的有19个德意志邦和3个自由市，它们在形式上都被承认有自治权。北德意志联邦的宪法保证普鲁士在联邦中居统治地位；普鲁士国王被宣布为联邦元首和联邦武装部队总司令，并被授予指导对外政策的权力。原来在联邦以外的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和黑森-达姆施塔特在1870年加入了联邦。北德意志联邦的建立在德意志国家统一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1871年1月，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北德意志联邦不复存在。——213。

143 指普鲁士在1866年的普奥战争中获得胜利后，并吞了汉诺威王国、黑森-卡塞尔选帝侯国、拿骚大公国、法兰克福自由市、荷尔斯泰因和石勒苏益格两公国，以及巴伐利亚和黑森-达姆施塔特的部分领土。

普鲁士在直接实行并吞的同时，还迫使奥地利同意废除德意志联邦，建立一个没有奥地利参加的美因河以北德国各邦的新联合。普鲁士和德意志北部的17个小邦（这些小邦在战争中站在普鲁士一边）签订了同盟协定，此后不久萨克森和其他一些德意志邦也参加了协定。这种联合形式为建立北德意志联邦做好了准备。——213。

144 由于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获胜，德国西南的四个邦（巴登、黑森、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并入了北德意志联邦，这一点由1870年11月签订的正式条约确定下来。从1870年11月15日起，随着德国西南各邦根据条约逐渐并入北德意志联邦，德意志各邦的联盟才在正式文件中定名为德意志联邦。1870年12月9日，根据联邦国会的决定，这一名称改为德意志帝国。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国正式宣告成立。——214。

145 指根据1872年12月13日普鲁士政府通过的《普鲁士、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波森、西里西亚和萨克森省专区法》(《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72年柏林版第661—714页)在普鲁士实行的行政改革。——214。

146 法国大革命在1792年进入革命的第二阶段。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举行起义,逮捕了国王路易十六,推翻了君主制。代表工业和商业资产阶级的吉伦特派开始掌握政权。1792年9月21日,国民公会在巴黎召开,宣布废黜国王,22日又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215。

147 *施皮歇恩会战*是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最初几次大会战之一,发生在1870年8月6日。这次会战中,普鲁士军队击败了法国军团。在历史文献中,施皮歇恩会战也称福尔巴赫会战。

马斯拉图尔会战,也称维永维尔会战,发生在1870年8月16日。在这次会战中,普军成功地阻止了法国莱茵军团从梅斯开始的退却,然后截断了它的退路。

关于*色当会战*,见注140。——216。

148 当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同法国驻普鲁士大使就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进行谈判时,法国政府要求普鲁士作出保证,永不同意霍亨索伦家族继承西班牙王位。威廉一世拒绝作出这种保证,并于1870年7月13日将谈判情况电告奥·俾斯麦。俾斯麦有意删简了电文,并使之带有对法国挑衅的口吻,然后公诸于众。于是拿破仑第三于1870年7月19日正式向北德意志联邦宣战。——216。

149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从1870年9月21日起,在每期报头上都刊有如下口号:“同法兰西共和国缔结公正的和约!不要任何割地!惩办波拿巴家族及其犯罪同伙!”——216。

150 *《人民国家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于1869年10月2日—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每周两次,1873年7月起改为每周三次)。该报反映了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代表的观点,因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由于编辑常被逮捕,致使该报编辑部成员不断更换,但报纸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威·李卜克内西手里。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社的奥·倍倍尔在该报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

刊起就为它撰稿，经常帮助编辑部，不断纠正报纸的路线，因此这家报纸成了19世纪70年代优秀的工人报刊之一。

根据1876年哥达代表大会的决定，从1876年10月1日起，开始出版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统一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以代替《人民国家报》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行以后，《前进报》于1878年10月27日停刊。——217。

151 在1874年1月10日的帝国国会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获得了九个席位，支持他们的选票有35万多张，占全部选票的百分之六，当选的人中有监禁期刚满的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217。

152 *汉撒同盟*是德意志北部沿海城市的贸易同盟。中世纪德语汉撒(Hansa)原意为“行会”或“协会”。从12世纪起，该同盟是北德意志商人与英国和佛兰德进行贸易的协作式联合组织；13世纪末是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以及与这两个海相连的河流两岸的城市所结成的贸易和政治同盟。同盟的中心在吕贝克；同盟的宗旨在于垄断东欧北欧同西欧的转运贸易。该同盟的极盛时代是在14世纪后半期和15世纪前半期，15世纪末开始衰落，1669年解体。——221。

153 当时的奥地利世袭领地指属于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部分，即奥地利公国、克赖因、施泰尔马克、克恩滕、蒂罗尔和所谓的前奥地利。

前奥地利原文为Vorderösterreich或Vorlande，是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于1491年建立的奥地利边区，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德国西南部地区。恩西斯海姆的阿尔萨斯政府即是奥地利边区政府。——223、264、276。

154 农奴制和依附农制是德国封建社会中同时存在的两种主要封建剥削形式。农奴制中有人身依附关系，是最重的封建剥削形式。依附农制与其略有区别。依附农通过世袭租佃方式依附于封建主的土地，已经没有人身依附关系，只有物的依附关系，但通过物的依附关系所承担的徭役与农奴差不多，仍然很重。骑士们的佃农和诸侯们的农庄雇农都不是主要形式，他们都可能同时是依附农。——224。

155 *死亡税*是领主根据封建权利对于已经死亡的农民的份地和财产征收的遗产税(在法国称为“死手权”)。在德国，封建主一般是向继承人征收好家

畜。——225。

156 保护金是封建主作为领主对自己的仆从进行所谓“保护”或法庭“辩护”所获报酬而征收的税项。——225。

157 在僧侣封建主可以娶妻的情况下，产业通常因后代继承而脱离教会掌握。教皇格雷戈里七世下令禁止娶妻以后，产业脱离教会掌握的可能性随之消失。——225。

158 什一税是中世纪的一种宗教捐税，由天主教会向居民征收其收成或收入的十分之一。这种税的税额和性质在德国不同的地区也有所区别，多半是大大超过了农民生产的产品的十分之一。通常情况下，是对非粮食作物征收小什一税，而对粮食作物则征收大什一税。18世纪末至19世纪什一税逐渐被废除。——226、281。

159 “公捐”即帝国税，是15—16世纪德意志封建国家的一种捐税，其征收形式是将人头税和财产税合并在一起，直接向农民征收。——227、231。

160 上任年贡是14世纪以来教皇要求征收的一种贡赋。被教皇任命担任教会职务（有俸圣职）的人须向罗马教廷缴纳一次性贡赋。此项贡赋在大多数情况下相当于恩赐职位的一年收益；担任此职务的人则向居民横征暴敛，百倍地收回他上任时所缴纳的贡赋。——227。

161 城关市民指中世纪居住在原城区界桩以外的居民。城市往往为提高防御能力而给他们以公民权。——227、238。

162 1848—1849年革命时期，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德意志各邦的国民议会中占据多数，他们在革命的最初几个月里在一些邦（如普鲁士）领导了“立宪政府”，但是后来被官僚和贵族代表所取代。立宪派力图保留王权，作为抵制革命进一步深入发展的支柱，他们只采用一部自由资产阶级的宪法来限制王权。立宪派对反动派所采取的调和政策是德国1848—1849年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229。

163 加洛林纳法典，即查理五世刑罚法规，指1532年德意志帝国国会在雷根斯堡通过的《查理五世皇帝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刑罚法规》。这是德国第一部刑法典，直到18世纪中叶为止，这部法典始终是德国占主导地位的刑

法典，它对各种违法行为采取的惩治措施极端残酷，如火刑、肢解、溺毙等等。——232。

164 神秘主义是一种宗教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主张人和神或超自然界之间直接交往，并能从这种交往关系中领悟到宇宙的“秘密”。在某些历史条件下神秘主义是反对教阶制和社会等级制的一种形式。这种信仰宣传耶稣再生并在世上建立公正、平等和幸福的“千年王国”（见注181）。

德国的神秘主义从13世纪以来在基督教中广泛传播，分为激进和保守两派。神秘主义曾被用来维护平民利益，是闵采尔教理的重要源泉。——236。

165 韦尔登派又称里昂穷人派，是12世纪末产生于法国南部下层城市平民中的一个教派。据说，创立者是把所有家产都周济贫民的里昂富商皮·韦尔登。韦尔登派主张放弃私产，认为贫穷是灵魂得到拯救的必要条件；反对天主教教会聚敛财富和神职人员奢侈享乐；号召恢复基督教早期的习俗。该派否定许多教会礼仪和正统教义，认为教会对拯救信徒灵魂没有任何特殊作用，声称施舍、斋戒、弥撒、祷告对已故的信徒都没有任何益处，并否认有炼狱存在。韦尔登派的学说在瑞士西南部和萨伏依山区农民中极为流行，后在西班牙、波希米亚和伦巴第等地也有发展。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时期，该派的信徒大部分参加了新教，成为新教中的一派。——236。

166 阿尔比派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12—13世纪广泛传播于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其主要发源地是法国南部阿尔比城。阿尔比派反对天主教的豪华仪式和教阶制度，以宗教的形式反映了城市商业和手工业居民对封建制度的反抗。法国南部的部分贵族也加入了阿尔比派，他们企图剥夺教会的土地。法国北部的封建主和教皇称该派为南方法兰西的“异教徒”。1209年教皇英诺森三世曾组织十字军征讨阿尔比派。经过20年战争和残酷镇压，阿尔比派运动终于失败。——236。

167 阿尔诺德于12世纪初生于意大利的布雷西亚，是法国早期唯名论哲学家阿伯拉尔的弟子，1136年参加布雷西亚反对高级僧侣的斗争，要求僧侣放弃世俗权力，并将财产交给世俗统治者。1146年阿尔诺德在罗马参加城市民主派反对教皇的斗争，1155年在罗马被判为异端并被处死。——236。

168　约翰·保尔是英国肯特郡的神父，是罗拉德派(见注175)出色的传教者。当时英国农村中流传着一句话："当亚当耕夏娃织的时候，谁是贵族？"这句话就出自约翰·保尔之口。他还在传教时向农民指出："只要一切还不是公有的，人和人之间的差别还没有消灭，庄主仍然还是我们的主人，英国的事情就永远也好不起来。"1381年瓦·泰勒起义时他还在狱中，农民把他从狱中解救出来后，他立即成为起义农民的领袖之一，起义失败后被杀。——236。

169　皮卡第地方的匈牙利牧师名叫雅科布，据说出生在匈牙利。他是1251年法国农民反封建起义的领袖之一。因为起义的参加者自称为"上帝的牧童"，故这次起义又称牧童起义。——236。

170　约·威克利夫这位神父兼牛津大学教授是英国宗教改革家，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先行者。他曾把圣经从拉丁文译成英文，主张用民族语言做礼拜；驳斥没有教皇教会即不能存在的观点，认为教皇无权从英国征收贡赋及授予英国教士以神职；主张建立脱离教廷控制并隶属于英王的民族教会；宣称"国王的王国直接得自上帝而不是得自教皇"；主张没收教会财产，简化宗教仪式；认为圣经的权威高于教会，教徒应听从基督而不应听从教皇。威克利夫的号召得到市民和骑士的拥护，成为15世纪和16世纪所有天主教教会改革者的指导思想，后来的罗拉德派也是他的信徒们创建的。1414年罗拉德起义失败后，1415年康斯坦茨宗教会议宣布威克利夫为异端，并下令将其遗骸从墓中掘出焚扬。——237。

171　加里克斯廷派又译圣杯派，15世纪上半叶是波希米亚的胡斯派民族解放和改革运动中的温和派。这一派别反对德国贵族、德意志帝国和天主教教会；主张做弥撒时，俗人可与主礼教士一样领食圣体(面饼)和圣血(酒)，而不是只领食圣体。因其以"圣杯"盛圣血，故而得名。该派主要代表市民和中小贵族的利益，要求自由传教，没收教会财产，限制教士特权，建立不受德意志教士控制的教会。胡斯运动期间，该派曾与塔博尔派结盟，共同击退教皇和德意志皇帝对波希米亚的征讨，后转而与天主教势力妥协。塔博尔派于1437年遭到失败，胡斯运动也随之被镇压下去。——237。

172　1381年的瓦特·泰勒起义是中世纪英国最大的一次反封建的农民起义。领导人除泰勒外还有传教者约翰·保尔。起义席卷了全国大部分郡。6月，起

义者在城市贫民的支持下进入伦敦。起义者同国王谈判要求废除农奴制(迈尔恩德纲领),归还村社土地,一切等级平等(斯密茨菲尔德纲领)。起义领袖泰勒在与国王谈判时被谋杀。起义虽遭镇压,但对农奴制和徭役制的废除起到了促进作用。——238。

173 *塔博尔派*是15世纪上半叶同德国封建主和天主教会进行斗争的波希米亚胡斯派民族解放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中革命的、民主的一翼。塔博尔派之名得自1420年建成并成为该派政治中心的城市塔博尔。该派建立了自己的军队,领袖之一是扬·杰士卡,基本群众是农民和城市平民,其中大多数人主张消灭封建所有制和封建特权,没收天主教会财产,建立一个"没有国王的国家",并试图在消费方面实行平均共产主义的原则。该派曾经联合胡斯运动中的温和派——圣杯派,多次击退教皇和德意志皇帝对波希米亚的征讨,后来由于圣杯派与天主教势力妥协,塔博尔派于1437年遭到失败,胡斯运动也随之被镇压下去。——238。

174 *鞭笞派*是一个宗教禁欲主义派别,11世纪出现于欧洲,盛行于13世纪到15世纪。鞭笞派宣称自我折磨能够赎免罪恶。最初该派曾被利用作为反对皇室,增强教会势力的工具,15世纪由于该派揭露僧侣罪恶,要求教会改革,开始遭到教会的迫害。——238。

175 *罗拉德派*是英国和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的宗教派别。罗拉德(Lollard)一词源于中古荷兰文Lollaert,意为"喃喃的祈祷者"。大约在1300年前后该派以慈善团体的名义出现在安特卫普。14世纪中叶,英国的罗拉德派大多是宗教改革者约翰·威克利夫的信徒,又较之更为激进,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约翰·保尔。该派主张废除徭役,取消什一税及其他捐税,剥夺教会财产,实现社会平等以至财产平等。罗拉德派传教士穿粗制袈裟,活动于城乡下层人民中间,曾参加1381年的瓦特·泰勒起义(见注172)。从14世纪末叶起这一宗教派别遭受到残酷的迫害。1414年英国的罗拉德派又发动起义,起义失败后不少信徒迁往欧洲大陆和苏格兰。罗拉德派的活动对16世纪英国宗教改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38。

176 *锡利亚*一词源于希腊文Chilioi,意为一千。锡利亚教义产生于奴隶制度解体时期,宣传基督复临,在世上建立公正、平等和幸福的"千年王国"(见注181)的宗教神秘主义学说,反映了农民和城市平民的心态。恩格斯把这种

信仰称做“锡利亚式狂想”。在基督教早期，这种信仰流传很广，后来经常出现在中世纪各种教派的教义中。——238、245、475。

177　奥格斯堡告白是新教路德宗的信仰纲要，由路德授意其亲信菲·梅兰希顿起草，于1530年提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在奥格斯堡召开的帝国议会。这一纲要从市民“廉价教会”的理想出发，规定宗教仪式(废除豪华的仪式，简化教会的等级等等)，确立教会从属于世俗统治的原则，宣布以领主王公取代教皇作为教会的首脑。皇帝拒绝接受奥格斯堡告白。赞同路德新教改革的王公与皇帝进行的战争于1555年以缔结奥格斯堡宗教和平协定而告结束。根据这一协定，每个王公有权自行决定其臣民的宗教信仰。——241。

178　岩礁和大漩涡是希腊传说中某个海峡的海洋怪兽。谚语中以此形容两个同样大的灾难。——242。

179　“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是路德1525年5月即农民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发表的一篇文章的题目。——243。

180　托·闵采尔的出生年月不详。在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2年斯图加特第1版中，闵采尔的出生年份是1498年。但是根据1506年10月莱比锡大学学生名册的记录来看，他应当生于1490年前后，因为16世纪初大学生首次注册入学的普遍年龄是16岁。——244。

181　千年王国是基督教用语，指世界末日到来之前，基督将再次降临，在人间为王统治一千年。届时魔鬼将暂时被捆锁，福音将传遍世界。此语常被用来象征理想中的公正平等、富裕繁荣的太平盛世。——245。

182　再洗礼派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的一个教派。该派不承认为婴儿所施的洗礼，主张成年后须再次受洗。该派在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出现在德国、瑞士和荷兰等地。其主要成员为农民和城市平民，他们仇视封建制度及其支柱天主教，信仰宣传基督复临并在世上建立公正、平等和幸福的“千年王国”的宗教神秘主义学说。该派中一部分人主张财产公有，反对贵族、地主和教会的封建土地占有制度，积极参加了1524—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后来被统治阶级残酷镇压。——245、282。

183 尼·施托尔希是茨维考的裁缝，以宣传锡利亚教义而著名，是再洗礼派的领袖。托·闵采尔曾受其影响，认为他对圣经的理解高出所有的牧师。1522年施托尔希在图林根和闵采尔一起成为农民战争的领袖。——245。

184 指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大·施特劳斯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他们在自己的早期著作中宣传了一种将神与整个世界等同的宗教哲学，与中世纪异端的神秘主义一样均属泛神论。——247。

185 事实上托·闵采尔离开阿尔施泰特以后，首先来到帝国直辖市米尔豪森，1524年9月由于参加当地城市平民骚乱被驱逐，才由米尔豪森来到纽伦堡。——252。

186 天主教规定的圣礼有七种，即圣洗、坚振、告解、圣体、终傅、神品和婚配。——252。

187 *清教徒*是基督教新教教徒中的一派，16世纪中叶产生于英国，原为英国国教会(圣公会)内以加尔文教义为旗帜的新宗派，如长老会、公理会等。清教徒要求"清洗"英国国教内保留的天主教旧制和烦琐仪文，反对王公贵族的骄奢淫逸，提倡"勤俭清洁"的简朴生活，因而得名。16 世纪末，清教徒中开始形成两派，即温和派(长老派)和激进派(独立派)。温和派代表大资产阶级和上层新贵族的利益，主张立宪君主政体。激进派代表中层资产阶级和中小贵族的利益，主张共和政体。——256、574。

188 *独立派*是英国清教徒中的激进派，16世纪末开始形成，反对专制主义和英国国教会，反对设立国教，更不赞成教会从属于国家政权。这一宗教政治派别代表中等工商业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了的中小贵族的利益，在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后，他们单独成立了一个政党，主张推翻并处决君主，成立共和国。1648年在奥·克伦威尔领导下，该派取得了政权，1649年共和国成立后，镇压平等派和掘地派的人民群众运动，并于1653年建立了军事专政的"护国政府"。——256。

189 *士瓦本联盟*于1488年由德国西南部的王公、中下等贵族和帝国直辖市建立，很快成为统治阶级镇压农民和城市平民的主要工具。该联盟拥有自己的司法行政机关和军队，1534年因内部纠纷而解体。——261、277、281、293。

190 **塞克勒人**指居住在特兰西瓦尼亚东部山区的马扎尔人部落，其成员大都参加边防部队。1848年以前他们拥有很多特权，享受同贵族一样的待遇。——267。

191 **西西里晚祷**指1282年3月30日在巴勒莫发生的人民起义。起义以晚祷的钟声为信号，矛头直指从1267年起统治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法国安茹王朝。4月，起义遍及全岛，消灭了数千名法国骑士和士兵，最后将整个西西里从安茹王朝统治下解放出来。——268。

192 路德开始自己的宗教生涯时是图林根奥古斯丁修道院的一名普通修士。1517年10月31日，他在维滕贝格教堂门前张贴了《九十五条论纲》，抗议教皇滥用特权，派教廷大员以敛财为目的向各地教徒兜售赎罪券，并要求对此展开辩论。随着《九十五条论纲》的传播，掀起了宗教改革运动。——271。

193 **蔷薇战争**亦称**玫瑰战争**，是1455—1485年为争夺王位发生在英国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之间的战争。约克家族的族徽上饰有白色蔷薇，兰开斯特家族的族徽上则饰有红色蔷薇。站在约克家族一方的有经济比较发达的南部的一部分大封建主，以及骑士和市民阶层；支持兰开斯特家族的则是北部诸郡的封建贵族。这场家族之间自相残杀的战争几乎使古老的封建家族消灭殆尽，其后英国建立了新的都铎王朝，并实行专制政体。——273。

194 **德意志三色旗**指黑红黄三色旗帜，是德意志民族统一的象征，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被宣布为德国的国旗，也是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旗帜。——277。

195 皇帝的诏书中说，根据马克西米利安大帝的旨意，地方法庭的法官只能由“高贵的”阶层的代表担任。——278。

196 **南部高地**指上巴登地区，即与瑞士接壤的巴登南部山地。16世纪，这一地区只有一部分属于巴登封疆伯爵，其他部分则属于奥地利的布赖斯高，或者由较小的教会的和世俗的封建主管辖。——278。

197 指1525年初在纽伦堡出版的一本匿名小册子《为说明激愤是否正当以及在和政权的关系方面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和不应该做些什么这件事，致高

等德意志民族和其他许多地区所有义愤填膺举行起义的农民的会议的文告。它是根据上帝的圣书，在编写和阐述时曾得到南部高地的同僚们的完全同意》。威·威美尔曼认为这篇文告的作者是托·闵采尔。——278。

198 鸠迪加礼拜日(原文是"Judica"，直译为"审判的星期日")是耶稣复活节前的第二个星期日。——281。

199 引自1525年3月士瓦本联盟在乌尔姆的联合政权会议上通过的决议。在乌尔姆档案中有一份文件记载了这项决议。见威·威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2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第167页。——281。

200 *维尔茨堡主教教堂议事会*是管理维尔茨堡教区的宗教委员会，该会主持人维尔茨堡主教同时还有法兰克尼亚公爵的封号。——283。

201 *德意志骑士团又称条顿骑士团*，是1190年十字军征讨时在普鲁士建立的德意志僧侣骑士团。骑士团在德国和其他国家夺得了许多领地，这些领地由骑士团的高官即团长(或共杜拉)治理。13世纪时，骑士团用征服和消灭当地立陶宛居民的办法占领了东普鲁士，并使之成为继续侵占波兰、立陶宛和俄罗斯各公国的堡垒。1237年该骑士团和另一个德国骑士团，即同样在波罗的海沿岸建立的立风骑士团联合。1242年楚德湖之战(冰上激战)和1410年格伦瓦尔德之战失败以后，骑士团开始衰败，于1466年臣服于波兰。1525年，僧侣骑士团波罗的海沿岸的领地变为世俗的普鲁士公国。——285。

202 *奥芬堡条约*于1525年9月18日由布赖斯高起义者与奥地利政府签订。条约规定恢复农民过去所担负的徭役并施行严格取缔农民团体和"异教徒"的条例；政府对普通的运动参加者免予刑罚，仅对其处以较轻的罚金，但是起义的领袖们不能得到政府的赦免。可是，奥地利官方和地方封建主们背信弃义，起义者刚放下武器，大批人便马上惨遭屠杀。——301。

203 黑林山农军被迫于1525年11月23日与奥地利政府签订条约，条约规定农民必须再次向哈布斯堡王朝保证恢复他们过去所承担的徭役，并且不得阻碍胜利者在运动的中心瓦尔茨胡特城进行屠杀。但此后农军在瓦尔茨胡特城继续坚持了好几个星期，由于市民阶级上层分子的叛变该城才落入敌手。——301。

204　1525年3月17日在米尔豪森通过选举产生的“永久市政会”是当权的资产阶级各个阶层妥协的产物，平民阶层仍被排除在外。事实上，闵采尔并不属于“永久市政会”，也没有担任正式职务，但是，他参加市政会举行的会议。——303。

205　指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和工人阿尔伯(亚历山大·马丁)，他们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进入了1848年二月革命后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304。

206　帝国摄政政府是由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中的自由民主派“残阙议会”于1849年6月在斯图加特成立的，由选出的弗·拉沃、卡·福格特、亨·西蒙、弗·许勒尔和奥·贝谢尔五人组成，以代替1848年6月以来在德国存在的、以帝国摄政约翰大公为首并公开奉行反革命方针的所谓中央政权。帝国摄政政府力图借助议会手段来保证实施法兰克福议会制定的，而被德意志各邦君主所拒绝的帝国宪法，但是没有成功。1849年6月18日，“残阙议会”被符腾堡的军队驱散，帝国摄政政府随之解散。——304。

207　车垒是以车辆构成的防御工事，在古代和中世纪曾广为采用。——307。

208　阿尔萨斯农军的十二条款不仅较士瓦本—法兰克尼亚农军的十二条款(废除农奴制、归还被贵族夺去的公共土地等等)更强烈地表达了反封建的要求，而且在许多方面还超过了这一纲领。阿尔萨斯农军的十二条款还反对高利贷(如关于废除高利贷的条款等)，要求不仅取消小什一税，而且取消大什一税，宣布当地人民有权撤换那些引起民怨的官员，任用新人。——308。

209　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是一次全欧洲范围的战争，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斗争引起，是欧洲国家集团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德国是战争的主要场所，是战争参加者进行军事掠夺和侵略的对象。

三十年战争分为四个时期：捷克时期(1618—1624年)、丹麦时期(1625—1629年)、瑞典时期(1630—1635年)以及法国瑞典时期(1635—1648年)。

三十年战争以1648年缔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告结束，和约的签订加深了德国政治上的分裂。——314、595。

210 《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条件与前景》是恩格斯论述军队及其作战方法同社会生产、政治制度的关系问题的军事著作。在这篇著作中，恩格斯将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军事科学研究，总结了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国所进行的历次战争，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思想。他指出：作战方法的每次改进都是以生产力的发展和由革命带来的社会关系的变化为前提的。“现代的作战方法是法国革命的必然产物。它的前提是资产阶级和小农的社会解放和政治解放。”（见本卷第329页）“新的军事科学只能是新的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新的生产力同样是作战方法上每一步新的完善的前提”（见本卷第333页）。现代作战体系的特点是人员、马匹和大炮这些进攻手段的众多性和运动性，这是文明发展到较高阶段的必然结果。他强调：“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同样也将有特殊的表现，并且将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新的作战方法。”（见本卷第332页）

恩格斯于1850年11月移居曼彻斯特后开始系统研究军事理论。本文是他研究军事理论的重要成果。手稿写成于1851年4月，当时没有发表，1914年12月4、11日首次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1914—1915年第33年卷第1册第9、10期。——320。

211 指第一次反法同盟发动的第一次武装干涉法国革命的战争中的主要战争阶段。欧洲的一些封建专制国家结成同盟，于1792年2月发动了反法战争。由不伦瑞克公爵率领的普奥联军于1792年8月23日占领了法国东部的隆维要塞，9月2日又占领了凡尔登要塞。9月20日在瓦尔米（法国东北部）炮战中，沙·弗·杜木里埃和弗·克·凯勒曼指挥的法国军队取得了胜利。接着，在11月6日热马普（比利时）会战中，杜木里埃又大胜奥军，但他没有乘胜追击，反而在荷兰遭到一连串的失败。1793年3月18日在内尔温登（比利时）会战中，法军被科堡公爵击溃，致使法国失去了比利时，北部国境处于入侵者的威胁之下。在内尔温登失败后，杜木里埃公开背叛共和国，投靠了敌人。1794年5月18日在图尔宽（法国）会战中，维·莫罗将军指挥的法国军队战胜了科堡公爵的反法联军。在6月弗勒吕斯会战中，法军战胜了反法同盟联军，并在多条战线上把战争推进到敌国的领土。——320、322、323。

212 全民征集制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种普遍征集制度，按照这种制度，几乎所有男性公民都被征召入伍以抵御外敌入侵。——322、331。

213　8月10日的内阁是吉伦特派1792年8月10日起义胜利后组成的，1793年6月2日该内阁被雅各宾派建立的专政所取代。——322。

214　1793年5月底，里昂的大资产阶级吉伦特派发动反雅各宾派的暴动，与此同时，法国南部许多省市也发生了叛乱。吉伦特派企图利用地方叛乱来对抗革命的首都。共和国的军队包围并占领了里昂，于10月9日平息了里昂暴动。

1793年5月12日，土伦发生了反对雅各宾市政当局的暴动。当时，对法作战的英国和西班牙趁土伦叛乱及法军许多海军高级军官参加叛乱的机会，把海军开进土伦港。12月19日，拿破仑指挥下的共和国军强攻并占领了土伦的主要堡垒，一举收复了土伦。——322。

215　指法军在拿破仑第一的指挥下，对奥地利和皮埃蒙特联军展开的意大利战局的开始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于1796年4月12—22日之间进行的决定性会战迫使皮埃蒙特退出了战争。——323。

216　安特卫普保卫战发生在1814年，当时欧洲各国与拿破仑第一的军事行动已转移到法国及其邻国。当年1月，拉·尼·卡诺奉命组织安特卫普的防御，顺利完成了任务，该要塞经受住了反拿破仑联军的多次轰击和围攻。直到拿破仑主力在法国投降以后，安特卫普才于1814年5月5日被放弃。——324。

217　热月九日即1794年7月27日。这一天发生了反革命政变，政变的结果是雅各宾派政府的倒台和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建立。拉·伊·卡诺积极参加了这一政变的准备工作。

果月十八日即1797年9月4日。这一天资产阶级政府即执政内阁在拿破仑·波拿巴支持下发动了政变，目的是防止建立君主政体。卡诺由于接近保皇主义阴谋分子而遭到怀疑，于是逃离法国。

雾月十八日即1799年11月9日。这一天拿破仑·波拿巴发动国家政变，建立了他的军事专政。卡诺虽然有时也表示反对拿破仑，但态度不坚决且赞成政变，因而被召回，1800年4月被任命为国防部长。——324。

218　七年战争是1756—1763年欧洲两个国家联盟之间的战争，一方是英国和普鲁士，另一方是法国、俄国、奥地利、萨克森和瑞典。这场战争反映了欧洲各封建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英法之间主要是为了争夺对北美和亚洲

殖民地的统治权；普奥之间主要是为了占领西里西亚。1763年，七年战争以缔结巴黎和约和胡贝图斯堡和约而告结束。根据巴黎和约，法国被迫将其最大的殖民地(加拿大以及在东印度的几乎所有领地)割让给英国，英国因此而增强了其在殖民地和海上的实力。俄国的势力也有所增强。普鲁士、奥地利和萨克森恢复了战前的疆界。普鲁士得到了西里西亚，并确立了其在中欧的霸权地位，与之相反，奥地利却因为战争削弱了自己的实力。——325。

219 莱茵联邦是1806年7月在拿破仑第一的保护下成立的德国南部和西部各邦的联盟。由于1805年击溃了奥地利，拿破仑得以在德国建立这样一个军事政治堡垒。莱茵联邦组成后，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即不复存在。最初有16个邦(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等)参加这个联邦，后来又有5个邦(萨克森、威斯特伐利亚等)加入，它们实际上成了拿破仑法国的附庸。这些邦的军队参加了拿破仑的侵略战争。由于拿破仑军队战败，莱茵联邦于1813年瓦解。——325。

220 阿本斯贝格之战和埃格米尔之战是1809年奥法战争期间，拿破仑军队和奥地利军队于当年4月在雷根斯堡(巴伐利亚)地区展开的一场为期五天的会战中的两个阶段。雷根斯堡会战以奥军的失败和撤退而告终。——327。

221 指1849年4月，尼·乌迪诺率领法国军队进攻罗马共和国，以及卡芬雅克在巴黎六月革命期间极残酷地镇压革命，屠杀起义工人的行径。——328。

222 普鲁士的后备军制是把已在正规军中服满现役和尚在规定的预备期限内年龄较大的人员编成一支武装部队的制度。普鲁士后备军在1813—1814年反拿破仑战争期间是以民团的形式组建的。后来，德国其他各邦和奥地利也实行了这种制度。1870—1871年普法战争时期，后备军被派去和正规部队共同作战。——331。

223 关于瑞士的民军制，恩格斯在《欧洲军队》一文中写道："瑞士没有本国的常备军。每个瑞士人只要适合服兵役，都应在民兵部队中服务。民兵按年龄分为三种(适龄的、第一类应征的和第二类应征的)。青年在服役的头几年必须应召受训，有时也把他们集中在兵营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第1版第11卷第529页)——331。

224 在普鲁士,凡受过预备教育,有能力承担自己服役期间所需的全部费用(包括购买军服和武器的费用以及伙食费),并通过考核的青年男子,均可成为服役一年的志愿兵。期满后,他们即有权要求晋升为预备军或后备军军官。——334。

225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是恩格斯总结德国1848—1849年革命经验的重要著作。在这篇著作中,恩格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德国革命的起因、性质、过程和失败的原因,批判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对工人的侵蚀,指出应当根据社会总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条件研究革命发生和成败的原因,并通过对德国社会阶级结构、各阶级的社会地位及其在革命中的态度和作用的分析,论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他强调革命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见本卷第383页),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略原则,指出武装起义是一种艺术,必须遵守一定规则;不要把起义当儿戏,事前必须有充分准备,要集中强大的优势力量对付敌人;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要按照"勇敢,勇敢,再勇敢!"的要求去行动。恩格斯还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民族问题,抨击了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民族压迫政策,揭露了资产阶级在1848年革命中对民族解放斗争的背叛,强调无产阶级应当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他还批判了"泛斯拉夫主义",指出这种理论起着助长俄罗斯帝国的侵略扩张政策的作用。

这篇著作由恩格斯于1851年8月—1852年9月写的19篇文章组成。1851年7月底,《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查·德纳约请马克思为该报撰稿。当时马克思正忙于经济学研究,因此请恩格斯帮忙。恩格斯在写这些文章时利用了《新莱茵报》合订本以及马克思提供的其他资料,文章在寄出前都经马克思看过。恩格斯本来还打算写一篇结束语,但未能写成。

这些文章从1851年10月25日—1852年10月23日陆续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德国"专栏,标题是《革命和反革命》,署名是卡尔·马克思,直到191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来往书信发表后,人们才知道作者是恩格斯。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这组文章没有出版过单行本,开头几篇文章曾被译成德文在美国的德文报纸《纽约晚报》以及柏林的《德意志总汇报》

上转载。

1896年，马克思的女儿爱·马克思-艾威林编辑出版了这组文章的第一个英文单行本，并给每篇文章加了标题，书名是《革命和反革命或1848年的德国》。同年还出版了卡·考茨基翻译的德文本，书名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两个版本均收入了恩格斯1852年11月写的《最近的科隆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作为恩格斯原打算写的结束语。在后来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全集本中，没有将《最近的科隆案件》收入《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900年，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法格将此书译成法文出版。

本卷选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作为总标题，并保留了爱·马克思-艾威林为19篇文章所加的标题。

这篇著作1930年由刘镜园译成中文，由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1939年延安解放社又出版了王石巍、柯柏年等翻译的中译本。——349。

226 指《纽约每日论坛报》。该报由著名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格里利创办，1841—1924年出版。19 世纪50年代中期，起初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机关报。40—50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制。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许多著名的美国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查·德纳从40年代末起是该报的编辑之一。马克思从1851年8月开始为该报供稿，一直到1862年3月，持续了十余年。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提供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他约请恩格斯写的。恩格斯的文章多半写于曼彻斯特，许多文章注明的日期并不是写作日期，因为马克思通常标明的是寄往纽约的日期。有些文章写于伦敦，而马克思注明的却是巴黎、维也纳或柏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文章，涉及国际政治、工人运动、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殖民地扩张、被压迫国家和附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等极其重要的问题。在欧洲反动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个发行很广的美国报纸，以具体材料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及其固有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并说明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常常随意处理，有些文章不署作者名字而作为编辑部的社论刊登出去。自1855年年中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的所有文章都被删去了署名。编辑部有时甚至未经

作者本人同意便随意改动文章的内容和日期，这种做法一再引起马克思的抗议。从1857年秋天起，由于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报纸的财政状况受到影响，编辑部让马克思减少他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通讯的数量。到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马克思完全停止了撰稿。马克思之所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断绝关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编辑部内主张同各蓄奴州妥协的势力加强以及该报离开了进步立场。后来该报的方向更日趋右倾。——353、594。

227　在被法国兼并的莱茵河左岸地区，农奴制度同贵族、教士的特权，以及教会的房地产特权，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已被废除。——354。

228　*大陆体系*或*大陆封锁*是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一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为反对英国而采取的一项重要的经济政治措施。1805年法国舰队被英国舰队消灭后，拿破仑于1806年11月21日颁布了《柏林敕令》，禁止欧洲大陆各国同英国进行贸易。参加大陆体系的有西班牙、那不勒斯、荷兰、普鲁士、丹麦和奥地利。根据1807年的蒂尔西特条约的秘密条款，俄国加入了大陆体系。1812年拿破仑在俄国遭到失败后，所谓的大陆体系便瓦解了。——354、596、639。

229　*关税同盟*是1834年1月1日在普鲁士领导下最后形成的。在此之前，1818年的保护关税条例废除了普鲁士境内的国内税，1819年开始，普鲁士同德意志的一些小邦(其中最大的是黑森-达姆施塔特)签订了关税协定，后来发展成确定共同税界的关税同盟，该同盟逐渐包括了德意志几乎所有的邦；在同盟之外的只有奥地利、汉撒的自由市(吕贝克、汉堡、不来梅)和北德意志的一些小邦。1848—1849年革命时期以及这次革命被镇压以后，关税同盟事实上已名存实亡。普鲁士在1853年恢复了关税同盟。关税同盟的成立促进了于1871年完成的德国政治上的统一。——355、596。

230　1844年6月4—6日，西里西亚纺织工人反对降低工资而自发举行了起义。这是德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展开的第一次阶级大搏斗。工人们捣毁工厂，破坏机器。起义最终遭到政府军队残酷的镇压。

与此同时，6月下半月，捷克爆发了布拉格纺织工人自发的起义。布拉格起义引起捷克许多工业城市的工人发生骚动，他们捣毁工厂，破坏机器。这次起义同样遭到了政府军队残酷的镇压。——357。

231 德意志联邦于1815年6月8日在维也纳会议上由德意志各邦联合组成，最初包括34个邦和4个自由市，其中还包括藩属丹麦王国的荷尔斯泰因公国和尼德兰国王的领地卢森堡。联邦既没有统一的军队，也没有财政经费，保存了封建割据的一切基本特点。德意志联邦唯一的中央机关是由奥地利代表担任主席的联邦议会。联邦议会拥有有限的权力，是反动势力镇压革命运动的工具。德意志联邦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瓦解，1850年恢复。联邦的两个最大的邦，即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曾不断地进行争夺霸权的斗争。德意志联邦在1866年普奥战争期间彻底解体，后来被北德意志联邦所取代。——359、371、392、441。

232 联邦议会是根据1815年维也纳会议决议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唯一的中央机关，由德意志各邦的代表组成，会址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由奥地利代表担任主席。联邦议会并不履行政府的职能，事实上成了德意志各邦政府推行反动政策的工具。它干预德意志各邦的内部事务，其目的在于镇压各邦的革命运动。1848年三月革命以后，反动势力企图加紧联邦议会的活动，以达到反对人民主权的原则和反对德意志民主联合的目的。1851—1859年，普鲁士驻联邦议会的全权代表是俾斯麦，最初他力求和奥地利结盟，后来采取了坚决反奥的立场。1859年初卡·乌泽多姆被任命为普鲁士的全权代表。1866年普奥战争后，德意志联邦被北德意志联邦所取代，联邦议会也不复存在。——359、370、392。

233 关税联盟于1834年5月1日成立，由愿意同英国进行贸易的德意志各邦汉诺威、不伦瑞克、奥尔登堡和绍姆堡-利珀单独组建而成。1854年该联盟瓦解，其成员并入了关税同盟。——359。

234 维也纳会议是欧洲各国（土耳其除外）从1814年9月至1815年6月断断续续召开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英、普、俄、奥等反拿破仑战争同盟国的君主和代表，法国复辟的波旁王朝也派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缔结的旨在恢复各国王朝统治和满足战胜国领土要求的条约和协议，统称为维也纳条约。根据维也纳会议的决定，奥地利获得了意大利的伦巴第和威尼斯等地；普鲁士获得了莱茵河两岸及北部萨克森的土地；瑞典从丹麦获得了挪威；俄国获得了芬兰，并把华沙大公国改名为波兰王国，由沙皇统治；克拉科夫成为俄、普、奥共同保护的共和国；奥地利的尼德兰（比利时）合并于荷兰称

为尼德兰王国；德意志组成松散的德意志联邦；瑞士重新恢复中立；英国得到了荷兰的殖民地好望角和锡兰以及法属殖民地马耳他岛。会议的最后决议规定，恢复法国1792年的疆界，恢复波旁王朝在法国的统治，并将法国置于列强的严格监督之下；法国不得再侵占欧洲领土。1815年9月关于成立神圣同盟的决议是对维也纳决议的补充。——360、370。

235　指1830年的法国七月革命（见注38）以及相继在比利时、波兰、德国和意大利等许多欧洲国家爆发的革命和起义。——361。

236　*青年德意志或现代派*是德国19世纪30年代在法国七月革命和德国人民起义的影响下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它同时又是一个文学团体，受海涅和卡·白尔尼的影响极大，在世界观方面受黑格尔思想和圣西门主义的影响。青年德意志作家（卡·谷兹科、亨·劳伯、卢·文巴尔克和泰·蒙特等）主张信仰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实行立宪制、解放妇女等等。他们的文艺和政论作品反映出小资产阶级的反抗情绪。青年德意志派观点的特点是思想上不成熟和政治上不坚定。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很快就沦为庸俗的资产阶级自由派。青年德意志在1848年后解体。——361。

237　*历史学派*指*历史法学派*，是18世纪末在德国兴起的一个法学流派。其特征是反对古典自然法学派，强调法律应体现民族精神和历史传统；反对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重视习惯法；反对制定普遍适用的法典。该派的代表人物是古·胡果、弗·卡·萨维尼等人，他们借口保持历史传统的稳定性，极力维护贵族和封建制度的各种特权。该派以后逐步演变成19世纪资产阶级法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1842年，萨维尼被任命为修订普鲁士法律的大臣，这样，历史法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就成了修订普鲁士法律的依据。

历史法学派的主张同黑格尔法哲学的观点相对立。早在1836—1838年，马克思就开始研究历史法学派与黑格尔法哲学之间的分歧和论争。1841年底，马克思着手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同时继续研究历史法学派。对这一流派的批判，见马克思《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363。

238　指《*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该报是德国的一家日报，青年黑格尔派

的喉舌，1842年1月1日—1843年3月31日在科隆出版。该报由莱茵省一些反对普鲁士专制政体的资产阶级人士创办，曾吸收了几个青年黑格尔分子撰稿。1842年4月马克思开始为该报撰稿，同年10月起成为该报编辑部成员。《莱茵报》也发表过许多恩格斯的文章。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政府对《莱茵报》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1843年4月1日将其查封。——365、588。

239 各省议会的*等级委员会*是根据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842年6月21日发布的命令建立的，等级委员会委员由各省议会按照等级划分，从各等级的议员中选举产生，并由国王召集各等级委员会组成咨议性机构——联合委员会。建立等级委员会的目的在于加强封建等级代表制，抵制自由主义反对派提出的在全普鲁士实行立宪代表制的要求。——365。

240 *联合委员会*是普鲁士各等级委员会组成的联合机构，行使咨议职能。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于1842年10月18日—11月10日召集联合委员会会议，打算按照1820年1月17日颁布的《关于将来处理全部国债事务的规定》实行新的税收和获得公债。关于省议会等级委员会的情况，参看马克思《本地省议会议员选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365。

241 *海外贸易公司*是1772年在普鲁士成立的贸易信用公司。该公司享有许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给予政府巨额贷款，实际上起到了政府的银行老板和财政经纪人的作用。1820年1月起，海外贸易公司正式成为普鲁士国家银行。——366。

242 指“*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从1844年起在德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传播的一种反动的学说，其代表人物有卡·格律恩、莫·赫斯、海·克利盖等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崇拜爱和抽象的人性，拒绝进行政治活动和争取民主的斗争。他们把假社会主义思想同沙文主义、市侩行为和政治上的怯懦结合起来，否认在德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在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这种学说成了不断发展的工人运动的障碍，不利于实现当时的主要任务，即团结民主力量进行反对专制制度和封建秩序的斗争，同时在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形成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6—1847年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批判(参看《德意志意识形态》、《反克利盖的通告》、《诗歌和散文中的德

国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宣言》等）。——368。

243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即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于1848年5月18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其目的是消除德国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和制定全德宪法。议会的选举采取两级制，不是直接选举。议会中，除了罗·勃鲁姆、卡·福格特等人组成的左翼外，还有阿·卢格、弗·施勒弗尔、弗·齐茨、威·特吕奇勒尔等人组成的极左翼，或称激进民主党。议会的多数派是自由资产阶级中间派，它又分裂成中间派右翼和中间派左翼。中间派拥护立宪君主政体。由于自由派多数的胆怯和妥协，以及小资产阶级左翼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议会害怕接管国家的最高权力，没有成为真正统一德国的机构，最后变成了一个没有实际权力，只能导致群众离开革命斗争的纯粹的争论俱乐部。

当德意志各大邦召回本邦议员，而法兰克福市当局又禁止留下的左翼议员在当地开会时，左翼议员便于1849年5月30日决定把议会地点迁往斯图加特，并试图组织保卫帝国宪法的合法运动。1849年6月6日，国民议会宣布废除帝国摄政及其阁员，建立由温和民主派弗·拉沃、卡·福格特、亨·西蒙、弗·许勒尔和奥·贝谢尔组成的五人摄政，但是没有成功。同年6月18日，议会被军队驱散，停止了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新莱茵报》上发表许多文章，对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活动进行了尖锐的批评。——370、392、421、432、440。

244　哥达派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以弗·达尔曼、马·西姆桑、弗·巴塞尔曼、亨·加格恩、卡·布吕格曼等人为首的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属于右翼自由派。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拒绝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为他加冕，以及国民议会左翼多数派通过关于建立帝国摄政政府的决议之后，他们当中有148名代表宣布退出国民议会，并于1849年6月25—27日在哥达单独召开了三天会议，故而得名。最后有130名与会代表签署了一项声明，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之下实现德国统一。于是“哥达派”一词被习惯地用来指背叛革命的自由资产阶级。——371。

245　德国天主教是1844年在德意志一些邦中产生的宗教派别，吸引了中小资产阶级广大阶层参加。该派不承认罗马教皇的最高权威，反对天主教会的许多信条和仪式，竭力使天主教适应德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是19世纪

40年代资产阶级对德国反动制度的不满和要求全国政治上统一的愿望在宗教上的反映。

1859年，德国天主教徒协会与自由公理会（见注246）合并。——372。

246 自由公理会是在“光明之友”运动的影响下，于1846年和1847年从官方新教教会中分化出来的宗教团体，曾试图成立全德国的教会。“光明之友”是产生于1841年的一种宗教派别，它反对在新教教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以极端神秘主义和伪善行为为特征的虔诚主义。自由公理会也反映了19世纪40年代德国资产阶级对本国反动制度的不满。该团体于1847年3月30日获得了进行自由的宗教活动的权利。

1859年，自由公理会与德国天主教徒协会合并。——372。

247 一位论派或反三一论派，是反对“神的三位一体”教义的宗教派别。一位论派运动产生于16世纪的宗教改革时期，最初在波兰、匈牙利、荷兰等国流行，17世纪以后又在英国和北美出现。19世纪，一位论派的教义反对宗教的表面仪式，把宗教中的道德伦理因素提到了首位。——372。

248 这里的德意志帝国是指创立于公元962年的欧洲封建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公元962年，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在罗马由教皇加冕，成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1034年帝国正式称为罗马帝国，1157年称神圣帝国，1254年称神圣罗马帝国。到了1474年，神圣罗马帝国被称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帝国在不同时期包括德意志、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法国东部、捷克、奥地利、匈牙利、荷兰和瑞士，是具有不同政治制度、法律和传统的封建王国和公国以及教会领地和自由城市组成的松散的联盟。1806年对法战争失败后，弗兰茨二世被迫放弃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这一帝国便不复存在了。——373。

249 “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这一口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前夕提出的（见马克思1847年10月底写的《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350页）。1848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拟定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时，又把这一口号作为最主要的要求列在首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3页）。——373、389。

250　1846年2—3月加利西亚爆发了乌克兰农民起义，当时在奥地利所辖的波兰地区，以克拉科夫为中心恰好也爆发了波兰民族解放起义。奥地利当局利用乌克兰农民与当时准备进行反奥暴动的波兰贵族之间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多次使起义农民将矛头指向波兰起义者的队伍。起义农民一开始就解除了波兰贵族起义部队的武装，随后大规模地摧毁地主庄园。奥地利政府在平息波兰贵族的起义运动之后，又镇压了加利西亚的农民起义。——375。

251　奥地利的财政状况在19世纪初依然极度拮据。当局曾想采用发行纸币的办法来克服支付和信贷上的困难；1810年流通的钞票超过10亿盾，全值兑现已不可能。1811年2月20日的特许令规定兑现面值的五分之一，这实际上意味着国家的破产。——376。

252　指大学生军团，该军团是一个准军事性的学生团体，1848年3月组建于维也纳。参加该团体的还有一些大学讲师及其他知识分子，主要是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该军团在1848年奥地利的革命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维也纳十月起义失败后被解散。——383、411。

253　指1848—1849年的奥意战争。1847年底和1848年初在并入奥地利版图的伦巴第和威尼斯地区，意大利居民掀起了反对奥地利的群众运动。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以皮埃蒙特为首的意大利各君主国于1848年3月底向奥地利宣战。战争的第一阶段，皮埃蒙特的军队于1848年7月25日在库斯托扎被击败，8月9日签订了奥地利—皮埃蒙特停战协定。由于意大利国内革命运动重新高涨，1849年3月20日皮埃蒙特的君主被迫继续进行战争。但在21—23日，他的军队在摩尔塔拉和诺瓦拉又被彻底击溃。皮埃蒙特在军事上的失败及其统治集团的投降，使奥地利恢复了在意大利北部的统治。——384。

254　马尔默停战协定指1848年8月26日丹麦和普鲁士签订的关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战争的停战协定。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德意志居民起义开始的反对丹麦的战争，是德国人民争取德国统一的革命斗争的一部分。德意志各邦政府，其中包括普鲁士政府，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参战。但是，普鲁士政府实际上在作战中采取消极态度，并于1848年8月在马尔默同丹麦政府签订了为期七个月的停战协定。法兰克福国民议

会在1848年9月批准了这一协定，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抗议怒潮并导致法兰克福的人民起义。1849年春天，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战事再起，结果，1849年7月普鲁士和丹麦签订了和约，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仍然留在丹麦王国中。——395、408。

255 *第一次瓜分波兰*是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根据1772年8月5日在圣彼得堡签订的协定进行的。奥地利分得了加利西亚，普鲁士分得了瓦尔米亚以及波美拉尼亚、库亚维恩和大波兰区的一部分；利夫兰和白俄罗斯东部的一部分划归俄国。波兰当时失去了29%的领土。——397。

256 *胡斯战争*是1419—1434年间捷克民族为反对德国贵族和德意志皇帝的最高权力而进行的带有宗教色彩的农民战争（见恩格斯《匈牙利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第199页），因捷克爱国者和宗教改革领袖胡斯而得名。胡斯严厉谴责教皇兜售"赎罪券"，反对教会占有土地，抨击教士的奢侈堕落行为，主张用捷克语举行宗教仪式。1415年7月胡斯作为异教徒被处以火刑。对胡斯的处决激起捷克人民更大的义愤，1419年7月30日布拉格发生起义，拉开了这场民族解放战争的序幕。胡斯战争的参加者分为两大派，即代表农民和平民的塔博尔派（见注173）与代表市民和中小贵族的圣杯派（见注171）。战争期间，塔博尔派军队击退了教皇和德意志皇帝组织的五次反对捷克的十字军征讨。最后由于圣杯派同国外封建反动势力实行叛变性的妥协，人民起义遭到失败。胡斯派的运动对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399。

257 *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于1848年6月2日在布拉格举行。代表大会上，受哈布斯堡王朝压迫的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中的两个派别展开了斗争。温和的自由主义右派（属于该派的有代表大会的领导者弗·帕拉茨基和帕·约·沙法里克）为了维护和巩固哈布斯堡王朝，试图使之变为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利的联盟，从而解决民族问题。民主主义左派（萨宾纳、弗里奇、利贝尔特等）对此坚决反对，他们竭力主张同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民主力量一致行动。代表大会的部分代表积极参加了1848年6月12—17日布拉格起义，受到残酷的迫害，其余的代表，即温和的自由派代表于6月16日宣布代表大会无限期休会。——402。

258 宪章派于1848年4月10日在伦敦组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计划前往议会递

交请愿书要求通过人民宪章。政府当局禁止这次游行示威，派出大批军警阻止游行队伍。宪章派的许多领导人发生动摇，决定放弃游行示威并劝说游行队伍解散。——406。

259　1848年4月16日巴黎工人在路易·勃朗影响下举行和平示威，向临时政府提出关于"劳动组织"和"消灭人对人的剥削"的请愿书，示威队伍被资产阶级国民自卫军驱散。——406、494。

260　1848年5月15日，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二世镇压了那不勒斯的人民起义，解散了议会和国民自卫军，取消了1848年2月在群众压力下实行的一些改革。1848年1月斐迪南炮轰巴勒莫，同年9月又炮轰墨西拿，因此被人们称为"炮弹国王"。——406。

261　指1848年9月18日的法兰克福起义。法兰克福国民议会1848年9月16日批准马尔默停战协定是这场人民起义的导火线。当时曾有1 000多人参加街垒战，起主要作用的是工人协会和体操协会的成员。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队取得了议会中占多数的自由派的同意，镇压了这次起义。——408。

262　1848年10月6日维也纳人民起义是由于大资产阶级支持的保皇派试图取消1848年奥地利三月革命的成果，恢复专制制度而引起的。德意志皇帝发布命令，派遣维也纳守备部队征讨革命的匈牙利，成了起义的直接导火线。经过1848年10月24日—11月1日的激烈战斗，起义最后被政府军队镇压。——409。

263　**新闻出版法**指1848年4月1日奥地利政府公布的新闻出版暂行条例。该新闻出版法规定必须交纳大量保证金才能取得出版报纸的权利。由于保留书报检查制度并规定"在新闻出版方面犯罪"的人必须交由行政法庭（而不是陪审法庭）审判，政府官员因此就可能禁止任何一本著作的出版。——410。

264　1848年4月25日宪法规定，在选举议会方面实行苛刻的财产资格限制和居住资格限制，决定建立两院，即下院和上院，并保留各省的等级代议机关。宪法将行政权和军权交给皇帝，并授予皇帝可以否决两院通过的法律的权力。

1848年5月11日选举法剥夺了短工和仆役等的选举权。上院议员一部

分由皇帝任命，另一部分则按照两级选举制从纳税数目最多的人中间选举。下院的选举也实行两级制。——410。

265 根据约翰大公的决定，1848年7月22日在维也纳召开了奥地利制宪议会会议。根据民主派议员的提议，奥地利议会于1848年7月31日发出请愿书，要求奥地利皇帝斐迪南一世无条件地返回维也纳。当年8月12日斐迪南一世回到维也纳。——412。

266 指1848年10月6日成立的帝国议会常设委员会，最初有10名议员参加。该委员会由温和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阿·菲施霍夫主持。——415。

267 1849年4月19日，奥军在纳迪—夏尔洛被击溃，4月26日，奥军撤出科莫恩（科马罗姆），当时匈牙利军队司令部和匈牙利革命政府没有组织力量追击向维也纳方向撤退的奥军，而是去围攻布达。恩格斯认为，这个决定给匈牙利革命带来了致命的后果，因为这样一来就使奥军在沙皇军队入侵匈牙利之前得以发动新的进攻，最终导致匈牙利军队于8月13日在维拉戈什向镇压匈牙利起义的沙皇军队投降。匈牙利军队当时还具有战斗力，并且得到匈牙利革命群众的积极支持，它的投降是由总司令阿·戈尔盖的叛卖行动造成的，戈尔盖依靠的是匈牙利资产阶级和贵族中的反革命势力。另一方面，拉·科苏特和革命政府的其他领导人在与戈尔盖的叛卖行为进行斗争时态度也很不坚决。——420。

268 《新莱茵报》在1849年1—5月间发表了大量有关匈牙利人民革命战争的文章，其中大部分出自恩格斯的手笔。他写的第一篇文章题为《匈牙利的斗争》，发表在该报1849年1月13日第194号。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的最后一号发表了恩格斯的总结性文章《匈牙利》。——420。

269 *东罗马帝国*指拜占庭帝国。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东罗马帝国包括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地中海东南岸地区，其首都是君士坦丁堡。1453年土耳其军队占领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灭亡。中国史籍中称东罗马帝国为拂菻或大秦。——422、436。

270 *兰开斯特学校*是以英国教育家约·兰开斯特的名字命名的贫民子弟学校。这些学校实行学习互助制度，年龄较大和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在学习上帮助其他学生，以弥补师资的不足。19世纪上半叶，英国以及其他一些国

家曾广泛开办兰开斯特学校。——422。

271　英国下院议员约·汉普敦1637年拒绝向皇家收税官交纳一种未经下院批准的捐税——“造船费”，并在法庭上坚持英国人有抗交皇家非法征收的捐税的权利。就汉普敦拒绝纳税一事举行的审判案使英国社会反对专制制度的情绪更加高涨。汉普敦后来成为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活动家之一。

美国人反对英国政府在殖民地征收捐税的斗争拉开了英属北美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战争(1775—1783年)的序幕。1766年英国议会被迫取消前一年开始征收的印花税；后来美国人宣布抵制须缴纳间接税的英国商品。1773年英国强行向美国输入须缴纳高消费税的茶叶，货物在波士顿港口被销毁。这些冲突导致了美洲殖民地举行反对英国的起义。——425。

272　指普鲁士国民议会于1848年11月15日通过的一项决议。决议指出：“只要国民议会不能自由地继续在柏林召开会议，政府就无权动用国家的资金并征收捐税。本决议从11月17日开始生效。”11月15日的会议是议员们在柏林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12月初，一部分议员，主要是右翼议员已集中到了勃兰登堡，12月5日，国王发布了关于解散国民议会并实施钦定宪法的敕令。至此，普鲁士的反革命政变即告成功。——425。

273　*无能的中央“政府”*指根据法兰克福国民议会1848年6月28日决议成立的，由帝国摄政和帝国内阁组成的临时中央政府。该政府没有财权、军权等任何实权，唯一能做的就是支持德意志各邦君主推行反革命政策。——435。

274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演出的皇帝的滑稽剧，指1848年3月21日由力图恢复国王权威的普鲁士资产阶级阁员们倡议，在柏林举行的普鲁士国王出巡盛典。与此同时还举行了要求德国统一的游行示威。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沿柏林的街道巡视，臂上戴着象征德国统一的黑红黄三色臂章，并发表了虚假的爱国主义演说，把自己装扮成“德国自由和统一”的捍卫者。他在当天发布的《告陛下的臣民和德意志民族书》中，庄严地保证要把统一德国的事业掌握在自己手里，并答应成立等级代议机构，实施宪法，确立内阁责任制，规定公开的和口头的诉讼手续以及陪审制度。——438。

275　*各邦君主会议*是1849年5月17日在柏林召开的有普鲁士、萨克森、汉诺威、

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的君主参加的会议，会议旨在修改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拟定的所谓帝国宪法。5月26日会议结束时，普鲁士、萨克森和汉诺威的国王缔结了协定，即所谓“三王联盟”。到1849年9月共有29个邦加入了这一协定，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德意志邦。根据协定，帝国摄政由普鲁士国王充任，议会由两院组成。“联盟”是一次使普鲁士君主制在德国取得霸权的尝试。但是，在奥地利和俄国的压力下，普鲁士不得不退却，并于1850年11月退出了“联盟”。——442。

276 *莱茵普鲁士各市议会代表会议*于1849年5月8日在科隆召开，代表们明确主张重新召开第二议院会议，赞成1849年3月28日的德意志帝国宪法，反对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的政府。——443。

277 1849年5月26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第228次会议在讨论措辞极为温和的《告德国人民书》时，威·沃尔弗发表演说，要求宣布帝国摄政不受法律保护，并且说“我要在这里代表人民讲话”，结果被哄下了台。——447。

278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的最后一篇没有写成。1896年英文版以及后来的许多版本都收录了恩格斯的《最近的科隆案件》一文，把它作为这组文章的最后一篇，实际上它并不属于这组文章。——459。

279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总结法国1848年革命经验和评述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政变的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了当时法国的社会结构和阶级斗争状况，评述了路易·波拿巴政变的原因、过程和结局，并通过对历史事件的生动描述和精辟分析，揭示了历史运动的规律，阐述了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科学方法，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见本卷第470—471页）马克思透彻地分析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的思想。他指出：“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里是表示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见本卷第479页）历次资产阶级革命都没有动摇在专制君主时代形成的军事官僚机器，反而把它当做主要的战利品。“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见本卷第565页）而无产阶级革命则必须“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见本

卷第564页）来摧毁旧的国家机器。马克思在1871年4月12日给路·库格曼的信中更明确地重申了这一思想："如果你查阅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352页）马克思还阐述了工农联盟的思想，指出：随着农民认识到自身利益与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他们"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做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见本卷第570页），而无产阶级革命有了农民的支持，"就会形成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见本卷第573页）。

这部著作是在1851年12月2日政变后不久就动笔撰写的，马克思把它定名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显然含有讽刺意味。法国大革命后的共和八年雾月十八日，即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第一发动政变，实行军事独裁，改行帝制。1851年12月2日，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步他的后尘，发动政变，废除共和，复辟帝制，号称拿破仑第三。在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的第二天，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就称这次政变"演出了雾月十八日的可笑的模仿剧"（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97页）。这部著作原来准备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约·魏德迈在美国创办的德文周刊《革命》上连载。最初计划写三篇，但在撰写过程中不断扩充，最后共写了七篇，于1852年3月25日前完稿。《革命》周刊1852年1月只出了两期，因经济困难而停刊。1852年5月，魏德迈以单行本形式将这部著作作为不定期刊物《革命》的第一期出版，他在扉页和前言中误将标题写成了《路易-拿破仑的雾月十八日》。

1869年，这部著作由出版商奥·迈斯纳在德国汉堡再版。再版前，马克思重新审定了原文，把书名更正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并写了第二版序言。马克思在序言中批判了维·雨果和皮·约·蒲鲁东在论述路易·波拿巴政变的著作中的唯心史观，强调对这一事件和人物的分析必须联系现代阶级斗争的物质经济条件，指出他的这部著作旨在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见本卷第466页）

马克思逝世后，这部著作于1885年6月在汉堡出版了第三版。恩格斯

对第二版作了少量修辞上的改动，并为第三版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指出："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重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见本卷第469页）1891年这部著作被译成法文，同年1月7日—11月12日分32节在法国工人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上连载。这一年还在法国里尔出版了单行本。另外，1889年出版了波兰文版，1894年出版了俄文版。

收入本卷的中译文是根据1869年版译出的，并收入了恩格斯为1885年版写的序言。马克思对1852年版所做的重要改动，均在脚注中作了说明。

这篇著作1930年由陈仲涛译成中文，上海江南书店出版，书名为《拿破仑第三政变记》；1940年延安解放社又出版了柯柏年翻译、吴黎平校订的《拿破仑第三政变记》。——461。

280 旺多姆圆柱又称凯旋柱，是为了纪念拿破仑第一的战功，于1806—1810年在巴黎旺多姆广场修建的。整个圆柱全部用缴获的武器上的青铜制成，顶上铸有一座拿破仑雕像，雕像在复辟时期被拆除，但在1883年又重新复原。1871年根据巴黎公社的决议，旺多姆圆柱作为军国主义的象征被推倒。1875年圆柱又被资产阶级政府修复。——466、578。

281 参看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1837年巴黎版第1卷第35页。——467。

282 1848年12月10日当选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路易·波拿巴于1851年12月2日在法国发动政变，立法议会和国务会议被解散，许多议员被逮捕，全国有32个省宣布处于战时状态，社会党和共和党的领导人被驱逐出法国。1852年1月14日通过的新宪法规定，一切权力都集中在总统手中，而在1852年12月2日却宣布路易·波拿巴为法国皇帝，帝号拿破仑第三。——468。

283 指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讲演录》第3部第2篇《从第二次普尼克战争到皇帝

当政时期》中的论述。黑格尔指出:“如果某种国家变革重复发生,人们总会把它当做既成的东西而认可。这样就有了拿破仑的两次被捕,波旁王室的两次被驱逐。由于重复,开初只是偶然和可能的东西便成了现实的和得到确认的东西了。”——470。

284　特别警察指英国的特别巡警,是由平民组成的警察后备队,他们曾帮助正规警察驱散1848年4月10日的宪章派示威游行队伍。路易·波拿巴流亡伦敦期间曾自愿充当特别警察。伦敦的特别警察代替小军士,指路易·波拿巴代替拿破仑第一。——470、488。

285　1800年6月14日,拿破仑的军队经圣伯纳德山口翻越阿尔卑斯山,在意大利北部的马伦戈击溃奥地利将军梅拉斯的军队,这一决定性胜利最后导致英、俄、奥等国反法同盟的解体。——470。

286　指1851年12月至1852年1月间由于路易·波拿巴要求瑞士当局引渡法国共和派流亡者而发生的法国和瑞士两国之间的冲突。——470。

287　圣安德烈大十字勋章是沙皇俄国的最高勋章。马克思在这里显然是指路易·波拿巴需要得到俄国皇帝尼古拉一世的承认。——470。

288　使徒保罗是圣经中的人物,原名扫罗,是虔诚的犹太教徒。据《新约全书·使徒行传》记载,当他前往大马士革追捕基督教徒时,忽被强光照射,耶稣在光中显现,嘱他停止迫害基督徒。他从此转信耶稣基督,后来成为耶稣直接挑选的使徒,被派往各地传教,改名保罗。《新约全书》中的保罗书信传说为他所写,其主要思想成为基督教教义和神学的重要依据之一。——471。

289　哈巴谷是圣经中12个所谓小先知之一。他以其诗一般热情的话语为人们所称道。约·洛克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出现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处事注重实际而缺少诗意,只相信人的理智。在这里马克思把哈巴谷当做洛克的对立面。——472。

290　1848年12月10日,路易·波拿巴经大选成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473。

291　“埃及的肉锅”一词源于圣经传说:被奴役的以色列人逃离埃及,行至旷

野，饥饿难忍，于是开始抱怨摩西，说他不应该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因为他们在埃及虽然世代为奴，但毕竟可以围着肉锅吃饱肚子（参看《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16章第1—3节）。——473。

292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这句话出自伊索寓言《说大话的人》。一个说大话的人自吹在罗陀斯岛上跳得很远很远。别人就用这句话反驳他。其转义是：这里就是最主要的，你就在这里证明吧！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这句话是从上面那句话演变而来的。罗陀斯在希腊语中既是岛名，又有“玫瑰花”的意思。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的序言中曾使用这种说法。——474。

293 按照1848年11月4日宪法规定，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任期为四年，新总统的选举在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举行，即将离任的总统不能参加竞选。1852年5月的这一天，路易·波拿巴的总统任期届满。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特别是流亡者，希望民主党派在这一天能够上台执政。——475、551。

294 卡皮托利诺是罗马城中一个设有防御工事的小丘，那里建有尤诺纳教堂。据传说，公元前390年高卢人进犯罗马时，尤诺纳教堂里鹅的叫声惊醒了守卫卡皮托利诺的士兵，从而拯救了罗马城。——475。

295 指正统派（见注40）和奥尔良派（见注77）。——475。

296 蓝色共和党人指资产阶级共和派，因其机关报是《国民报》故又称《国民报》派，亦称三色旗共和派、纯粹的共和派（见注64）。1848年革命时期，这一派的领导人参加了临时政府，后来靠卡芬雅克的帮助策划了六月大屠杀。红色共和党人指其他各种民主派和社会主义者。——475。

297 非洲的英雄指曾经参加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的法国军官，在法国，人们曾把他们称做“非洲人”或“阿尔及利亚人”。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路·欧·卡芬雅克、克·拉莫里谢尔和玛·阿·贝多等将军，他们是国民议会中共和派集团的首领。——475。

298 相传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在312年征讨马克森提乌斯时，中午时刻看见天上出现一个光芒四射的十字架，旁边有一行字：“在此标记下你必胜！”有人据此认为君士坦丁大帝从迫害基督教到皈依和保护基督教与这个传

说有关。——479。

299　1848年2月24日，路易-菲力浦让位给他的年幼的孙子巴黎伯爵。奥尔良公爵夫人打算让法国众议院拥戴她来摄政，立其年幼的儿子为国王。但是，在起义人民的压力下，法国后来成立了临时政府并宣布成立共和国。——482。

300　法国1830年宪章是七月王朝的根本法。宪章表面上宣布国民拥有自主权并对国王的权力作了某些限制，但是那些反对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官僚警察机构以及苛刻的法律仍然原封未动。

关于“新的宪法”，马克思在《1848年11月4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一文中作了专门评述。——483。

301　指路易·波拿巴的总统府邸。“极乐世界”的德文是“elysäische Gefilde”，与波拿巴的总统府邸巴黎的爱丽舍宫“Palais de e’Elysées”谐音。——485。

302　“*兄弟，要准备牺牲！*”是特拉伯天主教修道会修士见面时的问候语。特拉伯修道会成立于1664年，以严格的规章及其成员的禁欲主义生活方式而闻名。——485。

303　*近卫军*是古罗马帝王或将相拥有的享有特权的武装力量，经常参与内讧，扶助主子登上王位。马克思在这里是指支持路易·波拿巴政变的法国部队和军官。——488。

304　1832年路易·波拿巴在图尔高州加入瑞士国籍。——488。

305　*卡利古拉*是罗马皇帝（37—41年），他执政后立即同元老院一起参加近卫军的阅兵式并发表演讲。——492。

306　*议会总务官*原是古罗马元老院中的下级官员——财务官和档案官。这里是指在法国国民议会中负责经济、财务和安全保卫事务的委员会。

1851年11月6日，保皇党人议会总务官勒夫洛、巴兹和帕纳提出一项议案，要求把调动军队的权力授予议会。阿·梯也尔支持这项议案，波拿巴分子圣阿尔诺表示反对，经过激烈的辩论，这项议案于11月17日被否决。在

表决中山岳党支持波拿巴派，因为他们认为保皇党人是主要危险。——493。

307 *吉伦特派*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个政治集团，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在革命时期产生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该派的许多领导人在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中代表吉伦特省，因此而得名。吉伦特派借口保卫各省实行自治和成立联邦的权利，反对雅各宾政府以及拥护政府的革命群众。——494。

308 *雅各宾派*是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下层资产阶级的利益，1793—1794年实行了雅各宾专政，颁布了一系列废除封建所有制，镇压反革命活动和击退外国武装干涉的法令。——494。

309 *弗伦特运动*又译*投石党运动*，是1648—1653年法国反专制制度的运动。弗伦特（Fronde）原意是一种投石器，曾为当局所禁，违令者应受惩罚；这个词的转义为破坏秩序，反对当局。

弗伦特运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称为“高等法院弗伦特”（1648—1649年）。路易十四未成年期间，摄政太后安娜（1643—1653年）及首相马扎里尼的专横引起国内广大阶层的不满。1648年5月，巴黎高等法院要求监督政府财政，取消各省巡按使，但遭到拒绝。8月，巴黎市民起义，支持高等法院，迫使王室逃出首都。1649年3月，起义被政府军镇压，高等法院被迫与王室妥协。第二阶段称为“亲王弗伦特”（1650—1653年）。1650年1月起，以孔代亲王为首的贵族资产阶级在外国军队支持下，利用城乡人民运动，与专制政府抗衡，1653年被政府军击败。弗伦特运动的失败为路易十四当政后的专制独裁铺平了道路。——496。

310 策划1851年12月2日政变的波拿巴统治集团和反革命报刊在1852年5月总统选举之前用无政府状态、革命阴谋、新的农民起义和侵犯私有财产等罪名来恐吓善良的遵纪守法的法国公众。前警察局长罗米厄所写的小册子《1852年的赤色幽灵》在这一宣传运动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496。

311 *弗利基亚帽*，或红色尖顶帽，是古代弗利基亚（小亚细亚）人的头饰，后来在18 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成为雅各宾党人的帽子样式。此后，这

种帽子便成了自由的象征。——496。

312　1849年6月13日，小资产阶级政党山岳党在巴黎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抗议法国派兵镇压意大利革命，因为共和国宪法规定，禁止动用军队干涉别国人民的自由。这次示威被军队驱散，它的失败宣告了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破产。6月13日以后，当局开始迫害民主主义者，其中包括外侨，同时许多社会主义报刊遭到查封。

1849年8月10日，国民议会通过一项法令，将"6月13日暴乱的主谋和从犯"送交"布尔日特别最高法庭"审讯。34名山岳党议员（其中包括赖德律-洛兰、费·皮阿和维·孔西得朗）被提交法庭审判。——502、505。

313　议会规则是由国民议会多数派制定的，这项规则限制议员发言自由并赋予议长开除议员和扣发议员津贴的权利。1849年六月十三日事变后的第十天，议会拟订了这项规则的草案（见1849年6月25日巴黎《总汇通报》第176号），经过多日讨论，于1849年7月6日通过。

当时国民议会议长是安·杜班。——502。

314　在巴黎1849年六月十三日事变的影响下，里昂工人于6月15日举行了武装起义。这次起义经过八小时的战斗，最终被贝·马尼昂将军指挥的军队所镇压。——502、546。

315　*使耶利哥城墙应声倒塌的号角声*的传说出自圣经典故：公元前2000年下半年，以色列统帅约书亚的军队围攻耶利哥城时，约书亚令自己的士兵吹响用羊角制成的号角，并随号角声一齐大声呼喊，从而使久攻不破的城墙应声倒塌（见《旧约全书·约书亚记》第6章）。——503。

316　据圣经传说，犹太王大卫是由撒母耳主持涂油仪式而登极的（见《旧约全书·撒母耳记（上）》第16章）。这里暗指路易·波拿巴在恢复罗马教皇庇护九世的世俗权力之后，指望在他复辟称帝进入土伊勒里宫时，能得到教皇的支持。——506。

317　*奥斯特利茨*是现在的斯拉夫科夫的旧称。1805年12月2日，拿破仑第一在这里击败了俄奥联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507。

318　所谓*教皇的自由主义行动*是指罗马教皇庇护九世1846年就职时实行大

赦，在教皇国开始实行广泛的改革，以及1848年3月在教皇国实施立宪制并建立某种程度的世俗内阁等做法。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第一版和1869年第二版中，此处都错印成“教皇的非自由主义行动”，1885年出版第三版时更正为“教皇的自由主义行动”。——511。

319 1850年1月19日、2月26日和3月15日国民议会讨论了教育法，并在3月15日通过了这项法律。这项废除无神思想的教育法，实际上是把学校置于教士的控制之下。——513。

320 新选举法即法国1850年5月31日通过的《1849年3月15日选举法修正案》。该法案规定，在固定居住地居住三年以上并直接纳税的人才有表决权。此项法案使300多万选民丧失了选举权，实际上废除了普选权。——519、520。

321 卡宴是法属圭亚那的首府，法国流放政治犯的地方。大批政治犯在这里被折磨致死，故有“不流血的断头台”之称。——523。

322 指七月王朝时期路易·波拿巴企图实行政变的两次武装叛乱。1836年10月30日，路易·波拿巴在一些拥护波拿巴主义的军官的帮助下策动了斯特拉斯堡驻防军两个炮兵团的叛变，但几小时后叛乱分子就被解除了武装，路易·波拿巴本人被捕并被流放到美洲，1837年回到瑞士。因其在举事时是瑞士国民，所以被称为瑞士兀鹰。1840年8月6日他利用法国波拿巴主义抬头的机会，和一小撮密谋家一起在布洛涅登陆，企图在当地驻防军队中发动叛乱。这一企图也遭到了完全失败。路易·波拿巴被判处终身监禁，但1846年他便逃往英国了。——523。

323 指波拿巴派的报纸。爱丽舍宫是路易·波拿巴任总统期间在巴黎的官邸。——526。

324 爱丽舍园是巴黎的街名，路易·波拿巴的官邸所在地。在古代作者的笔下，爱丽舍园是天堂的同义语。“来自爱丽舍园的女儿”出自席勒的诗歌《欢乐颂》，马克思在这里是借此来讽刺波拿巴及其亲信。——530。

325 旧法国高等法院是18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前法国的最高司法机关，许多

城市设有这种高等法院。作用最大的是巴黎高等法院，该法院办理国王敕令的登记，并具有所谓谏诤的权力，即对不合习惯和国家法律的敕令提出反对意见的权力。但是高等法院没有实权，因为只要国王亲自出席会议，敕令就一定要作为法律登记下来。法国大革命时期这种高等法院于1790年被解散。——534。

326　贝勒岛是比斯开湾的一个岛屿。1849—1857年是法国囚禁政治犯的地方，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的参加者奥·布朗基也被囚禁在这里。——537。

327　马克思在这里套用了古希腊作家阿泰纳奥斯(2—3世纪)的著作《哲人宴》中的一个情节。埃及法老泰俄斯讥笑带兵前来支援他的斯巴达王阿革西拉乌斯身材矮小，他说："山怀孕了，宙斯很吃惊，但山生了个老鼠。"阿革西拉乌斯回答说："您把我看做老鼠，但是总有一天我会成为狮子的"。——539。

328　指复辟时期正统派营垒中策略上的意见分歧。路易十八和让·维莱尔主张谨慎从事，而达尔图尔伯爵(1824年起为国王查理十世)和茹·波林尼雅克却不顾法国局势的变化，主张完全恢复革命前的秩序。

巴黎的土伊勒里宫是路易十八的皇宫，马松阁是宫里的建筑之一，复辟时期是达尔图尔伯爵的府邸。——545。

329　伦敦工业博览会是1851年5—10月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工商业博览会。——551、556。

330　议会迷德文原文是parlamentarischer Kretinismus，直译为"议会克汀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首先使用这个术语批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后来他们用这个术语泛指欧洲大陆醉心于议会制度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556。

331　指波拿巴派的将军圣阿尔诺率军摧毁巴黎街垒的炮击声。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政变后，巴黎曾爆发了一次共和派起义。起义的领导者是立法议会左翼议员和工人联合会秘密组织的领导人。12月4日夜，在镇压这次起义时，波拿巴派的军队不仅用大炮摧毁了共和派构筑的街垒，还向路旁行人和窗口、阳台上的观望者任意射击。一些资产者的楼房，包括萨兰德鲁兹的房屋也遭到破坏。——557。

332 长期国会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长达13年(1640—1653年)没有改选的一届英国国会。长期国会是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为筹集政府经费于1640年11月召开的,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的立法机构和领导机构。该国会于1649年宣布处死国王,成立共和国;1653年4月,奥·克伦威尔建立军事专政后将其解散。——557。

333 1851年12月共和派在巴黎举行了反对波拿巴政变的起义。外省农民、小城镇手艺人、工人、商人和知识分子等也纷纷起义。反抗波拿巴的运动波及法国东南部、西南部和中部20多个省,将近200个地区。但是,由于缺乏统一领导,起义很快就被警察和政府军队镇压下去了。参看注331。

马克思在这里把波拿巴当局对包括农民在内的共和派运动采取的报复措施,同19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当局迫害所谓蛊惑者的行为作了类比。——567。

334 塞文是法国南部朗格多克省的一个山区,1702—1705年爆发了农民起义,被称为"卡米扎尔"("穿衬衫的人")起义。由于新教徒遭受迫害而引发的这些起义具有明显的反封建性质。个别地区直到1715年还有这类起义发生。——568。

335 指正统派首领沙·蒙塔朗贝尔1850年5月22日在一篇演说中要求国民议会议员"同社会主义进行严肃的斗争"。——572。

336 西奈山是阿拉伯半岛上的山脉。据圣经传说,摩西在西奈山上聆受了耶和华的"十诫"(见《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19—20章)。——573。

337 康斯坦茨宗教会议(1414—1418年)是宗教改革运动开始后为巩固天主教会已经动摇的地位而召开的。这次会议谴责了宗教改革运动的首领约·威克利夫和扬·胡斯的教理,消除了天主教会的分裂状态并推选出新的教会首脑以代替三个争夺教皇皇位的人。——574。

338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原指1844年起在德国传播的所谓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见注242)的代表人物。马克思在这里是指大约1850年初出现在法国的所谓社会民主派。——574。

339 加尔都西会是1084年法国人圣布鲁诺创立的天主教隐修院修会之一,因

创建于法国加尔都西山中而得名。该会会规以本笃会会规为蓝本，但更严格。修士各居一小室，以便独自专务苦身、默想、诵经；终身严守静默，只能在每周六聚谈一次；在每年的40天封斋期内，仅食面包和清水，有“苦修会”之称。——576。

340　这是雅·杜邦·德勒尔在《内部纪事》一文中对弗·基佐的称谓，该文发表在1850年12月15日《流亡者之声》第8期。——577。

341　指法国奥尔良王朝的菲力浦摄政时期（1715—1723年）。当时路易十五尚未成年。——577。

342　*特里尔的圣衣*是保存在特里尔教堂里的天主教圣物，传说是耶稣受刑时脱下的。特里尔的圣衣是朝圣者的崇拜物。——577。

343　*《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是马克思1856年4月14日在纪念英国宪章派报纸《人民报》创刊四周年的宴会上的演说。在这篇演说中，马克思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唯物史观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指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蕴含着巨大的革命力量，而在资本主义时代，这种发展和进步却使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陷入贫穷困苦的境地，使整个社会显露出衰颓的征兆；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对抗是不可避免、毋庸争辩的事实，它必然引起无产阶级革命，这种革命意味着无产阶级在全世界的解放；无产阶级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肩负着彻底改造旧世界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以铿锵有力的语言宣告：“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见本卷第581页）

《人民报》是英国宪章派的周报，1852年5月由宪章运动的领袖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厄·琼斯在伦敦创办。1852年10月—1856年1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并对该报的编辑工作给予帮助。1856年4月14日，马克思作为流亡伦敦的外国革命人士的代表应邀参加《人民报》创刊四周年宴会并发表演说，演说词发表在1856年4月19日《人民报》第207期。

这篇文章的中译文曾收入1930年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出版的《马克思论文选译》，译者李一氓；还收入1940年由何封等译上海读书出版社出版的《卡尔·马克思——人、思想家、革命者》一书。——579。

344 菲默法庭是中古时代盛行于德国西部威斯特伐利亚的秘密法庭。——581。

345 《法国的动产信用公司》是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评论法国的动产信用公司的一组论文中的一篇。这篇论文揭露了法国的动产信用公司作为路易·波拿巴的敛财工具的御用性质和投机性质，第一次评述了股份公司的作用和影响。马克思指出："把股份公司的形式运用于工业，标志着现代各国经济生活中的新时代。"（见本卷第584页）一方面，股份公司显示出过去料想不到的联合的生产能力，并且使工业企业具有单个资本家力所不能及的规模；另一方面，股份公司加速了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从而导致小资产阶级加速破产并使工业寡头集团的统治日益加强；与此同时，雇佣工人的人数迅速增长，成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日益强大的革命力量。

马克思评论法国的动产信用公司的一组论文共五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2卷第23—40、218—227、313—317页），本文是其中的第三篇，写于1856年6月底，发表在1856年7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751号。——582。

346 马克思在这里是指沙·傅立叶在他的著作《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1808年巴黎第1版）中的有关论述。——584。

347 指英国皮特政府为了使英格兰银行不致破产，于1797年颁布了专门的银行限制法。参看注118。——587。

348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马克思为他在1858年11月—1859年1月写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所写的序言。在这篇序言中，马克思回顾了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发现唯物史观的过程，对唯物史观作了经典表述，科学地阐明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通过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分析，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一般进程，论证了旧的社会形态为新的更高的社会形态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同时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

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见本卷第592页）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出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马克思在写这部著作之前，进行了15年的经济学研究，研读和分析了大量经济文献和社会文献，奠定了自己的经济学说的基础。《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于1859年6月出版，马克思生前没有再版。这篇序言曾于1859年6月4日发表在伦敦的德文报纸《人民报》第5期，发表时作了某些删节。

这篇序言最早由范寿康译成中文，1921年1月发表在上海《东方杂志》第18卷第1号。——588。

349　这里所说的全部材料，是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和一些准备材料、大纲及摘录笔记等。——588。

350　指马克思为自己计划撰写的一部经济学巨著写的，但没有完成的《导言》。——588。

351　指马克思的著作《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泽尔记者的辩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588。

352　《德法年鉴》是由马克思提议创办，由阿·卢格和马克思在巴黎编辑出版的德文刊物，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一期双刊号。其中刊载有马克思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恩格斯的著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心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最终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该杂志由于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卢格之间存在原则分歧而停刊。——591。

353　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这一术语出自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82节（见《黑格尔全集》1833年柏林版第8卷）。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这一术语有两重含义。广义地说，是指社会发展各历史时期的经济制度，即决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物质关系总和；狭义地说，是指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关系。因此，应按照上下文作不同的理解。——591。

354　把马克思和巴黎《前进报》其他撰稿人驱逐出巴黎的命令是法国内务大臣

杜沙特尔于1845年1月11日签发的。由巴黎警察局长德莱塞尔签发的驱逐令于1月25日送交马克思，限其在一周内离开巴黎。——591。

355 德意志工人协会全称是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德国工人团体，旨在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并向他们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侨居比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合法中心，并同佛兰德和瓦隆的工人俱乐部保持着直接的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协会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立过程中发挥了出色的作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不久，由于协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或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593。

356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是恩格斯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写的书评。这篇书评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局限性，阐述了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伟大贡献。恩格斯指出：德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见本卷第596页）；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见本卷第597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扼要阐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见本卷第597页），只要进一步阐发唯物主义历史观并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伟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人们面前。恩格斯高度评价马克思在吸收黑格尔哲学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创立的唯物辩证法的意义，指出这个方法的制定“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见本卷第603页），并且阐明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的辩证统一。恩格斯还概要介绍了马克思的商品、价值和货币学说，强调政治经济学从分析商品开始，但“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见本卷第604页）。

恩格斯的这篇书评是应马克思的要求写的。马克思在1859年7月19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建议书评应该“简短地谈一下方法问题和内容上的新东西”；后来又在7月22日的信中要求恩格斯在书评中阐明：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1）蒲鲁东主义被连根铲除了，（2）通过最简单的形

式，即商品形式，阐明了资产阶级生产的特殊社会的，而决不是绝对的性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9卷第442、445页）1859年8月3日，恩格斯完成了书评的第一部分，并把它寄给在伦敦的马克思，请他修改。

书评的前两部分发表在1859年8月6、20日《人民报》第14、16期，随后被多家报纸转载。恩格斯还写了分析该书经济学内容的第三部分，但因报纸停刊没有发表，手稿也没有找到。

这篇文章由彭嘉生译成中文，曾收入在1929年上海南强书局出版的《费尔巴哈论》；还收入1939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由王学文、何锡麟、王石巍翻译的《政治经济学论丛》一书。——595。

357　宗教改革战争指16世纪德国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农民战争指1524—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595。

358　荷兰在1477—1555年是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组成部分，1555年10月帝国被分割后，处于西班牙的管辖之下。16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末期，荷兰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而成为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由于荷兰脱离神圣罗马帝国，德国丧失了最重要的海上贸易航路，依赖于荷兰人的转运贸易，这对德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595。

359　1844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写一本批判德国经济学家弗·李斯特保护关税观点的小册子，为此马克思在巴黎研究和摘录了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版第1卷）。1845年春，马克思还摘录了弗·费里埃的著作《论政府和贸易的相互关系》（1805年巴黎版）。马克思对李斯特著作的摘录保存下来了，然而他计划写的小册子未能面世。——596。

360　*官房学*是16—18世纪德国有关行政、财政、经济和其他学科组成的统一的课程，是当时德国官僚候补人员所必须通过的训练科目。许多欧洲国家的中世纪大学以及后来的资产阶级大学都曾讲授这门课程。——596。

361　这是讽刺右派黑格尔分子。19世纪30—40年代，他们在德国大学开设很多讲座，并利用自己的地位来攻击哲学上较激进派别的代表人物；右派黑格

尔分子以反动的精神解释黑格尔学说。

*狄亚多希*是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的将领们，他们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为争夺权力而彼此进行残酷的厮杀。在这场争斗中，亚历山大的帝国分裂成许多单独的国家。——600。

362　指黑格尔的著作《精神现象学》1807年班贝格—维尔茨堡版；《美学讲演录》第1—3卷，《黑格尔全集》1835、1837—1838年柏林版第10卷；《哲学史讲演录》第1—3卷，《黑格尔全集》1833、1836年柏林版第13—15卷。——602。

363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俄国的对华贸易》*、*《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波斯和中国》*、*《鸦片贸易史》*、*《英中条约》*、*《中国和英国的条约》*、*《俄国在远东的成功》*、*《新的对华战争》*、*《对华贸易》*这10篇文章是马克思、恩格斯分别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有关中国问题的评论，其中《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俄国的对华贸易》、《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鸦片贸易史》、《英中条约》、《俄国在远东的成功》是作为社论发表的。

这些文章均写于19世纪50年代。在这些文章中，马克思、恩格斯从经济、政治、文化角度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揭露了英、法、俄、美等国对华战争的侵略本质和血腥暴行，谴责列强通过极不平等的贸易、虚伪狡诈的外交和“极端不义的战争”（见本卷第620页）对中华民族进行的掠夺和践踏，同时深切同情、高度评价中国人民反抗列强侵略的斗争，认为“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一场维护中华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见本卷第626页）。他们对中国的农民起义作了科学的评价，指出封建专制的压迫和欧洲列强的侵略是引起中国革命的原因，中国革命必将对欧洲产生重要影响。马克思指出：“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见本卷第612页）恩格斯在展望中国的前途时满怀深情地预言：“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见本卷第628页）

这组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的中译文收入1938年武汉中国出版社出版的《马·恩论中国》，译者署名方乃宜；同年又收入上海珠林书店出版的杨克斋编的《中国问题评论集》。——607。

364　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1851年在澳大利亚发现了丰富的金矿，这些发现对欧美各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608。

365　东印度公司是存在于1600—1858年的英国贸易公司，是英国在印度和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经营垄断贸易、推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的工具。从18世纪中叶起，公司拥有军队和舰队，成为巨大的军事力量。在公司的名义下，英国殖民主义者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该公司长期控制着同印度进行贸易的垄断权和印度最主要的行政权。它的贸易和行政特权由英国议会定期续发的公司特许状规定。由于公司管理中的独断专行、经营不善，加之19世纪初日益强大的英国工业资产阶级迫使印度对外"开放"，致使东印度公司的权力和影响日渐削弱。1853年下院辩论印度法案时的焦点就是英国今后在印度的统治形式问题，因为1854年4月30日是东印度公司特许状的截止日期。1857—1859年印度的民族解放起义迫使英国改变殖民统治的形式，于是公司被撤销，印度被宣布为英王的领地。英国资产阶级要求扩大对华贸易，提倡自由贸易。1833年8月23日，英国议会通过了取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权的法案，该法案自1834年4月22日开始实施。——608、618、631、678、689。

366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纽约每日论坛报》驻伦敦通讯员的身份为该报撰写的文章中，"我国"常指美国，"我们"常指美国人。——608、615、640。

367　1853年1月5日，咸丰帝在太平军已攻克岳州，行将夺取武昌、汉阳的形势下，谕令"该督抚悉心体察被贼地方，分别蠲缓，奏请恩施。其余应征钱粮之处，亦著严查各州县，总期照旧开征，毋得稍有浮勒。"本段引文和正文中马克思的引文均见《大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卷七十七第十八页。

这里咸丰帝提到的"督抚"，当指湖南、湖北两省的总督和巡抚。马克思文中的"武昌、汉阳南方各省督抚"一语显然不确切。——609。

368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对外贸易是由官方特许的垄断组织"公行"在广州进行的。公行的商人叫做"行商"。行商制度在南京条约第五款中被取消。——613、633。

369　原文中订立条约的年代写的是1787年。实际上，1787年中俄并未订立任何条约。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期间（1762—1796年），中俄曾在1768年对1728

年恰克图条约的个别条款进行修改，在1792年订立恰克图条约。这里根据史实改为1768年。——615。

370 《尼布楚条约》(1689年)签订以后，历代沙皇政府觊觎中国的黑龙江地区，图谋夺取通往太平洋的出海口。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沙皇俄国成立“黑龙江问题特别委员会”，加紧其侵略黑龙江的活动。1849—1855年，俄国海军上将根·涅韦利斯科伊率领武装人员侵入黑龙江下游，建立侵略据点。随后，在东西伯利亚总督尼·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的指挥下，大批俄国侵略军闯入黑龙江地区，对黑龙江中上游北岸和下游两岸地区实行军事占领。——617。

371 指克里木战争。这是1853—1856年俄国对英国、法国、土耳其和撒丁的联盟进行的战争。这场战争是由于这些国家在近东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发生冲突而引起的，故又称东方战争。克里木战争中俄国的惨败重挫了沙皇俄国独占黑海海峡和巴尔干半岛的野心，同时加剧了俄国国内封建制度的危机。这场战争以签订巴黎和约而告结束。——617。

372 1856年10月8日，中国水师在走私船亚罗号划艇上拘捕了12名水手。该船船主和水手均为中国人，只雇用了1名英国人做船长，该船的香港执照已过期失效。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硬说亚罗号是英国船只，并指控中国水师扯下了该船事实上并未悬挂的英国国旗。香港总督兼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包令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命令英国海军舰队司令西马糜各厘于23日率部进犯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即自此始。

文中所说的划艇实际上是一种船身为欧式，帆具为中式的近海帆船。这种船只最早为澳门的葡萄牙人所造。——619。

373 从19世纪中叶起，外国侵略者曾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拐骗一批又一批劳动者，强迫他们接受定期的卖身契约，然后运往古巴、秘鲁和英属西印度等地，从事牛马般的强迫劳动。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奴隶贸易；当时，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全部参与了这一拐卖华工的罪恶勾当。1845—1875年间，被卖往海外的“契约华工”总数不下50万人。——621。

374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在此处加了这样一段话：“为了同中国保持基督教的和贸易的联系，最好是我们避免参与这一冲突，使中国人不致觉得所

有西方国家都暗中串通起来侵害他们。”——621。

375　指1856—1857年英国对波斯进行的战争。19世纪中叶，英国企图征服波斯和阿富汗，以便在中东和亚洲实行进一步的侵略扩张。1856年10月，波斯占领了波阿两国有争议的领土赫拉特。英国以此为借口于11月对波斯宣战，先后占领了恰拉克岛、布什尔港、穆罕默腊市和阿瓦士市。由于俄国在外交上支持波斯，印度爆发了为争取民族独立、反对英国统治的大规模的人民起义，以及向中国调兵进行第二次鸦片战争等等，英国不得不在1857年3月4日同波斯签订和约，英军撤出波斯，波斯撤出赫拉特，并放弃对赫拉特的一切要求。——622。

376　指第二次鸦片战争，参看注372。——622。

377　1828—1829年俄土战争是尼古拉一世借口支持信奉基督教的希腊人反对土耳其压迫的民族运动而挑起的。1828年4—10月是战争的第一阶段，1829年5—8月是战争的第二阶段。土耳其军队起初对集中在多瑙河地区（锡利斯特里亚、舒姆拉、瓦尔纳等要塞附近）的俄国军队进行了有力的抗击。1828年10月11日，瓦尔纳被俄军攻占。1829年5月30日，土军在库列夫恰（保加利亚）会战中被击溃。1829年夏，俄国军队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并于6月11日击败了土耳其军队。1829年9月14日，土耳其接受了俄国提出的全部条件，签订了阿德里安堡条约。——622。

378　1806—1812年俄土战争是拿破仑第一施展外交阴谋致使俄国和土耳其之间矛盾加剧而引起的。除1807—1809年战事中断外，几年间交战双方各有胜败。1811年，战局发生了对俄国有利的变化，1812年5月28日，俄土两国签订了布加勒斯特条约。——623。

379　指克里木战争（见注371）中的几次会战。

1853年11月4日，土耳其军队渡过多瑙河，占领了俄军在多瑙河左岸的奥尔泰尼察阵地。

1854年1月6日，在切塔泰村进行了一场血战，俄军以重大伤亡为代价才把土耳其军队赶至卡拉法特。

1855年9月29日，俄军对被围困的土耳其要塞卡尔斯进行突袭，因兵力准备不足，且对方事先已有准备，突袭失败。

1855年11月6日，俄军在因古里河一战中，被占优势的土耳其军队赶出了明格列利亚。——624。

380 英国侵略者在1856年利用亚罗号划艇事件（见注372）作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口实，从1856年10月27日起，开炮轰击广州城。29日，英军攻破外城，一度冲入城内，纵火将靖海门、五仙门附近民房烧毁殆尽，后因兵力不足，只得退出，但是炮轰城市、掠杀居民的暴行依然继续。——626、643、656。

381 指1856年秋太平天国领导人之间的内讧。这次内讧是起义军领袖之间个人利益和团体利益压倒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的结果。内讧中有三个起义军领袖以及成千上万的起义军士兵被杀害。这对太平天国起义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627。

382 1838年10月28日道光帝所下的上谕中有“鸦片烟流毒内地，官民煽惑，传染日深……必欲净绝根株，毋贻远患”等语。马克思所引可能源出于此。——634。

383 莱特即印度农民，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殖民者实行新的土地税收法以前，在英国殖民者没有破坏印度的村社以前，他们是享有充分权利的村社农民。在从1793年起实行所谓柴明达尔制度的地区（最初在孟加拉、比哈尔、奥里萨实行，后来稍微改变了形式，在联合省和中央省以及马德拉斯省部分地区实行）莱特成了柴明达尔（地主）的佃农。在19世纪初孟买和马德拉斯两管区实行“莱特瓦尔”土地税收制后，莱特成为国有土地的持有者，并按印度英政府随意规定的数额缴纳地租税。根据“莱特瓦尔”制度，莱特同时被宣布为他们所租佃的土地的所有者。由于实行这种在法律上自相矛盾的土地税收制，为农民规定了高得无力缴纳的地租，致使农民欠税日增，其土地逐渐转到包买商和高利贷者手里。——635、686。

384 古代北非奴隶制国家迦太基的居民除从事农业外还经营海外贸易，而罗马帝国则通过征服别国来掠夺和积累财富。这里所说的“迦太基式的和罗马式的方法”，是指贸易的和征服的方法。——642。

385 继天津条约之后，中国和英国于1858年11月8日在上海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该条约第五款规定：“向来洋药、铜钱、米谷、豆石、硝磺、白铅等物，

例皆不准通商，现定稍宽其禁，听商遵行纳税贸易。”洋药即鸦片。——644。

386　此专条在中英天津条约中文本中为：“前因粤城大宪办理不善，致英民受损，大英君主只得动兵取偿，保其将来守约勿失。商亏银二百万两，军需经费银二百万两二项，大清皇帝皆允由粤省督抚设措，至应如何分期办法，大英秉权大员酌定行办。以上款项付清，方将粤城仍交回大清国管属。”——644。

387　指中英天津条约第十一款规定的，开放牛庄、登州、台湾（台南）、潮州、琼州五个口岸。——646。

388　蓝皮书是英国议会或政府的（包括政府向议会提交的）文件或报告书的通称，因封皮为蓝色而得名。英国从17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方面主要的官方资料。——647、660、669、672。

389　指俄国乘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胁迫中国于1858年5月28日签订的中俄瑷珲条约。下文所述俄国取得大片中国领土以及黑龙江航行权，均以该条约为据。在陆上边界自由贸易则属1851年8月6日签订的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的内容。——648。

390　赫拉克利亚半岛即克里木半岛南端自因克尔曼到巴拉克拉瓦以西的那部分土地，是克里木战争（1853—1856年）的重要战场之一，塞瓦斯托波尔就在这个小半岛上。文中所说俄国丧失了一小块领土，是指按照1856年的巴黎和约，俄国被迫放弃了比萨拉比亚南部的一部分地区。——649。

391　1853年1月9日沙皇尼古拉一世在同英国驻彼得堡公使乔·西摩尔会晤时曾称土耳其为“病夫”。尼古拉一世曾建议俄英瓜分土耳其帝国，但是英国不愿加强俄国的势力并希望保持奥斯曼帝国的弱小地位，因而拒绝了这一建议。——649。

392　这里是指1858年6月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签订的四个不平等条约，即中俄天津条约（13日），中美天津条约（18日），中英天津条约（26日）及中法天津条约（27日）。——650。

393　中国古代政府机关用来通报朝政的官方文书抄本，原称“邸抄”，清代称“京报”。——655。

394 英国的国徽是狮子。“跨上不列颠狮子”是指打着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幌子为武装侵华张目。——655。

395 当时广州为英法联军所占领，这里指中国向英法提出的交还广州的要求。——656。

396 英国在镇压了1857—1859年印度起义以后，面临着如何在印度巩固和加强被大大动摇了的殖民统治的难题。——657。

397 *皮尔派*是英国一批拥护罗·皮尔爵士的温和的托利党人。他们支持皮尔在保持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政治统治的条件下，在经济政策方面对工商业资产阶级采取让步政策。1846年，皮尔为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废除了谷物法，引起了托利党保护关税派的强烈不满，导致了托利党的分裂和皮尔派的孤立。19世纪50年代，皮尔派在议会中是一个没有固定纲领的小政治集团。50年代末60年代初，皮尔派并入自由党。——657。

398 指1838—1842年英国为了对阿富汗进行殖民奴役而发动的第一次英阿战争。1839年8月英军占领了喀布尔，由于1841年11月喀布尔爆发起义，英军被迫于1842年1月开始退却，最后英军完全被击溃。——660。

399 亚·伯恩斯于1836—1841年在喀布尔供职；喀布尔暴动发生于1841年11月；帕麦斯顿1835—1841年任英国外交大臣。詹·伯恩斯就亚·伯恩斯爵士公务信札被篡改一事所作的声明载于1858年2月3日《自由新闻》第5期。——661。

400 在对华侵略的做法上，以德比为首的托利党内阁（1858年2月—1859年6月）与在它之前以及之后的两届帕麦斯顿内阁有所不同。1858年詹·额尔金攻陷大沽口，1859年6月弗·普鲁斯以驻华全权公使身份来华，都是以德比为首的托利党内阁执政期间发生的事，而且惨败于大沽口的普鲁斯来华系由德比内阁所派。据马克思判断，额尔金和普鲁斯在华的所作所为乃是根据帕麦斯顿的指示，但是责任却要落到德比内阁头上。本文第四部分（见本卷第668—671页）主要讲的就是这件事。——667。

401 *唐宁街*是伦敦白厅大街上的一条横街，英国首相及某些内阁大臣的官邸设在这条街上，因此唐宁街也是英国政府的代称。——670。

402 指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罗·埃伦伯勒勋爵和印度总督查·坎宁勋爵之间的冲突。主张对印度封建上层采取灵活政策的埃伦伯勒在1858年4月19日的紧急报告中，激烈地抨击了坎宁关于没收曾参加民族解放起义的奥德封建主土地的通告。但是埃伦伯勒的紧急报告并没有得到英国统治集团的赞同，因此他不得不于1858年5月辞去督察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德比内阁力图以埃伦伯勒辞职为代价来保住政权。——670。

403 1859年4月，法国对意大利的撒丁王国和奥地利开战，英国外交大臣詹·马姆兹伯里曾力图阻止这场战争的爆发。——671。

404 《*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是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两篇关于印度问题的评论。马克思在文章中严厉地鞭挞了英国的殖民政策，深刻地揭露了英国殖民统治给印度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指出"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见本卷第690页）；同时还分析了英国殖民统治给印度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指出它破坏了印度的宗法制，动摇了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造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革命，"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见本卷第683页）。马克思联系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来考察民族殖民地问题，指出："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见本卷第689页）"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见本卷第690页）"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见本卷第691页）

这两篇文章于1853年6月25日和8月8日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04、3840号。

这两篇文章的中译文曾收入1940年5月上海北社出版的由丁宗恩编

译的《论弱小民族》一书。——677。

405 **莫卧儿人**是16世纪从中亚细亚东部入侵印度的突厥征服者，1526年在印度北部建立伊斯兰教国家大莫卧儿帝国。"莫卧儿"（Mogul）一词为"蒙古"（Mongol）的转音，该帝国的创建者（巴卑尔，1483—1530）自称是蒙古人，相传是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人的直系后裔，这就是"莫卧儿"一词的由来。

大莫卧儿帝国在17世纪中叶征服了印度大部分地区以及阿富汗部分地区。由于农民起义和印度各民族对征服者的反抗加剧，加之征服者经常发生内讧，封建割据趋势日益加剧，到了18世纪上半叶莫卧儿帝国便分裂成许多小邦，这些小邦逐渐被英国殖民主义者侵占。

1803年英国人占领德里以后，大莫卧儿王朝的后裔靠东印度公司的赡养费维持生计，成了该公司的傀儡。1858年英国殖民者宣布印度为不列颠王国的领地之后，莫卧儿帝国遂亡。——677、685。

406 **林伽**是印度教的主神之一湿婆神的象征。崇拜林伽的宗教盛行于印度南部。这一印度教派不承认种姓，反对斋戒、祭祀和朝圣。——678。

407 **札格纳特**是印度教的主神之一毗湿奴的化身。崇拜札格纳特的教派的特点是宗教仪式十分豪华，充满极端的宗教狂热，这种狂热表现为教徒的自我折磨和自我残害。在举行大祭的日子里，某些教徒往往投身于载着毗湿奴神像的车轮下将自己轧死。——678。

408 **七国争雄**亦称七国时代，是英国史编纂学中用以表示英国中世纪初期七国并立时代的术语，在6—8世纪，英国分为七个盎格鲁撒克逊王国，这些王国极不稳定，分合无常。马克思借用这一术语来描绘德干（印度的中部和南部）在穆斯林入侵以前的封建割据状态。——678。

409 **婆罗门**是梵文Brāhmana的音译，意译为"净行"或"承习"，是印度古代的僧侣贵族、印度的第一种姓（见注413），世代以祭祀、诵经（吠陀）、传教为业。

婆罗门教是印度古代宗教之一，约于公元前7世纪形成，因崇拜梵天，并由婆罗门种姓担任祭司而得名。以吠陀为最古的经典，信奉多神，其中主神为婆罗贺摩（梵天，即创造之神）、毗湿奴（遍入天，即保护之神）和湿婆（大自在天，即毁灭之神），并认为三者代表宇宙的"创造"、"保全"和"毁灭"三个方面。主张善恶有因果、人生有轮回之说。——678、681、690。

410　*萨尔赛达庙*是位于孟买北部的萨尔赛达岛上的庙宇，以拥有109座佛教石窟而闻名。——678。

411　*荷兰东印度公司*是存在于1602—1798年的荷兰贸易公司。它是荷兰在印度尼西亚推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的工具。公司不仅控制贸易垄断权，而且具有政府职权。它用强制手段巩固和保存当地的奴隶占有制关系和封建关系，在为荷兰效劳的土著政权的封建官僚机构的帮助下，掠夺当地被征服的居民。公司从印度尼西亚运出农产品，通过销售这些产品获取巨额收入；后来，还强制性地引进新的农作物（特别是咖啡），其收获全部归公司占有。荷兰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引起印度尼西亚人民举行一系列大规模的起义，随着荷兰共和国的全面衰落，该公司于1798年宣告倒闭。——678。

412　“*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laissez aller）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经济学家的信条，他们主张贸易自由，反对国家干涉经济范围内的任何事务。——680。

413　*种姓*是职业世袭、内部通婚和不准外人参加的社会等级集团。种姓的出现和阶级社会形成时期的分工有关。种姓制度曾以不同形式存在于古代和中世纪各国，但在印度社会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古印度的《摩奴法典》规定有四个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及首陀罗。——683、685、689。

414　*马拉塔人*是印度境内居住在德干西北部地区的一个部族。从17世纪中叶起，这个部族开始进行反对莫卧儿封建主的武装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大莫卧儿帝国并加速了它的崩溃。在这一斗争进程中建立了一个马拉塔人的独立邦，这个邦的封建上层人物不久就走上了发动侵略战争的道路。17世纪末，马拉塔邦被封建内讧所削弱，但是到了18世纪初，又形成了一个以最高统治者派施华为首的诸马拉塔王国的强大联盟。马拉塔封建主为了称霸印度而与阿富汗人进行斗争，1761年遭到惨重的失败。在1803—1805年英国—马拉塔战争中诸马拉塔王国被东印度公司征服。——685。

415　柴明达尔在大莫卧儿帝国时代指主要来自被征服的印度教徒中的封建领主。他们的世袭土地持有权被保留了下来，条件是从自已向被压迫农民征收的租税中抽出一定份额交给政府。“柴明达尔”这个名词还被用来指孟

加拉的土地税大包税主。1793年英国政府用“永久柴明达尔”法把柴明达尔(包税主)变成了私有土地的地主,以他们作为英国殖民当局的阶级支柱。随着英国人对印度的步步征服,柴明达尔制度在形式上略经改变后也在印度某些地区实行起来。——686。

416 圣威廉堡(威廉堡)是英国人于1696年在加尔各答修建的一座城堡,以当时英国国王奥伦治的威廉三世的名字命名。英国人在1757年征服孟加拉以后,把政府机关迁入这座城堡,城堡的名称遂被用来指“孟加拉管区政府”,后来指“印度英国政府”。——688。

417 贾特是印度北部的一个种姓集团,其基本群众是耕作农,其中也有军事封建等级的代表。在17世纪,农民贾特曾多次举行起义,反对外来的莫卧儿封建主的统治。——690。

418 拉甲(raja)是古代印度贵族的称号,指一族的酋长或一地的首领。最初由人民推选,后演变成世袭职位。近代英国殖民政府称印度土著王公为拉甲。——690。

419 奥里萨(东印度)的札格纳特庙是崇拜印度教主神之一毗湿奴-札格纳特的中心。庙里的僧侣受东印度公司的庇护,从群众朝拜以及豪华祭祀中取得巨额收入。在群众朝拜时,他们乘机怂恿住在庙里的妇女卖淫,而在举行祭祀时,则有一些狂热信徒进行自我折磨和自我残害。——691。

人名索引

A

阿伯丁伯爵，乔治·汉密尔顿·戈登(Aberdeen, George Hamilton Gordon, Earl of 1784—1860)——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1850年起为皮尔派领袖，曾任外交大臣(1828—1830和1841—1846)、殖民和陆军大臣(1834—1835)和联合内阁首相(1852—1855)。——659。

阿尔伯(Albert 原名亚历山大·马丁Alexandre Martin, 人称工人阿尔伯 Ouvrier Albert 1815—1895)——法国工人，布朗基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是秘密革命团体的领导人之一；1848年二月革命时期领导巴黎工人的武装起义，临时政府成员，因参加1848年五月十五日事件被叛处有期徒刑，巴黎公社的积极战士。——85、87、100。

阿尔布雷希特三世，勇士(Albrecht III, der Beherzte 1443—1500)——萨克森公爵(1464—1500)；尼德兰总督，曾率军镇压1488—1493年尼德兰人民起义和1500年弗里斯兰农民起义。——258。

阿尔诺德(布雷西亚的)(Arnoldo da Brescia[Arnoldus Brixiensis] 1100前后—1155)——意大利教士和宗教改革家，1147—1155年是罗马共和国的领导人；被作为异教徒处死。——236—237。

阿尔塞尼乌斯，圣徒(Arsenius, the Saint 约354—450)——罗马贵族；基督教圣徒，隐居埃及荒漠。——561。

阿尔瓦公爵，费南多·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皮门特尔(Alba, Fernando Alvarez de Toledo y Pimentel, duque de 1507—1582)——西班牙统帅，1567—1573年为尼德兰总督，曾残酷镇压尼德兰人民起义。——278。

阿革西拉乌斯(Agesilaus 公元前444—361)——斯巴达王(公元前401—361)。——539。

阿莱(阿莱斯)，路易·皮埃尔·孔斯坦(Allais [Alais], Louis-Pierre-Constant 约生于1821年)——法国警探。——524、528、529。

阿礼国，拉瑟福德（Alcock, Sir Rutherford 1809—1897）——英国外交官，1844年起历任驻厦门、福州、上海、广州等埠领事，1859—1865年为驻日公使，1865—1871年为驻华公使。——610。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亚历克西斯）（Алексей Михаилович [Алексис] 1629—1676）——俄国沙皇（1645—1676）。——648。

埃尔瓦，夏尔德（Aylva, Sjard [Sjurd, Syaard] 死于1509年）——1500年弗里斯兰农民起义的领袖。——258。

埃伦伯勒伯爵，爱德华·罗（Ellenborough, Edward Law, Earl of 1790—1871）——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曾任印度总督（1842—1844），海军首席大臣（1846），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1858）；爱·罗·埃伦伯勒男爵的儿子。——670。

埃芒蒂耶（Hermentier）——631。

埃默森（Emerson）——646。

艾森胡特，安东（Eisenhut, Anton 死于1525年）——德国神父；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为克赖希高农民起义领袖之一。——293。

艾森曼，约翰·哥特弗里德（Eisenmann, Johann Gottfried 1795—1867）——德国医生和政论家，1848年是《德意志人民报》编辑；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后来属于左派。——360。

艾特尔·汉斯——见齐格尔米勒，艾特尔汉斯。

艾希霍恩，约翰·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Eichhorn, Johann Albrecht Friedrich 1779—1856）——普鲁士政治家，曾在施泰因和哈登堡内阁担任多种职务，积极参与关税同盟的建立，1840—1848年任宗教事务、教育和卫生大臣，同时为书报检查三大臣之一。——372。

爱尔维修，克劳德·阿德里安（Helvétius, Claude-Adrien 1715—1771）——法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论者，法国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137。

安东（Antoine[Anton] 1489—1544）——洛林公爵（1508—1544）；镇压1525年阿尔萨斯农民起义的策划者。——309。

安斯蒂，托马斯·奇泽姆（Anstey, Thomas Chisholm 1816—1873）——英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议会议员（1847—1852）；曾任香港首席检察官（1854—1859）。——657。

昂格勒斯，弗朗索瓦·厄内斯特（Anglès, François-Ernest 1807—1861）——法

国地主，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50—1851），秩序党的代表人物。——548。
昂利，波尔多公爵——见尚博尔伯爵，昂利·沙尔·斐迪南·玛丽·迪约多内·达尔图瓦，波尔多公爵（亨利五世）。
昂利第二（洛林的），吉斯公爵（Henri II de Lorraine, duc de Guise 1614—1664）——法国弗伦特党领导人。——576。
奥蒂莉娅——见圣奥迪莉娅。
奥尔良公爵——见路易-菲力浦一世（路易-菲力浦），奥尔良公爵。
奥尔良公爵夫人，埃莱娜·路易莎·伊丽莎白（Orléans, Hélène-Louise-Elisabeth, duchesse d' 父姓梅克伦堡-什未林 Mecklenburg-Schwerin 1814—1858）——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的长子斐迪南的遗孀，法国王位追求者巴黎伯爵的母亲。——149、482、511。
奥尔良王朝——法国王朝（1830—1848）。——117、126、132、150、489、498、540—541、543—544、561、566、575—576。
奥尔斯瓦尔德，鲁道夫·冯（Auerswald, Rudolf von 1795—1866）——普鲁士国务活动家，自由派贵族的代表，曾任首相兼外交大臣（1848年6—9月），普鲁士第一议院议长（1849—1850），不管大臣（1858—1862）；汉·阿·埃·冯·奥尔斯瓦尔德的弟弟。——68、424。
奥克兰伯爵，乔治·伊登（Auckland, George Eden, Earl of 1784—1849）——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曾多次担任内阁大臣，1836—1842年任印度总督。——661。
奥朗则布（Aurangzib 1618—1707）——印度大莫卧儿王朝的钵谛沙赫（1658—1707）。——678。
奥普尔侯爵，阿尔丰斯·昂利（Hautpoul, Alphonse-Henri, marquis d' 1789—1865）——法国将军，正统主义者，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49—1851），陆军部长（1849—1850）。——151、161、167、178、185—186、512、518、525—527。
奥赛男爵，沙尔·勒梅谢·德隆普雷（Haussez, Charles Lemercher de Longpré, baron d' 1778—1854）——法国政治活动家，曾任海军大臣（1829）。——168。

B

巴贝夫，格拉古（Babeuf, Gracchus 原名弗朗索瓦·诺埃尔 François-Noël 1760—

1797)——法国革命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1796年是平等派密谋的组织者;密谋失败后被处死。——62。

巴尔贝斯,西吉斯蒙·奥古斯特·阿尔芒(Barbès, Sigismond Auguste Armand 1809—1870)——法国革命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团体四季社的领导人之一;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因参加1848年五月十五日事件被判处无期徒刑,1854年遇赦;后流亡荷兰,不久即脱离政治活动。——125、169、579。

巴尔扎克,奥诺雷·德(Balzac, Honoré de 1799—1850)——法国现实主义作家。——577。

巴富尔,乔治(Balfour, Sir George 1809—1894)——英国外交官和军官;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任参谋,南京条约签订后,代表英国政府接受中国支付的赔款,曾任驻上海领事(1843—1846)。——631。

巴赫,瓦尔特(Bach, Walther)——德国雇佣兵,1525年是阿尔高农军的领袖。——300、302。

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创始人和理论家;1840年起侨居国外,曾参加德国1848—1849年革命;1849年因参与领导德累斯顿起义被判死刑,后改为终身监禁;1851年被引渡给沙皇政府,囚禁期间向沙皇写了《忏悔书》;1861年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往伦敦;1868年参加第一国际活动后,在国际内部组织秘密团体——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妄图夺取总委员会的领导权;由于进行分裂国际的阴谋活动,1872年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第一国际。——7、13、17、20、218、451。

巴拉盖·狄利埃伯爵,阿希尔(Baraguay d'Hilliers, Achille, comte 1795—1878)——法国将军,1854年起为元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1851年统率巴黎卫戍部队;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为波拿巴主义者,曾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53—1854),1854年指挥波罗的海的法国远征军;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任军长;1870年任巴黎武装力量总司令。——146、533—534、546。

巴黎伯爵——见路易-菲力浦-阿尔伯。

巴罗,卡米耶·亚桑特·奥迪隆(Barrot, Camille-Hyacinthe-Odilon 1791—1873)——法国政治家,七月王朝时期是自由主义的王朝反对派领袖之一;1848年12月—1849年10月任内阁总理,领导各个保皇集团的反革命联盟所支

持的内阁；1849年11月内阁辞职后脱离政治活动。——84、108、118—126、122、130、139—140、146、149、151、490—492、496、510—512、521、535、538、545、554。

巴罗什，皮埃尔·茹尔（Baroche, Pierre-Jules 1802—1870）——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法学家，七月王朝时期是自由主义的王朝反对派领袖之一，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秩序党的代表人物，波拿巴主义者；1849年为上诉法院的首席检察官；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以前和以后曾数度入阁。——169、518、529、533—535、538。

巴塞尔曼，弗里德里希·丹尼尔（Bassermann, Friedrich Daniel 1811—1855）——德国书商和政治家，温和的自由主义者，预备议会议员；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巴登政府驻联邦议会的代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427。

巴师夏，弗雷德里克（Bastiat, Frédéric 1801—1850）——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阶级调和论的代表人物。——81。

巴斯蒂德，茹尔（Bastide, Jules 1800—1879）——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资产阶级共和派报纸《国民报》的编辑（1836—1846）；1848年是制宪议会议员和外交部长（1848年5—12月）。——112。

巴托里伯爵，伊什特万（Báthory［Batory］, István, Graf 死于1530年）——匈牙利贵族；1514年率领军队镇压匈牙利的农民起义；匈牙利宫廷侍卫（1519—1530）。——268。

巴夏礼，斯密斯（Parkes, Harry Smith 1828—1885）——英国外交官；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任璞鼎查的秘书兼翻译，曾参加攻占镇江的战役；1856年任驻广州领事，制造亚罗号事件，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58）；英军窃踞广州后为驻广州的三个欧洲监察员之一（1858—1859）；1860年随额尔金北上，随同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焚毁圆明园；曾任驻上海领事（1863—1865）、驻日公使（1865—1883）和驻华公使兼驻朝鲜公使（1883—1885）。——619—620、645。

巴伊，让·西尔万（Bailly, Jean-Sylvain 1736—1793）——法国天文学家；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自由立宪资产阶级领袖之一；任巴黎市长期间（1789—1791）曾下令向马尔斯广场上的要求建立共和国的游行示威群众开枪射击（1791），因此在1793年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472。

巴兹，让·狄德埃（Baze, Jean-Didier 1800—1881）——法国律师和政治家，奥尔良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

544、557。

班特尔，汉斯（班特尔汉斯）（Bantel, Hans [Bantelhans]）——德国代廷根（符腾堡）市民，1514年是“穷康拉德”的领袖之一。——265。

包令，约翰（Bowring, John 1792—1872）——英国政治活动家、外交官、语言学家和文学家，边沁的信徒，自由贸易派，高级殖民官员，议会议员；1847—1852年任驻广州领事，1854—1857年继文翰任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和中国商务监督，极力主张对中国进行侵略；1856年10月借口亚罗号事件，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620。

保尔，约翰（Ball, John 死于1381年）——英国神父，英国1381年农民起义的左翼思想家和领导人。——236、238。

贝多，玛丽·阿尔丰斯（Bedeau, Marie-Alphonse 1804—1863）——法国将军和政治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30—4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副议长（1848—1851），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逃离，1859年回国。——497、534。

贝尔纳（Bernard）——法国上校，镇压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的军事委员会主席；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是对反拿破仑第三的共和派的审判的组织者之一。——488。

贝克拉特，海尔曼·冯（Beckerath, Hermann von 1801—1870）——德国银行家，莱茵省自由派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1848年8—9月任帝国政府的财政大臣；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49—1852）和爱尔福特议会议员（1850）；支持普鲁士的联盟政策。——68。

贝里耶，皮埃尔·安东（Berryer, Pierre-Antoine 1790—1868）——法国律师和政治家，七月王朝时期是正统主义反对派领袖，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150、500、517、536、543、545、547、550。

贝列拉，雅克·埃米尔（Péreire, Jacques-Émile 1800—1875）——法国银行家，20—30年代为圣西门主义者，第二帝国时期为波拿巴主义者，立法团议员；1852年与其弟伊·贝列拉创办股份银行动产信用公司。——585。

贝列拉，伊萨克（Péreire, Isaac 1806—1880）——法国银行家，20—30年代为圣西门主义者，第二帝国时期为波拿巴主义者，立法团议员；1852年与其兄埃·贝列拉一起创办股份银行动产信用公司；写有信贷方面的著作。——583—585。

贝林，汉斯（Berlin, Hans 死于1560年前后）——海尔布隆公证人和司法代理人；

1525年农民起义时是农军营寨中海尔布隆市代表，内卡河谷—奥登林山农军的农军代表，温和的“阿莫巴赫声明”的倡导者之一，同汉·贝林市长同宗。——294。

贝林，汉斯（Berlin, Hans）——海尔布隆市政会成员和市长；1525年伯布林根农民起义失败后试图从士瓦本联盟统帅那里得到一支军队，占领海尔布隆。——286。

贝姆，约瑟夫（Bem, Józef 1794—1850）——波兰将军，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1830—1831年起义的领导人；1848年维也纳十月起义的参加者；1849年是匈牙利革命军领导人；革命失败后避难土耳其，入伊斯兰教，被苏丹封为穆拉德帕沙，任土耳其军队指挥官。——417。

贝努瓦·达济伯爵，德尼（Benoist[Benoît]d'Azy, Denis, comte 1796—1880）——法国政治家、金融家和工业家；正统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副议长（1849—1851）。——538、543。

比约，奥古斯特·阿道夫·玛丽（Billault, Auguste-Adolphe-Marie 1805—1863）——法国政治家，律师，奥尔良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1849）；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成为波拿巴主义者；曾任内务大臣（1854—1858和1859—1860）。——538。

俾斯麦公爵，奥托（Bismarck[Bismark], Otto Fürst von 1815—1898）——普鲁士和德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普鲁士容克的代表；曾任驻彼得堡大使（1859—1862）和驻巴黎大使（1862），普鲁士首相（1862—1872和1873—1890），北德意志联邦首相（1867—1871）和德意志帝国首相（1871—1890）；1870年发动普法战争，1871年支持法国资产阶级镇压巴黎公社；主张以“自上而下”的方法实现德国的统一；曾采取一系列内政措施，以保证容克和大资产阶级的联盟；1878年颁布反社会党人非常法。——24。

毕若·德·拉·比贡利，托马·罗伯尔（Bugeaud de la Piconnerie, Thomas-Robert 1784—1849）——法国元帅，奥尔良党人，七月王朝时期是众议院议员；在比利牛斯半岛战争期间（1808—1814）指挥法军分队，以后曾指挥军队镇压1834年巴黎共和派的起义；侵略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战争的策划者之一，1841—1847年为阿尔及利亚总督，1848—1849年为阿尔卑斯山部队的总司令，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48—1849）。——120。

毕希纳，路德维希（Büchner, Ludwig 1824—1899）——德国医生和哲学家，庸俗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代表人物；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属于小

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左翼，国际洛桑代表大会代表(1867)。——601。
庇护九世(Pius IX [Pio Nono] 世俗名乔万尼·马里亚·马斯塔伊-费雷蒂 Giovanni Maria Mastai-Ferretti 1792—1878)——罗马教皇(1846—1878)。——511。
波尔多公爵——见尚博尔伯爵，昂利·沙尔·斐迪南·玛丽·迪约多内·达尔图瓦，波尔多公爵(亨利五世)。
波林尼雅克亲王，茹尔·奥古斯特·阿尔芒·玛丽(Polignac, Jules-Auguste-Armand-Marie, prince de 1780—1847)——法国国务活动家，正统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曾任外交大臣和首相(1829—1830)。——545。
波拿巴，拿破仑·约瑟夫·沙尔·保尔，拿破仑亲王(Bonaparte, Napoléon-Joseph-Charles-Paul, prince Napoléon又名日罗姆Jérôme, 绰号普隆-普隆1822—1891)——法国政治家，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1854年在克里木指挥一个师，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任军长，普法战争初期曾参加关于法意反普同盟的谈判，日·波拿巴的儿子，拿破仑第三的堂弟，其兄死后(1847)改名日罗姆。——150。
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一。
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三。
波拿巴王朝——法国皇朝(1804—1814、1815和1852—1870)。——473、566—568。
波旁王朝——法国王朝(1589—1792、1814—1815和1815—1830)。——132、150、489、498、540—541、543—544、566。
伯恩斯，亚历山大(Burnes, Alexander 1805—1841)——英国军官，英国在中亚进行殖民扩张的策划者之一；1836—1838年在喀布尔执行特殊使命，1839—1841年任喀布尔英军司令部顾问，1841年喀布尔发生起义时被杀。——661—662。
伯恩斯，詹姆斯(Burnes, James 1801—1862)——英国医生，亚·伯恩斯的哥哥。——661。
伯海姆，汉斯(Böheim, Hans 人称吹鼓手小汉斯 Pauker, Pfeiferhänslein 死于1476年)——德国传教士、牧人和乡村音乐家，1476年在陶伯河谷传教，发动农民运动；后被维尔茨堡主教俘虏并作为异教徒被烧死。——255—258。
伯利欣根，葛兹·冯(Berlichingen, Götz von 1480—1562)——德国骑士，1525年参加农民起义，任内卡河谷—奥登林山雇佣军支队的步兵上校，在柯尼斯霍芬决战时出卖了农民；歌德的同名剧本和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

根》中的葛兹·冯·伯利欣根的原型。——284—286、295、296。

柏拉图(Platon[Plato] 约公元前427—347)——古希腊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自然经济的拥护者。——114。

勃朗,路易(Blanc, Louis 1811—1882)——法国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1848年临时政府成员和卢森堡宫委员会主席;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1848年8月流亡英国,后为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协会的领导人;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反对巴黎公社。——65、85、87、91、96、98、100、108、121、134、168、352、470。

勃鲁姆,罗伯特(Blum, Robert 1807—1848)——德国新闻工作者和出版商,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预备议会副议长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为左派领袖之一;1848年维也纳十月起义的参加者,在反革命军队占领维也纳后被杀害。——422、423、432。

博马舍,皮埃尔·奥古斯坦·卡龙·德(Beaumarchais, Pierre-Augustin Caron de 1732—1799)——法国剧作家。——125。

博纳尔德子爵,路易·加布里埃尔·昂布鲁瓦兹(Bonald, Louis-Gabriel-Ambroise, vicomte de 1754—1840)——法国政治家和政论家,保皇派,复辟时期的贵族和教权主义反动派的思想家。——363。

薄伽丘,乔万尼(Boccaccio, Giovanni 1313—1375)——意大利诗人和人文主义者,《十日谈》的作者。——237。

跛帖木儿——见帖木儿(跛帖木儿)。

不伦瑞克公爵,卡尔-威廉-斐迪南(Braunschweig, Karl Wilhelm Ferdinand Herzog von 1735—1806)——普鲁士将军,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792—1794)任普奥联军总司令,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任司令,在耶拿会战和奥尔施泰特会战(1806)中战败。——320。

布阿吉尔贝尔,皮埃尔·勒珀桑(Boisguillebert, Pierre Le Pesant 1646—1714)——法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重农学派的先驱,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写有《法国详情》和其他经济学著作。——157。

布尔布隆,阿尔丰斯·德(Bourboulon, Alphonse de 生于1809年)——法国外交官,驻华公使(1851、1852—1857和1859—1862);1853年曾访问太平天国的国都天京(南京),试探太平军的对外政策。——654—655、664。

布尔沃,威廉·亨利·利顿·厄尔(Bulwer, William Herny Lytton Earle 1801—1872)——英国外交家,议会议员(1830—1837),辉格党人;1839年和1840年

任英国驻巴黎代办，后任驻马德里公使(1843—1848)、驻华盛顿大使(1849—1852)、驻佛罗伦萨大使(1852—1855)、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58—1865)。——659。

布莱克特，约翰·芬威克·伯戈因(Blackett, John Fenwick Burgoyne 1821—1856)——英国议会议员。——677。

布莱特，约翰(Bright, John 1811—1889)——英国政治家，棉纺厂主，自由贸易派领袖和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60年代初起为自由党(资产阶级激进派)左翼领袖；曾多次任自由党内阁的大臣。——154、207。

布赖滕施泰因，塞巴斯蒂安·冯(Breitenstein, Sebastian von 1464—1535)——肯普滕修道院院长(1523—1535)。——279、315。

布朗基，路易·奥古斯特(Blanqui, Louis-Auguste 1805—1881)——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主张通过密谋性组织用暴力夺取政权和建立革命专政；许多秘密社团和密谋活动的组织者，1830年七月革命和1848年二月革命的参加者，秘密的四季社的领导人，1839年五月十二日起义的组织者，同年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法国无产阶级运动的领袖；巴黎1870年十月三十一日起义的领导人，巴黎公社时期被反动派囚禁在凡尔赛，曾缺席当选为公社委员；一生中有36年在狱中度过。——98、125、166、168—169、477、562、579。

布雷亚，让·巴蒂斯特·菲德尔(Bréa, Jean-Baptiste-Fidèle 1790—1848)——法国将军，参与镇压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被起义者击毙。——134。

布里斯曼，约翰奈斯(Briesmann, Johannes 1488—1549)——东普鲁士的宗教改革家，柯尼斯堡大学的创建人之一。——252。

布利丹，让(Buridan, Jean 1300前后—1358以后)——法国哲学家，唯名论者；认为意志自由特别是选择自由的问题在逻辑上是不可解决的；据说他讲了一个驴子的故事：一头驴子在两个完全相同的草堆之间，无法进行选择，结果只好饿死。“布利丹的驴子”就成了一句俗话。——556。

布鲁土斯(马可·尤尼乌斯·布鲁土斯)(Marcus Junius Brutus 公元前85—42)——罗马国务活动家，贵族共和派密谋反对凯撒的策划者之一。——471。

布伦坦诺，洛伦茨·彼得·卡尔(Brentano, Lorenz Peter Karl 1813—1891)——德国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领导巴登临时政府，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1850年迁居美国；1878年起为美国国会议员。——452、470。

布罗伊公爵，阿希尔·沙尔·莱昂斯·维克多(Broglie, Achille-Charles-Léonce-Victor, duc de 1785—1870)——法国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内阁首相(1835—1836)，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49—1851)。——517、545。
布绍特，让·巴蒂斯特·诺埃尔(Bouchotte, Jean-Baptiste-Noël 1754—1840)——法国将军；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雅各宾党人，曾任陆军部长(1793—1794)。——324、343。

C

查基，米克洛什(Csáky [Csakyi], Mikloš 1465—1514)——匈牙利神学家，乔纳德主教(1500—1514)，1514年匈牙利农民起义时被起义者所杀。——268。
查理-阿尔伯特(Carlo Alberto [Charles-Albert, Karl Albert] 1798—1849)——撒丁和皮埃蒙特国王(1831—1849)。——130、326。
查理大帝——见查理一世，查理大帝。
查理一世，查理大帝(Charles I, Charlemagne 742—814)——法兰克国王(768—800)和皇帝(800—814)。——396。
查理五世(Karl V 1500—1558)——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19—1556)，称查理五世；曾为西班牙国王(1516—1556)，称查理一世；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查理五世的原型。——293。
查理十世(Charles X 1757—1836)——法国国王(1824—1830)，被1830年的七月革命赶下王位。——168。
查普曼，约翰(Chapman, John 1801—1854)——英国政论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赞同在印度实行改革；《印度的棉花和贸易》一书作者。——688。
查苏利奇，维拉·伊万诺夫娜(Засулич, Вера Ивановна 1851—1919)——俄国民粹运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活动家，劳动解放社(1883)的创始人之一；后来转到孟什维克立场。——13、17。
吹鼓手小汉斯——见伯海姆，汉斯。

D

达尔曼，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Dahlmann, Friedrich Christoph 1785—1860)——德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主义者，1829年起为格丁根大学教授，“格丁根七贤”之一，因拒绝宣誓效忠而被赶出格丁根，1842年被聘为波恩大学教授，1848—1849年为预备议会议员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

中间派右翼，1850年为爱尔福特议会议员，后脱离政治活动；写有丹麦、德国、英国和法国史方面的著作。——370。

达尔文，查理·罗伯特(Darwin, Charles Robert 1809—1882)——英国自然科学家，科学的生物进化论的奠基人。——9、14。

达拉什，阿尔伯特(Darasz, Albert 1808—1852)——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1830—1831年起义的参加者，波兰流亡者民主组织的领导成员，伦敦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委员。——470。

大利，彼得(Ailly, Pierre d'1350—1420)——法国传教士，神学家，红衣主教(1410年起)，康斯坦茨宗教会议的重要人物。——574。

大莫卧儿王朝——见莫卧儿王朝。

戴斯特，让·巴蒂斯特(Teste, Jean-Baptiste 1780—1852)——法国律师和国务活动家，奥尔良党人，历任七月王朝时期商业大臣、司法大臣和公共工程大臣，因贪污舞弊被送交法庭审判(1847)。——155。

丹东，若尔日·雅克(Danton, Georges-Jacques 1759—1794)——法国政治家和法学家，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派的右翼领袖。——446、470、471。

但丁·阿利格埃里(Dante Alighieri 1265—1321)——意大利诗人。——26、594。

道光(1782—1850)——中国清朝皇帝(1821—1850)。——608、645。

德·梅斯特尔——见梅斯特尔(德·梅斯特尔)伯爵，约瑟夫·玛丽。

德比伯爵，爱德华·乔治·杰弗里·斯密斯·斯坦利，(比克斯塔夫的)斯坦利勋爵(Derby, Edward George Geoffrey Smith Stanley, Lord Stanley of Bickerstaffe, Earl of 1799—1869)——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领袖，19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曾任殖民大臣和陆军大臣(1833—1834和1841—1845)，内阁首相(1852、1858—1859和1866—1868)。——658、659、661、670。

德弗洛特——见弗洛特(德弗洛特)，保尔·路易·弗朗索瓦·勒奈·德。

德福塞，罗曼·约瑟夫(Desfossés, Romain-Joseph 1798—1864)——法国海军上将，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49—1851)，1849年11月—1851年1月任海军部长。——532、533。

德洛姆(洛姆，德)，让·路易(Delolme[Lolme, de], Jean-Louis 1741—1806)——瑞士法学家和作家，立宪君主制的辩护士。——68。

德穆兰，吕西·西姆普利斯·卡米耶·贝努瓦(Desmoulins, Lucie-Simplice-Camille-Benoist 1760—1794)——法国法学家和新闻工作者，18世纪末法国

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右翼雅各宾党人。——471。

狄金逊，约翰(Dickinson, John 1815—1876)——英国政论家，自由贸易论者；东印度改革促进协会创始人之一；写有关于印度的著作。——687。

狄摩西尼(Demosthenes 公元前384—322)——古希腊政治家和演说家，雅典的反马其顿派的领袖，奴隶主民主制的拥护者；雅典同盟反马其顿战争失败后(公元前338)被驱逐出雅典。——150。

迪斯累里，本杰明，比肯斯菲尔德伯爵(Disraeli [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英国政治活动家和著作家，40年代参加"青年英国"；托利党领袖，19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8—1859和1866—1868)，内阁首相(1868和1874—1880)。——667、668。

迪特里希施坦男爵，西格蒙德(Dietrichstein, Sigmund Freiherr von 1484—1540)——施蒂里亚总督，帝国军事长官，曾镇压1515—1516年阿尔卑斯山区的农民起义；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是施蒂里亚陆军指挥官，7月3日在施拉德明被击败，农民战争行将结束时在韦尔芬被起义军捕获，后被释放。——269、311、312。

蒂雷纳子爵，昂利·德拉图尔·多韦尔尼(Turenne, Henri de la Tour d'Auvergne, vicomte de 1611—1675)——法国将军，三十年战争时期任法军统帅。——336。

杜班，安德烈·玛丽·让·雅克(Dupin, André-Marie-Jean-Jacques 人称大杜班 Dupin aîné 1783—1865)——法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众议院议长(1832—1839)，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1849)和立法议会议长(1849—1851)；后为波拿巴主义者。——178、524、528、529。

杜邦·德勒尔，雅克·沙尔(Dupont de l'Eure, Jacques-Charles 1767—1855)——法国政治家，自由主义者；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830年革命的参加者；1830年以前是烧炭党领导成员；40年代是王朝反对派的代表人物，接近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1848年为临时政府主席，后为国民议会议员。——85。

杜弗尔，茹尔·阿尔芒·斯塔尼斯拉斯(Dufaure, Jules-Armand-Stanislas 1798—1881)——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曾任社会公共工程大臣(1839—1840)，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卡芬雅克政府的内务部长(1848年10—12月)和波拿巴政府的内务部长(1849年6—10月)；第三共和国时期任司法部长，内阁总理。——114、117、155。

杜克莱尔，沙尔·泰奥多尔·欧仁(Duclerc, Charles-Théodore-Eugène 1812—

1888)——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国民报》编辑(1840—1846),财政部长(1848年5—6月);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48—1849),动产信用公司董事会成员,国民议会副议长(1875),内阁总理兼外交部长(1882年8月—1883年1月)。——128。

杜木里埃,沙尔·弗朗索瓦(Dumouriez[Dümouriez], Charles-François 1739—1823)——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法国革命时期是吉伦特党人;曾任外交部长、北部革命军队指挥官(1792—1793);1793年3月背叛法兰西共和国。——320—321。

杜普拉,帕斯卡尔(Duprat, Pascal 1815—1885)——法国政治家和新闻工作者,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反对路易·波拿巴的政府;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530—531。

杜沙特尔伯爵,沙尔·玛丽·汤讷吉(Duchâter, Charles-Marie-Tanneguy, comte 1803—1867)——法国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曾任商业大臣(1834—1836)和内务大臣(1839—1840和1840—1848年2月)。——544。

杜山-路维杜尔——见路维杜尔(杜山-路维杜尔),弗朗索瓦·多米尼克。

敦克尔,弗兰茨·古斯塔夫(Duncker, Franz Gustav 1822—1888)——德国出版商,资产阶级进步党的活动家,1868年同麦·希尔施一起创建改良主义工会(1868—1933),人称希尔施—敦克尔工会。——595。

多布尔霍夫-迪尔男爵,安东(Doblhoff-Dier, Anton Freiherr von 1800—1872)——奥地利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自由派,1848年任贸易大臣(5月)和内务大臣(7—10月)。——412。

多斯特-穆罕默德汗(Dost-Muhammad Khan[Dost-Mahomed] 1793—1863)——阿富汗埃米尔(1826—1839和1842—1863)。——660—662。

多扎,盖尔盖伊(Dózsa [Dosa], Gergely 1470前后—1514)——特兰西瓦尼亚的下层贵族,马扎尔人;在希腊反抗土耳其的战争中任军官;1514年是匈牙利农民起义的领袖;起义失败后遭受贵族的酷刑致死。——267—268。

多扎,格雷戈尔(Dózsa, Gregor 死于1514年)——特兰西瓦尼亚的下层贵族,1514年匈牙利农民起义的领袖;起义失败后与其兄盖·多扎一起被处死。——268。

E

额尔金伯爵,詹姆斯·普鲁斯(Elgin, James Bruce, Earl of 1811—1863)——英

国外交官，作为特命全权代表出使中国（1857—1858和1860—1861），印度总督（1862—1863）。——651、656—657、665、667—670、672、675。
恩斯特第二（Ernst II 1464—1513）——德国神学家，马格德堡大主教（1476—1513）。——245。

F

法卢伯爵，弗雷德里克·阿尔弗勒德·皮埃尔（Falloux, Frédéric-Alfred-Pierre, comte de 1811—1886）——法国政治家和著作家，正统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1848年解散国家工场的策划者和镇压巴黎六月起义的鼓吹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曾任教育和宗教部长（1848—1849）。——119、129、140、151、496、510、511、545、547。
范斯特劳本齐，查理·托马斯（Van Straubenzee, Charles Thomas 1812—1892）——英国将军，1855—1856年在克里木战争中任英军一个旅的指挥官，1857—1858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任英军指挥官。——645。
菲力浦第二，奥尔良公爵（Philippe II, duc d'Orléans 1674—1723）——法国摄政王（1715—1723）。——587。
菲力浦一世（Philipp I 1479—1533）——巴登封疆伯爵；1514年镇压鞋会暴动的策划者之一，1525年参与镇压德国南部的农民起义；曾任帝国政府的总督（1524—1527）。——267。
菲力浦一世，仁者（Philipp I, der Großmütige 1504—1567）——黑森邦伯，曾参加镇压1522年的骑士起义，镇压1525年图林根农民起义的策划者。——275、306—307、315。
斐迪南多二世，斐迪南二世（Ferdinando II, Ferdinand II, 绰号炮弹国王 King Bomba 1810—1859）——双西西里王国国王（1830—1859）。——406。
斐迪南一世（Ferdinand I 1503—1564）——奥地利大公，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56—1564）。——278、287、300、301、311—313。
斐迪南一世（Ferdinand I 1793—1875）——奥地利皇帝（1835—1848）。——411、412、422。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Feuerbach, Ludwig 1804—1872）——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600—601。
费尔巴哈尔，马特恩（Feuerbacher, Matern 约1485—1567）——德国店主，博特瓦尔（符腾堡）市政会成员，市民反对派领袖；1525年领导符腾堡起义农民

和市民的华美基督教农军；起义失败后是唯一被释放(1527)的起义军首领。——288、289、292。

费里埃，弗朗索瓦·路易·奥古斯特(Ferrier, François-Louis-Auguste 1777—1861)——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保护关税制度的拥护者和重商主义的模仿者，国家官员。——596。

芬尼斯，托马斯·奎斯特德(Finnis, Thomas Quested)——伦敦市长(1856—1857)。——618。

弗兰茨一世(Franz I 1768—1835)——奥地利皇帝(1804—1835)，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92—1806)，称弗兰茨二世。——378、381。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Franz-Joseph I 1830—1916)——奥地利皇帝(1848—1916)。——431。

弗兰格尔伯爵，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恩斯特(Wrangel, Friedrich Heinrich Ernst Graf von 1784—1877)——普鲁士将军，1848年11月参加普鲁士反革命政变，驱散普鲁士国民议会；1856年起任陆军元帅；丹麦战争时期(1864)任普奥联军总司令。——425、426。

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 1494—1547)——法国国王(1515—1547)。——277。

弗里茨，约斯(Fritz, Joß 死于1525年前后)——1513年莱茵河上游地区鞋会的组织者。——261—264、269—270。

弗里茨——见弗里德里希二世，弗里德里希大帝。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二世(Friedrich August II 1797—1854)——萨克森国王(1836—1854)。——445。

弗里德里希二世，弗里德里希大帝(Friedrich II, Friedrich der Große 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325、330、331、336。

弗里德里希三世，贤人(Friedrich III der Weise 1463—1525)——萨克森选帝侯(1486—1525)；维滕贝格大学的创建人之一，路德在瓦尔特堡的保护人(1521—1522)。——241。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Friedrich-Wilhelm II 1744—1797)——普鲁士国王(1786—1797)。——320。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Wilhelm III 1770—1840)——普鲁士国王(1797—1840)。——363。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Wilhelm IV 1795—1861)——普鲁士国王(1840—1861)。——68、363、364、372、382、425、431、438、440。

弗里德里希-威廉-斐迪南——见不伦瑞克公爵，卡尔-威廉-斐迪南。

弗伦茨贝格，格奥尔格·冯(Frundsberg, Georg von 1473—1528)——日耳曼军人，哈布斯堡王室的忠实臣仆，1525年帕维亚会战的指挥官；1525年受士瓦本联盟的委托镇压阿尔高和萨尔茨堡大主教区的农民起义。——302、312。

弗洛孔，斐迪南(Flocon, Ferdinand 1800—1866)——法国政治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改革报》编辑，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山岳党人；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逐出法国。——85。

弗洛里安——见格赖泽尔，弗洛里安。

弗洛特(德弗洛特)，保尔·路易·弗朗索瓦·勒奈·德(Flotte[Deflotte], Paul-Louis-François-René de 1817—1860)——法国海军军官，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巴黎1848年五月十五日事件和六月起义的参加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50—1851)，1860年参加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的进军。——168、169、517。

伏尔泰(Voltaire 原名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 François-Marie Arouet 1694—1778)——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作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148、165、513。

福尔讷，安东(Forner, Anton)——讷德林根(法兰克尼亚)帝国直辖市市长；1525年4月参加农民起义并领导城市平民。——283。

福格特，卡尔(Vogt, Karl 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唯物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6月为帝国五摄政之一；1849年逃往瑞士，50—60年代是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447、601。

福禄培尔，尤利乌斯(Fröbel[Froebel], Julius 1805—1893)——德国自然科学家，政论家和进步书籍出版者，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1843年底—1844年同马克思有密切联系；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德意志民主协会中央委员会委员；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1857年回到欧洲，为奥地利政府撰写时评。——422。

福适，莱昂(Faucher, Léon 1803—1854)——法国政治家、政论家和经济学家，奥尔良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内务部长(1848年12月—1849年5月和1851年)。——80、119、125、127、518、538、544。

傅立叶，沙尔(Fourier, Charles 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13、

21、62、64、218、368、584。
富尔德，阿希尔(Fould, Achille 1800—1867)——法国银行家和政治家，奥尔良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1849)，曾任财政部长(1849—1851)，财政大臣(1861—1867)，国务大臣和皇廷事务大臣(1852—1860)。——94、111、123、152、155—156、512、532、534、538、547。
富基埃-坦维尔，安东·康坦(Fouquier-Tinville, Antoine-Quentin 1746—1795)——法国法学家，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1793年任革命法庭的公诉人。——131。
富歇，约瑟夫(Fouché, Joseph 1759—1820)——法国政治家和警官，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党人，拿破仑第一内阁的警务大臣，以毫无原则著称。——162。

G

盖尔，弗洛里安(Geyer, Florian 1490前后—1525)——法兰克尼亚骑士，站在起义农民一边，曾促使许多法兰克尼亚城市同起义军缔结盟约，他的军事经验被记入陶伯河谷农民起义军的《奥克森弗特军事条例》；农民起义失败后被处死。——284—286、295、297、298。
盖尔马尼库斯(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盖尔马尼库斯)(卡利古拉)(Gaius Julius Caesar Germanicus[Caligula] 12—41)——罗马皇帝(37—41)。——492。
盖尔温努斯，格奥尔格·哥特弗里德(Gervinus, Georg Gottfried 1805—1871)——德国历史编纂学家和文学史家，自由派；1844年起为海德堡大学教授，1847—1848年10月是《德意志报》的编辑，1848年是预备议会议员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371。
盖斯迈尔，米夏埃尔(Gaismair[Geismaier], Michael 1490前后—1532)——蒂罗尔行政长官的秘书，布里克森主教的书记员；1525—1526年阿尔卑斯山区农民起义的左翼领导人；《蒂罗尔邦法》的起草人，设想建立一个农民和矿工的国家；1532年被奥地利大公的亲信所谋杀。——311—314。
戈尔盖，阿尔图尔(Görgey, Arthur 1818—1916)——匈牙利将军，匈牙利军队总司令(1849年4—6月)；曾依靠反动军官和资产阶级中的反革命派，背叛匈牙利革命，率领所属部队向沙皇军队投降。——420。

歌德，约翰·沃尔弗冈·冯(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1749—1832)——德国诗人、作家、思想家和博物学家。——475、683、684。

格奥尔格，大胡子(Georg der Bärtige 1471—1539)——萨克森公爵(1500—1539)；宗教改革的反对者；镇压图林根农民起义的策划者之一，弗兰肯豪森会战的参加者。——251。

格茨，克里斯蒂安(Götz, Christian 1783—1849)——奥地利陆军少将；曾参加镇压1848—1849年意大利和匈牙利的革命。——326。

格尔伯，埃拉斯穆斯(Gerber, Erasmus 死于1525年)——德国手工业者；1525年阿尔萨斯农民起义的领袖之一；察伯恩会战失败后被俘并被处死。——309。

格尔伯，托伊斯(Gerber, Theus 原名马丁·安格勒 Martin Angerer 约死于1541年)——德国制革工人；斯图加特市民军(1525年同费尔巴哈尔的符腾堡起义军合并)的领袖，起义失败后逃往埃斯林根。——289、292。

格拉古(盖尤斯·赛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Gaius Sempronius Gracchus 公元前153—121)——古罗马的护民官(公元前123—122)，曾为农民利益进行争取实现土地法的斗争；提比里乌斯·赛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的弟弟。——471。

格拉古(提比里乌斯·赛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 公元前162—133)——古罗马的护民官(公元前133)，曾为农民利益进行争取实现土地法的斗争；盖尤斯·赛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的哥哥。——471。

格莱斯顿，威廉·尤尔特(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19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5和1859—1866)和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和1892—1894)。——657。

格赖泽尔，弗洛里安(Greisel, Florian 人称弗洛里安神父 Pfaffe Florian)——艾希施泰滕(符腾堡)的教士，1525年士瓦本农民起义的领袖。——290。

格朗丹，维克多(Grandin, Victor 1797—1849)——法国工厂主，保守派政治家，众议院议员(1839—1848)；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49)。——80。

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贝尔纳·阿道夫(Granier de Cassagnac, Bernard-Adolphe 1806—1880)——法国新闻工作者，1848年革命前是奥尔良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帝国时期是立法团议员(1852—1870)；曾为《立宪主义者报》撰稿，50年代为《国家报》主编。——179、577。

格雷贝尔，康拉德(Grebel, Konrad 1489—1526)——瑞士再洗礼派的创始人，闵采尔的信徒，曾在德国南部进行革命宣传。——253。

格雷戈尔(布格贝恩海姆的)(Gregor von Burgbernheim[Burg-Bernheim])——1525年安斯巴赫农民起义军的领袖。——297。

格律恩，卡尔(Grün, Karl 笔名恩斯特·冯·德尔·海德 Ernst von der Haide 1817—1887)——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接近青年德意志和青年黑格尔派，40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普鲁士制宪议会议员(1848)，属于左翼，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49)；1851年起流亡比利时，1861年回到德国，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高等商业工艺学校任艺术史、文学史和哲学史教授(1862—1865)；1870年到维也纳；1874年出版路·费尔巴哈的书信集和遗著。——60。

葛兹——见伯利欣根，葛兹·冯。

贡斯当·德勒贝克，昂利·本杰明(Constant de Rebecque, Henri Benjamin 1767—1830)——法国政治家、政论家和著作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反民主主义流派的代表，法国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观点的反对者；曾从事国家法问题的研究。——471—472。

古德肖，米歇尔(Goudchaux, Michel 1797—1862)——法国银行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48年为临时政府的财政部长，50年代为反对波拿巴主义政体的共和党反对派领袖之一。——108。

古格尔，巴斯蒂安(古格尔-巴斯蒂安)(Gugel, Bastian [Gugel-Bastian] 死于1514年)——巴登农民起义(1514)的领袖之一。——267。

H

哈伯恩，威廉·冯(Habern, Wilhelm von)——普法尔茨选帝侯路德维希的元帅，1525年镇压普法尔茨农民起义的贵族军队首领。——287、300。

哈德菲尔德，乔治(Hadfield, George 1787—1879)——英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议会议员。——661。

哈克斯特豪森男爵，奥古斯特·弗兰茨(Haxthausen, August Franz Freiherr von 1792—1866)——普鲁士官员和作家，联合议会议员(1847—1848)，后为普鲁士第一议院议员；写有描述普鲁士和俄国土地关系中当时还残存的土地公社所有制方面的著作。——31。

哈尼，乔治·朱利安(Harney, George Julian 1817—1897)——英国工人运动活

动家，宪章派左翼领袖；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民主派兄弟协会创建人之一，《北极星报》编辑，《民主评论》、《人民之友》、《红色共和党人》等宪章派刊物的出版者；1862—1888年曾数度住在美国；国际会员；曾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好联系；50年代初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接近，一度同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疏远。——11。

海尔维格，格奥尔格（Herwegh, Georg 1817—1875）——德国诗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2年起成为马克思的朋友，《莱茵报》等多家报刊的撰稿人；1848年二月革命后是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领导人，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组织者之一；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后长期流亡瑞士；1869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党员。——150。

海瑙男爵，尤利乌斯·雅科布（Haynau, Julius Jakob Freiherr von 1786—1853）——奥地利将军，1848年镇压意大利的革命；曾任镇压匈牙利革命的奥地利军队总司令（1849）。——148、399。

海涅，亨利希（Heine, Heinrich 1797—1856）——德国诗人，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马克思一家的亲密朋友。——395、404。

海特男爵，奥古斯特（Heydt, August Freiherr von der 1801—1874）——普鲁士银行家、政治活动家，曾任商业、工业和公共工程大臣（1848年12月—1862年）和财政大臣（1862、1866—1869）；1849年为第二议院议员。——72。

汉普敦，约翰（Hampden, John 1594—1643）——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夜反对专制独裁，革命斗争的参加者，在国内战争中牺牲。——425。

汉特，弗里曼（Hunt, Freeman 1804—1858）——美国政论家，《商人杂志和商业评论》的出版者。——630。

汉泽曼，大卫·尤斯图斯·路德维希（Hansemann, David Justus Ludwig 1790—1864）——德国政治家和银行家，莱茵省自由派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普鲁士制宪议会议员，财政大臣（1848年3—9月）。——72—73、387、394、399、424。

贺布，詹姆斯（Hope, James 1808—1881）——英国海军将领，1859—1860年率领远征舰队侵略中国。——654—655、663。

赫尔岑，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Герцен,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12—1870）——俄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政论家和作家，革命民主主义者，1847年流亡法国，1852年移居伦敦，在英国建立“自由俄国印刷所”，并出版《北极星》定期文集和《钟声》报。——13。

黑尔芬施太因伯爵,路德维希(Helfenstein, Ludwig Graf von 1480前后—1525)——奥地利贵族,魏恩斯贝格(符腾堡)地方长官,以残酷无情地对待农民而著称,1525年农民起义中被处死;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女婿。——284—285、295。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217、247、361、362、470、591、593、596、600—603、607。

亨利,约瑟夫·沃讷(Henley, Joseph Warner 1793—1884)——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商业和交通大臣(1852和1858—1859)。——651。

亨利五世——见尚博尔伯爵,昂利·沙尔·斐迪南·玛丽·迪约多内·达尔图瓦,波尔多公爵(亨利五世)。

亨利六世(Henry VI 1421—1471)——英国国王(1422—1461)。——541。

亨利希七十二世(Heinrich LXXII 1797—1853)——德国一小邦幼系(罗伊斯-洛本施泰因-埃伯斯多夫)的领主王公(1822—1848)。——435。

亨讷贝格伯爵,约翰(Henneberg, Johann Graf von)——德国僧侣,富尔达修道院院长(1521—1541)。——306、315。

洪施太因伯爵,威廉(Honstein, Wilhelm Graf von 1470前后—1541)——德国法学家,曾一度任弗赖堡(布赖斯高)大学校长;1506年起为斯特拉斯堡大主教,称威廉三世,1524年为美因茨地方长官;1525年镇压农民起义的参加者。——299。

洪秀全(1814—1864)——627。

胡布迈尔,巴尔塔扎尔(Hubmaier, Balthasar 1480前后—1528)——德国神学家,教士,后为再洗礼派教徒;闵采尔的拥护者;曾在瓦尔茨胡特传教(1524—1525),在教区和起义农民之间建立联系;后作为浸礼派的领袖在维也纳被烧死。——253、276。

胡登,弗罗文·冯(Hutten, Frowin von)——德国骑士,1522—1523年反对特里尔大主教骑士起义的参加者,1525年是士瓦本联盟的陆军上校,参加镇压农民起义;乌·冯·胡登的堂兄弟。——299。

胡登,乌尔里希·冯(Hutten, Ulrich von 1488—1523)——德国诗人和政论家,人文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宗教改革的拥护者,德国骑士等级的思想家,1522—1523年骑士起义的参加者;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的乌·冯·胡登的原型。——241、272—275、299。

胡斯，扬(Hus[Huß], Jan 1369—1415)——捷克宗教改革的领袖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布拉格大学教授，捷克人民的民族英雄；后被控告为异教徒，被烧死。——237、255。

华斯哥·达·伽马(Vasco da Gama[Vasco de Gama] 1469—1524)——葡萄牙航海家，1497—1498年发现绕过非洲到达印度的航路。——221。

惠勒(Wheeler)——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副董事长。——631。

霍格，詹姆斯·韦尔(Hogg, James Weir 1790—1876)——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议会议员；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董事长(1846—1847和1852—1853)；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委员(1858—1872)。——618、677。

霍亨洛埃伯爵，阿尔布雷希特(Hohenlohe, Albrecht Graf von)——法兰克尼亚贵族(1525年起)。——283。

霍亨洛埃伯爵，莱奥波德(Hohenlohe, Leopold Graf von)——法兰克尼亚贵族(1525年起)。——283。

霍苏(霍索)，安塔尔(Hosszu, Antal)——1514年是匈牙利农民起义的领袖之一。——268、269。

J

基佐，弗朗索瓦·皮埃尔·吉约姆(Guizot, François-Pierre-Guillaume 1787—1874)——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奥尔良党人；1812年起任巴黎大学历史系教授，七月王朝时期是立宪君主派领袖，历任内务大臣(1832—1836)、教育大臣(1836—1837)、外交大臣(1840—1848)和首相(1847—1848)；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30、80、83、84、103、112、119、126、146、151、472、485、544、545、562、563、577、591。

吉布森，托马斯·米尔纳(Gibson, Thomas Milner 1806—1884)——英国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后为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任商业大臣(1859—1865和1865—1866)。——657—658、666。

吉纳尔，约瑟夫·奥古斯坦(Guinard, Joseph-Augustin 1799—1874)——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制宪议会议员(1848—1849)，由于参加1849年六月十三日示威游行被判终生监禁，1854年获赦。——169。

吉斯公爵——见昂利第二(洛林的)，吉斯公爵。

济格尔，弗兰茨(Sigel, Franz 1824—1902)——德国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期

为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总司令、副总司令和巴登临时政府陆军部长；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1851年起流亡英国；1852年迁居美国，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1866年起为纽约新闻工作者；阿·济格尔的哥哥。——452。

济金根，弗兰茨·冯（Sickingen, Franz von 1481—1523）——德国骑士，曾参加宗教改革运动，1522—1523年反对特里尔大主教的骑士起义的领袖；在兰茨胡特的城堡遭攻击时丧生；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的济金根的原型。——241、272—273、275、317。

嘉庆（1760—1820）——中国清朝皇帝（1796—1820）。——632。

金克尔，哥特弗里德·约翰（Kinkel, Gottfried Johann 1815—1882）——德国诗人、作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被普鲁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850年在卡·叔尔茨帮助下越狱逃跑，流亡英国；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海尔曼》周报编辑（1859）；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470。

居比耶尔，阿梅代·路易·德庞·德（Cubières, Amédée-Louis Despans de 1786—1853）——法国将军和国务活动家，奥尔良党人；1839—1840年任陆军大臣，1847年因营私舞弊被降职。——155。

居鲁士二世，居鲁士大帝（Kyros[Cyrus]II the Great 约公元前600—529）——波斯帝国国王（公元前558—529），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创立者。——246。

K

卡贝，埃蒂耶纳（Cabet, Étienne 人称卡贝老爹 Père Cabet 1788—1856）——法国法学家和政论家，法国工人共产主义一个流派的创始人，和平空想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人民报》的出版者（1833—1834）；流亡英国（1834—1839）；《1841年人民报》的出版者（1841—1851）；曾尝试在美洲建立共产主义移民区（1848—1856），以实现其在1848年出版的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中阐述的理论。——14、21、64、98。

卡尔利埃，皮埃尔·沙尔·约瑟夫（Carlier, Pierre-Charles-Joseph 1799—1858）——法国警官，巴黎警察局长（1849—1851），波拿巴主义者。——162、163、512、525、530、555。

卡芬雅克，路易·欧仁（Cavaignac, Louis-Eugène 1802—1857）——法国将军和政治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30—4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年任阿尔及利亚总督；第二共和国时期是陆军部长（1848年5—6月），镇压巴

黎六月起义；曾任政府首脑（1848年6—12月）；立法议会议员（1849—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因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而被捕。——102、103、107、111—112、114—118、123、128—130、136、142、328、407、482、487—490、497、536、549、557。

卡利古拉——见盖尔马尼库斯（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盖尔马尼库斯）（卡利古拉）。

卡诺，拉扎尔·尼古拉·玛格丽特（Carnot, Lazare-Nicolas-Marguerite 1753—1823）——法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政治和军事活动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追随雅各宾党人，抗击欧洲各国同盟、保卫法国的组织者之一；1794年参加热月九日反革命政变，1795年是五人内阁成员，曾一度任拿破仑第一内阁的陆军和内务大臣。——320、323、324、343。

卡诺，拉扎尔·伊波利特（Carnot, Lazare-Hippolyte 1801—1888）——法国政治家和政论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七月王朝时期为众议院议员（左派反对派）；第二共和国时期是临时政府教育部长（1848年2—7月），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秩序党的反对者；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以后成为共和党反对派领袖，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168、169、517。

卡普菲格，让·巴蒂斯特·奥诺雷·雷蒙（Capefigue, Jean-Baptiste-Honoré-Raymond 1801—1872）——法国政论家、历史学家和作家；保皇派。——179。

卡齐米尔（Kasimir[Casimir]1481—1527）——勃兰登堡—安斯巴赫—拜罗伊特封疆伯爵（1519—1527），霍亨索伦王室法兰克尼亚系的代表人物；镇压安斯巴赫和罗腾堡农民起义和市民起义的策划者。——297、299、300。

卡托（老卡托）（马可·波尔齐乌斯·卡托）（Marcus Porcius Cato Major 公元前234—149）——罗马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和著作家，维护贵族特权，曾任执政官（公元前195年），监察官（公元前184年）；《论农业》的作者。——111—112、577。

开普勒，约翰奈斯（Kepler, Johannes 1571—1630）——德国天文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和自然哲学家，在哥白尼学说的基础上，发现行星运动的规律。——607。

凯，约翰·威廉（Kaye, John William 1814—1876）——英国军事史学家和殖民官员，曾任印度事务部政务机要司秘书（1858—1874），写有印度的历史和民族学方面的著作以及英国在阿富汗和印度进行的殖民战争方面的著作。——661。

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弗洛伦斯(Kelly-Wischnewetzky, Florence 1859—1932)——美国社会主义者，后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曾将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译成英文；1892年以前为波兰流亡者拉·威士涅威茨基的妻子。——14。

凯撒(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Gaius Julius Gaesar 公元前100—44)——罗马统帅、国务活动家和著作家。——149、471。

坎伯尔，乔治(Campbell, Sir George 1824—1892)——英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官，议会议员(1875—1892)，自由党人；1843—1874年屡任英国驻印度的殖民官员；写有关于印度的著作。——689。

康德，伊曼努尔(Kant, Immanuel 1724—1804)——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唯心主义者；也以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闻名。——152、601。

康拉德三世(廷根的)(Konrad III von Thüngen 1466前后—1540)——维尔茨堡主教(1519—1540)；1525年被起义军驱逐出境，在士瓦本联盟的帮助下才得以收复自己的领地。——286、299。

康普豪森，卢道夫(Camphausen, Ludolf 1803—1890)——德国政治家和银行家，莱茵省自由派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1834年起任科隆商会会长，莱茵报社股东和《莱茵报》撰稿人；1843年起为莱茵省议会城市等级的代表，普鲁士首相(1848年3—6月)，后为第一议院议员，普鲁士驻中央政府的使节(1848年7月—1849年4月)，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议员。——69、73、387、391、399、424。

科布顿，理查(Cobden, Richard 1804—1865)——英国工厂主，自由党人，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议会议员(1841—1864)；曾参加多次国际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如1850年8月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154。

科苏特，拉约什(路易，路德维希)(Kossuth, Lajos[Louis, Ludwig] 1802—1894)——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1848—1849年革命时期领导资产阶级民主派，匈牙利革命政府首脑，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50年代曾向波拿巴集团求援。——332。

科西迪耶尔，马尔克(Caussidière, Marc 1808—1861)——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34年里昂起义的参加者；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团体的组织者之一；第二共和国时期任巴黎警察局长(1848年2—5月)，制宪议会议员(1848)；因政府准备在布尔日对五月十五日事件的参加者进行审判，于1848年8月逃往英国。——91、108、134、470。

克拉伦登伯爵,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维利尔斯(Clarendon,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Villiers, Earl of 1800—1870)——英国国务活动家,外交家,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爱尔兰总督(1847—1852),曾镇压爱尔兰1848年起义;外交大臣(1853—1858、1865—1866和1868—1870)。——618。

克莱夫,罗伯特(Clive, Robert 1725—1774)——英国国务活动家和将军,英国在印度建立殖民统治的肇始人,孟加拉省督(1757—1760和1765—1767)。——690。

克雷米约,伊萨克·阿道夫(Crémieux[Cremieux], Isaac-Adolphe 1796—1880)——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40年代为自由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为临时政府司法部长(1848年2—5月),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85、128。

克雷通,尼古拉·约瑟夫(Creton, Nicolas-Joseph 1798—1864)——法国律师和政治家,奥尔良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156、541。

克里斯托夫第一(Christoph I 1453—1527)——巴登—霍赫贝格封疆伯爵(1473—1527)。——264。

克伦威尔,奥利弗(Cromwell, Oliver 1599—1658)——英国国务活动家,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领袖;1649年起为爱尔兰军总司令和爱尔兰总督,1653年起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472、557。

克诺普夫(洛伊巴斯河的)——见施米特,约尔格。

库克,乔治·温格罗夫(Cooke, George Wingrove 1814—1865)——英国历史学家和新闻工作者,自由党人;1857年为《泰晤士报》驻中国通讯员。——638、640、651。

库利汗——见纳迪尔沙赫(库利汗)。

库辛,维克多(Cousin, Victor 1792—1867)——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折中主义者。——471。

L

拉波尔特施泰恩,乌尔里希·冯(Rappoltstein, Ulrich von)——1525年是阿尔萨斯赖兴魏尔地方长官。——310。

拉德茨基伯爵,约瑟夫·温采尔(Radetzky, Joseph Wenzel Graf 1766—1858)——

奥地利陆军元帅，1831年起为意大利北部奥军司令，1848—1849年镇压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伦巴第—威尼斯王国的总督（1850—1856）。——326、327、405、411、412、415。

拉菲特，雅克（Laffitte, Jacques 1767—1844）——法国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金融资产阶级的代表，政府首脑（1830—1831）。——80。

拉斐德侯爵，玛丽·约瑟夫·保尔·罗什·伊夫·吉尔贝·莫蒂埃（Lafayette, Marie-Joseph-Paul-Roch-Yves-Gilbert Motier, marquis de 1757—1834）——法国将军，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大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在任国民自卫军长官时（1789—1791）曾指挥士兵向马尔斯广场上要求建立共和国的游行示威（1791）群众开枪射击；1792年是一个军团的指挥官，妄图把它变成反革命的工具，1792年8月10日人民起义后逃往国外；1830年资产阶级七月革命的领袖之一。——321。

拉弗尔，约翰（Lovell, John）——美国出版商和书商，曾出版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14。

拉弗尔斯，托马斯·斯坦福（Raffles, Thomas Stamford 1781—1826）——英国殖民地官员，曾任爪哇总督（1811—1816）；《爪哇史》一书的作者。——678、679、682。

拉克罗斯男爵，贝尔特朗·泰奥巴尔德·约瑟夫（Lacrosse, Bertrand-Théobald-Joseph, baron de 1796—1855）——法国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任公共工程部长（1848—1849和1851年10—12月）。——141。

拉罗什雅克兰侯爵，昂利·奥古斯特·若尔日·杜韦尔日耶（La Rochejaquelein [Larochejaquelin], Henri-Auguste-Georges Du Vergier, marquis de 1805—1867）——法国政治家，贵族院议员，正统派领袖，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1852年起为第二帝国参议员。——86、545。

拉马丁，阿尔丰斯（Lamartine, Alphonse 1790—1869）——法国诗人，历史学家和政治家，40年代为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第二共和国时期任外交部长（1848），临时政府的实际上的首脑。——85、90、98、102、538。

拉莫里诺，杰罗拉莫（Ramorino, Gerolamo 1792—1849）——意大利将军，1834年领导由马志尼组织的流亡革命者向萨瓦的进攻；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时期指挥皮埃蒙特军队，由于他的叛变，奥地利军队获得了胜利。——327。

拉莫里谢尔，克里斯托夫·莱昂·路易·瑞绍·德（Lamoricière, Christophe-Léon-

Louis Juchault de 1806—1865)——法国将军和政治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30—4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年参与镇压巴黎的六月起义,第二共和国时期任陆军部长(1848年6—12月),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逐出法国,1857年回到法国;1860年曾指挥罗马教皇的军队。——497、557。

拉萨尔,斐迪南(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代表,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始人之一和主席(1863);写有古典古代哲学史和法学史方面的著作。——12、20。

拉斯拜尔,弗朗索瓦·万桑(Raspail, François-Vincent 1794—1878)——法国自然科学家、政治家和政论家,社会主义者,《人民之友》的出版者,靠近革命无产阶级;1830和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1849年因参加1848年五月十五日事件被判处六年徒刑,后流亡比利时;1870—1871年普法战争爆发前夜属于资产阶级共和党反对派,后转向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场。——85、98、111、117、125、579。

拉斯卡斯伯爵,艾曼纽埃尔·奥古斯坦·迪约多内·马兰·约瑟夫(Las Cases, Emmanuel-Augustin-Dieudonné-Marin-Joseph, comte de 1766—1842)——法国军官和历史学家,拿破仑第一的秘书;1815—1816年曾陪同拿破仑第一前往圣赫勒拿岛。——561。

拉图尔伯爵,泰奥多尔(Latour, Theodor Graf 1780—1848)——奥地利将军,专制君主制度的拥护者;1848年任陆军大臣;1848年10月被维也纳起义者杀死。——413。

拉托,让·皮埃尔·拉莫特(Rateau, Jean-Pierre Lamotte 1800—1887)——法国律师,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491。

拉伊特子爵,让·厄内斯特·杜科(La Hitte[Lahitte], Jean-Ernest Ducos, vicomte de 1789—1878)——法国将军,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50—1851)、外交部长和陆军部长(1849—1851)。——168、517、533。

莱昂伯爵夫人(L. 伯爵夫人)(Lehon[Gräfin L.], comtesse de)——比利时驻巴黎公使沙·艾·约·莱昂伯爵的妻子,30—50年代随丈夫住在巴黎,同奥尔良王朝代表人物有联系。——576。

莱奥波德(大公)(Leupold[Grand Duke]1790—1852)——巴登大公(1830—1852)。——445、452。

赖德律(赖德律-洛兰),亚历山大·奥古斯特(Ledru[Ledru-Rollin], Alexandre-Auguste 1807—1874)——法国政论家和政治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改革报》编辑;第二共和国时期任临时政府内务部长和执行委员会委员(1848),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49),在议会中领导山岳党;1849年六月十三日示威游行后流亡英国,1869年回到法国。——65、85、94、98、106、108、117、125、128、130、135—136、138—140、143、156、169、177、352、399、482、497、502、505。

兰开斯特,约瑟夫(Lancaster, Joseph 1778—1838)——英国教育家。——422。

朗格,马泰乌斯(Lang, Matthäus 1468—1540)——德国贵族,神学家,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宠臣;1519年起为萨尔茨堡大主教和红衣主教;迫害宗教改革的拥护者,镇压1525年的农民和市民起义。——310、313。

朗帕尔特,格雷戈尔(Lamparter, Gregor 1463—1523)——符腾堡公爵乌尔里希的顾问。——266。

劳,卡尔·亨利希(Rau, Karl Heinrich 1792—1870)——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个别问题上赞同亚·斯密和大·李嘉图的观点。——596。

劳伦蒂乌斯——见梅萨罗什,劳伦蒂乌斯。

勒夫洛,阿道夫·艾曼纽埃尔·沙尔(Le Flô[Leflô], Adolphe-Emmanuel-Charles 1804—1887)——法国将军、政治家和外交家,保皇党人;秩序党代表人物,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流亡英国,1859年回到法国;曾任国防政府和梯也尔政府的陆军部长(1870—1871),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曾任驻彼得堡大使(1848—1849和1871—1879)。——493、557。

勒克莱尔,亚历山大(Leclerc, Alexandre)——法国商人,秩序党的拥护者,曾参加镇压1848年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177。

勒麦,克里斯托夫·哥特洛布·亨利希·弗里德里希·冯(Römer[Roemer], Christof Gottlob Heinrich Friedrich von 1794—1864)——德国法学家和政治家;1833年起为符腾堡第二议院议员,自由主义反对派的领袖之一,1848—1849年任符腾堡的司法大臣和首相,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360。

勒米尼耶,让·路易·欧仁(Lerminier, Jean-Louis-Eugène 1803—1857)——法国法学家和政论家,30年代末为保守主义者,法兰西学院比较法教授(1831—1839),由于学生抗议而离职。——126。

勒穆瓦讷,约翰·玛格丽特·埃米尔(Lemoinne, John-Marguerite-Émile 1815—

1892)——法国政论家,《辩论日报》驻英国记者,后为主编。——179。

雷布曼,约翰奈斯(汉斯)(Rebmann, Johannes[Hans])——德国传教士;1525年是农民起义军领袖,格里森农民起义失败后被贵族收买,后为苏黎世地区的神父。——253。

雷缪扎伯爵,沙尔·弗朗索瓦·玛丽(Rémusat, Charles-François-Marie, comte de 1797—1875)——法国政治活动家、政论家和作家,奥尔良党人,曾任内务大臣(1840);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第三共和国时期任外交部长(1871—1873)。——535。

雷尼奥·德·圣让·丹热利(圣让·丹热利)伯爵,奥古斯特·米歇尔·埃蒂耶纳(Regnault de Saint-Jean d'Angély [St. Jean d'Angély], Auguste-Michel-Étienne, comte de 1794—1870)——法国将军,后为元帅,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陆军部长(1851年1月);第二帝国时期任近卫军指挥官(1854—1869);1855年为克里木法军后备军军长。——533—534。

黎尔,威廉·亨利希(Riehl, Wilhelm Heinrich 1823—1897)——德国文学史家和政论家,慕尼黑大学教授。——596。

李比希男爵,尤斯图斯(Liebig, Justus Freiherr von 1803—1873)——德国化学家,农业化学的创始人。——625。

李斯特,弗里德里希(List, Friedrich 1789—1846)——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保护关税政策的维护者。——596。

里夫斯,威廉·多布森(Reeves, William Dobson 1827前后—1907)——英国出版商和书商;曾出版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14、19。

理查(格赖芬克劳的)(Richard von Greiffenklau 1467—1531)——特里尔的选帝侯和大主教(1511—1531),宗教改革的反对者,曾参加镇压1522—1523年的骑士起义和1525年的农民起义;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的特里尔的理查的原型。——275、300。

林则徐(1785—1850)——中国清朝官员,1839年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和负责查禁鸦片贸易的钦差大臣。——635。

卢格,阿尔诺德(Ruge, Arnold 1802—188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哈雷年鉴》的出版者,《莱茵报》的撰稿人,1842—1843年同马克思一起编辑《德法年鉴》;1844年中起反对马克思,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50年代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之一;1866年后成为民

族自由党人。——470。

鲁埃，欧仁（Rouher, Eugène 1814—1884）——法国律师和政治家，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49），1849—1852年曾断续地担任司法部长和司法大臣；第二帝国时期任商业、农业和公共工程大臣（1855—1863）、国务大臣（1863—1869）、参议院议长（1869—1870）；第二帝国崩溃后逃离法国；70年代为法国波拿巴派的领袖之一。——528、529、532、533、538。

鲁道夫第二·冯·谢伦贝格（Rudolf II von Scherenberg 1405前后—1495）——维尔茨堡主教（1466—1495）；1476年镇压汉·伯海姆所领导的陶伯河谷农民起义。——258。

鲁普斯——见沃尔弗，弗里德里希·威廉（鲁普斯）。

鲁瓦耶-科拉尔，皮埃尔·保尔（Royer-Collard, Pierre-Paul 1763—1845）——法国政治家和哲学家，巴黎大学历史和哲学教授，立宪君主制的拥护者。——471。

路德，马丁（Luther, Martin 1483—1546）——德国神学家，宗教改革运动的活动家，德国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德国市民等级的思想家，温和派的主要代表；在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站在诸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城市平民。——234、239—246、249—254、271—272、276、471。

路德维希五世（Ludwig V 1478—1544）——普法尔茨选帝侯（1508—1544）；参加镇压1522—1523年的骑士起义；参加士瓦本联盟对法兰克尼亚起义农民的征讨（1525）。——266、275、285。

路特希尔德家族（Rothschild）——金融世家，在欧洲许多国家设有银行。——83、366—367。

路特希尔德男爵，詹姆斯（Rothschild, James, baron de 1792—1868）——巴黎路特希尔德银行行长。——82。

路维杜尔（杜山-路维杜尔），弗朗索瓦·多米尼克（Louverture[Toussaint L'Ouverture], François-Dominique 1743—1803）——海地黑人革命运动的领袖，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反抗西班牙和英国的统治，1791年参加海地第一次奴隶起义，1795年被法国国民公会任命为黑人陆军师长和副总督，1797年任海地武装力量总司令，1800年脱离法国统治而独立，并自任总统，1803年被法国军队击败后被捕，并带至法国。——119。

路易九世（圣路易）（Louis IX[Saint Louis] 1215—1270）——法国国王（1226—

1270)。——148。
路易十一(Louis XI 1423—1483)——法国国王(1461—1483)。——223、273。
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法国国王(1643—1715)。——157、567。
路易十五(Louis XV 1710—1774)——法国国王(1715—1774)。——172、577。
路易十六(Louis XVI 1754—1793)——法国国王(1774—1792),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363。
路易十八(Louis XVIII 1755—1824)——法国国王(1814—1815和1815—1824)。——472。
路易·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三。
路易-菲力浦-阿尔伯,奥尔良公爵,巴黎伯爵(Louis-Philippe-Albert, duc d'Orléans, comte de Paris 1838—1894)——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一世之孙,法国王位追求者,称菲力浦七世;1861—1862年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182、542—543。
路易-菲力浦一世(路易-菲力浦),奥尔良公爵(Louis-Philippe I [Louis-Philippe], duc d'Orléans 1773—1850)——法国国王(1830—1848)。——80—82、84、111、114、118、146、149、152—156、180、182、382、476、477、481—483、488、490、496、507、510、522、543—544、546、547、561、562、565、587。
路易-拿破仑——见拿破仑第三。
吕埃尔,约翰(Rühel, Johann)——243—244。
律斯勒,古斯塔夫·阿道夫(Roesler[Rösler], Gustav Adolf 1818—1855)——德国教师和新闻工作者,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50年起侨居美国。——457。
罗,约翰(劳里斯顿的约翰·罗)(Law, John of Lauriston 1671—1729)——英国经济学家和金融家;曾任法国财政总监(1719—1720);以发行纸币的投机活动而闻名。——583、587。
罗伯斯比尔,马克西米利安·弗朗索瓦·玛丽·伊西多尔·德(Robespierre, Maximilien-François-Marie-Isidore de 1758—179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领袖,革命政府的首脑(1793—1794)。——112、470、471。
罗尔巴赫,耶克莱恩(Rohrbach, Jäcklein 1498前后—1525)——符腾堡的农奴;内卡河谷农民起义的领袖,在攻克黑尔芬施太因的魏恩斯贝格城堡后主张处死黑尔芬施太因伯爵;后被士瓦本联盟军队司令官特鲁赫泽斯下令处

死。——283—285、287—289、292—293。

罗素伯爵，约翰(Russell, John, Earl of 1792—1878)——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领袖，议会议员，曾任内务大臣(1835—1839)，殖民大臣(1839—1842)，首相(1846—1852和1865—1866)，外交大臣(1852—1853和1859—1865)，枢密院院长(1854—1855)；1855年作为英国代表参加维也纳会议。——657。

罗泰克，卡尔·文策斯劳斯·罗代克·冯(Rotteck, Karl Wenzeslaus Rodecker von 1775—1840)——德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自由主义者。——360、370。

洛克，约翰(Locke, John 1632—1704)——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启蒙思想家，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代表。——472。

洛歇尔(Lorcher)——符腾堡公爵乌尔里希的顾问。——266。

M

马蒂厄(德拉德罗姆)，菲力浦·安东(Mathieu[de la Dróme], Philippe-Antoine 1808—1865)——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倾向于山岳党；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流亡比利时。——126。

马丁，罗伯特·蒙哥马利(Martin, Robert Montgomery 1803—1868)——英国历史学家和统计学家，曾到东方旅行。——629—631。

马丁，亚历山大——见阿尔伯。

马尔什(小马尔什)(Marche, de jeune)——法国工人，1848年代表人民要求临时政府实行劳动法。——87。

马尔维尔，弗朗索瓦·让·莱昂·德(Maleville, François-Jean-Léon de 1803—1879)——法国政治家，奥尔良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内务部长(1848年12月下半月)，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538。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 1459—1519)——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493—1519)。——261、269。

马拉斯特，玛丽·弗朗索瓦·帕斯卡尔·阿尔芒(Marrast, Marie-François-Pascal-Armand 1801—1852)——法国政论家和政治家，人权社的领导人，后为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国民报》总编辑；第二共和国时期是临时政府成员和巴黎市长(1848)，制宪议会议长(1848—1849)。——98、107、111、113、114、128、136、352、472、482、492—493。

马利·德·圣乔治，皮埃尔·托马斯·亚历山大·阿马布勒(Marie de Saint-Georges, Pierre-Thomas-Alexandre-Amable人称马利Marie 1795—1870)——法国律师和政治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临时政府公共工程部长(1848)；曾组织国家工场，执行委员会委员，制宪议会议长(1848)，后为卡芬雅克政府的司法部长。——96。

马姆兹伯里伯爵，詹姆斯·霍华德·哈里斯(Malmesbury, James Howard Harris, Earl of 1807—1889)——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保守党人，曾任外交大臣(1852和1858—1859)，掌玺大臣(1866—1868和1874—1876)。——668—671。

马尼昂，贝尔纳·皮埃尔(Magnan, Bernard-Pierre 1791—1865)——法国将军，后为元帅，波拿巴主义者；3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里昂(1831和1849)、利尔和鲁贝(1845)的工人起义及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的镇压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49—1851)，1851年为巴黎卫戍司令，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策划者之一；第二帝国时期是参议员。——546、555、557。

马赞尼洛(Masaniello 原名托马佐·安尼洛 Tommaso Aniello 1620—1647)——意大利渔民，1647年那不勒斯王国反对西班牙统治的人民起义的领袖。——556。

玛丽·约瑟夫——见苏，欧仁。

麦格雷戈，约翰(MacGregor, John 1797—1857)——英国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自由贸易派，议会议员，英国皇家银行的创办人，并为董事之一(1849—1856)，写有统计学方面的著作。——645。

麦克法林，海伦(Macfarlane, Helen 笔名霍华德·莫滕 Howard Morten)——英国新闻工作者，革命宪章派领袖乔·哈尼出版的《民主评论》(1849—1850)和《红色共和党人》(1850)的撰稿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英文译者。——5、11。

曼特尔，约翰(Mantel, Johann 约1468—1530)——德国神学家，斯图加特的传教士，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是起义军中的激进派，闵采尔的拥护者。——253。

曼托伊费尔男爵，奥托·泰奥多尔(Manteuffel, Otto Theodor Freiherr von 1805—1882)——普鲁士国务活动家，贵族官僚的代表，曾参与宪法(1848年12月)的颁布和三级选举制的实行(1849)；曾任内务大臣(1848年11月—1850年12月)，首相和外交大臣(1850—1858)；1849年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66年入选第一议院。——425。

毛勒，格奥尔格·路德维希（Maurer, Georg Ludwig 1790—1872）——德国历史学家，古代和中世纪的日耳曼社会制度的研究者；写有中世纪马尔克公社的农业史和制度史方面的著作。——31。

梅茨勒，格奥尔格（Metzler, Georg）——巴登的小店主；1525年奥登林山—内卡河谷农民起义的领袖之一，华美军司令，属于温和派，华美军被击溃后逃亡。——283、285、293、296。

梅尔克尔（Maercker）——普鲁士国务活动家，奥尔斯瓦尔德—汉泽曼内阁的司法大臣（1848年6—9月）。——70。

梅兰希顿，菲力浦（Melanchthon, Philipp 1497—1560）——德国神学家，人道主义者；温和派的代表，马丁·路德最亲密的助手，和路德一起竭力使新教适合诸侯的利益。——250—251。

梅洛斯拉夫斯基，路德维克（Mierosławski, Ludwik 1814—1878）——波兰革命家、历史学家和军事活动家，1830—1831年和1846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曾参加1846年波兹南起义的准备工作，1848年三月革命把他从狱中解放出来；曾领导1848年波兹南起义，后来领导西西里岛起义者的斗争；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期间指挥革命军；50年代曾向波拿巴集团求援；1856年出版《欧洲均势中的波兰民族》一书；1863年波兰起义初期被任命为波兰国民政府首脑；起义失败后流亡法国。——453。

梅萨罗什，劳伦蒂乌斯（Meszáros, Laurentius 死于1514年）——塞格德的教士；1514年匈牙利农民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宣扬激进的思想；后被匈牙利贵族俘虏，并被杀害。——267、269。

梅森豪泽，凯撒·温采尔（Messenhauser, Caesar Wenzel 1813—1848）——奥地利军官和作家，1848年维也纳十月起义期间是国民自卫军司令和维也纳卫戍司令；11月16日被反革命军队杀害。——417。

梅斯特尔（德·梅斯特尔）伯爵，约瑟夫·玛丽（Maistre [De Maistre], Joseph-Marie, comte de 1753—1821）——法国作家，保皇党人，贵族和教权主义思想家。——363。

梅特涅-温内堡公爵，克莱门斯·文策斯劳斯·奈波穆克·洛塔尔（Metternich-Winneburg, Clemens Wenzeslaus Nepomuk Lothar Fürst von 1773—1859）——奥地利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1809—1821）和首相（1821—1848），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30、362、375—379、381—384、387、403、410。

门钦根，斯蒂凡·冯(Menzingen, Stephan von 死于1525年)——德国贵族；1525年3月罗滕堡手工业者和市民起义的领导人，起义失败后被处死。——283、299。

蒙克，乔治，阿尔比马尔公爵(Monk, George, Duke of Albemarle 1608—1669)——英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初为王党成员，后来是奥·克伦威尔军队将军；1660年曾积极主张英国恢复君主制。——126、525。

蒙塔朗贝尔伯爵，沙尔·福布斯(Montalembert, Charles Forbes, comte de 1810—1870)——法国政治家和政论家，奥尔良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天主教党的领袖；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时支持路易·波拿巴，但不久又成为他的反对者；1852年起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56—157、177、535、545、572、582、583。

孟德斯鸠，沙尔(Montesquieu, Charles 1689—1755)——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立宪君主制的理论家；货币数量论的拥护者；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创始人之一。——68。

弥勒，汉斯(布尔根巴赫的)(Müller, Hans aus Bulgenbach 死于1525年)——德国士兵；1524—1525年以其杰出的军事才能任黑林山的农民起义军上校；激进思想的传播者；后背叛农民起义，起义失败后被处死。——276、277、279、300—301。

米切尔(Mitchell)——英国驻广州代办。——673—675。

闵采尔，托马斯(Müntzer[Münzer], Thomas 1490前后—1525)——德国神学家，宗教改革时期和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为农民平民阵营的领袖和思想家，宣传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思想。——203、231、236、239、243—254、260、272、276、278、293—294、303—307、311。

摩尔根，路易斯·亨利(Morgan, Lewis Henry 1818—1881)——美国法学家、民族学家、考古学家和原始社会史学家，进化论的代表，自发的唯物主义者。——31。

摩莱伯爵，路易·马蒂厄(Molé, Louis-Mathieu, comte 1781—1855)——法国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曾任首相(1836—1839)，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秩序党领导人。——146、147、517、545。

摩莱肖特，雅科布(Moleschott, Jakob 1822—1893)——荷兰生理学家和哲学家，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曾在德国、瑞士和意大利的学校中任教。——

601。

莫尔，约瑟夫（Moll, Joseph 1813—1849）——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钟表匠；正义者同盟领导人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年7—9月是科隆工人联合会主席，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1848年科隆九月事件后流亡伦敦，不久改名回到德国，在各地进行宣传鼓动；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在穆尔格河战斗中牺牲。——189。

莫尔尼公爵，沙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Morny, Charles-Auguste-Louis-Joseph, duc de 1811—1865）——法国政治家，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49—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策划者之一，曾任内务部长（1851年12月—1852年1月），第二帝国时期是立法团议长（1854—1856和1857—1865），驻俄国大使（1856—1857）；拿破仑第三同母异父的弟弟。——576、585。

莫甘，弗朗索瓦（Mauguin, François 1785—1854）——法国法学家和政治家，七月王朝时期是自由主义的王朝反对派领袖；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528、529。

莫里哀（Molière原名让·巴蒂斯特·波克兰Jean-Baptiste Poquelin 1622—1673）——法国喜剧作家。——180。

莫帕，沙勒曼涅·埃米尔·德（Maupas, Charlemagne-Émile de 1818—1888）——法国律师，波拿巴主义者，巴黎警察局长（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策划者之一，第二帝国时期为警务大臣（1852—1853）。——555。

莫斯莱，约翰·路德维希（Mosle, Johann Ludwig 1794—1877）——德国军官和政治活动家，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奥尔登堡派驻联邦议会和中央政府的代表；1848年是被派往维也纳的帝国专员。——422。

莫卧儿王朝（大莫卧儿王朝）——印度钵谛沙赫王朝（1526—1858）。——685。

穆尔，赛米尔（Moore, Samuel 1838—1911）——英国法学家，国际会员，曾将《资本论》第一卷（与爱·艾威林一起）和《共产党宣言》译成英文；50年代为曼彻斯特的厂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15、19。

穆拉德帕沙——见贝姆，约瑟夫。

穆拉维约夫（旧译穆拉岳福、慕喇约甫、木哩斐岳幅、木喇斐岳福、木喇福岳福）伯爵，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Муравьёв,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граф 1809—1881）——俄国国务活动家，曾任东西伯利亚总督（1847—1861）；因侵华“有功”，被沙皇封为“阿穆尔河（黑龙江）伯爵”。——660。

N

拿破仑第一(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 [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法国皇帝(1804—1814和1815)。——81、115—120、135、150、157、158、161、162、163、184、186、320、322—329、331、333、334、336、340、343、345、347、354、365、373、453、466、470—473、487、492、513、523—525、557、561、564—573、577—578、639。

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II [Louis-Napoléon Bonaparte] 1808—1873)——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国皇帝(1852—1870),拿破仑第一的侄子。——24、111、118—124、126—129、131、133、135、138—140、148—151、156—158、162—164、167—169、180—186、198、204、207、214—216、459、465、466、470、472、480、481、486、488—493、494、496、497、500、502、506—513、516—518、521—541、544—550、553、563、565—566、568—578、582、583、585、587、615、658。

纳迪尔沙赫(库利汗)(Nadir Shah[Khuli Khan]1688—1747)——波斯沙赫(1736—1747),统帅和征服者,1738—1739年曾对印度进行掠夺性的远征。——678。

奈伊伯爵,拿破仑·昂利·埃德加(Ney, Napoléon-Henri-Edgar, comte de 1812—1882)——法国将军,波拿巴主义者,路易·波拿巴总统的侍卫官,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50—1851)。——149、510。

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俄国皇帝(1825—1855)。——325、336—337、648、662。

涅谢尔罗德伯爵,卡尔·瓦西里耶维奇(Нессельроде, Кар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граф 1780—1862)——俄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1816—1856),总理大臣(1845年起)。——325。

牛顿,伊萨克(Newton, Isaac 1642—1727)——英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经典力学的创始人。——607。

诺兰,刘易斯·爱德华(Nolan, Lewis Edward 1818—1854)——英国军官,在印度服役,曾参加克里木战争,写有关于骑兵的著作。——623。

诺马耶,马克西米利安·若尔日·约瑟夫(Neumayer, Maximilian-Georges-Joseph 1789—1866)——法国将军,秩序党的拥护者,巴黎卫戍司令(1848—1850)。——186、525—526。

O

欧文,罗伯特(Owen, Robert 1771—1858)——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13、21、62、64、218。

P

帕尔默,威廉(Palmer, William 1824—1856)——英国医生,为谋取保险赔偿费而毒死自己的妻子、兄弟和朋友,被判处绞刑。——631。

帕拉茨基,弗兰蒂舍克(Palacký, František 1798—1876)——捷克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自由主义者;1848年6月为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主席;实行旨在维护哈布斯堡专制统治的政策,奥地利斯拉夫主义思想家。——399。

帕略,玛丽·路易·皮埃尔·费利克斯(Parieu, Marie-Louis-Pierre-Felix, Esquirou de 1815—1893)——法国政治活动家,第二共和国时期是教育部长(1849—1851)。——533。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Viscount 1784—1865)——英国国务活动家,初为托利党人,1830年起为辉格党领袖,依靠该党右派;曾任陆军大臣(1809—1828),外交大臣(1830—1834、1835—1841和1846—1851),内务大臣(1852—1855)和首相(1855—1858和1859—1865)。——615、618、643、644、647、655—662、666—668、670—671。

帕芒蒂耶(Parmentier)——法国厂主和金融家,1847年因贿赂官吏受审。——155。

帕涅尔,洛朗·安东(Pagnerre, Laurent-Antoine 1805—1854)——法国出版商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48年是临时政府和执行委员会的秘书长,制宪议会议员。——128。

帕斯凯维奇公爵,伊万·费多罗维奇(Паскевич, Иван Федорович, князь 1782—1856)——俄国元帅,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1808—1814)的参加者,1831年夏天起为镇压波兰起义(1830—1831)的俄军总司令,1832年起为波兰王国总督,1849年为参加镇压匈牙利革命的俄军总司令,1854年为俄国西部和南部驻军总司令,5—6月任多瑙河俄军指挥官。——325、336。

帕西,伊波利特·菲利贝尔(Passy, Hippolyte-Philibert 1793—1880)——法国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家,奥尔良党人,七月王朝时期曾数度入阁,第二共和国时期是财政部长(1848—1849)。——149、155。

帕希,让·尼古拉(Pache, Jean-Nicolas 1746—1823)——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党人;曾任陆军部长(1792年10月—1793年1月),巴黎市长(1793年2月—1794年5月)。——324、343。

炮弹国王——见斐迪南多二世,斐迪南二世。

佩尔采尔,莫尔(Perczel, Mór 1811—1899)——匈牙利政治家和将军,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1851年流亡英国。——413、416、418。

佩尔西尼伯爵,让·日尔贝尔·维克多·菲阿兰(Persigny, Jean-Gilbert-Victor-Fialin, comte 1808—1872)——法国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49—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策划者之一,曾任内务大臣(1852—1854和1860—1863),驻伦敦大使(1855—1858和1859—1860)。——539、554。

佩罗,本杰明·皮埃尔(Perrot, Benjamin-Pierre 1791—1865)——法国将军,1848年参加镇压巴黎六月起义,1849年为巴黎国民自卫军司令。——534。

皮尔,罗伯特(Peel, Robert 1788—1850)——英国国务活动家和经济学家,托利党温和派(亦称皮尔派,即因他而得名)的领袖;曾任内务大臣(1822—1827和1828—1830),首相(1834—1835和1841—1846);1844年和1845年银行法的起草人;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1846)。——657、659。

皮亚,让·皮埃尔(Piat, Jean-Pierre 1774—1862)——法国将军,波拿巴主义者;十二月十日会的组织者和领导人。——523。

蒲鲁东,皮埃尔·约瑟夫(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1865)——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创始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12、20、61、175、218、465—466、505、593。

璞鼎查,亨利(Pottinger, Henry 1789—1856)——英国外交官和将军,1841—1842年任驻华公使,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任英军司令,1843年任香港总督,1847—1854年任马德拉斯总督。——637、673。

普卜利科拉(普卜利乌斯·瓦莱里乌斯·普卜利科拉)(Publius Valerius Poplicola [Publicola] 死于公元前503年)——据传说是罗马共和国任期一年的执政官。——471。

普法伊弗,亨利希(Pfeiffer[Pfeifer], Heinrich 原名亨利希·施韦特费格 Heinrich Schwetfeger 死于1525年)——德国传教士;闵采尔的信徒,米尔豪森市民起

义的领导人之一，后被处死。——303、307。

普拉斯勒，卡斯帕尔（Praßler, Kaspar）——德国矿工，1525年6月萨尔茨堡起义农民和矿工的领袖。——310。

普雷吉策尔，卡斯帕尔（Pregizer, Kaspar）——德国刀匠，1514年是“穷康拉德”的领导人之一。——265。

普鲁斯，弗雷德里克·威廉·阿道夫（Bruce, Frederick William Adolf 1814—1867）——英国殖民官和外交官，驻华公使（1858—1865）。——654—656、659、664、667、669。

Q

戚美尔曼，恩斯特·威廉·爱德华（Zimmermann, Ernst Wilhelm Eduard 1807—1878）——德国历史学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预备议会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1—1843年出版的《伟大农民战争通史》的作者。——203、240—241、243—246、249—250、251—252、255、258。

齐格尔米勒，艾特尔汉斯（艾特尔·汉斯）（Ziegelmüller, Eitelhans [Eitel Hans]）1525年是北博登湖农军的领袖。——279。

清朝——中国皇朝（1644—1911）。——613。

R

日拉丹，埃米尔·德（Girardin, Émile de 1806—1881）——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1836—1866年曾断续地担任《新闻报》编辑，后为《自由报》编辑（1866—1870）；1848年革命前反对基佐政府，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50—1851），第二帝国时期为波拿巴主义者。——178、531。

日拉丹，德尔芬娜·德（Girardin, Delphine de 1804—1855）——法国女作家，埃·德·日拉丹的妻子。——577。

日罗，沙尔·约瑟夫·巴泰勒米（Giraud, Charles-Joseph-Barthélemy 1802—1881）——法国法学家，保皇党人，曾任教育部长（1851）。——555。

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菲力浦·路易·玛丽，奥尔良公爵（Joinville, François-Ferdinand-Philippe-Louis-Marie, duc d'Orléans, prince de 1818—1900）——法国海军上将，4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年二月革命后

流亡英国，1861—1862年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路易-菲力浦一世的儿子。——544、553。

S

萨尔蒂科夫公爵，阿列克塞·德米特里耶维奇（Салтыков, Алексей Дмитриевич, князь 1806—1859）——俄国旅行家、作家和艺术家，曾游历印度（1841—1843和1845—1846）。——690。

萨尔万迪伯爵，纳尔西斯·阿希尔（Salvandy, Narcisse-Achille, comte de 1795—1856）——法国国务活动家和作家，奥尔良党人，曾任教育大臣和教育部长（1837—1839和1845—1849）。——543。

萨莱雷希（萨莱雷什），安布罗什（Száleresi [Szaleres], Ambros）——佩斯的公民；曾参加匈牙利1514年农民起义，曾任起义农军首领，后出卖起义者，投向贵族。——268。

萨兰德鲁兹·德拉莫尔奈，沙尔·让（Sallandrouze de Lamornais, Charles-Jean 1808—1867）——法国工业家，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1849）；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时支持路易·波拿巴。——557。

萨伊，让·巴蒂斯特（Say, Jean-Baptiste 1767—1832）——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最先系统地阐述辩护性的“生产三要素”论。——471。

塞巴斯蒂亚尼伯爵，奥拉斯·弗朗索瓦·巴斯蒂安（Sébastiani, Horace-François-Bastien, comte de 1772—1851）——法国元帅，外交家；1801—1802年在土耳其、埃及和叙利亚任拿破仑第一内阁的外交使节；曾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06—1807），外交大臣（1830—1832），驻伦敦大使（1835—1840）。——103。

赛居尔·达居索伯爵，雷蒙·约瑟夫·保尔（Ségur d'Aguesseau, Raymond-Joseph-Paul, comte de 1803—1889）——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中的秩序党代表。——169。

僧格林沁（1811—1865）——中国清末将领，蒙古亲王，蒙古科尔沁旗（今属内蒙古）人。——655。

沙尔腊斯，让·巴蒂斯特·阿道夫（Charras, Jean-Baptiste-Adolphe 1810—1865）——法国军事家和政治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曾参加镇压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

1851)，反对路易·波拿巴；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逐出法国。——466、557。

沙培尔，尤斯图斯·威廉·爱德华·冯(Schaper, Justus Wilhelm Eduard von 1792—1868)——普鲁士政治家，1837—1842年7月任特里尔行政区长官，1842年8月—1845年任莱茵省总督，1845—1846年任威斯特伐利亚总督。——588。

沙佩勒尔，克里斯托夫(Schappeler, Christoph 1472—1551)——德国神学家，宗教改革的拥护者；乌·茨温利的追随者；1523—1525年在梅明根传教，《十二条款》总纲的作者；农民起义失败后为躲避士瓦本联盟的迫害而逃往圣加伦。——253、301。

莎士比亚，威廉(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英国戏剧家和诗人。——76、523、534、542、564、670。

尚博尔伯爵，昂利·沙尔·斐迪南·玛丽·迪约多内·达尔图瓦，波尔多公爵(亨利五世)(Chambord, Henri-Charles-Ferdinand-Marie Dieudonné d'Artois, duc de Bordeaux, comte de, Henri V 1820—1883)——法国波旁王室长系的最后代表，查理十世之孙，1830年七月革命后逃亡国外，法国王位的追求者，称亨利五世。——182、500、522、542、543、547。

尚加尔涅，尼古拉·安娜·泰奥杜尔(Changarnier, Nicolas-Anne-Théodule 1793—1877)——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保皇派；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49)，曾参加镇压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后为巴黎卫戍部队和国民自卫军司令，曾参加驱散巴黎1849年六月十三日示威游行，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逮捕并被驱逐出法国，1859年回到法国；普法战争时期在莱茵军团司令部任职，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119—120、126、127、137、143、147、181、185、186、399、491—493、496、502、507、524—526、528、529、532—536、539、545、548、553—554、556—557。

圣阿尔诺，阿尔芒·雅克·阿希尔·勒鲁瓦·德(Saint-Arnaud, Armand-Jacques-Achille-Leroy de 1801—1854)——法国将军，1852年起为元帅，波拿巴主义者；1836—1851年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曾任陆军部长和陆军大臣(1851—1854)，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策划者之一，1854年任克里木法军总司令。——493。

圣奥迪莉娅(圣奥蒂莉娅)(Odilia, die Heilige[St. Ottilia] 死于720年前后)——阿尔萨斯贵族，多所修道院的创建人；到中世纪，被奉为阿尔萨斯的守护神。——262。

圣贝夫,皮埃尔·昂利(Sainte-Beuve, Pierre-Henri 1819—1855)——法国厂主和地主,自由贸易的拥护者,秩序党的代表人物;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548。
圣路易——见路易九世(圣路易)。
圣普里子爵,艾曼纽埃尔·路易·玛丽·德·吉尼亚尔(Saint-Priest, Emmanuel-Louis-Marie de Guignard, vicomte de 1789—1881)——法国将军和外交家,正统派的领袖,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49—1851)。——543。
圣让·丹热利——见雷尼奥·德·圣让·丹热利(圣让·丹热利)伯爵,奥古斯特·米歇尔·埃蒂耶纳。
圣茹斯特,安东·路易·莱昂·德(Saint-Just, Antoine-Louis Léon de 1767—179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比尔的追随者,1794年被绞死。——323、471。
圣西门,昂利(Saint-Simon, Henri 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62、218、361、368。
施蒂韦,约翰·卡尔·贝尔特拉姆(Stüve, Johann Karl Bertram 1798—1872)——德国政治家,自由主义者,曾任汉诺威内务大臣(1848—1850)。——360。
施拉姆伯爵,让·保尔·亚当(Schramm, Jean-Paul-Adam, comte de 1789—1884)——法国将军和政治家,波拿巴主义者,曾任陆军部长(1850—1851)。——526、532。
施米德,乌尔里希(Schmid, Ulrich)——德国锻工;巴尔特林根农军的领袖,1525年是起义军中温和派的代表人物。——279。
施米特,约尔格(洛伊巴斯河的克诺普夫)(Schmidt, Jörg [Knopf von Leubas] 约1480—1525)——德国染工,阿尔高农军的领袖,主张团结一致反对贵族,农民战争失败后被处死。——302。
施奈德,格奥尔格(Schneider, Georg)——法国雇佣兵上尉,德国人,1513年参加上莱茵"鞋会"密谋和上莱茵农民起义的准备工作,起义因泄密而告失败。——262。
施佩特,迪特里希·冯(Spät, Dietrich von 死于1536年)——德国贵族,乌拉赫总督,1525年任士瓦本联盟常备军分队指挥官。——289、292、296。
施塔迪昂伯爵,弗兰茨·泽拉夫(Stadion, Franz Seraph Graf 1806—1853)——奥地利政治活动家,1846年起为加利西亚总督,镇压加利西亚和捷克民族解放运动的策划者之一,1848年为奥地利帝国国会议员,曾任内务大臣(1848—

1849)。——422。

施泰因,洛伦茨·冯(Stein, Lorenz von 1815—1890)——德国法学家、国家法专家、历史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普鲁士政府的密探,《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的作者。——596。

施托尔贝格伯爵,博多(Stolberg, Bodo Graf von 1467—1538)——阿尔布雷希特红衣主教的顾问,马格德堡和哈尔伯施塔特修道院总管。——244。

施托尔希,尼克拉斯(Storch, Niklas 约1500—1536)——德国织工,16世纪再洗礼派的地方教派领袖,在闵采尔的影响下成为反对教会和世俗封建主的人民起义的鼓动者。——245。

施托费尔(Stoffel)——德国弗赖堡人,1513年上莱茵和黑林山"鞋会"的农民密谋的组织者之一,密谋失败后即隐匿。——262。

施瓦策,恩斯特·冯(Schwarzer, Ernst von 1808—1860)——奥地利新闻工作者和政治家,自由主义者;1848年为《奥地利总汇报》的创办人和编辑;奥地利帝国国会议员,曾任公共工程大臣(1848年7—9月)。——412。

施瓦尔岑堡公爵,费利克斯·路德维希·约翰·弗里德里希(Schwarzenberg, Felix Ludwig Johann Friedrich Fürst zu 1800—1852)——奥地利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1848年维也纳十月起义被镇压后任首相兼外交大臣(1848年11月—1852年)。——384。

斯密,亚当(Smith, Adam 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605。

斯特劳本齐——见范斯特劳本齐,查理·托马斯。

苏,欧仁(Sue, Eugène 原名玛丽·约瑟夫 Marie-Joseph 1804—1857)——法国作家,著有一些小市民的伤感的社会小说;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48—1849)。——163、176、179、518。

苏尔茨,鲁道夫·冯(Sulz, Rudolf von)——1525年是哈布斯堡王朝驻上奥地利的总督,克莱特高邦伯。——276、301。

苏路克,法斯廷(Soulouque, Faustin 1782—1867)——海地共和国总统(1847—1849),1849年自立为帝,称法斯廷一世。——119、162、167。

苏沃洛夫,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Сувор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1729—1800)——俄国元帅和军事理论家,七年战争(1756—1763)和俄土战争(1768—1774和1787—1791)的参加者,曾率兵完成向意大利和瑞士的远征(1799);保罗一世执政时被黜;著有《团谕》和《制胜的科学》等军事理论

著作。——327。

T

泰勒，瓦特（Tyler, Wat 死于1381年）——英国神父，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的领袖。——238。

泰列基，伊什特万（Teleki, István 死于1514年）——匈牙利枢密官，王室司库，后为匈牙利财政大臣，1514年农民起义时被起义者杀死。——268。

特雷拉，于利斯（Trélat, Ulysse 1795—1879）——法国政治活动家，职业是医生，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副议长（1848）、公共工程部长（1848年5—6月）。——100。

特里尔的大主教——见理查（格赖芬克劳的）。

特鲁赫泽斯（瓦尔德堡的），格奥尔格第二（Truchseß von Waldburg, Georg II 1488—1531）——士瓦本联盟军队司令官，镇压1519年符腾堡乌尔里希起义和1525年农民起义的主要策划者。——278、280、281、284、289—299、301—302、306、307。

特鲁拉夫，爱德华（Truelove, Edward 1809—1899）——英国出版商，欧文的信徒，宪章主义者，改革同盟和全国星期日同盟盟员；曾出版马克思的著作。——15。

梯也尔，阿道夫（Thiers, Adolphe 1797—1877）——法国国务活动家和历史学家，奥尔良党人，曾先后任内务大臣、贸易和公共事务大臣（1832—1836）、首相（1836和1840）；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第三共和国政府首脑（内阁总理）（1871）、总统（1871—1873）；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146、150、152、163、177、180、493、500、502、505、517、536、544、545、548、550、554、556—557。

帖木儿（跛帖木儿）（Tīmūr-i-lang [Tamerlane] 1336—1405）——中亚细亚的统帅和征服者，帖木儿王朝（1370—1507）的创立者。——684。

图恩费尔德，孔茨·冯（Thunfeld, Kunz von）——德国骑士，1476年是维尔茨堡主教的蕃臣，曾参加尼克拉斯豪森（维尔茨堡主教辖区）汉·伯海姆策动的农民密谋活动。——257、258。

图恩费尔德，米夏埃尔·冯（Thunfeld, Michael von）——德国骑士，1476年是维尔茨堡主教的蕃臣，曾参加尼克拉斯豪森（维尔茨堡主教辖区）汉·伯海姆策动的农民密谋活动，孔·图恩费尔德的儿子。——258。

图姆布(诺伊堡的),康拉德(Thumb von Neuburg, Konrad 1465—1525)——符腾堡公爵乌尔里希的顾问。——266。

托克维尔,沙尔·亚历克西斯·昂利·莫里斯·克莱雷勒·德(Tocqueville, Charles-Alexis-Henri-Maurice Clérel de 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正统主义者和立宪君主制的拥护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外交部长(1849年6—10月)。——545。

托里尼,皮埃尔·弗朗索瓦·伊丽莎白·勒利永·德(Thorigny, Pierre-François-Elisabeth Leullion de 1798—1869)——法国法学家,波拿巴主义者,1834年审理里昂四月起义者案件;第二共和国时期任内务部长(1851)。——555。

托马佐·安尼洛——见马赞尼洛。

W

瓦蒂梅尼尔,安东·弗朗索瓦·昂利·勒费夫尔·德(Vatimesnil, Antoine-François-Heinri Lefebvre de 1789—1860)——法国政治家,正统主义者,曾任教育大臣和教育部长(1828—1851),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49—1851)。——538。

瓦尔纳瓦(巴尔纳巴什)(Barnabás)——匈牙利教士,1514年匈牙利农民起义的领导人。——267。

瓦伊斯,克劳德·马里乌斯(Vaîsse, Claude-Marius 1799—1864)——法国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曾任内务部长(1851年1—4月)。——537。

威尔逊,詹姆斯(Wilson, James 1805—1860)——英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1847—1859),自由贸易论者;《经济学家》的创办人和编辑;曾任财政大臣(1853—1858)、印度财务大臣(1859—1860);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637、664。

威克利夫,约翰(Wycliffe, John 1324前后—1384)——英国神学家和宗教改革家;市民和骑士利益的代表者,曾为建立独立的不受罗马控制的英国教会而斗争,被天主教会定为异教徒。——237、238。

威廉第三,斯特拉斯堡主教——见洪施太因伯爵,威廉。

威廉一世(Wilhelm I 1781—1864)——符腾堡国王(1816—1864)。——445。

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Wellington, Arthur Wellesley, Duke of 1769—1852)——英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1808—1814年和1815年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任英军指挥官;历任军械总长(1818—1827),英军总司

令(1827—1828和1842—1852),首相(1828—1830),外交大臣(1834—1835)。——325。

韦厄,汉斯·雅科布(Wehe, Hans Jacob 死于1525年)——德国传教士,闵采尔的信徒;1525年是莱普海姆农军的领袖之一,农军失败后被杀。——253、280、284、290。

韦尔登男爵,弗兰茨·路德维希(Welden, Franz Ludwig Freiherr von 1782—1853)——奥地利将军,1848年参加对意大利的远征;曾任维也纳卫戍司令(1848年12月—1849年4月和1849年8月—1851年6月初),1849年4—5月任镇压匈牙利革命的奥军总司令。——326。

韦尔克尔,卡尔·泰奥多尔(Welcker, Karl Theodor 1790—1869)——德国法学家、政治家和自由派政论家;1831年起为巴登第二议院温和的自由主义反对派的领袖;1848年为巴登驻联邦议会全权代表,1848—1849年是预备议会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360、370、422。

韦尔泽家族——15—16世纪奥格斯堡的商人和银行世家;曾贷款给欧洲许多国家的君主。——278。

韦甘德(雷德维茨的)(Weigand von Redwitz 1522—1556)——德国神学家,班贝格主教,镇压班贝格主教辖区起义的策划者。——283、299。

韦隆,路易·德西雷(Véron, Louis-Désiré 1798—1867)——法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家,1848年前为奥尔良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巴黎评论》和《立宪主义者报》的所有人和发行人(1844—1852)。——577。

维埃伊拉(Vieyra)——法国上校,波拿巴主义者;1851年任国民自卫军参谋长;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参加者。——506。

维达尔,弗朗索瓦(Vidal, François 1814—1872)——法国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勃朗的追随者;1848年卢森堡宫委员会书记,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50—1851)。——168、169、176、517—518。

维吉尔(普卜利乌斯·维吉尔·马洛)(Publius Vergilius Maro 公元前70—19)——罗马诗人。——148。

维莱尔伯爵,让·巴蒂斯特·赛拉芬·约瑟夫(Villéle, Jean-Baptiste-Séraphin-Joseph, comte de 1773—1854)——法国国务活动家,正统主义者,曾任首相(1822—1828)。——545。

维特凯维奇,伊万·维克多罗维奇(Виткевич, Иван Викторович 死于1839年)——俄国军官,驻阿富汗外交代表(1837—1838)。——661。

维维安，亚历山大·弗朗索瓦·奥古斯特(Vivien, Alexandre-François-Auguste 1799—1854)——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1840年任司法大臣，1848年任卡芬雅克政府公共工程部长。——114。

魏德迈，约瑟夫(Weydemeyer, Joseph 1818—1866)——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军官、新闻工作者，"真正的"社会主义者(1846—1847)，《威斯特伐利亚汽船》编辑；曾参加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活动(1846)；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新德意志报》编辑(1849—1850)；共产主义者同盟法兰克福区部领导人(1849—1851)；1851年流亡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465。

魏特林，克里斯蒂安·威廉(Weitling, Christian Wilhelm 1808—1871)——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正义者同盟领导人，职业是裁缝；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和鼓动家；工人同盟的创始人，《工人共和国报》的出版者；1849年流亡美国，晚年接近国际工人协会。——14、21。

魏特莫泽尔，埃拉斯穆斯(Weitmoser, Erasmus)——德国手工业者，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萨尔茨堡起义矿工和农民的领袖。——310。

文迪施格雷茨公爵，阿尔弗勒德·坎迪杜斯·斐迪南(Windischgrätz, Alfred Candidus Ferdinand Fürst zu 1787—1862)——奥地利陆军元帅；1848年镇压布拉格六月起义和维也纳十月起义；1849年率领奥地利军队镇压匈牙利革命。——326、402—403、411、414、416、422。

文翰，赛米尔·乔治(Bonham, Samuel George 1803—1863)——英国殖民官员；1847—1852年任香港总督兼驻华全权公使和中国商务监督，1853年曾访问太平天国国都天京(南京)，试探太平军的对外政策。——620、673。

沃邦侯爵，塞巴斯蒂安·勒普雷特尔(Vauban, Sébastien Le Prêstre[Prestre], marquis de 1633—1707)——法国元帅，军事工程师，写有筑城学和围攻方面的著作以及经济学著作《王国什一税》。——157。

沃尔弗，弗里德里希·威廉(Wolff, Friedrich Wilhelm 鲁普斯 Lupus 1809—1864)——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论家，职业是教员，西里西亚农民的儿子，1834—1839年被关在普鲁士监狱；1846—1847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始人之一和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年3月起)，《新莱茵报》编辑(1848—1849)，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和科隆安全委员会委员；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左派；1849年流亡瑞士，1851年迁居英国，1853年起在曼彻斯特当教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

友。——447、455。

沃尔弗男爵，克里斯蒂安（Wolff, Christian Freiherr von 1679—1754）——德国哲学家，曾将莱布尼茨的哲学加以系统化和通俗化，开明的专制主义和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拥护者。——601。

沃伦，查理（Warren, Sir Charles 1798—1866）——英国军官，1858年起为将军，曾在印度任职（1816—1819和1830—1838）；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1854）。——688。

沃森，亨利（Watson, Henry 1737—1786）——英国工程师，上校，1764年起在东印度公司供职，在孟加拉任总工程师。——631。

乌迪诺，尼古拉·沙尔·维克多，雷焦公爵（Oudinot, Nicolas-Charles-Victor, duc de Reggio 1791—1863）——法国将军，奥尔良党人，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1849年指挥军队侵犯罗马共和国；曾任巴黎国民自卫军司令，试图组织力量抵抗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离开军界。——130—131、138—139、328、492、506、511。

乌尔里希（Ulrich 1487—1550）——符腾堡公爵（1498年起）；1519年被士瓦本联盟驱逐出符腾堡，1525年曾企图利用农民起义军进攻斯图加特，以图恢复公爵地位，1534年重新取得符腾堡公爵爵位。——265—267、278、279、281。

伍德，查理（Wood, Charles 1800—1885）——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曾任财政大臣（1846—1852），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1852—1855），海军首席大臣（1855—1858），印度事务大臣（1859—1866），掌玺大臣（1870—1874）。——677、678。

X

西马糜各厘（Seymour, Michael 1802—1887）——英国海军将领，1854—1856年参加克里木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1856—1858）任海军司令，其间曾率英军攻占虎门炮台及广州，随后又率舰队北上攻占大沽炮台。——620、669。

西塞罗（马可·土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 公元前106—43）——罗马国务活动家、雄辩家、著作家和哲学家。——626。

西斯蒙第，让·沙尔·莱奥纳尔·西蒙德·德（Sismondi, Jean-Charles-Léonard Simonde de 1773—1842）——瑞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政治经济学中浪漫学派的代表人物。——56、467。

希普勒，文德尔（Hipler, Wendel 1465前后—1526）——德国贵族，霍亨洛埃伯爵家族的总管；1525年参加法兰克尼亚农民起义；《海尔布朗纲领》的主要起草人；农民起义失败后逃脱，1526年被捕，死在狱中。——283、286、293—296。

咸丰（1831—1861）——中国清朝皇帝（1850—1861）。——609、613、627、634、645、650、651、658。

辛格尔，汉斯（辛格尔汉斯）（Singer, Hans [Singerhans]）——"穷康拉德"同盟和1514年士瓦本山区、符腾堡农民起义的领袖。——265。

匈牙利牧师——见雅科布（匈牙利牧师）。

休谟，约瑟夫（Hume, Joseph 1777—1855）——英国政治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议会议员。——677。

许乃济（1777—1839）——中国清朝官员，1834年任广东按察使，1836年任太常寺少卿，主张弛禁鸦片，遭到禁烟派的抨击，后被革职。——634。

雪恩，乌尔里希（Schön, Ulrich 死于1525年）——德国1525年农民战争的参加者，莱普海姆农军的领袖之一，后被俘并被处死。——280、290。

Y

雅科布（匈牙利牧师）（Jacob [Meister aus Ungarn]）——法国1251年牧童起义的领袖；据编年史记载，是匈牙利人。——236。

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公元前356—323）——古代著名的统帅，马其顿王（公元前336—323）。——185、525。

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 1777—1825）——俄国皇帝（1801—1825）。——325、399、402。

亚奇斯二世（Agis II 死于公元前401年）——斯巴达王（公元前427—401）；阿革西拉乌斯之兄。——539。

耶拉契奇，约西普，布日姆伯爵（Jellačič, Josip, Graf von Bužim 1801—1859）——奥地利将军，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和斯拉沃尼亚省总督（1848—1859），积极参加镇压奥地利和匈牙利的1848—1849年革命。——411、413、414、416、418、419。

叶卡捷琳娜二世（喀德邻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1729—1796）——俄国女皇（1762—1796）。——615。

叶名琛（1807—1859）——中国清朝官员，1848年起任广东巡抚，1852—1858年

任两广总督；1858年底广州陷落后被英军俘虏，送往印度；1859年4月殁于加尔各答。——620、650。

伊雍（Yon）——法国警官，第二共和国时期统帅立法议会警卫队（1850）。——524、528—529。

雨果，维克多·玛丽（Hugo, Victor-Marie 1802—1885）——法国作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流亡泽西岛；1855年底被英国当局驱逐出境，1870年回到法国，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第二帝国时期为参议员（1876）。——150、180、465、511。

约尔丹，西尔韦斯特尔（Jordan, Sylvester 1792—1861）——德国法学家和政治家，30年代黑森选帝侯国立宪民主运动的领袖；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360。

约翰（Johann 1782—1859）——奥地利大公，元帅，曾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9年为奥地利军队指挥官，1848年6月—1849年12月为德意志帝国摄政。——393、409、444。

约翰（忠实的）（Johann, der Beständige 1468—1532）——萨克森公爵，同魏森的弗里德里希三世共同摄政；1525年起为萨克森选帝侯；迫害闵采尔的魁首之一，镇压1525年图林根农民起义的策划者。——249。

约瑟夫二世（Joseph II 1741—1790）——奥地利女大公玛丽-泰莉莎的共同执政者（1765—1780），奥地利君主国执政（1780—1790），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65—1790）。——378、379。

约雅敬（Gioacchino da Fiore 约1132—1202）——意大利神父，中世纪基督教神秘主义者；卡拉布里亚的费罗拉隐修院院长；曾把世界历史分作三个时期，并预言在第三时期开始阶段将有一场巨变，接着将达到和平幸福的“安息世纪”；他的学说被天主教判为异端；其追随者后被称为“约雅敬派”。——245。

Z

扎波略，亚诺什（约翰）（Zápolya[Zapolya], János[Johann] 1487—1540）——特兰西瓦尼亚总督；曾率领贵族军队镇压1514年匈牙利农民起义，1526年被封为匈牙利国王。——268。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A

阿基里斯——古希腊神话中围攻特洛伊的一位最勇敢的希腊英雄，荷马的《伊利亚特》中的主要人物，他同希腊军队的领袖亚加米农的争吵和回到自己的营幕去，构成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一章的情节。据传说，阿基里斯出生时被母亲海洋女神西蒂斯握住脚跟倒浸在冥河水中，因此他的身体除没有浸水的脚跟外，不能被任何武器所伤害，后来，他因脚跟，即他身上那个唯一致命的地方中箭而身亡。后人用"阿基里斯之踵"比喻可以致命的地方和最弱的一环。——484、486。

安泰——古希腊神话中的巨人，海神波赛东和地神盖娅的儿子。战斗时，他只要身体不离土地，就能从母亲大地身上不断吸取力量，所向无敌。后来，海格立斯发现了他的这个特点，把他举起与地隔开，用手扼死。——142。

奥德赛(乌利斯)——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的主要人物，传说中的伊大卡岛国王，特洛伊战争时希腊军队领袖，以大胆、机智、善辩著称。传说他去过阴曹地府，同一些亡灵谈过话。——422。

奥菲士——古希腊神话中的诗人和歌手，他的歌声使猛兽俯首，顽石点头；他曾参加亚尔古船英雄们寻求金羊毛的远航。——136。

B

巴克科斯——古希腊神话中的酒神和快乐之神，又称狄奥尼索斯。据传说，他首创用葡萄酿酒，并将种植葡萄和采集蜂蜜的方法传遍四方。祭祀巴克科斯的方式是狂欢暴饮和疯狂舞蹈。——525。

巴托洛缪——圣经中的人物。——112、169。

保罗——据圣经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一；在信基督教之前叫扫罗。——455、471、573。

笨伯雅克——法国农民的讽刺性绰号。——94。

彼得——据圣经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一，三次不认自己的老师。——573。
彼得·施莱米尔——沙米索的中篇小说《彼得·施莱米尔奇遇记》中的主人公，他用自己的影子换来一个神奇的钱袋。——496。
波顿——见尼克·波顿。
波提乏——据圣经传说，是埃及法老的侍卫长，以愚忠和轻信著称。——148。

C

参孙——圣经中古犹太人的领袖，以身强力大著称。据《士师记》记载，参孙以留发不剃而具有神力，曾徒手撕裂狮子，以一块驴腮骨击杀1 000非利士人。——142。

D

达摩克利斯——古希腊传说中叙拉古暴君迪奥尼修斯（公元前4世纪）的宠臣。常说帝王多福，于是迪奥尼修斯请他赴宴，让他坐在自己的宝座上，并用一根马鬃将一把利剑悬挂在他的头上，让他知道帝王的忧患。后来“达摩克利斯剑”一词便成了“大祸临头”的同义语。——162、516。
大卫——据圣经传说，大卫幼年时撒母耳曾为其敷油，预许他继承扫罗王位。少年时值以色列王扫罗同非利士人作战，遇勇士歌利亚，军中无人能胜他。大卫自请出战，杀死歌利亚。后大卫继扫罗为以色列王。——115、506。
但以理——据圣经传说是先知，但以理书的作者。——246。
道勃雷——莎士比亚的喜剧《无事生非》中的人物，自大而愚蠢的官吏的化身。——670。

E

厄里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不和女神；佩琉斯同忒提斯结婚时，因忘了请厄里斯参加婚礼，她就投下了“不和的金苹果”，从而引起了赫拉、雅典娜和阿芙罗狄蒂之间的争执，最后导致了特洛伊战争的爆发。——540。

F

疯狂的罗兰——阿里欧斯托的同名长诗中的主人公。——123、655。
浮士德——歌德同名悲剧中的主要人物。——475。

G

戈尔迪——古希腊传说中的弗利基亚国王，据传说，他用乱结把轭系在马车的辕上，牢固不可解，声言能解此结者，得以统治整个亚洲，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拔剑斩开此结。"斩断戈尔迪之结"一语转意就是以大刀阔斧的方法解决复杂的问题。——185、436。

H

哈巴谷——圣经中的先知。——472。

哈姆雷特——莎士比亚同名悲剧和卡·谷兹科的剧作《维滕贝格的哈姆雷特》中的主要人物。——564。

哈努曼——印度传说中的神猴，后来被奉为印度教的毗湿奴的化身之一。——683。

好人儿罗宾——英国民间故事中的乐善好施、助人为乐的典型形象；是莎士比亚的喜剧《仲夏夜之梦》中的主要人物。——580。

J

基督——见耶稣基督。

教堂司事——莎士比亚的喜剧《无事生非》中的人物。——670。

K

克拉普林斯基——海涅的诗《两个骑士》中的主人公，一个破落的贵族；克拉普林斯基这个姓是由法文单词crapule（贪食、饕餮、酗酒以及懒汉、败类的意思）构成的。马克思用克拉普林斯基来暗指路易·波拿巴。——480。

克勒维尔——巴尔扎克的小说《贝姨》中的人物，是暴发户、贪财者和贪淫好色之徒的典型。——577。

L

理查三世——莎士比亚的同名悲剧中的主人公。——541、542。

路加——据基督教传说，是路加福音的作者。——246、249、251。

罗宾——见好人儿罗宾。

M

马凯尔，罗伯尔——法国演员弗·勒美尔特所塑造的和奥·多米耶画笔下的一个狡诈奸商的典型。罗·马凯尔的形象是对七月王朝时期金融贵族统治的讽刺。——82。

迈达斯——古希腊神话中的弗利基亚国王。据传说，太阳神阿波罗把迈达斯的耳朵变成一对驴耳。又据传说，他获得一种魔法，凡接触的东西都变成金子，结果食物也变成金子，他面临饿死的危险。——119。

摩洛赫——古腓尼基和迦太基的宗教中的太阳神、火神和战神，祭祀摩洛赫时要用活人作祭品，因此摩洛赫这一名字成了残忍、吞噬一切的暴力的化身。——630。

摩西——据圣经传说，摩西是先知和立法者，他带领古犹太人摆脱了埃及的奴役并给他们立下了约法。——155、246、548。

N

尼克·波顿——莎士比亚的喜剧《仲夏夜之梦》中的人物，织工，愚蠢的小人物的典型。——523。

涅墨西斯——古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共三人，又称依理逆司或厄默尼德。——137。

P

皮蒂娅——古希腊德尔斐城阿波罗神殿的女巫。——480。

S

撒巴拉——印度传说中的神牛，在印度教中被奉为财富和土地之神。——683。

撒旦——圣经中为恶魔的专称。——251、252。

撒母耳——据圣经传说，是古犹太先知；卡·谷兹科的悲剧《扫罗王》中的主人公。——467、506。

桑乔·潘萨——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诃德》中的人物，唐·吉诃德的侍从。——422。

扫罗——据圣经传说，是第一个以色列王。——115、573。

瑟西——古希腊神话中伊伊亚岛的女巫，她用魔法把奥德赛的同伴变成猪，

而把奥德赛留在岛上近一年；瑟西这个名字后来成了诱人的美女的代名词。——561。
施莱米尔——见彼得·施莱米尔。
舒夫特勒和斯皮格尔勃——席勒的悲剧《强盗》中的人物；丧尽天良的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的暴徒。——524。
斯芬克斯——古希腊神话中半截狮身半截美人的怪物。传说它常向过路人提出难猜的谜语，谁猜不出，谁就被它吃掉。后来谜底被奥狄浦斯道破，遂即自杀。今用以隐喻“谜”一样的人物。——92。
斯皮格尔勃——见舒夫特勒和斯皮格尔勃。

T

唐·吉诃德——塞万提斯的同名小说中的主要人物。——364、422。

W

乌利斯——见奥德赛。

X

西蒂斯——古希腊神话中的海洋女神，阿基里斯的母亲。——486。
西门——见彼得。
希西家——圣经中的人物，犹太王，亚哈斯之子及继承者。——246。

Y

雅赫维(耶和华)——犹太教中的主神。——573。
雅努斯——古罗马神话中的两面神，有前后两副面孔，一副向着过去，另一副朝向未来，掌管门户出入和水陆交通；后人用雅努斯这一名字比喻口是心非的人。——138、663。
耶稣基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始人。——241、245—247、252、475、515。
以利亚——圣经中的先知。——246。
以西结——圣经中的先知。——573。
约翰牛——18世纪英国作家约·阿巴思诺特在1712年写的政治讽刺小说《约翰牛传》中塑造的人物——一个急躁、坦率、滑稽的绅士形象，用以影射西班

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英国人。后来此名成为英国或英国人的绰号，广为流传。——641、644—648、651、652。
约瑟——圣经中的人物。据创世记记载，是犹太人的祖先雅各的第十一个儿子，被自己的兄弟出卖给埃及，成了埃及法老的侍卫长波提乏的仆人，以仁慈、贤能和正派著称，后成为法老的宰相。——148。
约西亚——圣经中的人物，亚们的儿子。据载，约西亚登基时年方八岁，在耶路撒冷做王31年，行耶和华眼中为正的事。——246。

Z

札格纳特——古印度教的大神之一毗湿奴的化身之一。——678、691。
祖莱卡——歌德的诗歌《致祖莱卡》中的主人公。——684。

文 献 索 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卡·马克思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载于1842年10月25、27、30日和11月1、3日《莱茵报》(科隆)第298、300、303、305和307号附刊(Verhandlungen des 6. rheinischen Landtags. Dritter Artikel: Debatten über das Holzdiebstahls-Gesetz.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298, 25. Oktober 1842. Beibl.; Nr. 300, 27. Oktober 1842. Beibl.; Nr. 303, 30. Oktober 1842. Beibl.; Nr. 305, 1. November 1842. Beibl.; Nr. 307, 3. November 1842. Beibl.)。——588。

《俄国的欺骗。——格莱斯顿的失败。——查理·伍德爵士的东印度改革》,载于1853年6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01号(The Russian humbug.- Gladstone's failure. - Sir Charles Wood's East Indian reforms.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801, 22. Juni 1853)。——678。

《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1871年伦敦版(The Civil War in France. Addres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London 1871)。——15。

《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致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1871年莱比锡版(Der Bürgerkrieg in Frankreich. Adresse des Generalraths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ziation an alle Mitglieder in Europa und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Leipzig 1871)。——6。

《雇佣劳动与资本》,载于1849年4月5、6、7、8和11日《新莱茵报》(科隆)第264、265、266、267和269号(Lohnarbeit und Kapital.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Nr. 264, 5. April 1849; Nr. 265, 6. April 1849; Nr. 266, 7. April 1849;

Nr. 267, 8. April 1849; Nr. 269. 11. April 1849)。——593。

《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1848年1月9日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召开的公众大会上》1848年布鲁塞尔版(Discours sur la question du libre échange, prononcé à l'Association Démocratique de Bruxelles, dans la séance publique du 9 janvier 1848. Imprimé aux frais de l'Association Démocratique. Bruxelles 1848)。——593。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于1844年《德法年鉴》(巴黎)第1—2期合刊(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 Einleitung. In: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Lfg. 1—2. Paris 1844)。——591。

《六月革命》,载于1848年6月29日《新莱茵报》(科隆)第29号(Die Junirevolution.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Nr. 29, 29. Juni 1848)。——103。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69年汉堡第2版(Der Achtzehnte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 2. Ausg. Hamburg 1869)。——465—467。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85年汉堡第3版(Der Achtzehnte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 3. Aufl. Hamburg 1885)。——468—469。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于1852年《革命。不定期刊物》(纽约)第1期(Der 18.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 In: Die Revolution. Eine Zeitschrift in zwanglosen Heften. Hrsg. von J. Weydemeyer. New York. 1852. H. 1)。——204、465、468。

《摩泽尔记者的辩护》,载于1843年1月15、17、18、19和20日《莱茵报》(科隆)第15、17、18、19和20号(Rechtfertigung des Korrespondenten von der Mosel. In: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 Köln. Nr. 15, 15. Januar 1843; Nr. 17, 17. Januar 1843; Nr. 18, 18. Januar 1843; Nr. 19, 19. Januar 1843; Nr. 20, 20. Januar 1843)。——588。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95年柏林版(Die Klassenkämpfe in Frankreich 1848 bis 1850. Berlin 1895)。——173。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载于1850年1—3月和5—10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伦敦—汉堡—纽约)第1—3期和第5—6期(Die Klassenkämpfe in Frankreich 1848 bis 1850.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London, Hamburg, New York. H. 1—3, Januar bis März 1850, H. 5—6, Mai bis Oktober 1850)。—— 204、488。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巴黎—布鲁塞尔版(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Réponse à la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de M. Proudhon. Paris, Bruxelles 1847)。——593。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柏林版(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H. 1. Berlin 1859)。——600。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载于1859年6月4日《人民报》第5期(Vorrede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In: Das Volk, No. 5, June 4, 1859)。——588、597。

《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批判分析》,赛·穆尔和爱·艾威林译自德文第3版,弗·恩格斯审定,1887年伦敦版上、下卷(Capital. A critical analysi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Transl. from the 3rd German ed. by S. Moore and E. Aveling and ed. by F. Engels. Vol. 1. 2. London 1887)。——15。

弗·恩格斯

《德国农民战争》,载于1850年5—10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伦敦—汉堡—纽约)第5—6期(Der deutsche Bauernkrieg.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London, Hamburg, New York. 1850. H. 5—6, Mai bis Oktober)。——203。

《德国农民战争》1870年莱比锡第2版(Der deutsche Bauernkrieg. 2. mit einer Einl. verb. Abdr. Leipzig 1870)。——203、213。

《德国农民战争》1875年莱比锡第3版(Der deutsche Bauernkrieg. 3. Abdr. Leipzig 1875)。——203。

《〈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1870年莱比锡版(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of "The Peasant War in Germany". Leipzig 1870)。——213。

《俄国在中亚细亚的进展》,载于1858年11月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471号(Russian Progress in Central Asia.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o. 5471, November 3, 1858)。——653。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载于1844年《德法年鉴》(巴黎)第1—2期合刊(Umrisse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ökonomie. In: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Lfg. 1—2. Paris 1844)。——592。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6年斯图加特第2版(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hums und des Staats. 2. Aufl. Stuttgart 1886)。——31。

《论住宅问题。第二篇: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1872年莱比锡版(Zur

Wohnungsfrage. H. 2: Wie die Bourgeoisie die Wohnungsfrage löst. Leipzig 1872)。——214。

《1844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附1886年附录和1887年序言，1888年纽约—伦敦版(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 With appendix written 1886, and preface 1887. New York, London 1888)。——9、14。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1845年莱比锡版(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Nach eigner Anschauung und authentischen Quellen. Leipzig 1845)。——593。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手稿)(Die deutsche Ideologie. Manuskripte 1845—1846)。——593。

《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发表)1848年伦敦版(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Veröffentlicht im Februar 1848. London 1848)。——5—6、11、17、25、62、593。

《共产党宣言》1869年日内瓦版(Манифесть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іи. Женева 1869)。——5、7、13、17。

《共产党宣言》1883年华沙—日内瓦版(Manifest Komunistyczny 1847 r. Warzawa, Genewa 1883)。——11、19。

《共产党宣言》1885年哥本哈根版(Det Kommunistiske Manifest. Med Forfatternes Forord. Efter den tredje avtoriserede tyske Udgave. In: Socialistisk Bibliotek. Udgivet af Det social-demokratiske Arbejderparti i Danmark. B. 1. Socialistiske Pjecer, København 1885)。——5、11、13、19。

《共产党宣言》1892年伦敦版(Manifest Komunistyczny. London 1892)。——5、23—24。

《共产党宣言》1893年米兰版(Il Manifesto del Partito Comunista con un nuovo proemio al lettore italiano F. Engels. Milano 1893)。——25—26。

《共产党宣言》，弗·恩格斯编辑并作注，1888年伦敦第3版(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Edited and annotated by F. Engels. 3. Ed. London 1888)。——11—16、19。

《共产党宣言》，附弗·恩格斯新序言，1890年伦敦增订第4版(Das Kommunistische Manifest. 4. autor. dtsch. Ausg. Mit einem neuen Vorwort von F.

Engels. London 1890)。——17—22。

《共产党宣言》，附作者序言，1872年莱比锡新版(Das Kommunistische Manifest. Neue Ausg. mit einem Vorw. der Verfasser. Leipzig 1872)。——5—6、8、15、18、188。

《共产党宣言》，经作者审定的德文第3版，附作者序言，1883年霍廷根—苏黎世版(Das Kommunistische Manifest. 3. autor. dtsch. Ausg. Mit Vorworten der Verfasser. Hottingen, Zürich 1883)。——9—10、17。

《共产党宣言》，译自1872年德文版，附作者序言，1882年日内瓦版(Манифесть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іи. Переводьсь нъмецкаго изданія 1872. Сь предисловіемь авторовь. Женева 1882)。——7—8、13、17。

《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发表)，载于1850年11月9、16、23和30日《红色共和党人》(伦敦)第21—24期(Manifesto of the German Communist Party. Published in February 1848. In: The Red Republican, Nos. 21—24, November 9, 16, 23, 30. London 1850)。——5、11。

《共产党宣言》，载于1871年11月21日《世界报》(Manifesto of the German Communist Party. In: The World. November 21, 1871)。——5。

《共产党宣言》，载于1871年12月30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纽约)第7期(Manifesto of the German Communist Party. In: Woodhull and Claflin's Weekly. New York. No. 7, December 30, 1871)。——5、12。

《共产党宣言》，载于1872年1月20、27日，2月10、17、24日和3月2、9、16、30日《社会主义者报》(纽约)第16—17，19—24和26期(Manifeste de Karl Marx. In: Le Socialiste. New York. Nos. 16—17, 19—24, 26; 20, 27 janv.; 10, 17, 24 fevr.; 2, 9, 16, 30 mars 1872)。——5、12。

《共产党宣言》，载于1885年8月29日，9月5、12、19、26日，10月3、10、17、24、31日和11月7日《社会主义者报》(巴黎)第1—11期(Manifeste du parti communiste. In: Le Socialiste. Paris. Nos 1—11; 29 août, 5, 12, 19, 26 septembre, 3, 10, 17, 24, 31 octobre, 7 novembre 1885)。——13、19。

《共产党宣言》，载于1886年6月11、18、25日，7月2、16、23、30日和8月6日《社会主义者报》(马德里)第14—17和19—22期(Manifesto del Partido Comunista. In: El Socialista. Madrid. Nos 14—17, 19—22; 11, 18, 25 Junio, 2, 16, 23, 30 Julio, 6 Agosto 1886)。——13、19。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年3月》，载于1851年6月28日《德累

斯顿新闻通报》第177号(Ansprache der Zentralbehörde an den Bund, März 1850. In: Dresdner Journal und Anzeiger. Nr. 177, 28. Juni 1851)。——188—199。

《流亡中的大人物。1852年》(Die großen Männer des Exils. 1852)。——599。

《时评。1850年5—10月》，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伦敦—汉堡—纽约)第5—6期(Revue. Mai bis Oktober 1850.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London, Hamburg, New York. 1850. H. 5—6)。——173。

其他作者的著作

B

巴拉盖·狄利埃，阿·《1849年7月7日在国民议会的演说》，载于1849年7月8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89号(Baraguay d'Hilliers, A.: Rede in der Assemblée nationale, 7. Juli 1849.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189, 8. Juli 1849)。——146。

巴罗，奥·《1849年1月12日在国民议会的演说》，载于1849年1月13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3号(Barrot, O.: Rede in der Assemblée nationale, 12. Januar 1849.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13, 13. Januar 1849)。——123。

巴塞尔曼，弗·丹·《1848年11月18日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演说》，载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国制宪国民议会辩论速记记录》1848年莱比锡版第5卷(Bassermann, F. D.: Rede in der 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 18. November 1848. In: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m Main. B. 5. Leipzig 1848)。——427。

贝列拉，伊·《董事会在1856年4月23日定期股东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于1856年4月26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17号(Péreire, I.: Rapport présenté par le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dans l'assemblée générale ordinaire des actionnaires du 23 avril 1856.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o. 117, 26 avril 1856)。——585—586。

贝林，汉·《十二条款陈情书》(Berlin, H.: Deklaration der zwölf Artikel)。——

286、294。

波拿巴，路·拿·《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致立法议会的咨文。1849年10月31日》，载于1849年11月1日《总汇通报》(巴黎)第305号(Bonaparte, L. N.: Message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à l'Assemblée législative, le 31 octobre 1849.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305, 1. November 1849)。——162、513。

波拿巴，路·拿·《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致立法议会的咨文。1849年11月1日于巴黎》，载于1849年11月1日《总汇通报》(巴黎)第305号(Bonaparte, L. N.: Message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à l'Assemblée législative, Paris, le 1 novembre 1849.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305, 1. November 1849)。——151、510、555。

波拿巴，路·拿·《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致立法议会的咨文。1850年11月12日》，载于1850年11月13日《总汇通报》(巴黎)第317号(Bonaparte, L. N.: Message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à l'Assemblée législative, le 12 novembre 1850.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317, 13 November 1850)。——526—527、547。

波拿巴，路·拿·《共和国总统给侍卫官埃德加·奈伊中校(罗马)的信。1849年8月18日于国民宫》，载于1849年9月7日《总汇通报》(巴黎)第250号(Bonaparte, L. N.: Lettre adressée par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au lieutenant-colonel Edgar Ney, son officier d'ordonnance, à Rome. Elysée-National, le 18 août 1849.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250, 7. September 1849)。——149、510。

波拿巴，路·拿·《共和国总统给乌迪诺将军的信。1849年5月8日于国民宫》，载于1849年5月10日《人民报》(巴黎)第172号(Bonaparte, L. N.: Lettre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au général Oudinot. Elysée-National, 8. Mai 1849. In: Le Peuple. Journal de la république democratique et sociale. Paris. Nr. 172, 10. Mai 1849)。——131、511。

波拿巴，路·拿·《共和国总统致法国人民。1849年6月13日于巴黎》，载于1849年6月14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65号(Bonaparte, L. N.: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au peuple français. Paris, le 13 juin 1849.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165, 14. Juni 1849)。——506。

波拿巴，路·拿·《拿破仑观念》1839年巴黎版(Bonaparte, L. N.: Des idées

napoléoniennes. Paris 1839)。——492、513、569—572。

波拿巴，路·拿·《1851年11月25日在伦敦工业博览会颁奖仪式上的讲话》，载于1851年11月26日《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巴黎)(Bonaparte, L. N.: Rede anläßlich der Verleihung von Preismedaillen für die Londoner Industrieausstellung, 25. November 1851. In: 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 Paris. 26. November 1851)。——556—557。

伯恩斯，詹·《就亚·伯恩斯爵士公务信札被篡改一事所作的声明》，载于1858年2月3日《自由新闻》(伦敦)第5期(Burnes, J.: Statements about the forgery of the dispatches of Sir A. Burnes. In: The Free Press. London. No. 5, February 3, 1858)。——661。

《柏林第一届联合省议会。1847年》，第一部分：《王国政府的建议、信函、备忘录、记录和其他文件》；第三部分：《辩论，根据速记记录整理》1847年柏林版(Der Erste Vereinigte Landtag in Berlin 1847. Th. 1: Königliche Propositionen und Botschaften, Denkschriften, Protokolle und andere Aktenstücke. Th. 3: Verhandlungen nach den stenographischen Berichten. Berlin 1847)。——367。

布阿吉尔贝尔，皮·《法国详情》，载于《18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欧·德尔编，1843年巴黎版(Boisguillebert, P.: Le détail de la France. In: Économists financiers du XVIIIe siècle. Préc. de notices historiques sur chaque auteur, et accompagnés de commentaires et de notes explicatives, par E. Daire. Paris 1843)。——157。

布阿吉尔贝尔，皮·《法兰西辩护书》，载于《18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欧·德尔编，1843年巴黎版(Boisguillebert, P.: Factum de la France. In: Économists financiers du XVIIIe siècle. Préc. de notices historiques sur chaque auteur, et accompagnés de commentaires et de notes explicatives, par E. Daire. Paris 1843)。——157。

布阿吉尔贝尔，皮·《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载于《18 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欧·德尔编，1843年巴黎版(Boisguillebert, P.: Dissertation sur la nature des richesses, de l'argent et des tributs. In: Économists financiers du XVIIIe siècle. Préc. de notices historiques sur chaque auteur, et accompagnés de commentaires et de notes explicatives, par E. Daire. Paris 1843)。——157。

C

查普曼,约·《印度的棉花和贸易及其与大不列颠的利害关系,兼评孟买管区的铁路交通》1851年伦敦版(Chapman, J.: The cotton and commerce of India, considered in relation to the interests of Great Britain; with remarks on railway communication in the Bombay Presidency. London 1851)。——688。

D

丹东,雅·《1792年9月2日在立法议会的演说》,载于1792年9月4日《国民报,或总汇通报》(巴黎)第248号(Danton, J.: Rede in der Assemblée nationale, 2. September 1792. In: Gazette nationale, ou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248, 4. September 1792)。——446。

狄金逊,约·《官僚制度下的印度管理》1853年伦敦—曼彻斯特版(Dickinson, J.: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under a bureaucracy. London, Manchester 1853)。——687。

迪斯累里,本·《1857年2月3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7年2月4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2595号(Disraeli, B.: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February 3, 1857. In: The Times. London. No.22595, February 4, 1857)。——668。

F

费里埃,弗·路·《论政府和贸易的相互关系》1805年巴黎版(Ferrier, F. L.: Du gouvernement considéré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e commerce, Paris 1805)。——596。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给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代表团的答复》,载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国制宪国民议会辩论速记记录》184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8卷(Friedrich-Wilhelm IV.: Antwort an eine Abordnung der 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 In: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m Main. B. 8. Frankfurt am Main 1849)。——440。

福适,莱·《关于结社权的法律草案(摘要)》,载于1849年1月28日《新莱茵报》(科隆)第207号(Faucher, L.: Gesetzentwurf über das Assoziationsrecht. Ausz.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Nr. 207, 28. Januar 1849. 2. Ausg.)。——125。

傅立叶,沙·《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1808年巴黎第1版(Fourier, Ch.:

Théorie des quatre mouvements et des destinées générales. Prospectus et annonce de la découverte. 1. ed. Paris 1808)。——584。

G

《告法国人民书》，载于1849年6月13日《和平民主日报》(巴黎)第161号(Au peuple français. In: Démocratie pacifique. Paris. Nr. 161, 13. Juni 1849. Morgenausg.)。——142、502—503。

《告人民书》，载于1850年8月14日《1850年人民报》(巴黎)第7号(Au peuple! In: Le Peuple de 1850. Paris. Nr. 7, 14. August 1850)。——180。

《关于解散匈牙利议会和任命克罗地亚的耶拉契奇总督为匈牙利民事和军事最高长官的圣谕。1848年10月3日》，载于1848年10月5日《维也纳日报》第275号(Königliches Rescript über die Auflösung des ungarischen Reichstages und die Ernennung des Banus Jellačić von Kroatien zum Zivil- und Militärgouverneur in Ungarn vom 3. October 1848. In: Wiener Zeitung. Nr. 275, 5. Oktober 1848)。——413。

《关于意大利事件的决议。1849年5月8日于巴黎》，载于1849年5月10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30号(Résolution relative aux affaires d'Italie. Paris, le 8 mai 1849.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130, 10. Mai 1849)。——139、502。

H

黑格尔，乔·威·弗·《法哲学原理，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1833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8卷)(Hegel, G. W. F.: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oder Naturrecht und Staatswissenschaft im Grundrisse. Hrsg. von Ed. Gans. Berlin 1833. Werke. Vollst. Ausg.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 B. 8)。——361。

黑格尔，乔·威·弗·《精神现象学》1807年班贝格—维尔茨堡版(《黑格尔全集》第2卷)(Hegel, G. W. F.: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Hrsg. von J. Schulze. Bamberg, Würzburg 1807. Werke. Vollst. Ausg.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 Verewigten… B. 2)。——602。

黑格尔，乔·威·弗·《历史哲学讲演录》1837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9卷)(Hegel, G. W. F.: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Hrsg. von Ed. Gans. Berlin 1837. Werke. Vollst. Ausg.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 B. 9)。——470。

黑格尔,乔·威·弗·《逻辑学》(两卷集)第1部《客观逻辑》第2编《本质论》1841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4卷)(Hegel, G. W. F.: Wissenschaft der Logik. Th. 1. 2. Th. 1. Die objektive Logik. Abth. 2. Die Lehre vom Wesen. Hrsg. von L. von Henning. Berlin 1841. Werke. Vollst. Ausg.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 B. 4)。——601。

黑格尔,乔·威·弗·《美学讲演录》1835—1838年柏林版第1—3卷(《黑格尔全集》第10卷)(Hegel, G. W. F.: Vorlesungen über die Aesthetik. Hrsg. von H. G. Hotho. B. 1—3. Berlin 1835—1838. Werke. Vollst. Ausg.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 B. 10)。——602。

黑格尔,乔·威·弗·《哲学史讲演录》1833年和1836年柏林版第1—3卷(《黑格尔全集》第13—15卷)(Hegel, G. W. F.: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Hrsg. Von K. L. Michelet. B. 1—3. Berlin 1833 u. 1836. Werke. Vollst. Ausg.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 Verewigten… B. 13—15)。——602。

霍格,詹·《1853年6月6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3年6月7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448号(Hogg,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6. Juni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48, 7. Juni 1853)。——677。

K

卡贝,埃·《伊加利亚旅行记。哲学和社会小说》1842年巴黎第2版(Cabet, É.: Voyage en Icarie, roman philosophique et social. 2. éd. Paris 1842)。——64。

卡尔利埃,皮·《警察局长的声明。1849年11月10日于巴黎》,载于1849年11月11日《总汇通报》(巴黎)第315号(Carlier, P.: Proclamation du préfet de police. Paris, le 10 novembre 1849.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315, 11. November 1849)。——162。

坎伯尔,乔·《现代印度。民政管理制度概述。卷首附当地居民及其制度的某些材料》1852年伦敦版(Campbell, G.: Modern India: a sketch of the system of civil government. To which is prefixed, some account of the natives and native institutions. London 1852)。——689。

库克,乔·温·《中国:1857—1858年〈泰晤士报〉特约中国通讯》1858年伦敦版(Cooke, G. W.: China: being “the Times”special correspondence from China

in the years 1857—1858. London 1858)。——638、640、651。

L

拉弗尔斯,托·斯·《爪哇史》(两卷集)1817年伦敦版(Raffles, Th. S.: The history of Java. With a map and plates. In 2 vols. London 1817)。——678—679、681—682。

拉罗什雅克兰,昂·奥·《1848年2月24日在众议院的演说》,载于1848年2月25日《总汇通报》(巴黎)第56号(Larochejaquelein, H. -A.: Rede in der Chambre des Députés, 24. Februar 1848.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56, 25. Februar 1848)。——86。

拉马丁,阿·《1848年2月24日在众议院的演说》,载于1848年2月25日《总汇通报》(巴黎)第56号(Lamartine, A.: Rede in der Chambre des Députés, 24. Februar 1848.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56, 25. Februar 1848)。——90。

拉斯卡斯,艾·奥·《圣赫勒拿岛回忆录。拿破仑十八月言行日录》(八卷集)1840年巴黎版第1—5卷(Las Cases, E. A.: Mémorial de Sainte-Hélène, ou Journal Oùse trouve consigné, jour par jour, ce qu'a dit et fait Napoléon durant dix-huit mois. T. 1—8. T. 1—5. Paris 1840)。——561。

赖德律-洛兰,亚·奥·《1849年6月11日在国民议会的演说》,载于1849年6月12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63号(Ledru-Rollin, A. A.: Rede in der Assemblée nationale, 11. Juni 1849.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163, 12. Juni 1849)。——502。

李斯特,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版第1卷(List, F.: 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 1. Stuttgart, Tübingen 1841)。——596。

路德,马·《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1525年维滕贝格版(Luther, M.: Ermanunge zum fride auff die zwelff artickel der Bawrenschafft ynn Schwaben. Auch widder die reubischen vnd mördisschen rotten der andern Bawren. Wittenberg 1525)。——243。

路德,马·《关于教会特权制的改革给德意志基督教贵族的公开信》1520年维滕贝格版(Luther, M.: An den Christlichen Adel deutscher Nation: von des Christlichen standes besserung. Wittenberg 1520)。——241。

路德,马·《就反对农民的小册子发的通函》1525年版(Luther, M.: Ein Sendbrief

von dem harten Büchlein wider die Bauern. 1525)。——243。

路德,马·《为反对叛逆的妖精致萨克森诸侯书》1524年维滕贝格版(Luther, M.: Eyn brieff an die Fürsten zu Sachsen von dem auffrürischen geyst. Wittenberg 1524)。——251。

路德,马·《1525年2月4日给约·布里斯曼的信》,引自威·威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2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Luther, M.: Brief an Johann Brießmann, 4. Februar 1525. Nach: W. Zimmermann: Allgemeine Geschichte des großen Bauernkrieges. Th. 2. Stuttgart 1842)。——252。

路德,马·《1525年5月30日给约翰·吕埃尔的信》,引自威·威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3年斯图加特版第3卷(Luther, M.: Brief an Johann Rühel, 30. Mai 1525. Nach: W. Zimmermann: Allgemeine Geschichte des großen Bauernkrieges. Th. 3. Stuttgart 1843)。——243—244。

M

《马丁·路德论温克尔麦斯的信》,引自威·威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2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M.Luther's Schrift von der Winkelmesse. Nach: W. Zimmermann: Allgemeine Geschichte des großen Bauernkrieges. Th. 2. Stuttgart 1842)。——245。

马丁,罗·蒙·《论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1847年伦敦版第2卷(Martin, R. M.: China: Political, Commercial, and Social. Vol. 2. London 1847)。——629—631。

麦格雷戈,约·《欧美若干国家的商业税则、条例、资源和贸易》1847年伦敦版(MacGregor, J.: Commercial Tariffs and Regulations, Resources, and Trade of the Several States of Europe and America. London 1847)。——645。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国制宪国民议会辩论速记记录》1848—184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1、8、9卷,莱比锡版第2—7卷(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m Main. B. 1. 8. 9. Frankfurt am Main, B. 2—7. Leipzig 1848—1849)。——422、435、440—444、447、456。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意志帝国立法议会的辩论》184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4卷(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verfassunggebenden Reichs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m Main. B. 4. Frankfurt am Main 1849)。——435、440—444。

蒙塔朗贝尔,沙·《1856年5月31日在立法议会的演说》,载于1856年6月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2386号(Montalembert, Ch.: Speech at the meeting of the Corps législatif on May 31,1856. In: The Times. London. No. 22386, June 5, 1856)。——582。

闵采尔,托·《布拉格宣言》,引自威·威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2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Müntzer, Th.: Prager Proklamation. Nach: W. Zimmermann: Allgemeine Geschichte des großen Bauernkrieges. Th. 2. Stuttgart 1842)。——246。

闵采尔,托·《对诸侯讲道。解释〈但以理书〉第二章,由上帝的代言者托马斯·闵采尔在阿尔施泰特宫对积极的、可敬的诸侯们和萨克森的执政者们进行讲解》。——见托·闵采尔《1524年7月13日在阿尔施泰特宫对诸侯讲道》。

闵采尔,托·《根据路加对福音的证明来公开驳斥不忠实世界的错误信仰,使可怜的和不幸的基督教界知道它的迷途》,引自威·威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2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Müntzer,Th.: Außgetrückte emplössung des falschen Glaubens der vngetrewen welt durchs Gezeügnus des Euangelions Luce vorgetragen der elenden erbermlichen Christenheyt zur innerung jres Irsals. Ezechie am 8. Cap. Lieben gesellen last vns auch das loch weytter machen auff das alle wellt sehen vnnd greyffen müg wer vnser grosse Hansen sind die Got also lesterlich zum gemalten mendleyn gemacht haben. Jere. am 23. Cap. Thomas Müntzer mit dem hammer. Nach: W. Zimmermann: Allgemeine Geschichte des großen Bauernkrieges. Th. 2. Stuttgart 1842)。——249—251。

闵采尔,托·《为反驳维滕贝格的不信神、生活安逸、以歪曲方式剽窃圣经从而使可怜的基督教惨遭玷污的人而作的立论充分的抗辩和答复》1524年纽伦堡版,引自威·威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2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Müntzer,Th.: Hoch verursachte Schutzrede vnd Antwort wider das Gaistloße Sanfft lebende fleysch zu Wittenberg welches mit verkärter weyße durch den Diepstal der heiligen schrift die erbermliche Christenheit also gantz jämerlichen besudelt hat. Nürnberg 1524. Nach: W. Zimmermann: Allgemeine Geschichte des großen Bauernkrieges. Th. 2. Stuttgart 1842)。——252。

闵采尔,托·《1522年3月27日给菲力浦·梅兰希顿的信》,引自威·威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2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Müntzer,Th.: Brief an Philipp Melanchthon, 27. März 1522. Nach: W. Zimmermann: Allgemeine Geschichte

des großen Bauernkrieges. Th. 2. Stuttgart 1842)。——250—251。

闵采尔,托·《1524年7月13日在阿尔施泰特宫对诸侯讲道》,引自威·威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2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Müntzer, Th.: Fürstenpredigt am 13. Juli 1524 im Schloß zu Allstedt. Nach: W. Zimmermann: Allgemeine Geschichte des großen Bauernkrieges. Th. 2. Stuttgart 1842)。——246、249、250。

N

诺兰,刘·爱·《骑兵的历史与战术》1854年伦敦第2版(Nolan, L. E.: Cavalery. Its history and tactics. sec. ed. London 1854)。——623。

P

帕麦斯顿,亨·约·坦·《1857年2月3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7年2月4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2595号(Palmerston, H. J. T.: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February 3, 1857. In: The Times. London. No. 22595, February 4, 1857)。——668。

帕麦斯顿,亨·约·坦·《1857年3月20日在市长官邸举行的宴会上的演说》,载于1857年3月21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2364号(Palmerston, H. J. T.: Speech at the Ministerial banquet at the Mansion House on March 20, 1857. In: The Times. London. No. 22364, March 21, 1857)。——618。

蒲鲁东,皮·约·《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1852年巴黎版(Proudhon, P. J.: La révolution sociale démontrée par le coup d'état du 2 décembre. Paris 1852)。——465。

蒲鲁东,皮·约·《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1—2卷(Proudhon, P. J.: 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T. 1. 2. Paris 1846)。——61。

蒲鲁东,皮·约·《致公民赖德律-洛兰、沙尔·德勒克吕兹、马丁·贝尔纳等人和伦敦〈流亡者报〉的编辑们。1850年7月20日》,载于1850年7月《1850年人民报》(巴黎)第2期(Proudhon, P. J.: Aux citoyens Ledru-Rollin, Charles Delescluze, Martin Bernard, et consorts, Redacteurs du Proscrit, a Londres. 20 juillet 1850. In: Le Peuple de 1850. Paris, Nr. 2, Juli 1850)。——505。

Q

威美尔曼,威·《伟大农民战争通史》(三卷集)1841—1843年斯图加特版(Zimmermann, W.: Allgemeine Geschichte des großen Bauernkrieges. Th. 1—3. Stuttgart 1841—1843)。——203、240、241、243—246、249—252、255、257—258。

S

萨尔蒂科夫,阿·德·《印度信札》1848(可能是1849)年巴黎版(Saltykow, A. D.: Lettres sur l'Inde. Paris 1848 [vielm.1849])。——690。

赛居尔·达居索,雷·约·保·《1850年3月16日在国民议会的演说》,载于1850年3月17日《总汇通报》(巴黎)第76号(Ségur d'Aguesseau, R.-J.-P. de: Rede in der Assemblée nationale, 16. März 1850.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76, 17. März 1850)。——169。

沙尔腊斯,让·巴·《1815年滑铁卢会战史》1857年布鲁塞尔版(Charras, J. -B.: Histoire de la campagne de 1815, Waterloo. Avec un atlas nouvau. Bruxelles 1857)。——466。

《山岳党告法国人民的宣言。1849年6月12日于巴黎》,载于1849年6月13日《人民报》(巴黎)第206号(Déclaration de la Montagne au peuple français. Paris, 12 juin 1849. In: Le Peuple. Paris. Nr. 206, 13. Juni 1849)。——142、502。

《山岳党告人民书》,载于1850年8月11日《1850年人民报》(巴黎)第6号(Compte rendu de la Montagne au peuple. In: Le Peuple de 1850. Paris. Nr. 6, 11. August 1850)。——180。

尚加尔涅,尼·安·泰·《报告。1849年6月16日于巴黎》,载于1849年6月20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71号(Changarnier, N. -A. -Th.: Rapport. Paris, le 16 juin 1849.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171, 20. Juni 1849)。——137。

《十二条款》,引自威·威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2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Zwölf Artikel. Dye Grundtlichen Vnd rechten haupt Artickel aller Baurschafft vnnd Hyndersessen der Gaistlichen vnd Weltlichen oberkayten von wölchen sy sich beschwert vermainen. Nach: W. Zimmermann: Allgemeine Geschichte des großen Bauernkrieges. Th. 2. Stuttgart 1842)。——278—279、281—282、284、286。

《书简》，引自威·威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2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Artikelbrief. Nach: W. Zimmermann: Allgemeine Geschichte des großen Bauernkrieges. Th. 2. Stuttgart 1842)。——278、281、282。

苏，欧·《巴黎的秘密》(十一卷集)1842—1844年布鲁塞尔版(Sue, E.: Les mystères de Paris. Vol. 1—11. Bruxelles 1842—1844)。——163。

T

《弹劾内阁的控诉书。——山岳党和蒲鲁东派的和解》，载于1849年1月31日《新莱茵报》(科隆)第209号(Der Anklageakt gegen das Ministerium. –Die Aussöhnung der Montagnards und Proudhonisten.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Nr. 209, 31. Januar 1849)。——131。

梯也尔，路·阿·《1850年2月23日在国民议会的演说》，载于1850年2月24日《总汇通报》(巴黎)第55号(Thiers, L. A.: Rede in der Assemblée nationale, 23. Februar 1850.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55, 24. Februar 1850)。——152、180。

W

《王国政府致王国驻临时中央政府的全权代表的通告。1849年4月28日》，载于1849年4月30日《普鲁士国家通报》(柏林)第117号(Schreiben der Königlichen Regierung an den Königlichen Bevollmächtigten bei der provisorischen Centralgewalt. Vom 28. April 1849. In: 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 Berlin. Nr. 117, 30. April 1849)。——442。

维达尔，弗·《论财富的分配，或论社会经济的公正分配》1846年巴黎版(Vidal, F.: De la répartition des richesses, ou de la justice distributive en économie sociale; ouvrage contenant l'examen critique des théorie sexposées soit par les économistes, soit par les socialistes. Paris 1846)。——168。

沃邦，塞·《王国什一税》(Vauban, S.: Projet de dime royale)。——157。

沃尔弗，弗·威·《1849年5月26日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演说》，载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国制宪国民议会辩论速记记录》184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9卷(Wolff, F. W.: Rede in der 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 26. Mai 1849. In: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m Main. B. 9. Frankfurt

am Main 1849)。——455。

伍德,查·《1853年6月3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3年6月4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446号(Wood, Ch.: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3. Juni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446, 4. Juni 1853)。——677。

X

西斯蒙第,让·沙·莱·西蒙德·德·《政治经济学概论》1837年巴黎版第1卷(Sismondi, J. -Ch. -L. Simonde de: Etudes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 T. 1. Paris 1837)。——467。

《宪法之友民主协会宣言。1849年6月13日》,载于1849年6月13日《人民报》(巴黎)第206号(Manifest der Association démocratique des amis de la Constitution. 13. Juin 1849. In: Le Peuple. Paris. Nr. 206, 13. Juni 1849)。——142。

Y

《印度的铁路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附地图和附录》,一位印度老邮递员著,1848年伦敦第3版(Indian railways and their probable results, with maps and an appendix, containing statistic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mmerce of India. By an old Indian Postmaster. 3. ed. London 1848)。——688。

雨果,维·《小拿破仑》1852年伦敦版(Hugo, V.: Napoléon le petit. Londres 1852)。——465。

Z

《中国的贸易及其直接的与间接的重要意义》,载于1859年9月17日《经济学家》(伦敦)第838期(The Trade of China. It's Importance, Direct and Indirect. In: The Economist. London. No. 838, September 17, 1859)。——664—665。

《中国的灾难》,载于1859年9月17日《经济学家》(伦敦)第838期(The Disaster in China. In: The Economist. London. No. 838, September 17, 1859)。——664—665。

法律、法令、条例、文件

A

《奥地利帝国宪法。1849年3月4日》，载于1849年3月8日《维也纳日报》第57号（Reichs-Verfassung für das Kaiserthum Oesterreich. Vom 4. März 1849. In: Wiener Zeitung. Nr. 57, 8. März 1849）。——431、433、436。

《奥地利帝国宪法原本。1848年4月25日》，载于1848年4月25日《维也纳日报》第115号（Verfassungs-Urkunde des Oesterreichischen Kaiserstaates vom 25. April 1848. In: Wiener Zeitung. Nr. 115, 25. April 1848）。——411。

C

《查理五世皇帝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刑罚法规》，根据1533年原版重印…… 约·克·科赫作序，1787年吉森增订第4版（Hals oder Peinliche Gerichtsordnung Kaiser Carls V. u. d. H. Röm. Reichs nach d. Originalausg.Vom J. 1533 auf das genaueste abgedr. u. e. Vorr. von J. Chr. Koch. 4. verm. Ausg. Giessen 1787）。——232。

D

《德意志帝国宪法。1849年3月28日》，载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意志帝国立法议会的辩论》184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4卷（Verfassung des deutschen Reiches vom 28. März 1849. In: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verfassunggebenden Reichs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m Main. B. 4. Frankfurt am Main 1849）。——435—445。

《帝国国民议会议员选举法》184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Reichsgesetz über die Wahlen der Abgeordneten zum Volkshause. Frankfurt am Main 1849）。——410、437。

《东印度文件。喀布尔和阿富汗》，根据下院1859年6月8日的决议刊印，1859年伦敦版（Papers. East India. Cabul and Affghanistan.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8 June, 1859. London 1859）。——660—662。

F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关于坚持帝国宪法的决议。1849年4月11日》，载于《法兰克福德国制宪国民议会辩论速记记录》184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8卷（Beschluß der 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 an der Reichsverfassung festzuhalten, vom 11. April 1849. In: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m Main. B. 8. Frankfurt am Main 1849）。——440。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关于任命德国临时摄政政府的决议。1849年6月6日》，载于《法兰克福德国制宪国民议会辩论速记记录》184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9卷（Beschluß der 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 über die Einsetzung der provisorischen Regentschaft von Deutschland vom 6. Juni 1849. In: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m Main. B. 9. Frankfurt am Main 1849）。——456。

《法兰西共和国宪法。1848年11月4日于巴黎》，载于1848年11月7日《总汇通报》（巴黎）第312号（Constitution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Paris, le 4 novembre 1848.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312, 7. November 1848）。——112—170、483—488、502。

G

《关于巴黎到阿维尼翁铁路的法案。摘录》，载于1849年8月9日《总汇通报》（巴黎）第221号增刊（Projet de loi relatif au chemin de fer de Paris à Avignon. Ausz.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221, 9. August 1849. Suppl.）。——156。

《关于保留1850年度酒税的法令。1849年12月20日于巴黎》，载于1849年12月21日《总汇通报》（巴黎）第355号（Loi relative au maintien de l'impôt sur les boissons pour l'année 1850. Paris, le 20 décembre 1849.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355, 21. Dezember 1849）。——155—157、162、513。

《关于保证工人能以劳动维持生存的法令。1848年2月25日于巴黎》，载于1848年2月26日《总汇通报》（巴黎）第57号（Décret pour garantir l'existence de l'ouvrier par le travail. Paris, le 25 février 1848.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57, 26. Februar 1848)。——87。

《关于报刊杂志缴纳保证金的法令。1848年8月9日于巴黎》,载于1848年8月12日《总汇通报》(巴黎)第225号(Décret relatif aux cautionnements des journaux et écrits périodiques. Paris, le 9 août 1848.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225, 12. August 1848)。——109。

《关于成立普鲁士王国等级委员会的决定。1842年6月21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42年柏林版第20号(Verordnung über die Bildung eines Ausschusses der Stände des Königreichs Preußen. Vom 21. Juni 1842. In: 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Berlin. 1842. Nr. 20)。——365。

《关于额尔金伯爵赴华赴日特别使命的函件。1857—1859年》1859年伦敦版(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Earl of Elgin's special Missions to China and Japan, 1857—1859. London 1859)。——656—657、668—669、672—676。

《关于建立人民自卫团的法律。1849年6月16日》,载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国制宪国民议会辩论速记记录》184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9卷(Gesetz vom 16. Juni 1849 über die Bildung der Volkswehr. In: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m Main. B. 9. Frankfurt am Main 1849)。——456。

《关于将来处理全部国债事务的规定。1820年1月17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20年柏林版第2号(Verordnung wegen der künftigen Behandlung des gesamten Staatsschulden-Wesens. Vom 17. Januar 1820. In: 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Berlin. 1820. Nr. 2)。——364。

《关于将要建立的人民代议机关的规定。1815年5月22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15年柏林版第9号(Verordnung über die zu bildende Repräsentation des Volks. Vom 22. Mai 1815. In: 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Berlin. 1815. Nr. 9)。——365。

《关于解散第二议院和近期召开第一议院会议的决定。1849年4月27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49年柏林版第13号(Verordnung, betreffend die Auflösung der zweiten und die Vertagung der ersten Kammer. Vom 27. April 1849. In: 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Berlin. 1849. Nr.13)。——442—443。

《关于解散克雷姆西尔帝国议会和颁布宪法的决定》,载于1849年3月8日《维也

纳日报》第57号(Verordnung über die Auflösung des Reichstages in Kremsier und die Verkündung der Verfassung. In: Wiener Zeitung. Nr. 57, 8. März 1849)。——429、431。

《关于解散为了商定宪法而召集的议会的决定。1848年12月5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48年柏林版第55号(Verordnung, betreffend die Auflösung der zur Vereinbarung der Verfassung berufenen Versammlung. Vom 5. Dezember 1848. In: 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Berlin.1848. Nr. 55)。——425。

《关于俱乐部的法令。1848年7月28日于巴黎》,载于1848年8月2日《总汇通报》(巴黎)第215号(Décret sur les clubs. Paris, le 28 juillet 1848.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215, 2. August 1848)。——127。

《关于流放已确认参加6月23日事件的在押犯的法令。1848年6月27日于巴黎》,载于1848年6月30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82号(Décret sur la transportation des individus actuellement détenus qui seront reconnusavoir pris part à l'insurrection du 23 juin et des jours suivants. Paris, le 27 juin 1848.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182, 30. Juni 1848)。——118。

《关于秘密投票选举的法令。1851年12月4日》,载于1851年12月5日《总汇通报》(巴黎)第339号(Décret sur la loi électorale au scrutin secret, le 4 décembre 1851.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339, 5. Dezember 1851)。——562—563。

《关于任命镇长及其助理的法案》,载于1850年3月2日《总汇通报》(巴黎)第61号(Projet de loi relatif à la nomination des maires et adjoints.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61, 2. März 1850)。——162。

《关于授权政府禁止俱乐部和其他公开集会的法令。1849年6月19日于巴黎》,载于1849年6月23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74号(Loi qui autorise la Gouvernement à interdire les clubs et autres réunions publiques. Paris, le 19 juin 1849.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174, 23. Juni 1849)。——145。

《关于限期对所有四种直接税每法郎加征四十五生丁附加税的法令。1848年3月16日于巴黎》,载于1848年3月17日《总汇通报》(巴黎)第77号(Décret sur la perception temporaire de quarante-cinq centimes du total des rôles des quatre contributions directes. Paris, le 16 mars 1848.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77, 17. März 1848)。——94、162。

《关于乡村学校教师的法令。1850年1月11日于巴黎》，载于1850年1月15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5号(Loi relative aux instituteurs communaux. Paris, le 11 janvier 1850.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15, 15. Januar 1850)。——161。

《关于选举法的法令。1851年12月2日》，载于1851年12月4日《总汇通报》(巴黎)第338号(Décret sur la loi électorale, le 2 décembre 1851.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338, 4. Dezember 1851)。——562—563。

《关于盐税的法令。1848年12月28日于巴黎》，载于1848年12月30日《总汇通报》(巴黎)第365号(Loi relative à l'impôt du sel. Paris, le 28 décembre 1848.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365, 30. Dezember 1848)。——120。

《关于1848年4月25日宪法原本中的选举暂行条例》，载于1848年5月11日《维也纳日报》第131号特别附刊(Provisorische Wahlordnung zur Verfassungs-Urkunde vom 25. April 1848. In: Wiener Zeitung. Nr. 131, 11. Mai 1848. Besondere Beil.)。——410。

《关于召开联合省议会的诏书。1847年2月8日》，载于《柏林第一届联合省议会。1847年》1847年柏林版第1部分(Patent wegen Einberufung des Vereinigten Landtages.Vom 8. Februar 1847. In: Der Erste Vereinigte Landtag in Berlin 1847. Th. 1. Berlin 1847)。——367。

《关于组成联合省议会的决定。1847年2月3日》，载于《柏林第一届联合省议会。1847年》1847年柏林版第1部分(Verordnung über die Bildung des Vereinigten Landtages.Vom 3. Februar 1847. In: Der Erste Vereinigte Landtag in Berlin 1847. Th. 1. Berlin 1847)。——367。

《国民议会通过的最初宪法草案。1848年6月19日于巴黎》，载于1848年6月20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72号(Projet de constitution présenté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Paris, le 19 juin 1848.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172, 20. Juni 1848)。——113。

《国民议会议事规程草案》，载于1849年6月25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76号(Projet de réglement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176, 25. Juni 1849)。——144、502。

H

《虎门条约。1843年10月8日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陛下和中国皇帝在

虎门签订的补充条约》(Traité supplémentaire entre S. M. La reine du Royaume-Uni de la Grande-Bretagne et d'Irlande et l'empereur de Chine, signé à Houmon-schai, le 8 octobre 1843)。——643、644、673。

J

《集会法。1848年6月7日于巴黎》,载于1848年6月9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61号(Loi sur les attroupements. Paris, le 7 juin 1848.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161, 9. Juni 1848)。——101。

《加洛林纳法典》——见《查理五世皇帝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刑罚法规》。

《教育法。1850年1月19日、2月26日和3月15日于巴黎》,载于1850年3月27日《总汇通报》(巴黎)第86号(Loi sur l'enseignement. Paris, les 19 janvier, 26 février et 15 mars 1850.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86, 27. März 1850)。——162、169、513。

《戒严法。1849年8月9日于巴黎》,载于1849年8月12日《总汇通报》(巴黎)第224号(Loi sur l'état de siége. Paris, le 9 août 1849.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224, 12. August 1849)。——145。

N

《拿破仑法典》,官方出版的原件单行本,1808年巴黎版(Code Napoléon. Ed. orig. et seule officielle. Paris 1808)。——567、570。

《南京条约。1842年8月29日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陛下和中国皇帝在南京签订的条约》(Traité entre S. M. La reine du Royaume-Uni de la Grande-Bretagne et d'Irlande et l'empereur de Chine, signé à Nanking, le 29 août 1842)。——635、637、643、650、673。

P

《普鲁士、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波森、西里西亚和萨克森省专区法。1872年12月13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72年》(无出版年代)柏林版第41号(Kreisordnung für die Provinzen Preußen, Brandenburg, Pommern, Posen, Schlesien und Sachsen. Vom 13. Dezember 1872. In: 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1872. Berlin. O. J. Nr. 41)。——214。

《普鲁士国家通用邦法》1806年柏林版下册(Allgemeines Landrecht für die

Preußischen Staaten. Th. 2. Berlin 1806)。——70。

《普鲁士国家宪法原本。1848年12月5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48年柏林版第55号(Verfassungs-Urkunde für den preußischen Staat. Vom 5. Dezember 1848. In: 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Berlin. 1848. Nr. 55)。——427。

《普鲁士国民议会关于拒绝纳税的决议。1848年11月15日》，载于1848年11月17日《新莱茵报》(科隆)第145号特别附刊(Beschluß der preußischen Nationalveramm-lung zur Steuerverweigerung vom 15. November 1848.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Nr. 145, 17. November 1848. Außerordentliche Beil.)。——425。

S

《省等级会议一般组织法。1823年6月5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23年柏林版第13号(Allgemeines Gesetz wegen Anordnung der Provinzialstände. Vom 5. Juni 1823. In: 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Berlin. 1823. Nr.13)。——365。

T

《天津条约。1858年6月13日俄国和中国在天津签订的友好条约》(Traité d'amitié entre la Russie et la China signé à TienTsin, le 13 juin 1858)。——650、658。

《天津条约。1858年6月27日法国和中国在天津签订的贸易和通航友好条约》(Traité d'amitié, de commerce et de navigation, conclu entre la France et la China à TienTsin, le 27 juin 1858)。——650。

《天津条约。1858年6月26日英国和中国在天津签订的条约》，载于1858年9月27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3109号《与中国签订的条约》(The Treaty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signed at TienTsin, June 26, 1858. In: The Times. London. No. 23109, September 27, 1858: "The Treaty with China")。——629、637、643、644、646、650、654、656、659、669。

W

《王室内阁指令及各省联合等级委员会会议工作条例。1842年8月19日》，载于1842年10月29日《普鲁士王国内务管理内阁通报》(柏林)，内务部办公厅编，

第3年卷第13期(Allerhöchste Kabinets-Ordre, mit der Geschäfts-Ordnung für die Versammlung der vereinigten ständischen Ausschüsse sämtlicher Provinzen, vom 19. August 1842. In: Ministerial-Blatt für die gesamte innere Verwaltung in den Königlich Preußischen Staaten. Hrsg. im Büreau des Ministeriums des Innern. Berlin. Jg. 3. Nr. 13, 29. Oktober 1842)。——365—366。

《为了商定普鲁士国家宪法而召集的会议的选举法。1848年4月8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48年柏林版第12号(Wahlgesetz für die zur Vereinbarung der Preußischen Staatsverfassung zu berufende Versammlung. Vom 8. April 1848. In: 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Berlin. 1848. Nr. 12)。——388。

X

《新闻出版法。1849年7月27日于巴黎》,载于1849年7月30日《总汇通报》(巴黎)第211号(Loi sur la presse. Paris, le 27 juillet 1849.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211, 30. Juli 1849)。——145、178—181、519。

《新闻出版暂行条例。1848年3月31日》,载于1848年4月1日《维也纳日报》第92号(Provisorische Vorschrift über die Presse vom 31. März 1848. In: Wiener Zeitung. Nr. 92, 1. April 1848)。——410。

Y

《1830年8月14日宪章》(La Charte constitutionelle du 14 août 1830)。——483、485。

《友好协议法案》,载于1848年8月12日《总汇通报》(巴黎)第225号(Projet de décret sur les concordats amiables.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225, 12. August 1848)。——110、163。

Z

《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1869年9月6—11日》1869年伦敦版(Report of the Fourth Annual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held at Basel, in Switzerland, from the 6. to the 11. September, 1869. London 1869)。——211。

文 学 著 作

A

阿里欧斯托《疯狂的罗兰》。——123。
阿泰纳奥斯《哲人宴》。——539。

B

巴尔扎克《贝姨》。——577。

D

但丁《神曲》。——594。

F

伏尔泰《亨利亚德》。——148。

G

歌德《浮士德》。——475。
歌德《致祖莱卡》。——683—684。

H

海尔维格《一个活人的诗》。——149—150。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395。
海涅《夜巡来到巴黎》。——404。
荷马《奥德赛》。——422。

L

《来自偏僻村庄的后备军》。——214、327。
《路特希尔德王朝》。——83。

M

莫里哀《不得已的医生》。——180。

S

塞万提斯《唐·吉诃德》。——422。
沙米索《彼得·施莱米尔奇遇记》。——496。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564。
莎士比亚《皆大欢喜》。——76、534。
莎士比亚《理查三世》。——542。
莎士比亚《无事生非》。——670。
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523。

W

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148。

X

西塞罗《论神之本性》。——626。
席勒《欢乐颂》。——530。

Y

伊索《说大话的人》。——474。
《犹太人是现代的国王》。——83。
雨果《卫戍官·三部曲》。——177、517、556。

圣经
—《旧约全书·出埃及记》。——473、573。
—《旧约全书·创世记》。——148。
—《旧约全书·但以理书》。——246。
—《旧约全书·哈巴谷书》。——472。
—《旧约全书·撒母耳记》。——506。
—《旧约全书·申命记》。——246、249。

—《旧约全书·士师记》。——142。
—《旧约全书·以西结书》。——573。
—《旧约全书·约书亚记》。——503。
—《旧约外传·所罗门智训》。——399。
—《新约全书·路加福音》。——246。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473、514。
—《新约全书·使徒行传》。——471。
—《新约全书·约翰启示录》。——513。

报 刊 索 引

A

《奥得总汇报》(Allgemeine Oder-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天主教反对派的机关报，1846年4月起用这个名称在布雷斯劳(弗罗茨拉夫)出版，编辑是莫·埃尔斯纳、尤·施泰因和约·泰梅；1849年4月起该报调整出版方针，并更名为《新奥得报》(Neue Oder-Zeitung)，支持布雷斯劳方兴未艾的工人运动，从而成了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被普遍认为是德国最激进的报纸；其最活跃的撰稿人之一是路·海尔贝格；1855年该报曾发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1855年12月31日停刊。——193。

《奥地利帝国维也纳日报》(Oesterreichisch-Kaiserliche Wiener Zeitung)——奥地利政府的官方报纸，1780—1931年在维也纳出版，曾数度易名，如《维也纳日报》(Wiener Zeitung)等；1814年1月1日起正式作为日报出版。——413。

B

《辩论日报》——见《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

《柏林政治周刊》(Berliner Politisches Wochenblatt)——德国的一家周报，历史法学派机关报，1831—1841年在柏林出版，代表君主派的观点，对普鲁士的政治发展有影响，曾得到皇太子弗里德里希-威廉的支持。——363。

C

《晨星报》(The Morning Star)——英国的一家日报，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1856—1869年在伦敦出版；报纸还出版定期晚刊《晚星报》(Evening Star)。——646、657。

D

《大陆上中华之友》(The Overland Friend of China)——英国官方的报纸，简称

《中华之友》(Friend of China),1842—1859年在维多利亚(香港)出版。——630。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编辑是阿·卢格和马克思;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第1—2期合刊;其中刊登了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重要著作;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卢格之间存在原则上的意见分歧。——591、592。

F

《法兰西报》(La Gazette de France)——法国的第一家报纸,1631年由泰·勒诺多在巴黎创刊,最初名称为《新闻报》(La Gazette),每周出一次,后来每周出两次,1792年起改为日报;七月王朝时期为正统派机关报。——86。

《法郎吉。社会科学评论。政治、工业、科学、艺术和文学》(La Phalange. Revue de la science sociale. Politique, industrie, sciences, arts et littérature)——法国的一家杂志,傅立叶派的刊物;《法伦斯泰尔。关于建立劳动和家庭生活相结合的农工法郎吉的报纸》(Le Phalanstère, journal pour la fondation d'une phalange agricole et manufacturiére, associée en travaux et en ménage)的续刊;1836—1840年9月用现在这个名称出版,每月出两次,1843年7月以前每周出三次;7月以后又先后改名为《法郎吉。社会科学评论》(La Phalange. Revue de la science sociale)和《和平民主日报。维护政府和人民利益的报纸》(La Démocratie pacifique. Journal des intérêts des gouvernements et des peuples),1851年停刊;主编是维·孔西得朗。——142、503。

G

《改革报》(La Réforme)——法国的一家日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1843年7月—1850年1月在巴黎出版,创办人和主编是赖德律-洛兰和多·弗·阿拉戈,编辑有赖德律-洛兰和斐·弗洛孔等;1847年10月—1848年1月曾刊登恩格斯的许多文章。——65、106、124、503。

《革命》(Die Revolution)——约·魏德迈在纽约出版的德文周报,1852年1月6日和13日出版两期后,由于物质上的困难不得不停刊;1852年5月和6月,魏德迈在阿·克路斯的资助下又作为月刊出版了两期《革命。不定期刊物》(Die

Revolution. Eine Zeitschrift in zwanglosen Heften)。——465。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848年4月1日—1915年在柏林出版；50年代具有自由主义倾向，后为民族自由党的机关报；1866年以后支持俾斯麦的政策，1870—1871年曾号召兼并法国领土，主张武力镇压巴黎公社。——470。

《国民报》(Le National)——法国的一家日报，1830年由阿·梯也尔、弗·米涅和阿·卡雷尔在巴黎创刊；1834—1848年用《1834年国民报》(Le National de 1834)的名称出版；40年代是温和的共和派的机关报；1848—1849年革命时期聚集在报纸周围的有阿·马拉斯特、路·加尔涅-帕热斯和欧·卡芬雅克等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51年停刊。——85、90、99、107、111—115、117—120、124—125、127、128、132、136、142、145、147、165、168、182、481—482、488—489、490、519。

《国民议会报》(L'Assemblée nationale)——法国的一家日报，1848—1857年在巴黎出版；代表两个保皇派，即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观点，支持他们的合并。——179、543。

《国民议会通报》(Le Message de l'Assemblée)——法国反波拿巴派的日报，1851年2月16日—12月2日在巴黎出版。——554。

H

《和平民主日报。维护政府和人民利益的报纸》(La Démocratie pacifique. Journal des intérêts des gouvernements et des peuples)——见《法郎吉。社会科学评论。政治、工业、科学、艺术和文学》。

《红色共和党人》(The Red Republican)——英国的一家周刊，宪章派左翼的机关报，1850年6—11月在伦敦出版，主编是乔·哈尼。——5、11。

J

《经济学家。每周商业时报，银行家的报纸，铁路监控：政治文学总汇报》(The Economist. Weekly Commercial Times, Bankers' Gazette, and Railway Monitor: a political, literary, and general newspaper)——英国的一家周刊，1843年由詹·威尔逊在伦敦创办，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547、550、611、612、637、638、640、664—666。

K

《科隆日报》(Köln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世纪创刊,1802—1945年用这个名称出版;19世纪40年代初代表温和自由派的观点,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反对派持批判态度,维护莱茵地区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科隆教会争论中代表天主教会的利益;《莱茵报》被查封后,报纸成为莱茵地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要机关报;1831年起出版者是杜蒙,1842年报纸的政治编辑是海尔梅斯。——68。

L

《莱茵报》——见《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德国的一家日报,青年黑格尔派的喉舌;1842年1月1日—1843年3月31日在莱茵地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支持下在科隆出版;创办人是伯·腊韦,编辑是伯·腊韦和阿·鲁滕堡,发行负责人是路·舒尔茨和格·荣克;1842年4月起马克思为报纸撰稿,同年10月马克思成为报纸编辑;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报纸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并成为德国最重要的反对派报纸之一;1843年4月1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365、588、591。

《立宪主义者报。政治和文学汇闻》(Le Constitutionnel. Journal politique, littéraire, universel)——法国资产阶级的报纸,1815—1870年用不同名称在巴黎出版,40年代是奥尔良派温和的一翼的机关报,1848—1849年革命时期代表以梯也尔为首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成为波拿巴派的机关报。——179、577。

M

《每日电讯》(The Daily Telegraph)——英国的一家日报,1855—1937年在伦敦出版;起初为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后来从19世纪80年代起是保守派报纸;1937年同《晨邮报》(Morning Post)合并以后改名为《每日电讯和晨邮报》(Daily Telegraph and Morning Post)。——647、655、667。

N

《拿破仑》(Le Napoléon)——法国波拿巴派的周报,1850年1月6日—5月19日

在巴黎出版。——163。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er Daily Tribune)——美国的一家日报，由霍·格里利和托·麦克尔拉思等人创办，1841年4月10日—1924年在纽约出版；50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40—50年代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坚决反对奴隶占有制；1851年8月—1862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报纸撰稿；美国内战开始后，报纸日益离开进步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遂停止撰稿并与报纸断绝关系；除日报外，还出每周版《纽约每周论坛报》(New-Yorker Weekly Tribune)(1841年9月起)和半周版《半周论坛报》(Semi-Weekly Tribune)(不迟于1845年)，1853年5月起《半周论坛报》改名为《纽约半周论坛报》(New-Yorker Semi-Weekly Tribune)。——353、409、410、594、689。

Q

《权力报》(Le Pouvoir)——法国波拿巴派的机关报，1849年4月—1850年6月用《十二月十日报。维护秩序的报纸》(Le Dix décembre. Journal de l'ordre)的名称出版，此后改名为《权力报。十二月十日报》(Le Pouvoir. Journal du dix décembre)，1850年7月19日起取消副标题，正式用《权力报》的名称出版；1850年6月—1851年1月主编是阿·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181。

R

《人民报》(Das Volk)——在伦敦出版的一家德文周报，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和其他在伦敦的德国工人团体的机关报；1859年5月7日—8月20日由埃·比斯康普在伦敦创办和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报纸撰稿，从6月初起马克思实际上成为报纸的编辑，并于7月初接任该报的领导；编辑部成员有比斯康普、威·李卜克内西和弗·列斯纳等。——597。

《人民报。维护公正政治和普遍权利》(The People's Paper, the champion of political justice and universal right)——英国的一家周报，宪章派左翼的机关报，1852年5月由厄·琼斯在伦敦创刊；1852年10月—1856年1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报纸撰稿，并对报纸的编辑工作给以帮助；周报除刊登马克思和恩格斯专门为之撰写的文章外，还转载他们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文章；在这个时期，报纸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后来琼斯同资产阶级激进派日益接近，致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停止撰稿，同琼斯的关系一度破裂；1856年6月报纸转入资产阶级实业家手中。——579。

《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德国的一家报纸,1869年10月2日—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起初每周出两次,1873年7月起每周出三次;创刊时的副标题是《社会民主工党和工会联合会机关报》(Organ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Arbeiterpartei und der Gewerksgenossenschaften),1870年7月2日起改名为《社会民主工党和国际工会联合会机关报》(Organ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Arbeiterpartei und der internationalen Gewerksgenossenschaften),1875年6月11日起又改名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Organ der Sozialistischen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报纸编辑部领导人是威·李卜克内西,出版社社长是奥·倍倍尔;报纸反映德国工人运动中革命派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报纸创刊之日起就为之撰稿;他们认为报纸的活动具有重大意义,并密切关注它的工作,及时批评它的疏忽和某些错误,纠正它的路线,使它成为19世纪70年代最优秀的工人报纸之一。——217。

S

《商人杂志和商业评论》(The Merchant's Magazine and Commercial Review)——美国的一家杂志,由弗·汉特创办,1839—1850年用这个名称在纽约出版。——630。

《社会主义者报》(Le Socialiste)——法国的一家周报,1885年由茹·盖得在巴黎创办,1902年以前是工人党机关报;后来是法国社会党的机关报;80—90年代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13、19。

《社会主义者报》(El Socialista)——西班牙的一家周报,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从1885年起在马德里出版。——19。

《社会主义者报》(Le Socialiste)——美国的一家法文日报,1871年10月—1873年5月在纽约出版,国际法国人支部的机关报;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9月2—7日)以后与国际断绝关系;1872年1—2月该报曾发表《共产党宣言》。——5、12。

《世纪报》(Le Siècle)——法国的一家日报,1836—1839年在巴黎出版,1870—1871年间曾在图尔和波尔多出版;19世纪40年代代表部分仅限于要求温和的宪法改革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147、165、182。

T

《泰晤士报》(The Times)——英国的一家资产阶级报纸,保守党的机关报,1785

年1月1日在伦敦创刊，报名为《环球纪事日报》(Daily Universal Register)，1788年1月1日起改名为《泰晤士报》，每日出版；创办人和主要所有人为约·沃尔特，1812年起主要所有人为约·沃尔特第二，约·沃尔特第三继其后为主要所有人；19世纪先后任主编的有托·巴恩斯(1817—1841)、约·塔·德莱恩(1841—1877)、托·切纳里(1877—1884)、乔·厄·巴克尔(1884—1912)，助理编辑乔·韦·达森特(1845—1870)等；50—60年代的撰稿人有罗·娄、亨·里夫、兰邦等人；莫·莫里斯为财务和政务经理(40年代末起)，威·弗·奥·德莱恩为财务经理之一(1858年前)；报纸与政府人士、教会和垄断组织关系密切，是专业性和营业性的报纸；1866—1873年间曾报道国际的活动和刊登国际的文件。——582、638、648、651、652、655、658、659、663—664、670。

W

《维也纳日报》(Wiener Zeitung)——见《奥地利帝国维也纳日报》。

《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Woodhull and Claflin's Weekly)——美国的一家周刊，1870—1876年由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维·伍德赫尔和田·克拉夫林在纽约出版。——12。

X

《新奥得报》(Neue Oder-Zeitung)——见《奥得总汇报》。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无产阶级第一家独立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主编是马克思，编辑是恩格斯、威·沃尔弗、斐·沃尔弗、格·维尔特、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等；报纸作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核心，实际履行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职责；1848年9月26日科隆实行戒严，报纸暂时停刊；此后在经济和组织方面遇到了巨大困难，马克思不得不在经济上对报纸的出版负责，为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现金贡献出来，报纸终于获得了新生；1849年5月马克思和其他编辑被驱逐或遭迫害，报纸被迫停刊。——102、103、117、326、420、447、455、593。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的杂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刊物；1850年1—10月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和纽约印刷，共出六期。——173、180、203、204。

《新闻报》(La Presse)——法国的一家日报，1836年在巴黎创刊，七月王朝时期具有反政府的性质；1848—1849年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是反波拿巴派的报纸；1836—1837年主编是埃·日拉丹。——147、165、519。

Z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法国的一家日报，1789年在巴黎创刊，1814年起用这个名称出版；七月王朝时期为政府的官方报纸；1848—1849年革命时期支持反革命；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为温和的奥尔良反对派的机关报；70—80年代报纸具有保守主义倾向。——108、179、481、556。

《中华之友》(Friend of China)——见《大陆上中华之友》。

《钟声》(Колоколь)——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报纸，1857—1865年由亚·伊·赫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用俄文在伦敦不定期出版，1865—1867年在日内瓦出版，1868—1869年改用法文出版，同时出版俄文版附刊。——7、13、17。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98年由约·弗·科塔创办，由科塔出版社先后在蒂宾根、乌尔姆和斯图加特出版，1810—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基本上持保守派的观点，但温和的自由派的观点也常见于报端；特别是三月革命以前，报纸是大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要喉舌；50—60年代支持在奥地利霸权下统一德国的计划。——591。

《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法国的一家日报，1789—1901年在巴黎出版，1811年1月1日起用这个名称出版，最初用《国民报，或总汇通报》(Gazette nationale, ou Le Moniteur universel)的名称出版；1799—1814、1816—1868年是政府的官方报纸；1848年2月26日起加副标题《法兰西共和国官方报纸》；巴黎被围困期间，报纸在巴黎和图尔两地同时出版，后在波尔多出版，是甘必大领导的国防政府代表团的正式机关报。——89、101、103、131、146、149、152、510、522、533、534、537、558、585、586、658、666。

《祖国报。商业、农业、工业、文学、科学和艺术报》(La Patrie. Journal du commerce, de l'agriculture, de l'industrie, de la littérature, des sciences et des arts)——法国的一家日报，1841年在巴黎创刊；1850年报纸支持秩序党的保皇派选举联盟；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成为波拿巴派的机关报。——532。

名目索引

A

阿富汗人——622、685。
阿拉伯人——686。
埃及——679、680。
爱尔兰——31。
奥地利(1867年以前)
——概述——205—206、375—380、391—392。
——1848—1849年时期的奥地利——382—385、391—392、409—415、416—419、422—423、427—428、431—436、440—441。
——经济——375—379、383—385、412。
——政治制度、对内政策——375—384、391—392、394、409—411、430—437、440。
——教士、教派——372、378、380。
奥地利1848—1849年革命
——革命的前提和原因、进程和性质——90—91、373—385、391—392、403—405、409—417、422、425—426、427—428、429。
——和权力机关、宪法——382—384、392、403、404、409—415、418—419、431。
——和工人阶级——25—26、382—384、412—415。
——和社会其他阶级与阶层——382—385、390—392、409—415、416。
——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394、419、421—423、429—431、433、435、440。
澳大利亚
——金矿的发现——593、608、610、666。
——对外贸易——639、666。

B

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1848年)
——概述——11、89、100—105、106、108—110、129、135、141、143—144、145、407、478—480、482—483、489、494、504、507、560。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第一次决战——101、406—408。
——起义的原因——100—106、123—125。
——起义的过程——101—102。

——起义的失败——11、103—105、107—108、109—110。
拜占庭——422。
保护关税、保护关税制度——89。
报刊、新闻出版
——概述——90、111—112、145、165、178—179、193、365、378、407、514。
——和社会舆论——179。
——新闻出版自由——59、165、365、367、383、387、483、514。
——资产阶级社会中新闻出版自由的虚伪性——387、483—484、514。
——新闻出版自由对战斗的无产阶级的意义——383、514。
暴动——见**起义和暴动**。
暴力
——概述——43、190、492。
——暴力和无产阶级革命——43、53、63、66、103—104。
本质和现象——58、318、601。
必然性和偶然性——36、352、450。
辩证法
——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602—605。
——辩证法和自然科学——600—601。
——唯心主义辩证法——601—603。
——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唯心主义辩证法——603—605。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602。
——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600—605。
——黑格尔的辩证法——600—603。
波兰——65—66、90、398、401—404、414。
波拿巴主义(波拿巴制度)
——概述——214、465—467、526—527、548—550、553—554、562—563。
——在互相斗争的各阶级之间的随机应变——513、522、562—563、574—575。
——对拿破仑第一的崇拜——466、567。
——和军队、军国主义、战争——525、561、572、574。
——和流氓无产阶级——516、522、560、575。
——和农民——566—573。
——和资产阶级——558—559、574。
波斯——622—625。
剥夺——52。
剥削
——概述——14、34、54、160—161。
——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34、38—39、45—46。
——消灭剥削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14、50。
不断革命——52—53、65—66、155、166、191—199、450、563、564。
布朗基、布朗基主义——98、125、166、168、169、477、579。

C

财产——见所有制(所有权、财产)。
财产关系——591。
财富
——概述——43、354、605。
——财富和贫穷——687。
产业革命——见工业革命(产业革命)。
城市和乡村
——概述——32、227—228。
——中世纪的城市和乡村——32、33、227、315。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市和乡村——35—36。
——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及其消灭——35—36、53、63、498。
抽象、抽象的和具体的
——抽象和现实——603—605。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588、603—605。
——抽象和形而上学——601。
——抽象和唯心主义——602。
——抽象的思维——601、604。
传统
——历史传统——567。
——革命传统——471。
存在
——概述——592、598。
——存在和意识——51—52、591、592、597—598。
——存在第一性和意识第二性——592、598。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591。
——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50—51。

D

达尔文主义——9。
大工业
——概述——32、36—38、39—41、43、88—89。
——大工业和科学——579—580。
——大工业和农业——56、672—676。
——大工业和无产阶级的产生——26、40—41、88—89、580。
——大工业、机器生产的发展是建成社会主义的必要的物质前提——37、43、52、333、580、691。
道德
——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42、51。
——道德的阶级性——51。
——资产阶级道德——42、256、580、621、632。
德国
——概述——25—26、353—354、359、396—397。
——19世纪以前的德国——221—233、234—235、273、396—398。
——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57—

58、66、353—374、396—398、457—458。
——工商业、运输业——207、221—222、354、357。
——农业、土地关系——203、355、358。
——税收——354、373、374。
——政治和社会发展、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58、59、66、361—362、368、370—371、386—387、436、441—442。
——宗教、教会、僧侣——59、221、315、372。
——官僚(官吏)——59、354、355、372、373、374。
——农民——191、210、223—224、231—233、273—274、355、358、371、374。
——手工业者——221、318、356、357。
——资产阶级、自由派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自由主义)——318—319、356、360—362、364—374、378—379、383、384、386—390、391—392、398、406、436、441、458。
——民主派、民主运动——188—199、374、389、404、449。
——国家的分裂和国家统一的任务——25—26、355、359、371—372、395、406、421。
——对外政策——397—398、403—404。
——革命前途——59、66、353—354。

德国农民战争(1524—1525年)
——概述——220、229—231、232、242—243、284—292、295—298、300—302、314—316、319。
——农民战争的起源——204。
——农民战争的失败原因和主要后果——314—315。

德国1848—1849年革命
——概述和革命的前提——25—26、72—76、90、146、189—190、318—319、352—354、372—385、386—387、392—393、395—396、407—409、420、423—428、431、435、444—459。
——议会、国家机构——189、366、370—371、387—389、391—395、408—409、418、421、422—423、424—426、427—428、429—433、435、454—458。
——军队——138、398—399、404、407、424、437、442、445—450、451。
——封建专制主义的党派与官僚——189、387、391、407—409、424—425、432。
——和资产阶级——72—75、190、386—388、391—392、398、407—408、432、440、458、521。
——和小资产阶级——188—189、190、389、406、428、432、440—442、450—452、455、458。
——和农民——358、389—390、449、

450、458。
——和工人阶级——75、188—189、386—389、444—445、449、454、458。
——和民族问题——104、274、393、395、397—404、429—430。
——和其他国家中的革命——97—98、367、386、389、394、410、417—418、420—421。
——和欧洲其他国家——397—398、430、436、443。
——结论和评价——24、25—27、72—76、189—190、353、355、358、365、382、386—392、420—422、438、458—459。
德国哲学
——概述——57—61、217、361、368、591。
——德意志意识形态——593。
——和现实、社会、历史——361。
——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那么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217。
德意志联邦(1815—1866年)——359、371、392、421、436、441、442。
等级、阶层
——概述——31—32、33、41—42、112、227、232、234、316—317、363—364。
——贵族等级——272、274、354。
——僧侣等级——225—227。
——骑士等级——223、224—225。
——特权阶层——274。
——等级会议——223。
——等级制度——224、273、363—364。
抵押——89、135、159—160、514、570、575。
地产——见土地所有制(土地所有权、地产)。
地方主义——74。
地理发现——32。
地理环境
——概述——32、610。
——和生产力的发展——221—222、679—680。
——对社会发展所起作用的具体例证——354、679—680。
地租
——地租的源泉——273。
——地租的历史性质——47、52。
——资本主义以前的地租形式——158—159。
第一国际——见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
东印度公司(英国的)
——概述——608、610、631、632、678、689。
——殖民掠夺的方法——608、610、631—634。
对立、对抗
——对立的辩证性质——604。
——对立的发展——53、62、79、104、383、495、604。

——对立面的消除、克服、解决和消失——53、63—64。
——利益的对立——90、154、498、544—545。
——阶级的对立、对抗——见**阶级**。
——各民族之间的对立——50。
——城乡对立——53、63、498。
——土地所有者和农业工人的对立——210—211。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45、62、63—64、210—211、501、504。
——资产阶级社会的对抗——592。
——共产主义社会中阶级对抗的消灭——51—53、62—63。

对外贸易
——概述——32、88、354、588。
——开辟新的市场和通商道路——354。
——和殖民地——32、666、676。
——对外贸易的差额——608、666、672—676。
——英国对世界市场的垄断——见**世界市场**。

E

俄国
——概述——7—8、23、359、371、398、401—402、446、616—617、649、652—653。
——经济——17—18、23、615、617。
——土地关系、农业——18。
——对外贸易——615—617、650—651。
——对外政策和外交——650—651、653。
——俄国和远东——615—617、650—653。
——俄国和中国——650—653、658—660。
俄国公社——8、18。

F

发明
——概述——36。
——发明的社会成果——221、225。
——发明和社会进步——580。
发展
——概述——466、469、472。
——对发展的辩证理解——603。
——发展的规律——607。
——发展和矛盾、对立——63、102、383。
——革命的发展——494、591、597。
——社会的发展——见**社会**。
——生产力的发展——见**生产力**。
——人的自由发展——53。
——精神的、智力的发展——12、14、20、25、378。
——科学的发展——600—601。
法(权利)
——概述——59、70、176、177、492。
——作为上层建筑——48、51—53、563、591—592、597。
——法和生产力——591—592、597。

——法和生产关系——591—592。
——财产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591、597。
——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48、563。
——法和国家——597。
——资产阶级法律及其实质——33—34、48—51、59、112—116、157、482—486。
——劳动权——87—89、113。
——继承权——52、171、192。
法国
——概述——33、74、85—86、152—155、156—162、232、353—354、406、409、468—469、481、526、527。
——经济——81—84、91—94、108—111、120—121、142—145、152—155、156—161、163—164、173—175、354、471、511—513、550—553、566、568—572、575。
——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273。
——阶级、阶级关系、阶级斗争——154、235、497。
——国家机器——479、485、510—513、565—567、571—572、577。
——国民公会——320、324。
——政治派别——399、470、475、479、486、494、497、500—503、505—508、510、513—514、517—518、522、533—537、539—545、546—547。
——贵族——86、93、157。
——资产阶级——见**法国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81、83、482、562。
——农民——56、81、111、157—161、566—570。
——工人阶级——66、80、85、87、103—104、165、335、357、367—368、478、570。
——军队——90、111—112、117、140—145、156、168—170、184—186、321—324、328、329—331、340—344、429、476、478、485、487、507—509、520、525、533、559、572。
——宗教、教士——571。
——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以前的法国——33、156、236—237、273、354、363、495、534—535、567、575、577。
——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执政时代和帝国时期的法国——45、74、80、93、101—104、115、146、158、160、222—223、353、358。
——1830年七月革命和七月王朝——54、66、80—87、88—91、99、103、106、110、132、146、151—155、156、164。
——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330、465—467、468—469、470、472—475、487—493、506—509、550、554、557—568。

——法国和中国——611。
法国1848—1849年革命
——概述——25—26、79、80、87—88、142—145、147、151、168、170、351—352、382、426、472—479、483、488、494。
——前提和原因——80—85、173、351—353。
——革命沿着下降的路线发展——79、494—495。
——二月革命和6月底以前发生的事件——79、82—100、101—102、103—108、112—114、123—125、128—129、134、144、165、168、177、381、386、406—407、558。
——第二共和国(1848年6月—1850年11月)——104—151、154—156、160—164、166—171、176—185、407、443。
——经济——81—83、84、91—94、120—121、149、152—161、173—174、512、519、538、546—554、568—570。
——资产阶级、大土地所有者——80—90、91—104、106—117、123—128、130—134、144、151—155、164—166、168—171、177、406。
——小资产阶级——84—85、89、92、97—99、104—106、108—115、116、133—137、140、144、147、155、164—165、170、173、176—178、186、406。
——农民——86、89、94、99、104、106、112、114—116、118、120、129、133—136、158—161、164、175、477、497、566—575。
——工人阶级——85—89、90—91、93—99、100—106、109、114、116—117、123—128、134—137、141、143—145、147、155、160、165—168、176、407、477—479、482、500—505、516、519、531、550、560、562—563、570。
——军队——90、96、98、111、117、135、140—143、168、184—186。
——国民自卫军——86、95—96、101、123、142、145。
——保皇党(正统派、奥尔良派)——86、90、99、102、107、119—120、122、126、129、132—136、138、145—153、161、164、169、180、182—183、560。
——波拿巴派——149—150、163、181—187。
——秩序党——132—133、135—137、144、146、147、151、153—156、161—170、176—186。
——资产阶级共和派——85、90、99—100、102、104、106—120、122、124、132、134、136、142、147、152、168、180、183。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97、99、106、117、135—136、140、142—145、147、164、176—178、180、

458。
——空论的社会主义——见**社会主义**(理论和流派)。
——革命失败的原因——173—175。
——对欧洲各国人民的影响——89—91、97、104—105、138、154—155、368、382、386、406—408。
法国资产阶级
——概述——80—86、92、96—100、103—104、114—115、132、153、171、207、351、353、478、498。
——金融贵族——478、481—482、489、498、506、512、547。
——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法国资产阶级——482—484、489—490、498—499。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190。
法兰西银行——93、174—175、575。
法律——144、485、492、563。
法院(法庭)、审判制度
——封建社会的——225、232、235。
——资产阶级社会的——114—115。
——陪审法庭、它的阶级性——108—109、365、367、383、387、561。
反殖民主义斗争——607—608、625。
泛神论——247。
泛斯拉夫主义——399、401—404、430。
梵蒂冈——506。
方法
——唯物主义方法——601、603。
——唯心主义方法——601—603。
——辩证方法——601—604。
——形而上学的方法——600—601、605。
——研究的方法——601、603。
——历史方法——603。
——逻辑方法——602—605。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601—605。
——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方法——600—605。
——政治经济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意义——603。
分工
——概述——566。
——社会的分工及其结果——32、564。
——企业内部的分工——32。
——分工的发展——38、56、564。
——分工和机器、机器生产——56、159。
封建社会
——概述——51、62、75、235—236、238、564。
——阶级、阶级斗争——31—33、223—232、235—236、239、256、317—318。
——封建社会的解体——32。
封建主义(封建制度)
——概述——74、75、224、236、331、397、468、471。
——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592。
——封建的所有制关系——36。
——经济——32、221—222、224、225、

227—228、376、377。
——法庭、司法制度、法学家——225、228、232、235。
——农村——227—228、230—232。
——城市、城关市民——32、56、219、221—222、227—230、236—237、273、294、299、303、564。
——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见**资产阶级、资本家阶级**。
——城市的底层、无产阶级的萌芽——230、248、293—294。
——教育、意识形态——235。
——宗教——234—240。
——教会、僧侣——223—228、235—237、239—240。
——封建制度的衰落和灭亡、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32、36、45、159、192、196、229、230、238、244、294、305、353—354、358、367、378、389、471、564—565。
——封建主义残余——191、197、330、331、353—355、374、377、378、384。
复杂的——见**简单的和复杂的**。
赋税、税收制度
——概述——52、81、93—94、120、154、156—158、160、161、215、223、570—571。
——税收和国家——81、93—94、154、156—157、160、570—571。
——税收和农民——157、160。
——直接税——52、93、114、166、224、570—571。
——所得税——149、155。
——累进税——52、114、158、166。
——消费税——156—160、224、265、513、575。
——印花税——179。
——教会税——227。
傅立叶、傅立叶主义——13、21、62—64、368、584。

G

改革、改良——114、136、147、164—165、242、379。
高利贷、高利贷者——89、135、159、191、210、259、358、374、397。
哥萨克——327、328、330。
革命
——概述——31—32、52—55、66、88—89、104、164、166、175、176、329、336、344、468—469、580、613。
——革命是历史进步的动力——354、472—474。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161。
——革命的前提、原因——36、176、351—352、591—592、597、613—614。
——革命和经济危机——612—614。
——革命和阶级斗争——164—165、190、235、515—516。
——革命和国家——164—165、190、564。
——革命的首创精神——73—74、97、

105、155、367—368、382、386、406—407。
——社会革命——见**社会革命**。
——中国革命——607。
革命民主专政——161、194、198—199。
个别、特殊和普遍
——共同利益和特殊利益——44、132—133、154、164、359、382—383、479—480、481、504、516、536、541、550、564—565。
——各种社会现象中的个别、特殊和普遍——44、51—52、58、501、552。
——思维中的个别、特殊和普遍——51—52。
个人——见**人、个体、个人**。
个体——见**人、个体、个人**。
工场手工业——32。
工会——43、209。
工联——12、20、40。
工人
——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和生产的条件——38、39、42。
——工人变成劳动工具——38—39。
——工人的利益——39—43、53、58、61、65、191—193、196、198。
——工人的国际团结——26、40、43、66。
——农业工人——358。
工人阶级、无产阶级
——概述——30、38—43、50、65、87—89、103—104、356、500。
——是在大工业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15、26、39—43、580。
——工业无产阶级——88、144、160、407。
——工人阶级的贫困化——43、46、538。
——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39—41、44、53、62。
——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41、88—89、118、133—134、164、188、449。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见**阶级斗争**。
——资产阶级的掘墓人——37—38、43。
——工人阶级的世界历史作用——14、26、42、44、53、88、103、165、188、192、198—199、216、450。
——无产阶级变成统治阶级的历史必然性——43—45、50、52—53、104、192。
——无产阶级的解放——333。
——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21、46。
——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发展——20、23、41、65、199、357。
——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劳动群众利益的代表者——42、164、194。
——和农民——见**农民**。
——和城市小资产阶级——39、41—

42、59、104、106、134、164、190—191、356、389。
——农业无产阶级——211。
——平民无产阶级——256。
——流氓无产阶级——42、83、95、209、280、516、522、560、574、575。
工人运动
——概述——39—40、42、44、65、341、478。
——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42。
——工人运动产生的前提和发展阶段——6、11、39—42、44、62—63、165。
——它的最近目的和最终目的——44、65、357。
——和革命理论——12—15、19—20、25、166。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表现——44—45。
——工人运动中的思想斗争——12、63—64、65。
——争取民主的斗争——65、389。
工业——580、584—585、587、610。
工业革命（**产业革命**）
——对英国的意义——580、595—596。
——工业革命的发展——32—35、580。
——导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对立的发展——7、18、23—24、26、39—45、62、88—89、579—580。
——开拓了世界市场——35、88—89、691。
工业危机——见**经济危机**。
工资
——工资作为劳动力的价值（价格）——38、46。
——工资和劳动力再生产——46。
——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39。
——工资和使用机器——40。
——工资和资本主义竞争——40。
——工资和经济危机——40。
工作日
——概述——22、38。
——十小时工作日法案——41。
公社——8、31、227、228、231。
公债——见**国债、公债、借贷**。
共产主义（理论和流派）
——概述——30、44—50、52、57、58、64、66、368。
——科学共产主义——12—14、19—20、44、166、188、217—218、368。
——空想的共产主义——13—14、21、62—64、218、268、374、386。
——工人共产主义——14、21、368。
——伊加利亚共产主义（卡贝的共产主义）——13、21、64、98。
——自发的共产主义——13—14。
——和消灭私有制——44—48、52、66。
共产主义（社会形态）

——共产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43、44—53、65—66、155、166、192。
——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作出科学设想的方法论——52—53、63。
——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的共产主义改造的物质前提——88、256、580、592、597、689、691。
——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社会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之间的对抗的物质条件——592。
——社会革命的必然性——592、691。
——阶级对立的消灭和阶级差别的消失——14、48—53、166、192、333。
——消灭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所有制)——45—46、66。
——消灭私有制是一个过程——52、192。
——社会的共产主义改造和科学——691。
——共产主义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3。
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运动——30、44、64—66。
共产主义者同盟
——同盟的理论原则和纲领——5—6、11、192—197、373。
——同盟的策略原则的制订——9、11、52—53、65—66、192—197、389。
——在1848—1849年革命以前——11、30、357、368—369。
——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188—189、389、598。
——在1848—1849年革命失败以后——188—199、598。
——与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65、188—191、389。
共和运动——102—104、107、132、146—147、373、389、438。
古代世界——51、235。
古罗马——31—32、34、466—467、471、472。
古希腊罗马时代
——概述——31—32、466—467。
——奴隶制是生产的主要形式——466—467。
——阶级、阶级斗争——466—467。
——奴隶——32、466。
——罗马的无产阶级——467。
股东——583、584。
股份公司
——股份公司的形成和作用——173、583—585。
——股份公司是资本的一种组织形式——584—585。
——股份公司的意义——584。
——股份公司活动的性质——584—587。
——股份公司的风险——173、530—531、587。

——股份公司和国家——81—82、583—584。
——动产信用公司——582—587。
股票
——实质和作用——512、531、575、583—587。
雇佣劳动
——概述——38、63、113、588。
——它的历史性质——45—46。
——和资本——见**资本**。
——没有雇佣劳动，就没有资本，就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资产阶级社会——88。
关税同盟(1834—1871年)——355、359、596。
观念、思想
——观念的起源和本质——50—51、165—166。
——观念和现实——44、50—51、74、372—373、438。
——观念和社会关系、阶级——34、48—49、50—51、165—166、357、569、572。
——人们的观念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50—52。
——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思想——23、44、367、374。
——共产主义革命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52。
官吏——59、206、227—228、331、366、373、374、376—380、387、481、485—486、497、511—512、564、565、570、633—635。
规律
——社会规律——48、62。
——历史规律——603。
——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规律——600。
贵族、贵族制
——概述——215、222—225、239、248、272—275、277—278、280、314—316。
——贵族的统治——80、498、546。
——作为一个等级——354。
——门阀世族、土地贵族——33、41、54、373、375。
——金融贵族——80—83、132、152—154、156、498、547—548。
——贵族同盟——275。
——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斗争——214。
——贵族和工人阶级——54。
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14、20、22。
国际主义——219。
国家
——国家和社会、社会制度——74、86—87、98—100、101、104、113、127、152—154、156、164、373—375、511—512、560—567、573、591—592、613。
——国家的相对独立性——86、566。
——国家和经济关系、生产关系——53、166、591—5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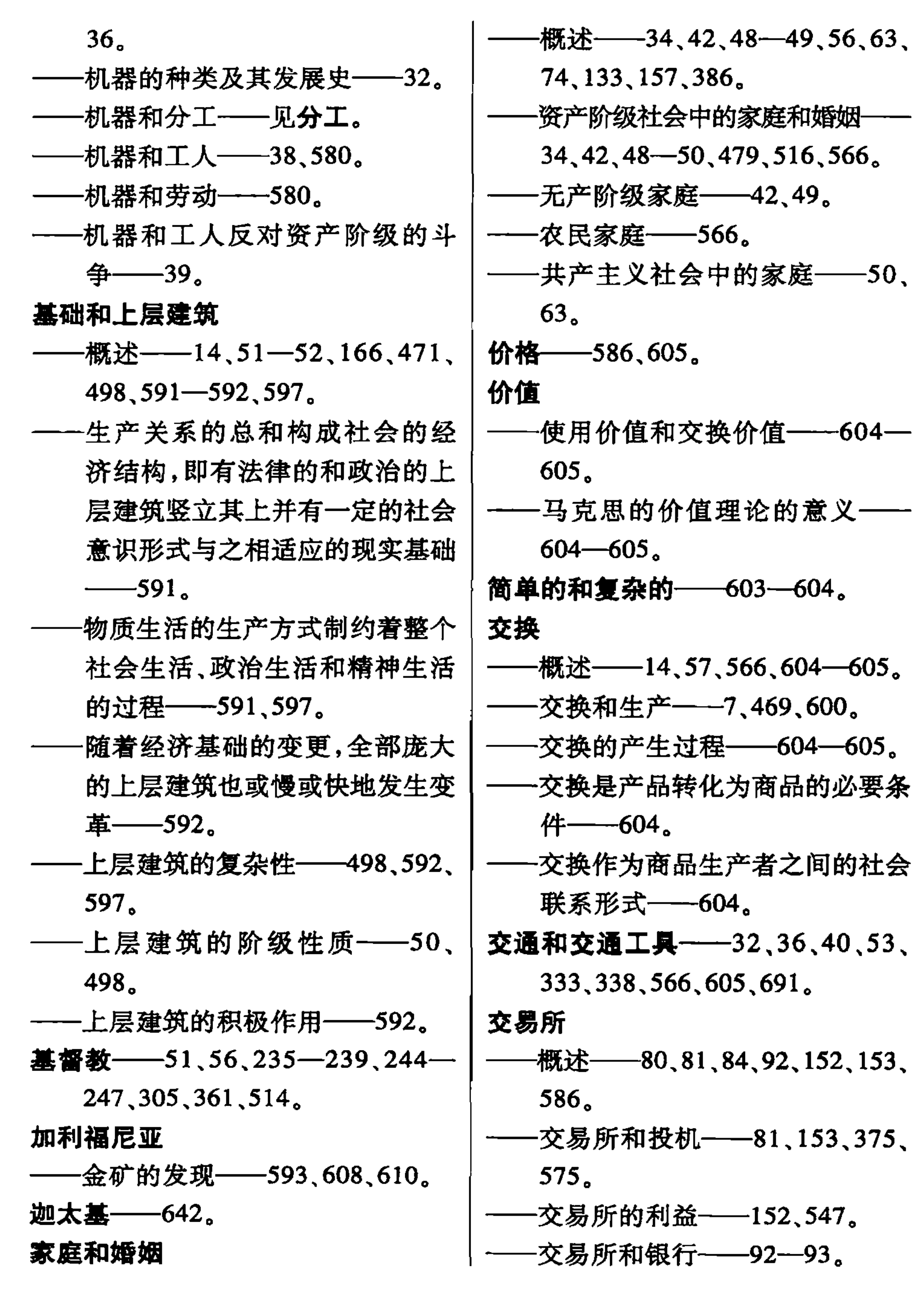
——国家的起源——108、564。
——国家作为剥削者统治的工具——9、38、53、82、94、376—378、565。
——文明国家和野蛮国家——333。
——国家和中央集权——36、164、220、573。
——军队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156、376、387、572、576。
——国家和税收——81、93—94、108、154、156、160、570—572。
——国家和法——125。
——国家和阶级、阶级斗争——33、52、100—101、375—377、489、565—566。
——国家和革命——192—198、564—565。
——东方的国家——679、681、682。
——资产阶级国家——见**资产阶级国家**。
——国家的消亡——53、63—64。
——共产主义条件下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63—64。
国家权力(国家政权)
——概述——33、53、70、197—198、205、215、377、450、570、573。
——它的阶级性质——565。
国家所有制——52—53、196—197。
国债、公债、借贷
——概述——81—83、92—93、153—154、156、198、205、215、367、375、548、585—586。
——和国家预算——81。
——和税收——154。
——和国家借款——81—82、152—154。
——和国家有价证券——81—82。
——和国家信用——81、92。

H

汉撒同盟——221。
行会、行会制度——57、74、228、229、230、357、377、380。
黑格尔、黑格尔主义
——概述——470、593、607。
——黑格尔哲学——217。
——黑格尔方法——600—603。
——黑格尔的唯心主义——591、593、600—603。
——黑格尔辩证法——600—604、607。
——黑格尔的辩证法与唯物史观——602。
红旗——70、89、105、170、279。
红色共和国——126、161。
胡斯运动、胡斯战争——255、399。
婚姻——见**家庭和婚姻**。
火药
——火药是从中国传入欧洲的——221。
货币——605。

J

机器
——概述——378。
——机器是大工业发展的基础——



36。
——机器的种类及其发展史——32。
——机器和分工——见**分工**。
——机器和工人——38、580。
——机器和劳动——580。
——机器和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39。
基础和上层建筑
——概述——14、51—52、166、471、498、591—592、597。
——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591。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591、597。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592。
——上层建筑的复杂性——498、592、597。
——上层建筑的阶级性质——50、498。
——上层建筑的积极作用——592。
基督教——51、56、235—239、244—247、305、361、514。
加利福尼亚
——金矿的发现——593、608、610。
迦太基——642。
家庭和婚姻
——概述——34、42、48—49、56、63、74、133、157、386。
——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家庭和婚姻——34、42、48—50、479、516、566。
——无产阶级家庭——42、49。
——农民家庭——566。
——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家庭——50、63。
价格——586、605。
价值
——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604—605。
——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意义——604—605。
简单的和复杂的——603—604。
交换
——概述——14、57、566、604—605。
——交换和生产——7、469、600。
——交换的产生过程——604—605。
——交换是产品转化为商品的必要条件——604。
——交换作为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联系形式——604。
交通和交通工具——32、36、40、53、333、338、566、605、691。
交易所
——概述——80、81、84、92、152、153、586。
——交易所和投机——81、153、375、575。
——交易所的利益——152、547。
——交易所和银行——92—93。

——交易所和国家——81—82、92、152。
教皇——129、227、237、243、257。
教会
——概述——225—227、235—237、248、372、373。
——教会和封建社会——225—227、235—237。
——教会和国家——235—237、372。
——罗马教会——245。
——天主教——239—241、372。
——新教——372。
——教会法庭——259。
——教会改革——250。
教师——162、380、568。
教士——见**僧侣、教士**。
教育
——概述——49、53、235、378、566。
——教育的阶级性——48—49、498。
——中世纪的知识教育为僧侣所垄断——235。
——共产主义条件下的教育——49、53。
阶层——见**等级、阶层**。
阶级
——概述——31—37、45、48、223、317—318、354—358、469。
——阶级的产生——31—33。
——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95、165、353—359、498。
——阶级和生产——50、53、133、165—166、304。
——阶级和国家——见**国家**。
——阶级和民族——50。
——阶级的矛盾、对立——25、31—32、41—43、45、50、52—53、62—63、79、90、102—104、123、192、382—384、415、488—489。
——资本主义以前社会中的阶级——31、223—233、239—240、256、317—318。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32—38、39—42、56、99、100—104、114—116、379。
——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14。
——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14。
——市民阶级——239、243、256。
——资产阶级——见**资产阶级、资本家阶级**。
——小资产阶级——见**小资产阶级**。
——工人阶级——见**工人阶级、无产阶级**。
——农民阶级——81、358。
——革命阶级——530。
——工人阶级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41、118、133、165、449。
——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43、44、50、52、53。
——共产主义社会中阶级对立的消灭和阶级差别的消失——见**共产主义**(社会形态)。
阶级斗争
——概述——14、31—32、41、52、88、90、100—102、165—171、204、

214、216—217、317、466、469。
——阶级斗争和经济关系——304。
——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9、31、51—52。
——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形式——40、235、469、497—498。
——阶级斗争和革命——31、41—42、53、65—66、87—88、102—105、382—383。
——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中的阶级斗争——31、235、260—261、317。
——宗教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235、255—256。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11、14、39—41、42、44、53、62、65、89、97、100—102、382、406、413。
捷克——396、399。
借贷——见**国债、公债、借贷**。
金和银
——概述——608、610。
——在澳洲和美洲发现金矿的意义——438、593、608。
——和对外贸易——608、680。
进步
——概述——318、691。
——社会的进步和政治的进步——225、383、580。
——科学的进步和技术的进步——36、41、43。
——进步和文明——66。
——进步和倒退——580。
——进步和资产阶级——515、689。
禁欲、禁欲主义——56、62、255—256。
经济的社会形态——见**社会形态(经济的社会形态)**。
经济关系
——概述——61、95、186、641、672。
——经济关系的概念——591—592。
——经济关系是物质关系——61。
——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的经济组织——591、672。
——经济关系在社会中的决定性作用——591—592。
——和政治关系、政治的上层建筑、国家、政治——61、95、186、591、592。
——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95、186。
——和无产阶级革命——186。
经济规律——48、600、603。
经济和政治
——概述——36、84、164—166、353—354。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9、591—592、597。
——政治现象的经济基础、原因、条件,政治依赖经济——9、34—36、84、113—115、353、500、515。
——阶级关系是政治关系的基础——353。
经济危机
——概述——37、84、91、175、584、612—614。

——经济危机的前兆——610、612。
——经济危机的周期性——37、612。
——和作为周期中一个阶段的繁荣——175、610。
——生产过剩是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37、552。
——和贸易——612—614。
——世界市场危机(普遍危机)——84、552—553、612。
——工业危机——84、552。
——商业危机——37、84、91、551—552。
——和革命——612—614。
精神、精神的
——概述——25、35、51、157、377、397。
——精神和物质、精神的和物质的——35、51、399、591、597。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591。
——精神生产——35、51、157。
——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51。
——精神文化——377、397、399。
——精神发展——378、551。
——无产阶级的精神发展——25。
竞争
——概述——36、221。
——资本家之间的竞争——39—40、81、691。
——资本和地产之间的竞争——498。
——大农场的竞争——7。
——工人之间的竞争——40、43、192。
——竞争和工资——40。
居民——见人口(居民)。
具体的——见抽象、抽象的和具体的。
旧事物和新事物
——在社会发展中——53、378—379。
——在生产发展中——592。
军队
——概述——69、156、162、329—332、452。
——军队和经济——329—334。
——军队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156、376、387、572、576。
——反动势力利用军队作为镇压革命运动的工具——156、170—171、376、387、406—407。
——在封建主义时期——229—230、330—331、354。
——在资本主义时期——326—331、487、572。
——军队和剥削阶级——354、406—408、488—489。
——军队和农民——330、334、335。
——军队和资产阶级革命——328—329、332、404、407。
——军队和无产阶级革命——335、339—341、407。
——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后对武装力量的改造——332—336、341—344。
——革命军队——340—344、453。
——志愿军——340。

——军队的纪律和精神素质——323、328。

军事

——军事对社会发展水平的依赖性——329。

——军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329、333—336。

——军事学术的规律(进行战争的规则)——418、425、446。

——军事训练——323、340—341。

——军事和革命——328—329、332—336、418。

军事科学——325、333、336。

君主制、君主国、君主政体

——概述——33、59、66、73、74、75、99、112、151—152、191、214、273、351、356、360、363、376、477、479、505、542—543、564。

——官僚机构是君主制的基础——331、363、366、376、387、573。

——立宪君主制——73、86、90、99、191、360。

——等级君主制——33。

——和资产阶级——33、112、505、542—543。

——和工人阶级的斗争——66、190—191。

K

科学

——科学和生产——36、566、580、681、691。

——科学是生产力——579—580。

——科学和农业——566。

——科学和阶级——62。

——科学与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333、580。

——科学和哲学——596—597、600—603。

——科学和工人——580。

——社会科学——14—15、64。

——科学中的原则、公正和良心——594。

——科学的发展——600—601。

——共产主义条件下的科学——333、580、691。

科学社会主义、科学共产主义

——它的产生——596—597。

——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表现——44—45、166、188。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它的理论基础——14、597。

——生产资料社会化的要求——52—54、113。

——它的国际性质、它的思想的传播——12—14、19—21。

克里木战争(1853—1856年)——624、649。

空想社会主义——13—14、21、62—64。

恐怖——70、74、90、104、147、161。

L

劳动

——概述——38、46—48、53。
——劳动是经济范畴——38、45—46。
——共产主义条件下的劳动——46、47、53、334、335。
劳动时间——38。
类比、类似
——类比和区别——204、318、320、466—467。
——类比推理——36、320、329。
——历史上的类比——36、87、318、320、329。
理论和实践
——实践是理论的基础,理论是实践的反映——44、204、597、603—604。
——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603—604。
——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113、220、305、531。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5—6、238—239。
——革命实践——597—598。
——理论观点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597。
——理论的科学论据——217—218。
——工人运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11—12、19—20、44、165—167、217—218。
理性——48、247。
历史
——概述——9、31、51、213、469、520。
——历史的规律性——469、602。
——历史的发展(历史过程、历史进程、历史运动)——54、166、236、466、469、520、603、605。
——历史和社会发展——31。
——历史和阶级斗争——9、31—32、468—469。
——原始公社解体以来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9、14、31。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470。
——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137。
——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581。
——历史的例证——605。
历史(作为科学)——9、51、203—204、220、352、363。
历史编纂学
——它的阶级性质——306、472、580。
——资产阶级伪造历史——197、580。
——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的形成和发展——9、204、465—466、468—469。
历史的和逻辑的
——它们的辩证关系——603—605。
——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603。
历史学派——363。
历史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
——概述——31—43、469、588—594、595—602。
——它的本质——9、469、591—594、

597—598。
——“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术语——597。
——和科学共产主义——14。
——和历史科学——14、204、228—235、469。
——和政治经济学——588—594、596—597、600—604。
——它的历史前提和理论来源——602。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它的创始人——9、14—15、204、469。
——它的历史——14—15、588—594、603。
立法
——概述——36、42、114、122、145。
——资产阶级的立法——484—485。
立法权和行政权——121、151、441、484—485、505、510、512、529、534、537、541、547、555、559、564、572。
利己主义——34、76、198、683。
利润——583、586。
利息——586、587。
利益
——概述——42、58、72—73、81、85、87—89、136、151—154、566。
——物质利益是阶级斗争的基础——235。
——利益和国家——81、107、133、151、222、512、541、548、564。
——利益和法——42。
——利益和原则——498。
——利益和社会的、历史的发展——41—42、222。
——普遍利益和公共利益——99、163、211、358—359。
——特殊利益——81、132、193。
——相对的利益和绝对的利益——317。
——对立的利益和一致的利益——85、90、154、358—359、498。
——人民的利益——72。
——民族利益——359、450。
——阶级利益——85、90、116、124、132、152、154、182、199、383、479、501、504、512、516。
——贵族的利益——54、316、373—374。
——农民的利益——116、120、371、424、458。
——小资产阶级的利益——42、59、136、356、450、458。
——资产阶级的利益——33—34、42、46、72、81—83、87—88、102、107、132、133、153、154、182、374、408。
——资产阶级社会中利益的虚假协调——90、99、570。
——无产阶级的利益——39—43、44、54、61、63、89、102、134、199、356、450。
——无产阶级的利益同社会发展的利益是一致的——42、450。

——共产主义者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体现者——44、65。
联合、联合体
——工人的政治和经济的联合——39、43、113、193、196。
——共产主义的联合——43、53。
——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21、66。
——共产主义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3。
路德教——239—244、250—251、254、276。
律师、律师界——81、361、394、481、489。
逻辑
——逻辑和现实——605。
——逻辑的研究方法——602—605。
——逻辑的发展——603、605。
逻辑的——见**历史的和逻辑的**。

M

马克思主义
——概述——30—53、591—593、595—599。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596—597。
——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12—13、19—20。
——是无产阶级斗争的理论表现——12—13、20—21、44、65、166、188。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5—6、7、12—13。
——它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5—6、15。
——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5—6、15。
满洲、满族——612—613、650、653。
矛盾
——概述——90、102、353、358—359。
——矛盾和对立——90、580、604。
——矛盾的表现形式——121、383。
——矛盾的发展——102、304、604。
——矛盾的解决、消灭、克服和消失——333、546、604。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176、591—592、597。
——阶级矛盾——见**阶级**。
——资本主义的矛盾——32、41、56、353、580。
贸易——见**商业(贸易)**。
贸易自由——见**自由贸易(贸易自由)**。
美国、美洲
——概述——8、64、429、479。
——美洲的发现——32。
——经济——640—641、647。
——社会制度、政治制度——198、479。
——阶级和阶级斗争——479。
——对外政策——611、640—641。
——和欧洲移民——8。

——美国和中国——611。
民主、民主制
——概述——114—115。
——贵族民主制——272—273。
——资产阶级的民主——190—195。
——无产阶级的民主——52。
民主运动
——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196—197。
——小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116—117、135—145、190—199、355—356、371、373、388—389、440—442、450—452、458。
民族
——概述——35、36、50、219、220、231、330、376、395、397—399、403—404、429—431。
——民族的形成——36、429—431。
——经济关系在民族结合过程中的作用——35—36。
——共同的领土疆域——234、395、565。
——民族大迁徙——34。
——民族的独立和统一——26、359、398、397—398。
——民族利益——222、359、450。
——民族意识、民族感情——35、83、227、272、376、399、429—430。
民族问题——24、25—26、50、65、104、375、397—399、403—404。
民族运动——24、26、104、397—399。
目的和手段——63、66、503。

N

农民
——概述——160—161、196、358、371。
——农民的特征和差别——39、42、89、133、196、358、371。
——封建社会中的农民——231—232、237—238、240、314。
——从封建依附中解放出来——569。
——农民和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见**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农民——36、45、159—161、175。
——农民和高利贷——89、159—160、191、358、570。
——雇农、小农——45、210、223—224、329、449—450、566—569。
——农民和资产阶级——36、42、104、160—161、191、196、389—390、568—571。
——农民和无产阶级——39、42、89、104、133、161。
——农民作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133、160—162、164、570。
——农民和无产阶级革命——见**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
农奴、农奴制
——概述——32、43、244、273、375、378、380、398、401。
——自由农变为农奴——314。

——农奴境况——31、43、224—225、231、239、330、375、380、398、401。
——农奴变成自由民——32、43、378、569。
——废除农奴制——274、281、569。
农业
——概述——53、158—160。
——封建社会的农业——36、222。
——资本主义社会的农业——36。
——农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进步——196、568—569。
——农业和工业——56、401、672—676。
——农业和科学——36。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农业——53、196—197。

O

欧文、欧文主义——13、21、62—64。
欧洲
——概述——175、351、397—398、429—430、613—614、653。
——19世纪的欧洲——351、397—398、429—430、613—614。
——欧洲的革命运动——607。
欧洲1848—1849年革命
——概述——476—479、483、495、500—501、563、579、613。
——革命的前提和性质——24、26、74—76、173、175—176。
——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25—26、104、136、190—199、355—356、442、450—451。
——和工人阶级——11、25—26、450。
——和民族独立运动——104、397—398。
——反革命和反动派——131、134、138、146、352、407、446。
——革命失败的原因及其后果——24、25—26、173、175、351—352、398—399。
偶然性——见**必然性和偶然性**。

P

批判、批评——54—60、63。
平等
——斯巴达克式的平等——256。
——资产阶级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239。
——基督教对平等的解释——236—239、305。
平民
——中世纪的平民——226—227、228—231、237—238、248、252—254、259—264、271、288—289、315、317。
——平民和贵族——31。
——平民革命家闵采尔——231、243—254、260、272、278、293—294、303—307。
——平民反对派——229—231。
破产——81、84、93—94、584、587。
蒲鲁东、蒲鲁东主义——218。

普遍——见**个别、特殊和普遍**。
普鲁士
——概述——72、74—75、205—206、213—215、355、360、363—367、370—374、379、389、391—392、393、424—429、431—434、435—436、440—443。
——历史——72—73、363—367、370、373—374、386—390。
——经济——355、365—366、373—374。
——官僚制度、官吏——331、363、366、369、379、387、392。
——协商议会——69、70、71。
——对外政策——360、370、374、391—392、397—398、404、431、445—446。
普鲁士1848—1849年革命——74—76。
普选权——见**选举权、普选权**。

Q

启蒙运动——51、74。
起义和暴动
——概述——25、84、125、140、143、220、261、344、406—407、446—447。
——中世纪带有宗教色彩的起义——255。
——平民和农民的暴动——233。
——1491—1492年荷兰农民起义——258。
——德国农民的起义和暴动——232、276—277、278—280、282—283、289、308、310。
——斯洛文尼亚的农民暴动——261、269。
——图尔高的农民起义——276。
——符腾堡的起义——287—288。
——波兰的农奴起义——402。
——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1848年）——见**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1848年）。
——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1844年）——357、368、386。
——太平军起义（1851—1864年）——见**太平天国起义**（1851—1864年）。
——里昂和土伦暴动——322、344。
气候——679。
青年——404。
权利——见**法**（**权利**）。

R

人、个体、个人
——概述——47、580、607、691。
——人的本质——58。
——个人——46—47、470、483。
——人的意识、理性、思维、认识——438、498、591—592、597。
——人和自然界——见**人与自然**。
——人和社会——46、53、352—353、483—484、591—592、597、682、685。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关系——580、591、604。
——人和自由——46—47、53、483—484、515。
——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136、184—185、303—304、343、352—353、470—471。
——封建社会的人——33—34。
——资产阶级社会的人——33—34、45—48、580。
——人和社会的共产主义改造——49—53、691。
——共产主义条件下个人的全面发展——46、53。
——共产主义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3。
人的活动
——和意识——498。
——人的精神活动——35。
——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活动——34。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470。
人口(居民)
——人口的增长及其在社会生产发展中的作用——36、159、222、333—334、397。
——人口和军事——333—334。
人民、人民群众——99、102、140、352—353、355、359、406、407、445。
人民武装——195、393、415。
人权
——资产阶级人权观念的阶级局限性——501。
——资产阶级社会中不可能真正实现劳动权——87—88。
人与自然
——人和自然界——566、580、683、691。
——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和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36、566、571、580。
——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支配——691。
——人通过认识和利用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来支配自然力——36、580、683、691。
——自然科学和工业是人类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580。
——人对自然力的利用——36、691。
瑞士——261、264、267、276。

S

僧侣、教士
——概述——34、58、59、225—227、257、314、316、326、380、561。
——作为剥削阶级的利益和社会的反动倾向的表达者——55—56、139、156、208、223、372、378、380、571。
——僧侣是中世纪封建意识形态的代表——55—56、225、378。
——教士在社会等级制中的地位——

34、55—56、156、372、571。
——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教士——35、156。
——和世俗教育——378、568。
沙文主义——216、219。
商品
——概述——604—605。
——商品作为社会关系的载体——604。
——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的条件——604。
——商品的二重性——604。
——商品的内在矛盾——605。
商业(贸易)
——概述——32、354—355、608、611—613。
——商业和交通工具的发展——32、691。
——世界贸易——32、221—222。
——商业和竞争——221—222、355。
——商业和经济危机——610—614。
上层建筑——见**基础和上层建筑**。
社会
——概述——31—32、51、53、62、473、511—512、560、564、573、613。
——社会存在——51、591、597。
——社会的基础——591—592。
——社会规律——62。
——社会矛盾——102。
——社会和自然界——566、580。
——社会和生产——14、35—36、56—57、91、166、175、591、597。
——社会和生产方式——见**生产方式**。
——社会和生产力——36—37、41、52、176。
——社会和阶级——9、14、31、41—42、51、74—75、85—88、102、238—239、571。
——阶级斗争在对抗性社会中的作用——9、14、31—32。
——社会和革命——14、51、66、73、88、105。
——社会和家庭——48—49、566。
——社会和国家、法——86、105、248、474、511—512、565—567、591—592、597、613。
——社会和社会意识——50—52、591—592、597。
——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50—51。
——社会和人、个人——45—46、53。
——社会的发展、进步——51、53、242、605。
——社会的组织、形式、体系——31、238—239、273、682。
——原始社会——14、31。
——行会市民社会——238。
——封建社会——见**封建社会**。
——市民社会——见**市民社会**。
——资产阶级社会——见**资产阶级社会**。
——无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见**共产主义**(社会形态)。
——共产主义社会是真正的人的社会

——53、592。
社会革命
——概述——105、113、256、579—580、682—683、691。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社会革命的基础——见**生产力**。
——是从一种社会形态到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过渡形式——591—592、597。
——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104、113、450、473、580、591—592、597、691。
社会关系
——概述——34、50、90、113、166、176、206、231、333、498、566。
——和人对自然的关系——566。
——社会关系的发展——34、48、166、176。
社会劳动组织
——大工业是社会劳动组织的形式——41、43、56。
——和科学的应用——691。
——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条件下的劳动组织——52—53。
社会(个人、阶级)生存的物质条件
——概述——42—43、48、50、59、61—62、304、357、378、498、592、597。
——人的生存条件是社会存在——597。
——个人、阶级生存的物质条件——39、42、43、48、357、378、498、567。
——和社会意识——见**意识**。
——和革命——61、303—304、352、591—592、597。
——社会的共产主义改造的物质前提——62、592、597、689、691。
社会形态(经济的社会形态)
——经济的社会形态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是社会的经济结构——591。
——和生产力、生产资料——591—592。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592。
——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592。
——社会形态的演进——471、592、597。
社会制度——36、89—91、100、102。
社会主义(理论和流派)
——概述——21、218—219。
——封建的社会主义、反动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的社会主义——54—56、64。
——“真正的社会主义”——57—62。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保守的社会主义——60—61、64、165、240、514。
——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56—57、165、479—480。

——空想社会主义——见**空想社会主义**。
——空论的社会主义——102、134、135、166、168。
——科学社会主义——见**科学社会主义、科学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革命——见**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
神圣同盟——325。
神学——235、236、247—248、252。
审判制度——见**法院(法庭)、审判制度**。
生产
——概述——469、479、566、591—592、691。
——生产和自然界——36、691。
——生产和社会——35—36、56—57、91、166、176、591。
——生产和交往——133、304。
——生产和所有制、所有制形式、财产关系——36—37、47—48、88—89。
——生产和国家、法——52—53、81、591—592。
——生产和社会意识——51、165—167、304、591—592。
——生产和科学——36、691。
——物质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35、47—48、51、53、133、156、591—592、691。
——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支配——691。
——精神生产——35、48、51。
——生产的发展——35—37、50。
——共产主义条件下生产的调节——52—53、691。
生产方式
——生产方式和社会、社会关系、生产关系——14、34、52、469、591—592、597。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591、597。
——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生产工具——34—37。
——生产方式和交换——14、469。
——生产方式和阶级——14、33—35。
——亚细亚生产方式——592、679、681—682。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592。
——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质——14。
——生产方式的变更和发展——33—35、52。
生产工具——34、35、39、49、52、159、335。
生产关系
——概述——569、591—592。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

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591。
——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591。
——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591。
——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形式——591—592。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35—37、591—592、597。
——生产关系和所有制、所有制形式、财产关系——36—37、48、52、569、591—592、597。
——财产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591、597。
——生产关系和社会、社会关系——34、36、48、53、61、166、176。
——生产关系的发展——34、36—37、39、48、52—53、56、61、113、166。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592、597。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592、597。
——生产关系和无产阶级革命、共产主义革命——46—48、50、52—53、61、88、91—92、166、591—592、597。

生产管理
——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条件下的生产管理——47、52—53、63—64。

生产力
——生产力的构成——36。
——科学是生产力——580。
——物质生产力——591—592、597。
——社会生产力——42、591—592。
——生产力和社会——35—37、42、52、176。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37、591—592、597。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社会革命的基础——580、591—592、597。
——生产力和阶级——35—37、42、52、192。
——生产力的发展——35—37、52、176、471、591—592、597、689、691。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力——35—38、176、198、256、471、580、592、597、687。
——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的共产主义改造的物质前提——256、592、597、689、691。
——新的生产力是军事上的新成就的前提——333。
——共产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力——42、52—53、192、198、580。

生产资料
——概述——36、57、198。

——生产资料和物质生产——36。
——生产资料和所有制(所有权、财产)——36—37、57、113。
——生产资料社会化——46、52、113、333。
——“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社会化)这一公式及其意义——113。
——生产资料和社会——57。
——生产资料的发展——36、333。
——封建主义制度下的生产资料——36。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资料——31、36、88、113。
——生产资料同直接生产者的分离——31。
——过渡时期生产资料发展的必要性——333。
——共产主义条件下的生产资料——113、333。
生活资料——37、38、46、211、566。
圣经
——圣经词句在中世纪具有法律效力——235、247—252、253。
——圣经和宗教改革——242—246。
圣西门、圣西门主义——62—64、218、361、368、583。
十字军征讨——34。
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性质、任务——45、76—78、102、103、197、232、235、328、329、470—474。
——历史意义——471—472。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394、403。
时代
——概述——234、579。
——工业发展的经济时代——584。
——历史时代——9、14、31。
——革命时代——471、592。
——社会时代——75—76、137。
——资产阶级时代——32、34、62、328、330、580、691。
——科学中的时代——600—601。
实践——见理论和实践。
世界观
——唯物主义世界观——601。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598、601。
世界市场
——概述——32、35、88、552、588、617、629、639。
——世界市场的产生——35。
——世界市场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32、35、88—89、691。
——世界市场和生产关系——88。
——英国对世界市场的垄断——7、88、155、175、354。
——世界市场和经济危机——552—553。
市场
——概述——37、373、617、639。
——国内市场——355、373。
——销售市场——672。
——市场和经济危机——551—553。

——东印度市场——32。
——中国市场——32、610、611、638—641。
市侩——见小市民(市侩)。
市民
——中世纪的市民——32、40、47、227—229、230、232、236—244、254、266、271、294。
——市民反对派——228—229、259、285。
——市民和资产阶级的形成——32、56、228。
——行会师傅——31、32、230。
市民社会
——概述——32、153、230、238、294、471—472、591、597。
——市民社会是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591。
——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230、238、294、471、591、597。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591。
收入
——概述——227、587。
——纯收入——159—160。
手段——见目的和手段。
手工业
——概述——39。
——封建制度下的手工业——32、221、230、299、357、377。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手工业——39、355—356、377、378。
税收制度——见赋税、税收制度。
私有制(私有权、私有财产)
——概述——45、48、52。
——私有制和工人阶级——42、46、52。
——私有制和法——48、178。
——私有制的历史性质、私有制形式的历史更替——45—48。
——封建私有制——36、196—197。
——资产阶级私有制或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形式——45—47。
——作为资产阶级统治的条件——43、133、157、386、390、479—480、516。
——私有制和人——45—46。
——消灭私有制的历史必然性——42—43、45—48、66、248。
——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为消灭私有制创造了前提——45—47。
——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限制和废除私有制——8、42、45—47、52—53、66、129、169、192、198。
思想——见观念、思想。
所有制(所有权、财产)
——概述——36、45、47、89、358、569—570。
——所有制关系(财产关系)——36—37、45—46、48、52、57、89、358、591—592、597。
——财产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591、597。

——所有制和社会——36—37、45—46、48、57、89、591—592。
——所有制和生产资料——31、36—37、57、113。
——所有制和生产关系——36—37、48、52、569、591、597。
——所有制的发展、它的历史性质——36—37、45—46、48。
——所有制的形式——499、569。
——封建的、等级的所有制——36、45—48、52、57。
——资产阶级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36—37、45、48、196。
——私有制——见**私有制(私有权、私有财产)**。
——国家所有制——见**国家所有制**。
——所有制和革命——36—37、45、52、57、66、591—592、597。

T

太平天国起义(1851—1864年)——607—612、616、625—628、634、641、646、650—651。
特殊——见**个别、特殊和普遍**。
天文学——607。
天主教
——概述——162、234、239—240、242、247。
——天主教教阶制度——241、276。
铁路——40、82、379、575、583、605、687—688。
同化(民族的)——430、686。
投机(货币的、交易所的)
——概述——80、81、153、207、376、583、585。
——交易所和投机、舞弊——81、153、375、575。
——投机和经济危机——552。
——投机和资产阶级国家的作用——81—83。
土地
——土地肥力——159。
——土地革命——196。
——土地国有化——52、196。
土地所有制(土地所有权、地产)
——概述——7—8、210、375、499、588。
——和资本——499、588。
——和土地价格——158—159。
——和竞争——7。
——和土地抵押——159—160、569、570。
——和高利贷——159—160、358。
——亚洲的土地占有制形式——686。
——封建土地所有制——36、353、375。
——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29、294、499。
——小块土地制度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159。
——无产阶级革命将废除土地私有制——52、196。
——土地转变为社会财产——211。
土地析分、小块土地

——概述——158—159、471、566—573。
——小农——331、566—570。
——小土地所有权、小农经济——471、568—571。
——和抵押——159—160、572。
——作为“拿破仑的”所有制形式——569。

W

外化——见**异化(外化)**。
万有引力定律——607。
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世界观——601—602。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597—598、601—602。
——唯物主义的方法——601—603。
——自然科学唯物主义——601。
唯物主义历史观——见**历史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
唯心主义
——唯心主义历史观——204、598、601、602。
——唯心主义的历史——601—603。
——德国的唯心主义——593。
——黑格尔的唯心主义——601—603。
维也纳会议(1814—1815年)——360、370、481。
文化——330、331。
文明
——概述——35、37、56、66、116、222、235、330—331、479、515、626、632、663、690。
——文明的发展——56。
——资产阶级文明——35、37、56、66、116、330、379、401、479、515、690。
——不同民族的文明水平——430、682。
文艺复兴时代——468。
无产阶级——见**工人阶级、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
——概述——613—614。
——实质、任务和历史必然性——8、37—38、42—43、52—53、65—66、154—155、176、209、445—447、449、476—477、579—580、592、597—598、691。
——它的前提——26、36—37、39—43、62、88—89、175—176、351—352、476—479、591—592、597—598、689、691。
——同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区别——101—103、104、474、563。
——它的国际性质——50、66、88、104—105、192、580、691。
——工人阶级组成独立政党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44—45、65—66、199。
——和平方法和暴力方法——43、52—53、66。
——和无产阶级专政——6、15、42—43、44、50、52、563—564、573。
——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生产

资料公有制——42、46、52—53、113、333。
——和民族问题——50、104、689、691。
——和农民，工农联盟的必要性——52—53、160—161、164、196—197、210—211。
——术语："共产主义革命"——52、66。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22、44、66。
无产阶级斗争策略
——概述——13—14、426。
——实现民主要求的斗争策略——11—14、40。
——不断革命的策略——52—53、192—199。
——革命斗争的策略——426、445—447。
无产阶级政党
——它的性质、纲领、斗争目标——5—6、11、15、18、30、44—45、65、66、192—193、198、389、598。
——革命理论对革命政党实践活动的意义——44—45。
——和无产阶级专政——42—45、50、52—53、192。
——要求消灭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45—46、52—53、66、113。
——它的策略——65—66、191—199、389、446。
——和非无产阶级的社会理论——54—64。
——取得政权以后的无产阶级政党——52—53。
无产阶级专政
——历史必然性——43、44、50、52、103—104、166、192。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52。
——作为过渡时期的国家——52—53、104、166、192。
——它的历史任务——15、50—53、192—193、196—197。
——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15、563。
——和农民——160—161、196—197。
——和民族问题的解决——50。
——和阶级、阶级斗争——53、166、344。
——无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专政——44、65—66。
——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是建成无阶级社会的手段——52—53、166、192。
——术语："工人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104、166。
无神论——247、248。
武装起义
——概述——236、445—447。
——起义是一种艺术——446。
——武装起义的策略——425—427、445—447。

——无产阶级武装起义——143。
物质的
——概述——35、50—51、59、135、305、498、501。
——物质的和精神的——35、135、591、597。
——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35、51。
——物质的和观念的——550。
——物质的和社会的——591、597。
——经济关系是阶级斗争的物质基础——467。
——物质力量——574、580。
——人的物质生活——591—592、597。
——物质生产——35、479。
——物质生产力——591、597。
——物质利益——136、235、355、500、512、550。
——物质利益和政治利益——512、550。

X

现实
——概述——45、58、605。
——现实的东西和想象的东西——99。
——现实和幻想——238—239。
——现实的和理想的——165—166。
——现实和意识、思维——438、498、603—604。
——现实和抽象——603—605。
——现实和理论——44—45。
——现实在意识中的反映——603。
——现实的内容——121。
——现实的人——58。
——现实的发展——603。
——现实和哲学——58。
现象——见本质和现象。
宪法
——概述——112—115、121—122、125—128、138—140、170—171、183、438。
——资产阶级宪法的阶级局限性——112—115、122、170、183—184、438、482—486、506。
——宪法和权力分立——69—70、484—485。
——资产阶级社会的立宪制度、立宪统治——361、368。
乡村——见城市和乡村。
香港——643、645。
相互作用——604。
小块土地——见土地析分、小块土地。
小市民(市侩)——34、256。
小说(文艺作品的形式)——179、361、596。
小亚细亚——609。
小资产阶级
——概述——39、42、43、56、89、165、209、355—356、450—451、500—501。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经济状况——39、56、89、165。
——资本积聚的加速使小资产阶级的破产加速——584。

——和工人阶级以及社会主义运动——39、41、42、56—57、89、104、106、133、140、164、356、389、500。
——作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89、104、133—134、164。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106、114、136、140、191—198、356、389、442、450—451、455、458。
——和无产阶级革命——89。
——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165—166、356、389。
——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界代表——500—501。
新教——276、305、306、372。
新事物——见旧事物和新事物。
新闻出版——见报刊、新闻出版。
信贷(信用)
——概述——52、81、91—93、95、109。
——信贷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和结果——93—94、109—110。
——商业信用——93、94。
——私人信用——91、92。
——国家信用——81、91、94、548。
行政权——见立法权和行政权。
形而上学——600—605。
匈牙利
——概述——430。
——1514年的农民战争——267。
——1848—1849年的匈牙利——91、104、134、138、146、394、403—404、413、417—420、430、443。
——政治制度——378—380。
需要
——概述——35、103、225、352、357、358、391、528。
——需要和生产——688。
——需要和国家——354、355、357、392。
——需要和意识——103、352、357、368。
——感觉到的需要——355、371。
——观念、思想是需要的反映——236—237。
——直接的需要——103—104、389、688。
——社会的需要——74、352。
——需要的满足和发展——35、352、688—689。
——需要的改变、发展、增长，新需要的产生——222、225—227、355。
——需要和革命——74—76、103—104、355、357、389、391—392。
选举权、普选权
——概述——99、114、121、167、170、177—178、483、519、520、528。
——执政阶级控制选举——519—520。
——选举资格——483。
——在资产阶级国家中选举权的不平等性质和局限性——99、114—115、170—171、483、518—520、528。
——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普选权对工人阶级的意义——114—115、178、

388—389。

Y

鸦片贸易——608—609、613、621、629—636、641、643、644、671、672、673。

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的侵略性质和掠夺性质——615、629、641。

——1840—1842年英国对中国的战争——609、621、622、625、629、634—635、643、645、647、648。

——1856—1860年英法对中国的战争——615、618—621、622、625—628、629、641、643—648、650、654—660。

——南京条约——629、635、637、639—641、643—648、650。

——天津条约——629、637、643—648、654—657。

亚细亚生产方式——见**生产方式**。

亚洲——628、672、677—679、682。

研究——203、352、466、591、593、600、604。

耶稣会——157、163、168、490、513。

医生——34、81。

艺术——472、592。

议会(资产阶级国家的)

——议会的阶级性和职能——162、441、484—486、491—492、505—506、515、530、550、563。

——工人阶级利用资产阶级议会——206、209。

——“议会迷”——437、536、556。

异化(**外化**)

——人的异化、外化、自我异化——58。

——异化的消灭——248。

异教、异教徒——236—238、240、246、249。

意大利——25、33、375、412、677。

意识

——意识和存在——50—52、591—592、597—598。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48—50、591、597。

——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50—51。

——意识和现实——见**现实**。

——意识是社会的、历史的产物——48、498。

——意识和人——438、498、592。

——意识和社会、社会关系——34、48、166、498、591。

——意识和社会生存的物质条件——50—51、57、59、357、498、501、591—592、597—598。

——意识和阶级——51—52、356、498、501。

——社会意识的形式——9、14、51—52、166、591—592、597。

——意识的发展——33—34、403。
——工人阶级的意识——65、103—104、466—467。
——现代意识和传统意识——568。
意识形态
——概述——52、469、501、547、550、591—592。
——和社会关系、经济关系——469、592。
——种类、形式——50—51、469、592。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41、81、102、122、152、501、547、550。
——和宗教——42、469、592。
——德意志意识形态——234、235、593。
——意识形态家(思想家)——41、81、133、227、234—235、501、547、550。
意志
——意志和现实——48、304、591。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591。
——法是上升为法律的统治阶级意志——48、563。
——个人的意志——563。
——人民的意志——392、409、491、496、563。
——阶级意志——48、58。
因果性
——辩证法的因果观和形而上学的因果观——601。
——原因和结果的相互作用——154、159、316—317、574。
——原因和结果在相互作用中丧失自己的特征——574。
——实际的因果联系——216。
——历史上的因果性、历史原因——36、39—40、242、316、317、319、329—330、352—355、399、410、551—553、569、607—608。
银行
——概述——52、81、92—93、376、548。
——银行和银行(货币)资本——52、80—82、92—93、174—175、376、548。
——银行和信贷(信用)——52、548。
——银行和交易所——92。
——银行和国家——81、92—93、548、575。
——金融贵族——81—84、91、93、152—153、174、547—548。
——银行家的利益——152—153、547。
——银行破产——93。
——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银行——548、575。
——股份银行——585。
——商业银行——583。
——过渡时期的银行——52。
——蒲鲁东论银行——478。

银行券——93、174—175、583。
印度
——概述——31、32、221、608、613、677—683、685—691。
——种姓,种姓制度——683、685、689。
——宗教,宗教纠纷——678、683、685、689。
——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和销售市场——608、613、631—635、676、677—680、685、686、689—691。
——资本主义在印度的发展是英国统治的后果之一——686—691。
英国
——概述——33、154—155、222、635、671。
——英国是资产阶级世界的缔造者——175。
——17—18世纪的英国——74、354。
——19世纪的英国——33、54、91、153—155、175、353—354。
——19世纪工商业的繁荣——610。
——工业、商业、金融、交通事业和经济的发展——175。
——工商业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7、88、155、175、354。
——经济危机——84、173、175、610。
——社会政治制度,立法——351、353。
——对中国和印度的殖民扩张——608—611、615、619—621、626、637、677—678、688—689。
——社会革命及其前途——175—176。
预算
——预算的阶级性质——81—82、156。
——预算和国债——156。
——预算和赋税——81、93。

Z

占有——42、46—48、113。
战争
——概述——70、104、155、320、399—405、417—419、446。
——战争艺术——417—419、426、446。
——战略和战术——323—324、328、332、334。
——掠夺战争的后果及其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影响——88、354、398、438、472、614。
——作战体系、作战方法——328—330、332、336。
——战争和革命及革命运动——88、155、320、398。
——革命战争——88、335、341、418。
——人民战争——626。
——掠夺战争、侵略战争——328。
——殖民战争——629。
——世界战争——104。
——鸦片战争——见**鸦片战争**。
哲学
——哲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式——50—51、469、591、592、597、598。
——哲学和现实——51、58。
——哲学和阶级——51。
——哲学领域中的意识形态斗争是各

社会阶级的斗争的表现——469。
——哲学和宗教——51、247。
——哲学和自然科学——601。
——哲学的思维方式——602。
——哲学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50—51、58、591。
——哲学的历史——51、235。
——古代哲学——235。
——近代哲学——247。
——宗教哲学——247。
征服——396、686。
政变——324。
政党
——概述——271、303—304、352、498—499、565。
——政党和阶级、阶级对立——85、133—136、254、499。
政治(政策)
——概述——235、469。
——政治上层建筑——50—53、591—592、597。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591、597。
——政治和社会关系——14、65—66、99—100、114—115、499—500、515、680。
——政治和阶级斗争——39、204、468—469。
——共产主义条件下政治上层建筑的消亡——53。
——政治统治——208、515。
——政治解放——329。
——对政治的唯心主义理解——203—204。
政治斗争
——经济关系是政治斗争的物质基础——591—592、597—598。
——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40。
——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形式——204—205、234—235、468—469。
政治经济学
——概述——593—594、595—596、600、603—604。
——政治经济学的对象——595—596、603—604。
——和辩证法——600—605。
——和唯物主义历史观——588—594、595—598、600—604。
政治制度——18、36、59、66、74、355。
知识分子——34、41、81。
殖民地
——殖民制度——678。
——殖民地经济的畸形发展——32。
——殖民地的解放斗争——50、689—690。
——殖民地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途径——689。
中国
——概述——375、607、612—613、622、626—628、632、650—653。
——经济、财政——608—609、641—642、672、674—675。

——对外贸易——608—613、615—617、620—621、629—634、637—642、645—648、650—652、665—666、672—674。
——白银外流——608、634。
——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608、609、612—613、617、622、627—628、632、634、650。
——作为殖民扩张的对象——32、608—613、615—616、620—621、637—642、670—672。
——地方工业的破坏——609。
——鸦片贸易——见**鸦片贸易**。
——华工、移民——621、625。
——对外政策——608—613、644—646、650—651、665—666、672—674。
——鸦片战争——见**鸦片战争**。
——反对社会政治压迫的人民斗争——608。
——人民战争——626。
——对欧洲革命运动的作用——607—614。
中世纪——26、32、34、39、222、223、234—236、239。
中央集权
——概述——164、220、573。
——在封建社会瓦解和资本主义萌芽时期——222—223、273、294、316、564、573。
——资产阶级国家的中央集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36、564、573。
种姓、种姓制度——见**印度**。
主教——226、299、312。
专制制度、专制政体
——概述——164、373、379、395、414、431、437、503、564。
——军事专制制度——395。
——亚洲式(东方)专制制度——678、682。
——欧洲式专制制度——318、678。
资本
——概述——43、113、501。
——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38、43、45—46、87—88、501、584。
——资本和地产——498—499、588。
——资本的积聚——8、584。
——资本的集中——81、691。
——资本的统治——104、691。
——资本和资本主义矛盾的深化——114—115。
资本家
——概述——31、32—34、46、81。
——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见**竞争**。
——大资本家吞并小资本家——81、690—691。
——资本家和工人——31、46、103。
资本主义(社会形态)——471、592。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它的产生、发展和特征——35、176。
——它的历史性质——592。
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过渡

——概述——52—53、155、165—166、196—197。
——社会的共产主义改造的长期性和复杂性——155、335。
——过渡措施——52—53。
——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52、333。
——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52—53、196。
——无产阶级专政与国家——50、52—53、103—104、155、166、192。
资产阶级、资本家阶级
——概述——25、55、87—88、328、329、531、535、549—551、689—691。
——它的产生和发展——32—42、55—56、227—229。
——反封建贵族、反君主制的斗争——33、40、41、51、54—56、61、66、73、75、88、351、353、514。
——它在发展生产力中的作用——32—37、43、88—89、689、691。
——它的经济统治——14、35—36、43、88、357。
——它的政治统治的物质基础——88、591—592。
——工业资产阶级——32、38、80、88、132、143—144、207、357。
——金融资产阶级(金融贵族)——80—84、89、93、132、152—155。
——资产阶级内部的派系之争——41、80—81、112—114、132、151—155、182、356—357、479—482、498—499、540—545。
——自由派资产阶级——189、240、391、461。
——资产阶级的理论家和思想家——41、80—81、501、547、550。
——和君主专制——33、73、113、505、542。
——和国家权力、和法——33、36、43、48、59、81—82、104、112、114—115、132、169—171、205—209、354、357、511—515。
——成为历史发展的障碍——36—37、43、537—538。
——与封建反动派的勾结——75—76、104、389—391、535。
——资产阶级生产了自身的掘墓人——26、37—38、43、55。
——和农民——36、42、104、160—162、191、196、365、389—390、568—569。
——它的意识形态、世界观——41—42。
——和民族问题——26。
——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43。
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概述——26、33、34、39、51、86、90—91、101—103、175—176、351—352、364—365、382—384、387、389—391、440、449、473—476、564—565、613。
——它的性质、目的和任务——353—

355、471、476、563—564。
——革命沿着上升或下降的路线进行的可能性——494—495。
——它的局限性——74—75、103、189—190、364—365、386—387、441、471、472、518—519。
——对旧的国家机器的态度——90、387、484、563—565。
——作为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阶段——26、88—89、155、192、194、198—199、351—352、449、563。
——和所有制——37、45、66。
——和农民、土地问题——89、94、114、116、133、157—161、196、244、365、389—390、449—450、458、567—569。
——革命的动力、人民群众的作用——72—76、102、352—356、391—392、449、472、474。
——和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与策略——24、25—26、52—53、65—66、73、75、86—88、99—100、117、188—199、352、382—384、389、445、449、454、458。
——和小资产阶级——133、136—137、190—199、356、442、450、455、458。
——和民族问题——397—399、402—405、419。

资产阶级共和国

——概述——71、86—87、99—100、104、106—108、112—115、122、127、132—133、137、144、147、151—153、161—162、169—172、180、373、389、477、479、489、499、536、561。
——议会制共和国(立宪共和国)——137、144、147、151—153、161—162、169—172、494、499、505、515、536、553、558—565、568。
——联邦共和国——190、198、373、389。
——和工人阶级——85—87、97—104、374、389。
——和农民——116、159—160。

资产阶级国家

——概述——36、59、86—88、104、156、331、407、479、488—489、564—565、570。
——作为阶级统治和剥削劳动群众的手段——33、38、86、104、156—157、189—190、510—512、565。
——它的寄生性质——512、564—565。
——三权分立——69、151、484—486、512、520、529、563—564。
——它的各种形式——39、82、87、99—100、111—113、138、151、164、170、171、479、489。

资产阶级民主

——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191、194、196。
——它的阶级性、局限性——33、114—115、483—486。

资产阶级社会
——概述——32、34、36—37、43、45—47、74、83、176、471、479—480、499—500、580、592。
——它的形成——32、36、229—230、238—239、470—471。
——它的经济基础、经济制度——14、35、43、88、132、175、471—472、591—592。
——它的社会关系——34、36—37、49、73—74、88、91、99—102、176、239、580。
——它的社会制度——36、74、87—88、89、91、99—100、127。
——阶级、社会阶层、阶级斗争——33、39—42、56、89、99—102、477—479、592。
——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一个主要阶级——32、43、450。
——和国家——74、86、99—101、103—104、112—114、164、479、487、510—512、558—565、570、573。
——它灭亡的历史必然性——37、41、43、176、580、592、597、691。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概述——604—605。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表现——595、600。
——它的教条性质——596。
——它的辩护性质——600。
——它的拜物教性质——604。
资产阶级专政——33—34、103—104、112、161、162、164、170、479。
自然、自然界
——自然界和人——见**人与自然**。
——自然界和生产——566。
——自然界和社会——566、580。
——科学是改造自然界和征服自然界的手段——691。
——自然界和宗教——683。
自由
——概述——45、47、59、104、206、207、215、387、407、483—484、514、580。
——资产阶级社会的个性自由及其虚伪性——46—47、483—484、514。
——政治自由——11、47、51—53、59、407、483—484。
——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自由是有产阶级的特权，它的局限性——59、407、483—484。
——新闻出版自由——见**报刊、新闻出版**。
——迁徙自由——206、207、215。
——言论自由——483—484。
——集会、结社自由——127、387、407、483。
——宗教和信仰自由——51、483。
——经营自由——206、215。
——人们获得真正解放的条件——51—52、62、580。
——共产主义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

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3。
自由贸易（贸易自由）——34、47、154、636。
自由主义
——概述——59、108、119、228、355、367、391—392、458、480、514、516。
——德国的自由主义——59、72、190。
宗教
——宗教的产生、发展和本质——34、42、51、129、156—157、690—691。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50、204、235、469、592、597。
——宗教的社会作用——34、42、55—56、129、133、157、169、235、372、386。
——宗教教义——235—238、241、247—248。
——封建社会的宗教、中世纪的宗教——34、51、55—56、235—239。
——资产阶级社会的宗教——34、129、133、157、386。
——宗教和国家——372、373。
——宗教和统治阶级——51、129、133。
——宗教纷争——204、235、255、372、469、472、685。
——宗教改革——234、239、241、271、272、306、317、595。
——宗教战争——235、314。
——宗教和信仰自由——见**自由**。
——宗教教派——236—239、245、253、255—257、372—373。
——宗教的消亡及消亡的条件——51。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点著作
译文审核和修订课题组

首席专家　韦建桦

主要成员　顾锦屏　王学东　李其庆　周亮勋
王锡君　蒋仁祥　胡永钦　翟民刚
章丽莉　张钟朴　冯文光　柴方国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编审委员会

第二卷编审人员

文献选辑和编纂

韦建桦　顾锦屏　李其庆　周亮勋
王锡君　蒋仁祥　胡永钦　章丽莉
张钟朴　冯文光　柴方国

译文审核和修订

王学东　韦建桦　夏　静

题注和说明

韦建桦　顾锦屏　王学东　柴方国

资料审核和修订

王栋华　章丽莉　蒋仁祥　胡永钦
章　林　刘洪涛　沈　延　单志澄
李　楠　张红山　李朝晖　张凤凤

全卷译文和资料审定

王学东